《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

考古发掘与历史复原

法国汉学 第十一辑

中华书局

法国汉学　第十一辑

考古发掘与历史复原

《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
陈星灿　米盖拉　主编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古发掘与历史复原/《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中华书局,2006

(法国汉学;第11辑)

ISBN 7-101-05361-0

Ⅰ.考… Ⅱ.法… Ⅲ.考古发掘-世界 Ⅳ.K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31112号

书　　名 考古发掘与历史复原

丛 书 名 法国汉学(第十一辑)

编　　者 《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责任编辑 孙文颖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 //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12月北京第1版

200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960毫米 1/16

印张26 插页8 字数450千字

印　　数 1-2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5361-0/K·2384

定　　价 58.00元

《法国汉学》第十一辑
《考古发掘与历史复原》编辑委员会名单

编委：傅飞岚（法国远东学院）
廖育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李学勤（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
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米盖拉（法国远东学院）
华　澜（法国远东学院）
柯　兰（法国远东学院）
吴　旻（法国远东学院）
李　零（北京大学）
邓文宽（中国文物研究所）
柴剑虹（中华书局）
端木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韩　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刘国忠（清华大学）
李晨光（中华书局）
孙文颖（中华书局）

图 1　2002 年发掘的一个二里头文化大水井（水井口的直径达四米多）
（杨宝成、杜德兰文）

图 2　喀拉墩古城：佛寺 A（N61）：上部图案中的佛陀坐像（脸部细节）
（© – 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队版权所有）
（戴蓬琳、伊弟利斯 · 阿不都热苏勒文）

图 3 喀拉墩古城：两座佛寺的装饰对比(© – 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队版权所有)
(戴蔻琳、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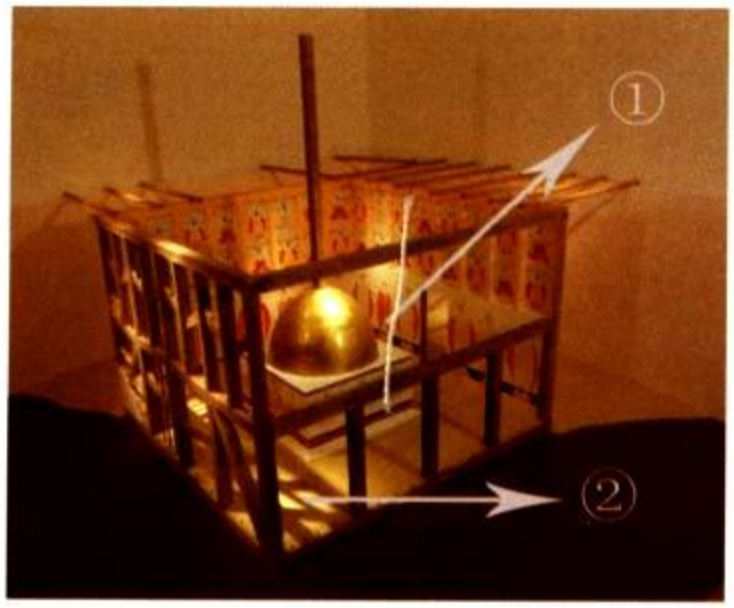


图 4 佛寺 A 模型：① cella（内神殿）；② pradakšina（行道）
（© – 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队版权所有）
（戴蓥琳、伊弟利斯 · 阿不都热苏勒文）

图 5 第一处宅院（局部，上为西）
（刘海旺文）

图6 第二处宅院（上为西）
（刘海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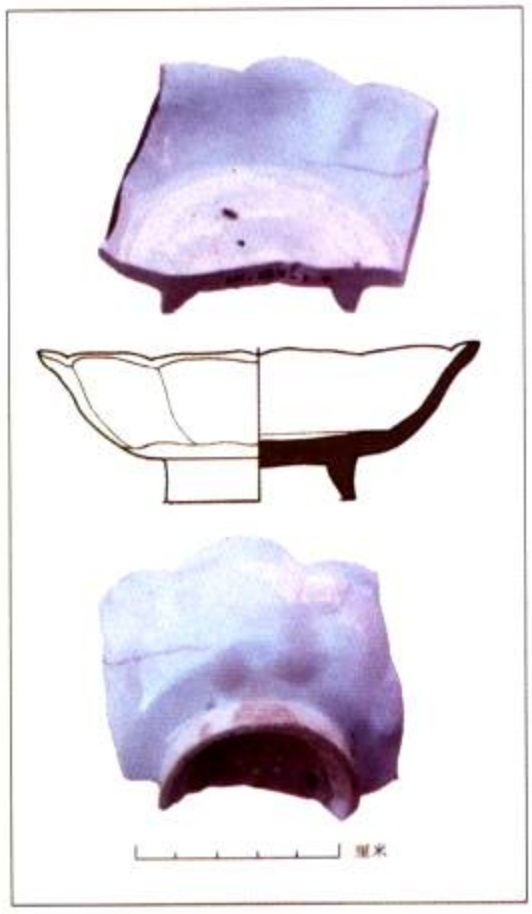


图7 莲花瓣碗，口径13厘米，北宋中期，江西景德镇窑或赣州窑，SHA 569－1，草图：Vincent Bernard，电脑制图：Antoine Jarrier，照片摄制：赵冰
（赵冰文）

图8 伊斯兰绿松石色釉碗碗底陶片，底径5厘米，伊朗卡尚地区窑场？十三世纪，SHA S 176，草图：Vincent Bernard，电脑制图和照片摄制：Axelle Rougeulle
（赵冰文）

图 9 哈乌内菲墓
（马迪厄文）

图 10 乌纳斯金字塔
（马迪厄文）

图 11 “埃尔切妇女”雕像（马德里，国立考古博物馆）
（莫雷文）

图 12 城墙：西勒诺斯（Silène）门（Mulliez 摄）
（缪理业文）

图 13 城墙：宙斯与赫拉（Héra）门（Mulliez 摄）
（缪理业文）

图 14 现代的围起港湾，它基本沿用了古代围起港湾的形状（Mulliez 摄）
（缪理业文）

图 15 从东端看到的塔索斯市政广场（Mulliez 摄）
（缪理业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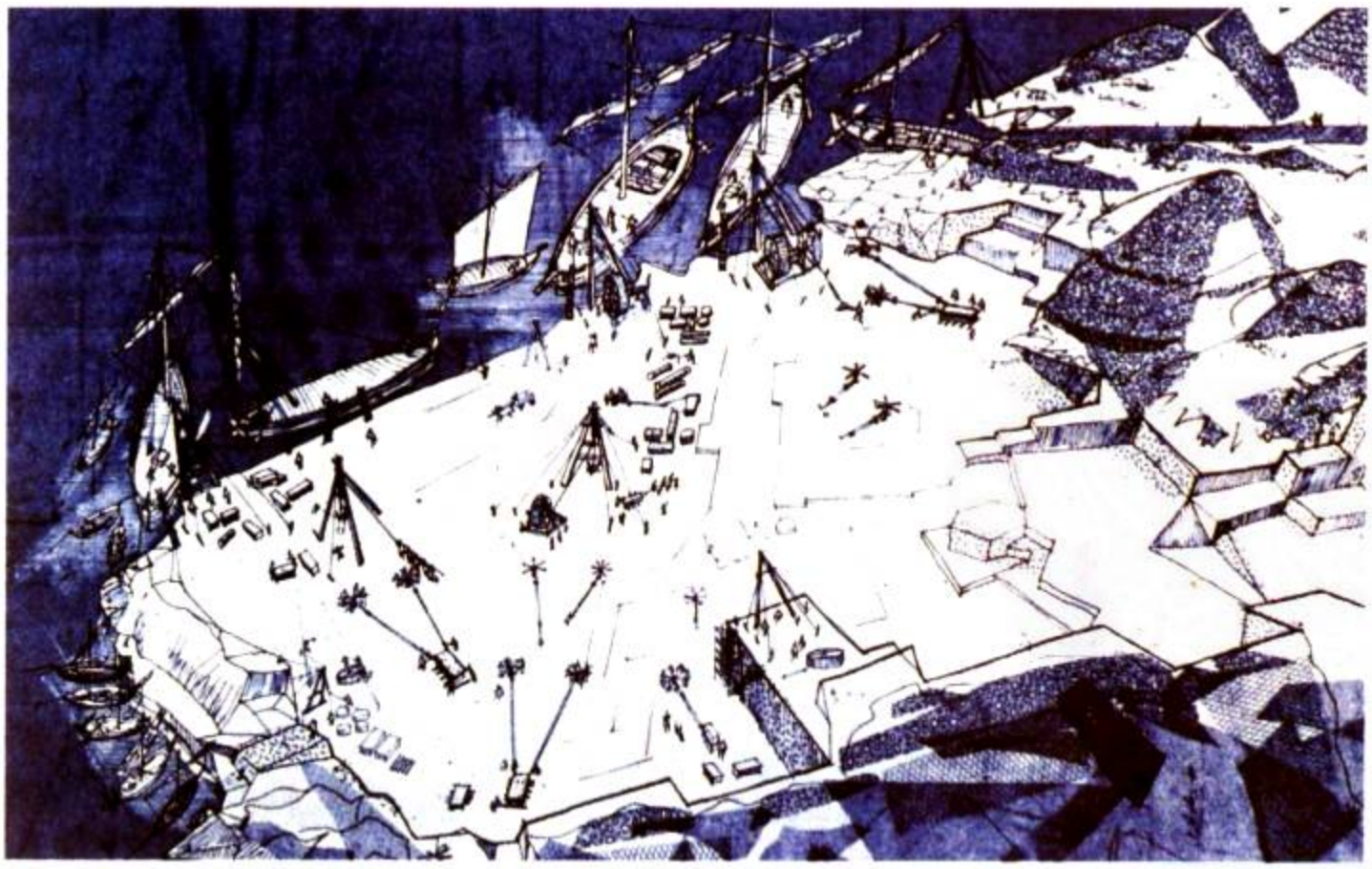


图 16 阿利基：大理石采石场工作状况再现（© – EfA/T. Kozelj 版权所有）
（缪理业文）

图 17 瓦笛·梅尼：刻有古代来往贝雷尼斯的旅行者粗糙文字的岩石
（博伦文）

图 18 Go Cây Me 遗址发掘（沃澳，2001）；人类在此居住 12 个世纪：从史初时代的居所直到吴哥时代的建筑
（莽甘文）

图19 吴哥遗址，位于洞里萨（Tonle Sap）湖以北，荔枝（Kulen）山以南（郭榭文）

图 20　吴哥，顶上有五座塔状殿堂的阶梯状庙宇，吴哥窟（12 世纪中期）
（郭谢文）

图 21　巴方寺的修复效果示意图
（若耶尔文）

目　　录

致读者 …… 米盖拉(1)

对中国考古的贡献

龙骨坡遗址与亚洲人类起源…… 侯亚梅 等(7)
中国早期盐业生产的考古和化学证据…… 付罗文 等(23)
南阳附近的龚营遗址的发掘:方法和结果…… 杨宝成　杜德兰(36)
在塔克拉玛干的沙漠里:公元初年丝绸之路开辟之前克里
　雅河谷消逝的绿洲——记中法新疆联合考古工作
　…… 戴蔻琳　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49)
首次发现的汉代农业闾里遗址——中国河南内黄三杨庄
　汉代聚落遗址初识 …… 刘海旺(64)
中世纪时期贸易中转港——也门舍尔迈遗址出土的中国
　瓷片 …… 赵　冰(79)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与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研究…… 刘庆柱(117)
基美博物馆所藏令簋的年代 …… 李学勤(128)
"北方系青铜器"——一个术语的"诞生"和"成长" …… 梅建军(132)
法国的先秦两汉出土文字资料研究概述 …… 风仪诚(148)

欧亚非考古与文明

法国海外学院——欧亚非考古与文明 …… 傅飞岚(163)
古埃及的几座金字塔(哑式金字塔　铭文金字塔　消失的
　金字塔) …… 马迪厄(165)
西班牙土地上的腓尼基人与希腊人——铁器时代"远西"
　地区的文化接触与交流模式 …… 莫　雷(180)
晨雾缭绕的塔索斯岛——古典和希腊化时期(公元前 5—
　前 1 世纪)一处帕罗斯人的殖民地 …… 缪理业(199)
经由埃及东部沙漠和红海而建立起来的罗马帝国与东方

诸国的商贸联系 …… 博　伦(223)
关于扶南国的考古学新研究——位于湄公河三角洲的沃澳(Oc Eo,越南)遗址 …… 莽　甘(247)
城市与考古的整体观——柬埔寨旧都吴哥城(10—16世纪) …… 郭　榭(267)

"历史、考古与社会"中法学术系列讲座

吴哥及其地域 …… 博悌叶(297)
文字记载与考古发现——阿莱西亚遗址给我们的启示 …… 列　德(322)

法国远东学院在东南亚的部分考古工作简介

柬埔寨考古遗址统计及其居住地域的分析 …… 布吉耶(341)
吴哥区域整治中的法柬联合考古工作 …… 博悌叶(345)
重修吴哥巴方寺计划 …… 若耶尔(350)
越南古皇城考古——遗址发掘与清理 …… 帕　潘(360)
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的巴如斯进行的法国—印尼联合考古研究 …… 贝雷　苏拉尺曼(366)
塔如玛纳嘎拉古国考古(西爪哇,印度尼西亚) …… 莽　甘(370)
东南亚艺术——法国远东学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合作项目 …… 嘉博德(374)

结语 …… 陈星灿(376)

附录一:大学三年后的考古学课程——从法国课程改革到建立起完整的职业道路 …… 杜尔若(380)
附录二:法国考古课程网址一览 …… 杜尔若(387)
附录三:作者、译者的联系方式 …… (393)

致 读 者

由于以往《法国汉学》对于考古学的介绍不多，我们希望通过本辑发表的“历史、考古与社会——中法系列学术讲座”中以考古学为主题的系列文章来填补这一空白。

正值中法文化年（2004—2005）之际，在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的赞助之下，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与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合作，组织了题为“欧亚非考古与文明”的讲座报告会。该系列讲座于2005年4月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位于文津街的分馆如期举行，获得了巨大成功，这应该归功于各个协作单位之间的精诚合作，以及各单位参与人员的全力配合。我们首先向中国国家图书馆分馆孙学雷副馆长与分馆相关人员、国际交流处严向东处长，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的王巍以及朱乃诚先生表示感谢，他们为讲座的顺利进行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们还要感谢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及其他相关单位的廖学胜、李裕群、刘健、杨共乐、殷玮璋、杨泓等学者的积极参与以及为讲座所作的精彩评论。讲座报告会的目的就在于介绍包括法国远东学院在内的法国各大海外学院所进行的部分考古工作。我们将这一系列讲座整理修订之后，全文发表在本期《法国汉学》之中，以飨读者。

同时，我们还荣幸地请到了李学勤先生（清华大学）、刘庆柱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傅飞岚院长（法国远东学院）在这次讲座报告会上发言。除傅飞岚先生的讲稿经过整理在本期发表之外，李先生和刘先生也都为本辑《法国汉学》撰写了专文。李先生的大作是对公元前10世纪的青铜器铭文研究，而刘先生的大作研究的则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都将收入本期《法国汉学》专论中国考古的第一部分。在这一部分里，我们还将收录杨宝成先生（武汉大学）和杜德兰先生（法国高等实验学院）在“欧亚非考古与文明”的讲座报告会上所做的精彩报告，文中介绍的是中法两国在河南进行合作考古的初步成果。此外，我们还将介绍其他一些中法合作考古的成果，如侯亚梅女士和博爱

客先生主持的史前考古项目，戴蔻琳女士和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先生在新疆进行的合作考古项目；此外本辑还有付罗文、罗泰等先生与海峡两岸考古学家开展的国际性合作成果等等。我们在这一部分中还将看到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赵冰女士撰写的有关法国考古学家在中东进行的东方陶瓷研究（亦请参见毕梅雪女士发表在《法国汉学》第四辑上的有关文章）；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海旺先生介绍的则是他们对汉代农业聚落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还有北京科技大学梅建军先生关于"北方系青铜器"的论述以及法国高等实验学院风仪诚先生对考古发现在法国其他研究领域中的影响所作的总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星灿先生在结语里对本辑文章所做的整体评论，是从专业的角度将之重新置于当代国际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背景之下。

本辑《法国汉学》的第二部分收录的文章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能相对陌生，我想在这里强调一下它们的独创性和高质量，它们可能会引起读者对于研究那些与中华文明同样古老、同样复杂、同样引人入胜的古代文明的兴趣。我们将看到有关地中海地区和东南亚在这一方面的例证：如开罗法国东方考古学研究所前所长马迪厄先生的古埃及金字塔研究和法国雅典学院院长缪理业先生对希腊萨索斯岛及其历史的研究。西班牙委拉士开支研究所的莫雷先生将为我们谈论当地铁器时代的腓尼基人与希腊人，而意大利贝哈尔中心的博伦先生则为我们描述了古罗马帝国与东方的商业联系。接下来两篇讲座的作者都是法国远东学院的成员：莽甘先生的文章论述的是在扶南国（今越南境内）进行的考古研究，而郭榭先生则介绍了他们在柬埔寨吴哥城所做的工作。另一位法国远东学院成员博悌叶先生有关吴哥地域的文章是今年"历史、考古与社会——中法系列学术讲座"中的一讲，它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于古代柬埔寨的认识；而法国实验学院列德先生的文章则是"历史、考古与社会——中法系列学术讲座"往年的一讲，内容有关罗马帝国时代高卢地区的阿莱西亚的考古发掘，这把我们又带回了这次异国旅行的起点。

一般而言，《法国汉学》的最后一个部分都是介绍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的活动，但是这一次我们介绍的是法国远东学院其他中心的工作。这里汇集了由我们的同事撰写的数篇短文，布吉耶、莽甘、帕潘、贝雷、博悌业、若耶尔和嘉博德等先生在文中分别介绍了一些正在东南亚进行的考古计划的主要情况。这些文章既不想把这些复杂计划的全貌详尽论述，也没有汇报法国远东学院各中心在这一领域或相近领域的全部工作，其目的只是提供一个概述，让有兴趣的读者可

以与他们联系以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此外，作为附录，我们选登了杜尔若女士的文章，介绍法国考古学专业的概况，希望对有志赴法学习该专业的学生能有所帮助。并附上一份尽可能详尽的中外作者联系方式表，为那些有兴趣与他们联系的读者或是希望师从他们深造的学生提供方便。

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　米盖拉

吴旻　译

对中国考古的贡献

龙骨坡遗址与亚洲人类起源[1]

侯亚梅、黄万波、博爱客（Eric BOËDA）、赵凌霞、徐自强、
杜爱溪（Axel DAUSSY）、葛励施（Christophe GRIGGO）、
何觅乐（Michel RASSE）、沙悠诗（Josette SAREL）、李英华、
鲁娜、鲍爱丽（Erika BODIN）、袁俊杰　著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一流传千古的古诗绝句出自中国唐代诗人元稹，描绘的是长江三峡巫山的传情神韵。巫山县历史悠久，秦汉时巫山称巫县，隋朝始用现名。巫山县的历史还可以追溯至史前时期，新石器时代以距今5、6千年的“大溪文化”为代表，大溪文化遗址位于瞿塘峡东口、大宁河宽谷岸旁的大溪镇，是长江流域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巫山的旧石器文化则能够远溯至200万年以前，遗址坐落于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名龙骨坡。

引　言

自1984年发现以来，巫山龙骨坡遗址的发掘、研究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2]，它提供了中国以至东亚最早的古人类生存证据，对人类起源理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随着工作的进展和更多证据的发现，龙骨坡遗址的科学价值也变得更加重要，本文将在以下章节中依次介绍该遗址的工作内容与研究进展，阐述其科学意义。

到目前为止，龙骨坡遗址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系统发掘和研究：

1. 第一阶段：1985—1988年，着重于古生物化石的发现与研究，四年中每年都进行发掘，共发现并采集到脊椎动物化石120种，其中哺乳动物化石116种，人类化石2件（曾被命名为“巫山人—*Homo erectus wushanensis*”），巨猿牙齿化石

14 个。发掘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重庆自然博物馆、巫山县文物管理所联合承担，黄万波、方其仁任领队。为了确定化石在埋藏地的空间位置，以南北为基线，2 米为基数，由西向东依据字母顺序，由北向南依据数字顺序组合为 A1、A2、A3……、B1、B2、B3……的系列探方编码。以 1 米为一个水平层给予垂直分层记录。发掘中对岩性特征、化石产状，特别是灵长类化石和石制品的埋藏情况都给予仔细的描述，并将其标记在探方图上，同时附照片及插图。该阶段的研究成果汇集于《巫山猿人遗址》一书发表[3]。

2. 第二阶段：1997—1998 年，本阶段的发掘工作由黄万波、徐自强等主持，工作方式与第一阶段相同，工作重点之一是继续寻找人类化石和巨猿化石，重点之二是寻找石制品和有人工痕迹的骨制品。发现的哺乳动物未超出第一阶段的种属与数量，在第 5 至第 8 水平层（L5—L8）获得石制品 20 余件，初步研究成果曾于《龙骨坡史前文化志》上发表[4]。

3. 第三阶段：2003 年至今，本阶段为中法合作发掘与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侯亚梅、黄万波和巴黎第十大学博爱客负责组织工作和具体实施。由于采用了新的野外工作方法和研究理念，使得这一阶段的工作与前两次有较大不同，成为一次真正具有考古学意义的发掘（详见下文）。初步工作中已获取大量翔实的旧石器、动物考古学和埋藏学依据，发现了 20 多个考古文化层，大大加强了龙骨坡的考古学证据，使该遗址有了更多的研究内涵，目前工作仍在进展当中。

本文首先介绍前两个阶段的发掘和研究成果，从遗址的发现、自然概况、人类化石、动物群、石制品、古环境、年代测定等方面给予论述，然后对第三个阶段的工作和最新成果加以概述，藉以展示这一东亚早期人类遗址的内涵和意义。

遗址的发现

1913 年，美国传教士埃德加（J. H. Edgar）凭着对中国古生物学的热情，经过周密的准备之后，来到了川东一带。他沿着宜昌到万县的长江边上，一边传教，一边发现了一些石器地点，采集到不少石制品。1921 年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兰阶（W. Granger）追寻埃德加的足迹，来到了川东一个叫盐井沟的地方。吸引他的是被当地人称为“龙骨”的药材，他打听到了“龙骨”的产地坪坝。这里无数的山洞里埋藏着“龙骨”，山高路难，葛兰阶一干就是好几年。到了 1926 年，他

已采集到上万件化石。这些化石被运到美国进行研究，盐井沟也从此被载入西方古生物学的史册。时光荏苒，1984 年 6 月，几位来自重庆自然博物馆和北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的新一代古生物学家们（黄万波、郑绍华、钟志楷、李宣民、杨代环、廖渝方、郑龙亭）因为仰慕葛兰阶的事迹，怀着向往，再次来到了盐井沟，见到了当年为葛兰阶挖过“龙骨”的老人，聊起那逝去的往事，重温着葛兰阶收购化石，得到“宝物”的幸福和快感，按捺不住一定要亲临坪坝的决心。终于，他们成全了自己的梦想，成为当代的葛兰阶，还意想不到地挖到了一具大熊猫的骨架。他们满载而归，7 月初辗转到了巫山，到了目的地，照样先问“龙骨”的下落，顺藤摸瓜地循着一条又一条线索，找到了带领村民疯狂采挖过“龙骨”的赤脚医生牟之富。在牟医生的指引下，一行人来到了那块曾满足过村民们发财之梦的“龙骨”产地：远看是一块种着红苕和苞谷的农田，近看土里到处都露着白花花的“龙骨”渣，捡起来细看全是食肉类或食草类动物的牙齿，有灵猫、鬣狗 、爪蹄兽和大熊猫，队员们心里乐开了花。望着这块宝地，一个名字浮现在黄万波的脑海：龙骨坡——一个很快流传于世界古人类学界的名字诞生了[5]。

自 然 概 况

龙骨坡遗址位于中国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的西南坡上，东经 109°4′50″，北纬 30°21′25″。遗址北距巫山县城 57 公里，东南距庙宇镇约 4 公里。该区海拔 1300 米以上的高山为“鄂西期”夷平面，700—1000 米为“山原期”夷平面，遗址位于此平面下，标高 830 米。庙宇镇处在锯木沟至三溪园向斜东南翼的溶蚀盆地边缘，周围基岩为三叠系嘉陵江巴东组灰岩，盆地内为紫红色泥岩、页岩夹中厚层状石英粉砂岩及泥岩、白云岩。盆地沿北东—南西向伸长，周围地形起伏较大，庙宇河是盆地内的一条干流，沿盆地东南向西北入泄水孔进大溪河，在盆地边缘的斜坡地带，可见庙宇河一级阶地，阶地组成物质为砂砾及砂质黏土，未胶结，不含化石。庙宇盆地地势较高，年无霜期只有 250 天，年平均气温 14℃。土壤为红色酸性土，植被属华南落叶阔叶林区，与江北神农架山区的针阔混交林相似。

龙骨坡遗址所具有的上述自然地理特征为古人类的生息繁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可以从地质构造史上找到证明。大约 3600 万年前，长江、三峡还未形

成，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还处在一片汪洋之中，即地质史上所称的古特提斯海。后来，由于古特提斯海板块向北漂移了7000多公里，最终到达北纬30°，并俯冲到亚洲板块之下，两块古大陆的重叠，使那里的地壳层急剧加厚达到70公里（全球地壳的平均厚度为35公里），进而使青藏高原强烈隆起。青藏高原及其东西部地势的形成，阻止了印度洋暖湿气流北上，使青藏高原变为大陆性气候，进而影响了我国西部地区的自然环境，在"山原期"夷平面上的串珠式盆地里，连续的森林被断裂成一片片的疏林和灌木地，与此同时，一种富于镶嵌性的生态环境得到了发展。这种不可逆转的环境变迁，为各种灵长类动物提供了新的进化机会。大约在50万年前，横断山脉以东的河流沿构造线快速下切，长江穿过奉节、巫山、秭归与下游贯通，三个峡谷——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就此诞生。而龙骨坡遗址的所在地——巫山就位于险峻的巫峡段内[6]。

人类化石

龙骨坡遗址经过第一、二阶段的发掘，采集的人类化石为一段左侧残破下颌骨（图1），带有P_4—M_1（CV·939·1），另一件是第7水平层E9探方发现的一个右上内侧门齿（CV·939·2）。初步研究结果表明，龙骨坡的材料不同于已知直立人的性状，而是地区性的亚种——*Homo erectus wushanensis*。这一鉴定结果引起了国内外的评论，评论的焦点集中于标本的分类地位和系统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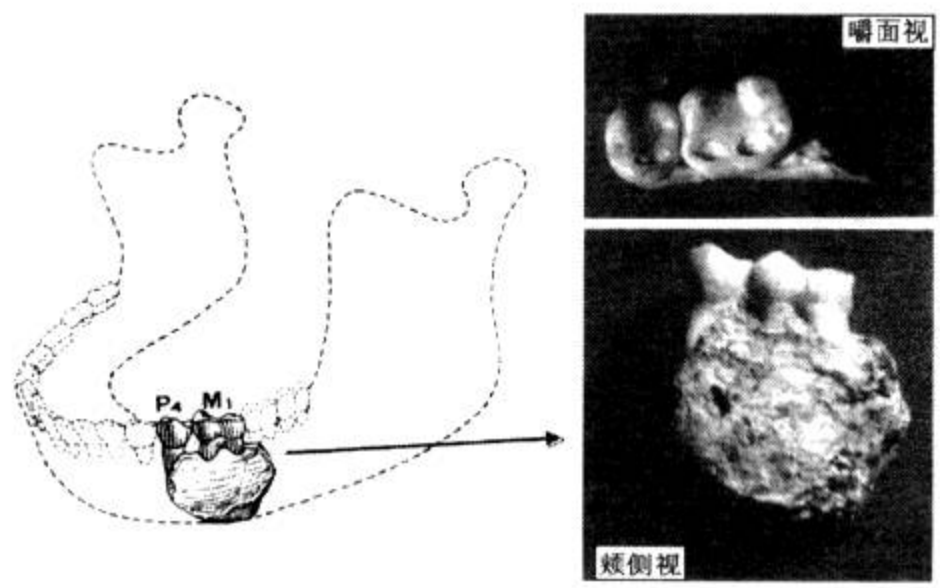


图1 龙骨坡遗址人类化石左侧下颌骨及其在牙床中的位置（依顾玉珉等，1999）

对于这两件人类化石，共有几种不同的看法。黄万波和 Ciochon 等认为，龙骨坡标本比亚洲直立人更原始，而同东非早更新世的人 *Homo ergaster* 和 *Homo habilis* 有着密切的关系[7]。Wood 和 Turner 认为，它有可能是能人（*Homo habilis*）和直立人（*Homo erectus*）之间的过渡类型，即匠人（*Homo ergaster*）。Wolpoff 、Etler、周国兴、Schwatz 和 Tattersall 等认为，龙骨坡发现的下颌残片为猿类的，也许是禄丰古猿的后代[8]，吴新智也倾向于这样的观点[9]。Groves 和何传坤认为属于人类，法国著名人类学家 Coppens 也表示是人类化石并与格鲁吉亚的化石比较接近。王谦认为，龙骨坡遗址发现的门齿系后期混入堆积中的晚期智人[10]。

由于材料太少，可供对比的信息也就较少，容易产生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毕竟古人类学家研究的依据是化石标本。另外各个学者对人类演化进程的中间环节和过渡类型所掌握的信息量不同，也影响他们的判断。这一点并不奇怪，当初能人发现时所依据的头骨和下颌骨，有人认为是人的，有人认为是南方古猿的。又如爪哇直立人发现时也有关于是人还是猿的争论。科学发现当中的争议是正常的，可以促进研究的进展。关于龙骨坡人类化石系统地位的争议，研究者们会随着以后发掘中可能获得的进一步的材料加以调整，得出新的看法。总之，该遗址的人类化石问题还有待更多材料的发现和更加深入的研究。

关于巨猿

巨猿是我国南方哺乳动物群中比较常见也是十分特殊的一个种类，也是龙骨坡遗址动物群中令人关注的内容之一。第一颗巨猿牙齿 1935 年首次由德籍荷兰古生物学家孔尼华（von Königswald）发现于香港中药铺，因为这个巨大的灵长类动物的牙齿比最大的猩猩（Pongo）牙齿还要大，孔尼华将其定名为步氏巨猿（*Gigantopithecus balcki Königswald*），推测其产地为中国。1937 年孔尼华在香港和广州的中药铺又分别找到两颗巨猿牙齿，德籍解剖学和体质人类学家魏敦瑞（Weidenreich）将上述三颗牙齿与爪哇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头骨与下颌骨材料对比研究后认为，它们具有明显的人的性质，而非猿的系统，重新命名为“巨人”（*Giganthropus*），指出它们是北京猿人和爪哇猿人的直接祖先。此后孔尼华继续搜集到另外 5 个巨猿的牙齿，于 1952 年对总共 8 个巨猿牙齿进行综合研究后肯定了魏敦瑞的结论，认为巨猿不是“猿”而是“人”，属于人类谱系上一个十分特化的旁支。此后，人类学家们关于巨猿的认识一直存在诸多分歧，没有

出土地点和层位、缺少颅骨和肢骨的“巨猿”抑或“巨人”实难定论。

1955 年第一批拥有产地和层位的巨猿牙齿由贾兰坡带队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发掘队在广西大新的黑洞(溶洞编号为 5657)被发现:1 个下第 3 臼齿、1 个第 1 前臼齿和 1 个上臼齿,总共 3 颗。1956 年第 1 具巨猿下颌骨发现于广西柳城新社冲村楞寨山硝岩洞(后改名为巨猿洞,溶洞编号 5704),发现人是当地农民覃秀怀。根据这个线索,由裴文中带队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发掘队从 1957—1961 年和 1963 年共在此进行了 6 次发掘,发现两具巨猿下颌骨和 948 颗巨猿牙齿、直立人和数十种脊椎动物化石,由此,中国学者终于亲自揭开了巨猿产地和层位的迷雾[11]。

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发现巨猿的化石产地共有 9 个,它们从北到南依次为:重庆巫山龙骨坡、湖北建始龙骨洞、贵州毕节扒耳岩、广西柳城巨猿洞、广西巴马弄莫山、广西布兵么会洞、广西武鸣拉利山、广西大新黑洞、广西崇左生态公园。对各个地点化石的研究表明,巨猿生存于更新世早期到更新世中期,根据各遗址的动物群时代,年代顺序依次为:巫山龙骨坡—柳城巨猿洞—建始龙骨洞—大新黑洞—武鸣拉利山—巴马弄莫山[12],巫山龙骨坡是目前已知巨猿分布最北和时代最老的地点。此外在越南北部和印度也各有一处巨猿化石地点,时代分别为 47.5 万年和中新世晚期[13]。

吴汝康(1962)根据巨猿牙齿和下颌硕大的特化性状,认为巨猿是区别于真人亚科的前人亚科系统上的一个旁支,在早更新世或中更新世初期绝灭了。也有学者主张巨猿与人类存在密切的亲缘关系[14]。

根据巨猿牙齿的巨大和下颌骨的形态,学者们大都推断巨猿的体态巨大,身高可能在 2—3 米左右(图 2)。魏敦瑞[15]曾认为巨猿逐渐缩小变为直立人和现代人。张银运和许春华则认为巨猿后部牙齿有增大趋势[16],王令红认为巨猿身体有向着硕大方向特化的趋势[17]。

巨猿的食性多认为以植物为主,其牙齿缺乏适于切割和撕裂的特征,高比例的龋病反映食物中富含碳水化合物[18]。有人认为巨猿是以森林中的坚果为食[19]。Ciochon 认为巨猿的食物含草类和果实等多种来源,很可能还包括竹子(图 3)[20]。黄万波在研究巨猿牙齿的釉质结构时观察到了镶嵌在牙齿釉质上属于竹子的植硅石[21],证实了 Ciochon 等的说法。韩康信和赵凌霞根据龋齿率推断巨猿食物中含有较高的糖类,从牙齿结构和釉质厚度、牙齿磨耗和下颌结构看,认为巨猿食物比较坚硬并需要强烈的咀嚼研磨活动[22]。赵凌霞提示巨猿的食性特化,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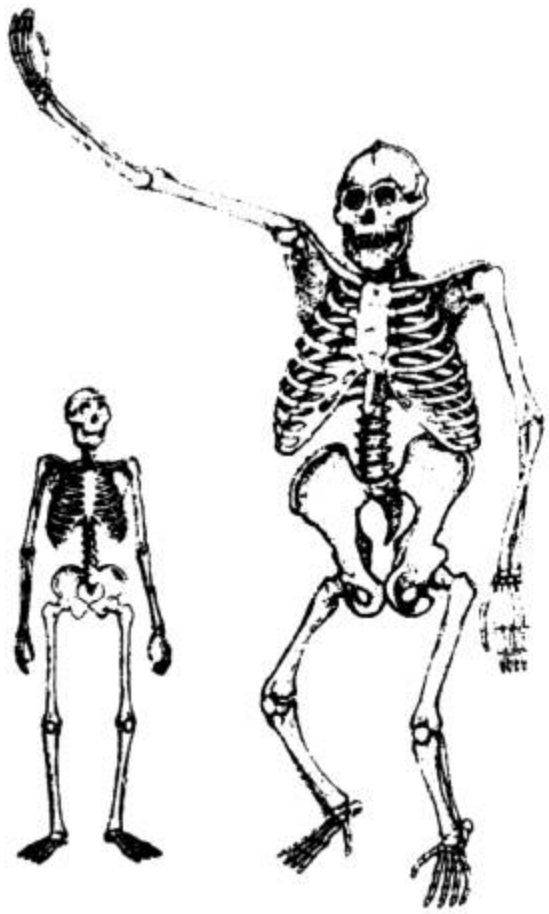


图 2　巨猿与直立人骨骼高度比较
(Williams Thomson 绘)

图 3　巨猿食竹的情形(依 Ciochon)

营养不良问题[23]。

关于巨猿的栖息环境有两种说法:一种基于食性的研究,认为是开阔的草原或稀树草原环境,另一种基于其伴生动物群的性质,认为巨猿生活于森林环境[24]。赵凌霞测试巨猿动物群中动物(含巨猿)牙齿中碳同位素 $\delta^{13}C$ 值变异范围所反映出的 C_3 或 C_4 植被特点结合孢粉分析认为巨猿类似于现代猿类,生活在以 C_3 植物占优势的茂密的森林环境,随着生存环境的恶化或退缩,其生物特性与习性的特化,加上人类的扩张和挤压,首先在中国南方走向灭绝[25]。

石　制　品

龙骨坡遗址发现的石制品是确立该遗址文化属性和研究其面貌特征的重要依据。目前经过研究发表的石制品有 15 件,分别出自第一和第二发掘阶段中的第 5—8 水平层[26]。以类型学和技术学为基础,对这批石制品的性状进行了仔细观察后,总结出龙骨坡遗址石器中存在多种砍砸器类型、原型薄刃斧、石锤、手

镐、石片等类型，最大的一件为218×115×99(mm)，最小的一件为79×64×24(mm)。经初步研究，这些石制品所反映出的面貌总结为以下几点：

(1)原料系就地取材，以自然砾石或石块为主，具有多样性，有变质灰岩、硅质灰岩、火成岩、石英岩、铁锰质结核等，反映出石器制作者的活动范围以及对原料的选择。制作者在选择毛坯时有明确的目的性，并从自然和人工生产两方面满足这种需求。

(2)工具的毛坯既有砾石、石块，也有石片，而且多直接使用石片。

(3)在打片方法与技术上采用了硬锤直接打击，在加工方法上使用锤击法，既有单面加工，也有两面加工，还有交互和对向的加工方式，且具有加工对称工具的意识，加工疤痕较为连续。除了修理直接将要使用的刃口之外，制作者具有明确的修理把手的意识，使之成为制作工具程序中与制作刃口具备同等重要性的工作。此外，制作者可能已经(有意识地)使用孔贝哇技法，并掌握了沿砾石长轴方向开片的技巧。

(4)类型上，标本以大型和偏重型为主，中型为次，形制偏长、偏厚，同时也有轻薄型存在。其刃角以80°左右的为多，手锛的刃角相对较锐。包括手镐、手锛、原型薄刃斧、砍砸器、石片、石锤等，其中砍砸器较多，且有不同的类型。刃缘形态上，大型器类呈尖形，多缓凸刃和横直刃，也有凹刃。存在一器多用现象。

(5)工具的使用痕迹明显，使用频率较高。

作为遗址文化属性的重要证据之一，龙骨坡遗址的石器工业延长了中国早期石器工业发展的脉络，充实了中国早期人类的文化内涵，为研究中国乃至东亚古人类制作工具的技术及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动物群与古环境变迁

龙骨坡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相当丰富，除少量爬行类(2种)和鸟类(2种)外，主要是丰富的哺乳类。到目前为止，共发现食虫目、翼手目、啮齿目、灵长目、长鼻目、食肉目、奇蹄目及偶蹄目中的29科、74属(含3新属)、116种(含25个新种)。这是目前在华南乃至全国第四纪研究中，在同一地点采集到的种类最多的化石地点。而且该遗址剖面厚度较大，化石种类丰富，在确定其地质时代上具有良好的古生物基础。根据各种哺乳动物在龙骨坡遗址不同沉积相中的分布区分出第1段(下部淤泥河湖相堆积)、含步氏巨猿(*Gigantopithecus blacki*)和人

类化石的第2段(中部洞穴堆积)与第3段(上部次生裂隙堆积)三类动物组合。通过与其他动物群的对比、与古地磁等资料的印证,下部组合属于上新世,中部组合与午城黄土下部的时代(或"红色土A带")相当,上部组合与华北泥河湾期(狭义)同期[27]。龙骨坡的动物群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具有鲜明的华南动物区的面貌,如维氏原黄狒(*Procynocephalus winani*)、小种大熊猫(*Ailuropoda microta*)、更新大灵猫(*Megaviverra pleistocaenicus*)、剑齿虎(*Homotherium palanderi*)、爪兽(*Nestoritherium*)、广西巨羊(*Megalovis guangxiensis*)、伏飞鼠(*Petinomys electilis*)等;2.可以看出一些西南区哺乳动物的东移,像中华鼩猬(*Neotetracus sinensis*)、肥鼩(*Blarinella quadraticauda*)、印度长尾鼩(*Soriculus leucops*)、毛耳飞鼠(*Belomys*)等;3.有相当数量华北区哺乳动物成分的南迁,如现生刺猬(*Erinaceus*)、小飞鼠(*Pteromys*)、模鼠(*Mimomys peii*)、转角羚羊(*Spirocerus*)等;4.有不少现生哺乳动物,比如麝鼩(*Crocidura*)、针尾鼹(*Scaptonyx fusicaudatus*)、毕式菊头蝠(*Rhnolophus pearsoni*)、岩松鼠(*Sciurotamias*)、竹鼠(*Rhimys*)、华南豪猪(*Hystrix subcristata*)、高山姬鼠(*Apodemus chevrieri*)、鼠(*Rattus*)、猕猴(*Macaca*)、中国黑熊(*Ursus thibetanus*)和豹(*Panthera*)等。这种混合动物群的特征表明,巫山人生活时期的自然景观一方面显示出和目前相似的过渡类型特征,另一方面表现出更加鲜明的特性。首先,巫山人生活时期,长江三峡一带的气候远较目前湿热,森林更加茂盛,同时也有相对干冷的时段,有一定范围的灌丛草地存在。其次,云贵高原尚未形成,当时的秦岭—大巴山未达到目前的高度,强盛的西北季风能够影响到巫山地区,这样巫山人生活时期的地理概貌十分类似于现代淮河流域动物区系——过渡区的面貌,地势较低,便于南北动物的交换。再次,相当数量温带动物的存在表明,当时的长江要么还未形成,要么仅是雏形,还未对华北草原型动物的南渡形成天然屏障。从气候来看,以龙骨坡组第1段动物组合为代表的时期,沉积物以湖相为主,是一个雨量相当充沛的时期,但也含有相对干冷的时段。

从孢粉组合判断,这一时期的植被以常绿阔叶林为主兼落叶阔叶与常绿阔叶混交林,与目前三峡一带的景观类同。第2段动物组合代表的时期,沉积物以河流相为主,也是一个多雨的时期,不过其中明显存在着一个相对干冷的时段,且有一定范围的草原。第3段动物组合代表的时期,沉积物为裂隙堆积,气候相对干冷[28]。

年代测定

到目前为止，研究人员已经运用多种方法对龙骨坡遗址进行了年代测定。

从动物群组合特征来看，其上部与华北泥河湾期同期，中部大致与午城黄土下部的时代相当，下部与中部处于同一时代范围内，不过略早。总体而言，根据动物群组合判断该遗址属于早更新世早期。

根据刘椿等所做的磁性地层年代测定，在该遗址采集的古地磁样品磁性是负向极性占主导地位，属于松山负向极性时（带）。其中含古人类化石的层位正对应于地磁极性年代表上的留尼汪正向极性亚时的 2r—1，按照 W. B. Harland 等 1982 年公布的同位素地质年龄数字，它应距今 2.01—2.04 百万年[29]。

根据加拿大学者亨利·史瓦克的电子自旋共振测年，龙骨坡遗址第 4 水平层为距今 102 万年[30]，以此推理，第 8 水平层（含人类化石）应早于 180 万年。北京大学考古系陈铁梅等用此法测年结果显示，第 4—5 层的年代在 1.3—1.9 百万年间[31]。

根据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吴佩珠所做的氨基酸年代测定，与古人类化石同层的马牙化石的年龄是距今 239 万年，小种大熊猫牙齿化石的年龄是距今 183 万年[32]。

第三阶段工作概要

在前述两个阶段工作的基础上，第三阶段于 2003 年 10 月拉开序幕，该阶段以中法合作、采用新的科学方法为特色。发掘工作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侯亚梅、黄万波和法国著名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巴黎第十大学的博爱客共同主持。

该阶段采用的新的科学方法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依据此前发掘人员绘制的遗址平面图，使用更为精准的电子测距仪进行现场测量和勘察后，工作人员将原来采用的 2 米 ×2 米探方各个分割为 4 个 1 米 ×1 米的方格，如原来的 C9 就被分割成 C9a，C9b，C9c，C9d，依此类推。这样的分方安排是为了把可能的发现限制在更小的单位里，使出土遗物之间的关系更易于得到“透视”和“扫描”，取得更高的“分辨率”，使遗物面貌的分布关系更为清晰可见。通过对地层的初步观察和对以往发掘的研究，确定了 4 个重要的地层区域单元，即 ComplexI—IV

(CI—CIV),其中除 CIII 单元暂时未发掘外,其余单元均成为地层判别和精细发掘的重点所在。结果,在 CII 和 CIV 就分别发现了石器与大型草食动物长骨共存的遗迹层位和非常密集、有明确人工打制痕迹的石器的数个文化层位。再次,在地层判别时,不再是用以前单纯按水平层发掘的方式,而是最大限度地以自然的地质层位为主导,与水平层相结合对遗物的地层归属进行尽可能准确和科学的判断与划分,以便最大限度地获得与遗址相关的信息资料。最后,对于在发掘中发现的每件具有潜在价值的考古遗物,如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的牙齿或是破碎的骨头,都要测量其相对于基准点的坐标,并利用配套程序输入电脑进行处理,以便将这些遗物的坐标点绘制成两维或是三维的图像。完成了发掘记录的标本被一个一个地装入塑料袋,带回野外实验室,进入下一步工作程序,像清洗、在标本上写号、分类、绘图和照相等等。这样一套工作程序所指导下的发掘工作确实较以往要细致很多,对遗迹和遗物的坐标系统也有了更加宏观的数据系统。利用这些符合国际标准的考古学发掘方法,虽然发掘进度很慢,发掘的土方量上大大少于前两个阶段,然而出土遗物的数量和信息量则大大超出前面两次,找到了人类在此生存的更多新证据。迄今已判别出 20 多个考古学地层,从面积有限的发掘平面和地层工作剖面中发现了数百件石制品(图 4、图 5)[33],最新的研究表明,Complex Ⅱ 中所见大型哺乳动物骨骼上留下的石器切割痕迹确凿地证明人类曾在此宰杀猎物。另外,根据首次研究者提供的生物地层顺序和古地磁测年证据,CIV 单元的第 5 层中发现的数量众多的石器年代为 200 万年前。说明早在 200 万年前,古人类就已经在此制作工具、生息繁衍。截至目前,新一阶段的工作仍在有序进行之中,不久将会有新的研究成果面世。

东亚与人类起源

龙骨坡的古人类来自何方?对这个问题的准确回答仅凭目前有限的证据显然是不够的,更全面的化石证据与翔实的文化证据的进一步研究,会更好地推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解答。人类起源作为学术热点,争论从未停息,值得注意的是对关于"走出非洲"理论时间的认定又取得了突出进展:Templeton 继 2002 年发表走出非洲的二次说之后,在 2005 年[34]发表最新研究结果认为古人类走出非洲经历了三次历程,其迁徙路线呈复杂的网格状结构而非简单的树状结构,人类最早一次走出非洲应发生于 190 万年前。那么,龙骨坡会不会是这次迁徙的一

图4 龙骨坡遗址发掘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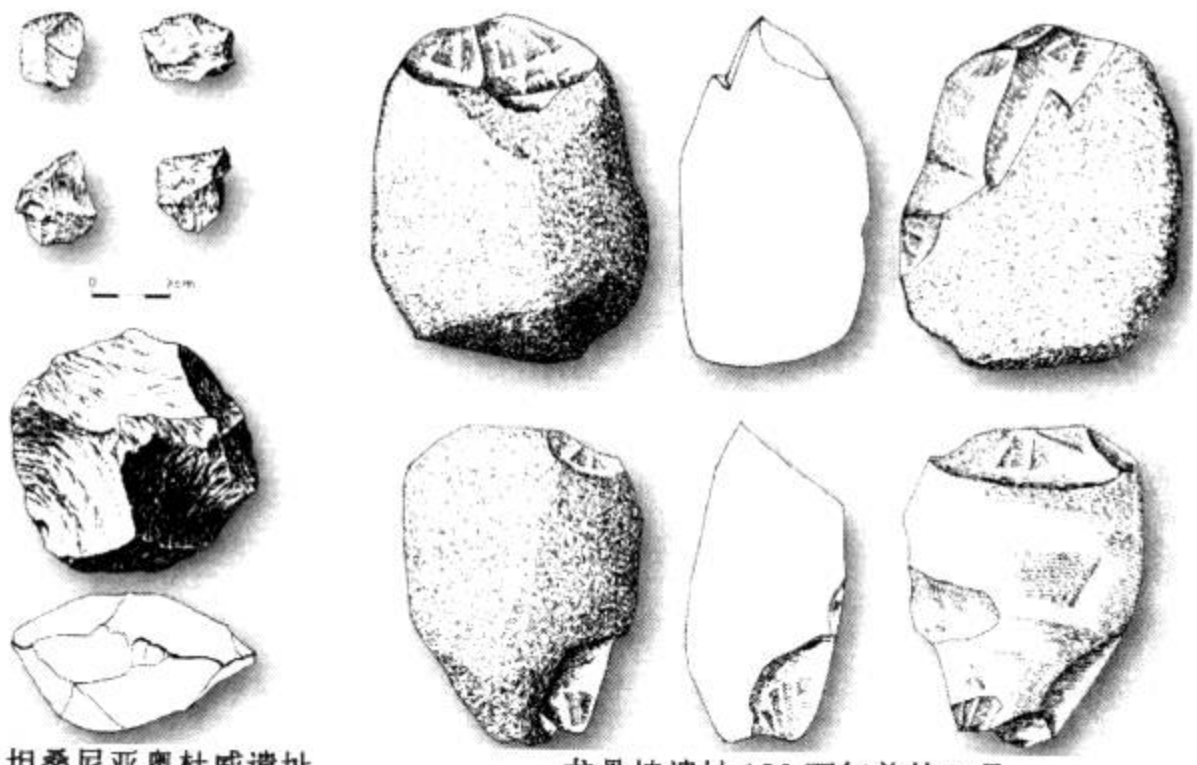


图5 龙骨坡遗址的工具与奥杜威遗址工具的比较(依 Rachel Mulot, 2006)

个目的地呢？Dennell 与 Roebroeks 近期联合撰文[35]认为目前除了直面非洲不断发现的化石新证据，对于人类化石以外，特别是亚洲发现的文化证据也应给予相当的关注，而传统的走出非洲说也并非不可动摇。他们还指出化石证据不平衡性的原因与东非特殊的地质、生态环境和长期的研究投入有密切关系，而亚洲北部如格鲁吉亚（*H. georgicus*）的若干化石以及东南亚印尼小矮人（*H. floresiensis*）的发现不禁令人怀疑其祖先的出处是否来自非洲或更可能出自亚洲本身，反之，古人类起源于亚洲也绝非没有可能，只是由于当前证据的缺乏使可能潜在的事实暂时无解。该文的发表预示着古人类学领域新一轮学术热潮的开始，而中国的早期人类证据正受到国际舆论的密切关注，黄万波更是提出了大三峡是中国人起源的摇篮的说法（与黄万波个人交流）[36]，这与吴新智提出的中国古人类演化连续进化说似乎相辅相成。亚洲特别是中国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作为中国乃至东亚重要的早期人类遗址之一，龙骨坡遗址是研究人类起源与演化、探索亚洲早期人类文化面貌和非洲大陆早期人类之间关系的重要线索，并将积极影响人们对人类起源和文化发展的认识，它预示着亚洲很可能是人类起源的适当场所。

〔注　释〕

1 本文写作得到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4017200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特殊学科点人才培养基金项目（批准号：J0530189）和中国科学院院长基金项目以及法国大使馆文化交流经费的联合资助。

2 W. Huang, R. Ciochon, Y. Gu 等，"Early *Homo* and associated artefacts from Asia"（亚洲的早期人类和共生的人工制品），*Nature*, 1995, 378, p. 275－278.

3 黄万波、方其仁，《巫山猿人遗址》，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页 1—229。

4 侯亚梅、徐自强、黄万波，《龙骨坡遗址 1997 年新发现的石制品》，《龙骨坡史前文化志》，1999，1，页 69—80。侯亚梅、徐自强、黄万波，《龙骨坡遗址 1998 年第 8 水平层若干石制品新研究》，《龙骨坡史前文化志》，2002，4，页 1—14。

5 黄万波、侯亚梅、徐自强，《龙骨坡：200 万年前的山寨》，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 1—163。

6 马丽华，《青藏苍茫：青藏高原科学考察 50 年》，北京，三联书店，1999。李钟武，《横断山形成过程浅谈》，《大自然探索》，1986。杨怀仁、徐馨、李国胜，《第四纪中国自然环境变迁的原因机制》，《第四纪研究》，1989，页 97—111。

7 顾玉珉、方其仁，《人类化石》。黄万波、方其仁，《巫山猿人遗址》，北京，海洋出版社，

1991,页 16—19。

8 顾玉珉,《龙骨坡人类化石研究》,《龙骨坡史前文化志》,1999,1,页 18—20。

9 吴新智,《巫山龙骨坡似人下颌属于猿类》,《人类学学报》,2000,19(1),页 1—10。

10 王谦,《巫山龙骨坡人类门齿的归属问题》,《人类学学报》,1996,15(4),页 320—323。

11 黄万波,《上世纪中叶"巨猿"考察的回顾与展望》,《龙骨坡史前文化志》,2001 年,(3),页 58—78。

12 郑绍华,《建始人遗址》,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页 1—412。

13 R. L. Ciohon, V. T. Long, R. Larick 等, "Dated co-occurrence of *Homo erectus* and *Gigantopithecus* from Tham Khuyen Cave, Vietnam"(越南坦库仰洞穴共生直立人与巨猿的测年),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996, 93, p. 3016 - 3020. E. Simons & S. R. K. Chopra, "*Gigantopithecus* (Pongidae, Hominoidea) a new species from North India"(印度北部的巨猿人猿超科大猿科新种), *Postilla*, 1969, 138, p. 1 - 18.

14 D. Pilbeam, "*Gigantopithecu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Hominidae"(巨猿与人类起源), *Nature*(自然), 1970, 225, p. 516 - 519. E. Simons, *Primate evolution*(灵长类演化),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1972.

15 F. Weidenreich, "Giant early man from Java and South China"(爪哇和华南的早期巨人), *Anthrop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45, 40, p. 1 - 134.

16 张银运,《步氏巨猿牙齿大小上的变异性和南方古猿类食性假说》,《人类学学报》,1983(2),页 205—217。许春华、韩康信、王令红,《鄂西巨猿化石及其共存的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4,12(4),页 293—309。

17 王令红、吴茂霖、张银运,《论巨猿与人类的关系》,《古人类论文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编,北京,海洋出版社,页 67—76。

18 赵凌霞,《步氏巨猿牙齿的综合研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6,页 1—117。

19 裴文中,《中国原始人类的生活环境》,《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0,2(1),页 9—21。D. J. Daegling & F. E. Rine, "Tooth wear, gnathodental scaling and diet in *Gigantopithecus blacki*"(牙齿磨耗、颌齿比例与步氏巨猿的食性),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987, 72, p. 191 - 192. D. J. Daegling & F. E. Rine, "Bamboo feeding, dental microwear, and diet of the Pleistocene ape *Gigantopithecus blacki*"(竹食、牙齿磨耗和更新世步氏巨猿的食性),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1994, 90, p. 527 - 532.

20 R. L. Ciochon, D. R. Piperno and R. G. Thompson, "Opal phytoliths found on the teeth of *Gigantopethecus blacki*: implications for paleodietary studies"（步氏巨猿牙齿上发现的植硅石:示解古食性研究）,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996, 93, p. 3016 - 3020.

21 黄万波、徐自强,《关于东亚直立人兴起的时间与地域》,《龙骨坡史前文化志》, 2000,2,页 1—6。

22 韩康信、赵凌霞,《湖北巨猿牙齿龋病观察》,《人类学学报》,2002,21(3),页 191—198。

23 赵凌霞,2006,页 1—117。

24 P. Andrews, "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in the hominoidea"（人类进化与环境）, *Nature*, 1992, 360, p. 641 - 646. D. R. Begun, C. V. Ward, M. D. Rose (eds), *Function, Phylogeny and Fossils: Miocene Hominoid Evolution and Adaptation*（功能、系统演化与化石:中新世类人猿的演化和适应）, New York, Plenmum Press, 1997.

25 赵凌霞,2006,页 1—117。

26 侯亚梅、徐自强、黄万波,《龙骨坡遗址 1997 年新发现的石制品》,《龙骨坡遗址 1998 年第 8 水平层若干石制品新研究》,《龙骨坡史前文化志》,1999,1,页 69—80 与 2002,4,页 1—14。李炎贤,《龙骨坡遗址 1985—1988 年发现的石制品》,《龙骨坡史前文化志》,1999,1,页 21—24。

27 黄万波、郑绍华、计宏祥、杨兴隆、杨代环、李宣民、钟志楷、张联敏、曹幼枢,《龙骨坡动物群组合与时序》,《龙骨坡史前文化志》,1999,1,页 31—45。

28 郑绍华、黄万波,《巫山人的生活环境及其变迁》,《龙骨坡史前文化志》,1999,1,页 50—51。陈因硕、杜乃秋,《龙骨坡遗址孢粉分析》,《龙骨坡史前文化志》,1999,1,页 46—49。

29 刘椿、金增信、朱日祥、杨洪,《磁性地层年代测定》,《龙骨坡史前文化志》,1999,1,页 41—42。

30 亨利·史瓦克,《电子自旋共振年代测定》,《龙骨坡史前文化志》,1999,1,页 42。

31 陈铁梅,《电子自旋共振年代测定》,《龙骨坡史前文化志》,1999,1,页 42—43。陈铁梅、杨全、陈琪、胡艳秋,《巫山龙骨坡地层的电子自旋共振测年》,《人类学学报》, 2000,19(1),页 17—20。

32 吴佩珠,《龙骨坡遗址氨基酸年代测定》,《龙骨坡史前文化志》,1999,1,页 43—45。

33 R. Mulot,《*Contre-enquête sur le berceau chinois*》(关于中国人类摇篮的复查), *Science et Avenir*(科学与未来), 2006 (Avril), p. 56 - 61.

34 A. R. Templeton, "Haplotype Trees and Modern Human Origins"（单倍型谱系与现代人起源）, *Yearbook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2005, vol. 48, p. 33 - 59.

35 R. Dennell & W. Roebroeks, "An Asian perspective on early human dispersal from Africa"（早期人类从非洲扩散的亚洲视角）, *Nature*（自然）, 2005, vol. 438, p. 1099 – 1104.

36 黄万波、徐自强,《关于东亚直立人兴起的时间与地域》,《龙骨坡史前文化志》, 2000,2,页 1—6。

中国早期盐业生产的考古和化学证据

付罗文(Rowan FLAD)、朱继平、王昌燧、陈伯桢、
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孙智彬、李水城 著
袁振东 译

盐业生产的起源和发展是有关人类历史的重要议题。盐既是许多生理方面所必需的[1],也是文化方面至关紧要的[2]。盐是重要的饮食补充物,并能用作防腐剂以保存季节性或地理上受限制的肉类。盐业生产能使贸易增加、人口增长,并能为人们开辟居住地、带来烹饪风格的多样化。不同的烹饪风格可能标志着不同的种族划分和阶级等级。基于这些原因,人们认为盐对于所有复杂社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盐业生产对于研究古代社会有着重要意义[3]。我们相信,如果没有稳定的盐的来源,任何国家都难以发展。然而,似乎与此观点相反的是,以前所获得的证据并不能说明中国内陆早期的盐业生产与早期复杂社会有关。在本文中,我们介绍利用 X 射线荧光、X 射线晶体衍射和扫描电子显微镜(SEM)方法所做的分析。结果表明,盐是公元前 1000 年中国中坝遗址的主要产品,从而支持了我们的观点。这项研究不仅说明了在中国内陆地区国家发展早期阶段的盐业生产,而且提供了一种以往无人提及的、可用于研究其他地区古代盐业生产的方法。

尽管盐业生产有着普遍的重要性,但是在早期文明的研究中,盐业生产经常被忽略。有时候,人们在研究中考察了关于早期盐业生产的考古学的、图像材料的以及历史的证据[4],但是,由于盐的溶解性,考古学家们常常找不到盐在古代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中国,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说明,在中国历史的后期(即在各诸侯国已完全形成并统一成一个帝国以后)盐是一种重要的商品。然而,考古学家们很少找到盐业生产的起源证据。事实的确如此,尽管历史记录表明,在中华帝国时代的 22 个世纪内(公元前 3 世纪到公元 20 世纪初),盐和铁常常提供了国家的大部分收入,而且直到 20 世纪盐对于国家的财政仍然很重要;有

些历史文献记载内陆的盐资源在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中国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缺乏适当的考古学方法，关于四川盆地在先秦时期盐业生产的证据还没有找到。同样，有些假说认为盐在中国商朝（公元前1600—前1050年前后）和随后的周朝（公元前1050年前后—前221年）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没有找到早期盐业生产的明确的考古证据，这些假说也还没有得到最后的证实。刘莉、陈星灿、方辉以及李水城的假说都暗示了华北青铜时代早期的中国盐业生产[5]，但这些研究所依赖的都是间接证据。事实上，在此以前，还没有任何可靠的方法能在考古学领域中评价盐业生产。我们关于中坝遗址盐业生产的研究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中坝位于中国中部重庆市的忠县，沿长江而下距重庆约200公里（图1）。这个遗址的文化遗产都集中在瀼井河河心的一座小土包上。瀼井河距忠县城6公里，直接流入长江。这个土包由厚达12米、可分成70多层的文化层堆积构成。就像在最近付罗文和陈伯桢的博士论文以及其他近期出版物中所论述的那样[6]，作为三峡水库抢救工程的一部分，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在这里的挖掘工作从1997年一直持续到2002年。大多数遗存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与前200年之间[7]。从大量陶器遗存来看，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的生产规模持续增加，显示中坝在先秦时期属于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中心。我们有四方面的证据说明盐是中坝遗址的主要产品。

首先，利用历史的和跨文化的类比所得到的几条线索都指向了盐业生产。中坝遗址是位于一个有完好盐业生产记录的地方。这里出土的陶器和其他生产遗迹在形式和成分方面都与世界其他产盐地区的制盐陶器（*briquetage*）非常相似[8]。有关盐业生产的民族学和历史实例随处可见，其中都包含少量最佳形状的制盐陶器。存在于中坝地区的内陆制盐工艺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可用如图所示的容器类型做代表（图2）。在所有的三个阶段内，制盐容器都被用于蒸发盐水使之结晶。但是，不同的容器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稍有不同。在盐业生产的第一阶段（公元前2000—前1750年），当生产发展到最高水平时，大量使用的容器是大的尖底缸。在日本沿海的盐业生产遗址也发现有类似的容器被使用[9]。在当时的中坝，这些缸可能与其他易腐的生产容器一起用于储存盐水，也可能被直接用于蒸发过程。另外，也可以想象，这些缸曾用于生产鱼酱或腌制食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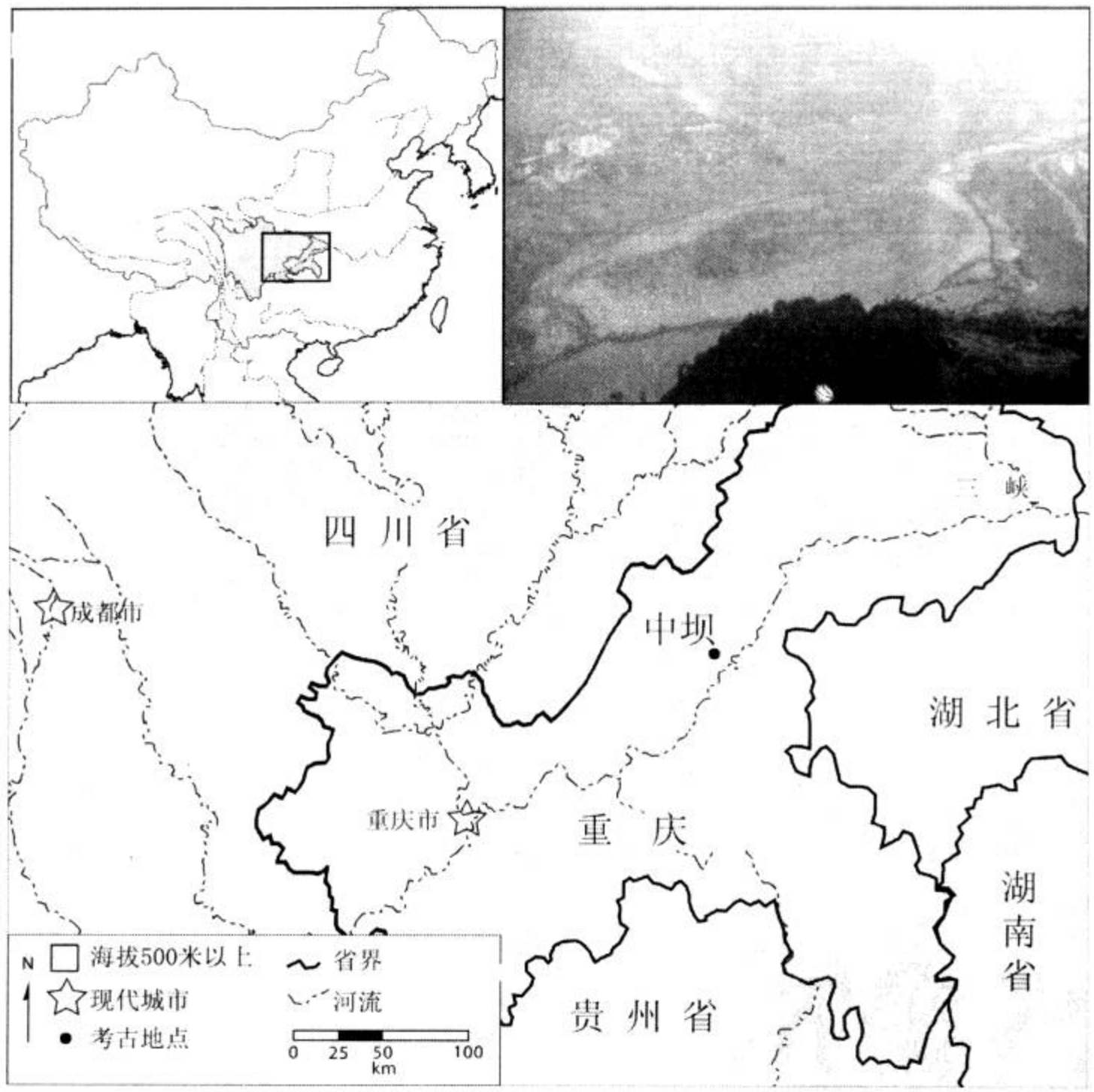


图1 中坝遗址位于中国重庆直辖市的忠县，三峡的东端。图中右上角的插图表明遗址所在的土包处于淦井河的河心，且在刚竣工的三峡东侧的三峡大坝前面。© 2005 *Th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 S. A.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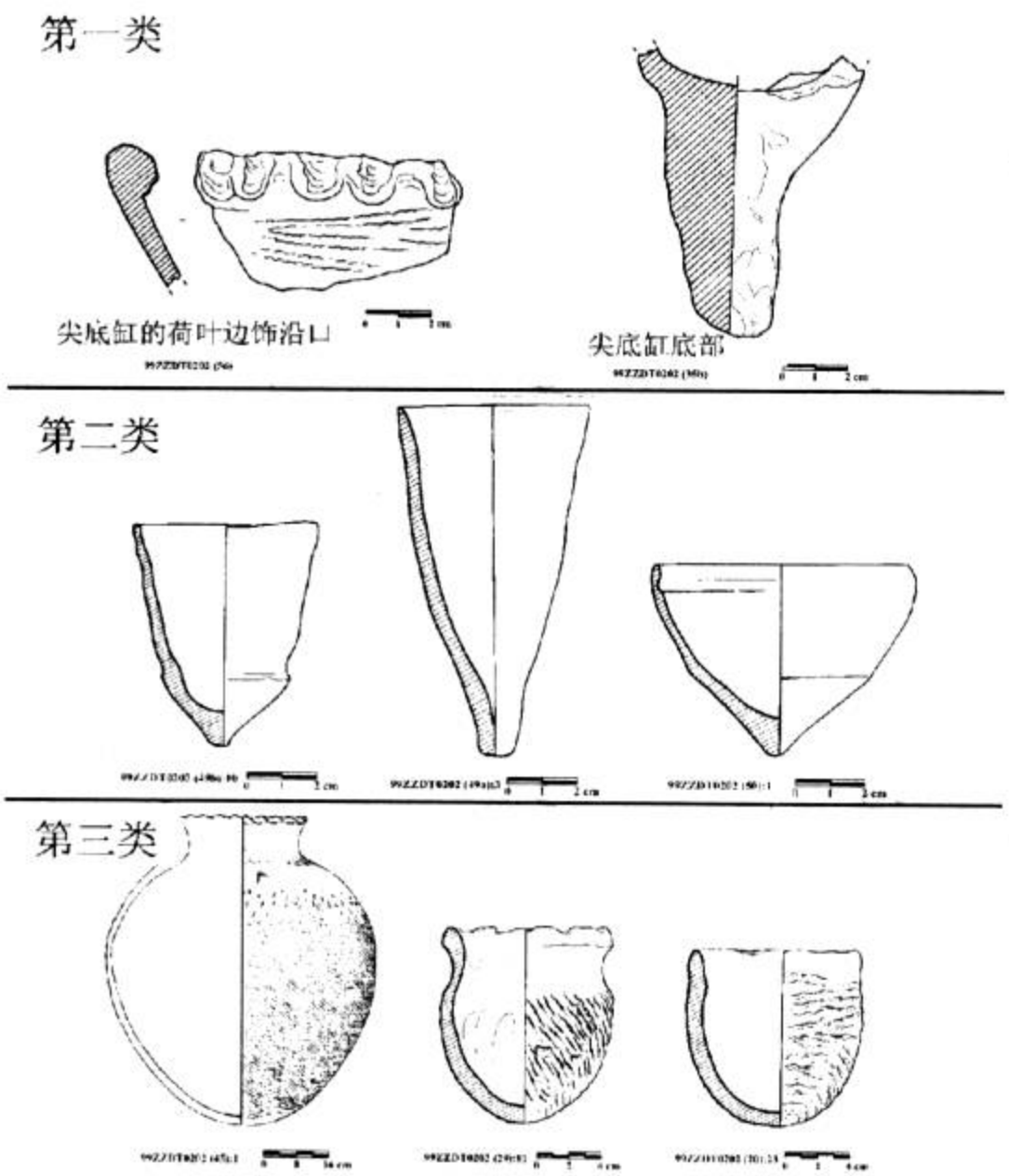


图2 中坝的主要类型:第一类是尖底缸的碎片;第二类是尖底杯;第三类是圜底罐。每种类型都与其他地区的制盐陶器类似。图中每个样品都标有出土地点和编号。© 2005 *Th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 S. A. 版权所有。

在盐业生产的第二阶段(公元前1630—前1210年),最普遍使用的容器类型是尖底杯。这些杯与所谓的"*augets*"相似。"*Augets*"是杯状的小容器,用于早期的中欧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盐业生产[10]。在中坝遗址,发现了大量的这种小尖底杯。这些杯可能被用作模子以干燥潮湿的盐,并制造统一规格的锥形盐块以方便贸易交换。在盐业生产的第三阶段(公元前1100—前200年),生产中使用的是圜底罐。这种罐与玛雅(Maya)的沿海地区、山东半岛、菲律宾以及西非的制盐陶器类似[11]。在这些类似物中,从尼日尔和菲律宾[12]得到的民族学例证表明,相似的容器可放在火上用于煮沸盐水并生产大块的盐饼。我们猜想,中坝的圜底罐也是按照这种方式使用的。考古队做了实验,结果表明,圜底罐可以有效地按上述方式使用。

另外，中坝陶片的整体特点与在已知的盐业生产遗址发现的陶片类似，但与在陶器生产遗址中发现的陶片有相当差别。在上述两种遗址中都有大量的陶片被发现，但在盐业生产遗址发现的陶片总是极为相似。中坝的陶片就具有这种类同性。通过对中坝核心部位连续 35 层堆积物中的 134265 个陶片的分析发现，在所有各层收集到的陶片，其中 90% 都属于同一种陶器[13]。

中坝的遗迹也与已知的盐业生产遗址类似。在盐业生产的第一阶段，卵形的粘土坑一直是很普遍的。这些坑的结构与民族学上和历史上已经确认的墨西哥、非洲及其他地方的盐业生产设备相似[14]。虽然具有启发性，但是，这些定性的资料还不能明确地将中坝确认为盐业生产遗址。考古上确认的大多数盐业生产的案例都无一例外地使用了这种证据。这里，我们还提供另外三方面的证据。

我们的第二种证据是当地盐水在化学成分方面与考古上认为是盐业生产设施的土样相类似。这种类似性在没有设施的土壤或与制盐生产过程无关的设施的土壤中均没有发现。化学杂质是盐水或海水留在制盐生产工具或设备上的唯一痕迹[15]。四川盆地东部的盐和盐水中的主要杂质是镁、钙和钾[16]。对生产遗迹（F270、M75、F198、F226）的土壤进行 X 射线荧光分析发现，与非生产遗迹（Level 20）[17]的土壤相比，它们的钙、镁含量特别高（见表）。当地盐水中这两种元素的化合物含量也很高[18]。钙和镁在表面和坑中的高含量是盐业生产的结果。

利用 X 荧光分析法测定的各种土壤中 Ca 和 Mg 的百分含量[19]

成分	取样处，%				
	F270	M75	F198	F226	Level 20
CaO	30.9	26.1	32.3	34.7	7.8
MgO	12.3	8.9	11.5	13.7	5.0

支持盐业生产假说的第三种证据来自对中坝遗址第三阶段所用圜底罐残留物进行的 X 射线衍射分析。这些残留物的矿物成分与在四川发现的一个有 2000 年历史的煮盐平底锅的残留物以及 2002 年在重庆云阳一家现代盐业生产地的生石灰废料场收集的残留物相一致（图 3）。在现代盐业生产的案例中，生石灰用于处理盐水中的可溶性杂质，残留物被丢弃在与熬盐炉灶邻近的空地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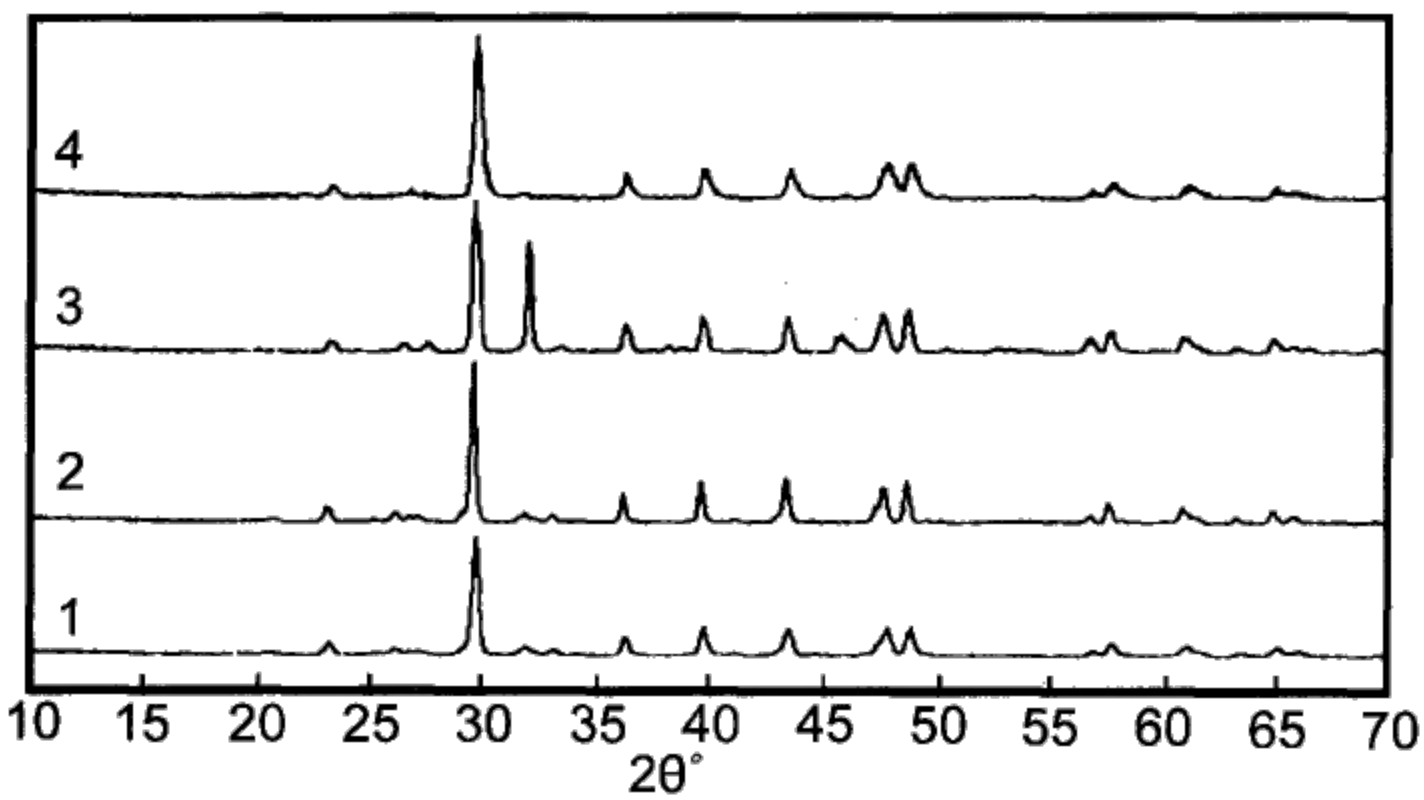


图3 几个钙化残留物的X射线衍射图被认为与盐业生产有关。Y轴表示X射线的强度(也就是,当X射线在一个已知角2θ衍射时对X射线数量的计算,θ是衍射角)。衍射线1代表从中坝灰坑H457出土的圜底容器内壁发现的残留物;衍射线2代表从中坝灰坑H509出土的圜底罐内壁发现的残留物;衍射线3代表2002年从重庆市云阳县一个现代盐业生产地的生石灰废料场收集的残留物;衍射线4代表从四川自贡发现的汉代铁质煮盐平底锅(YG2)的残留物。©2005 *Th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 S. A. 版权所有。

在这三种样品中所含的主要化合物是碳酸钙($CaCO_3$)和少量的二氧化硅(SiO_2)。

所有$CaCO_3$的衍射峰都与文献中报道的一致(粉末衍射标准联合会文件:NO. 70—00095)。云阳的样品中还含有少量NaCl(粉末衍射标准联合会文件:NO. 78—0751)。这种差别可用以下事实来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盐易溶解,但其他杂质留了下来。在中坝和自贡案例中,盐晶体早在古代就溶解掉了,但是,由于云阳案例中的堆积物形成的时间较短,其盐晶体仍然保留着。在所有的案例中,盐水中的其他杂质都在生产工具上形成了很硬的残留物。

我们第四方面的证据是陶器内壁的氯化钠(NaCl)痕迹。通过使用带有能量色散分光计的扫描电子显微镜,我们分析了被认为是制盐陶器的器壁上的盐分。分析结果表明,陶器内壁的Na和Cl的浓度都很高,而且从陶片的内部到外部,浓度从高到低形成了清晰的梯度(图4)。对圜底罐碎片的外壁进行的光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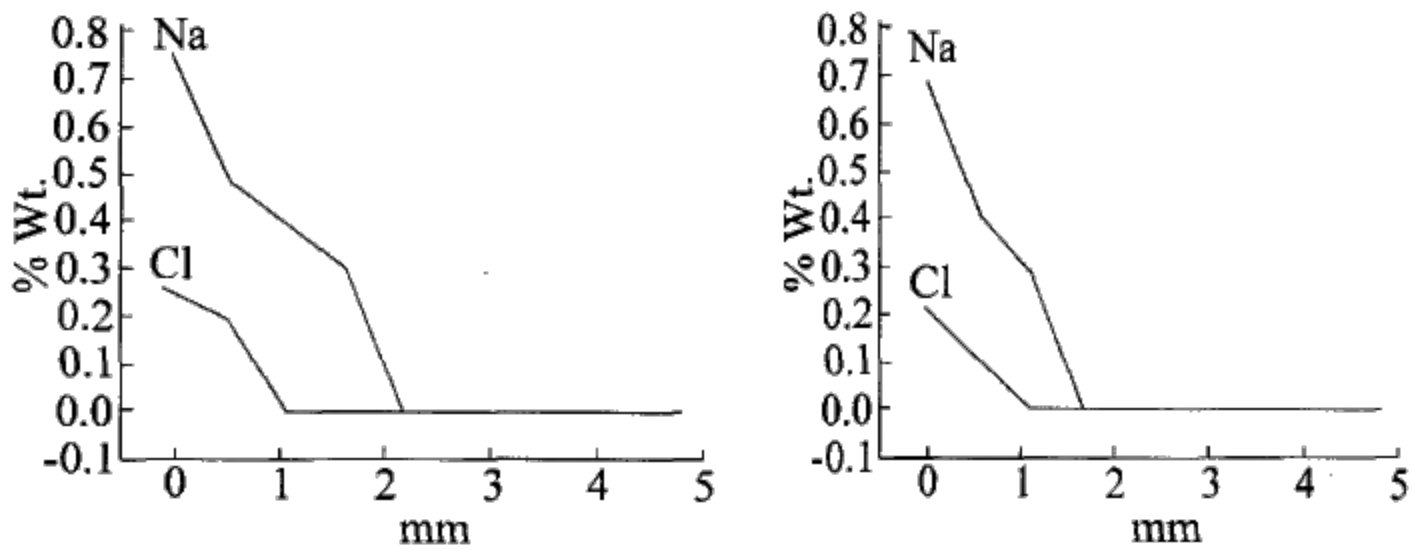


图4 对中坝的两个被怀疑为制盐陶片所做的扫描电子显微镜色散分光计分析。一个陶片取自灰坑H457(左)。另一陶片取自DT0202号探方(右)。事实上,在这两个陶片中,深度超过约1.1毫米后,Cl就没有了。从陶片的内壁起,左右两个陶片分别在深度为2.1毫米和1.7毫米处,Na的浓度接近0。© 2005 *Th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 S. A. 版权所有。

测定分析表明,未见Na和Cl。由此表明陶器内壁Na和Cl浓度的逐渐变小与陶片沉积后周围的条件无关,而与这些容器用于煮沸盐水相当有关。在盐水煮沸的过程中,Na和Cl与盐一起从溶液中沉淀出来并渗入器壁,但是,不同的扩散速度导致了碎片最内部2.1毫米内Na和Cl浓度的不同分布。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盐业生产是公元前一千纪中坝遗址的最重要的活动。此外,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陶器复制品的类似向人们暗示:在公元前第二千纪,盐业生产可能已经是这个地区的重要活动。对中坝的研究资料表明,以陶器为基础的盐业生产已经在中国发现。这是中国最早的、经过证实的案例。单从公元前一千纪这个年代就可证明,在公元前316年(秦国向四川扩张时)以前盐业生产就已建立。

事实上,在中国南部国家形成的复杂过程中,来自中坝的盐的确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关于剩余盐和可能的盐腌产品的专门生产,以及把这些商品与三峡外的地区进行贸易交换都刺激了长江中下游之间的联系。就像在公元前二千纪末年和前一千纪初中原和华东诸国形成时期,海盐和内陆的湖盐为新兴的国家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一样[20],四川盆地的盐源为南方新兴的政体提供了饮食补充品、保鲜剂和工业成分。公元前一千纪,虽然三峡仍然是一个相对边缘的地区,但是,随着楚国等邻近政体中的社会精英尝试创立更大的政治影响网络而

进行赠送礼物和其他相关的活动，使主要依靠剩余盐的交换建立的贸易网络给这个地区带来一些社会精英的活动，并刺激了这个地区的社会分化[21]。同时，来自三峡的盐促进了这些邻近政体更加复杂的经济体系的发展，因为盐资源在长江中游的其他地区是很难得到的。最后，盐成为秦国和楚国等扩张的国家的重要军队供应品，这些政体控制了与三峡邻近的地区。而且，盐的交换网络变成了这个地区并入统一的中华帝国的媒介。

这里使用的技术能用于进一步研究其他地区盐的开发。如上所述，关于盐业生产的考古工作已经在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和新大陆不同程度地展开。由于盐是人类社会中众所周知的重要物质，最近关于盐业生产的学术著作及通俗历史读物都表明[22]，盐业生产依旧是考古研究的重要问题。然而，考古学家常常要艰难地寻找适当的方法以研究古代社会中这种易溶解的产品。我们的研究工作表明，这种研究考古学遗迹的新方法对盐的探索富有成效。

本文发表在 *Th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102－35, 2005 年[23]。© 2005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 S. A. 版权所有。PNAS 不对本文翻译所产生的后果负责。

〔注　释〕

1 见 Bloch,1963;Dauphinee,1960;Denton,1984;Dethier,1977。

2 见 Bloch, 1963;Denton, 1984;Adshead, 1992;Kaunitz,1956; Multhauf, 1978;Schulkin, 1991。

3 见 Andrews,1983;Keslin,1964;Parsons,2001;Potts,1984。

4 同上。也见 Adshead, 1992。

5 见 Liu 与 Chen,2003;方辉,2004;李水城,2003。

6 见 Flad,2004;Chen,200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忠县文物保护管理局、重庆市移民局,2001。

7 见 Flad, Wu,von Falkenhausen, Li,Sun 与 Chen,还没出版。

8 见陈伯桢,2003。

9 见 Kondo,1975。

10 见 Riehm,1961;Potts,1984。

11 承 A. Yankowski 惠告。也见方辉,2004; Mckillop,2002;Gouletquer,1975;李水城、兰玉富、王辉、胡明明,2003。

12 承 A. Yankowski 惠告。

13 见付罗文与袁靖,2006,页 82:图表显示了在中坝一座编号为 99ZZDT0202 的探方内出土堆积物中三种主要容器类型出现的相对频率。列在图表左手侧的各层是最早的,可追溯到公元前 3000 年。几乎每一层的陶器都极为类似。

14 见 Parsons,2001;Sutton 与 Robert,1968。

15 见 Jodlowski,1975;北林八洲晴,1969。

16 见孙智彬,2003。

17 F = 房子,通常指房基。在中坝,这个名称是指工场的基础。M = 墓葬。这个名称是指挖掘出的坟墓状的坑。在中坝,这个名称也指那些被认为是生产设施的矩形坑,大多数的坑可能是盐水储存坑。Level 20 是在 DT0202 处挖掘出的堆积层,此处与盐业生产的陶片有联系。

18 见孙智彬,2003。

19 钙(Ca)(0.027 克/升)和镁(Mg)(0.0073 克/升)是当地盐水中重要的杂质。在第三阶段的几个生产设施的土壤中,其 Ca 和 Mg 的含量远高于同时代第 20 层(Level 20)的土壤。这些设施包括一个粘土壁坑(M75)和三个工场基础(F270、F198 和 F226)。粘土壁坑可能是储存盐水的容器,其基底表面是盐业生产的主要场所。因此,第 20 层土壤受盐水侵蚀的程度不如生产设施。

20 见 Liu 与 Chen,2003;方辉,2004。

21 见 von Falkenhausen,2001。

22 见 Parsons,2001;Riehm,1961;Mckillop,2005;Kurlansky,2001。

23 由美国耶鲁大学的 Frank Hole 编辑,于 2005 年 7 月 17 日通过(收稿日期为 2005 年 4 月 11 日)。作者感谢 Daniel Lieberman、Ofer Bar Yosef 和一位匿名审稿人,他们的评论对我们很有帮助。这项研究得到了美国 Wenner Gren 基金会(Wenner Gren Foundation fo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美国鲁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洛杉矶比较与跨学科亚洲研究中心(Los Angeles Comparative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Asia),Cotsen 考古研究所(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和考古学界的朋友,富布赖特基金(Fulbright Foundation),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10135050;中国科学院资助项目 KJCX—No 4 的支持。

参 考 文 献

ADSHEAD, Samuel Adrian M., *Province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Viceregal Government in Szechwan* (晚期中华帝国的省和政治:四川的王权统治),

London, Curzon Press, 1984.

ADSHEAD, Samuel Adrian M., *Salt and Civilization*（盐和文明）,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ANDREWS, Anthony P., *Maya Salt Production and Trade*（玛雅盐业生产和贸易）, Tucson, Arizona,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3.

北林八洲晴,《青森県夏泊半島の製塩土器》,《考古ジャーナル》,38,1969,页16—21。

BLOCH, Maurice R.,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Salt"（盐的社会影响）, *Scientific American*, 209 no. 1, 1963, p. 88 -96, 98.

陈伯桢,《由早期陶器制盐遗址与遗物的共同特性看渝东早期盐业生产》,《盐业史研究》,2003,1,页31—38。

CHEN Pochan（陈伯桢）, *Salt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from the Neolithic Period to the Han Dynasty in the Eastern Sichuan Basin, China*（中国四川盆地东部从新石器时代到汉朝的盐业生产及其分布）,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in Archaeology,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2004.

DAUPHINEE, James A., "Sodium Chloride in Physiology, Nutrition and Medicine"（生理学、营养学和医学中的氯化钠）, in D. W. KAUFMANN ed., *Sodium Chloride in Physiology, Nutrition and Medicine*, New York and London, Reinhold Publishing Corp., 1960, p. 382 -453.

DENTON, O., *The Hunger for Salt: An Anthropological, Physiological, and Medical Analysis*（对盐的渴求:一个人类学、生理学和医学的分析）,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84.

DETHIER, Vincent G., "The Taste of Salt"（盐的味道）, *American Scientist*, 65, 1977, 6, p. 744 -751.

FALKENHAUSEN, Lothar von, "The Chengdu Plain in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 C.: Zhuwajie"（公元前一千年的成都平原:竹瓦街）, in Robert W. BAGLEY ed., *Ancient Sichuan: Treasures from a Lost Civilization*, Seattle and Princeton, Seattle Art Museum an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77 - 201.

方辉,《商周时期鲁北地区海盐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2004,4,页53—67。

FLAD, Rowan K., *Specialized Salt Production and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 at the Prehistoric Site of Zhongba in the Eastern Sichuan Basin, China*（中国四川盆地东部中坝史前遗址的专门化盐业生产和变化的社会结构）,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in Archaeology,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2004.

FLAD, R. K.（付罗文）, WU X.（吴小红）, von FALKENHAUSEN, L.（罗泰）, LI S.（李水城）, SUN Z.（孙志彬）& Chen P.（陈伯桢）, "Radiocarbon Dates from the site of Zhongba"（中坝遗址的放射性碳素断代）,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发表中；也以《中坝遗址放射性碳素分析简要报告》为题提供给《考古》。

付罗文、袁靖,《重庆忠县坝遗址动物遗存的研究》,《考古》,2006,1,页 79—88。

GOULETQUER, Pierre Louis, "Niger, Country of Salt"（尼日尔,盐的国家）, in Kay W. de BRISAY and K. A. EVANS eds., *Salt: The Study of an Ancient Industry. Report on the Salt Weekend Held at the University of Essex, 20—22 September 1974*, Colchester, Colchester Archaeological Group, 1975, p. 47 - 51.

郭正忠,《中国盐业史·地方编》,古代篇,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第 1—3 册。

JODLOWSKI, Antoni, "Salt Production in Poland in Prehistoric Times"（史前时期波兰的盐业生产）, in Kay W. de BRISAY and K. A. EVANS eds., *Salt: The Study of an Ancient Industry. Report on the Salt Weekend Held at the University of Essex 20—22 September 1974*, Colchester, Colchester Archaeological Group, 1975, p. 85 - 87.

KAUNITZ, Han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alt Consumption"（盐消耗的原因和结果）, *Nature*, 178, 1956, 4543, p. 1141 - 1144.

KESLIN, Richard O., "Archaeological Implications on the Role of Salt as an Element of Cultural Diffusion"（关于盐作为文化传播要素角色的考古学推断）, *Missouri Archaeologist*, 26, 1964, p. 1 - 174.

KONDO Yoshiro, "The Ancient Salt Industry in Japan"（日本古代的食盐工业）, in Kay W. de BRISAY and K. A. EVANS eds., *Salt: The Study of an Ancient Industry. Report on the Salt Weekend Held at the University of Essex, 20—22 September 1974*, Colchester, Colchester Archaeological Group, 1975, p. 61 - 65.

KURLANSKY, Mark. *Salt: A World History* (盐:世界历史), New York, Walker and Co., 2001.

李水城、兰玉富、王辉、胡明明,《莱州湾地区古代盐业考古调查》,《盐业史研究》,2003,1,页82—91。

李水城,《近年来中国盐业考古领域的新进展》,《盐业史研究》,2003,1,页9—15。

LIU Li(刘莉), CHEN Xingcan(陈星灿),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中国早期的国家形成), London, Duckworth, 2003.

刘卫国,《试论渝东古盐泉向人工井的演进》,《盐业史研究》,2002,页32—40。

McKILLOP, Heather, *Salt: White Gold of the Ancient Maya* (盐:古代玛雅的白色金子), Gainsville, FL,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2.

McKILLOP, Heather, "Finds in Belize Document Late Classic Maya Salt Making and Canoe Transport" (在伯利兹档案中发现的早期玛雅一流的制盐和独木舟运输), *Th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2), 2005, p. 5630 - 5634.

MULTHAUF, Robert P., *Neptune's Gift, a History of Common Salt* (普通盐的历史),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ARSON, Jeffrey, *The Last Saltmakers of Nexquipayac, Mexico: An Archaeological Ethnography* (墨西哥 Nexquipayac 最后的制盐者), Vol. Series Volume ID: 92, *Anthropological Papers of the Museum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2001.

POTTS, Daniel, "On Salt and Salt Gathering in Ancient Mesopotamia" (古美索不达米亚的盐和盐的收集),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XXVII, no. III, 1984, p. 225 - 271.

RIEHM, Karl, "Prehistoric Salt-Boiling" (史前熬盐), *Antiquity*, 35, 1961, 139, p. 181 - 191.

SCHULKIN, Jay, *Sodium Hunger: The Search for Salty Taste* (关于咸味的研究),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忠县文物保护管理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页559—610。

孙智彬,《忠县中坝遗址的性质——盐业生产的思考与探索》,《盐业史研究》,

2003,1,页25—30。

SUTTON, J. E. G., ROBERT, A. D., "Uvinza and Its Salt Industry"(Uvinza 和它的盐工业), *Azania*, 3, 1968, p. 45 - 86.

南阳附近的龚营遗址的发掘:方法和结果

杨宝成　杜德兰(Alain THOTE)　著
何竞　译

对中国中部地区龚营遗址的发掘工作是由武汉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法国高等实验学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以及塞纳—圣德尼省考古中心等中法研究机构和学校联合进行的。此次考古合作之所以能顺利开展还得益于法国远东学院的支持,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和交流合作处也提供了很大帮助。杜德兰之所以选择和武汉大学进行合作,是因为该校考古系杨宝成教授曾经参加著名的安阳遗址的发掘工作,长达20多年,具有非常丰富的考古经验。另外,武汉大学长期以来与法国在许多科学领域都保持着合作关系。最后,让学生们直接参与考古发掘过程,可以让这些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对考古学的新方法和考古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有更多的了解。

我们的合作项目起源于以往工作中的一点体会:中国的考古工作成果极为丰富,在世界上享有广泛声誉,不过它也存在不利的一面。在古代,中国人有厚葬死者的习惯,秦始皇陵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另外,与西方的情况不同,中国的建筑多是用木材、夯土或留不下太多痕迹的材料建成。供活人使用的建筑遗存虽然不多,中国的地下墓葬里却埋藏着大量的珍宝。因而对墓葬的发掘,尤其是对那些身分高贵、声名显赫的人的墓葬的发掘就成了一项吸引人的工作。但与此同时,对其他类型遗址的研究则远远不够。当然近年来我们的中国同行对陵墓和陪葬的珍宝之外的其他方面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但这还只是一个新的现象。总之我们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对于古代的中国,到目前为止我们了解的主要是死人的世界,而对古代活人的生活情况还所知甚少。

因此,我们对中国古代的了解还不够全面:我们所了解的仅仅是上层社会的物质文化,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包括其中最重要的方面都还不为我们所知。城市和乡村居民的生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这和30多年前法国

对中世纪研究的情况相仿:因为有大量这个时期的教堂、房屋以及丰富的图文手稿和其他文献存在,所以考古学者原来对这个时期并不很感兴趣。然而,研究波兰和英国的考古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经验[1]。在参考了他们的经验并学习了他们所创造的新技术之后,法国考古专家们对遗迹较复杂的城市遗址进行了发掘,而后又成功地再现了高卢时期的村庄和当时的聚落以及居住环境,这使我们完全改变了以往的看法,因为法国高卢时代遗址所遭到的破坏和中国青铜时代的村落遗址所遭到的破坏情况是很相似的。

在中国,发掘了很多属于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221年的青铜时代的聚落遗址,然而这些发掘多是抢救性的,规划不够完整也不够系统。但是这些遗址的价值要求我们一定要采用科学系统的方法去发掘。今天,有谁能描述出中国青铜时代房舍的形状和修建方法呢?当时的村落是如何布局的?它们建造于什么样的环境之中?这些村民的生活是相对自给自足还是和距离遥远的村落保持着互相联系?村落之间的道路是怎么修建的?当时进行物品交换的途径是什么?城市之间,以及与相距更远的地区之间相互交换的物品是什么?这些问题对于完整、全面地理解一个古代社会都是十分重要的。在法国,在欧洲,这个研究课题提出已有时日,这方面的研究使我们对过去的了解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此我们想到要法方与中方携手合作发掘古代聚落。

关于此次发掘的选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议我们发掘位于南阳以南的龚营遗址。西周和春秋时期众多小国曾在南阳盆地设都,楚国可能也是其中之一。在古代,楚国是东周列国中最为富庶的国家之一。在战国时期楚文化的中心地区位于江汉平原,包括现在的湖北全省、湖南的北部以及河南的南部。我们对楚文化的了解停留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对此前的情况目前还知之不多。

南阳盆地有丰富的水系,它为长江的主要支流之一——汉水提供水源。这个位于中国北部和南部之间的微型区域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是几种不同文化的交汇之处。因此它在地理学和历史学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龚营,我们的工作从绘制地形图开始(图1)。为了完成这项工作,我们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对600多个地点进行了测量。遗址被一条小河——涧河所环绕。现代的村庄位于龚营遗址以北。为了搞清遗址的范围我们首先开挖了呈十字形分布的8条探沟。两条探沟之间的距离为40米,每条探沟长2米宽1米。根据试掘时所发现的遗迹,我们可以推断出遗址的面积在10000平方米左右。遗迹最密集处位于一棵大树和几座现代坟墓的旁边。不同时期在这里修建的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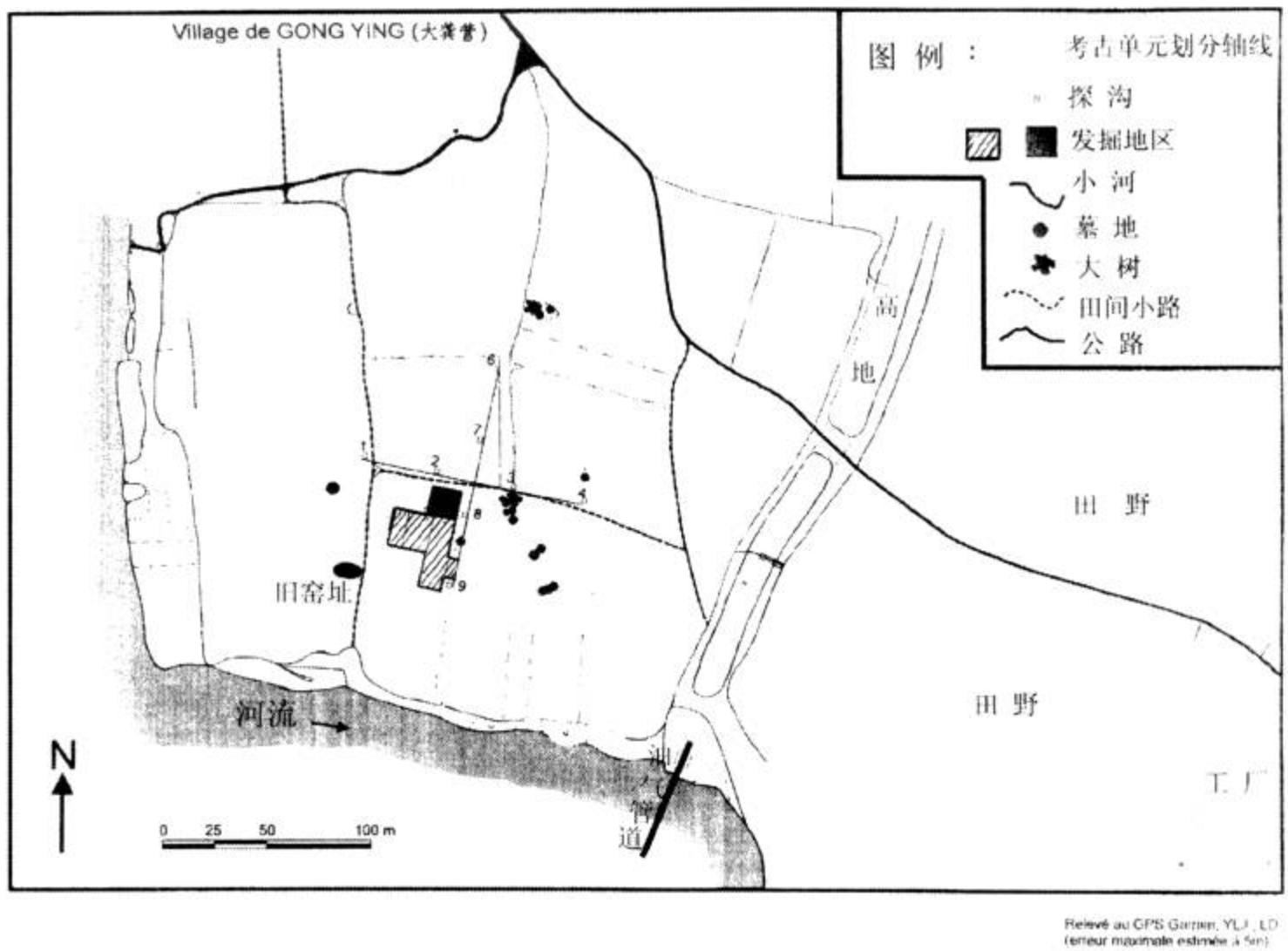


图 1 初步的地形图:1,2,3,4,6,7,8,9 等号码是试掘探方,F 是 2000 年发掘地区,F 以南是 2001 年和 2002 年的发掘区;小圆点是现代坟墓。

墓对遗址造成了相当的破坏。由于后期整理工作尚未结束,这次讲座所介绍的只是一些初步的成果。钻探时提取了供分析用的土壤。对它们的分析尚在进行之中,我们可以通过已经提取的标本进行初步的剖面分析。

遗址位于一座小山岗上。在耕土下面,有受到破坏的文化层,其中分属各个时代的陶片和其他器物混杂在一起。在靠近河流,距离发掘区 100 米左右的地段进行钻探时找到了一个古代的地面,但由于缺少遗物,我们无法得知这一地面是否是周朝的。

我们的考古队伍包括武汉大学的学生、河南省的考古学者以及法国的考古专家。在 2000 年、2001 年、2002 年进行了三次发掘,发掘面积略多于遗址总面积的 5%,也就是 700 平方米左右。我们同时在两个工地进行发掘,一处由中方

主持,另一处由法方负责,以比较两个发掘方法的长处(图2)。双方采用的发掘方法迥然不同,因为如今在欧洲我们已经几乎不再使用分层发掘的探方发掘法。探方四壁的剖面有助于了解和判断堆积的早晚关系,而没有明显可确认为某一遗迹现象的,则将其作为地层来处理。

图2 2001年发掘工地全图,后面是中方用探方发掘法发掘的工地,前面是法方用全面揭露法发掘的工地。

在2000年,中国和法国的发掘都采用探方发掘法。在2001年和2002年,法国使用的是全面揭露发掘法,即整个揭开发掘工地的表面土层,不设隔梁。在2001年,法方开挖面积长10米宽14.5米。在发掘聚落时,该方法显示出很多优势:首先,我们在整个发掘过程中都能看到遗址全貌,而且每个发掘阶段结束后,马上可以绘出平面图并且测量出所有遗迹的高度数据。其次,我们不是按照不同时期的文化层进行发掘,而是根据考古单位进行发掘。一个灰坑是一个考古单位,一个柱洞是一个考古单位,一个灰坑里的堆积层也是一个考古单位。在记录时,我们使用了考古单位这个词,相当于中国考古学者所称的地层和遗迹单位。用这个方法还有一个优点:在整个工地范围内不留任何隔梁,全部进行发掘,这种情况在采用探方发掘法时是很难实现的。因此我们认为这是发掘聚落

遗址最为恰当的方法。

登记采用卡片的形式，而且是与发掘的进展同步进行。涉及不同性质的现象，卡片也不同，比如地层（废弃堆积层或人工修整堆积层）、挖坑或是挖掘柱洞的现象都用不同的卡片。在发掘的时候，我们通过填写卡片的所有内容来描述每个考古单位：比如说有多少陶片和其他物品以及有没有木炭等标本的提取，并在卡片上绘制灰坑的平面图和剖面图等等。每个考古单位都有不同的编号。因为我们是按照考古单位进行发掘，每一个单位卡片填写完时，它与其他单位之间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就被记录下来。这里必须指出编号的大小与遗址存在的时期及地点没有关系。我们按 1：20 的比例绘出灰坑的侧面图、平面图和发掘地面图。探方发掘法的好处在于能在发掘进行的同时提供侧剖面图，也能揭示层位间的依次叠压或堆积。全面揭露发掘法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做剖面的方法有所不同：随着发掘的不断进展，我们随时测量地层和灰坑的深度，同时绘制剖面图，因此称此图为渐进剖面图。2001 年，我们曾在发掘区做了三个渐进剖面图，一个在南北主轴线上，还有两个为东西方向，分别位于工地 1/3 和 2/3 处。每个地层单位发掘结束后，我们都把它绘制在图上。

因为我们记录下了每一个灰坑中哪些是回填的地层单位，哪些是和其他灰坑的交叉，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地层单位的时代顺序。这样做就可以做出涵盖整个发掘地面全部地层单位和灰坑单位的图表，各个单位之间的时间关系也一目了然。图 3 是 2000 年到 2002 年三次发掘期间的树状相对年代单位关系图的一部分。全单位图表大约有 4 米长。图表上的单位可分为两种：挖坑单位和地层单位（“⊔”符号为挖坑单位）。举例来说，904 号单位是一个灰坑，该坑的第一个发掘的填层编号为 905，第二层发掘填土为 925 号单位。这也就是说，时代最早出现的是挖坑，然后是第一次回填，接着是第二次回填，925 号单位里的陶片及包含物与 905 号单位的包含物相比属于较早时期。因此图表的第一个优点是可以快速确定同一个发掘工地里彼此远离的单位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另一方面，依据图表和对遗址整体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遗址变化的主要阶段：修建时期、聚落时期、废弃时期以及重新使用的时期等。事实上，发掘人类聚落遗址的困难正在于此，因为经过一代代人不断的繁衍生息，聚落的遗迹受到不断的破坏（比如说 917 号灰坑破坏了填满 936 号灰坑的 937 号与 938 号两个回填地层）。我们的图表表明龚营遗址在公元前 15 世纪与公元 1 世纪之间经历了 9 个大的发展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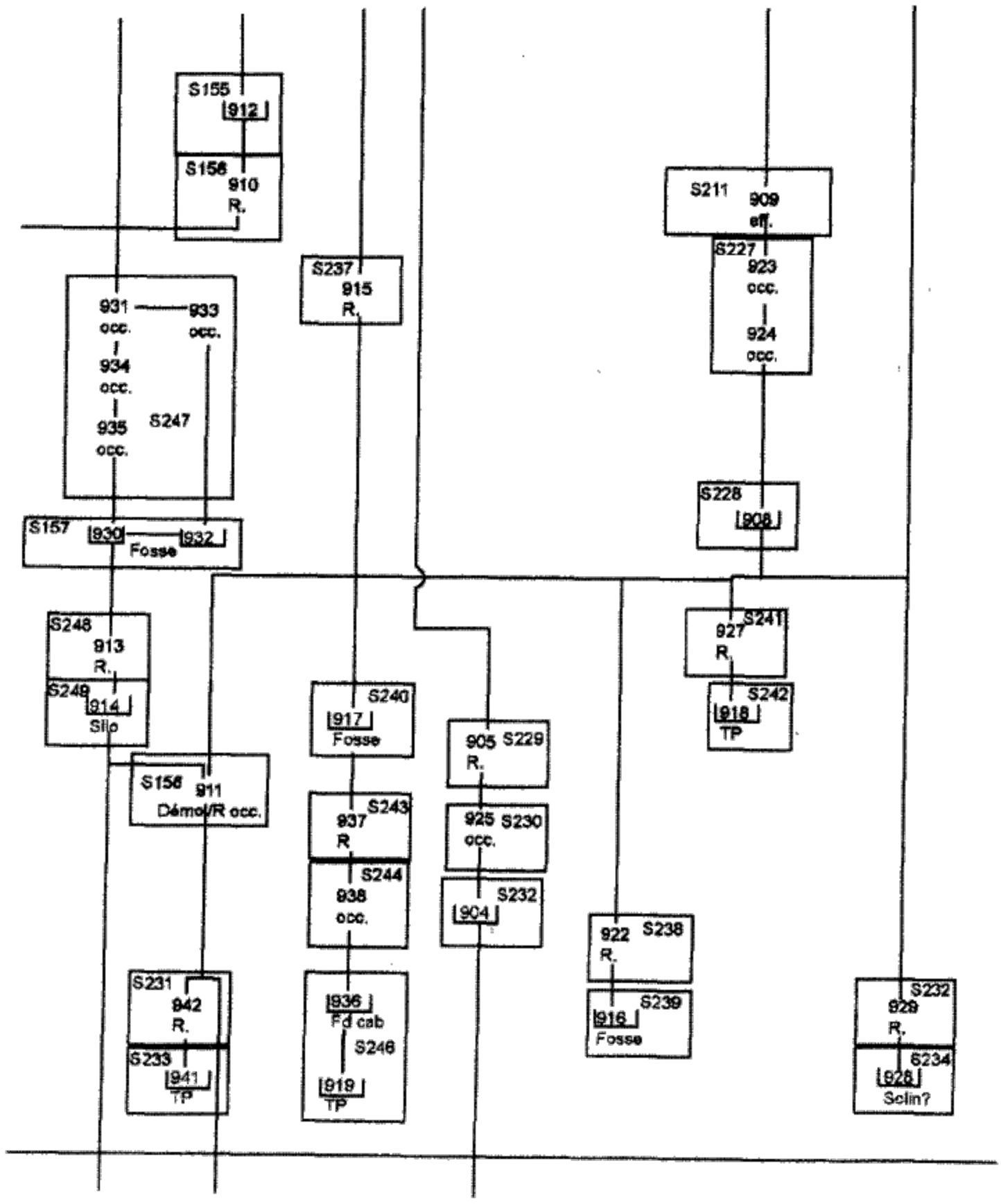


图 3　发掘期间的树状相对年代单位关系图的一部分

在发掘灰坑时，我们都先发掘一半，这样可以清楚地了解地层单位的先后顺序，并能看到清晰的剖面结构。在发掘一口直径大约为4米的水井时我们也采取了上述的方法（彩图1）。这口水井先挖得十分宽阔，然后里面建造了一个木头或其他材料的结构，最后在井壁与结构之间进行了回填。这口水井使用了一段时间，最后在公元前8或7世纪左右大井的上面部分被改成了水塘。整个井坑位于聚落附近，周围几乎没有什么建筑遗迹，仅有的几个基本属于作坊。这个水井坑可能是当时附近的居民的生活水源，也可能是为手工作坊提供用水。

与很多古代聚落相同，这里发掘出来的结构大多为半穴式建筑遗迹、倒垃圾的灰坑、柱洞和水井。此外，还有一些房舍的地基结构。我们注意到很多结构呈东西向或南北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朝向影响到当地土地的划分，甚至在废弃以后还能对当地的自然景观产生长达几个世纪的影响。

这片区域可能经历过若干次不同性质的活动。在一个灰坑的深处，我们发现了两块鹿角，它们被有意摆放在一起。这样做也许是为表示某种祭祀性或避邪性活动。该遗址里发掘出来的大部分物品都是陶片，法方工地发掘出的陶片共计4.7万余片，总重量超过500公斤（图4）。每一个陶片上都写有它们所处地层单位的号码。在对这些陶片进行对比时，我们就能很方便地判断出从多个地层单位出土的陶片是否来自于同一件陶器。我们对从法方工地270余个含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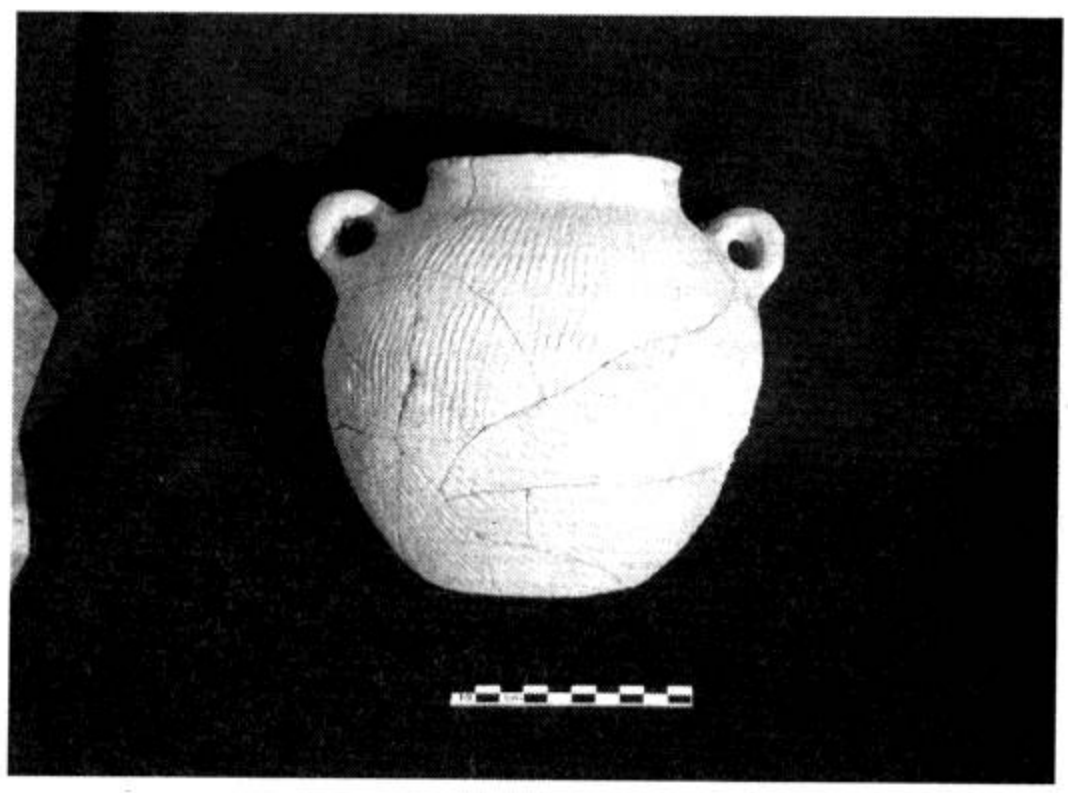


图4　双耳水罐

陶片的地层单位出土的陶片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并对若干件陶器进行了复原。另一些陶器虽然残缺,但可通过绘图看出其原始形状。对制陶所用陶土的分析工作还在进行当中。龚营的陶器是用较高温度焙烧的。细质或极细质陶的储存器、饮食器和用于炊事的粗质陶器在器物中各占1/2。

对陶片进行的分析发现了当时的独特做法,由器物表面的绳纹可以推断出当时使用的是慢轮拍打法。大部分的慢轮痕迹位于陶器的颈部和边缘处,而在陶器的内壁上则没有。我们原来以为在青铜时代晚期,陶器的制作采用的是快轮制造法,而没有想到当时最普遍的制造方法还是手制。

在日常生活中,陶豆可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器皿:从它的形状和尺寸分析,它可能是当时人们席地而坐时使用的器物,因此这种器皿距离地面高度可达20厘米左右。另外,有些陶豆上刻有符号,或是刻在容器的内面,或是刻在豆把上。这些符号应该与制陶作坊无关,因为在其他陶器上都没有这样的符号,因此我们认为它可能和使用陶豆的人有关。

因为有烧坏了的陶器和陶拍、陶垫的存在,我们可以认为龚营遗址当时有制陶作坊。但也有一类陶器的土质和器形与大部分陶器均不相同,它们可能来自于另外的地方。有一些陶器和从墓葬里发掘的陶器有所不同,比如说小罐的陶塞。

我们已经对每一个地层单位出土的陶片都做了整体分析:粗陶质,有含石英的,有含云母的,也有极细的陶质。还有一些陶器是用两种不同陶质烧造的,比如甗:它的底部是粗陶质,而上部陶质较细。此外,我们将所有能表现某种器形的陶片都画下来并做了绘图(图5)。然后将绘图输入电脑,并在电脑上进行器形复原后随即开始做类型学研究。这部分陶器做工精细,和其他遗址相比,从它们的器形上可以判断出其制作的时间大约在西周末期到战国初期之际。C_{14}测定进一步确定这一时期为公元前800—400年。位于全单位图表上部的是一个在公元前385—173年间被回填的灰坑(也就是说它比大部分遗址的年代要晚)。在清理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几片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陶片,说明附近曾有一个比较早的聚落遗址。对龚营陶器做出全面分析之后,我们希望能对该遗址做一个比较细的发展断代。

起初,我们的计划是研究楚文化。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处发掘现场里楚文化的典型遗迹相当少,这可能是因为遗址的表面地层曾遭受严重破坏。

我们发掘出了若干件已经破碎或者不完整的器物,其中有石制工具(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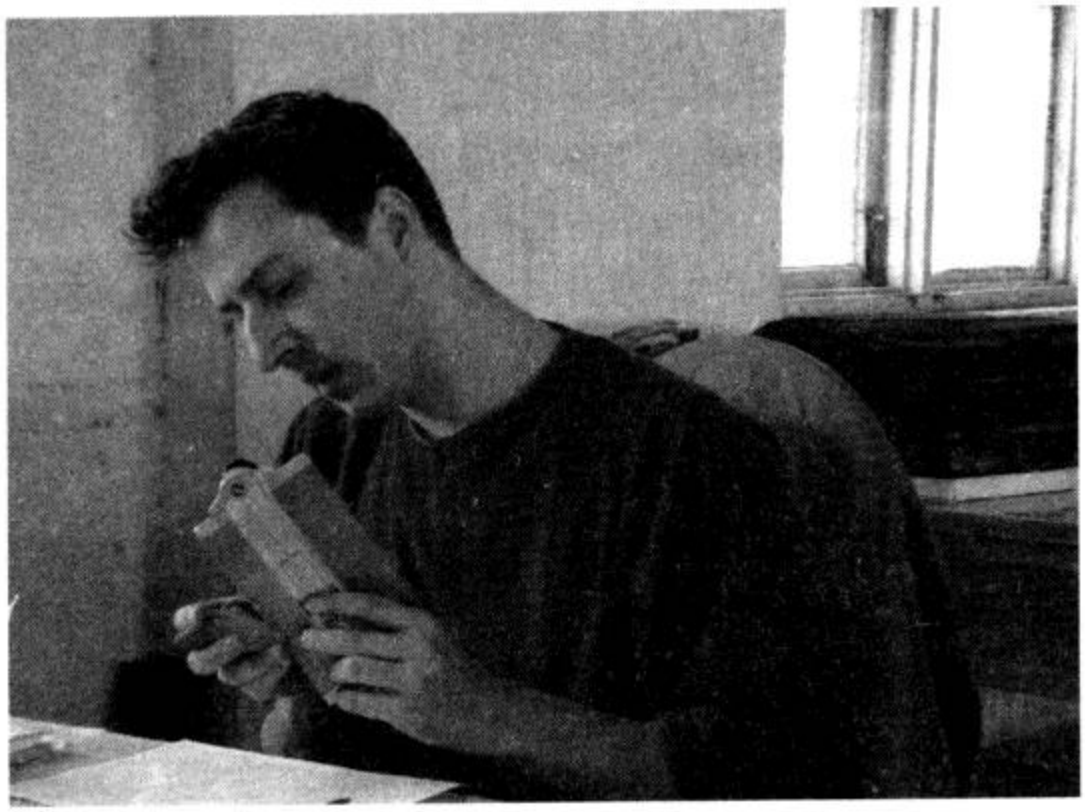


图5　陶片绘图方法(绘图比例为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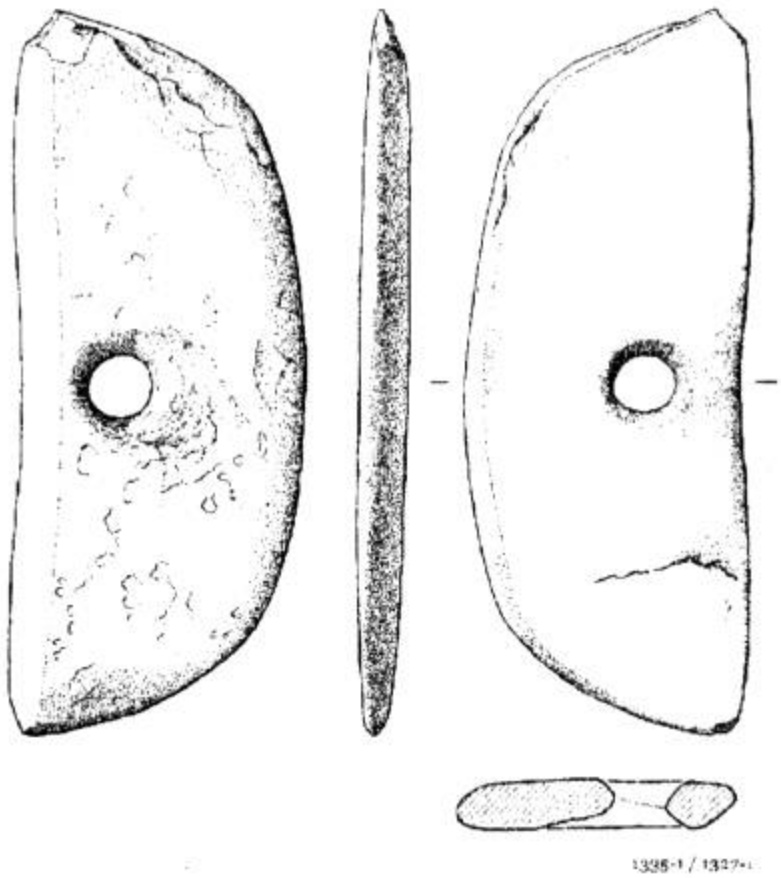


图6　半月形石刀(尼古拉·拉特萨诺布罗斯绘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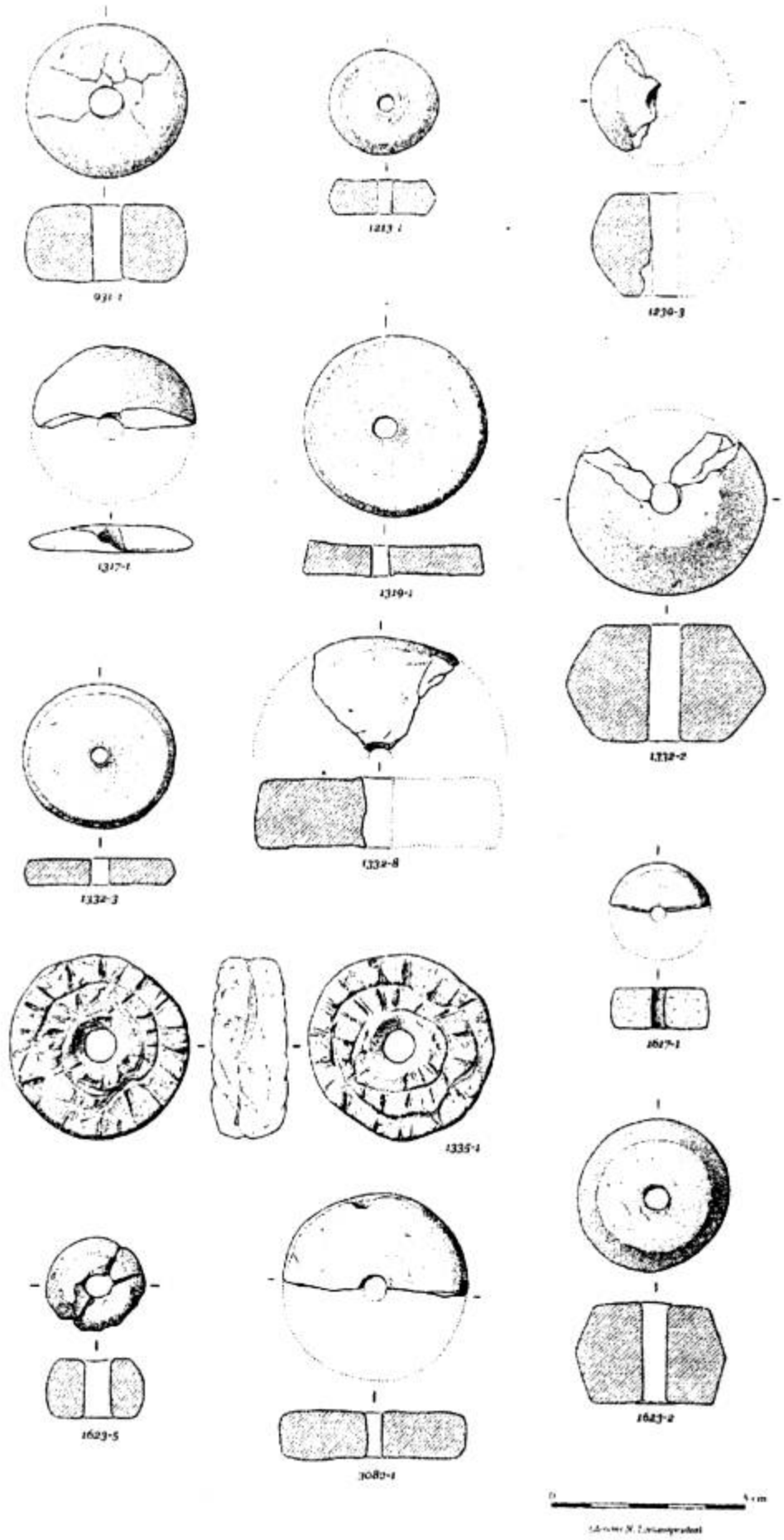


图7 纺轮

6),它说明在青铜时代这一古老的技术还在延续。有纺轮(图 7),还有一些金属或骨质的细小器物(如箭镞)。在 2000 年的考古工作中发掘了一个呈饼状、表面有很多小孔的陶甑(图 8)。在该工地我们还发现了几块陶甑,一块呈椭圆形,另两块是用碎陶片加工而成的。据一些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它们是洗浴时使用的工具。在现代的摩洛哥还有人使用该种物品。

有一块陶片的内表面上有好几处类似青铜器铭文的焙烧之前刻上去的字迹。左上方有汉字"王"的痕迹,另一字符在焙烧前被多次刻画。因此,很有可能是一种书写的尝试。能在那个时期的村庄遗址里发现陶器上有文字样刻痕很令人惊讶,因为当时只有社会上层的人才会写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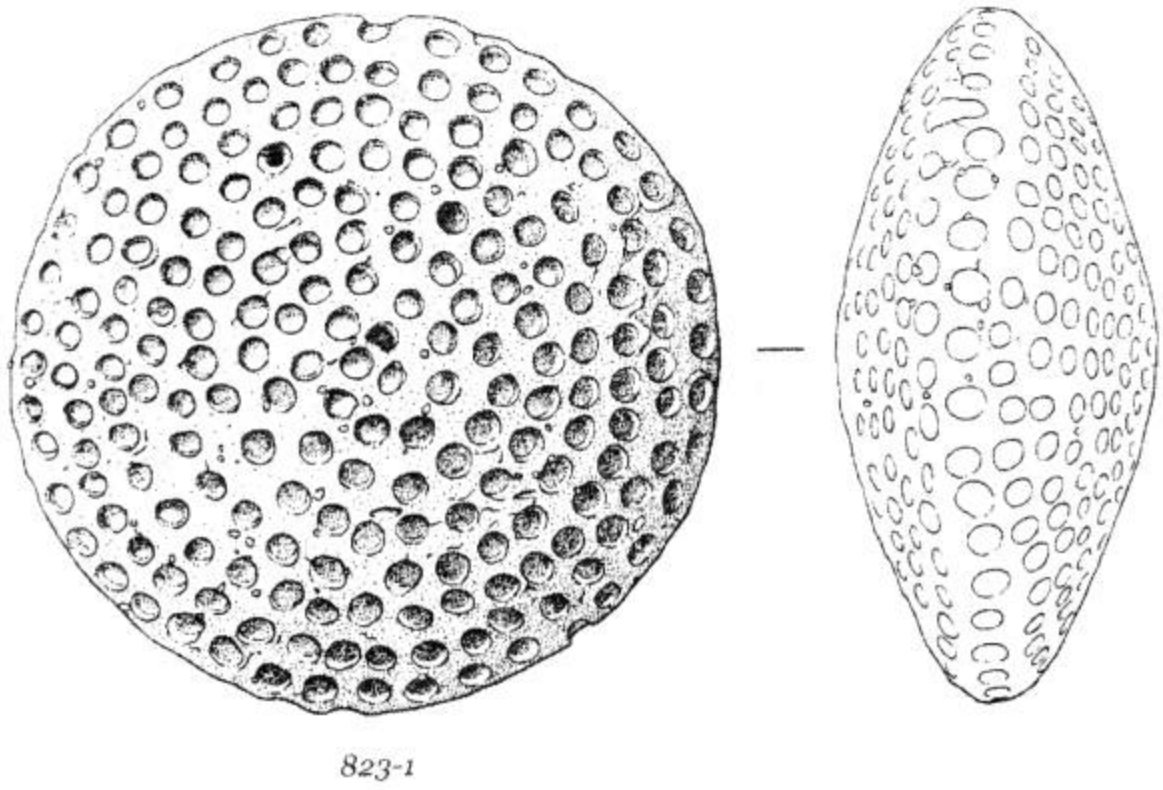


图 8 陶甑(尼古拉·拉特萨诺布罗斯绘图)

我们对发掘出来的全部动物骨骸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显示猪在当时生活中占有主要地位,其次是羊,而牛和鹿同处于第三位,然后有狗和野猪,最后是马。狩猎的对象则首先是鹿,然后是野猪和野兔。根据各种动物的数量可以推断,狩猎是当时这一聚落的重要活动。经过对骨骸上存留的割痕的研究,我们认为当时的人很可能也吃狗肉和马肉,这很令人惊奇。因为据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那一时代的人食用这两种动物的记载或报告。鹿的大量存在说明当时这里的环境和气候与今天有很大差别。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这里当时完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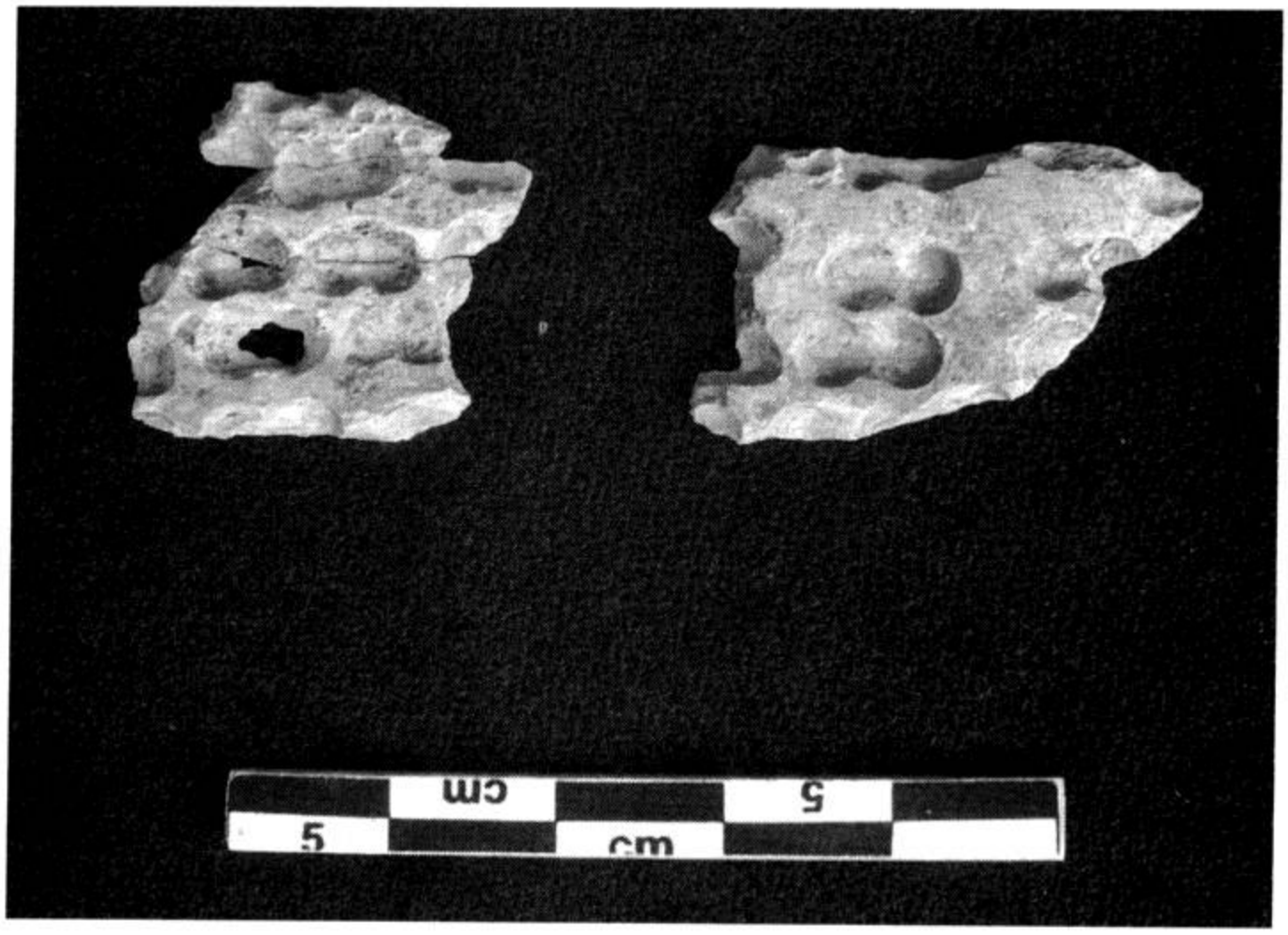


图9 占卜的龟腹甲片

被森林所覆盖。遗址所发现的植物残留显示,当时的龚营也有自然生长的竹子。

在遗址的多个地方都发现了准备用于占卜或已经用于占卜的牛的肩胛骨和乌龟腹甲的碎片(图9)。这样的骨片都是小块,而且数量也不多。虽然卜骨在夏商时期比较流行,但在中国青铜时代末期的遗址里却很少见到卜骨。话虽如此,湖北的一些西周末期以及春秋时期的遗址里也出土过与龚营遗址相似的卜骨(《江汉考古》, 2005 年第 4 辑)。也就是说,这些遗址不仅与龚营遗址处于同一时代,而且还相距不远,就在南阳盆地以南。

尽管对所有数据,包括发掘时收集到的骨骸和炭化物都进行了分析、研究,但因发掘面积有限,我们依然无法揭开这个西周晚期到战国初期聚落遗址的所有秘密。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发掘验证发掘此类遗址所采用的特殊方法,因为要想表现青铜时代村落的物质文化的价值,研究方法是最重要的因素。同一类型的多次发掘活动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青铜时代村落里从居所的形式到

村庄的布局，以及手工业生产的组织等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的实际情况。在欧洲，至少最近三四十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而，今天我们可以重现当时房舍、谷仓的形状，描绘古代生活环境和自然景观一直到今天的演变过程。的确，从古代到今天，自然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生活环境已经无法让我们了解远古的状况。今天，中国考古工作者已经提出了这些问题，我们相信在这个方面，中国考古界必将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最后，我们谨向本次学术讨论会的组织者表示真诚的感谢，同时感谢对我们在中国进行的合作提供过宝贵帮助的中国国家文物局、河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局以及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合作处。

本文是“欧亚非考古与文明——历史、考古与社会”中法学术系列讲座第67讲的讲稿。

〔注　释〕

1　请参看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保罗·巴恩(Paul Bahn)，《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在塔克拉玛干的沙漠里:公元初年丝绸之路开辟之前克里雅河谷消逝的绿洲——记中法新疆联合考古工作

戴蔻琳(Corinne DEBAINE-FRANCFORT)
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Abduressul IDRISS) 著
吴旻 译

位于中国内陆和中亚边界处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是中国最西部的一个省份,它的面积是法国的三倍。它与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克什米尔吉拉达克等国家与地区接壤,在这个高山环绕的地区中间,有一片广袤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那里干燥的气候使得一些古迹非常完好地保存下来。在几大农耕帝国(中国、印度和波斯)交叉处,这片"蛮夷之地"的绿洲一直是接触和混杂的地方。但是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这个地区在丝绸之路以前的历史几乎不为人知。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外交部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组成的中法联合考古队,其目的就在于试图揭开这个地区第一批移民运作的秘密,并且将之重置于自然环境的发展之中。

克里雅计划

从1991年开始,围绕着南疆于阗地区的克里雅河谷——这一可能会有很大发现但是几乎还没有考察的地区,组织了一个"中法联合克里雅河考古队"进行共同发掘的计划。

这个中法考古队的主要成员来自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UMR 7041("考古学与古代科学")的中亚考古研究所(以前的315所)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此外还有许多中法机构的合作人员参加,如来自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法国国立自然博物馆、法国人类博物馆、法国图卢兹大学、斯托拉斯堡法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等。在他们当中，有关于中国和中亚的考古专家，有古动物与古植物考古学家，有体质人类学家和一位法医，有纺织品和皮革的专家，有染料和颜料专家，有冶金学家，有建筑学家，有古建保护和重修专家，有艺术史家，还有与最大的实验室（历史古迹研究实验室、法国博物馆重修研究中心、法国国家电力公司——Valectra 实验室、欧莱雅研究与发展实验室、计算机、自动化和应用数学研究中法实验室、还有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人类学研究室古代基因研究中心，还有其他很多的实验室，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合作的化学专家。

这次合作考古活动的目的在于，基于对中亚其他相似地区的认识，验证在沙漠、河流三角洲和古河流沿岸存在人类居住的可能性，这些河流今天已经枯竭，但在卫星图片上其痕迹还清晰可见。在经过很好地推算和设计之后，我们从克里雅河现在的河道找到了它的古河道，几年的勘查和发掘使得我们确实发现了属于一个已经消逝的文明的从未为人所知的遗迹。

克里雅河源自昆仑山。如今，它的河谷土地不适宜农耕，因此以畜牧业为生的居民散居在河谷中。这是个半沙漠化的地区，分布沙丘和沼泽：沼泽地里长着芦苇、胡杨和柽柳。这里同样也保存了手工业与建筑业的传统，对这些传统的研究使得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的人们是怎样能够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定居和延续下来的。穿越了一片又一片的沙漠，这条河水已经干涸的河谷曾经是一条联系南北的道路，连接着和田（于阗）和库车（龟兹）地区的大绿洲。由于地质运动以及部分由人类造成的逐步的沙漠化，河流的走向在几个世纪的时间中已经渐渐改为西北—东南（图 1）。

这些河流改道的痕迹在卫星图片上仍然清晰可见。对这些图片的研究和我们在实地进行的考察，使得我们可以重现克里雅河三角洲自公元前一千纪上半叶至今的分为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第一个阶段：史前时代（铁器时代），圆沙古城（Djoumboulak Koum）三角洲（今天，这里的植被已经完全被破坏，只有沙漠肆虐）。第二个阶段：汉魏两晋时代（3—4 世纪），喀拉墩古城三角洲。那些树木，生长在已经干涸的河流的不同河床之上，根被狂风侵蚀成了锥状，它们艰难地苟活着。第三个阶段：就是目前的大河沿三角洲，是在沙地上的一片绿洲（图 2）。

图1 新疆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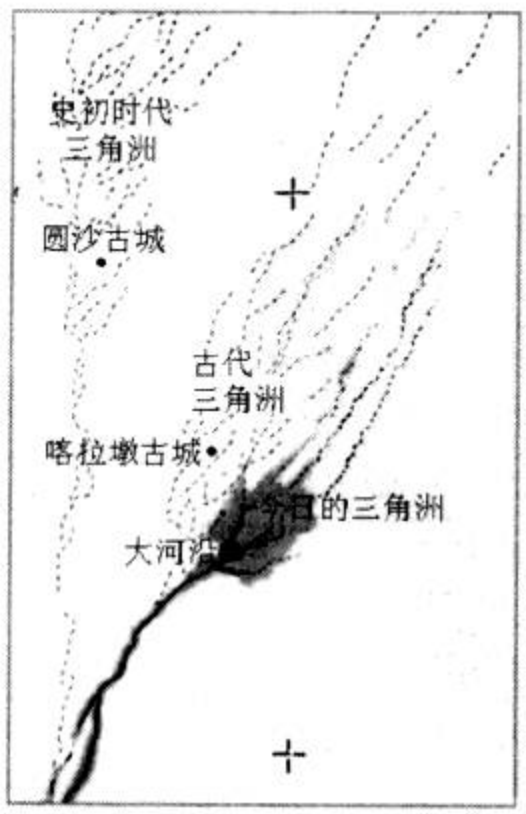


图2 克里雅河古今三处三角洲图

重新发现喀拉墩古城：一片被浇灌过的绿洲，中国最古老的佛教图画（公元3世纪）

我们需要做的第一步是回溯历史：古代三角洲的中心喀拉墩古城，是一片被浇灌过的绿洲的心脏地区，这片绿洲于3世纪末被放弃。在通往沙漠北边库车的道路上，它是商队的休憩之处和哨所。1898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曾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小堡垒，随后人们在这一地区又发现了建立在这个堡垒周围的一个农垦移民区的遗迹。在沙丘转移的时候，又有新的遗迹被发现：大型农场、公共和宗教建筑、手工业作坊区等。1991—1994年的三次调查发掘活动，通过对其人居建筑的研究，使得我们更好地认识了这一绿洲的功用，而通过对两座佛教寺院的研究，使得我们得以了解当时的日常生活和大的交流潮流。

这些相当分散的建筑，在绿荫遮盖的运河两岸形成木骨房的小型聚居区，还有一些为了禽畜修建的围场和附属建筑，以及花园和果园，种植着桑树、桃树和葡萄。无论是民用的还是宗教性质的，这些建筑物都是木结构，木骨泥墙（里面是木头或是芦苇做的骨架，外面抹泥）。从它们的家具上看得出在丝绸之路促进下的大的交流潮（如商业的、思想的和宗教的）：有雕刻的木制品——使人想到希腊样式的重要性，从巴尔米拉（叙利亚）到巴克特利亚，到犍陀罗，这些样式对建筑和绘画装饰影响极大；有当地的纺织品，有中国的丝绸和钱币，还有中亚的陶制品和棉织品，其形制和作坊则要到印度西北部的贵霜王朝和兴都库什山地区去寻找。

尽管中国有宗主国性质，但是从发现的用佉卢文（*kharosthi*）书写的板牌，和我们抢救出来的两座佛寺废墟中的壁画可知，喀拉墩的文化属于印度—犍陀罗文化圈。

这些遗址，与其东部的米兰和尼雅遗址一起，都是在中国内地和新疆已知的最早的佛教遗迹范围之中，也是我们这次考古发掘的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由于一次沙丘运动，在一年之内先后发现了这两座建筑，经过C_{14}断代可知，它们都建于公元3世纪的上半叶。对于这些建筑遗迹中保存下来的部分所做的精细的清单，以及对存留的壁画残片所做的保存和修复，使得我们可以重新设想这些建筑物的修建过程及其装饰，它们的印度原型早已不复存在，因此它们建立起了佛教向中国和中亚传播历史中脱漏的一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我们对它们进行了

多次修复和研究。

这两座佛寺都是高约3.5米的立方体形状,其中心构件都是一个边长2米的为安放佛塔所建的正方形台基。在这个*cella*(内神殿)的周围,有一条或两条宽1.5米的走廊以供完成*pradakšina*(行道)的仪式(彩图4)。尽管它们都是采取用木料和胶泥的建筑方式,但是这个用于仪式的建筑平面图与民居建筑平面图完全不同。

内廊的墙是有壁画的。很遗憾的是,这些土墙都非常易碎,这两座建筑都只留下了一堆由木料和断壁残垣组成的废墟,如同一个巨幅拼图的零散部分。对于考古队的每一位专家(考古学家、地形学家、建筑学家、艺术史家、修复专家),如何很好地理解整个遗址,并且试图从建筑和装饰两个方面将这一消逝的地方重建,都是一个挑战。从发掘现场就开始进行的辨认、修复和重建的长期工作使得我们能够第一次完成并且提供一个年代相当久远的佛教建筑的几乎完整的还原。上述的这些工作包括给出当地保存的遗址图、墙壁坍塌及其残片分布示意图、保存在建筑物上的木料和芦苇痕迹的示意图、在当地由古迹保护重建专家进行的加固和取样工作等等。

在两座佛寺胶泥之上绘制的装饰都是以墙基的佛陀站像为中心,在上部的图案中另有一些小型的佛陀坐像,这些上部图案的画面都嵌在木骨房裸露的木料之间(彩图3)。那些在上部图案中静思的小佛坐像是保存得最好的(图3、彩图2)。通过色彩、佛的姿势和佛像脸部方向的变化使得画面韵律生动,在佛寺A中,这些佛像的背景是佛树的叶子。佛寺A(N61)中,使用了三种基本颜色:白(石膏)、黑(石墨)和红(赭石)。在佛寺B(N62)中,又增加了一种鲜艳的蓝色(青金石),这种在中亚十分常见的颜色,是我们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使用记录。

在佛寺A里,印度艺术典范的影响十分明显,如微笑和丰满的脸部处理方式、小发卷式的发型、以及半闭的杏眼(与米兰的眼睛大张的表现方式非常不同)。在佛寺B里,外墙都用粘土模制的壁架装饰,这种印度风格与其他的灵感来源相混,反映出当地艺术来源的多样性及其中转过程。而这种当地艺术本身已经很混杂,例如我们可以看到世俗的和装饰性的花纹,都带有希腊文化的影响(珠状纹饰的框架、希腊纹饰框架或是枝叶状纹饰的框架)。

这些遗址从整体上建立起了佛教向中国和中亚传播历史中脱漏的一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根据东晋西行求经者法显(约公元400年)的说法,和田是当

图3 喀拉墩古城:佛寺A(N61):上部图案中的上下两座佛陀坐像(©—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队版权所有)

时繁荣的佛教中心。在此之前,如果我们将它与米兰比较,可以看出在南部地区已经存在着相当数量的不同佛教风格,它们完全不同并且代表了不同来源的影响。而目前来看喀拉墩却是占据了一个不同的位置。我们看到这里一些日后将发扬光大的题材已微露端倪,如将佛像成倍增多这一想法。

设防的古城及其墓地:圆沙古城或第一批定居农业经济的遗迹(公元前第一千年)

1994 年,我们在沙漠中又前进了 41 公里之后,终于到达了克里雅河西北的大三角洲,它比喀拉墩三角洲年代要早,我们设想它是在史前时代有人居住过的未知之地,这也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有的研究目标。我们在那里发现了圆沙古城及其绿洲,这是第一次发现汉代以前的人居痕迹,也是目前新疆已知的这一时代的惟一民居遗址,属公元前一千纪中期。以后的发掘活动都针对它展开。

喀拉墩遗址是一个围绕着它的小城堡建立起来的小型居民区,而圆沙古城则不同,它是一个设防的古城,对于究竟出于哪些理由(政治的不稳定性、空间的变化、对于外界侵略的反应、来自游牧民族的威胁、劫掠、侵袭或仅仅是一种警戒)使得城中的居民采取这样的方式保护自己还不无疑问。我们目前仍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是整体建筑的宏伟壮观,可见得显然当时是动员了相当可观的人力和物力。

城墙曾经过数次修缮,其建筑主体高度 2—4 米,厚度 4—5 米(图 4)。墙体用粘土建造,并以土坯加固,顶部则用夹以桎柳枝的木棍束加固,有些地方还划出巡查道。这一建筑方法与将泥土夯实的中国式技术不同,可以猜想它是受到了中亚的影响。南边的城门坐落在一座小丘的顶端,其最高海拔为 1160 米,也是这一遗址的制高点。一条有碉堡护卫的隐蔽的道路穿越城墙(图 5)。小道用一扇门来关闭,我们找到了它的木制门闩(图 6)。我们在这里找到的可供研究的地层达 7 米之厚,这在新疆是绝无仅有的。在城内,由于风沙的侵蚀,遗址的地形已经发生显著的变化,重现原有地貌通常是很困难的。而人类居所抵挡住了风沙的侵蚀,使得我们辨认出许多用于仓储的构件和大的住宅,人类至少有两个大的时期曾在此居住。在遗址找到的有机易腐的遗留物(木头、秸秆、干草、家畜粪便、厩肥、牲畜的角、毛皮和革,种籽、织品和毡垫等)之丰富极为罕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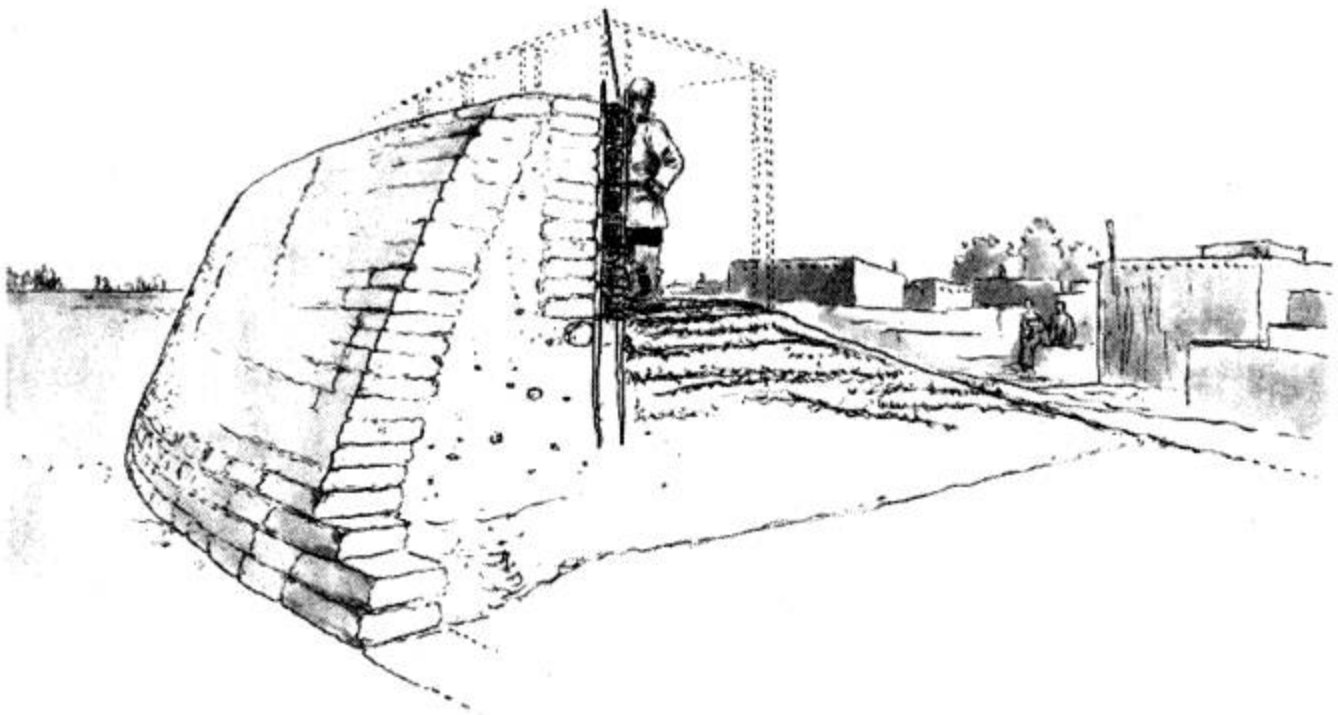


图4 南部城墙复原示意图(©—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队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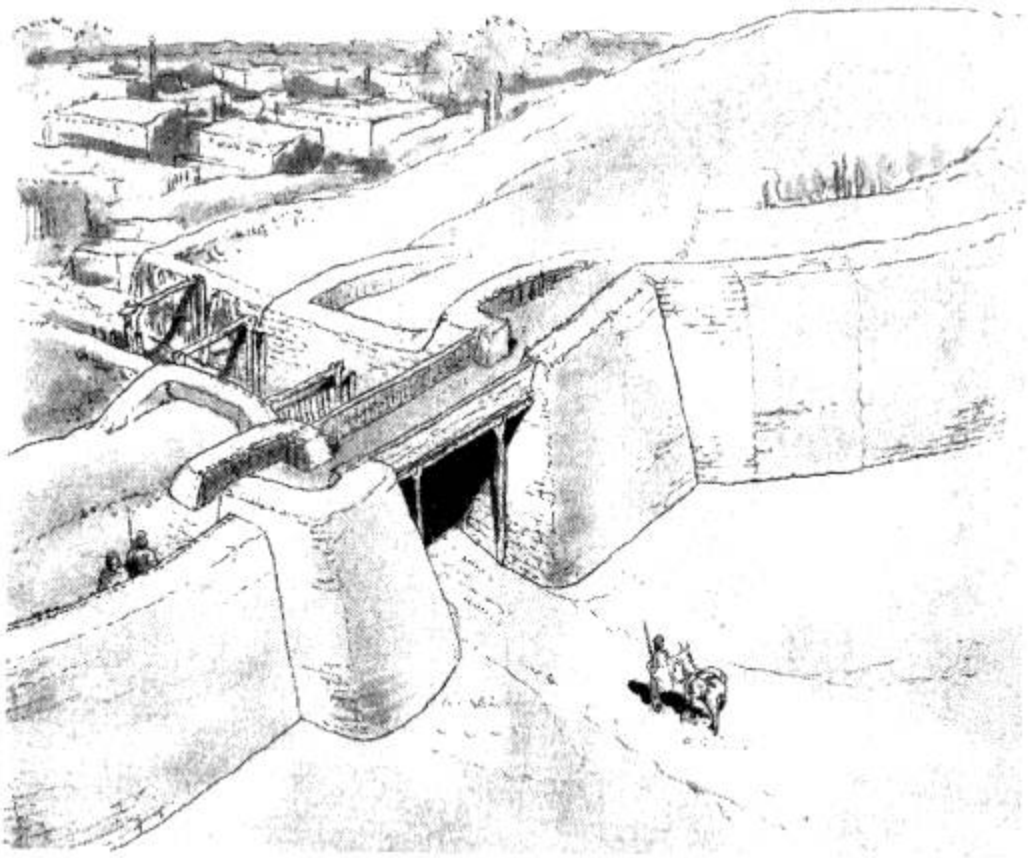


图5 南城门复原示意图(©—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队版权所有)

图6 南城门及其木门闩(©—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队版权所有)

这座古城的居民是什么人

他们是定居的农牧民、织工和冶金工人。早在汉代之前,他们就灌溉并且种植谷物:黍(*panicum miliaceum*)、大麦和小麦。在遗址周围找到的灌溉网络的痕迹(是新疆现存最早的)有数公里之长。传统上认为在公元初年中国人来此屯垦时才出现灌溉和农业发展,但是上述发现却推翻了这一想法。并且这一发现也更新了人们对公元前第一千纪这一地区居民的认识,此前人们大都是从几乎纯游牧民族的角度来看待他们的,同时也使得新疆在中亚古代农业发展史上获得应有的地位。

在遗址上发现的丰富的有机物使得对遗迹的交叉研究成为可能(植物学、动物学、对动物毛发和排泄物的显微观察、对织品所用染料和纤维的确定)。根据这些分析,我们获得了有关畜牧、农业活动、饮食习惯、制皮革业和纺织业的前所未有的讯息。山羊、绵羊、骆驼、马、牛、鸡和狗,那里的家禽家畜可以列举出很多。马科动物和骆驼,还有狗,都被食用。对畜类的食用是通过在骨头上留下的切割痕迹发现的。动物的角和肌腱同样也被切割过。

圆沙古城的居民对满足他们生活所需的周边环境了如指掌,他们懂得如何

最大限度地利用它，并且“物尽其用”。与喀拉墩一样，木料是取自近处的胡杨，在这里胡杨几乎就是全部的木料。胡杨的树干用来做房屋的梁架，把中间挖空，就做成棺材；人们还用它做成木碗和托盘、木桶和木盒，还有驮鞍的部件及纺轮。遗址中的陶器与塔克拉玛干西部和南部绿洲的灰色陶器文化相关（图 1）。除了有一些石磨和不同的石制工具及一些小型青铜器具之外，还有大量不同的铁制农具，其中大部分应该是在当地锻造的，其他的可能是别处进口的。其中一只白铁锅的残片可能就属于后者，盛放它的提兜在城内的发现应该说是绝无仅有的，对它的研究（与法国电力公司实验室以及圣太田矿业学院合作进行）应该可以重现其浇铸过程。

这座城池对于塔克拉玛干南部和北部的相邻地区开放，其居民也与其他更加遥远的地区有联系，如中国、印度以及中亚西部。一些进口的物品，如用眼纹玻璃珠子或用蚀刻玛瑙制作的椭圆形珠子、青铜贝或用胭脂虫染色的细麻布可以为证。其他的一些木制、毡制或是羊毛制的日常用品（驯鹿图案的盘子、装饰有鹰的图案的织品、有粘贴图案的毡垫，等等）通过其图案证明了他们与中亚草原居民及其绘图表现方式之间的联系。这些物品都是本地出产的，并不是从别处进口的。相似的器物也在且末扎滚鲁克的墓中发现，它们都属于从中亚（从米努辛斯克盆地到阿尔泰山、天山）到印度北部的喜玛拉雅地区（岩画）的广阔草原世界之中，而可以肯定的是，从此新疆，尤其是塔克拉玛干南部地区成为连接两个世界的重要的，但却长期被人忽略的一环。这种与草原世界的联系还不仅限于此。2001 年在圆沙古城发现的干尸，与阿尔泰冰墓的塞人文化的干尸有文化上的亲缘关系，这就提供了另一证据。

在城外的数座墓地

圆沙古城的居民为混血，以欧罗巴血统为主，他们死后都葬在城外的几座墓地之中。他们埋葬的方式各有不同（有的有棺盖；有的用胡杨的树干挖空作棺材；有的直接挖掘土坑，然后用木头和芦苇秸秆或编织好的桎柳枝填充覆盖），很可能反映出死者身份的不同。首先清理出的有四十多座墓。尽管被沙丘运动和风沙侵蚀严重破坏，但还是有大量的织品残余在墓中保存下来。

2001 年，重新开始的考古工作发现了一批保存完好的墓，里面有一些风干的干尸，他们身着服装，平躺屈膝，双手置于腹部，头部有枕，帽带系于下颌，面部

有殓衣覆盖(图7)。死者都穿着紧身上衣、一条长裤或一条腰裙,还带着帽子,穿着皮袄,戴着手套,穿着皮靴。死者都带有羽毛或玻璃珠作为装饰,还有一些日常器物作陪葬:装有谷类汤粥的陶碗、刀、铁制箭镞或者磨刀石(男性)、纺轮(女性)。有三具干尸是非常独特的:一具是位上了年纪的妇女,面部着色,戴着一顶铜冠以及一顶混合型高帽,帽子的最上端是一个铁制尖顶;一具是位男子,穿着一件贴有染色的皮革作为装饰的皮袄,一条绣有用小花图案装饰的纹章的长裤,这种图案继承了阿契美尼德传统,是经由草原传播过来的;另一具是位死于非命的青年男子。

图7 木制棺木中的男性干尸,面部有红色殓衣覆盖
(©—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队版权所有)

干尸和残存有机物

因为人们希望完整地将干尸保存下来，它们都被运往乌鲁木齐的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并成为另一项完全独立的研究对象。第一次跨学科的研究活动于2002年展开，其对象也扩大到整个人类学材料（8具干尸和57副骨架）和目前发现的衣物。

首先对于人体可见部分进行了人体生理学研究，继而又进行了病理学研究（外伤、传染病和炎症），并结合医学影像和基因分析技术（古基因研究由吉林大学的专家承担）进行深入研究。电子扫描图使得对这些干尸的虚拟解剖和三维立体成像成为可能。其中有三具被认为是受刑而亡的干尸，由于上面有多处人身伤害，因此请了法医来进行检验，从而再现了他们被处死刑的过程。

对于随葬品和葬礼仪式的研究也使得我们对于这个身后世界有了初步的了解（祭品、尸枕、被褥和尸布，将眼睛、鼻子和嘴封闭和/或填上药膏，帽带、蒙面布等等）。

然而这些干尸也为了解生前世界的情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重现生活状态、生活环境和人口情况；对于人体装饰习俗的研究（纹身、面部的粉饰和画妆、帽子和发型、饰品）（图8）。例如一些骨骼特征亦证明某些干尸生前曾经频繁地骑马；而在另一些干尸那里，牙齿的磨损显示有一种日常咀嚼之外的活动，很可能与软化皮革有关（图9）。

将对用于纺线/编织/纺织和对皮革进行处理的手工工具的研究，与对纺制、毡制、革制和皮毛制的服装的初步研究结合之后，我们就可获得各种重要的生产线的整体信息（对于生产原料的筛选和准备；服装的染色、设计、裁剪和缝制；成品的结构、装饰、作

图8 圆沙古城居民服饰复原图（©—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队版权所有）

图9 一位年轻人(接近成年的少年或青年)的齿冠磨损图(这种磨损由于日常咀嚼之外的活动所致,例如抽丝纺线,或是将作为缝纫用线的动物皮革或筋进行软化)(©—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队版权所有)

用和使用)。日后还将有一个更大的关于生物和有机物的考古学研究(尤其针对织品和染料)计划将之进一步发展。我们希望通过在新疆地区和阿尔泰地区(哈萨克斯坦和俄国)的考古发现——这两个地区的共同特征是由于干燥的气候或是永冻层,有机物都能很好地保存下来——使得公元前10—1世纪的知识和技术系统得到很好了解。这一计划需要采用新的分析方法,并且在一些尚未有太多文献的领域建立起重要的资料库。这一计划可以使我们日后获得一个在整个中亚范围内有效的参考体系。

这些研究日后亦将帮助我们了解死者的社会地位、两性的社会分工、居民之间的交流和发展以及人居历史,其背景是与新疆地区铁器时代居民的来源及其与周围居民关系相关的广泛问题。长期以来,对于这些干尸的研究是建立在它们的人种学分类上,即它们属于欧罗巴人种还是蒙古人种。有些作者认为这些新疆的"高加索"干尸是讲吐火罗语(这种语言由6—8世纪发现的文献证明其存在)的印欧民族的代表,他们是在青铜时代早期(公元前4000年末至3000

年)或是在铁器时代早期(公元前2000年末至1000年初)从西方到达塔里木盆地的。目前的研究已经证明情况要复杂得多,并指出遗传方面的混合早就存在,圆沙城的居民已经多为混血。这些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开展。

除了2001年在圆沙城西北对于克里雅的一条大的河道进行的勘测所得到的初步信息之外,这些居民之前的历史至今还是一个谜。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将继续回溯重现历史、找寻消逝的青铜时代。

参考文献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克里雅河流域出土金属遗物的冶金学研究》,《西域研究》,2004,4,页1—11。

DEBAINE-FRANCFORT, Corinne, IDRISS, Abduressul et WANG Binghua, 《Agriculture irriguée et art bouddhique ancien au coeur du Taklamakan (Karadong, Xinjiang, IIe—IVe siècles); premiers résultats de l'Expédition franco-chinoise de la Keriya》(塔克拉玛干中心的灌溉农业和古老的佛教艺术[喀拉墩,新疆,2—4世纪]:克里雅河中法联合考古工作最初成果), *Arts Asiatiques*, tome XLIX, 1994, p. 34-52.

DEBAINE-FRANCFORT, Corinne, 《Dans le Xinjiang désertique, Les oasis retrouvées de Keriya》(在沙漠化的新疆:克里雅重新发现的绿洲), *Archeologia*, n°75, février 2001, p. 16-29.

DEBAINE-FRANCFORT, Corinne, IDRISS, Abduressul (éds.), *Keriya, mémoires d'un fleuve, Archéologie et civilisation des oasis du Taklamakan*, Catalogue d'exposition(克里雅,一条河流的记忆:塔克拉玛干绿洲的考古和文化)[展览目录], Paris, Findakly, 2001.

DEBAINE-FRANCFORT, Corinne, IDRISS, Abduressul, 《Dans les sables du Taklamakan : oasis perdues de la Keriya》(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消失的克里雅绿洲), *Archéologies, 20 ans de recherches françaises dans le monde*, M. d. A. Etrangères, Paris, Maisonneuve & Larose-ADPF-ERC, 2005, p. 609-612.

古丽比亚,《哈拉墩古城N61、N62佛寺壁画试解》,《新疆文物》,2002,3—4,页103—108。

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张玉忠,《1993年以来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述略》,

《西域研究》,1997,3,页 39—42。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法国科学研究中心 315 所,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队,《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调查概述》,《考古》,1998,12,页 28—37。
中法联合克里雅河考古队,《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考察概述》,《新疆文物》,1997,4,页 1—12。

首次发现的汉代农业闾里遗址
——中国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初识

刘海旺　著

2003 年夏，在河南省内黄县南部黄河故道发现了一处保存完好的汉代聚落遗址（图 1）。经过 2003 年 6 月至 2005 年 12 月的考古发掘和勘探，初步确认这是一处因黄河洪水泛滥而被淤沙深埋的保存较好的西汉晚期聚落（闾里田宅）遗址。在该遗址中已发现了七处当时的宅院，并对其中的四处进行了初步的揭露清理，主要的考古发现是宅院平面布局形式、房舍瓦顶及墙体坍塌原状、宅院内的各类遗迹与遗物、宅院外的树木、耕作农田等遗迹。这是目前中国首次发现的汉代乡里田宅民居完整实物遗存，是中国汉代农耕文明的全新考古发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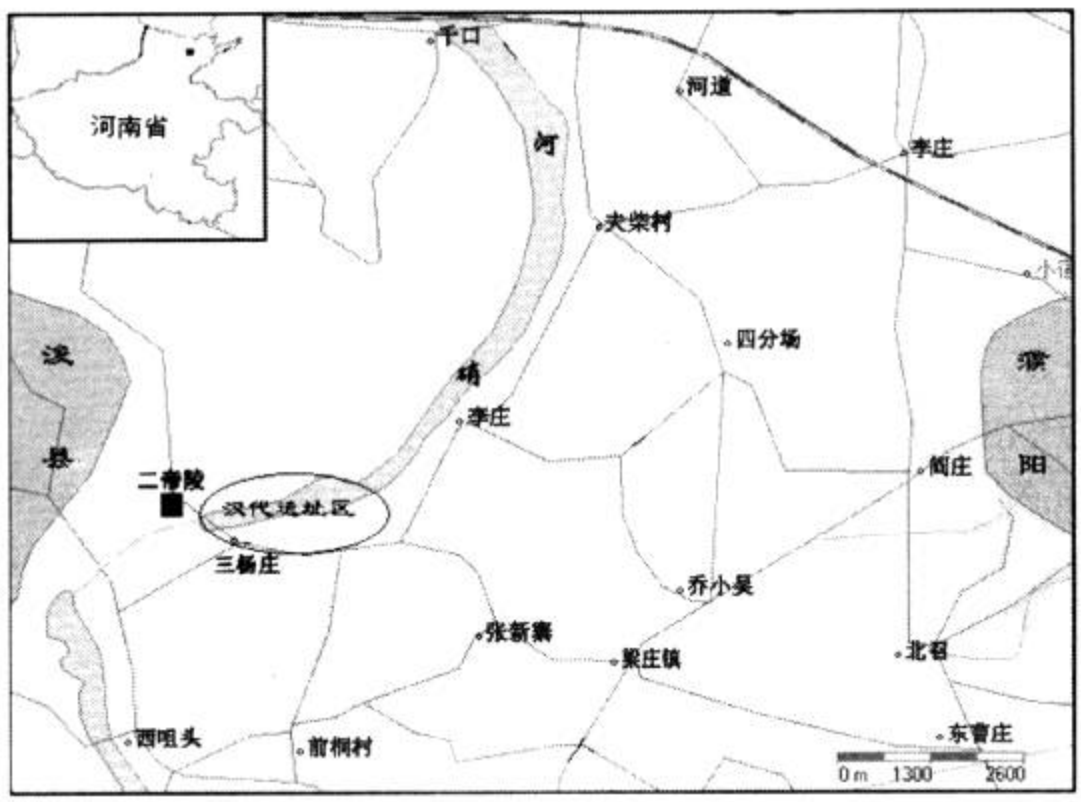


图 1　遗址位置

为该遗址发掘工作的主持人，本人在这里试图结合一些古代文献的记载，仅把对该遗址的一些初步认识提出来供大家进行讨论。

一 遗址的地层堆积与形成原因

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位于内黄县的南部，这里地处黄河故道，现地表沙岗连绵起伏，卫河的一条小支流——硝河从遗址中自西南向东北流过。硝河实际上在20年前已几近断流消失，只是原河道地势仍稍为低洼，近年来甚至已被开辟为农田。2003年夏，当地政府重新疏浚硝河，该遗址在现地表下4—5米深处被发现（图2、图3）。

遗址内的地层堆积呈典型河床淤泥与淤沙堆积形态，这与历史上黄河在北宋以前一直在此地流经相吻合。西汉以前的黄河河道在这里形成一个明显的折弯点流向东北（图4），并经常向西北方向改道。东汉及东汉以后的黄河河道则从这里东向流去（图5），河道在这里较前平直并较为固定，一直到唐。这可能与西汉末年黄河的一次大规模洪水泛滥并改道有关。史载："（王莽始建国三年，

图2 遗址地貌

图3 遗址地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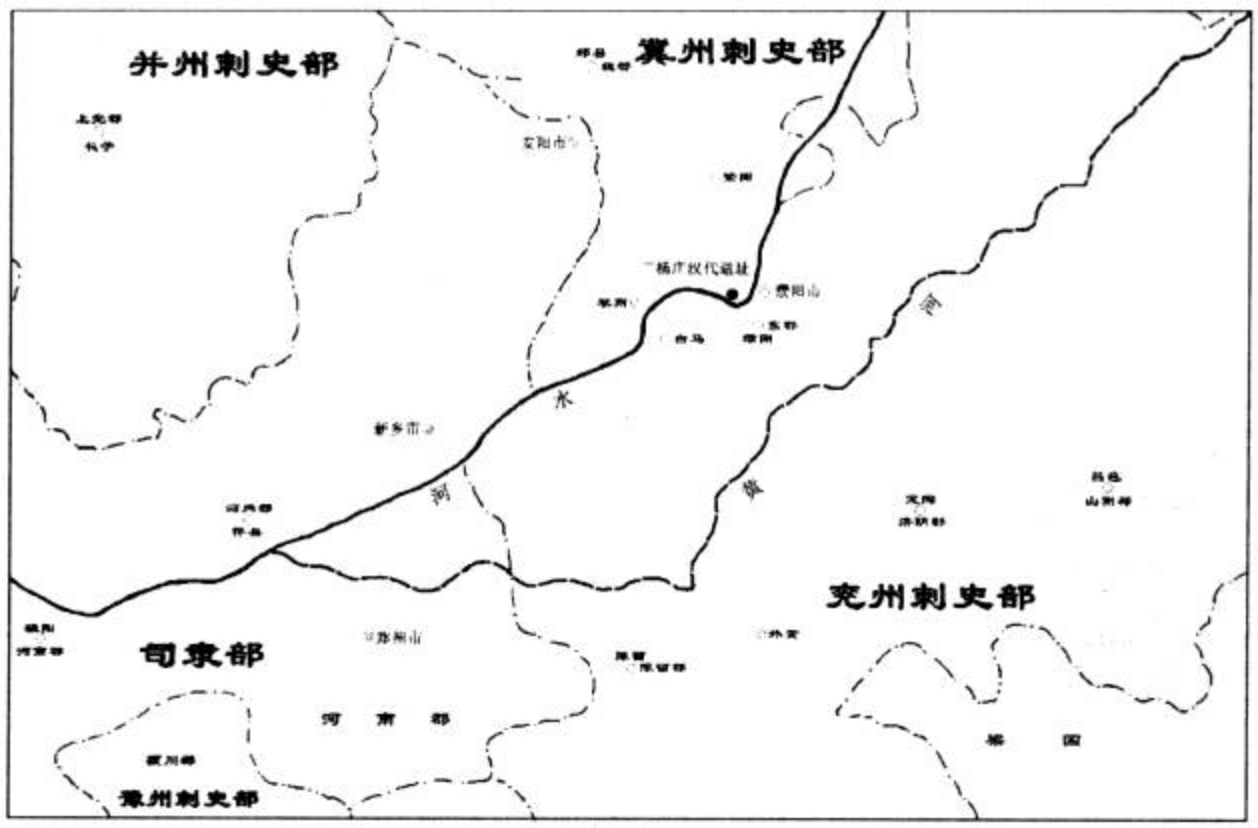


图4 遗址与西汉时期的黄河(河水)相对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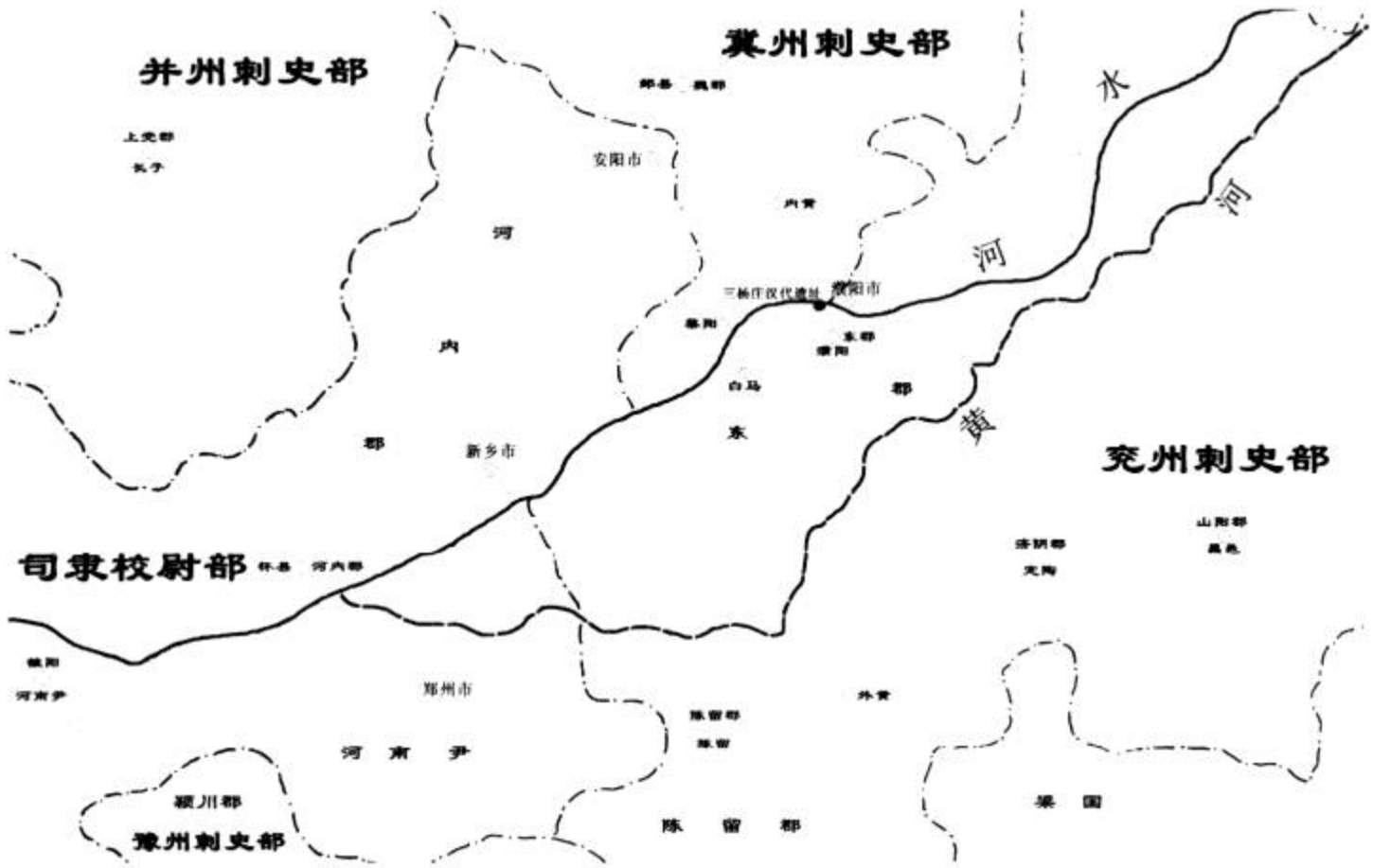


图 5 遗址与东汉时期的黄河(河水)相对位置

公元 11 年)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先是,莽恐河决为元城冢墓害。及决东去,元城不忧水,故遂不堤塞。"[1]此次洪水发生后的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 69 年),王景主持整修河道成功[2],此后 600 年内黄河河道在这里没有大范围的移动。唐代后期以后,黄河河道在这一区域又发生了频繁的大范围的改道,直到北宋中期黄河河道彻底南移,这一区域就成了黄河故道。发掘的情况正与此相吻合,汉代地层以上,有 4—5 米厚的淤泥与淤沙堆积层,包含有少量唐宋时期的瓷器残片。

由此,在这里可以判断,该遗址形成于王莽时期的一次大水灾,后来又长时间处于黄河河道的范围内,河床内的淤泥与淤沙越积越厚,所以最终形成遗址现在的保存状况。

二 遗址的基本内涵

从目前已发掘清理的情况看,该遗址主要的内容为田与宅。在遗址内长 1500 米、宽 8 米的河道范围内已发现七处当时的宅院并发掘清理了其中的四处

(图6),只有二处得到了较为完整的揭露,发掘面积总计约9000平方米。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迄今只是对这四处宅院遗存的坍塌原貌进行了平面揭露,尚未作单体或局部解剖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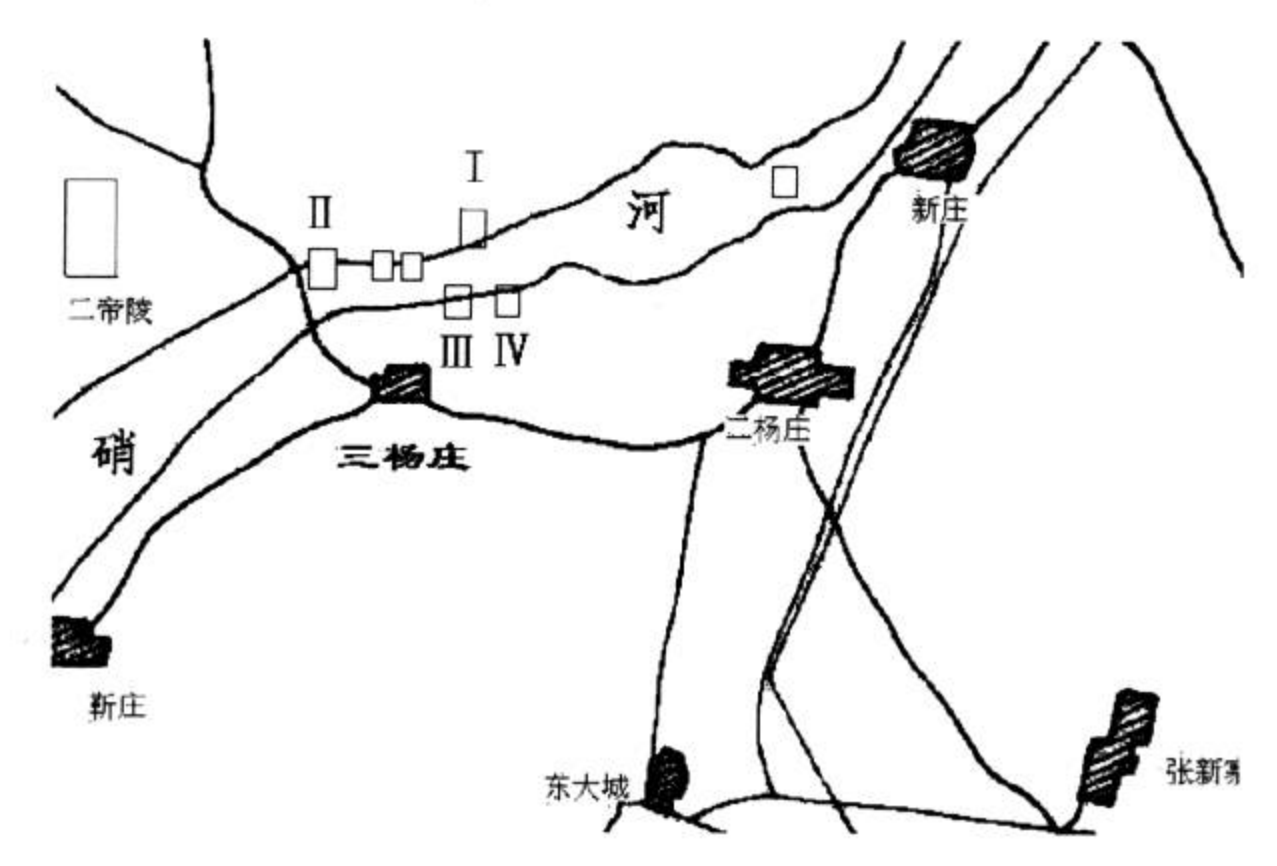


图6 遗址内已发现的宅院基址分布示意图

第一处宅院遗存(已发掘清理的宅院编号按发掘时间先后排序)位于三杨庄村北约500米。仅对已暴露于河道内的宅院部分进行了初步发掘清理,清理面积400余平方米(彩图5)。清理出的宅院建筑遗迹有宅院围墙、主房的瓦屋顶、墙体砖基础、坍塌的夯土墙、未使用的板瓦和筒瓦、建筑废弃物堆积、拌泥池、灶、灰坑等。出土有一些轮盘、盆、瓮等陶器。该宅院的其他部分目前仍未揭露。从已清理部分的情况看,应当为整座宅院(应为二进宅院)的第二进院落的一部分。其中有一部分尚未使用的板瓦、筒瓦仍被整齐地叠摞在第二进院落的东部,结合主房东北侧有一堆筒板瓦碎块(为建筑废弃物),西南侧有一小的拌泥池推测,主房正在维修过程中洪水来临,维修工作没能完成,维修时的原状才得以保存下来。

第二处宅院遗存位于三杨庄村西北,东距第一处宅院遗存约500米。该处宅院遗址揭露较为完整,遗址总面积近2000平方米(彩图6)。宅院的平面布局

从南向北依次为:第一进院南墙及南大门、东厢房、西门房,第二进院南墙、南门、西厢房、正房等。南大门外偏东南约5米处还有一眼水井及通往水井的用碎瓦铺设的便道,水井壁系小砖(与房基用砖相同)圈砌,井口周围用同样的砖铺砌成近方形的低井台;水井的周围还分布有较多的水槽、盆、瓮等陶器(有的可能因残破而废弃),石磨等石器。水井西侧约5米处,有一处特殊的编织遗存,遗迹四角为三块砖摞成的四个分布呈长方形的砖垛,砖垛内堆积有较多的长宽为10厘米×5厘米的砖块,砖块的中部刻有可以缠线(或细绳)的凹槽,故此,推测该处可能为编制竹席或草席类物品的遗迹。宅院西北角有一带瓦顶的厕所。在宅院的西侧,还清理出一座形状规范的圆形水池。在该宅院遗址内及南大门外、水池内,清理出有5个大石臼、2个小石臼、石磨、石磙等石器,陶水槽、碗、甑、盆、罐、豆、瓮、轮盘等陶器,铁犁、釜、刀等铁器。主房瓦顶东侧还初步清理出带有"益寿万岁"字样瓦当的筒瓦数件。二进院内西部地面初步清出3枚"货泉"铜钱等。

第三处宅院遗存东北距第一处宅院遗存近100米。该宅院遗存揭露得也较为完整,面积大致为30×30平方米(图7),宅院的平面布局从南向北依次为:第一进院南墙及南大门、南厢房、东西两侧院墙,第二进院南墙、正房、院墙等。宅院东西墙外分别有一条宽窄、长度大致相同的水沟,西侧水沟分为南北两段。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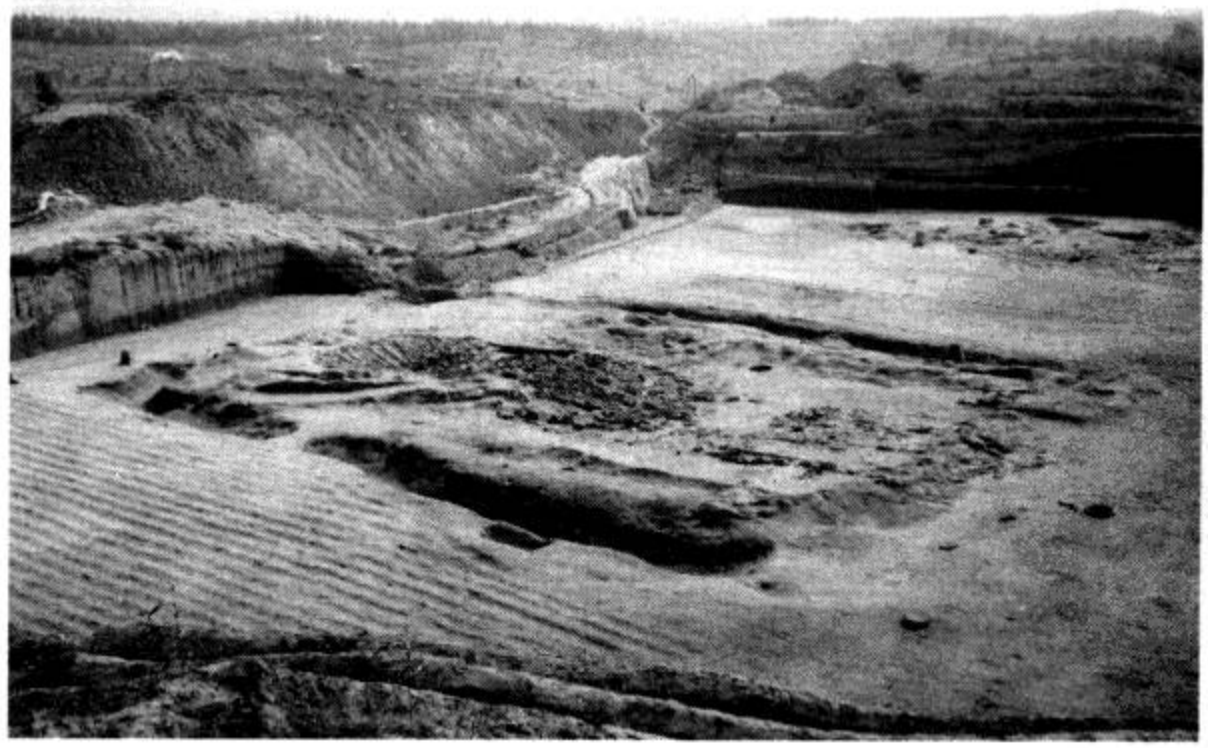


图7 第三处庭院与周围农田(由西南向东北)

门外西侧有水井一眼，井壁的用砖及砌法与第二处宅院的水井相同，只是没有砖铺的井台。宅院后附有一小的建筑遗存，目前推测可能为厕所。宅院后（北侧）还发现有两排树木残存遗迹，从清理出的残存的树叶痕迹初步判断，多为桑树，也有榆树。南厢房版筑夯土南墙（也为整个宅院的南墙，已经倒塌）的块状大小清晰可辨。特别是在该宅院的东西两侧水沟外和后面（北侧）清理出有排列整齐的十分明晰的高低相间的田垄遗迹，田垄的走向有东西向的，但多为南北向，宽度大致在60厘米左右。有迹象表明，在南门外不大的活动场地南侧，也为农田，且有一条不宽的南北向与外界相通的道路。在宅院内外的地面上散落有石碓、小石臼、陶瓮、陶盆等遗物，同时还发现有半枚“货泉”铜钱。

第四处宅院遗存位于第三处庭院遗存东25米处，大致东西并列，尚未完整清理与揭露（图8）。平面布局接近第三处宅院遗存，只是西侧未有边沟，代之的是一行南北向的树木。院后有一附属遗迹，与第三处宅院同位置遗存类似，可能为厕所。厕所后也种植有树木，并有一方形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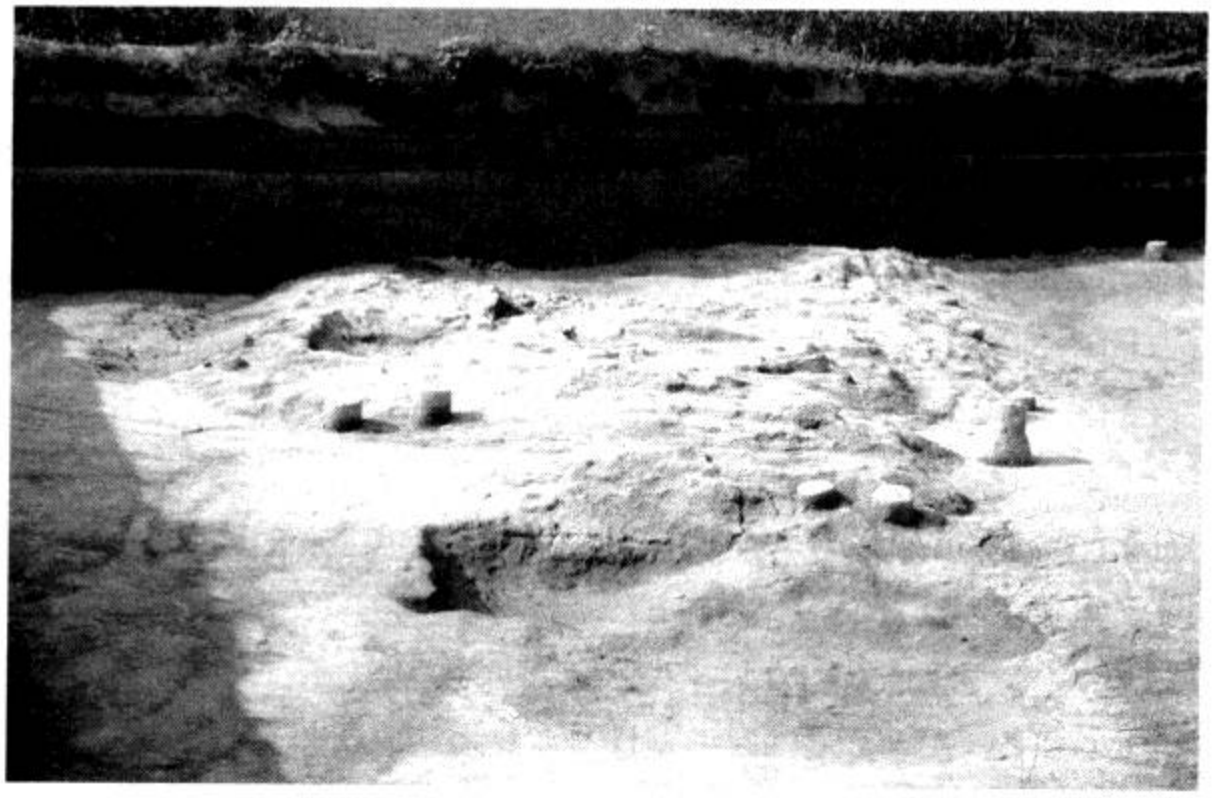


图8 第四处宅院局部（由南向北）

第三处宅院与第四处宅院之间没有发现明显的相通道路，也为有田垄的农田，田地内发现有车辙痕迹及牛蹄痕迹，田垄高低相比不如第三处庭院西侧和北

侧清晰。

另外，在第一处宅院遗存与第二处宅院遗存之间，还发现有两处汉代宅院遗存。在第一处宅院遗存东约1000米处也发现有一处建筑遗存。经过2005年上半年在遗址区域内沿现在的田间土路所进行的考古钻探，发现有若干条汉代道路和遗迹。由此可以说，该遗址是宅在田中，田中建宅。

三　遗址性质与汉代闾里制度

（一）汉代的闾里制度的考古发现

中国古代氏族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是聚族而居。新石器时代的氏族聚居点（这里指以采集和种植粮食作物为主要生产活动的农业聚落）随着历史的发展，人口的增多，规模越来越大，但整个氏族（包括所有的家庭）居住于一些单一的、仅供居住的小的区域的方式始终未变，即氏族的居住区是与农作物种植区相分离开的，每一个家庭的居室之间相距很近或毗邻，没有形成一个个单独而相对隔离封闭的小的空间。当农业氏族逐渐扩展并分解为一个个大的家族后，到春秋战国之时（可能早到夏商），在聚族而居的聚落基础上，流行着一种新的社会组织管理形式——闾里制度。当然，随着手工业和商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并发展壮大，这些行业的从业者逐渐聚集于城邑（国家各级治理机构所在地）之中，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居住形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城邑内也实行闾里制度，但内涵明显不同于纯农业耕作区，这不在本文所要探讨的范围之内，本文只是对纯农业耕作区的闾里制加以考察。

闾里，也称里闾，有时也称闾伍、闾巷、闾阎、闾井等，泛指乡里。《周礼·地官·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周礼·地官·遂人》也说："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可见，春秋战国时期规定，一般一个闾或里由二十五家组成。这与井田制（历史记载，夏商周均实行的是井田制）这种分配土地制度相适应，每家（户）一般种田一百亩。而这些闾内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家庭的田与宅的关系、家庭宅院之间的距离等，至今还不得而知。

西汉继承战国及秦制，施行郡、县、乡、里的行政管理体系（在县和乡之间，有的还设有亭，但亭只是负责社会治安及文书传递等），里是最基层的社会组织。汉代对里的管理也继承了秦代的制度，实行编户齐民，什伍制，即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从江陵凤凰山约属于汉景帝初年的十号墓出土的汉简记载的情况

看，所记载农户所聚居的郑里也是二十五户为一里[3]。东汉明、章之间侍廷里也是二十五户为一里[4]。可见，当时的一里二十五户较为普遍。但二十五户在里中的居住、分布形式尚不清楚。

在有关两汉的文献记载中，“田宅”这一组合词屡见不鲜。例如在西汉建国的初始，“兵罢皆归家。诏曰：‘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一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又说：“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5]但田与宅的关系却没有记载。

从内黄三杨庄遗址目前的发现看，已经发现了七处汉代的宅院，也就是说七户，遗址内的“一里”究竟有多少户，现在仍在勘探之中。就目前的发现来看，这些宅院均经过统一的规定或约定俗成，它们均为坐北朝南，方向一致（南偏西约10°）；均为二进院布局，占地面积大致相同；前后左右相距的距离有远有近，最近的相距为25米，远的可超过500米，相互之间均被农田相隔。五家为邻，应当可信，但这里的“邻”，不是紧邻，而是近邻。每家的宅院均在自己的田中，也就是说，每家均有自己的田宅。由这些发现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若干（二十五户）农户组成的里，对每家的宅院的大小、布局、朝向等均有统一的规定，而且，每家的宅院均建在自己的田中。与邻居的相邻是田地的相邻相接，宅院之间具有相当的距离。这就是当时的农业闾里空间分布方面的大致景象。

（二）汉代平民的家庭人口和居住条件

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的家庭多为五口之家。秦自商鞅变法以后，强制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6]这就形成了人口较少的核心家庭结构。汉承秦制，西汉初年晁错上书中曾提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7]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墓出土一批汉初文景年间的简牍中，记述的一里全部二十五家，除“其奴”一家口数模糊外，其余二十四家共计一百一十二口，平均每家4.67人；每家少则一二口，多则七八口，但都是特例，最常见的却是三至六口，不论家数或口数皆几占全部家、口数的80%[8]。西汉晚期的全国民户数是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零六十二（12,233,062），人口数是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59,594,978）[9]；如果加以平均，则每户约为4.87口人。东汉中期全国的民户是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9,698,630），人口数是四千九百一十五万零二百二十（49,150,220）[10]；若加以平均，则每户约为5.07口人。可见两汉时期每个平民家庭通常多为五口人，一

般为一对夫妇带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

如果从三杨庄遗址目前发现的宅院情况看，四处宅院从屋舍的数量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如第二处，有正房（主房或堂屋）、西厢房、东厢房、西门房四座房舍（图9），正房可能为三开间，其中的东厢房为厨房，西门房可能多用于堆放农具等用具物品；另一类如第三处（图10），仅有主房（堂屋）、南厢房二座房舍，主房为二开间，南厢房为厨房，可能兼作他用。前一类目前是孤例，另外三处均属后一类。从这些基本情况分析，除第二处宅院能够居住超过五口以上的家庭成员外，其他的宅院最多能够容纳五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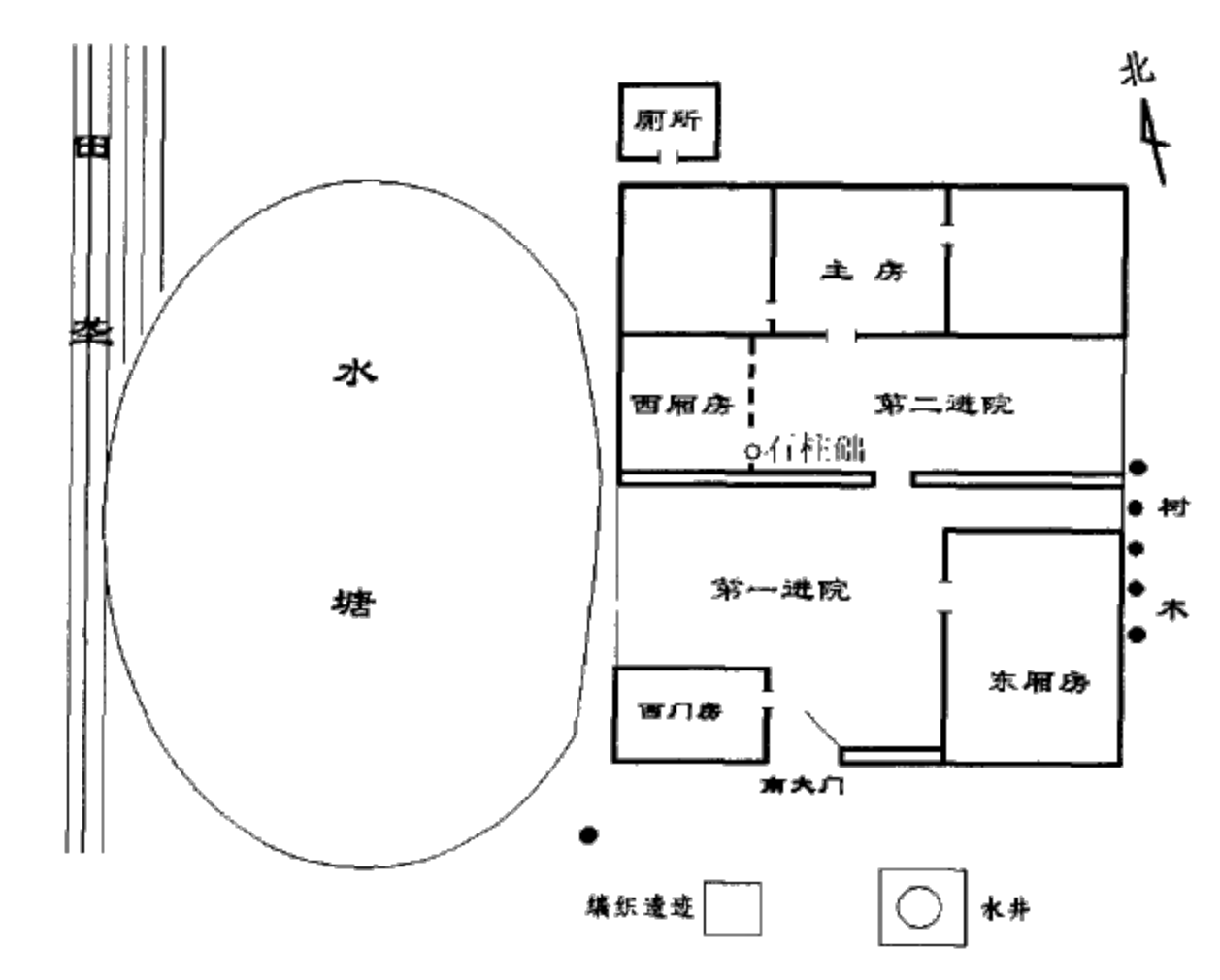


图9 第二处宅院平面布局示意图

从目前已经清理的四处宅院的情况看，除第二处宅院布局较为复杂，主房（堂屋）坐北朝南，且使用有“益寿万岁”瓦当外，其余三处宅院布局均较简单，主房可能坐西朝东，不见使用瓦当。尽管如此，这几处宅院均为封闭型的两进院，占地面积大致相当（第二处庭院西侧有较大面积的水塘，较为特殊）；主房屋顶全部用瓦，墙基砌砖，墙体为夯土或土坯筑成；门前有一定面积的活动场地，各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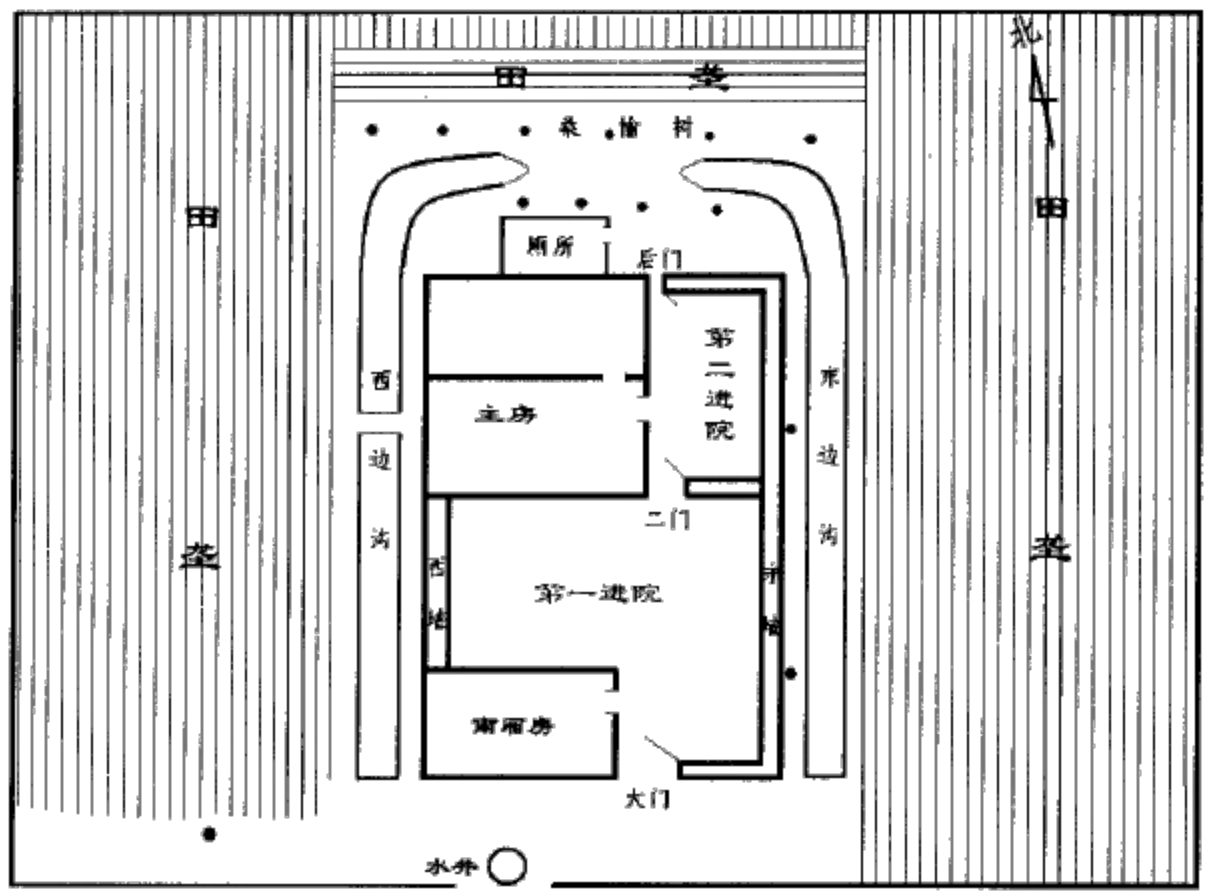


图 10 第三处宅院平面布局示意图

自己的水井;院后有厕所;宅院周围植树,特别是宅院后面(北面)植的树更多;宅院外就是自己的农田。这就是当时平民的居住条件和环境。

另外,关于汉代的民居(有人称之为小康之家)形式,汉初的晁错曾谈及:"营邑立城,制里割宅,返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11]可见,"一堂二内"是汉代平民典型住宅。《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封守"中也曾提到"士伍"的房屋为"一宇二内,各有户,内室皆瓦盖,本大具。"其中的"一宇"即堂屋一,"二内"即卧室二间。《封诊式》中另一处"穴盗"中亦记有"一堂二内"。不同者是"二内"中有一为正房,正房东有侧室,有门相通,而堂前小堂在侧房之后。这样其平面即成曲尺形[12]。这也是对于秦汉时期"一堂二内"的一般理解,堂即堂屋,内即卧室,一所堂屋,两间卧室。但堂屋是两间或三间?也就是堂屋有没有用于待客或非卧室用的房间(类似现在民居中的客厅)?

从三杨庄遗址内已发现的各宅院周围,特别是屋后广种树木的情况看,这符合当时朝廷的提倡和规定。早在战国时期就提倡在宅院中种植桑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13]西汉历代皇帝均提倡宅中植桑树,汉景帝

曾多次下诏劝农桑："（后二年，公元前142年）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太官，省徭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后三年，公元前143年）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14]考古发现的情况正好与此相印证。在第三处宅院的西北田地中，清理出有一些树叶痕迹，很可能是桑树叶和榆树叶。这也说明，当时的家庭中妇女肯定从事有养蚕、纺织等这类副业，也是家庭收入的来源之一。当然，按规定，田里是不能种树的。从清理的情况看，田垄中没有发现种树的痕迹。

（三）汉代的耕作制度

古代文献记载，中国古代的耕作制度，在秦汉以前主要是施行最简单的缦田法，缦田是"不为垄者"，即没有行垄的耕作法，是一种粗放的农作方式。因为缦田是撒播，无行无垄，缺点很多。它虽然可以在播种时节约劳力，但浪费种子，而且幼苗长出后密集丛生，中耕、除草都需要付出额外的劳动。由于田间管理不严密，产量相当低。后来逐渐出现了有垄的条播法（也就是垄作）。到西汉武帝时明确出现了"代田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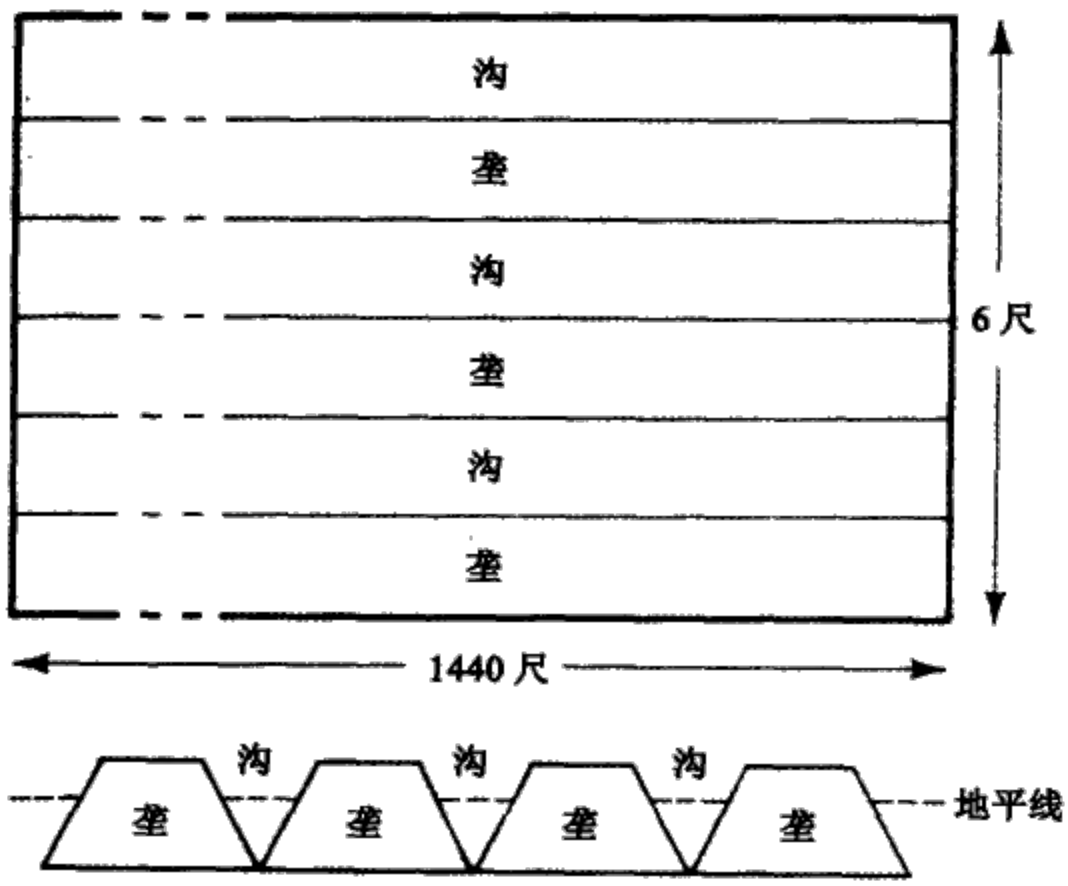
"过能为代田，一晦三圳。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圳田，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圳，长终晦。故其《诗》曰：'或芸或耔，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垄尽而根深，能风与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过使教田太常、三辅、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三亩，以故田多垦辟。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墟地，课得谷皆多其旁田亩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15]

晦即亩，既是面积单位，古代又指田垄的上部；圳，也写作畎，又称作畎，均指田垄的底沟。对这段文字中"一晦三圳"的理解，也就是对"代田法"的基本推测。一般认为，一种可以解释为一亩地共分三个垄沟，每垄广一尺，三垄共三尺，而长度相等于一亩面积的长度。关于晦的长度，许慎《说文解字》曰："六尺为步，步百为晦。秦田二百四十步为晦。"[16]汉因秦制，也是二百四十步为晦。但为什么一定要每亩三垄？这样解释是有问题的。再一个解释根据"圳晦代处"的

办法，“一畮三圳”就是一个宽垄背和三行播种作物的垄沟相间，类似现在农民常用的“三杆抢”播种方法。这与赵过提倡的播种工具“三脚耧”形式也正吻合。今年播种作物畮的地方明年就成了圳，今年未播种作物畮的地方明年再播三行作物，这样在一块地上进行轮替种植也合乎圳和畮进行“岁代处”的精神[17]。

研究者曾总结实行“一畮三圳”代田法的优点：首先，与缦田法所造成的作物群集丛生相比，作物种植时整齐的分行排列可以保证更好的通风与获得更充足的阳光；其次，汉代的犁在耕作时能达到的深度有限，通过将土壤从垄上推至沟内，不断地、逐渐地使成长中的植株根部的土壤变得厚实，则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第三，作物生长的早期阶段容易受到强风与失墒伤害，这两个都是中国北方旱地农作物的老问题，播种于沟内，可以使幼苗免受风吹，又可减少土壤及叶面水分的蒸发；第四，植株排列整齐使农民可以在作物之间走动，方便了除草，而除草是提高粮食产量的重要因素之一[18]。

有人曾绘制有“代田法”的草图（图 11）。如果按 1 尺（西汉前期）为 23.5 厘米计算，那么，每畮或圳的宽度均为 23.5 厘米，也就是每个畮和圳的合计宽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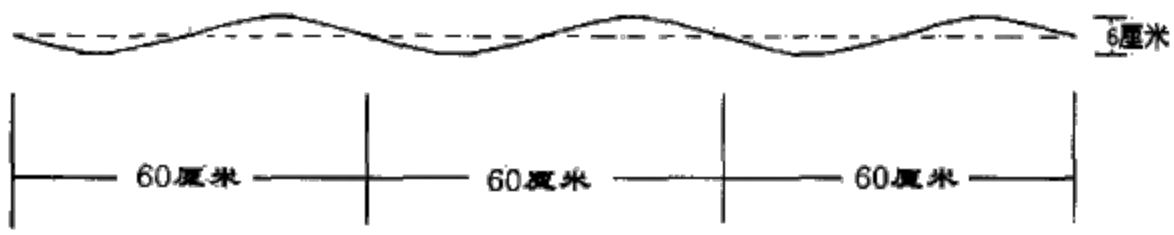


代田法畮圳平、剖面示意图

图 11　代田法中畮圳结构示意图

为47厘米;每亩长为1440尺,合33840厘米。

三杨庄汉代遗址中发现的大面积耕作农田可以为我们真正理解汉代的代田法提供真实的实物样本(图12)。三杨庄汉代遗址中的垄和沟的宽度一般为60



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遗址田垄剖面示意图

图12 遗址内田垄剖面示意图

厘米,也就是每个畮和圳的宽度合计为60厘米左右。这就是说,比以前推测的代田法中的畮或圳的宽度要宽出1/5。而且,并没有三圳三畮为一组的小的分区。现存圳深(最高点到最低点高度约为6厘米),肯定不是耕作后最初的深度,而可能是庄稼收割后的深度。

应该说,通过与三杨庄遗址实际农田的比较,虽然圳的宽度相差不太大,但对"一畮三圳"恐怕还得重新解释其真正的意义。由于受发掘面积所限,目前还难以确指当时对农田小的区域的划分情况,也就是一亩的长度究竟是多少。

四 结语

以上只是发掘者对三杨庄汉代遗址目前的考古新发现的少数一些方面的初步认识,显然既不全面,也不够系统和深入。现在,考古探查和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之中。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试图掌握该遗址的范围、宅院的数量、布局特点等,同时,通过对一座宅院及各单体建筑的整体解剖以搞清楚各类房舍的梁架结构、开间布局、室内遗迹等。也要开始对各类标本进行科学检测和分析。

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无疑包含了汉代中原地区当时作为社会基础的单个家庭的居住环境与条件、房屋建筑技术及思想意识、农业生产、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新颖的实物信息,同时,也包含有由这些家庭组成的社会最基层的管理组织——里的组成、规划、布局、土地分配、耕作制度等方面丰富的信息。因而,该遗址具有多学科、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同时,也需要采取多学科的手段进行各类

信息的提取与研究。

〔注 释〕

1 《汉书·王莽传》(卷九十九中),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页 4127。

2 《后汉书·循吏列传》(卷七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版,页 2464—2466。

3 《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 年第 6 期,页 41 -61;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及其在历史地理研究上的价值》,《文物》,1974 年,第 6 期,页 66—77;弘一,《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初探》,《文物》,1974 年,第 6 期,页 78—84;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 年,第 7 期,页 49—63。

4 黄士斌,《河南偃师县发现汉代买田约束石券》,《文物》,1982 年,第 12 期,页 17—20;宁可,《关于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文物》,1982 年,第 12 期,页 21—27。邢义田,《汉代的父老、僤与聚族里居——〈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读记》,《城市与乡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年版,页 27—51。

5 《汉书·高帝纪》(卷一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页 54。

6 《史记·商君列传》(卷六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版,页 2230。

7 《汉书·食货志》(卷二十四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页 1132。

8 杜正胜,《传统家族试论》,《家族与社会》(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年版,页 17—28。

9 《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页 1640。

10 《后汉书·郡国志》(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 年再版,页 3533。

11 《汉书·袁盎晁错传》(卷四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页 2288。

12 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页 992。

13 《孟子·梁惠王上》,《诸子集成》(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再版,页 33。

14 《汉书·景帝纪》(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页 151—153。

15 《汉书·食货志》(卷二十四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页 1138—1139。

16 《说文解字段注》,成都,成都古籍书店影印,1981 年,页 736。

17 张履鹏,《汉代的代田》,《农业经济史研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页 39—44。

18 许倬云,《汉代农业——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及特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页 108—113。

中世纪时期贸易中转港
——也门舍尔迈遗址出土的中国瓷片

赵冰　著

在法国外交部和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共同赞助下，法国考古学家 Claire Hardy - Gilbert 和 Axelle Rougeulle[1] 于 1993—1995 年和 1996—1999 年对也门哈达拉毛（Hadramawt）省沿海和阿曼沿海进行了两期普及调查。她们发现了大量旧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铁器时期、中世纪时期和近代居住遗址，其中以 20 余座中世纪大型城市遗址最为重要。经初步研究，这些城址多数为古代阿拉伯文地理书所记载的 9 世纪至 12 世纪时期的港口城市。它们的发现给中世纪印度洋国际贸易史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考古资料[2]。舍尔迈（Sharmah）遗址和 30 公里以西的席赫尔（al-Shihr）遗址[3]就是哈达拉毛省沿海地区新发掘的重要港口遗址（图 1）。

一　舍尔迈遗址主要遗迹和遗物简介

公元 985 年，穆格迪西（al-Muqaddasî）首次提到舍尔迈港，并说该城归属红海沿岸扎比德城[4]。公元 12 世纪中期，易德里斯（al-Idrîsî）在描述也门哈达拉毛省时，谈到两个相距一天路途的港口城市，席赫尔和舍尔迈[5]。公元 1300 年左右，迪马西基（al-Dimashqî）再次涉及席赫尔港和舍尔迈港[6]。舍尔迈港遗址在 1996 年首次被发现和确认：它散布在位于哈达拉毛省穆卡拉城 120 公里以东的舍尔迈角（Ras-Sharmah）北端（图 2）。哈达拉毛省地处阿拉伯半岛南海岸中部，遥望东非索马里，是波斯湾通往东非海岸的必经之地。冬季雨期从印度通往波斯湾的最佳路线也恰恰经过这一带地区[7]。舍尔迈角北部港湾的占地面积约 100 公顷。舍尔迈角以南，伸延着宽 500 米、长 2.5 公里的金色沙滩。舍尔迈角附近海域鱼源丰富。气候酷热干燥和水源不足等自然条件不利于在港内发展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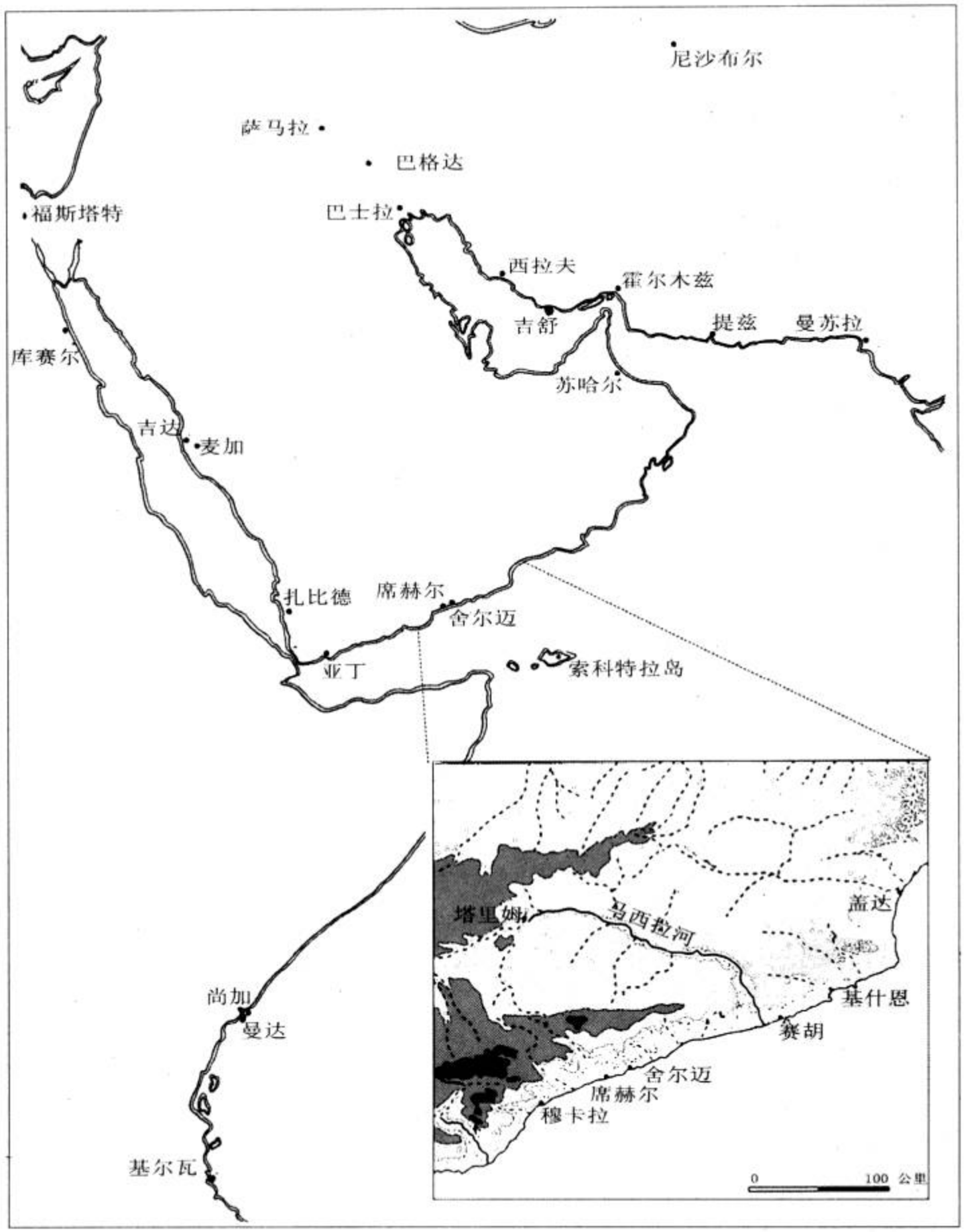


图1 10—12世纪印度洋西部和也门哈达拉毛省沿岸(引自 Rougeulle, 2005, fig.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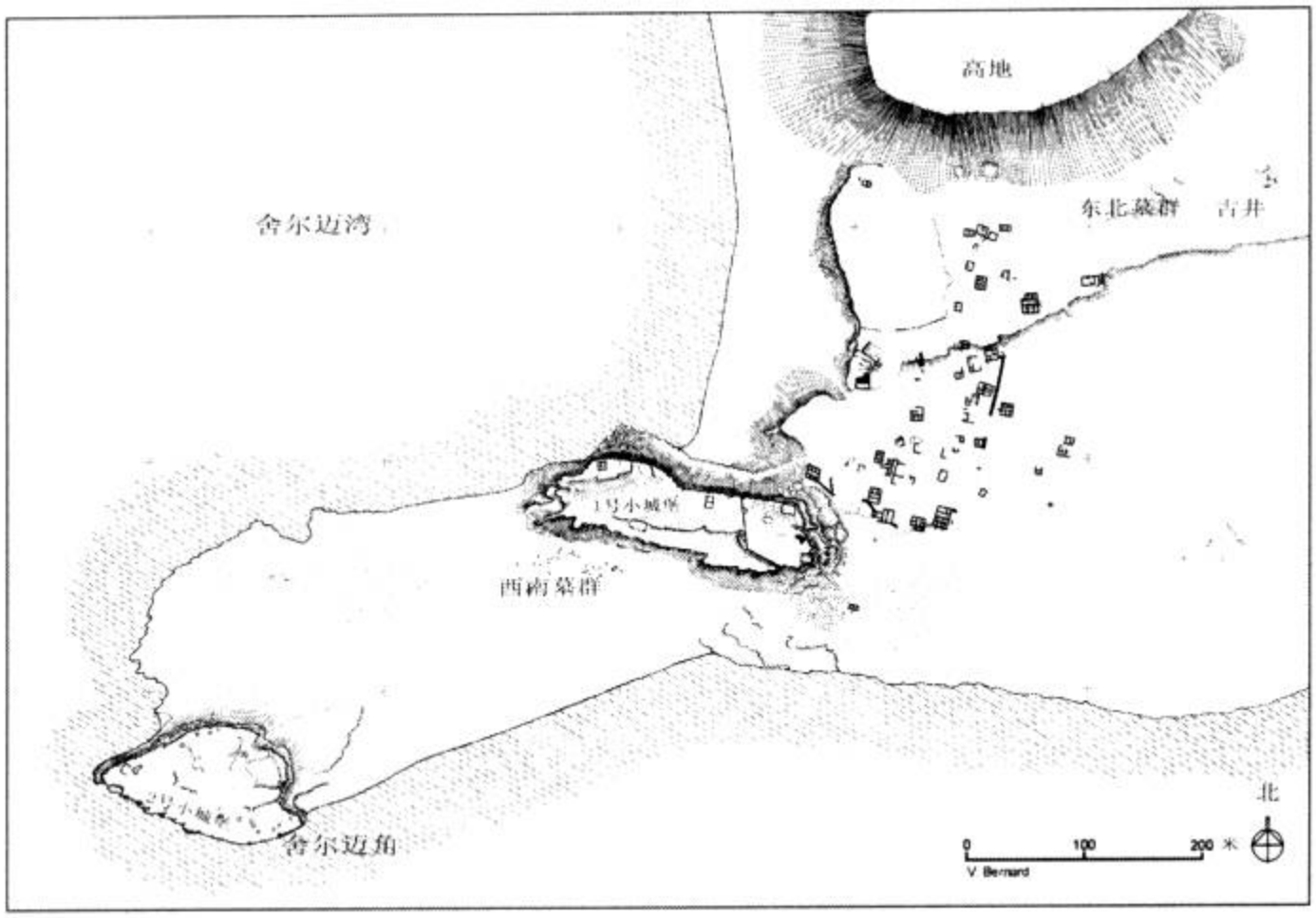


图 2 舍尔迈遗址全景图(引自 Rougeulle, 2005, fig. 2)

耕。舍尔迈港背靠高地荒漠,与内陆交通极为不便。目前,离这个天然深水港最近的绿洲在 12 公里以外。

舍尔迈遗址风化剥蚀现象非常严重。其残留文化层的深度不超过 2 米。在遗址表面清理和表面裸露遗迹绘图工作完成后,法国考古学家针对 50 余座大建筑遗迹进行了四期发掘。至 2005 年,他们打开了 1200 余个发掘单位(3 米 × 3 米或 1 米 × 1 米),揭露面积占遗址总面积的 3%。这些发掘单位分布在建筑遗迹内部的过道、房间和外墙附近。它们的发掘以找到岩石地质层为终。各发掘单位的地层保存状况不一,最少的包含两层地层,最多的包含五层地层。其中相当数量的地层被扰乱。总的来说,舍尔迈所有的遗迹均归属三大段文化层。第一段为前伊斯兰时期。其遗迹主要包括集中在舍尔迈角周围的新石器时期房屋遗迹,其附近八组青铜器时期墓葬群和坐落在舍尔迈角角端俯瞰港湾的公元 2 世纪—4 世纪时期的神庙遗迹[8](图 3)。

第二段文化层是一个公元 10 世纪—12 世纪时期由城墙和数座小城堡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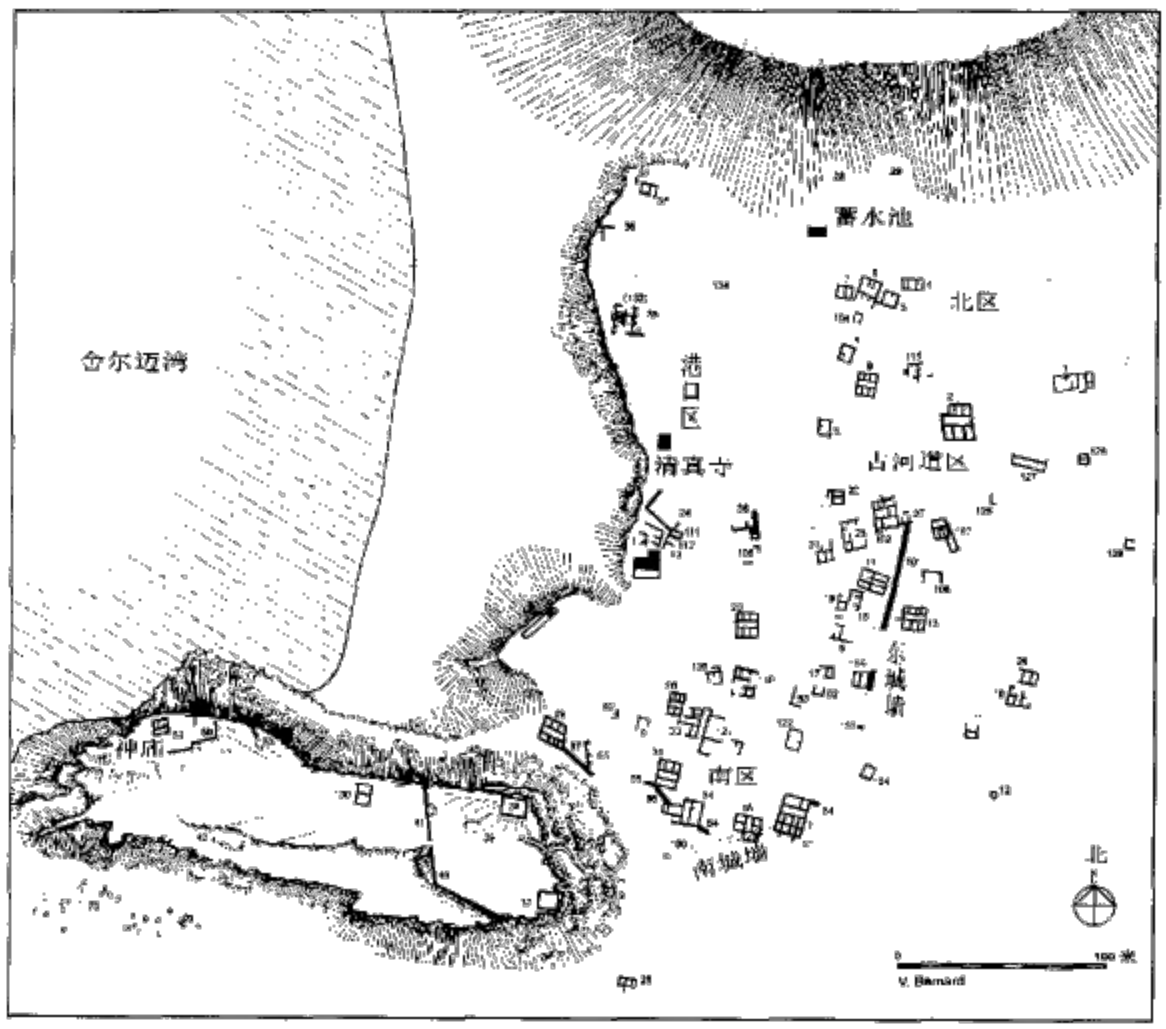


图 3 舍尔迈遗址主要遗迹分布图(绘图:Vincent Bernard)

起来的港口城市遗址(图 3)。这个中世纪城址占地面积达 5 公顷,包括百余座建筑遗迹。现存的这些建筑遗迹仅见由石块砌成的部分地基和墙基。试掘的 50 余座房屋遗迹均呈现出极其相似的平面结构。面积在 30 平方米和 35 平方米之间的第一类小型房屋由南北走向或东西走向的两或三间通房顺序排列组成。第二类大型房屋的面积则通常在 105 平方米和 145 平方米之间(其中最大的 2 号和 7 号建筑的面积达 235 平方米,最小的 90 号建筑则仅有 77 平方米)。它们的平面结构如出一辙:面积相等的正方形或长方形房间对称排列在东西走向的中心过道的两旁。有的房屋遗迹内或附近有火烧灰堆积或(和)灰坑堆积。除 2 号和 33 号建筑内各有两个水槽和一个灶炉外,在其他遗迹中均不见任何日常生活设施遗迹。发掘工作者推测这些庞大坚固的、各自独立的房屋遗迹大多数为仓库遗迹。

这个中世纪港口城市遗址分港口区、古河道区、北区和南区。清真寺是俯瞰

舍尔迈港的港口区内现存的最重要的遗迹(24 号建筑)。它经历了三期修建工程。最早的清真寺面积仅有 25 平方米,残留的墙基厚 60 厘米。就地扩建的第二个清真寺(7.8 米 × 7.6 米)残留白石膏地面。最上层清真寺的面积超过 200 平方米,残留 1 米或 1.2 米厚的石泥混合墙基,墙外有走廊等附加建筑遗迹。在紧靠清真寺的古河道区里,大型仓库遗迹最密集。古河道区以北的北区古迹在 20 世纪受到极大破坏,在其紧靠高地之处揭露出两口大蓄水池和一口水井。古河道区以南的南区的建筑遗址保存相对较好。舍尔迈背靠的高地是防范内陆攻击的天然堡垒。在舍尔迈角遗址还揭露出数座巡哨台遗迹、小城堡遗迹和城墙遗迹。它们显示这个港口的人工军事保护设施很完整。残留的南城墙遗迹呈现四期工程,东城墙遗迹仅属第四期工程。舍尔迈南部沙滩地段未见明显的建筑遗迹。第三段文化层遗迹只包含舍尔迈沙滩南端高地一座 18 世纪—19 世纪小平台。遗址发掘者推测该时期的居民可能是小规模的土著游牧民族。

舍尔迈遗址遗物特别丰富,包含大量日用陶瓷器、伊斯兰玻璃器和也门乳香等海上贸易商品,以及一些石器和铁器工具。遗址还出土少量铜、玻璃或天然宝石质地的首饰和伊斯兰钱币。除部分本地粗陶器外,其他陶瓷片均来自外地,如中国、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阿曼,以及红海沿岸和非洲东部沿岸等地区。这些遗物充分证明舍尔迈是中世纪时期阿拉伯半岛南部海岸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港口。各种遗物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正在进行中。一些重要遗物标本(如中国低温绿铅釉瓷片、伊斯兰阿拔斯时期陶片、也门本地陶片以及十余种乳香标本等)正在法国、加拿大实验室接受物理化学测试。

二 舍尔迈遗址出土的中世纪时期中国瓷片的分类分型

我们在舍尔迈遗址表层采集到 350 余块中国瓷片。据初步统计,2001 年、2002 年、2004 年和 2005 年四期发掘出土陶瓷片共计 47425 片(3118 片有釉陶瓷片和 42715 片无釉陶瓷片),其中有 1592 块中国瓷片,占四期发掘出土陶瓷片总数的 3.36%[9]。这个比例远远高于 9 世纪—10 世纪时期波斯湾最重要的港口遗址西拉夫[10],在伊斯兰地区目前已发掘的中世纪港口遗址中排榜第一。其中 95% 以上的瓷片属于中世纪时期。我们按胎质釉色把它们划入以下 8 大类:青白瓷、乳白釉瓷、青瓷、灰青釉瓷、釉下彩绘瓷、酱黑釉瓷、绿铅釉瓷和素胎瓷。晚

期瓷片均来自遗址表层，主要包括18世纪和19世纪碗和咖啡小盅等器物。其中有景德镇窑青花、白釉、蓝釉、粉彩[11]和福建德化窑[12]、安溪窑[13]青花。

舍尔迈遗址中世纪时期的中国瓷片中大约有15%的瓷片（其中大多数为不带任何纹饰的腹壁瓷片）特别微小，我们无法对此进行器形还原。综合胎釉质量、复原器形、纹饰、用途及产地等多种因素，我们将剩余瓷片划分成90余型。现将整理出来的器型描述如下[14]：

A. 青白瓷

青白瓷瓷片数量近800片，其器形和质量异常丰富多样。我们依据其胎釉的粗细劣优归入三大组：细青白瓷（a组）、中等青白瓷（b组）和粗青白瓷（c组）[15]。这个特殊的分组旨在体现舍尔迈遗址同一个器形的青白瓷可以具有不同胎釉质量，即可能拥有不同的商品价值。细青白瓷的胎精细坚致，瓷化程度极高，胎体轻薄而胎色白净，其釉晶莹透明，玻璃质感强，呈天蓝或淡蓝色。以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初中期江西窑场产品为主，也包括少量广东、福建窑场细瓷。中等青白瓷的胎含少量杂质，瓷化度相对低一些，胎色多为灰白色，其釉色偏青灰，多为北宋早期产品或北宋中期以后的普通质量产品。其产地可能包括江西、安徽、广东、福建和湖北等窑场。舍尔迈遗址中世纪地层的断代和更进一步分期主要依据这两组青白瓷瓷片的年代。粗青白瓷胎质粗松，含杂质，釉色接近青瓷或灰青瓷，修坯不规整，施釉不及底，多有缩釉现象，应当是南方窑场所产，但具体产地比较难确定。由于能作为其断代参考的墓葬实物少见，我们目前只能比较笼统地把它们定为宋代。

85%左右的青白瓷片是碗瓷片，其余为盘、注壶、瓶、盒等器物瓷片。其中有8块剖面完整的瓷片（即残留口沿、腹壁和器底），其余的为口沿、腹壁、口流、器柄、器盖和器底瓷片。共划分入34型。

青白瓷碗

青白瓷Ib型：唇口碗，浅腹壁，宽矮圈足，口径11—18厘米，北宋早期，江西或广东窑场。

青白瓷Ic型：器形同青白瓷Ib型，粗青白瓷胎，北宋早期，江西或广东窑场。

青白瓷IIa型：莲花瓣碗，底有褐色垫饼痕迹，圈足削得比较薄，口径13—15厘米，北宋中期，江西景德镇窑或赣州窑[16]（彩图7）。

青白瓷IIb型：莲花瓣碗，器形同青白瓷IIa型，灰白胎，北宋中期，广东潮州窑[17]。

青白瓷IIIb型：外壁凸刻一层细密规整的仰莲瓣碗，釉色青灰，口径15厘米，北

宋早中期，江西赣州窑[18]。

青白瓷 IVb 型：外壁浮雕重瓣仰莲碗，唇口或敞口，圈足低矮，口径 13—16 厘米，釉色分浅青灰色和浅灰白色，北宋早期，江西景德镇窑或广东潮州窑[19]。

青白瓷 Va 型：葵口高足碗，胎薄体轻，深腹壁，敞口或侈口，有的内壁出筋，圈足裹釉，底有褐色垫饼痕迹，口径 13—16 厘米，北宋晚期，江西景德镇窑或南丰窑[20]。

青白瓷 Vb 型：器形如青白瓷 Va 型，胎体偏厚，胎质瓷化度偏低，北宋晚期，广东潮州窑？

青白瓷 VIb 型：卷口碗，半球形腹，无纹饰，外壁施釉不及底，口径 11—13 厘米，北宋中晚期，江西或福建窑场。

青白瓷 VIIa 型：敞口或撇口碗，外壁划菊花瓣，胎体轻薄透明，釉色淡青莹洁，口径 11—13 厘米，北宋中晚期，江西景德镇窑或赣州窑。

青白瓷 VIIb 型：器形同青白瓷 VIIa 型，中等青白瓷胎，瓷化程度略低，北宋中晚期，广东潮州窑或其他南方窑场。

青白瓷 VIIc 型：器形同青白瓷 VIIa 型，粗青白瓷胎，北宋中晚期，广东或福建窑场[21]。

青白瓷 VIIIa 型：薄斜壁小圈足碗，外壁浅划菊瓣纹，内壁浅划花草纹，内底刻一朵菊花，胎薄如纸，天青色釉匀亮纯正，有口径为 10 厘米左右的小碗和口径在 15 厘米以上的大碗两组，北宋晚期，江西景德镇窑（图 4）。

青白瓷 IXa 型：内壁有半刀泥刻繁密花草纹，间以篦纹，外壁刻旋转深菊瓣纹。其中口沿瓷片可按口径大小分三组：口径在 13 厘米以下的，口径在 17 厘米左右的，口径在 25 厘米左右的；其中器足瓷片可分三型：底有褐色垫饼痕迹、尖而薄的裹釉高圈足、足壁薄而直的裹釉低圈足和裹釉微小圈足。北宋中晚期—南宋初期，江西景德镇窑或湖北湖泗窑[22]（图 5）。

青白瓷 Xa 型：葵口，斜弧壁，矮圈足，内浅刻折枝菊花或云草纹，间以碎点篦纹，胎薄，腹壁上半部对光半透明，口径 17—21 厘米，北宋晚期，江西景德镇窑（图 6 和图 7）。

青白瓷 XIa 型：弓顶宽边塔状钮划篦纹碗盖，直径 9—11 厘米，北宋中晚期，江西景德镇窑。

青白瓷 XIIb 型：宽口沿外撇，深腹厚腹壁大碗，圈足外卷裹釉，其器形与釉下褐彩 II 型碗一致，无纹饰，口径 25—27 厘米，北宋时期，广东西村窑[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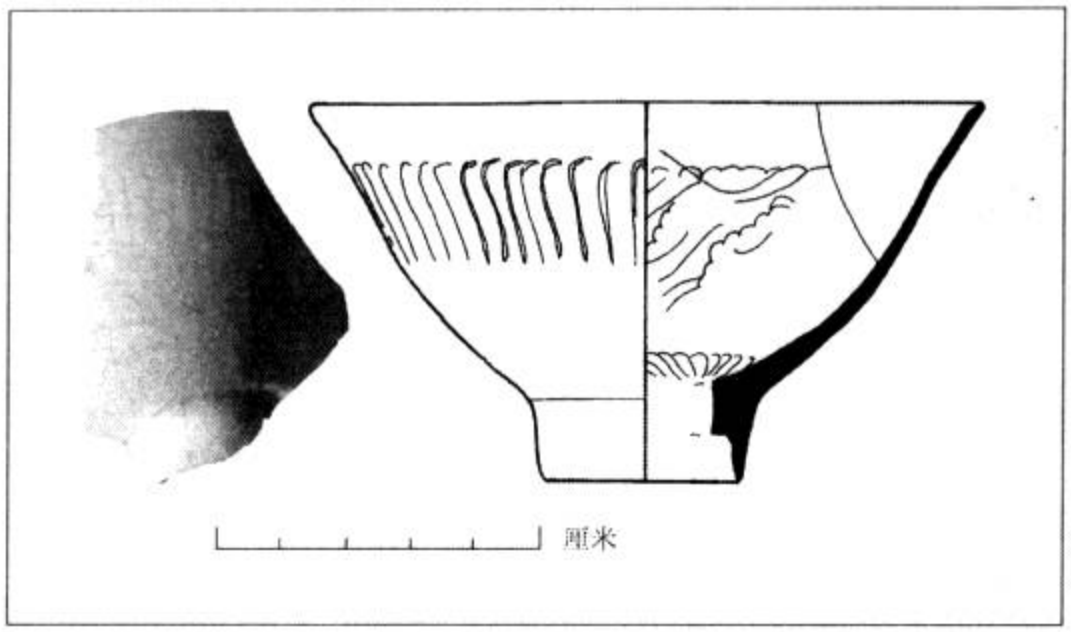


图4 青白釉划花斗笠碗，口径11厘米，北宋晚期，江西景德镇窑，SHA 506—1，草图：Vincent Bernard，电脑制图：Antoine Jarrier，照片摄制：赵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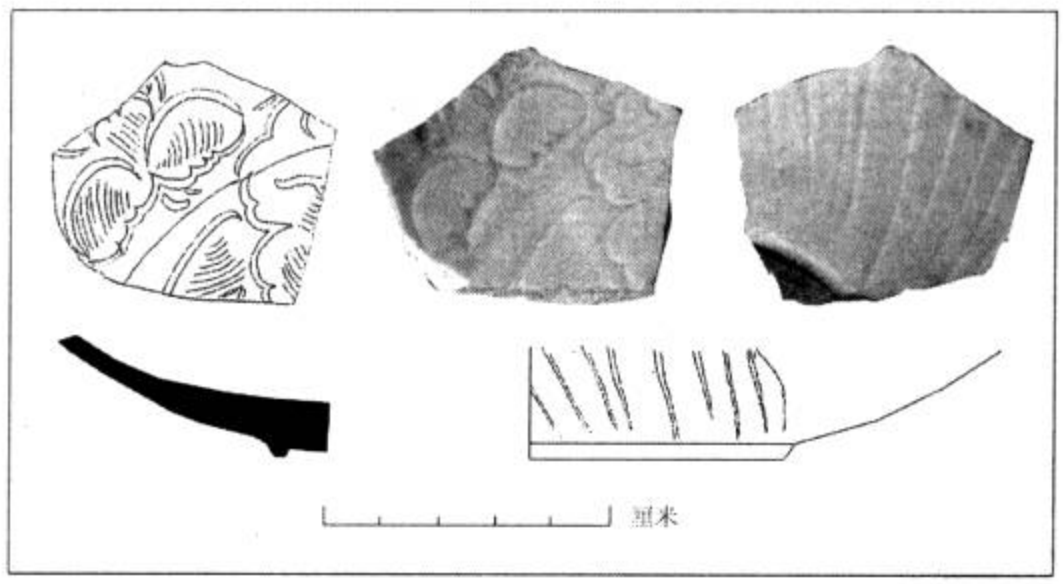


图5 青白釉刻划花碗碗底瓷片，底径9厘米，北宋晚期，江西景德镇窑，SHA 1077，草图：Vincent Bernard，电脑制图：Antoine Jarrier，照片摄制：赵冰

青白瓷XIIIa型：内底和内壁刻划有稀疏的卷草纹碗，器形规整，胎体轻薄，圈足壁薄而直，通体施釉，底径6—8厘米，北宋晚期—南宋初期，江西景德镇窑。

青白瓷XIVb型：模印稀疏的蕉叶阴纹大碗，圈足低矮，胎色白净但胎质比较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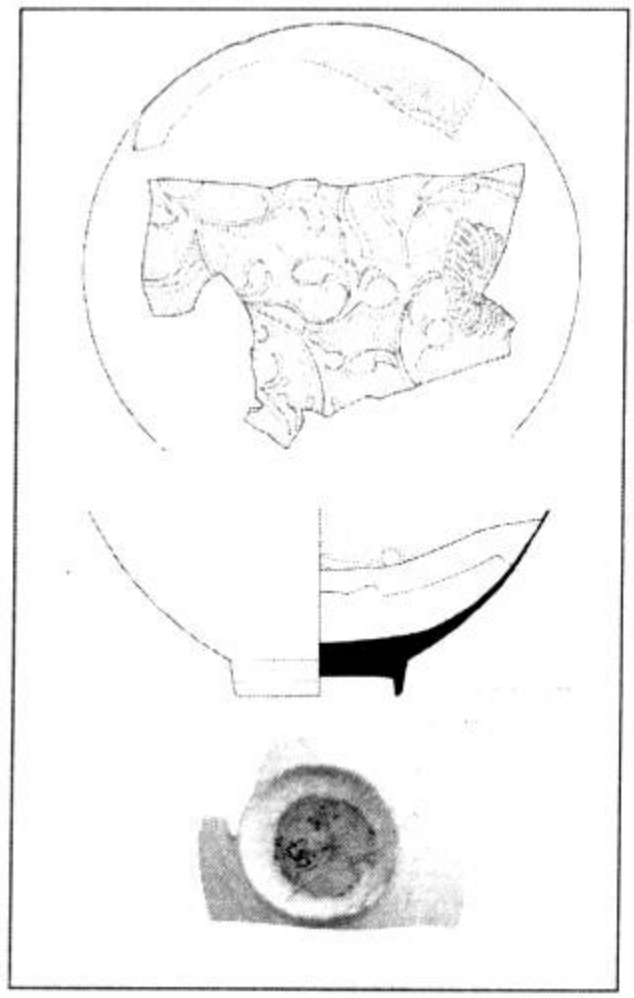


图6 青白釉刻划花和碎点篦纹碗碗底瓷片，直白细胎，天青釉滋润透明，葵口，斜弧壁，高圈足，底径6.7厘米，北宋晚期，江西景德镇窑，SHA 1644 + 1657 + 1668，草图：Vincent Bernard，电脑制图：Antoine Jarrier，照片摄制：赵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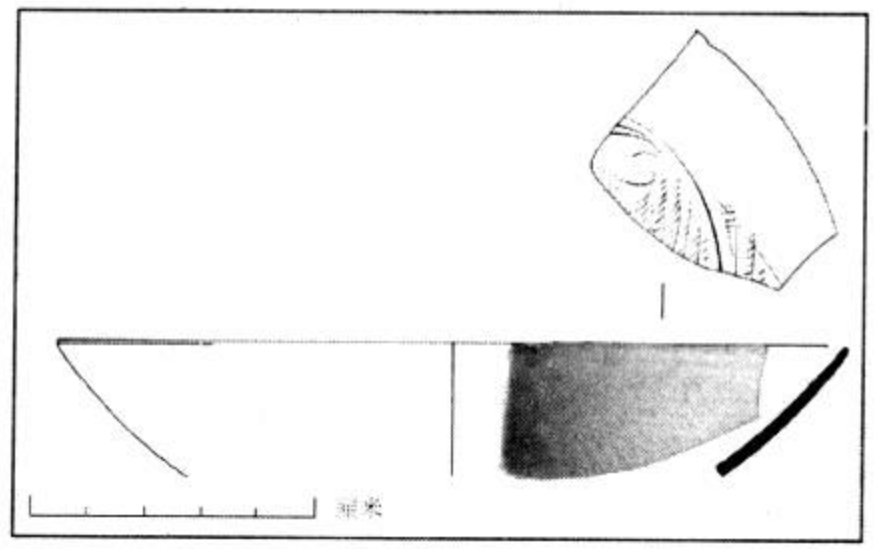


图7 青白釉刻划花和碎点篦纹碗口沿瓷片，胎薄，瓷片对光半透明，口径18.2厘米，北宋晚期，江西景德镇窑，SHA 677—1，草图：Vincent Bernard，电脑制图：Antoine Jarrier，照片摄制：赵冰

松，釉色浅淡，釉层薄，底径分 5 厘米和 8 厘米，北宋晚期—南宋初期，广东潮州窑或西村窑[24]（图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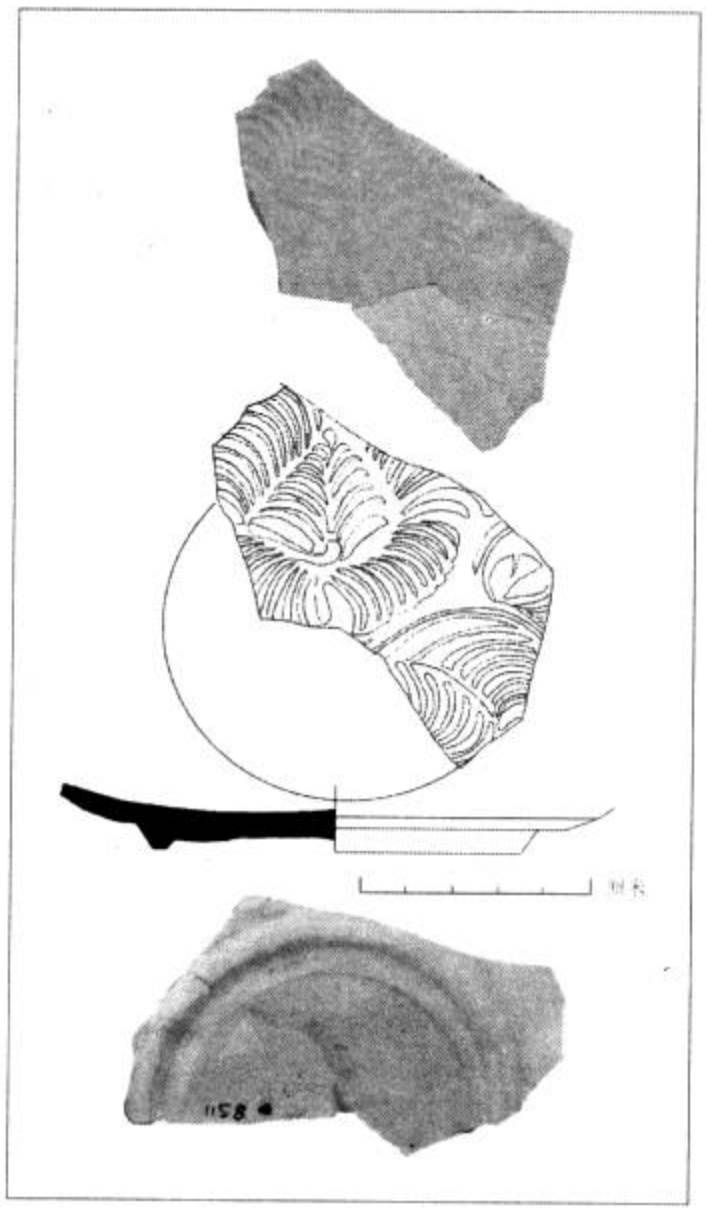


图 8　青白釉印花碗碗底瓷片，底径 7.8 厘米，北宋晚期—南宋初中期，广东西村窑，SHA 1154 + 504，草图：Vincent Bernard，电脑制图：Antoine Jarrier，照片摄制：赵冰

青白瓷 XVa 型：直口沿碗，白胎细腻坚硬，胎体薄，白釉晶莹透明，外壁口沿处 1 厘米宽无釉（施釉后被刮去），内壁浅划细密整齐的波涛纹，口径 23 厘米，失底，北宋晚期—南宋初中期，江西景德镇窑？

青白瓷 XVIa 型：外壁模印多层细密莲瓣纹，内壁无纹饰或浅划花草纹，有口径 20 厘米的口沿瓷片和底径 4 厘米的碗底瓷片，南宋晚期，江西景德镇窑。

青白瓷 XVIIa 型：白胎，火候较高，胎体比较厚，淡蓝色釉水比较薄，内壁刻莲花或其他团花纹，圈足低矮，南宋晚期—元时期，福建窑场？

青白瓷 XVIIIb 型：厚胎，釉色灰青，宽矮圈足，无纹饰，内底有涩圈，底径 5—8 厘米，南宋中晚期—元代时期，南方窑场。

青白瓷盘

青白瓷 XIXa 型：莲花瓣碟，胎白而薄，平底微凹无釉，口径 11 厘米，北宋中期，江西景德镇窑（图 9）。

青白瓷 XXa 型：斜壁平底碟，口径 8—9 厘米，北宋中期，江西景德镇窑。

青白瓷 XXIb 型：斜壁平底碟，开米仔片，口径 9 厘米，北宋中晚期，广东窑场。

青白瓷 XXIIb 型：折沿斜壁小圈足碟，北宋晚期—南宋初期，江西景德镇窑。

青白瓷 XXIIIa 型：折沿盘，内壁浅刻一组 S 纹，口径 21 厘米，南宋时期，广东石湾窑[25]。

青白瓷盒

青白瓷 XXIVb 型:扁平盒,无纹饰,子母口和器底素胎,内外壁施釉,釉色灰青,胎灰白松散,直径 5—8 厘米,北宋早期,江西景德镇窑。

青白瓷 XXVb 型:扁平盒,子母口,内外壁施釉,堆塑瓜蒂钮,子母口及盒底素胎,釉色灰青,直径 4—5 厘米,北宋早期,江西景德镇窑(图 10)。

青白瓷 XXVIb 型:扁平圆盒,子母口,内外壁施釉,母口直径 4—5 厘米,北宋早期,江西景德镇窑或广东潮州窑。

青白瓷 XXVIIa 型:长筒盒,深刻瓜棱瓣,内壁和子母口无釉,胎细白,釉色淡青,平底微凹,最大直径 6—9 厘米,北宋中期,广东西村窑[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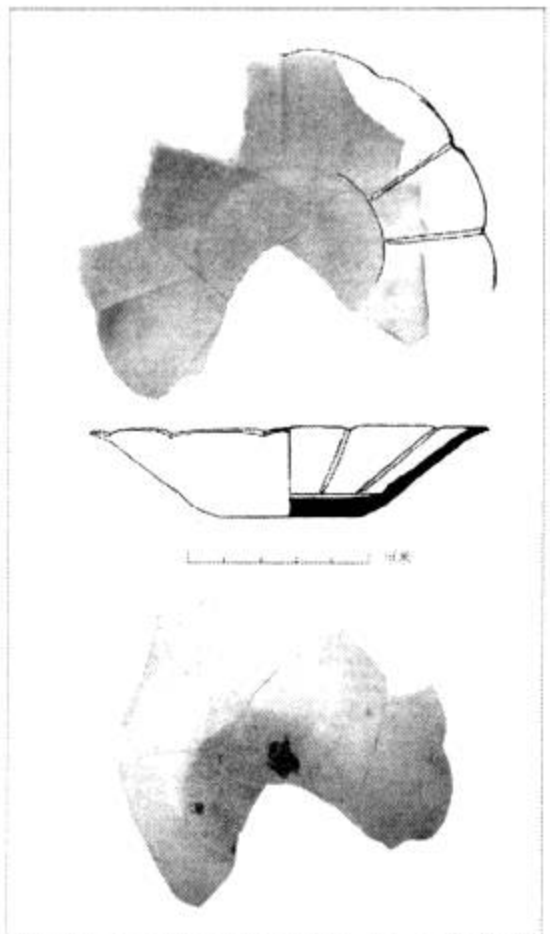


图 9 青白釉莲花瓣碟,细青白瓷,平底微凹无釉,口径 11 厘米,北宋中期,江西景德镇窑,SHA 1457 + 9,草图:Vincent Bernard,电脑制图:Antoine Jarrier,照片摄制:赵冰

青白瓷 XXVIIIa 型:模印瓜棱形长筒盒,胎体色白质坚,瓷化程度高,釉色天青莹洁,平底微凹,最大直径 6—9 厘米,北宋中期,江西景德镇窑(图 11)。

青白瓷 XXIXa 型:模印菊瓣纹或细密菱形纹扁圆盒,子母口,内外施釉,胎体色白质坚,瓷化程度高,釉色天青莹洁,子口直径 5—7 厘米,北宋末年—南宋初中期,江西景德镇窑。

青白瓷 XXXa 型:模印覆莲瓣纹,内壁和底无釉,底径 4 厘米,北宋末年—南宋初中期,江西景德镇窑或广东潮州窑。

青白瓷注壶或瓶

青白瓷 XXXIb 型:盘口瓶,胎白而纯但瓷化程度不太高,釉色浅青,开细片,口径 4 厘米,北宋早期,广东潮州窑或西村窑。

青白瓷 XXXIIb 型:竹节颈瓶或注壶颈部瓷片,胎色白而胎质纯,但瓷化程度不太高,釉色淡青,开细片,北宋早期,广东潮州窑或西村窑。

青白瓷 XXXIIIb 型:瓜棱注壶双泥条把手瓷片,胎色灰白,胎质瓷化程度不太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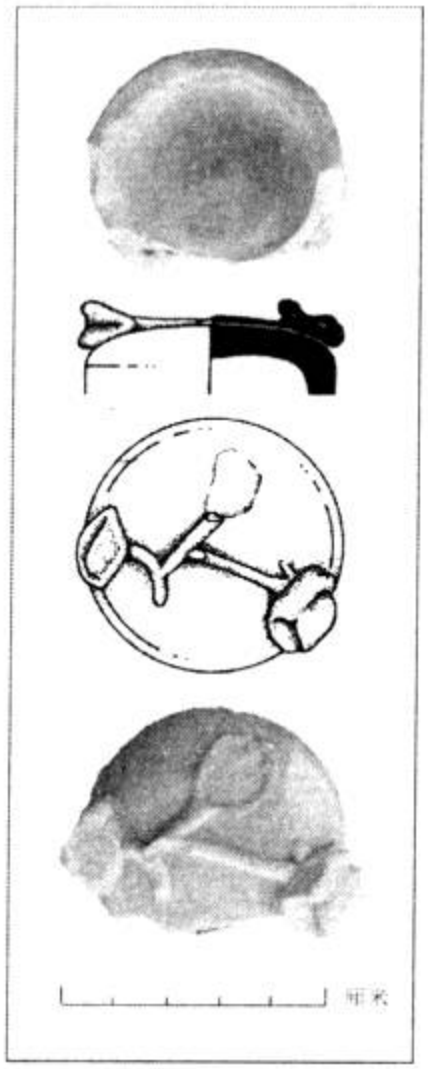


图10 青白釉扁平盒盒盖瓷片，母口直径4.5厘米，北宋早期，江西景德镇窑，SHA S 173，草图：Vincent Bernard，电脑制图：Antoine Jarrier，照片摄制：赵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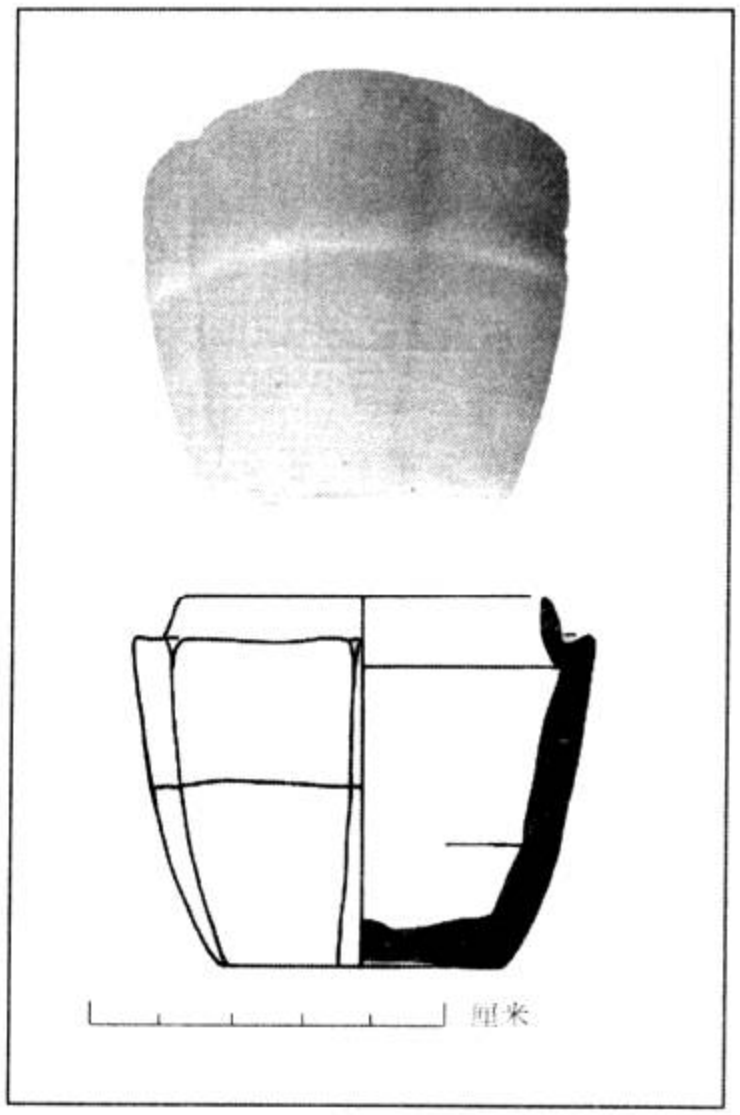


图11 模印瓜棱形长筒盒盒身瓷片，最大腹径6厘米，北宋中期，江西景德镇窑，SHA S 6，草图：Vincent Bernard，电脑制图：Antoine Jarrier，照片摄制：赵冰

釉色灰青，北宋中期，广东潮州窑或西村窑。

青白瓷小罐

青白瓷 XXXIVb 型：卷唇短直颈弧壁小罐，内外施釉，釉色偏灰青，口径5厘米，北宋时期，南方窑场。

B. 乳白瓷

我们将宋元时期在氧化气氛中烧成的、釉色明显偏牙黄色或乳白色的不透明的白瓷统称为乳白釉瓷。这一类瓷片的胎质瓷化程度通常与中等青白瓷的瓷化程度接近，和细青白瓷的瓷质相去甚远。当然，我们并不排除这类质量的瓷器

可能有时是由于窑炉气氛控制不够理想而出现的。舍尔迈遗址出土的100来块乳白釉瓷片均为碗类瓷片，多素面无纹，可分4型。

I型：薄弧壁撇口碗，白胎细密坚致，白釉泛黄，半木光，有的瓷片有缩釉，口径12厘米，北宋早期，北方窑场？

II型：薄弧壁束口碗，胎釉同I型，北宋中期，安徽繁昌窑[27]？

III型：方唇碗，灰胎，腹斜曲，内部圆底，直白色釉，口径12—14厘米，北宋时期，产地不详。

IV型：灰白胎，多杂质，白釉泛灰，釉水薄，半透明，内壁见篦划纹，圈足有高低两组，底径4厘米—6厘米，北宋晚期，福建霞洋窑[28]？

C. 青瓷

舍尔迈遗址出土的青瓷瓷片共计194块，可分以下几组。

越窑系青瓷

碗

越窑系I型：玉璧底碗碗底瓷片，胎质细密，胎色青灰，釉色青绿，足底满釉，碗心有长条弧形泥点垫烧痕，底径9厘米，晚唐时期。

越窑系II型：刻重瓣莲花纹深腹碗，胎色青灰，胎体薄，釉色青绿玻璃质感强，口径9厘米，北宋早期（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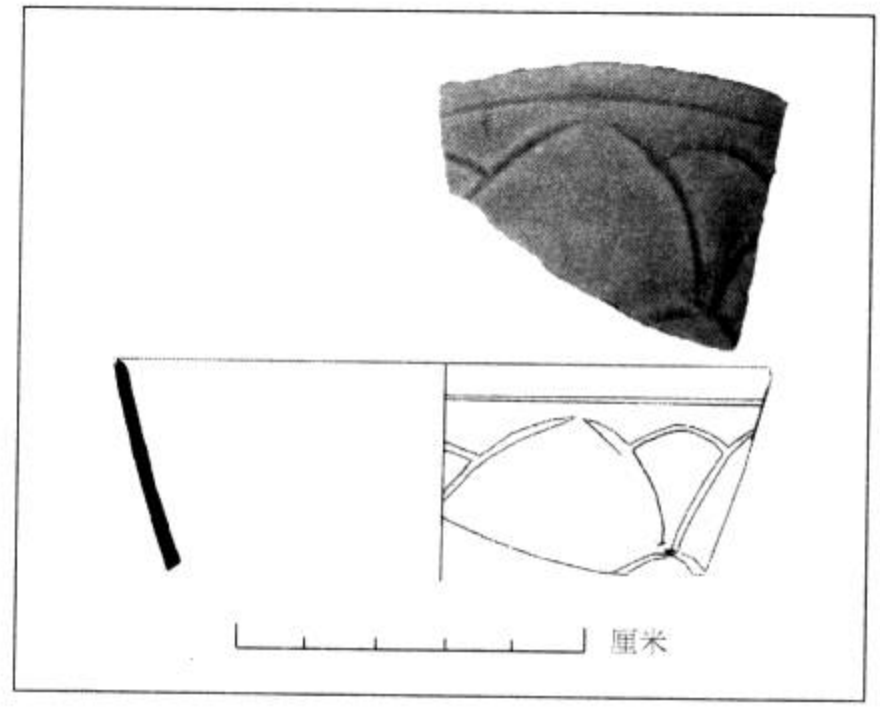


图12 刻重瓣莲花纹深腹碗口沿瓷片，口径9.2厘米，北宋早期，越窑，SHA 522—1，草图：Vincent Bernard，电脑制图：Antoine Jarrier，照片摄制：赵冰

越窑系III型：敞口碗口沿瓷片，灰白色胎，胎质更疏松些，釉色青黄发暗，内壁口沿下有一组刻划纹，口径大小不详，北宋早期。

越窑系IV型：敞口碗口沿瓷片，灰褐色胎，胎质细腻，釉色青绿，无纹饰，口径大小不详，北宋早期。

盘

越窑系V型：内底划对称鹦鹉盘，灰白胎，胎质细腻，胎壁轻薄，釉色青黄，圈足裹釉并外撇，底径6厘米，北宋早期[29]。

盒

越窑系 VI 型:青灰釉,灰褐色细胎,扁平盒,子母口微敛,母口直径 12 厘米,北宋早期。

越窑系 VII 型:扁圆盒,子母口,胎色灰白,釉色青黄,盒身外壁有刻划纹,子口直径 5 厘米,北宋中期。

龙泉窑系青瓷

舍尔迈遗址出土的能划入龙泉窑系的青瓷瓷片极少而且极碎小,可分 3 型。

I 型:敞口或卷口划花碗口沿瓷片,胎色灰白,釉色翠绿,玻璃质感比较好,口径大小不详,也可能是越窑系晚期产品,北宋中晚期。

II 型:葵口碗口沿瓷片,无纹饰,胎色灰褐,釉层厚,玻璃质感强,细开片,釉色深绿,口径大小不详,南宋时期。

III 型:无纹饰碗或盘腹壁瓷片,典型元代胎釉,胎灰白,釉色青绿透明,釉层厚,玻璃质感强,瓷片微小,无法还原器形。

耀州窑系青瓷

耀州窑系青瓷瓷片有两块,分属 2 型。

I 型:胎色呈灰褐,胎质细密,釉色青绿偏暗,胎釉之间有一层白色中界面,内壁有略显模糊的印花纹,圈足低矮,器底无釉、略显铁红色,底径 4.5 厘米,北宋中晚期,陕西耀州窑[30](图 13)。

II 型:胎灰白,烧成温度不太高,釉色翠绿,多微小气泡,内壁有印花纹,圈足和器底无釉,底径 4.5 厘米,北宋中晚期,南方仿耀州窑,窑场不详。

广东、福建青瓷

I 型:器形纹饰同青白瓷 VII 型,胎色灰褐色,胎质比较松散,釉色青绿偏暗,釉水薄,广东潮州窑。

II 型:敞口弧壁碗,胎色灰褐色,多杂质,胎坯厚重而松弛,内外壁均施有青绿色釉,玻璃质感比较好,大开片,圈足低矮宽厚,外壁施釉不及底,素面无纹,底径 4—8 厘米,宋代时期,广东潮州窑。

III 型:宽撇口大碗,胎色灰白,瓷化程度高,釉色淡青绿,光亮透明,细开片,内壁装饰有卷草刻花,间有篦纹,圈足宽大外撇,底径 5—8 厘米,北宋中期,广东西村窑或江西赣州窑?

IV 型:宽撇口大碗,胎色浅灰,火候偏低,釉色青灰,内壁有疏松的刻划纹,底径 4—7 厘米,北宋中期,广东西村窑?

V 型：素面无纹宽矮圈足碗，灰黄胎，质地松散，气孔多，釉色青黄，釉层薄，内外壁无釉处见一层薄薄的砖红色化装土，宋代时期，底径 4 - 8 厘米，广东、福建窑场？

VI 型：短颈椭圆腹壁注壶，双泥条把手，胎釉同 II 型，内外壁施釉，北宋中期，广东潮州窑？

D. 灰青釉瓷

舍尔迈遗址出土近 90 片制作比较草率的釉色灰青暗淡的素面无纹饰的碗和盘瓷片。

I 型：胎色灰黄，胎体粗松，多杂质，釉色暗淡，无光泽，器形同青白瓷 VII 型，北宋时期，广东窑场？

II 型：胎色灰暗，胎质比较细而紧，灰青釉薄，釉面开细片，器形同青白瓷 VII 型，宋代时期，广东窑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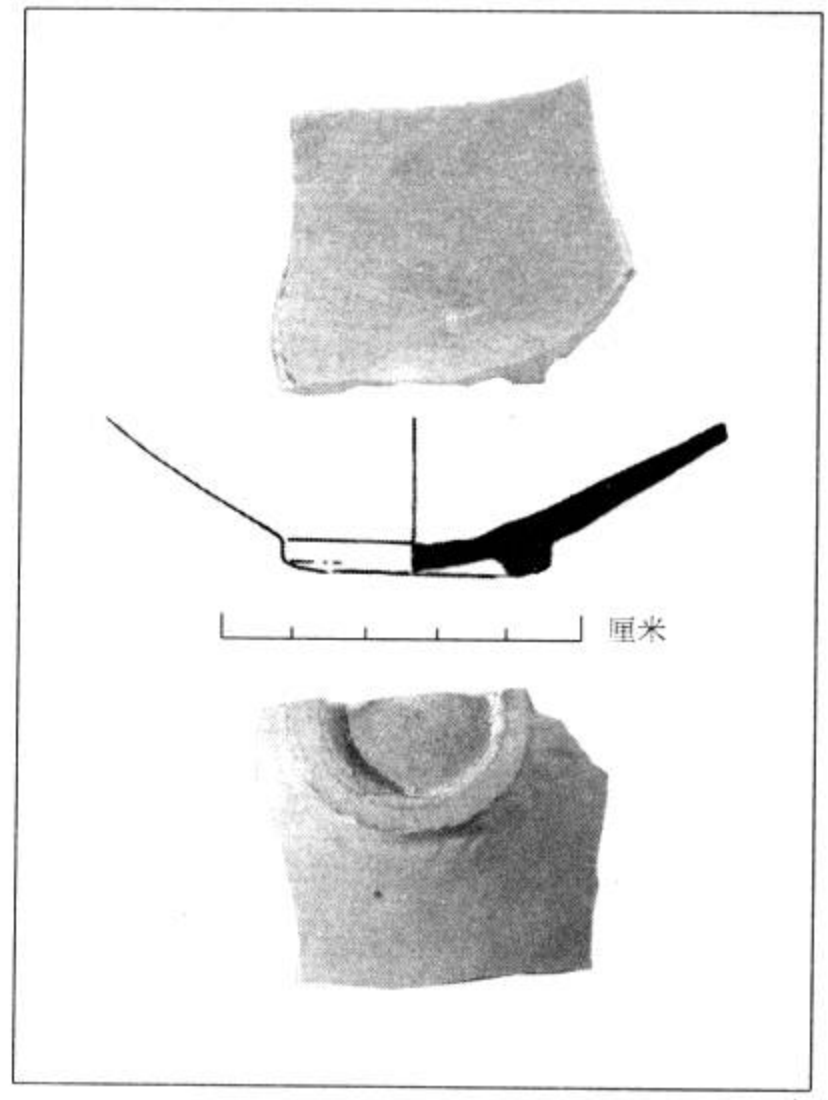


图 13　青釉印花碗碗底瓷片，底径 4.5 厘米，北宋中晚期，陕西耀州窑，SHA S 114，草图：Vincent Bernard，电脑制图：Antoine Jarrier，照片摄制：赵冰

III 型：内底涩圈碗，胎色灰白，气孔多，圈足宽厚，釉色青灰，底径 5—8 厘米，南宋时期—元时期，广东、福建窑场？

IV 型：灰胎，多杂质，釉色暗淡，无光泽，平底，制作粗糙，施半釉，底径 3.5 厘米，宋元时期，广东、福建窑场？

E. 釉下彩绘瓷

舍尔迈遗址出土的 44 余块釉下彩绘瓷片可划分为 3 型。

I 型：褐绿彩绘碗，胎质粗糙，胎色浅褐色，白色化装土覆盖不及外壁下部和碗底，釉色青绿泛黄，有剥落现象，圈足厚重，制作工艺粗糙，底径 9 厘米[31]，晚唐、五代时期，湖南长沙窑。

II 型：褐彩大碗，胎色浅褐或浅灰，胎质粗松，多杂质和气孔，釉色青黄，胎釉结合

比较好，碗口多为外卷沿，弧壁，圈足分三种：圈足，直壁饼足或外斜壁饼足，釉下绘粗狂的卷草纹，口径25—35厘米，北宋早期，广东西村窑[32]或南海窑[33]。

III型：胎釉同上，刻划纹与釉下彩绘纹共存，北宋早期，广东西村窑或南海窑。

F. 酱黑釉瓷

舍尔迈遗址出土的酱黑釉瓷片共计38块。其器形比较多样，其中黑釉碗和盒在外销瓷中极少见。

I型：平底斜壁盆，卷唇或方唇，胎体内含沙量高，半施咖啡色化装土和酱黑釉，口沿有垫烧痕迹，口径25—40厘米，宋元时期。

I式：褐色胎粗糙松弛，釉色多深褐色，多剥落，内底有印花纹，广东西村窑[34]。

II式：灰胎坚硬，釉色呈黄绿色，多剥落，外壁刻划有水波纹，广东石湾窑[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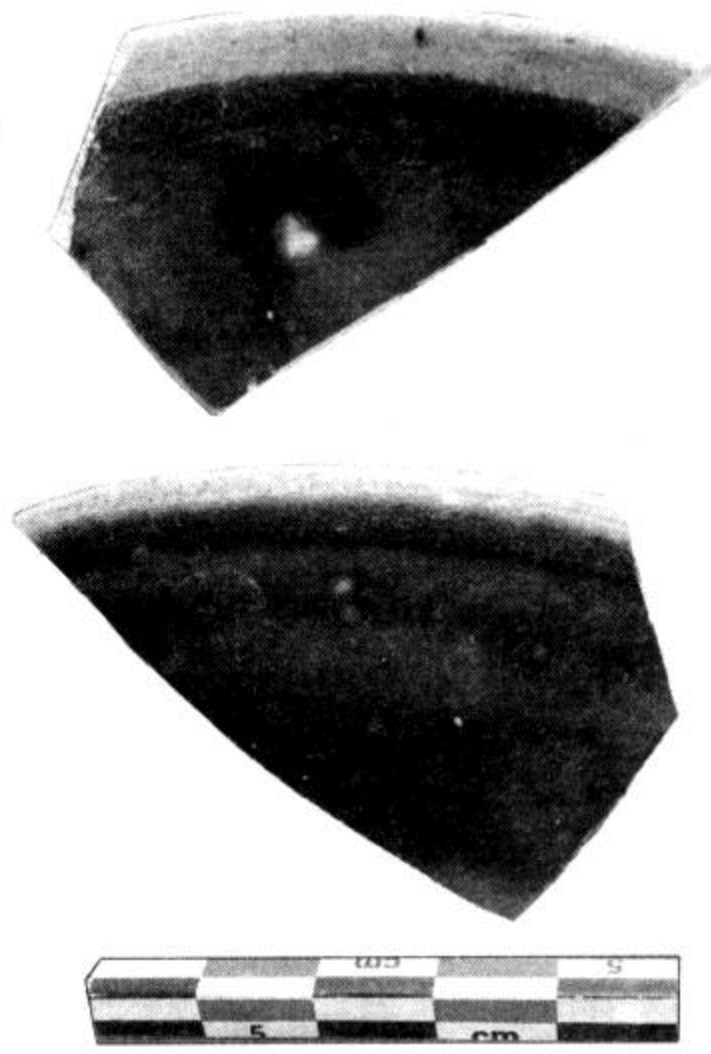


图14 褐釉白边唇口碗口沿瓷片，口径13厘米，北宋中期，窑场不详，SHA S 523，草图：Vincent Bernard，电脑制图：Antoine Jarrier，照片摄制：赵冰

II型：黑釉碗（口沿瓷片）

I式：唇口，斜直壁，灰白胎比较细密坚致，褐釉白边，有小棕眼，口径13厘米，北宋中期，窑场不详（图14）。

II式：束口碗，斜深腹，矮圈足，灰黑色胎，釉层上薄下厚，口沿处釉水薄呈褐色，近足部凝成黑釉珠，腹壁上黑釉有几根兔毫纹，口径12厘米，北宋晚期，福建建阳窑[36]（图15）。

III式：敞口，弧壁，灰白胎比较粗松，黑釉，光洁，口唇部呈酱色，口径12—14厘米，北宋晚期—南宋初中期，广东潮州窑？

III型：黑釉盒

I式：灰白胎比较细密坚致，施褐色釉，釉色滋润，捏制盒盖钮，北宋早期，南方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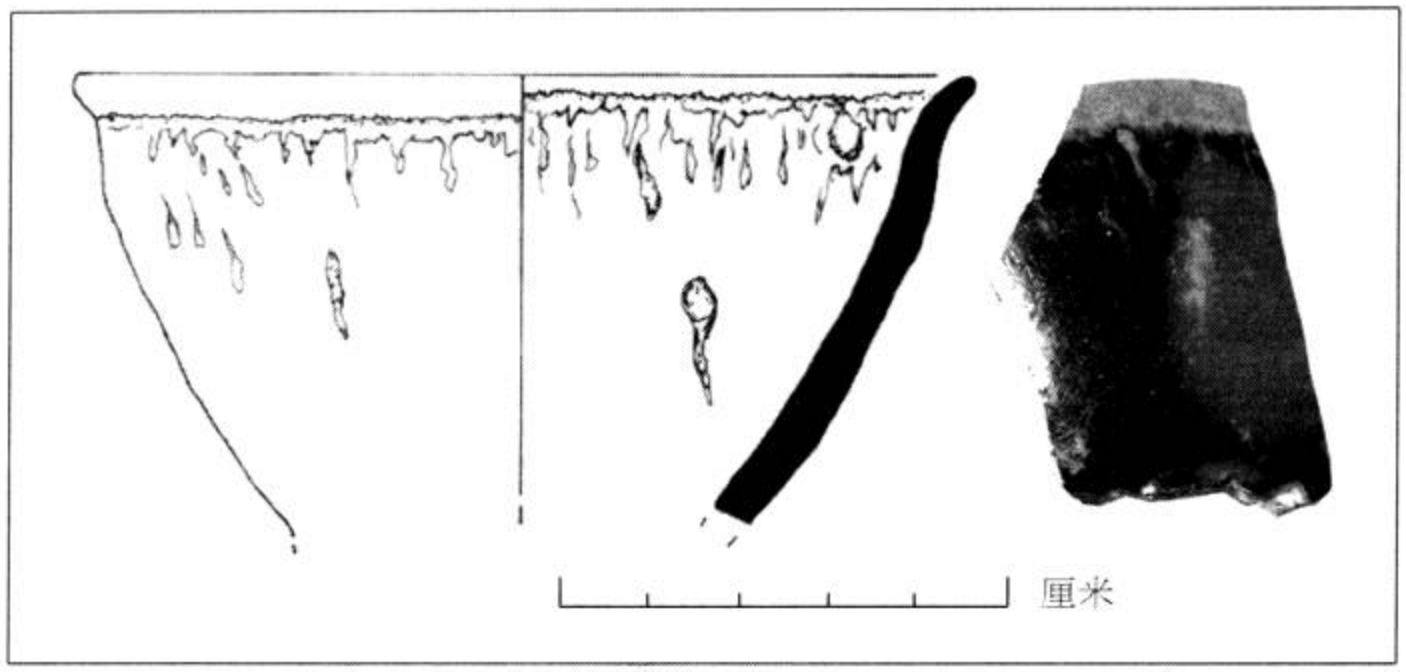


图 15　黑釉束口碗，口径 12.2 厘米，北宋中晚期，福建建阳窑，SHA S 118，草图：Vincent Bernard，电脑制图：Antoine Jarrier，照片摄制：赵冰

场，江西赣州窑？

II 式：圆底小盒，灰白胎比较细密坚致，外壁施半釉，釉色酱黑，底径 3 厘米，北宋中晚期，南方窑场。

III 式：平口，拱形盖盒，胎灰白，颗粒粗，多杂质，盖外壁施酱黑，有缩釉，直径 11 厘米，北宋晚期—南宋初中期，南方窑场。

G. 绿铅釉瓷

舍尔迈遗址出土的低温绿铅釉瓷片共 8 块，分属 4 种类型。

I 型：印花碗口沿瓷片，灰白胎比较薄，比较粗松，小卷沿，弧壁，印花纹饰细密、浅而模糊，口径 12 厘米，北宋时期，南方窑场，江西吉州窑[37]（图 16）？

II 型：侈口素面碗口沿瓷片，灰白胎比较粗松，深绿色釉多棕眼，口径 12 厘米，北宋时期，南方窑场，江西吉州窑？

III 型：印花卷沿卧足盘，深灰褐色胎，细密坚致，胎体薄，釉层多剥落，器底无釉，口径 15 厘米，南宋时期，福建磁灶窑[38]（图 17）？

IV 型：注壶或瓶腹壁瓷片，灰褐胎，外壁深绿色釉剥落严重，内壁无釉呈灰色，宋元时期，福建泉州窑？磁灶窑[39]？

H. 素胎瓷

舍尔迈遗址出土 3 块素胎瓷片。它们分属 3 型。

图 16　低温绿釉印花碗口沿瓷片，口径 12 厘米，北宋时期，江西吉州窑？SHA 1617，草图：Vincent Bernard，电脑制图：Antoine Jarrier，照片摄制：赵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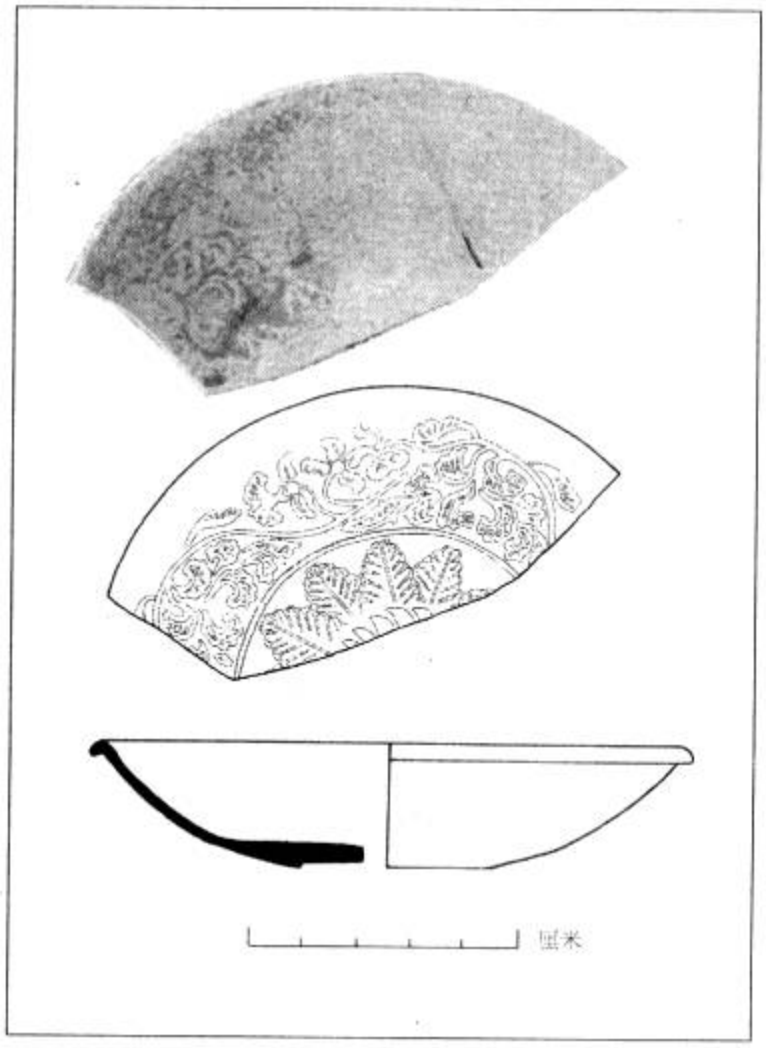


图 17　低温绿釉印花卷沿卧足盘，口径 15 厘米，南宋时期，南方窑场，窑址不详，SHA S 502，草图：Vincent Bernard，电脑制图：Antoine Jarrier，照片摄制：赵冰

I 型:细青白瓷胎,模制规整覆莲瓣纹器盖或器底,直径 4 厘米,广东潮州窑。
II 型:中等青白瓷胎,模制树叶形素胎片,器形不详,广东潮州窑?
III 型:平底斜壁擂钵,胎同酱黑釉瓷 I 型,底径 13 厘米,广东窑场?

I. 瓷罐

舍尔迈遗址出土 250 余块大型运输瓷罐瓷片。这些瓷片分 7 种胎质和 12 种器型。其中 9 世纪—11 世纪的典型器型两种,10 世纪—14 世纪的两种,其他的器型目前只能粗略地定在 11 世纪—16 世纪之间。能比较准确确定其产地的有 I 型广东潮洲窑短颈高身罐[40]、II 型广东石湾窑或奇石村印花四耳罐[41]、IV 型广东遂溪窑[42]或潮洲窑[43]刻划水波纹四耳罐。此外,V 型刻划莲花枝瓷罐[44]和 VIII型瓷罐通常也被确认为广东窑口产品。其他的,如 III 型瓷罐口沿,VI 型瓷罐口沿,IX 型瓷罐口沿和 XI 型瓷罐口沿似乎都应当是南方窑场的产品,但因窑址参考资料欠缺,其确切产地目前尚不详。

三 中世纪时期中国瓷片的分期

中世纪时期中国瓷片的进一步分期主要依据以下两组信息: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瓷片的绝对年代和瓷片所出地层之间的相互叠压关系的相对年代。前者主要依据一些比较精细的或多带纹饰的、有相应的断代参考的墓葬实物的器型。一部分胎釉粗糙,制作草率,多无纹饰的粗青白瓷瓷片、青瓷瓷片、灰青釉瓷瓷片和乳白釉瓷瓷片的时代特征不明显,通常被定为宋或宋元时期。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这些比较粗糙的产品的生产周期确实比较长的可能性。就舍尔迈遗址而言,由于遗址上部地层扰乱严重,我们只能分析这类器型最早出现在哪层封闭地层中,并与哪类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瓷片共存。因此,舍尔迈遗址这类器型的分期通常仅仅反映其上限时代,并不能体现它们在舍尔迈遗址的延续状况。当然,有的器型由于本身断代不够细,又只出现在舍尔迈遗址的表层或扰乱地层。我们无法对此进行更细致的分期。总的来说,舍尔迈遗址采集和出土的中世纪时期中国瓷片可划入以下 5 个时期。遗址发掘资料的整理工作正在进行中,连接各发掘单位和各建筑遗迹的统一地层关系尚未建立起来。各时期的瓷片在遗址的分布状况目前还无法显示出来。

第一期(晚唐—五代时期)

属于这个时期的瓷片很少。有一块长沙窑褐绿彩绘碗底瓷片[45]、一块越窑

系 I 型青瓷碗底瓷片[46]和数片微小的越窑青瓷碗腹壁瓷片。大部分瓷片来自遗址表面。此外,在舍尔迈遗址表面采集到 1 块阿拔斯时期拉斯特彩陶片、5 块白釉陶片和 18 块极其微小的宝石蓝碱釉大罐陶片[47]。从目前来看,证实舍尔迈在 9—10 世纪上半叶存在的实物证据太少。

第二期(北宋早期,公元 980—公元 1050 年)

这一期以青白唇口碗的大量出现为起点[48]。它是舍尔迈遗址开始成批量出土中国瓷片的时期。属于这个时期的典型器型有越窑系青瓷 II 型[49]、V 型[50],早期青白瓷类[51](如青白瓷 I 型、IV 型[52])和广东釉下彩绘瓷类(表一)。其货源很广,有浙江、江西和广东各名窑的产品。

表一:第二期器型表

器　型	窑　场
越窑系 II 型青瓷碗	越窑系
越窑系 III 型青瓷碗	越窑系
越窑系 IV 型青瓷碗	越窑系
越窑系 V 型青瓷盘	越窑系
越窑系 VI 型青瓷盒	越窑系
青白瓷 Ib 型碗	江西、广东窑场
青白瓷 Ic 型碗	江西、广东窑场
青白瓷 IIIb 型碗	江西赣州窑、广东潮州窑
青白瓷 IVb 型碗	江西景德镇窑、广东潮州窑
青白瓷 XIIb 型碗	广东西村窑、南海窑
青白瓷 XXIVb 型盒	江西景德镇窑、广东潮州窑
青白瓷 XXVb 型盒	江西景德镇窑
青白瓷 XXVIb 型盒	江西景德镇窑、广东潮州窑
青白瓷 XXXIb 型瓶	广东潮州窑
青白瓷 XXXIIb 型瓶或注壶	广东潮州窑
乳白釉 I 型碗	产地不详(北方窑场?)
釉下彩绘 II 型碗	广东西村窑、南海窑
釉下彩绘 III 型碗	广东西村窑、南海窑

第三期(北宋中年,公元1050—公元1100年)

这一期以细青白瓷的出现为开端[53]。它多为单色釉瓷组成,其中以青白瓷为大宗。这一期的典型器型有青白瓷青白瓷IIa型碗[54]、青白瓷XXVIIIa型盒[55]、青白瓷XXXIIIb型注壶[56]等。

表二:第三期器型表

器型	窑场
越窑系VII型青瓷盒	越窑系
青白瓷IIa型碗	江西景德镇窑
青白瓷IIb型碗	广东潮州窑
青白瓷VIb型碗	江西、福建窑场
青白瓷VIIa型碗	江西景德镇窑
青白瓷VIIb型碗	广东潮州窑
青白瓷IXa型碗	江西景德镇窑、湖北湖泗窑
青白瓷XIa型碗盖	江西景德镇窑、广东潮州窑
青白瓷XIIb型碗	广东西村窑
青白瓷XIXa型盘	江西景德镇窑
青白瓷XXa型盘	江西景德镇窑、广东潮州窑
青白瓷XXIb型盘	广东窑场
青白瓷XXIIb型盘	江西景德镇窑
青白瓷XXVIIa型盒	江西景德镇窑、广东西村窑
青白瓷XXVIIIa型盒	江西景德镇窑、广东潮州窑
青白瓷XXXIIIb型注壶	广东潮州窑、西村窑
青白瓷XXXIVb型小罐	南方窑场
乳白釉II型碗	安徽繁昌窑?
乳白釉III型碗	产地不详
龙泉窑系I型青瓷碗	越窑系或龙泉窑系
耀州窑系I型青瓷碗	陕西耀州窑
耀州窑系II型青瓷碗	产地不详
广东、福建青瓷III型碗	产地不详

续表

器型	窑场
广东、福建青瓷 IV 型	广东西村窑?
广东、福建青瓷 V 型碗	产地不详
广东、福建青瓷 VI 型碗	产地不详
灰青釉 I 型	产地不详
灰青釉 II 型	产地不详
酱黑釉 II 型 I 式	产地不详
酱黑釉 III 型 II 式	南方窑场
绿釉 I 型	江西吉州窑?
素胎 I 型	广东潮州窑
素胎 II 型	广东潮州窑

第四期(北宋晚期—南宋早期,公元 1100—公元 1150 年?)

这一期包括一些相当典型的 12 世纪上半叶的素面或碎点篦纹青白瓷碗(如青白瓷 Va 型[57]、VIIIa 型[58]和 Xa 型碗[59])。此外,青白瓷 XXIXa 型盒和 XXXa 型盒同时出现在国内一批 1120 年和 1184 年之间的墓葬中[60]。不过,在舍尔迈遗址我们至今未见南宋中期典型的青白釉和乳白釉芒口印纹碗、盘[61];因此,目前我们比较赞同将第四期下限定为南宋早期。

表三:第四期器型表

器型	窑场
青白瓷 Va 型碗	江西景德镇窑或南丰窑
青白瓷 Vb 型碗	广东潮州窑
青白瓷 VIIIa 型碗	江西景德镇窑
青白瓷 IXa 型碗	江西景德镇窑
青白瓷 Xa 型碗	江西景德镇窑
青白瓷 XIa 型碗	江西景德镇窑
青白瓷 XIIIa 型碗	江西景德镇窑

续表

器型	窑场
青白瓷 XIVb 型碗	广东潮州窑或西村窑
青白瓷 XVa 型碗	江西景德镇窑
青白瓷 XXIb 型盘	广东窑场
青白瓷 XXIIIa 型盘	广东石湾窑
青白瓷 XXIXa 型盒	江西景德镇窑
青白瓷 XXXa 型盒	江西景德镇窑
乳白釉 IV 型碗	福建霞洋窑?
龙泉窑系 II 型	龙泉窑系
灰青釉 III 型	福建、广东窑场
灰青釉 IV 型	福建、广东窑场
酱黑釉 II 型 II 式	福建建阳窑
酱黑釉 II 型 III 式	广东潮州窑?
酱黑釉 III 型 III 式	产地不详

第五期(南宋晚期—元朝时期,公元 1250—公元 14 世纪?)

该时期的各类型中国瓷片均来自遗址南部表层。其中,青白瓷 XVIa 型是典型的南宋晚期产品,国内四川平武窖藏有出土[62],13 世纪印度尼西亚布亚岛沉船中亦有出土[63]。青白瓷 XVIIa 型和 XVIIIb 型的断代则不太精细,多为南宋晚期或元朝时期。低温绿铅釉 III 型和 IV 型也应当是该时期的。13 世纪中叶以后,龙泉窑莲瓣碗风靡伊斯兰地区。这类瓷片在波斯湾沿海地区(如米纳布[64]、巴林[65])、阿拉伯半岛(如席赫尔[66])和埃及福斯塔特[67]等地均有出土。而在舍尔迈遗址,除了几块极其碎小的典型的元代龙泉青瓷(龙泉窑系 III 型)[68]外,我们未发现其他任何龙泉青瓷。此外,除去数十块也门黄褐釉陶片和埃及水缸陶片,在舍尔迈遗址也不见其他 13—14 世纪遗物。遗址发掘者推测 13—14 世纪期间可能有海船在舍尔迈遗址南部有过短暂停留。

四 从舍尔迈遗址窥视波斯湾商人控制的中国宋代瓷器贸易

舍尔迈遗址表层采集的40余块公元2—4世纪的阿曼、伊朗、印度等国陶片表明，舍尔迈可能很早就参与印度洋海上贸易。舍尔迈遗址出土的具有一定纪年价值的遗物，如中国瓷片和部分伊斯兰陶片，都集中在10世纪后半叶和12世纪中叶之间。11世纪是印度洋西部海上贸易的转折点。公元977年西拉夫港遭受大地震而衰败；伊朗法尔斯地区随着白益王朝（932—1055年）的灭亡进入战乱时期。波斯湾西海岸苏哈尔港、吉舒岛港、霍尔木兹港随之兴盛起来[69]。最新的考古发掘显示，11世纪也是波斯湾商人在东非沿海发展的重要时期[70]。与此同时，法蒂玛王朝时期（969—1168年）的埃及商人也不断壮大，逐渐控制了红海沿岸。12世纪上半叶，埃及商人与波斯湾商人在阿拉伯半岛南部沿海地区对峙争雄，战火多次在这一带地区爆发[71]。舍尔迈遗址出土大量的东非沿岸陶片，就中世纪中国瓷片的类型和组合来看，舍尔迈遗址与苏哈尔港遗址[72]、东非坦桑尼亚基尔瓦[73]和肯尼亚给地遗址[74]非常接近。舍尔迈遗址发掘者因此推测舍尔迈可能正是西拉夫港衰弱以后波斯湾商人开辟的一个中转货栈。此外，舍尔迈遗址表层散布一些埃及达赫莱绿洲生产的水缸陶片。遗址发掘者进一步推测舍尔迈可能因遭遇埃及船队的袭击而在12世纪中期猝然消失[75]。

就11—12世纪时期由波斯湾商人控制的贸易体系内输入的中国瓷器在生产、销售环节和市场消费等方面，我们借舍尔迈遗址出土的实物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假设。

1. 所输入中国瓷器的综合特征

盛唐以后长沙窑瓷器大批量输入伊斯兰国家，构成外销瓷的大宗。长沙窑衰落以后，广东沿海西村窑和南海窑等窑场在北宋初期继续给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地区提供彩绘瓷器。不过，11世纪以降，单色釉瓷（以青白瓷、白瓷、乳白釉瓷、青瓷和灰青瓷为主）占绝对优势。这表明中国瓷器以胎釉的质量而赢得欢迎。从器形来看，以碗和大型运输瓷罐为主，其次是盘，还有少量注壶、瓶、盒等日用器物和少量橱具，不见任何器形复杂、不便于运输的器物。在舍尔迈遗址2001年、2002年两期发掘出土的21000余块的陶瓷片中（其中中世纪时期陶瓷片占绝对多数），哈达拉毛省本地粗陶片大约占25%，印度、巴基斯坦地区陶

片各占 20%，红海沿岸和东非沿岸所产陶片各占 15%，伊斯兰刻剔花陶片（*sgraffiato wares*，初步断定为伊朗产）占 6.6%，中国瓷片占 3.83%[76]。由此看来，中国瓷器是稀有货物，应当是少数人能够享用的奢侈品[77]。除广东釉下褐彩大碗外，迄今不见其他专供伊斯兰市场的器形和纹饰。不过，有的青白瓷碗比国内市场同类器物更大（如青白瓷 IXa 型、青白瓷 XIIb 型等）。

由于舍尔迈遗址迄今仅局部被发掘，我们目前不能计算出各类器物在舍尔迈遗址的数量和比例，以便估计哪些器物是成批量输入，哪些又是罕见物。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观察到以下两个现象。第一，有的器型存在大小不同的规格（如青白瓷 IXa 型和青白瓷 XIVb 型）。第二，有的器形则拥有不同的胎釉质量（如青白瓷 Ib 型和青白瓷 Ic 型，或青白瓷 VIIa 型、青白瓷 VIIb 型和灰青釉 I 型）。两者都反映了这些器型的畅销性，后者还体现了同时输入不同质量的同种器形以满足不同经济水准的消费者的现象。此外，舍尔迈遗址出土数十余块变形的或釉面龌龊的废品瓷片。由此可见，在窑场瓷器拣挑[78]和出港质量检验[79]环节上，北宋时期外销瓷器是鱼目混珠的。

2. 供给伊斯兰国家的中国窑场的多元化

舍尔迈遗址出土的日用瓷器品种特别丰富，其出产地出乎寻常的繁多。我们现已确认的有比较常见的南方窑场，如湖南长沙窑系窑场，浙江越窑系窑场、龙泉窑系窑场，江西景德镇窑系窑场，福建泉州窑、磁灶窑，广东潮州窑、西村窑、石湾窑、南海窑、遂溪窑等。此外，福建建阳窑、霞洋窑，江西南丰窑、赣州窑、吉州窑，陕西耀州窑瓷器则比较少见。总的来说，江西和广东的瓷器为大宗。不过，我们目前不排除有北方地区（如安徽繁昌窑）和长江中游地区（如湖北湖泗窑窑场）瓷器的可能。

9 世纪黑石号沉船[80]、东非坦桑尼亚基尔瓦海港遗址 11—12 世纪地层[81]和十六世纪初文莱沉船[82]均显示，在远洋运输中大型瓷罐常用来装盛陶瓷器、玻璃器或金属材料等货物。这类大型器物由于本身的运输问题，应该通常在出港港口附近地区就地生产。舍尔迈遗址出土的 250 余块大型中国瓷罐瓷片中，目前已确认产地的仅见广东窑场。据目前所掌握的实物资料来看，把广东省珠江和潮州一带港口当作主要出港港口的证据最充分。舍尔迈遗址出土的越窑系器型在浙江省宁波港唐宋时期遗址有出土[83]。我们认为还有其他的与舍尔迈遗址有关的出口港。不过，国内港口遗址的发掘不多。我们目前对各窑场和出港港口之间的货源关系了解也甚少。

3. 有关中国与伊斯兰地区陶瓷工艺的交流与传播

舍尔迈遗址出土40余件广东西村窑和南海窑釉下褐彩大碗瓷片。这类瓷器在内地墓葬不常见，而在国外如东南亚[84]、波斯湾[85]、东非[86]等则常有出土，是一种外销产品。舍尔迈遗址20号房屋未扰乱的最深层（发掘单位1216和1167）和未扰乱的发掘单位1304出土数片这类釉下褐彩碗瓷片。发掘单位1304还同时出土典型的北宋早期青白釉唇口碗（青白瓷Ib型）瓷片。由此可推断，广东釉下褐彩大碗是舍尔迈成批量进口的最早的中国瓷器之一。这类大碗的直壁饼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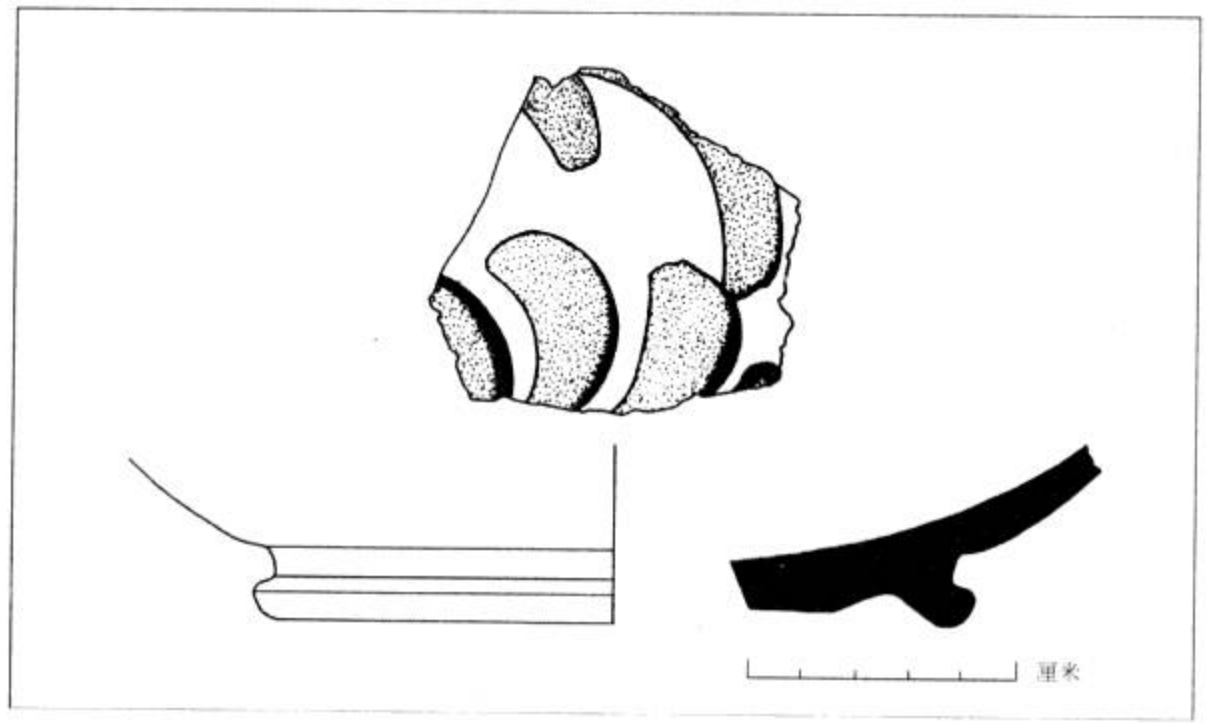


图18 釉下褐彩碗碗底瓷片，底径12.2厘米，广东西村窑，北宋早期，SHA S 1，草图：Vincent Bernard，电脑制图：Antoine Jarrier，照片摄制：赵冰

或外斜壁饼足的底内均削出凹圈形成假圈足（图18）。这个微小的器型特征最早见于广东唐代器物[87]。在舍尔迈遗址出土的伊斯兰刻划花（*hatched sgraffiato*）碗和伊斯兰剔刻花（*champlevé sgraffiato*）的碗底上，我们观察到同样的特征（图19）。这两类敞口大碗为细泥质红胎，外挂白色化装土，施低温单色或斑块铅釉，这些制作精细的陶器可能是伊朗东南部沿海地区产品[88]。前者在化装土上有细致规整的刻划线形成篦纹地，是10世纪末或11世纪初的产品；后者的化装土被剔掉使纹饰呈浮雕，是11世纪上半叶或中叶的产品。这两类陶器在波斯湾内遗址极其少见[89]，而常出现在伊朗东部沿海地区[70]和阿拉伯半岛沿海和红海沿海地区[91]。

挖足属于基本制作工艺，是坯工的习惯性动作。仅仅将以上描述的现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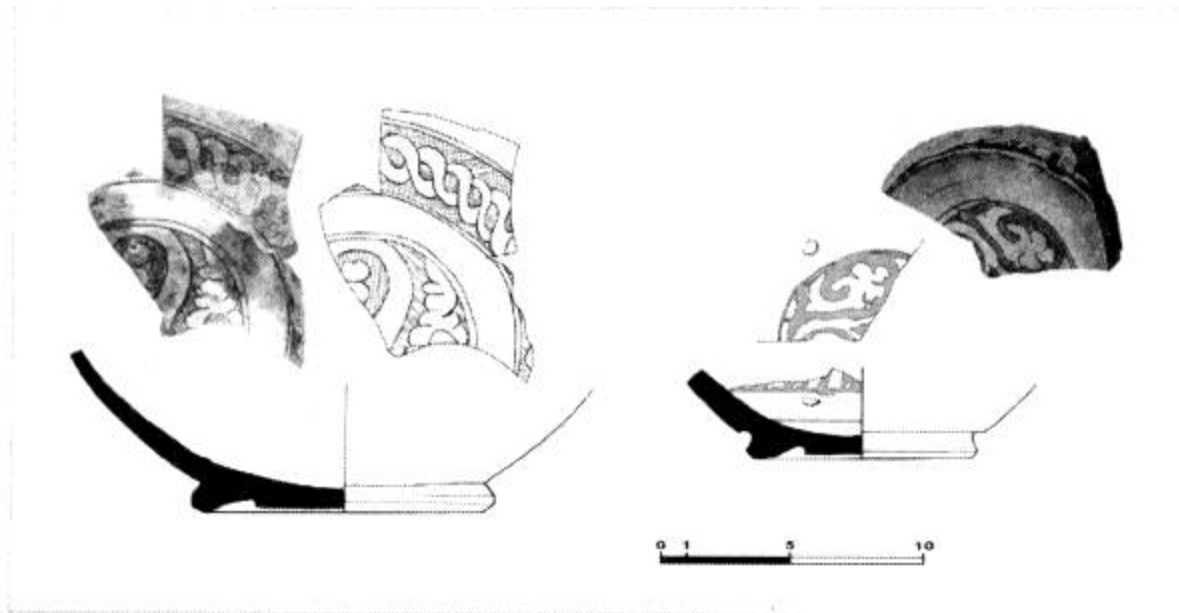


图 19　左:伊斯兰篦纹底刻划花碗碗底陶片,底径 12 厘米,10 世纪末或 11 世纪初,伊朗东南沿海地区,SHA 1024—1 + 1128—2(引自 Rougeulle, 2005, fig. 4—7);右:伊斯兰剔刻花碗碗底陶片,底径 8 厘米,伊朗东南沿海地区,11 世纪,SHA 744—1,草图:Vincent Bernard,电脑制图和照片摄制:Axelle Rougeulle

解成伊朗陶工刻意效仿广东瓷器似乎肤浅了一些。因为,正如舍尔迈遗址的另一件效仿青白釉斗笠碗的伊朗绿松石釉瓷所显示,模仿通常涉及器物造型和釉色等外在因素(彩图 8)。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两种瓷器的挖足制作工艺的特殊共性这个表面现象当作 11 世纪时期广东沿海地区和伊朗东南部沿海地区的陶工迁徙流动的物质依据。不过,这个细微的器形特征提醒我们应当特别关注中国和伊斯兰地区的陶瓷工艺技术的异同和交流等问题。

后补:数年来,也门舍尔迈遗址出土的中国瓷片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承蒙许多国内学者的指导和帮助。笔者在此诚挚感谢马文宽(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禚振西(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林业强(香港中文大学)、秦大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广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樊昌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一平(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栗建安(福建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岳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劲峰(江西省赣州市博物馆)等学者。

〔注　释〕

1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UMR 8167《Orient et Méditerranée》Laboratoire《Islam médiéval》.

2 Hardy-Gilbert & Rougeulle, 1995, 1997.

3 Hardy-Gilbert, 2001, Hardy-Gilbert & Ducatez, 2004.

4 Ranking & Azoo, 1897, p. 93, 112.

5 Bombaci, Rizzitano, Rubinacci & Valiere, 1971, fasc. 1 p. 52 .

6 Mehren, 1874, p. 217, 301.

7 Hourani, 1975, p. 73.

8 Rougeulle, 2004, p. 204.

9 从胎质和釉色来看,十来块青瓷瓷片不像我们目前所知的中国青瓷;它们有可能来自越南中部地区。但是由于瓷片太碎小,我们无法还原其器形,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和确认。

10 在所有陶瓷片中,中国瓷片仅占有 0.5—0.9% (Tampoe, 1989 , fig. 100、103 、106)。

11 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92 年,插图 353。

12 陈建中,1999 年,页 13—15,插图 27、30、66、69。

13 安溪县文化馆,1977 年 ,插图 10—4;曾凡 2004 年 ,插图 70—3。

14 有关 这批资料的首次发表,见 Zhao, 2004a。

15 各类器型编号以大写罗马数字顺序排例。大写罗马数字后小写西文字母 a、b 、c 分别体现其胎质。

16 出光美术馆,1982 年,插图 225;江西省文物工作队、赣州地区博物馆、赣州市博物馆,1990 年,插图 4—13、14。

17 李炳炎,2004 年,页 50,插图 1。

18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赣州地区博物馆、赣州市博物馆,1990 年,插图 8—9;李海根,1990 年,插图 2—3。

19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2001 年,插图 11—1;Southeast Asian Ceramic Society, 1985, pl. 132.

20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2001 年,插图 19—10。

21 Ho, 2001, pl. 1.

22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 2001 年,插图 11—4;熊跃泉、贺世伟 1997 年,插图 6—1、4。

23 广州市文物管理会员会、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7 年,图 31。

24 出光美术馆,1982 年,插图 202。

25 Southeast Asian Ceramic Society, 1985, pl. 141、142.

26 广州市文物管理会员会、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1987 年,插图 28—7。

27 陈衍麟,1995 年,插图 1—1,1—3。

28 曾凡,2004 年,插图 45。

29 慈溪市博物馆,2002 年,页 80,插图 41—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2002 年,插图 60—1、2、3、4,63—1。

30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耀州窑博物馆,1998 年,插图 84—6。

31 长沙窑编辑委员会, 2005 年,卷 1,图 57 右和图 60 下左。

32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1987 年,图 30 ;Hughes-Stanton & Kerr, 1980, pl. 135.

33 Lam, 1989, p. 49;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85 年,页 39。

34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1987 年,图 17—8。

35 佛山市博物馆,1978 年,页 196、198。

3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省博物馆,1990 年,页 1097,插图 2—1;茶道资料馆、福建省博物馆,1994 年, 插图 61;同类型碗在深圳有出土(深圳博物馆,1990 年,插图 3—7、8,图版 8—4)。

37 Hughes-Stanton & Kerr, 1980, pl. 265;作者在江西省文物考古所见到多块吉州永和窑绿铅釉印花碗瓷片,其胎釉特征与此类瓷片比较接近。

38 陈鹏,1982 年,页 494。

39 Hughes-Stanton & Kerr, 1980, pl. 168, 175;陈鹏,1982 年,页 492,插图 8—1。

40 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85 年,插图 72。

41 佛山市博物馆,1978 年,图 5—4。

42 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85 年,页 39。

43 广东省博物馆,1981 年,页 22,插图 26—3。

44 Brown, 1989, pl. 103。新近有学者提出这种瓷罐可能产于越南(Stevenson & Guy, 1997, pl. 316)。

45 有关断代参考资料见长沙窑课题组,1996 年,页 237,插图 559。

46 有关断代参考资料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2001 年,插图 6—1。

47 Rougeulle, 2005, p. 226 - 227.

48 最早的青白唇口碗见于 983 年墓(江西省文物工作队、乐安县博物馆,1984 年,插图 1—1)和 986 年墓(九江市文物保护管理所,1990 年,图三)。

49 有关断代参考资料见浙江省博物馆,2000 年,插图 198。

50 有关断代参考资料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2002 年, 页 350,插图 60—1、2、3、4,63—1;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1993 年,插图 33—1。

51 有关青白瓷的分期见范凤妹,1988 年;斐亚静,1999 年;彭善国,2002 年。

52 有关断代参考资料见瑞昌县博物馆,1986 年,插图 1。

53 有关细青白瓷的出现见刘新园,1980 年;彭善国,2002 年。

54 有关断代参考资料见彭适凡、唐昌朴,1980 年,插图 4—3。

55 有关断代参考资料见江西省考古研究所、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2001 年,插图 20—4 ;无锡市博物馆,1990 年,插图 6。

56 有关断代参考资料见薛尧,1965 年,插图 9—3。

57 有关断代参考资料见镇江市博物馆、溧阳县文化馆,1980 年,插图 29。

58 有关断代参考资料见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南丰县博物馆,1988 年,插图 11。

59 有关断代参考资料见陈定荣,1990 年,插图 2—1;彭适凡、范凤妹,1998 年,插图 27、28。

60 有关断代参考资料见彭适凡、范凤妹,1998 年,插图 36、39 、59、62、65;吴兴汉,1995 年,插图 8。

61 有关景德镇覆烧工艺的出现见刘新园,1974 年。

62 斐亚静,1999 年,图一/21。

63 Ridho & Mchinnon, 1998, pl. 3.

64 Rougeulle, 1991, p. 473.

65 Pirazzoli-t'Serstevens, 1985, pl. 7/1; Zhao & Lombard, 2005, fig. 6.

66 Hardy-Gilbert, 2001, fig. 7—2、7.

67 Gyllensvärd, 1975, pl. 10, 11;马文宽、孟凡人,1987 年,插图 5—4, 5 ;Yuba, 2005, fig. 15.

68 李宝平, 2002 年 ; Kamei, 1994, p. 46 - 84.

69 Piacentini, 1992 ; Piacentini, 1999—2000.

70 Horton, 1996 ; Pradines, 2006.

71 Goitein, 1954.

72 Pirazzoli-t'Serstevens, 1988.

73 Chittick, 1974 ; Stéphane Pradines 带队的法国考古队从 2004 年 8 月起再次发掘基尔瓦遗址所得(待发表)。

74 Pradines, 2006.

75 Rougeulle, 2004, p. 232 - 233.

76 Rougeulle, 2005, p. 11.

77 Pirazzoli-t'Serstevens, 2005, p. 77.

78 蒋祈在《陶记》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景德镇瓷器的质量检验和分类。据作者的最新考证,蒋祈为南宋福建路福州府人,活跃在南宋晚期(Zhao, 2004b)。

79 有关宋代港口的运作参见廖大轲,1990 年。

80 Flecker, 2001.

81 法国考古队 2005 夏季发掘坦桑尼亚基尔瓦海港的最新信息,待发表。

82 L'Hour, 2002, vol. 2, p. 103.

83 Lin, 1994, p. 148 - 150.

84 Southeast Asian Ceramic Society, 1985, pl. 23, 24 ;Dupoizat, 2003, p. 145, fig. 7, 8.

85 Pirazzoli-t'Serstevens, 1988, fig. 22 n. 30.

86 由 Stéphane Pradines 带队的法国考古队在 2005 年 8 月发掘坦桑尼亚基尔瓦遗址出土,待发表。

87 广东省博物馆、电白文化局,1986 年;广东省博物馆、高明县文物普查办公室,1993 年,插图 6—5、9、10,插图 7—1。

88 Rougeulle, 2005, p. 228.

89 即使在最重要的西拉夫遗址也仅见 30 来块瓷片(Tampoe, 1989, p. 39 - 40)。

90 Rougeulle, 2005, p. 217.

91 有关也门扎比德遗址,见 Marson & Keall , 1988。

参 考 文 献

安溪县文化馆,《福建安溪古窑址调查》,《文物》,1977 年,第七期,页 58—65。

BOMBACI, A., RIZZITANO, U., RUBINACCI, R., VALIERE, L. V., ed., *Al-Idrîsî, Kitâb Nuzhat al-mushtâq fi 'khtirâq al-âfâq*(易德里斯《诸国风土志》), Opus Geographicum 1, 1971.

BROWN, Roxanna, M. ed., *Guangdong Ceramics from Butuan and Other Philippines Sites*(菲律宾武端遗址和其他遗址出土的广东瓷器), Manill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the Philippines, 1989.

茶道资料馆、福建省博物馆,《唐物天目——福建省建窑出土と日本の伝世天目》,京都,茶道资料馆,1994 年。

长沙窑课题组,《长沙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 年。

长沙窑课题组,《长沙窑》,长沙,湖南省美术出版社,2005 年。

慈溪市博物馆,《上林湖越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年。

陈定荣,《江西金溪宋孙大郎墓》,《文物》,1990 年,第九期,页 14—18。

陈建中,《德化民窑青花》,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

陈鹏,《福建晋江磁灶古窑址》,《考古》,1982 年,第五期,页 490—498、489。

陈衍麟,《繁昌窑器釉色及造型工艺》,《文物研究》,1995 年,第 10 期,页 71—80。

CHITTICK, Neville, *Kilwa: an Islamic Trading City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基尔瓦:东非沿海的一座伊斯兰贸易城), Nairobi,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1974.

出光美术馆,《近年觅见の窑址出土中国陶磁展》,东京,出光美术馆,1982 年。

DUPOIZAT, Marie-France, 《Céramique chinoise》(中国瓷器), GUILLOT, Claude dir., *Histoire de Barus. Le site de Lobu Tua I, Étude archéologique et documents*, Cahiers d'Archipel, Paris, Association Archipel EHESS, 2003, p. 103 - 170.

范凤妹,《江西出土的宋代瓷盒》,《文物》,1988 年,第三期,页 88—93。

费郎编,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中华书局出版,2001 年。

斐亚静,《简谈景德镇宋元时期青白瓷》,《中国古陶瓷研究》,1999 年,第五辑,页 209—221。

FLECKER, Michael, "A ninth century A. D. Arab or Indian shipwreck in Indonesia: first evidence for direct trade with China" (印度尼西亚 9 世纪阿拉伯或印度沉船:与中国进行直接贸易的最早证据), *World Archaeology*, 32. 3, 2001, p. 335 - 354.

佛山市博物馆,《广东石湾窑址调查》,《考古》,1978 年,第三期,页 195—199。

GOITEIN, S. D., "Two eyewitness reports on an expedition of the King of Kîsh (Gays) against Aden"(见证克什王进攻亚丁港的两份报告),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54, 16/2, p. 247 - 257.

广东省博物馆,《广州西村窑》,北京,文物出版社,1958 年。

广东省博物馆,《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年。

广东省博物馆、电白文化局,《广东电白县霞洞墟唐墓简报》,《考古》,1986 年,第一期,页 48—50。

广东省博物馆、高明县文物普查办公室,《广东高明唐代窑址简报》,《考古》,1993 年,第九期,页 809—814。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广州西村窑》,香港,香港中文

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87 年。

GYLLENSVÄRD, Bo, "Recent finds of Chinese ceramics at Fostat II"(福斯塔特新发现的中国瓷器 II),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47, 1975, p. 93 – 117.

HARDY-GILBERT, Claire & ROUGEULLE, Axell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Islamic period in Yemen: 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French expedition 1993"(也门伊斯兰时期考古研究——1993 年法国考察简报), *Proceeding of the Seminar for Arabian Studies*, 25, 1995, p. 29 – 44.

HARDY-GILBERT, Claire & ROUGEULLE, Axelle,《Ports islamiques du Yémen. Prospections archéologiques sur les côtes yéménites 1993—1995》(也门伊斯兰时期港口——1993—1995 年也门沿海考古调查), *Proceeding of the Seminar for Arabian Studies*, 27, 1997, p. 129 – 140.

HARDY-GILBERT, Clair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t al-Shihr, the Islamic port of Hadramawt, Yemen (1996—1999)"(1996—1999 年也门哈达拉毛省伊斯兰时期席赫尔港口遗址的考古研究), *Proceeding of the Seminar for Arabian Studies*, 31, 2001, p. 69 – 79.

HARDY-GILBERT, Claire & DUCATEZ, Guy,《Al-Shihr, port du Hadramawt sur l'océan Indien》(席赫尔,印度洋上哈达拉毛省的港口), *Annales islamologiques*, 38, 2004, p. 95 – 157.

HO Chuimei(何翠媚), "The Ceramic Boom in Minnan during Song and Yuan Times"(宋元时期闽南陶瓷业的繁荣), SCHOTTENHAMMER, Angela,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Maritime Quanzhou, 1000—1400*, Brill, Leiden, Boston, Köln, 2001, p. 237 – 282.

HORTON, Marc, *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尚加——东非沿海一个伊斯兰贸易社会的考古), London, The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 Africa, 1996.

HOURANI, George Fadlo, *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印度洋上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阿拉伯航海业),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5.

HUGUES-STANTON, Peneloppe & KERR, Rose, *Kiln Sites of Ancient China. Recent Finds of Pottery and Porcelain*(新近中国窑址出土的陶瓷片), London,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80.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景德镇湖田窑 H 区附属主干道发掘简报》,《文物》,2001 年,第二期,页 42—62。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乐安县博物馆,《江西九江市乐平县发现宋墓》,《考古》,1984 年,第八期,页 733—736。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南丰县博物馆,《江西南丰县桑田宋墓》,《考古》,1988 年,第四期,页 318—317。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赣州地区博物馆、赣州市博物馆,《江西赣州七里镇窑址发掘简报》,《江西文物》,1990 年,第四期,页 3—23。

靳枫毅、徐基,《辽宁建昌龟山一号辽墓》,《文物》,1985 年,第三期,页 48—55。

九江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江西九江北宋墓》,《文物》,1990 年,第九期,页 19—21。

KAMEI, Meitoku (亀井明德), "Chronology of Longquan Wares of the Song and Yuan periods"(宋元时期龙泉窑瓷器的分期), HO Chuimei, ed., *New Light on Chinese Yue and Longquan Wares. Archaeological Ceramics Found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sia, A. D. 800 - 1400*, Hong Kong, The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4, p. 46 - 84.

LAM, Peter Y. K. (林业强), "Decorative techniques and motifs in Guangdong trade wares of the Song Dynasty"(宋代广东贸易瓷器的装饰技术和纹饰), BROWN, Roxanna, M. 1989, p. 47 - 59.

L'HOUR, Michel, dir., *La Mémoire engloutie de Brunei*(沉落的文莱记忆), Paris, Edition Textuel, 2002.

廖大轲,《宋代包买商人的考察》,《江淮论坛》,1990 年,第二期,页 4—14。

李宝平,《浙江龙泉宋元时期瓷器手工业遗存初步研究》,《东方博物》,2002 年,第七期,页 56—65。

李海根,《赣州七里窑乌头塘出土瓷器》,《江西文物》,1990 年,第四期,页 24—30。

LIN Shimin (林士民), "Zhejiang export green glazed wares: Ningbo data"(外销浙江青瓷:来自宁波的资料), HO Chuimei, ed., 1994, p. 141 - 168.

刘新园,《景德镇湖田窑各期典型碗类的造型特征及其成因考》,《文物》,1980 年,第十一期,页 50—60。

刘新园,《景德镇宋元芒口瓷器与覆烧工艺初步研究》,《考古》,1974 年,第六期,页 39—52。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 年。

MASON, R. & KEALL, E. J., "Provenance of local ceramic industry and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imports: petrography of pottery from medieval Yemen"(当地陶器的产地和进口陶器的特征:也门出土的中世纪陶片的岩相分析), *Antiquity*, 62, 1988, p. 452 - 463.

MEHREN, F., *Al-Dimashqî*, *Nukhbat al-Dahr fi'ajâ'ib al-barr wa-l-bahr*(迪马斯基《海陆奇迹荟萃》), trad., Manuel de la cosmographie du Moyen-Âge, Copenhague, 1874.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陈国公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年。

彭善国,《辽代青白瓷器初探》,《考古》,2002 年,第 12 期,页 1120—1130。

彭适凡、范凤妹,《宋元纪年青白瓷》,香港,庄良出版社,1998 年。

彭适凡、唐昌朴,《江西发现几座北宋纪年墓》,《文物》,1980 年,第五期,页 28—33。

PIACENTINI, V., "Merchants, merchandises and military power in the Persian Gulf"(波斯湾的商人、商货和军事势力), *Atti delle Accademia Nazionale del Lincei*, Memorie serie IX, III/2, 1992, p. 163 - 167.

PIACENTINI, V., "Merchant familles in the Gulf. A mercantile and cosmopolitan dimension: the written evidence (11—13th Century A. D.)"(波斯湾的商人家族——从公元 11—13 世纪文献资料看其商业化和国际化), *Proceedings of Aram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ultural Interchange in the East of the Arabian Peninsul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1999—2000, p. 143 - 157.

PIRAZZOLI-t'SERSTEVENS, Michèle(毕梅雪), "Chinese Ceramics Excavated in Bahraîn and Oman"(巴林和阿曼出土的中国瓷器),《三上次男博士喜寿纪念论文集考古编》,东京,平凡社,1985 年,页 315—335。

PIRAZZOLI-t'SERSTEVENS, Michèle,《La céramique chinoise de Qal'at al-Suhâr》, *Arts Asiatiques*, 43, 1988, p. 87 - 105,中文版见程存浩译,《苏丹国苏哈儿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海交史研究》,1992 年,第二期,页 100—116。

PIRAZZOLI-t'SERSTEVENS, Michèle,《Une denrée recherchée : la céramique chi-

noise importée dans le golfe arabo-persique, IXe—XIVe siècles》(一种紧俏商品:9—14 世纪进口阿拉伯波斯湾的中国瓷器), *Mirabilia Asiatica*, 2, 2005, p. 69 - 88.

PRADINES, Stéphane, *Fortifications et urbanisation Swahili: l'exemple de la cité de Gedi*(斯瓦希里人的城市规划和军事建筑:以给地城遗址为例), Le Caire,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2006(待发表).

RANKING, G. S. A. & AZOO, R. F., *Ahsan al-Taqâlîm fi ma'rufati-l-aqâlîm*, *al-Muqaddasî*(《挚友书信集》,穆卡迪西), Calcutta, Bibliotheca Indica,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1897.

RIDHO, A. & MCHINNON, E., *The Pulau Buaya Wreck*(布亚岛沉船), Monograph Series n. 18, Jakarta, The Ceramic Society of Indonesia, 1998.

ROUGEULLE, Axelle, *Les importations extrême-orientales trouvées sur les sites de la période abasside :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u commerce moyen-oriental au Moyen-Age*(阿拔斯时期遗址出土的远东瓷器:对中世纪中东贸易史研究的贡献),巴黎第四大学博士论文,未发表,1991。

ROUGEULLE, Axelle, "Le Yémen entre Orient et Afrique: Sharma, un entrepôt du commerce médiéval sur la côte sud de l'Arabie"(东方与非洲之间的也门:舍尔迈,阿拉伯半岛南部沿海的一个中世纪贸易中转港口), *Annales Islamologiques*, 38, 2004, p. 201 - 253.

ROUGEULLE, Axelle, "The Sharma horizon. Sgraffiato wares and other glazed ceramics of the Indian Ocean trade (c. AD 980—1140)"(舍尔迈时期——公元980—1140 时期印度洋贸易中的剔花陶器和其他釉陶器), *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for Arabian Studies*, 35, 2005, p. 223 - 246.

瑞昌县博物馆,《江西瑞昌发现两座北宋纪年墓》,《文物》,1986 年,第一期,页70—7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耀州窑博物馆,《宋代耀州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

深圳博物馆,《广东深圳宋墓清理简报》,《考古》,1990 年,第二期,页 131—134。

Southeast Asian Ceramic Society, *A Ceramic Legacy of Asia's Maritime Trade: Song Dynasty Guangdong Wares and Other 11th—19th Century Trade Ceramics Found on Tioman Island*(亚洲海上贸易的陶瓷遗产:雕门岛发现的宋代广东瓷器和其他 11—19 世纪的贸易陶瓷), Kuala Lumpur, Southeast Asian Ceramic So-

ciety,1985.

STEVENSON, John & GUY, John, *Vietnamese Ceramics. A Separate Tradition*(越南陶瓷:一个别出一格的传统), Chicago, Art Media, 1997.

TAMPOE, Moira, *Maritim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the Ceramics from Siraf*(中国和西方的海上贸易:西拉夫遗址出土陶瓷器的考古研究), Oxford,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555, 1989.

无锡市博物馆,《江苏无锡兴竹宋墓》,《文物》,1990 年,第三期,页 19—22。

吴兴汉,《试论包拯家族墓出土瓷器窑口及相关问题》,《文物研究》,1995 年,第 10 期,页 11—28。

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广东唐宋窑址出土陶瓷》,香港,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85 年。

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景德镇出土陶瓷》,香港,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92 年。

熊跃泉、贺世伟,《湖泗窑初探》,《中国古陶瓷研究》,1997 年,第四辑,页 219—225。

薛尧,《江西南城、清江和永修的宋墓》,《考古》,1965 年,第十一期,页 571—576。

YUBA, Tadanori (弓场纪知), "Chinese ceramics found in al-Fustat, Cairo, 9th to 16th century"(开罗福斯塔特出土的 9 世纪至 16 世纪中国瓷器), *Taoci*, 4, 2005, p. 87 - 94。

曾凡,《福建陶瓷考古概论》,福州,福建省地图出版社,2004 年。

ZHAO Bing (赵冰),《Traduction annotée du *Taoji*》(《陶记》译注), CABRERO, Gilles, dir., *La splendeur du feu. Chefs-d'œuvre de la porcelaine chinoise de Jingdezhen du XII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 Centre culturel de Chine, 2004a , p. 182 - 199.

ZHAO Bing (赵冰),《La céramique chinoise importée à Sharma (Hadramaut) au Yémen》(输入也门哈达拉毛省舍尔迈遗址的中国瓷器), *Annales Islamologiques*, 38, 2004b, p. 255 - 284.

ZHAO Bing (赵冰) & LOMBARD, Pierre,《La céramique chinoise importée avant 1500 à Qal'at al-Bahreïn: fouilles française 1989—2002》(1989—2002 年法国考古队发掘巴林城堡遗址出土的公元 1500 年以前的中国瓷器), *Taoci*, 4,

2005, p. 105 - 116.

镇江市博物馆、溧阳县文化馆,《江苏溧阳竹箦北宋李彬夫妇墓》,《文物》,1980年,第五期,页35—44。

浙江省博物馆编,《浙江纪年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越窑寺龙口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十一期,页23—4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寺龙口越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省博物馆,《福建水吉北宋建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十二期,页1095—1089、1089。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与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研究

刘庆柱　著

一　关于当前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研究

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研究，是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重要学术课题。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中国科技部先后启动了国家重点课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学术任务是解决“中华文明”之“源”，也就是现代意义下的中国国家区域范围之内的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问题。这里我把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中国家历史形成的“过程”与“结果”来理解。

“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其实质就是“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这里的“文明”与一般意义上的“文明”不同，它（“文明”）是相对“野蛮”而言的。“文明”是对“野蛮”的否定，“文明”与“野蛮”均为政治概念。“文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国家”，国家是由“政府”（包括军队）来体现的，“文明”是“有政府”的，“野蛮”是“无政府”的。

正如“文明”的实质是政治问题一样，“文明”的政治“组织”——国家及其政府属于政治范畴，它是通过对其占有空间及其空间范围之内人与资源的管理来实现的。其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在其国家管理、统治中心的“城”、“都城”中完成的。“城”、“都城”中的“宫殿”、“宗庙”及其他“官署”是政府管理、统治国家的活动平台。青铜礼器与兵器、作为礼器的玉器、文字等是国家统治者管理、统治国家的重要工具。“城”或“都城”附近的“王陵”或“陵墓”是国家统治者历史缩影的遗存。以上的“城”、“都城”、“宫殿”、“宗庙”、“官署”、青铜礼器、

作为礼器的玉器、青铜兵器、文字、陵墓等遗址、遗迹与遗物是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物化载体，是国家及其政府历史活动的“物质遗存”。我们可以通过考古学科学“提取”上述“物化载体”、“物质遗存”，从而进行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

关于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时代与空间，现在学术界一般是依据“古史传说”的记载，认为活动于豫西地区的夏王朝[1]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或“王国”[2]。在此之前又有晋南地区的“尧都平阳”，这应该是“古史传说”中的前“王国”时代或“邦国”（或称“方国”）时代，我理解这是从“野蛮”向“文明”社会的“过渡时代”。上述的“古史传说”内容，是现在学术界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研究的基本时空构架。“古史传说”不是后人的凭空想像，它是我们的先人世代相传的“文化遗产”，在其流传的历史过程中，不断溶入“时代特色”，但是其中至今仍然保留着一些重要的真实历史信息，如重大历史事件的时空问题，这已是被近代以来的考古学发现所证实的了。这就是为什么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考古学家，必须加强“史学意识”的原因所在。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时代，没有当时留存下来的、可供参考的历史文献资料。“古史传说”均为以后历代“追记”而成，其科学性、完整性、系统性都存在问题，仅仅或主要依据这些“古史传说”资料，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是不可能的。即使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时空”问题研究，“古史传说”也只给人们提供出“时空”的框架“线索”，而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时间、空间、内容、过程等历史发展的具体化、科学化研究则需要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来解决，其中考古学应该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主战场与主力军。

文明形成时期的国家及其政府的“物化载体”、“物质遗存”是：城、宫城、都城、宫殿、宗庙、官署、国家统治者的陵墓、青铜礼器与兵器、作为礼器的玉器、文字等遗址与遗物，随着历史的远逝，它们已沉睡于地下，成为今天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宝贵资料。因此，对上述考古学对象的考古调查、发掘成为研究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基本内容，田野考古成为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学术突破口和主要探索与研究手段。

在田野考古中，研究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学术切入点与重点是城址考古、都城遗址考古。中国古代早期城、都城是其所管辖地域范围之内的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经济管理中心与文化礼仪活动中心。有的学者把中国古代早

期(即古代文明形成时期)城与都城的出现视为农业与手工业、农业与工商业分工的"二元"产业对立产物,视为城乡分化的"二元"社会对立表现所致,这种看法是需要认真研究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古代的"城"、"都城"不是刚刚来到人间,就"少年老成",像传说中刚刚降生就长满了白胡子的哲人老子。

对于社会管理而言,"文明时代"与史前时代(即"野蛮时代")的根本区别在于地缘政治的介入与否。古代文明形成时期的社会管理,一方面继承史前时代"血缘政治"的社会管理,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新的文明时代"地缘政治"的社会管理。从本质上讲,地缘政治是对血缘政治的否定,地缘政治不能建立在以血缘为基础的"聚落"之内。"城"、"都城"是地缘政治的产物,"城"、"都城"中的宫殿和官署建筑是地缘政治活动的平台;宗庙是血缘政治在文明形成、国家出现时代的政治舞台。考古学从宗庙与宫殿两种建筑遗址,探索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的社会管理问题或国家管理(或统治)问题。从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的发展是渐进的,中国古代城址、都城遗址的考古学研究已揭示出这一变化。如从王国时代都城的宫城之内的宫庙并列,到帝国时代大朝正殿位于都城之宫城中心位置,宗庙移出宫城,处于"次要"地位,这就反映出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的消长过程。

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时期的城址、都城遗址要有城墙遗迹,但是有"墙"不见得就是"城",是否是"城"、"都城"还要考虑其内涵,即有无宫殿、宗庙遗址等。但是,"城"、"都城"必须有"城墙",否则不能称其为"城"或"都城"。

现在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技术路线是以历史传说为基础性时空框架,以田野考古资料与研究成果为基本内容,由后向前与由前向后双向探索。前者是从早商的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向前探索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又从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探索比其更早的、与其考古学文化有着直接渊源关系的重要城址或都城遗址;后者是从传说时代夏商王国中心地区的豫西、晋南一带的仰韶文化,向下探索河南龙山文化,再从早期河南龙山文化探索晚期河南龙山文化,直至从考古学文化编年系列中找到与二里头文化的衔接点。科学实践证明,这样一种技术路线的实施,选择城址与都城遗址考古是十分必要与可行的。

二 关于中国古代都城遗址的考古研究

中国古代都城遗址考古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很长的历史。中国学术机构独立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于1928年,其发掘地点就是商代

都城——安阳殷墟遗址。由于当时学术界“疑古”的流行，中国古代历史被认为“东周以上无史”（胡适语），至于历史上的商代的存在更是被否定，因此该遗址的考古发现，引起了当时国内外学术界的轰动。殷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确定，主要原因是19世纪末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及其在学术界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一考古工作最初的重要目的是寻找更多甲骨[3]。1931年，梁思永参加李济、董作宾分别主持的殷墟第四、五次发掘，从学术目的和方法两个方面使殷墟遗址考古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们把解决殷墟的城址布局作为主要学术任务。为辨识城址中的建筑基址，他们首次在田野考古中发掘出夯土建筑基址，这在中国古代城址考古中有着划时代的重大学术意义。1932—1934年的第六次至第九次殷墟发掘，进一步积累了古代建筑基址考古发掘的经验。1934—1935年候家庄西北岗10座商代王陵和千余座祭祀坑的发掘，1936—1937年的第十三、十四、十五次殷墟建筑基址的全面揭露，为中国古代都城遗址考古的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初步基础，在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确立了商代历史存在的科学结论，成为当时及其后世界学术界公认的最早的中国古代文明[4]。与殷墟考古发掘同时进行的比较重要的田野考古工作还有1930年马衡先生主持的燕下都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等[5]。

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全国各地基本建设的大规模开展，为了保护民族历史文化遗产，郑振铎、梁思永、夏鼐等先生，把中国古代都城遗址考古工作，放在全国考古工作的突出位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中国著名古代都城所在地西安、洛阳和安阳，分别建立了研究室或工作站，开展了安阳殷墟[6]、西安丰镐[7]、洛阳东周王城[8]、汉长安城[9]、汉魏洛阳城[10]、隋大兴城唐长安城[11]、隋唐洛阳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12]。60年代以后，都城遗址考古又有新的扩展，偃师二里头遗址[13]、偃师商城[14]、郢城[15]、南宋临安城、金中都和元大都[16]等都城遗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在历史时代上使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向早晚两个方面大大延伸。与此同时，河南、陕西、河北、山东、湖北、山西、广东、福建、云南、黑龙江、内蒙古等省、自治区的考古工作者，相继开展了郑州商城[17]、黄陂盘龙城商代城址[18]、曲阜鲁国故城[19]、侯马晋国都城[20]、秦咸阳城[21]、凤翔秦雍城[22]、新郑郑韩故城[23]、临淄齐故城[24]、安邑故城[25]、楚纪南城[26]、易县燕下都[27]、邯郸赵故城[28]、广州南越国宫城[29]、福建崇安汉城[30]、云南大理南诏国都太和城[31]、渤海上京龙泉府[32]、辽中京[33]、辽上京[34]、元上都[35]、元中都[36]等城址的考古工作。这些考古工作为从晚到早、由近及远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代的都城遗址，积累了田野考古

资料，创造了科学研究条件。这一时期都城遗址考古发现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与二里头遗址，把中国古代文明从商代晚期的殷墟，向上推至商代早期乃至夏代中晚期。

除了古代都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之外，近半个世纪以来还对一般古代城址进行了大量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研究热潮的兴起，在史前聚落考古研究的基础上，史前城址考古提到了学术发展的日程上来。史前城址发现的各类报道相继出现，多达数十座，其时代从龙山文化推至仰韶文化、大溪文化。如大溪文化的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37]，仰韶文化晚期秦王寨类型的河南郑州西山城址[38]，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山东滕州西康留城址[39]，龙山文化的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40]、丁公城址[41]、田旺城址[42]、边线王城址[43]、五莲丹土城址[44]、阳谷景阳岗城址[45]、茌平教场铺城址[46]，河南龙山文化的淮阳平粮台城址[47]、登封王城岗城址[48]、辉县孟庄城址[49]，山西襄汾陶寺城址[50]，屈家岭文化的澧县鸡叫城[51]、江陵阴湘城[52]、石首走马岭城址[53]、荆门马家垸城址[54]，石家河文化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55]，见于报道的成都平原史前城址主要有新津宝墩[56]、温江鱼凫城、郫县梓路、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城等城址[57]，此外，内蒙古中部也发现大量史前石城城址[58]。这些城址的考古工作大多仅调查、勘探了城墙、城壕，有的对城内的房屋建筑基址、夯土遗迹进行了一些勘探或小面积的揭露，更多的考古工作有待进一步开展。尽管如此，上述城址考古工作的开展，为从早到晚、从远到近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时期的城址及都城遗址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它们的地望、时代与文化内涵，在从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遗址向上追溯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学术意义。

中国古代城址、都城遗址考古经过 70 多年来的田野考古工作实践，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这主要表现在发现了一批古代城址、都城遗址，其分布范围几乎遍布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其时代上下约 5000 年左右；其类型繁多，有历史时期的王国或帝国都城遗址、各地的中等城址（仅小于王国或帝国都城遗址的城址）、县城或其他城址，还有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的城址。

在半个多世纪古代城址、都城遗址的田野考古中，长期以来主要开展的是历史时期都城遗址考古，积累了一些经验，摸索出一些方法，总结出一些规律。古代都城是古代城市的最高形式，也是最为复杂的城市形式。古代都城考古对古代城址考古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从以往的都城遗址考古研究中，我们认识到，

城址考古是个系统工程，要有全面、严格的技术保障路线。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尤其要强调“宏观”与“微观”结合、“点”与“面”结合，学术研究的重点应突出“城”的布局、结构等“宏观”和“面”上的特点，以及这些重大“制度”的渊源与流变所反映出来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历史问题。因此，在中国古代城址、都城遗址考古中，首先究明城址、都城遗址范围是必要的，调查、勘探城墙、城壕是城址考古的切入点，勘探城址、都城遗址之内的古代主干道路是探索城址布局的前提。城址、都城遗址宫庙区的调查、勘探和重点发掘是城址考古的重点，是界定城址、都城遗址性质的关键，是探讨城址、都城遗址政治变化的核心。这些在历史时期都城遗址考古工作中尤为突出，在开展古代文明形成时期的城址考古工作中也是十分重要的。对于都城遗址考古而言，上述考古方法更为重要，多年来我们正是根据上述理论和方法开展都城遗址考古工作的[59]。1994 年 11 月 25—30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洛阳召开的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术研讨会上，我们提出，先秦都城遗址考古在基本完成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学研究基础上，也要与汉唐都城考古一样，在究明城址范围的前提下，将开展城址布局结构研究作为其首位任务，考古工作的重点应是确定城址范围并究明其变化以及勘探、发掘宫庙遗址[60]。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都城遗址考古中，贯彻了上述都城考古的学术规划，先后取得了学术上的重大进展：偃师商城宫城全面发掘、早期郭城的发现，山西襄汾陶寺城址的发现与城内宫殿建筑遗址的勘探、“观天授时”性质建筑遗址的发掘，安阳洹北商城的发现和宫庙区发掘，偃师二里头遗址宫庙区道路勘探、宫城范围确定和早期宫庙发掘等，这些对我们全面了解夏商时代都城布局形制、进一步探索夏王朝之前的重要城址至关重要。从认识论角度来看，对夏商时代都城的了解，是研究夏代以前城址的钥匙与阶梯。陶寺城址、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洹北商城遗址的田野考古，使我们看到了从龙山时代到夏商时期，作为当时的地域（即“邦”）或国家（即王国）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的城或都城及其宫殿、宗庙、官署、官手工业作坊、陵墓等遗址、遗迹的特点。

都城考古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龙头课题。“都城”是从“城”发展而来的，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城址考古是进一步深入研究古代都城所必须的，同时这也是当前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中的关键性考古学课题。近年史前城址考古非常活跃，新发现不断见诸报道，发现的城址时代越来越早。现在从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加强对古代城址（尤其是史前城址）的研究已十分迫切。

从理论上看，关于中国古代早期“城”的出现还要进行理论的研究。如果说古代东方“城”的本质是政治性的，那么“城”应该是“政治”发展的产物，这个“政治”就是“国家”。最早“国家”的人格化代表是“君”，也就是当时的社会统治者和管理者，因此古代文献有所谓“城以卫君”的记载。严格意义上说，早期“城”即“国”，《周礼·考工记》中的“国”就是“城”。这种“城”是统治者的活动场地，老百姓不可能在这里生活。后者的生活空间在“郭”中，古代文献记载的“郭以居民”就表明了这点。

与“城”相连的是“非城”的居民的问题。传统认为“城”是相对“乡”（即“农村”）而存在的，我认为就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国家出现来说，中国古代早期“城”的出现，不是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结果，更不是由于商业贸易发展的结果，它们与“城乡分化”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中国古代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经济类型——商业贸易与农业的真正分离是帝国出现以后的事情，而与古代文明形成、国家出现没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认为，君王是统治“人民”的，“人民”概念的主体是农民。从政治地位上讲，作为手工业者的“工”和从事商业的商人都是低于“农民”的，“工”和“商”更不是统治者中的一部分。在当前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研究中，将古代地中海文明研究中的强调城市人口数量的众多、农民与手工业者、商人的分化模式予以套用，是否合适值得深思。我认为中国古代早期城址中不应有大量“民居”遗址，城址中发现的诸如青铜器、玉石器等众多手工业遗物及遗迹，不应视为手工业与农业分化的证据，而是“工”在“官”的“中国特色”，这些手工业产品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不是面向全社会的，不是作为流通的商品，也不是用于农业生产的（主要作为礼器或兵器用于礼仪祭祀、战争）。

城址的学术概念要有明确界定，不能一发现墙垣和壕沟就认定为“城”，一般讲“城”有城墙、城壕，但是不能认为有墙垣、壕沟就是“城”，因为有的村庄、城堡也有墙垣、壕沟。中国古代早期城址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性的，其物化体现为大型夯土建筑遗址，它们不是史前时代的“大型公共建筑”，而应为“宫殿”、“宗庙”、“官署”等建筑遗存。作为政治在考古发现中的物质载体，其科学界定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种事物自身都是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人们对各种事物的认识也是逐渐深入的，我们必须遵守从已知到未知的认识论。即使人类的“原始创新”，也是在已有知识阶梯之上继续向上攀登。对于“城”、都城及其相关的“宫殿”、“宗庙”、“官署”等考古发掘、研究的文明的物化载体，都要一步一步由

近及远、从已知到未知，这样得到的结论才是比较可靠的。

〔注　释〕

1 《逸周书·度邑》："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1995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卷五，页44。《国语·周语》载："昔伊洛竭而夏亡"；《国学基本丛书·国语卷一·周语上》，商务印书馆，1958年，页9。

2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夏"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页818。

3 董作宾，《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安阳发掘报告》，第一册。

4 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史论纲》，《考古学集刊》，第16集，2006年（待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

5 傅振伦，《燕下都发掘报告》，《国学季刊》，第3卷1期，1932年。

6 同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陕西长安沣西客省庄西周夯土基址发掘报告》，《考古》，1987年，第8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镐京西周宫室》，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

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

9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考古》，1996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汉礼制建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著，《汉长安城武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

10 刘庆柱，《北魏洛阳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兼谈北魏洛阳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的地位》，《中国史研究》（韩国），第40辑，中国都市史特辑号，中国史学会（韩国）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汉魏洛阳城的调查与发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洛阳市文物局、洛阳市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汉魏洛阳故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

11 龚国强，《唐长安城考古述要及今后工作的几点设想》，西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编，《论唐代城市建设》，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12 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编，《洛阳考古集成·隋唐五代宋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杜金鹏、许宏主编,《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许宏等,《二里头遗址发掘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考古》,2004年,第11期。

14 杜金鹏、王学荣主编,《偃师商城遗址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杜金鹏、王学荣,《偃师商城近年考古工作要览——纪念偃师商城发现20周年》,《考古》,2004年,第12期。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临漳县邺北城遗址勘探与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临漳县邺南城遗址勘探与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3期。

16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金中都》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

1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1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19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

2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晋都新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2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刘庆柱,《论秦咸阳城布局形制及其相关问题》,《文博》1990年第5期。

22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陕西雍城钻探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韩伟,《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合刊。

23 河南省博物馆新郑工作站,《河南新郑郑韩故城的钻探和试掘》,《文物资料丛刊》,1980年,第3辑。

24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页3399—3403。

25 陶正刚等,《古魏城和禹王城调查简报》,《文物》,1962年,第4—5期合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夏县禹王城调查》,《考古》,1963年,第9期。

26 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考古学报》,1982年,第3、4期。

2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28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赵都邯郸故城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1984年,第4集。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2000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第2期。

30 福建省博物院、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发掘报告》(1980—1996),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年。

31 李昆声,《南诏大理城址考》,《云南考古学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页 622—6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六顶山与渤海镇》,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年。

33 辽中京发掘委员会,《辽中京城址发掘的重要收获》,《文物》,1961 年,第 9 期。

34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上京城址勘查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

35 贾洲杰,《元上都调查报告》,《文物》,1977 年,第 5 期。

36 任亚珊等,《元中都考古取得重大进展》,《中国文物报》,1999 年 12 月 29 日。

37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3 年,第 12 期;蒋迎春,《城头山为中国已知时代最早城址》,《中国文物报》,1997 年 8 月 10 日。

38 张玉石、杨肇清,《新石器时代考古获重大发现:郑州西山仰韶时代晚期城址面世》,《中国文物报》,1995 年 9 月 10 日。

39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滕州市西康留遗址调查发掘简报》,《考古》,1995 年,第 3 期。

40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城子崖遗址又有重大发现,龙山岳石周代城址重见天日》,《中国文物报》,1990 年 7 月 26 日。

41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山东邹平丁公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 年 1 月 12 日;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 年,第 4 期。

42 魏成敏,《临淄区田旺龙山文化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 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年。

43 杜在忠,《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1988 年 7 月 15 日。

44 王学良,《五莲县史前考古获重大发现》,《日照日报》,1995 年 7 月 8 日。

45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阳谷县景阳岗龙山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7 年,第 5 期。

46 资料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

4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 年,第 3 期。

4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年。

49 袁广阔,《辉县孟庄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 年 12 月 6 日。
50 何驽、严志斌,《黄河流域史前最大城址进一步探明》,《中国文物报》,2002 年 2 月 8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队,《2002 年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3 年,第 5 期。
5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3 年,第 12 期。
52 江陵县文物局,《江陵阴湘城的调查与探索》,《江汉考古》,1986 年,第 1 期。
53 张绪球,《石首市走马岭屈家岭文化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年。
54 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马家垸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文物》,1997 年,第 7 期。
55 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 5 辑,1992 年。
56 成都市文物考古队,《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7 年,第 1 期。
57 《成都平原发现一批史前城址》,《中国文物报》,1996 年 8 月 18 日。
58 田广金,《内蒙古长城地带石城聚落址及相关诸问题》,《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 6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93 年。
59 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考古》,1996 年,第 10 期。
60 王立早,《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洛阳召开古代都城考古研讨会》,《中国文物报》,1995 年 1 月 8 日第二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洛阳召开古代都城考古研讨会》,《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 年)第 268 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年。

基美博物馆所藏令簋的年代

李学勤　著

法国巴黎的基美博物馆[1]，收藏中国古代青铜器非常丰富，其中尤以一对令簋最为著名[2]，堪称在欧洲的中国青铜器的翘楚，历来受到学者和艺术家的重视。

令簋系于1929年河南洛阳东北的邙山马坡出土[3]，当地是西周王朝的墓葬群。同出的还有令方尊和令方彝，属于一个器主。方尊现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4]，方彝在美国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5]。

形制特异，装饰瑰丽，是令簋的特点。两件簋都已失盖，由器上子口的锈蚀状况看，在埋藏地下时便已分离，或许簋盖没有入土也未可知。簋是有方座的，口沿下饰顾首的长鸟纹，双耳上有兽首，下有垂珥，腹饰勾连纹，足饰蝉纹。足下方座饰鸟纹，并加镂孔。完全和令簋相似的器物，在西周早期迄今还不曾发现过。更值得注意的，是令簋内底有长达111字的铭文，不仅书法雄肆，内容更为重要。

和众多珍贵青铜器及其铭文一样，学者们对于令簋在研究中有一些分歧，其间最集中的是器的时代。早在令器出土后不久的1930年，罗振玉在考释令方彝时指出其时代是周昭王，后来继续其说的有吴其昌、唐兰等先生；另外主张其时代是成王的，则有郭沫若、陈梦家及日本学者白川静等先生[6]。由于令器在青铜器分期研究中关系重大，所以这一分歧对分期，特别是西周早期青铜器的划分有明显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性的。

在很长的时间里，学者关于令器时代的讨论，都只依靠铭文，而各家解释不同，难以折衷统一[7]。这种情形，到上世纪晚期才有所改变。1976年，在陕西扶风庄白发现一号青铜器窖藏，出土器物103件，包含木羊氏（后称微氏）一家四个世代的制作[8]。窖藏里的析尊、析方彝、析觥、析斝[9]的器主析，从同出的史墙盘铭文可以推定其活动时代在昭王朝，而析方彝的形制纹饰与令方彝十分接近[10]，这就为判断令器的时代提供了类型学的依据。现在，令器属于昭王已成为学界

的共识。

确定令器和析器是同时的，就使他们的铭文所反映的史事凸显出来。例如令簋铭文记载“惟王于伐楚”，正与《左传》僖公四年、《吕氏春秋·音初篇》、《史记·周本纪》等文献相合。古本《纪年》有这样几条：

> 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
> 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
> 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11]。

而上面提到的史墙盘铭文说到周朝列王的功业，其中有“弘鲁昭王，广𢦏(惩)楚荆，惟𠂤南行”，1993 年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遝(佐)盘，也提及昭王“翦伐楚荆”[12]。这些材料，较详细地记述了昭王伐楚的过程。

1996 年，多学科结合的年代学研究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其重要课题之一便是编排西周青铜器铭文的历谱。恰好在当时，日本出光美术馆的《馆藏名品选》第三集出版，书中编号 67 的青铜器静方鼎，是以往大家不曾见到过的。静方鼎铭文的内容，可以同前述析尊等，以及十三月中方鼎、趞尊、趞卣、睘尊、睘卣等联系。这些器铭多有历日，析尊等还明记“十又九祀”，睘卣记“十又九年”，从而能够推算其确切年代。

“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推定周穆王元年为公元前 976 年[13]。古本《纪年》讲了昭王十九年的灾异，随之“丧六师于汉”，可知昭王南征不返，其纪年只有十九年。把昭王十九年定为公元前 977 年，对照历表[14]，不难将有关器铭列进昭王十八、十九两年：

十八年 (公元前 978 年)	十月癸亥朔，初二日甲子	王在宗周，命师中暨静省南国相(湘)(静方鼎)
十九年 (公元前 977 年)	五月	王在庠(析尊等)
	六月己未朔，三十日戊子	命析貺望土于相(湘)侯(析尊等)
	八月戊午朔，初吉初三日庚申 月既望二十日丁丑	静至，告于成周(静方鼎) 王在成周大室，锡静采(静方鼎)
	十三月丁亥朔，初四日庚寅	王在寒次，锡采于中(中方鼎)

初五日辛卯　　王在庠，锡趞采
（趞、尊、卣）
王在庠，王姜命晨安夷伯
（晨、尊、卣）

由此知道，昭王在其十九年的最后闰月仍然健在。他死在汉水，丧失六师，应在次年。这样，我们终于懂得古本《纪年》为什么说："周昭王末年"王南巡不返。"末年"不是昭王十九年，而是其次年，因为穆王继位，当年改元，本来是昭王"末年"就成了穆王元年了。

令方尊、方彝的历日正可排入昭王"末年"，即穆王元年，公元前976年：

八月壬午朔，月吉初三日甲申　　王命周公尹三事四方
十月辛巳朔，初三日癸未　　公朝至成周，舍三事四方令
初四日甲申　　用牲于京宫、康宫

这应该是穆王即位后的新举措。有关问题，我会在另一篇论文里详论。

那么，令簋应排在哪一年呢？依历日推算，当在昭王十五年，公元前981年。与之联系的还有諆鼎、諆簋、召尊、召卣等青铜器[15]：

十五年　　九月　　堆叔从王征楚荆，在成周（諆簋）
（公元前981年）
九月壬子朔，既死霸二十六日丁丑　　王伐楚，伯在炎（庸），令𨺅宜于王姜（令簋）
十月辛巳朔，十四日甲午　　伯懋父在炎（庸），锡召（召尊、卣）
十六年　　八月　　堆叔从王南征，惟归，在𩰫（諆鼎）
（公元前980年）

可以看出，昭王南征楚荆，就是在十五年九月这个时候开始的，而令簋记载了该次战争初期最重要的事迹。那时，作为战争指挥者的大臣伯懋父驻在炎，炎即古音相近的庸[16]，在今湖北竹山，正为向沮、漳一带楚国腹地进军的前沿。伯懋父在那里，至少到十月中旬。整个战役，到十六年八月已告结束，从王征战的人员，如堆叔，踏上了归途。

这些青铜器铭文，与古本《纪年》是非常吻合的。现在弄明白，昭王伐楚荆和南巡，是相衔接的两件事。据铭文，昭王十五年秋始伐楚国，他本人渡过汉水，

遇到大兕，如《纪年》所载，在十六年。十六年秋，战事终了。这是伐楚荆的过程。到十八年，昭王在宗周即王都镐京，又派遣中、静等臣属省察南国，整顿驻守当地的军队。十九年，昭王前往成周、庠、寒等地，赏赐众臣，到次年落得"南巡不返"，以悲剧收场。这也便是史墙盘说的"广惩楚荆，惟奂（意为盛大）南行"，前者是伐楚，后者是南巡。

由此，我们了解到，令簋是记述周昭王南征楚荆的重要青铜器，其历日据推算是昭王十五年（公元前981年）的九月二十六日。

〔注　释〕

1 全称"国立基美亚洲艺术博物馆"（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Guimet），馆名或译"吉美"、"吉梅"。

2 Maud Girard-Geslan, *Bronzes Archaïques de Chine*, Paris, Musée Guimet, 1995, p. 41–45.

3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上册，页30。

4 《商周青铜酒器》，图版三六，（台湾）故宫博物院，1989年。

5 John A. Pope *et al.*,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Washington, Freer Gallery of Art, 1967, vol. I, pl. 38.

6 白川静，《金文通释》，京都，白鹤美术馆，1964年，卷一上，二四、二五。

7 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

8 陕西周原考古队，《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

9 "析"字旧释"折"，今改正。

10 同7。

11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页43—44。

12 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141—142。

13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页26—27。

14 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

15 关于各器的出处，参看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28—29。

16 "庸"、"燄"字通，见高亨，《古字通假会典》，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页10。

“北方系青铜器”
——一个术语的“诞生”和“成长”

梅建军　著

学习中国考古学的人常常会遇到一些很有意思的术语或概念，比如“夷夏东西”、“动物纹饰”、“弓形器”和“北方系青铜器”等。这些术语因广为使用，往往给人一种约定俗成的印象。但你如果想在考古学辞典或百科全书中找到这些术语的确切定义，却往往会落空。如果你肯用些工夫考究一番，则会有些意想不到的收获。本文所述就是考究“北方系青铜器”这一术语或概念的一点收获，本想以“一个术语的学术史考察“为题，但斟酌再三，感觉还是以谈论“诞生”和“成长”来得直截了当。

“诞生”

追溯“北方系青铜器”这一术语或概念的“诞生”，一般都会追到著名考古学家、吉林大学的林沄教授那里。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林先生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题为《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这篇论文最初发表是 1982 年，是在张光直先生组织的一个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用英文发表的，后来收在张先生主编的名为《商代考古研究》(*Studies of Shang Archaeology*)的会议论文集中，于 1986 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而此文的中文原稿则要等到 1987 年才在苏秉琦先生主编的《考古学文化论集》第一集中发表。在这篇堪称经典的论文中，林先生就“北方系青铜器”这一概念的形成作了如下阐述：“从中国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在首先认识了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商周文化之后，开始逐步认识到北方地区还存在着与中原青铜器有别而自成一系的青铜器。进而认识到这种北方系青铜器，至少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分布在现时中

国国境以外很大的一片地域。"[1]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北方系青铜器"主要是基于跟"中原系青铜器"或"商周式青铜器"的对比而提出来的新概念,它体现的是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角度;二是"北方系青铜器"的分布范围很广,超出了现时中国的国境。事实上,在同一篇文章中,林先生就"北方系青铜器"的分布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在米奴辛斯克(Minusinsk)盆地和黄河流域之间,是一个广大的北方系青铜器的分布区,米奴辛斯克盆地只是这个分布区最北的一小部分,黄河流域则是这个分布区的最南缘。"由此可见,在林先生最初提出"北方系青铜器"这一概念时,他的视野其实并不限于中国的北方地区,而是向北延伸直至俄国西伯利亚的米奴辛斯克盆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乌恩先生也是研究北方青铜器的著名学者。1985 年他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题为《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2],文中指出:"商代晚期至西周初北方草原地带已出现有一组品类复杂、独具风格的铜器群,它们与传统的商周铜器有明显区别,显然不能划归商周文化的范畴,应分别属于目前尚未认识的北方青铜文化。"乌恩先生在文中虽然没有使用"北方系"一词,而仅以"北方"或"北方式"相称,但思路上跟林沄先生是完全相通的,都是着眼于把北方青铜器作为一个独立的类群,来探讨其文化渊源和属性及其与卡拉苏克(Karasuk)青铜器和殷商青铜器的关系。他所讨论的"商周之际北方青铜器"的分布同样也不仅限于我国北方,"有的器类的分布已远远超出现有国界"。但他基本上是把"我国北方青铜器"与"欧亚大陆草原其他地区的青铜器"区别对待的。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田广金和郭素新先生最初倾向于使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这一命名,"主要依据是在鄂尔多斯朱开沟遗址中,发现了早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他们看来,相当于殷至周初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内蒙古、晋陕高原、冀北及辽西地区,还包括新疆、蒙古和俄罗斯的外贝加尔等。他们还认为:"所谓'北方青铜器'和'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概念,今天看来难免过于笼统,束缚了我们对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渊源的探讨。"[3]但是最近,田先生发表了"中国北方系青铜器文化和类型的初步研究"一文,指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命名是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特征提出的,并认为:"'北方系青铜器'的命名应覆盖整个中国北方或更北的地区。在这样广阔的区域之中,实际上可能还存在着若干个文化。根据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在'北方系青铜器'文化大层次下,各地区不同时期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命名条件

已趋于成熟。"[4]这段话表明，田先生的看法跟早先相比已有所改变，他现在似乎基本认同并接受了"北方系青铜器"这一术语。

然而，"北方系青铜器"这一概念的"诞生"其实还有更深远的学术背景。追溯起来，早自上个世纪20、30年代，就已经有人开始留心收集并著录中国北方边境地区出土的小型青铜武器、工具和装饰品，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和关注。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和著录有罗斯托伏泽夫（Rostovtzef）《南俄和中国的动物风格》（1929）、安特生（Andersson）的《动物纹中的狩猎巫术》（1932）和《鄂尔多斯青铜器选》（1933）、萨里莫尼（Salmony）的《卢芹斋收藏的中国—西伯利亚艺术品》（1933）、水野清一和江上波夫的《绥远青铜器》（1935）等[5]。这一时期对北方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有多种不同的称谓，如"鄂尔多斯青铜器"和"绥远青铜器"，大体上是以青铜器的来源地命名；而"中国—西伯利亚艺术品"之称则意在强调来自中国的影响及其与西伯利亚之影响的融合。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梅原末治著有《古代北方系文物的研究》（1938）一书，其中将中国北方及蒙古一带所出铜剑和铜腹等都纳入"北方系文物"之范畴[6]。这一阶段的研究以采集品为主要对象，多数学者已注意到中国北方边境地区的青铜器跟南西伯利亚的青铜器在类型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并开始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有学者注意到中国北方跟南俄草原斯基泰文化（Scythian Culture）动物纹艺术的联系。

至40年代，随着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成果广为人知，安阳出土青铜器中的某些带动物纹饰的武器和工具也很快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关注的焦点是它们跟西伯利亚发现的标本非常接近以至类同。1945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arlgren）撰《殷代的一些武器和工具》一文[7]，认为安阳出土的带动物纹饰的青铜器标本跟西伯利亚所出的同类标本相关，但安阳的标本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1300年，而西伯利亚的对应器物仅出现在卡拉苏克时期，年代至多可断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因此安阳所出的标本早于西伯利亚的对应器物。换言之，后者的出现或受到了前者的影响。1949年，美国艺术史家罗越（Loehr）发表《安阳的武器和工具及西伯利亚的对应物》一文，对高本汉的主张提出反驳，认为安阳所出的带动物纹饰的青铜器物受到了来自北方草原游牧艺术的影响，而非相反，理由有三条：一、"动物风格"反映的是草原艺术，与商文化的礼器艺术风格截然不同；二、草原地带所见的带动物纹饰的青铜器并不仅限于卡拉苏克时期，也见于早于卡拉苏克时期的青铜文化，如相当于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时期（约公元前1600年）的塞伊玛（Seima）墓地和伽利希（Galich）遗址均出有柄

作动物头部造型的短剑;三、米奴辛斯克盆地所出青铜器就整体而言,没有显示出任何商周式青铜器影响的迹象,包括铜器的类型和纹样,但却有很多证据表明其与西方南俄草原的联系[8]。

1956 年,罗越出版《中国青铜时代兵器》一书[9],更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主张。他在书中单列一章"早期青铜时代的西伯利亚",专门讨论中国跟西伯利亚的早期联系。在全面考察了西伯利亚青铜时代的各个文化阶段之后,他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称之为"北方风格",既用以强调跟中国中原风格的不同,也刻意用来拉开跟西伯利亚青铜文化的距离。在罗越看来,尽管中国北方边境地带(如绥远和鄂尔多斯)所出青铜器跟南西伯利亚的铜器标本呈现出密切的联系,看上去就好像属于同一个文化体系,但不能把"北方风格"径直称作"西伯利亚风格",因为有些器物类型仅见于中国北方而不见于西伯利亚的米奴辛斯克盆地,如带管銎的斧、钺和戈等,这些器物可能另有来源,有的或许要追溯到更遥远的西方。基于这样的考虑,罗越在总结中国青铜时代兵器的来源时,给出了三个来源,即中国(中原)、俄国(西伯利亚)和(中国)北方。带有片状柄的斧、戈和短剑多为中国中原本土起源的兵器类型,竖銎斧和矛头应来源于西伯利亚,而有柄短剑、带横銎的斧、钺和戈则为出自中国北方的类型(尽管有的类型最终还可追溯到西亚)。罗越有关"北方风格"的见解对后来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10]。

1959 年,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Kiselev)来华访问时曾就"苏联境内青铜文化与商文化的关系"作过学术报告,认为塞伊玛文化在公元前 1600—1300 年间向东扩展,它的一些特征可能影响到中国境内商代某些器物形制的改变。后来,质量很高的商代青铜器又向邻近地区扩展其影响,最后达到相当远的地区,如苏联的外贝加尔地区[11]。换言之,文化的影响是互动的,最初是由西向东,继而是由东向西。就塞伊玛文化的影响方向而言,吉氏的看法跟罗越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吉氏认为商文化影响到了苏联境内的卡拉苏克文化。这一论断也对以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68 年,威廉姆 · 华生(Watson)在就任伦敦大学中国艺术和考古教授时作了题为"汉代以前的内陆亚洲和中国"的就职演讲,首次提出了"北方区带"(Northern Zone)的概念[12]。这是一个文化区域的概念,从地理上讲,它包括内蒙古(尤其是鄂尔多斯)、绥远以及山西和河北的北部地区,从文化特征上讲,它是所谓"北方风格"青铜器的发现地或分布区。华生将"北方区带"视作一个自身特征分明的青铜生产区,它存在于中原地区的北部边缘,从中原借用或吸取一些

技术、风格和观念，加以简化和改造，并跟当地土生土长的一些艺术母题或趣味相融合，形成新的器物类型和风格，然后再向草原地带传播。1971 年，华生出版《古代东亚的文化边界》一书[13]。在“隔离和接触”一章中，他进一步阐述了“北方区带”作为连接南西伯利亚和中国的中间枢纽的功用，认为它不仅有能力接纳、借用和改造外来的技术和观念，而且有能力作出原创性的发明，例如有柄短剑的发明。他还认为，在晚商时期，来自中国的武器和工具正是在“北方区带”得到改造后才传入内陆亚洲的。显然，“北方区带”这一概念跟罗越有关“北方风格”的认识是完全相通的，都着眼于把握中国北方边境地区出土青铜器的某些独特性，并为揭示中国跟南西伯利亚的文化联系的本质创造条件。关于中国跟西伯利亚的文化接触和交流，华生大体上采纳了吉谢列夫的观点，认为可以区分出早晚两个阶段：在早期阶段，中国跟遥远西方（西西伯利亚）的接触体现在矛头和竖銎斧上；而在晚期阶段，接触主要发生在南西伯利亚和中国的“北方区带”之间，涉及到的青铜器主要是柄端作动物头部造型的刀和短剑等。值得注意的是，华生认为竖銎斧是中国的发明，竖銎斧在塞伊玛文化遗址中的出现是中国技术由东向西传播的结果，尽管矛头可能仍起源于塞伊玛文化并由西向东传播。

1982 年，林沄先生在《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一文中首次提出“北方系”的概念。这篇论文最初是用英文发表的。有趣的是，译者顾道伟（David W. Goodrich）在翻译“北方系”时，除了译成“Northern Complex”，有时还径直译作“Northern Zone”，即“北方区带”，可见这两个概念之间显而易见的联系或延续性。林沄论文的贡献不仅在于对 50 年代以来大量考古新材料的掌握和运用，更在于他对出自“北方区带”的青铜器作为一个独立系统的认识和强调。如果说华生眼中的“北方区带”强调的是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其主要功用是作为连接南西伯利亚和中原地区的桥梁；那么林沄的“北方系”着眼的是青铜器本身所展现的独特的类型和装饰特征。事实上，林沄所理解的“北方系”青铜器的地理分布范围并不仅限于中国国界之内或邻近国界的区域，而是向北延伸直至西伯利亚的米奴辛斯克盆地，向西甚至可达黑海沿岸[14]。换言之，在林沄看来，中国北方边境地区所出的青铜器跟米奴辛斯克盆地所出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它们都属于“北方系”；如果存在什么不同，那也仅限于地域性的差异。显然，这跟罗越和华生分别用“北方风格”和“北方区带”来着意强调中国北方青铜器跟西伯利亚青铜器的区别是很不一样的。

"成长"

如果说"北方系青铜器"这一术语或概念"诞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那么随后而至的就是其"成长"期。短短二十年间,"北方系青铜器"这一术语使用之频繁之广泛,恐怕是最早"发明"这一术语的林沄先生也未曾想到的。在最初使用这一术语或概念时,林先生对其模糊性是有相当清醒的认识的。他说:"'北方系青铜器'是在认识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相当笼统的概念,分布于广大地理范围内的北方系青铜器,在不同的地区因不同的历史传统和不同的外界影响,在共性之外都有一定的差异性,按现在惯有的方法,应该是以研究陶器群为根本手段,划定明确的考古学文化,从而把青铜器分别归纳为'某某文化的青铜器',这样看来,似乎提倡'北方系青铜器'这一概念是多余之举,甚至有害无益。"[15]但他又意识到使用北方系青铜器的人群可能主要采用游动的生活方式,制陶业不发达或甚至不使用陶器,因而提出:"全凭陶器群划分考古学文化的方法就有一定的缺欠;以同时同地的原则把一切青铜器都归为定居者文化的原则也并非绝对可靠了。"由此可见,林先生在提出"北方系青铜器"这一概念时,并没把它完全视作一个表达方便的"符号",而是认为它有着深刻的经济和文化内涵。可惜,在"北方系青铜器"这一概念的"成长"过程中,关于其笼统性和实质性内涵的见解似乎逐渐被人遗忘了;它如今已变得如此庞大而包罗万象,恐怕很难有人能真正说清"北方系青铜器"的确切定义了。

相比于二十多年前,"北方系青铜器"这一概念的"成长"主要体现在时空两个维度上的延伸。林先生在最初提出"北方系青铜器"这一概念时,所依据的材料就中国境内而言,主要出自晋陕高原、冀北和辽西地区,时代是商末周初。他指出:"如果单就青铜器这一种遗存进行区系的研究,则整个商周时代,在商周式青铜器即中原系青铜器分布区的北面,曾有两种不同系统的青铜器,可分别命名为北方系青铜器和东北系青铜器。"[16]很显然,在林先生看来,东北所出的青铜器属于另一个系统,既不同于商周式青铜器,也不同于北方系青铜器。林先生仅指出东北系青铜器是西周后期才兴起,而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讨论。他认为北方系青铜器可划分为三大期,但仅指出第一期的上限不清,下限可定在西周前期,而没有给出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年代。尽管林先生认为"北方系青铜器"的分布北可至米奴辛斯克盆地,西可达黑海北岸,但他的讨论还是限于中国境内的考

古材料。

乌恩先生不使用“北方系青铜器”这一术语，而使用意义更为宽泛的“北方青铜器”或“北方草原青铜文化”，但在他的一系列论文中，“商周之际的北方青铜器”或“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显然有着特别的“组合”意义，似与“北方系青铜器”有暗合之处。关于“商周之际的北方青铜器”之分布，他指出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地区：鄂尔多斯地区：以朱开沟遗址为代表；晋西北和陕北地区：以石楼铜器群为代表，可能与李家崖文化有关；京津唐地区：以青龙抄道沟和昌平白浮的发现为代表；以及辽西地区[17]。乌恩在研究“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时，提出了如下分期，即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春秋时期至战国时期、以及两汉时期[18]。这一分期虽然不是就北方青铜器本身直接提出的，但对其后“北方系青铜器”的分期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94 年，林沄先生发表了《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几个年代问题》的文章，其中提出“把我国境内的在斯基泰式器物流行以前的北方系青铜器称为早期北方系青铜器”，并再次重申，把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上限上推到二里头时代，其主要依据是二里头遗址所出的环首刀和铜斧以及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出的一端为漏斗状的耳环。如此看来，过去所谓“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自然也就成了“早期北方系青铜器”一个组成部分。不过，林先生认为：“过去被当作商末周初的北方青铜器，年代下限并不仅限于西周初”，而是可能晚到西周中期或晚期[19]。在该文中，林先生没有定义或提及晚期北方系青铜器的概念。

1997 年，田广金先生在“中国北方系青铜器文化和类型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提出可以划分北方系青铜器的文化和类型。在他看来，就商末周初而言，含有北方系青铜器的文化有：李家崖文化（晋陕黄河两岸）、围坊三期文化（燕山南麓）、魏营子文化（辽河流域）、西北地区诸文化（寺洼、辛店、卡约和火烧沟）；就西周至春秋而言，有夏家店上层文化；就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而言，则有山戎文化（北京和河北北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化（内蒙古中南部）和西戎文化（以陇山为中心的甘宁地区）[20]。如此分期和分区，使北方青铜器的确有了一个“系统”的面貌，但与最初提出“北方系青铜器”这一概念时的初衷已经相去甚远了。

同年，美国学者林嘉琳（Linduff）等人在为邦克（Bunker）等人主编的《欧亚草原东部的古代青铜器》大型图录所撰写的长篇考古学导言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期：第一期为公元前第二千纪，所涉及的青铜文化有朱开沟文化、李家崖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第二期为公元前 9—前 3 世纪，游牧文化开始出现，可分

为五个文化区:即甘宁地区、鄂尔多斯及相邻地区、阴山以南和黄河以北的内蒙古地区(毛庆沟墓地)、河北北部(山戎?)和辽西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第三期为公元前3—公元3世纪,以匈奴部落联盟的兴起为主要内容[21]。这样的分期自然是吸取了中国学者的一些看法,但林嘉琳也注意到,如果把第一期的上限提早到公元前第二千纪初,那么位于甘肃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以至新疆境内的发现恐怕都需要加以考虑。有趣的是,在同一本书由邦克所撰写的图录说明中,她似乎采用了略为不同的编年结构,如西北中国的青铜时代(公元前13—前9世纪)、东北中国的青铜时代(公元前13—前9世纪)和远北方(Far North)的青铜时代(公元前13—前7世纪)等,她所谓的西北和东北是以太行山为界来划定的[22]。

1999年,美国学者狄宇宙(Di Cosmo)在为《剑桥中国史》(先秦卷)所撰写的有关"先秦时期中国北方边境"一章中,把华生的"北方区带"(Northern Zone)的概念重新提了出来,并且将它定义为东起黑龙江和吉林、西抵新疆的一个广阔的区域,其中包括了戈壁(沙漠)、草原和森林地带。他还把"北方区带文化"分成四期:即公元前第二千纪、西周至春秋早期(公元前1000—前650年)、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公元前650—前350年)和战国晚期至秦代(公元前350—前209年)。他所谓"北方区带的青铜文化"包括了夏家店下层文化、东北青铜器、朱开沟文化、抄道沟文化、白金宝文化(黑龙江)和甘宁地区的北方文化(如齐家、卡约和寺洼)等[23]。我们知道,自从林沄有关"北方系青铜器"的英文论文发表以后,所谓"北方区带"(Northern Zone)或"北方区系"(Northern Zone Complex)等用语,在英文文献中就与"北方系青铜器"发生了直接关联。从这种意义上讲,狄宇宙所提出的"北方区带的青铜文化"这一概念,已经间接地拓展了北方青铜器的分布范围及其所跨越的时代,与田广金和林嘉琳的分期和分区相比虽有差异,但不乏异曲同工之处。

2002年,林沄先生发表《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一文,提出把四坝文化、朱开沟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青铜器都纳入"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24]。这一见解主要基于在上述文化中均发现了一端作喇叭口形的青铜耳环,而这种耳环可与欧亚草原地带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发现相类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论文中,林先生有关塞伊玛—图比诺(Seima - Turbino)文化年代较晚的看法似乎有所改变,因为他注意到火烧沟墓地所出的穿銎铜斧(或"套管式"铜锛)与塞伊玛—图比诺文化的发现可能存在联系。在近期发表的题为《中国北方长城

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的长篇综述性论文中，林先生进一步指出："过去有不少学者把特定式样的刀子和短剑作为中国北方系青铜器的代表性器物，但认为其出现年代不早于商代。现在在西部的四坝文化和东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都已发现了柄身连铸但有明显分界、刀背起脊、环形柄首的刀子，说明这种和西伯利亚的塞伊姆—土尔宾诺文化的青铜刀子相似的器物，在夏代已经出现于北方长城地带了。"[25]至此，"北方系青铜器"的"成长"可谓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不仅在时代上上推至夏代，在分布地域上也扩展到了甘肃的河西走廊。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就是中国学者也开始提出并关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或"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问题，与国外的类似研究形成一种呼应[26]。

疑惑与思考

以上所述"北方系青铜器"的"成长"过程不敢说讲述全面了，但大体轮廓应该说还是勾画出来了。简单说来，不外乎有两个方面的演变：其一是朝更笼统更模糊的方向发展，也就是由"北方系青铜器"演变成"北方青铜器"或"北方地区青铜文化"，如此以来，则分区和分期也就顺理成章了；其二是在时空两个维度上扩展"北方系青铜器"的覆盖面，也就是把"北方系青铜器"的起源提早到夏代，把其分布范围延伸到西面的河西走廊、甚至更西面的新疆地区。对那些从一开始就只使用"北方青铜器"和"北方地区青铜文化"这类术语的学者而言，这样的变化自然是谈不上的。但对经常使用"北方系青铜器"这一概念的学者而言，恐怕就当另作别论了。

前已述及，林沄先生在最早提出"北方系青铜器"这一概念时，对其笼统性是有充分认识的，他所以提倡这一概念，是因为他考虑到使用"北方系青铜器"的人群可能因其游动的生活方式，而没有发达的制陶业或很少使用陶器，因而无法采用传统的研究陶器群的方法来确定其所属的考古学文化；换言之，"北方系青铜器"这一概念背后可能蕴涵有实质性的内容。尤其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尚无法确定出自晋陕高原、冀北和辽西地区的一批商末周初的青铜器的考古学文化归属的时候，提出"北方系青铜器"这一概念以与"中原地区商周式青铜器"相区别，无疑是有启发和实用意义的。但如今，很多青铜器已有明确的考古学文化归属，比如属于四坝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青铜器，但仍被纳入"北

方系青铜器"中来讨论,这与最初提倡"北方系青铜器"这一概念的初衷不是有些相违背吗?这是疑惑一。

当然,任何概念都是允许也应该随着新资料的出现而加以补充、调整和发展的。问题是围绕"北方系青铜器"所发生的某些演变并没有增进我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而是引向了一种不必要的混乱状态。比如说,如果考虑把四坝文化的青铜器算作夏代"北方系青铜器"的一部分,那么处于四坝文化之东、并与四坝文化至少有部分年代重叠的齐家文化的铜器是否也可以纳入"早期北方系青铜器"呢?同样地,在新疆东部哈密地区发现的天山北路墓地,无论是陶器还是青铜器都与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关系极为密切,那么天山北路的青铜器是否也可以算作"北方系青铜器"呢?这是疑惑二。

产生这样的疑惑并非空穴来风,如果我们看最近出版的李海荣的专著《北方地区出土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研究》,就会发现一些让人迷惑不解的论述。比如:"在北方地区之内的甘肃东部发现的齐家文化的铜器中,广河齐家坪出土的一件素面无纹铜镜是青铜的,在本书所指的北方地区之外的青海贵南尕马台也出有一件属于齐家文化的七角星纹青铜镜。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中国的铜镜最早是在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中出现的,也应该属于北方系青铜器。"[27]作者没有说明为什么齐家铜镜应该属于"北方系青铜器",而其他的齐家铜器却不属于。又比如:"在甘肃河西走廊四坝文化的分布范围内,出有受到北方系青铜器影响的器物,如喇叭形耳环等。"[28]这句话表明,在李海荣看来,喇叭形耳环等器物在四坝文化遗址的出现是受东面"北方系青铜器"影响的结果。换言之,四坝文化所出的铜器是不属于"北方系青铜器"的。李伯谦先生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作了这样的评论:"作者把我国甘青地区齐家文化出土的铜镜等归入北方系青铜器,无疑是正确的。但同为甘肃东部马家窑文化出土的铜刀却又被排除在北方系青铜器之外,认为'早于夏时期的北方系青铜器还没有产生',恐怕还需要斟酌。"[29]这一评论实际提出了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那就是公元前第三千纪早期的马家窑文化的铜刀属于"北方系青铜器"吗?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首先必须问:所谓"北方系青铜器"在如今的确切定义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产生以上疑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方地区"这个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前已提及,华生最初提出"北方区带"这一概念时,其覆盖的地域包括内蒙古(尤其是鄂尔多斯)、山西和河北的北部地区。后来,美国学者狄宇宙将"北

方区带”这一概念扩大到东起黑龙江和吉林、西抵新疆这样一个广阔的区域。相比之下，林沄先生所理解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有所收缩，他说：“所谓‘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并非指历代所筑长城经由的全部地域，而是指古来中原农业居民与北方游牧人互相接触的地带。这个地区东起西辽河流域，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到达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大体上包括了今天的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宁夏、甘肃和青海的东北部。这一地带，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说是‘农牧交错带’。”[30]而李海荣所定义的“北方地区”收缩更多，已把甘肃西部排除在外。李伯谦先生就此发表如下精辟评论：“是否应从时代变迁的角度，考虑‘北方地区’的概念应有所变化，不宜以一时的地域概念来规范整个夏商周时期所指的‘北方地区’。”[31]可谓一语中的。事实上，我们最应关注的是考古学发现本身所揭示的现象或图景，而不是拘泥于人为定义的某些概念。以这样的眼光去看，就公元前第二千纪前半叶或更早一些而言，中国的西北地区（甘肃、青海和新疆东部）在早期铜器的使用上显示出更多的联系和一致性，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带”似乎会更有说服力一些。而朱开沟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所在的北方地区，或许可以视作另一个“文化区带”，它所覆盖的区域与后来商末周初“北方系青铜器”的分布区是完全可以有很大不同的。

疑惑三或许是最关键的，那就是“北方系青铜器”这一概念究竟有无实质性的意义？若从总的演变趋势看，现在所谓“北方系青铜器”的涵义似乎变得更为笼统了，与“北方青铜器”或“北方地区出土的草原青铜器”似乎也谈不上有什么差别了。那所谓“北方系”的“系”究竟有何意义呢？林沄在《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几个年代问题》一文中是这样解释的：“广布于我国北方并对中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北方系青铜器，是多源而多分支的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我之所以把它名之为‘北方系’，一方面意在强调它们在器类、器形、纹饰和艺术风格等方面有别于中原起源的青铜器，另一方面则着眼于它们与横贯欧亚大陆的大草原地带的其他地区的青铜器的密切关系。因此，所谓‘北方系’的‘系’仅指一种大的分类。”[32]如果仅作为一个笼统而模糊的概念或“大帽子”使用，尤其是强调跟中原系统的商周青铜礼器相区别，似乎也未尝不可。而从大的系统上看，“北方系青铜器”跟欧亚草原文化的联系明显更为密切，把它笼统地视作草原青铜器的一个子系统也说得过去。从研究和讨论方便的角度看，作为一种大的分类，“北方系青铜器”这一概念还是相当有用的。然而，这样一来，“北方系青铜器”这一概

念原本所蕴含的某些具有实质意义的特征就被模糊丢失掉了。

那么,"北方系青铜器"这一概念究竟蕴含有哪些具有实质意义的特征呢?其实,林沄和乌恩的论文早已涉及到这一问题了。罗越提出所谓"北方风格",以及华生提出所谓"北方区带",从根本上讲,就是注意到中国北方边境地区因处于农业文明和草原文化之间所具有的一些特质,尤其是一批形制独特的青铜器,这些器物不同于商周式青铜器,也不见于欧亚草原地区,如曲柄匕首式剑、弓形饰、铃铎形器、蛇首匕和啄锤等等。换句话说,作为中国中原和欧亚草原之间的农牧交错地带,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很可能因其特定的生态和人文环境而形成有独立特征的物质文化,这种文化既反映了跟南北两方面的联系,也有独立自主的新创造。这种创造甚至会传播开去,影响到周邻的文化。如果我们在"北方系青铜器"中看到了这样的"区域性创新"的特征,尤其是在金属冶炼和铜器制作等方面,那么,"北方系青铜器"就不仅仅是为研究和讨论方便而使用的一个"符号性"的笼统概念,而是一个有特定学术意义的科学概念。

最后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观察视角的可变性。前已指出,"北方系青铜器"这一概念体现的是中国考古学的观察和研究角度,而这一角度并非可以理所当然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实上,最近国外已有学者指出这一术语有"中国中心主义"的嫌疑。近年来,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及其同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关系开始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33]。欧美一些学者注意到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些早期铜器的发现,如齐家、四坝和天山北路诸文化遗址出土的铜器,以及这些铜器在型制上跟欧亚草原文化(尤其是塞伊玛—图比诺文化)的密切联系,从而提出"欧亚草原冶金传统"或"草原冶金"这样的概念,并开始探讨"欧亚草原冶金传统"向东延伸至何处这样的问题[34]。这实际上代表了一种不同的观察角度,不再是从南向北看,而是从北向南看,从欧亚大草原看中国。如果认为可以把"北方系青铜器"的分布界限向北向西推至南西伯利亚的米奴辛斯克盆地,那从欧亚草原的角度看,也完全有理由把"草原冶金"或"草原系青铜器"的分布界限向东向南推至中国境内。因此,要使"北方系青铜器"成为一个有实质意义的概念,还应该在研究和挖掘其区域性特征上下工夫。

总之,在本文作者看来,对所谓中国"北方系青铜器"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狭隘的理解,主要用来指称商末周初出自中国北方边境一带(晋陕高原、冀北和辽西等)的青铜器;另一种是广义的理解,用来泛指北方边境地区出土的不同于中原系统的跨越多个时代的青铜器。然而,无论是广义或狭义的理解,似乎都

不宜将新疆和河西走廊的出土的早期铜器纳入"北方系青铜器"的范围,因为这无助于我们对中国境内早期青铜文化体系的认识和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对西北地区早期铜器的成分及类型学分析,显示出更多与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联系,所以在广义上看,这些铜器似乎可以归属于"欧亚草原冶金传统"。对时代晚一些的商末周初的"北方系青铜器"需要开展深入的科学分析,以揭示其冶金技术特征,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北方系青铜器"的实质内涵。对中国北方文化带在地理、环境和气候方面的特殊性,也需要开展多学科交叉性质的研究,这同样也是更好地研究"北方系青铜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和途径[35]。

〔注 释〕

1 a: Lin Yün, "A 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onzes of the Shang culture and of the Northern Zone"(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 in K. C. Chang (ed.), *Studies of Shang Archaeolog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1986, p. 237 - 273; b: 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载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年,页 129—155。

2 乌恩,《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考古学报》,1985 年,第 2 期,页 149。

3 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考古学报》,1988 年,第 3 期,页 257。

4 田广金,《中国北方系青铜器文化和类型的初步研究》,载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四)》,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年,页 266—267。

5 a: M. Rostovtzeef, *The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南俄和中国的动物风格),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29; b: J. G. Andersson, "Hunting magic in the animal style"(动物纹中的狩猎巫术),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MFEA*), 4 (1932), p. 221 - 317; c: J. G. Andersson, "Selected Ordos bronzes"(鄂尔多斯青铜器选), *BMFEA*, 5 (1933), p. 143 - 154; d: A. Salmony, *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 T. Loo*, Paris, 1933 ; e: 水野清一、江上波夫,《绥远青铜器》,东方考古学丛刊乙种第一册,1935 年。

6 梅原末治,《古代北方系文物的研究》,京都,星野书店,1938 年。

7 B. Karlgren, "Some weapons and tools of the Yin dynasty"(殷代的一些武器和工具), *BMFEA*, 17 (1945), p. 101 - 144.

8 M. Loehr, "Weapons and tools from Anyang, and Siberian analogies"(安阳的武器和工具及西伯利亚的对应物),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53—2, 1949, p. 126 - 144.

9 M. Loehr, *Chinese Bronze Age Weapons*(中国青铜时代兵器), Ann Arbor, The Univer-

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6.

10 田广金先生有如下评论:"1956 年,罗越把类似器物又称之为'北方风格'。这一类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带普遍流行的以动物纹为特征的器物群,在尚未区分其考古学文化归属之前,'北方风格'的提法无疑是比较科学的概括,其影响面很大。"引自注 4:页 266。

11 吉谢列夫,《苏联境内青铜文化与商文化的关系》,《考古》,1960 年,第 2 期,页 51—53。

12 W. Watson, "Inner Asian and China in the pre - Han period"(汉代以前的内陆亚洲和中国),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69. 此文已收入同一作者的文集:*Studies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Art*, London, The Pindar Press, 1997, vol. 1, p. 169 - 194.

13 W. Watson, *Cultural Frontiers in Ancient East Asia*(古代东亚的文化边界),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1.

14 林沄,1987 年,页 134 和 148。

15 林沄,1987 年,页 149—150。

16 林沄,1987 年,页 131。

17 乌恩,《朱开沟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论丛》,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 年,页 259—260。

18 乌恩,《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考古学报》,1981 年,第 1 期,页 46—48 页。

19 林沄,《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几个年代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另见《林沄学术论集》,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页 289—295。

20 同注 4:页 270—299。

21 Katheryn M. Linduff (with Emma C. Bunker and Wu En), "An archaeological overview"(考古学导言), in Emma C. Bunker, *et al* (eds), *Ancient Bronzes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Arthur M. Sackler* 所藏欧亚草原东部的古代青铜器), New York, The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1997, p. 18 - 98.

22 Emma C. Bunker, *et al* (*eds*). *Ancient Bronzes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Arthur M. Sackler* 所藏欧亚草原东部的古代青铜器), New York, The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1997, p. 113 - 299.

23 Nicola Di Cosmo, "The northern frontier in pre-imperial China"(中国先秦的北方边境), in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 1999, p. 885 – 907.

24 林沄,《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边疆考古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 辑,页 1—12。

25 林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燕京学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新第十四期,2003 年,页 12—13。

26 同注 23:页 95—145;杨建华,《东周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形成初探》,《燕京学报》新十四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页 147—191 页。有关国外北方文化区带的相关研究,请参见注 21—23。

27 李海荣,《北方地区出土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年,页 48。李氏认为今甘肃的乌鞘岭以西地区、青海和新疆属于中国的西部地区,而不在他所定义的北方地区之内,详见页 82。

28 同注 27:页 82。

29 同注 27:页 III。

30 同注 25:页 95。

31 同注 27:页 III。

32 同注 19:页 289。

33 E. E. Kuzmina, "Cultural connections of the Tarim Basin people and the pastoralists of the Asian steppe in the Bronze Age"(青铜时代塔里木盆地居民同亚洲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文化关联), in Victor Mair (ed.),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 1998, 2 vols., p. 63 – 93; Mei Jianjun,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during the Bronze Age"(青铜时代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互动),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21, 2003, p. 1 – 39.

34 C. Debaine-Francfort, "Xinjiang and Northwestern China around 1000 BC: Cultural contacts and transmissions"(公元前 10 世纪前后的新疆及西北部中国:文化的接触与传播), in Ricardo Eichmann & Hermann Parzinger (eds.), *Migration und Kulturtransfer*, Bonn, Dr. Rudolf Habelt GmbH, 2001, p. 57 – 70; K. M. Linduff, "How far east does the Eurasian metallurgical tradition extend"(欧亚草原冶金传统向东延伸至何处?), in Kim *et al.* (eds), *BUMA-V: Message from the History of Metals to the Future Metal Age*, Seoul, The Korean Institute of Metals and materials, 2002, p. 35 – 45.

35 致谢:本文的一些基本想法形成于 2002 年,当时我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研究该馆收藏的中国北方青铜器,有很多机会向高浜秀先生请教。所以,我首先要感谢高浜先生的指导和教诲。2003 年 10 月,我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为研究生开过一堂讨论课,内容就是本文讨论的"北方系青铜器",我要感谢参加讨论课的各位同学以及他

们的发言。在讨论课后，Richard Meadow 博士就我的一些想法提了一些中肯的评论。过去几年间，我还有机会与罗森（Jessica Rawson）、罗丰、乌恩、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王睦（Mayke Wagner）、焦天龙、陈星灿和王涛等众多师友讨论并交流本文中的一些想法，并得到他们的很多指教，在此我表示衷心地感谢！这篇文章断断续续写了近三年，能够下决心开始写，是多亏罗丰先生的鼓励，而能够如愿写完，则多亏吴旻女士的宽容和耐心，我愿向他们两位表示特别的感谢。

法国的先秦两汉出土文字资料研究概述

风仪诚(Olivier VENTURE) 著

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日益增多的考古发现给世人带来了大量的文物,也给汉学界带来了大批最新的诸如甲骨文、敦煌写本一类的文字资料。法国学者在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过去已有研究者作过详细介绍[1]。然而,法国汉学界在研究先秦两汉的古文字及相关出土文献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却从未有过介绍。因此我们希望通过这篇简短的文字,向大家简要概述一下自上个世纪初至今法国对有关中国出土的古代汉文文献的研究状况,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将按照时间顺序逐一介绍各位学者的研究课题及其主要著作,使大家对法国学者的主要研究方向及成果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研究

沙畹(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是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汉学大师。他早在1893年就在《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秦铭刻》的研究文章。其中,对《诅楚文》、《秦始皇二十六年诏》和《琅邪秦石刻》等八篇具有重要文字史料价值的秦铭文做了考释并将其翻译成法语[2]。中国甲骨文的发现及其相关研究成果曾引起了欧洲汉学界的极大兴趣。1911年,沙畹又发表了《上古中国之甲卜》[3],该文被视为法国甲骨文研究的首篇论文。在文中沙畹以罗振玉1910年出版的《殷商贞卜文字考》[4]为基础,向西方学术界介绍和阐明有关甲骨文的主要内容及其资料的重要性。由于沙畹在当时西方汉学界享有盛名,因此,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曾经请他协助整理和翻译1907年在敦煌以北发现的一批汉文资料,其中包括汉代木简700多枚以及帛书残片4件。1913年牛津大学出版了由沙畹主编的《斯坦因在

东突厥斯坦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一书[5]。1912 年,在该书正式出版之前,沙畹应罗振玉的请求把图片资料和此书的初稿寄给了罗氏。1914 年,罗振玉和王国维在日本发表了《流沙坠简》[6]。由此中国和日本学者得以了解这批珍贵的资料,并对其作了进一步的研究。

佩特鲁奇(Raphaël Petrucci, 1872—1917)是沙畹的好友,也是欧洲 20 世纪初最著名的东方艺术专家。佩特鲁奇的著作及其举办的展览,对使当时欧洲民众了解东方艺术是很大的贡献。1916 年,佩特鲁奇在《亚洲学报》上发表了他的《古代中国青铜礼器铭刻学》一文[7],该文是西方最早的一篇以商周青铜器铭文为题的研究专文。在这篇文章里,佩特鲁奇介绍了中国古代的青铜礼器并把其中的 18 篇铭文全部翻译成法文。虽然他的考释和翻译主要是依据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但同时也有一些自己的独特见解[8]。

戴遂良(Léon Wieger,1856—1933)是一位传教士。虽然他对中国研究的主要贡献是在道教研究方面,但是在 1916 年他曾经出版过一本研究汉字的书,题为《中国文字》[9]。这本书共分为:文字的本义、字形和形声字三个部分。在第二部分中,戴遂良提供了五十多个殷周青铜器铭文的摹本,并且把铭文翻译成法文。但是,无论是在铭文的隶定、翻译方面,还是在断代或辨伪方面,他都远不及佩特鲁奇。

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1945)曾师从沙畹[10],他虽然也曾研究过道教,但其主要成就还是在历史和语言学方面。1913—1919 年间,斯坦因又一次在中国西部地区获得一大批汉文和中亚古文献资料。由于沙畹已于 1918 年去世,斯坦因决定让沙畹的优秀弟子马伯乐继续承担他老师的任务。从 1920 年起,马伯乐开始整理其中的汉文资料,1936 年他已完成了书稿,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大英博物馆直到 1953 年才把此书交付出版[11]。此书公布的资料中共有汉简 166 枚。然而在马伯乐的著作正式出版之前,原帮助他工作的一位中国学者张凤已于 1931 年在中国独自公布了这些资料[12]。张氏书中的资料有一部分来自沙畹的《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一书,另一部分则来自于马伯乐赠给他的资料。在此还要指出的是,张氏书中的一些照片后来未见于马氏书中[13]。马伯乐在 1927 年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书名为《古代中国》[14]。马伯乐在这本书中,研究从商代晚期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期间约一千多年的历史。他利用当时最新的甲骨文研究成果解释了商代社会。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在西方学术界很有影响的汉学家当时由于怀疑大部分流传下来的青铜器上的铭文是

后人伪造的，因此在该书中并未采用这些铭文。但是从他死后发表的一篇尚未完成的文章中可以看到，马氏晚年对这些未被采用的铭文的看法有所改变。在此篇题为《为了商末周初中国社会的研究》[15]的文章中，马氏利用传世文献、考古与出土文字资料讨论了中国商周时期的社会制度，诸如土地制度、王室制度、官制等等。该文与《古代中国》一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研究中引用和翻译了不少西周铭文[16]。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研究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的考古学者向国际汉学界公布了大量新出土的先秦两汉文字资料。这些资料的发现与研究深深地影响着法国汉学界对古代中国的研究。近十几年来，法国学者对该资料的研究基本上有两个主要方向，一是语言学，二是古代思想与文化史。

1. 语言学

我们在这里将要介绍五位这一研究方向的学者，其中一位研究上古语法，其他四位则研究古文字——但他们并不属于传统的古文字学者，他们都是从文字学的角度研究古文字[17]。他们当中有四位是在隶属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和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共管的东亚语言研究所工作。应当指出的是，该研究所对于中国语言（包括现代汉语及古代汉语）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游顺钊（Yau Shun-chiu）现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名誉教授。他原来从事手语的研究，近几年来则转向象形原字学和他所谓的“字形社会学”的研究。他希望为古文字学研究找到新的角度，并在音韵学和历史语义学的基础上建立一门新的学科。在他发表的中文论文中，有一篇题为《古汉字书写纵向成因——六书以外的一个探讨》[18]。游顺钊在该文中提出，中国汉字的纵向书写形式是由于竹简（包括木简）的使用。此外，他用法文发表的论文中还有两篇分别题为《汉字与手势》[19]和《龙之聋病与革命之鞣》[20]的文章。在后一篇文章中他对“聋”和“革命”这两个字词提出新的考释。他怀疑就是因为在现实中与龙类似的动物听觉都很差，所以古人造字才把“龙”作为“聋”字的声旁。他还主张西周革命的主要条件应为周人所发展的新鞣革方法，这就是“革命”一词的真正来源。2001 年游顺钊在《甲骨文王室称谓中所见的象征参照物》一文中，还分析了甲骨文中的王、妇、我等象形字原来所表现的器物，并认为这些文字均象征着王室

的权势。

蒲芳莎(Françoise Bottero)现任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她主要从事汉字结构、汉字与汉语之间关系的研究。她早期主要研究历代字书,其代表著作为1996年出版的《汉字的分类与语义——自〈说文解字〉至〈康熙字典〉以部首整理汉字系统》一书[21]。她后来在研究早期汉字性质时也涉及到了出土文字资料,如她在1995年发表的《甲骨文辨读的前三十年》[22]一文中,除了介绍从1903年到1933年的三十年间甲骨文的辨读工作,还指出了甲骨文字的特点。同时她还将中国的甲骨文字与世界其他古文明的文字作了比较,并指出了它们的一些共同点。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她开始研究异体字,并于2001年和2003年相继发表了《甲骨文异体字》[23]和《中国文字中的异体字》两篇论文[24]。在前一篇中,她分析了异体字的类型,并探讨了异体字出现的原因。后一篇则从甲骨文到简化字的演变,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探讨影响异体字产生的诸多因素,涉及审美、社会、技术、宗教、巫术与语言等各个方面。

麦里筱(Christelle Maréchale)原为游顺钊的博士研究生,现任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文字学方面的研究。她特别注意到了"有义声旁"在造字过程中的重要性。她认为古人造字时,在选择声音符号时常常需要考虑到它本身的含义,因此她强调在辨认某一汉字时,要特别重视对各个偏旁部首所带有的本义的研究。另外,麦里筱在其1995年发表的《关于"头"字的造字假设》一文中[25],提出"头"与"豆"不但读音相同,而且在字义上也很可能有联系。她于1997年又发表了另一篇题为《"贝"部首在中国货币词汇造字中的功能》[26]的论文,主要论述了在战国时期以"贝"为部首的字汇的大量出现显示了商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有所上升。她所作的相关研究还有2001年发表的《从宝字演变论证字体结构上的保守性为汉字经久不废的一个因素》[27]等。除了用法文发表的论文外,麦里筱近几年来还发表了几篇中文论文,如《彝鼎套语程式与春秋铜器铭文释读举隅》[28]和《汉文字体系的形态变换机制》[29]。在前一篇论文中,她提出河南光山宝相寺出土的黄君孟夫妇铭文中的"则永宝宝",应释为"则永祜福"。

马飞燕(Fabienne Marc)现任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主任,她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古文字。她的博士论文题目为《中山王国文字——东周汉字学方法要素》[30]。在这篇论文里,马飞燕在中山王的铭文中找出了中山文字的字型结构规律,并且还特别注意到了该铭文中字的来源和演变、与其他地区文字的区别以及该字是否是第一次在出土文字资料中出现。她在1995年发表的一篇题为

《中国先秦文字中的假借字》的文章中，利用出土文字资料分析了六书与文字和语言的关系[31]，并强调了假借字在汉字的早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局限性。目前，马飞燕计划以《中山王的遗书》为题将她的博士论文修改出版。在该书中，她将把中山王的三大青铜器上的铭文以及与中山王国相关的传世文献全部翻译成法语。

罗端(Redouane Djamouri)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现任东亚语言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上古汉语语法的研究，特别是研究甲骨文的句法。他也曾对上古汉语中的某些虚词进行研究，曾用汉文发表题为《金文中"毋"跟"勿"两个否定词在用法上的区别》的论文[32]。此外，他也曾对"又"、"兹"、"之"、"于"和"在"等虚词在上古汉语中的用法作过系统的研究[33]。除了这些语法学专题的论文外，罗端还发表过一些语法范围之外的论文，如《商代铭文里数字的用法》(1994年)[34]和《商周青铜器上所谓的"族徽"》(1995年)[35]等。罗端在后一篇文章中，反对将族徽视为汉字祖先的说法。他认为尽管在族徽符号形式中有明显的图画因素，并且其结构布局也较为随意，但是它仍然属于汉字，只不过是采用了另外一种形式。他还发表过题为《中国上古铭文的文字和语言》的论文(1997年)[36]。在这篇文中，罗端从语言学的角度介绍了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并且否定了新石器陶文的语言功能。

以上是法国汉学界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的情况，下面将介绍的是法国学者利用出土文献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的情况。在此特别应指出的是，伯希和把敦煌写本带回法国以后，很多学者都曾参加法藏敦煌文献的整理工作，特别是前敦煌研究小组的学者。虽然整理工作目前已基本结束，敦煌学也已不再是法国汉学研究的中心项目，但是敦煌研究传统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敦煌写本的整理工作使得法国汉学研究者格外重视对第一手资料的研究，并以此作为汉学研究的基础。

2. 思想与文化方面

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当年师从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攻读博士学位，曾任法国远东学院院长和法国高等实验学院宗教学系教授[37]。他的研究领域很广，从商代的占卜技术到中国的近代史均有所涉及。1960年他从越南回来以后，出版了《河内博物馆所藏的铜镜》一书，书中介绍了18件带有铭文的中国汉代铜镜，并附有这些铜镜的照片、释文和法文译文[38]。在汪德迈的研究著述中，最重要的当属1977年和1980年出版的《王道》(两卷

本)[39]。该书对商周社会进行了研究,引用了大量的甲骨文和金文材料,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这本书里详细地分析了上古的家族系统、政治结构和礼制,并认为过去常被认定为年代较晚的思想,实际上早在上古时期已经可见其端倪。此外,近二十年来,他还写了几篇有关汉字起源的文章,如《中国文字与文言》[40]和《中国图画语》等[41]。在这些文章里,他强调文言与口语之间存在着极大的距离,而且,时代越早距离应该越大。他甚至认为早期文字是完全独立于语言之外的[42]。

雷焕章(Jean Lefeuvre)神父是耶稣会台北利氏学社的主要成员,也是目前惟一的法籍甲骨文专家。近几年来,雷焕章在利氏学社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利氏汉法辞典》古文字部分的撰写(此辞典已于2001年出版)。早在1975年,他就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商代甲骨文》[43]。在该文中,雷氏很详细地介绍了甲骨文的发现以及之后的研究状况。1985年和1997年他还分别出版了另外两部研究著作:《法国所藏甲骨录》[44]和《德、瑞、荷、比所藏的一些甲骨录》[45],均有照片、释文和译文。前一部是用法、英、中三种文字出版的,后一部则是用英、中两种文字出版的。另外,雷焕章还发表过几篇有关古文字研究的论文,如:《"兕"试释》(1983年)[46]和《"宾"字在甲骨文里的异体字以及金文里的演变》(2001年)[47]等。在前一篇论文中,他认为"兕"字在上古时期的意思应为野水牛。在后一篇中,他阐述了"宾"字从商代到西周晚期的字形演变与其字义演变有关。

马克(Marc Kalinowski)原为汪德迈的博士研究生,曾为法国远东学院成员,现任法国高等实验学院宗教学系的教授。他曾对《吕氏春秋》,《五行大义》等古代著作做过深入的研究,其目前的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思想和中国古代术数,特别在占卜及五行思想研究方面颇有成绩。自睡虎地秦简发现以后,他就开始利用出土文献进行研究。1986年他发表了《睡虎地简书与中国战国末期的日书》一文,文中介绍了日书的内容,并对其作了结构上的分析[48]。1995年他又用中文发表了一篇题为《马王堆帛书"刑德"试探》的论文[49]。在该文中,马克主要研究"刑德"与战国末期流行的占星和历数的关系。1996年发表《古代中国的天文历数与位置的运算——公元前4世纪到2世纪六甲择日的演变》[50]。在此文中,他认为计算位置的方式在不断变化,而马王堆出土的《刑德篇》和传世《淮南子》则是这一演变时期的代表作。2004年他还发表了《中国古代宇宙起源论的历法作用》一文[51],文中介绍了他通过对三部有关论述中国早期宇宙起源论的著

作:《尧典》、《楚帛书》和《太一生水》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他指出这三部著作的共同点是把日历和四季作为宇宙起源的主要因素,而这在晚期宇宙起源论的文献中是难以看到的。2005 年他还发表了《古代中国书的生产——关于马王堆汉墓藏书的编纂研究》一文[52],在该文中他除了对出土书籍的内容做了研究以外,还强调研究者要注意到这些书的形状、编排、字体、改字等诸多方面的情况,从这些情况出发可以对该书葬前的用途及其编纂等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风仪诚(Olivier Venture)原为马克的博士研究生,现为法国高等实验学院历史与古典学系的副教授[53]。1999 年他发表了《商代石文》[54]一文,介绍已发表的商代石文。2001 年在《龟版卜辞布局初步研究》一文中[55],他指出卜辞在龟版上的不同布局以及与贞组的关系,并希望通过对此问题的讨论引起学者们的关注。2004 年他又发表了另两篇论文,一篇题为《善鼎:塞努基博物馆所藏带铭文的西周青铜器》[56],此文主要介绍了法国塞努基博物馆(Musée Cernuschi)收藏的一件重要的西周青铜器并将该器物上的铭文译成法语;另一篇题为《古代中国文字与通神》[57],他在文中指出上古时期文字使用的范围比起后来的文字使用范围要小得多,如在与神灵交流时,文传并没有代替口传,文字的主要作用是为了记录与神交流的内容,使其得以文字的形式长期固定下来。

除了上述以出土文字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以外,在法国还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研究这些资料的,但也写过一些相关的研究著述。在此,我们介绍几位有代表性的学者。

桀溺(Jean-Pierre Diény)原为戴密微的博士生,曾任法国高等实验学院历史与古文献学系的教授,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古典文学,也涉及古文字学领域。1986 年他在《周代甲骨文》一文中,评介了王宇信在 1984 年出版的《西周甲骨探论》一书,介绍了西周甲骨文的发现和内容,并指出了相关的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方法上的问题[58]。

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原为德康谋(Max Kaltenmark, 1910—2002)的博士生,曾任法国高等实验学院宗教学系的教授。施舟人一直致力于中国道教研究,十分重视原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曾进行社会调查,特别注意对早期印本、写本和石碑的收集和研究。1997 年他曾发表过《最近发现的一座东汉道教碑》一文[59],在该文中施舟人对 1991 年河南偃师东汉墓出土的肥致碑进行了研究,强调此碑对了解汉代道教原貌的重要性,并且特别指出此碑虽属道教碑,但其铭文中也含有一般被视为属于儒家的内容。

吕敏(Marianne Bujard)原为施舟人的博士生,现为法国远东学院教授[60],主要从事宗教史研究,特别是研究汉代皇室与宗教的关系。她不仅利用正史文献进行研究,而且与沙畹、施舟人等人一样重视碑刻资料。2000年在《地方祠祭的举行和升格——元氏县的六通东汉石碑》一文中,她利用石刻资料研究地方祠祭活动,强调该活动与地方官员的支持有关,并指出这类地方性的宗教活动在汉代的传世文献里并没有详细的记载。

戴仁(Jean-Pierre Drège)原跟从苏远鸣(Michel Soymié, 1924—2002)研究敦煌写本,曾任法国远东学院院长,现任法国高等实验学院历史与古文献学系教授。他主要研究中国书史,但是这几年来他也主持一个项目,旨在建立起拓本电子数据库,把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以外)所藏的拓本公布给学术界。虽然其中大部分拓本为唐宋以来的石刻资料,可是也有一部分早期的资料,如一些先秦两汉的金文拓本和汉代石刻拓本。他已主持出版了《亚洲学社藏中国拓本目录》[61],《远东学院藏中国拓本目录》[62],《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中国拓本目录》[63]等光盘。

我们在此还想介绍一下法国惟一的一位中国钱币专家——陈道明(François Thierry),他现任法国国家图书馆钱币馆馆长,主要研究的是唐宋时期的货币,但也出版过有关先秦两汉货币研究的著作。特别应提到的是他于1997年出版的题为《中国货币——先秦时代》的著作,该书公布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货币馆所藏的中国先秦钱币图录[64]。在该图录的开头,他首先介绍了法国图书馆自19世纪初开始藏入的中国先秦时期的钱币情况及其来源;在解说钱币的同时,他常常介绍专家学者们对钱币上文字的考释。此图录共收录了538枚先秦钱币,并附有黑白照片和文字说明。

从上述法国汉学界研究中国出土先秦两汉文献资料的整体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法国汉学研究已经完全走出传统的东方学研究模式,正在朝着更专业的方向发展。除了介绍最新的资料以外,还有不少关于最新资料的专门研究论文发表,从而使这些最新资料在法国学术界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兴趣。对此感兴趣的不仅有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也有研究世界其他古代文化的学者,中国的古代文字资料因此不仅为古文字学研究的基本资料,而且成为研究中国以及世界古代文化的最基本的资料。此外,还应该指出的是法国在这一学术领域的发展与中国学术乃至国际汉学研究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注 释〕

1 请参阅戴仁(J.-P. Drège),《法国的敦煌学研究》,载在《法国当代中国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页 238—255。

2 Édouard Chavannes,《Les inscriptions des Ts'in》, *Journal Asiatique*, 1893, p. 473 - 521.

3 Édouard Chavannes,《La divination par l'écaille de tortue dans la haute antiquité chinoise》, *Journal Asiatique*, 10 - 17, 1911, p. 125 - 137.

4 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玉简斋,1910 年。

5 Edouard Chavannes 主编,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3. 沙畹在前言里提及在他开始研究这批资料之前,斯坦因的中国助手蒋孝琬已经做过初步的释文。此外在辨识文字方面,沙畹也受到过吴勤训和魏怀的帮助,他们都是当时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

6 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京都,东山书社,1914 年。

7 Raphaël Petrucci,《Épigraphie des bronzes rituels de la Chine ancienne》, *Journal Asiatique*, 11 - 7, 1916, p. 5 - 76.

8 对于其中的几篇铭文,佩特鲁奇参考了在他之前所发表的英文翻译。如英人布舍尔(Stephen W. Bushell)的叀鼎铭文翻译。见 Stephen W. Bushell, *Chinese Art*(中国美术),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09, p. 86 - 87.

9 Léon Wieger, *Les caractères chinois - Étymologie, graphies, lexiques*, 1899, quatrième édition(第四版), Imprimerie de Hien-Hien, 1924.

10 有关马伯乐的生平著作请参看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所写的马伯乐小传,《法国汉学》,第 7 辑, 2002 年,页 520—533。

11 Henri Maspero,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é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 Londres, British Library, 1953.

12 有关资料的公布情况马氏和张氏说法不一。张氏书自序说是马氏希望他在中国公布这批资料,但是马氏在他的前言里一边感谢张氏的帮助一边强调张氏没有得到许可而把资料主动发表。实际情况我们不清楚。

13 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初二编》,上海,有正书局,1931 年。

14 Henri Maspero, *La Chine antique*, Paris, de Boccard, 1927.

15 Henri Maspero,《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a société chinoise à la fin des Chang et au début des Tcheou》,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46 - 2, 1954, p. 335 - 403.

16 马氏的释文和翻译的主要参考书为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

17 要了解什么是文字学请参看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

18 《中国语言》,第5期,1992年,页371—375。

19 Yau Shun-chiu, 《Gestes et écriture chinoise》, *Revue du Collège de Psychanalystes*, 46-47, 1993, p. 75-81.

20 Yau Shun-chiu, 《La surdité du dragon et le tannage de la révolution》, *Ecritures archaïques, systèmes et déchiffrement* (上古文字——系统与辨读), Paris, Editions Langages Croisés, 1995, p. 123-135.

21 Françoise Bottero, *Sémantique et classification dans l'écriture chinoise - Les systèmes de classement des caractères par les clefs du* Shuowen Jiezi *au* Kangxi Zidian, Mémoire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35,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1996. 该书以蒲芳莎博士论文为基础。

22 Françoise Bottero, 《Les trente premières années du déchiffrement des inscriptions oraculaires》, *Écritures archaïques, systèmes et déchiffrement*, Paris, Editions Langages Croisés, 1995, p. 73-98.

23 Françoise Bottero, 《Variantes graphiques dans les inscriptions sur os et écailles》,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commémorant le centenaire de la découverte des inscriptions sur os et carapaces* (甲骨文发现百周年纪念国际会议论文集), Paris, Editions Langages Croisés, 2001, p. 179-193.

24 Françoise Bottero, 《Les variantes graphiques dans l'écriture chinoise》, *Faits de langue*, 22, 2003, p. 205-214.

25 Christelle Maréchale, 《Hypothèse sur la formation de la graphie de *tou* 头 tête》, *Ecritures archaïques, systèmes et déchiffrement*, Paris, Editions Langages Croisés, 1995, p. 109-122.

26 Christelle Maréchale, 《Le rôle du composant catégoriel 'cauris' dans la création graphique des termes monétaires chinois》, *Revue de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comparée*, 10, 1997 (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Pau), p. 69-75.

27 Christelle Maréchale, 《La conservation formationnelle des caractères chinois : une source de vitalité de l'écriture révélée au travers de *bao* 宝 'précieux'》,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commémorant le centenaire de la découverte des inscriptions sur os et carapaces*, Paris, Editions Langages Croisés, 2001, p. 229-247.

28 麦里筱,《商承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页355—362。

29 麦里筱,《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95—99页。此后麦里筱改写了这篇文章而翻译成英语:"Graphic Modulation in the Ancient Chinese Writing System",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006, 34-1, p. 25-43.

30 Fabienne Marc, *L'Écriture du royaume de Zhongshan (4e—3e siècle avant J.-C.) : éléments de méthodologie en grammatologie chinoise des Zhou Orientaux*, Thèse de l'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 Paris, 1993.

31 Fabienne Marc, 《Le principe de rébus dans l'écriture chinoise pré-impériale》, *Écritures archaïques, systèmes et déchiffrement*, Paris, Editions Langages Croisés, 1995, p. 137 - 154.

32 《中国境内语言暨语言学 第一辑 汉语方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2 年,页 323—332。

33 有关该方面的文章请参阅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 Asie Orientale*, 20—1; p. 5 - 76, 21—2; p. 231 - 289, 23; p. 107 - 118, 26—2; p. 221 - 248.

34 Redouane Djamouri, 《L'emploi des signes numériques dans les inscriptions Shang》,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16, 1993, p. 12 - 42.

35 Redouane Djamouri, 《Marques dites 'claniques' sur les bronzes Shang et Zhou》, *Écritures archaïques, systèmes et déchiffrement*, Paris, Editions Langages Croisés, 1995, p. 99 - 108.

36 Redouane Djamouri, 《Écriture et langue dans les inscriptions chinoises archaïques (XIVe—XIe siècle)》, *Paroles à dire paroles à écrire*, 1997, p. 209 - 240.

37 汪德迈曾在日本京都大学进修,他还在香港中文大学在饶宗颐的辅导下攻读古文字和古汉语。

38 Léon Vandermeersch, *Les miroirs de bronze du Musée de Hanoï*, Paris, EFEO, 1960.

39 Léon Vandermeersch, *Wangdao, la Voie Royale*, Paris, EFEO, 1977, tome 1, 1980 tome 2.

40 Léon Vandermeersch, 《Écriture et langue écrite en Chine》, *Écritures-systèmes idéographiques et pratiques expressives*, Paris, Sycomore, 1982, p. 254 - 270.

41 Léon Vandermeersch, 《Langue graphique chinoise》, *Études sinologiques*, Paris, PUF, 1994, p. 235 - 275.

42 对汪德迈的这种看法可以参考李学勤的《文字画与文言》, *En suivant la Voie Royale*, Paris, EFEO, 1997, p. 51 - 53.

43 Jean Lefeuvre, 《Les inscriptions des Shang sur carapaces de tortue et sur os - aperçu historique et bibliographique de la découverte et des premières études》, *T'oung Pao*, 41, 1975, p. 1 - 82.

44 雷焕章,《法国所藏甲骨录》, 台北,利氏学社,1985 年。

45 雷焕章,《德、瑞、荷、比所藏的一些甲骨录》,台北,利氏学社,1997 年。

46 雷焕章,《中国文字》,台北,1983 年,新八期,页 84—110。

47 Jean Lefeuvre, 《La graphie *bin* 宾 et ses variantes dans les inscriptions oraculaires et son évolution dans les inscriptions sur bronze》,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commémorant le centenaire de la découverte des inscriptions sur os et carapaces*, Paris, Editions Langages Croisés, 2001, p. 225 - 228.

48 Marc Kalinowski, 《Les traités de Shuihudi et l'hémérologie chinoise à la fin des Royaumes Combattants》, *T'oung-Pao*, 72, 1986, 2, p. 175 - 228.

49 参《华学》,第 1 辑,1995 年,页 82—102。

50 Marc Kalinowski, 《Astrologie calendaire et calcul de position dans la Chine ancienne. Les mutations de l'hémérologie sexagésimale entre le IVe et le IIe siècle avant notre ère》,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18, 1996, p. 71 - 113.

51 Marc Kalinowski, 《Fonctionnalité calendaire dans les cosmogonies anciennes de la Chine》, *Etudes chinoises*, 23, 2004, p. 87 - 122.

52 Marc Kalinowski, 《La production des manuscrits dans la Chine ancienne - Une approche codicologique de la bibliothèque funéraire de Mawangdui》, *Asiatische Studien - Etudes Asiatiques*, 59—1, 2005, p. 131 - 168.

53 笔者在吉林大学和北京大学接受古文字学培训。

54 Olivier Venture, 《Les textes sur pierre sous les Shang》, *Études Françaises* - Numéro spécial Sinologie (法国研究——汉学特期), 武汉, 1999 年, 页 109—136。

55 Olivier Venture, 《Quelques observations au sujet de la mise en page des textes de divination sur plastron》,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commémorant le centenaire de la découverte des inscriptions sur os et carapaces*, Paris, Editions Langages Croisés, 2001, p. 71 - 90.

56 Olivier Venture, 《Le Shan *ding* : un vase en bronze inscrit de l'époque des Zhou occidentaux (1050—771 av. notre ère)》, *Arts Asiatiques*, 59, 2004, p. 166 - 172.

57 Olivier Venture, 《L'écriture et la communication avec les esprits en Chine ancienn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74, 2004, p. 34 - 65.

58 参 Jean-Pierre Diény, 《Les inscriptions sur os et écailles de l'époque des Zhou》, *Journal Asiatique*, 1986, 274, p. 455 - 466.

59 Kristofer Schipper, 《Une stèle taoïste des Han Orientaux récemment découverte》, *En suivant la Voie Royale*, Paris, EFEO, 1997, p. 239 - 247.

60 Marianne Bujard, 《Célébration et promotion des cultes locaux, six stèles des Han Orientaux》,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87, 2000, p. 247 - 266. 中文版见《法国汉学》,第 7 辑,2002 年,页 322—345。

61 Jean-Piere Drège dir., *Catalogue des estampages chinois de la Société asiatique*, Paris,

Société asiatique, 2002.

62 Jean-Piere Drège dir. , *Catalogue des estampages chinois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Paris,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004.

63 Jean-Piere Drège dir., *Catalogue des estampages chinois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2005.

64 François Thierry, *Monnaies chinoises – 1 l'Antiquité pré-impériale*,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1997.

欧亚非考古与文明

法国海外学院——欧亚非考古与文明

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 著
吴旻 译

我很荣幸地代表法国远东学院，特别是学院的北京中心，欢迎各位法国海外学院的同事和中国同行来到今天开幕的系列报告会，这是中法之间在考古和古代文明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对话。中国的考古学，通过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大量展览，已经在国际上广为人知；由于丰富的考古发现及其出色的质量，也由于在中国高水平的考古研究和完善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使得考古学成为中国人文科学中最多产的领域之一。

考古学也是法国五所海外学院的研究重点，这五所海外学院的总部分别设在雅典、罗马、开罗、马德里和巴黎。法国的海外学院是在人文科学领域中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其中尤以历史学与考古学为重。这些学院都拥有专业的图书馆和文献中心，并保证它们各自的实地研究成果得以出版和传播。它们为法国的、欧洲的和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提供了长期交流的场所，并为发展法国和它们各自所在国家的双边关系作出了贡献。从属于法国教育部研究分部和法兰西学士院碑铭美文学院的法国各海外学院与外交部也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正是在这种合作关系下，作为中法文化年的重要活动之一，法国远东学院荣幸地与法国大使馆合作举办这次系列报告会。

法国的海外学院到底有哪些？

法国雅典学院是五所学院中历史最久的一所。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1846），在雅典，它就致力于研究希腊的语言、历史和古代文明。今天，它的任务是对所有与古希腊和拜占廷帝国有关的学科进行研究，并培养相关人才，特别重视考古学的技术和方法。与此同时，它也关注从史前时代直到现代的希腊化世界文化的各个方面。自 1989 年以来，它开始在希腊以外的地方扩展考古活

动，在乌克兰，在阿尔巴尼亚，并且它也与俄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建立起关系。

1873 年由法国政府建立起来的法国罗马学院，其任务是从事对从史前时代直至今日的意大利及地中海沿岸的历史学、考古学以及社会科学的研究。它参与了意大利、马格里布地区和巴尔干半岛的多处考古发掘活动。它的总部与法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一起，坐落在罗马著名的法奈兹宫里，学院图书馆的藏书有 20 万册之多。

法国开罗东方考古研究所（诞生于 1880 年）对从史前时代直到阿拉伯——伊斯兰时代在埃及大地上相继出现的各种文明进行研究。它的科学活动一方面包括从埃及最早的王朝直到罗马帝国的埃及考古学与语言学，另一方面包括对科普特、阿拉伯和伊斯兰的研究。

法国远东学院的科学活动是研究伟大的亚洲传统文明。法国远东学院在法兰西学士院碑铭美文学院的倡导下，1898 年由印度支那总督杜梅（Paul Doumer）决定建立的，目的是探索和保存殖民地的文化遗产。今天，法国远东学院在南亚次大陆，在东亚——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在包括有法国远东学院的摇篮——印度支那半岛的东南亚等各个亚洲地区开展研究工作。至于远东学院的科学研究方法，是通过人文和社会科学来接近亚洲文明，并密切关注当代世界。从一开始，法国远东学院研究方法的特点就是跨学科和比较的研究，将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和宗教科学联系起来。

最后，是 1929 年建立于马德里的委拉士开支研究所，它的任务是发展西班牙及伊比利亚世界的创造性的活动及与艺术、语言、文学和文明相关的研究。这个研究所不仅培养研究人员，也培养艺术家，并且参与发展法国与伊比利亚半岛国家的艺术与科学交流。

在本次系列报告会上有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和武汉大学的研究人员作为中国考古学的代表，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同时我也要感谢这次报告会的所有组织者，以及他们为这次会议所付出的辛劳。我特别要感谢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的所有成员组织了这次活动，使得我们有机会在此聚会。特别感谢中国国家图书馆分馆在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地点接待我们。最后我祝愿这次报告会能够增进大家在科学、跨文化和友谊各方面的交流，成为一次成果丰硕的聚会。

古埃及的几座金字塔
（哑式金字塔　铭文金字塔　消失的金字塔）

马迪厄（Bernard MATHIEU）　著
刘驯刚　译

一　哑式金字塔（les pyramides muettes）

1. 吉萨（Gîza）高原

“金字塔”一词必然使人们想起法老时代孟斐斯陵墓群的著名建筑。

首先，位于撒卡拉（一译塞加拉，Saqqâra）的左塞王（一译卓瑟，Djoser）梯形金字塔（pyramide à degrés，图1），是埃及历史上的第一座金字塔，它建于第三王朝之初，约公元前2700年，是建筑家伊姆荷太普（一译伊姆霍特普 Imhotep）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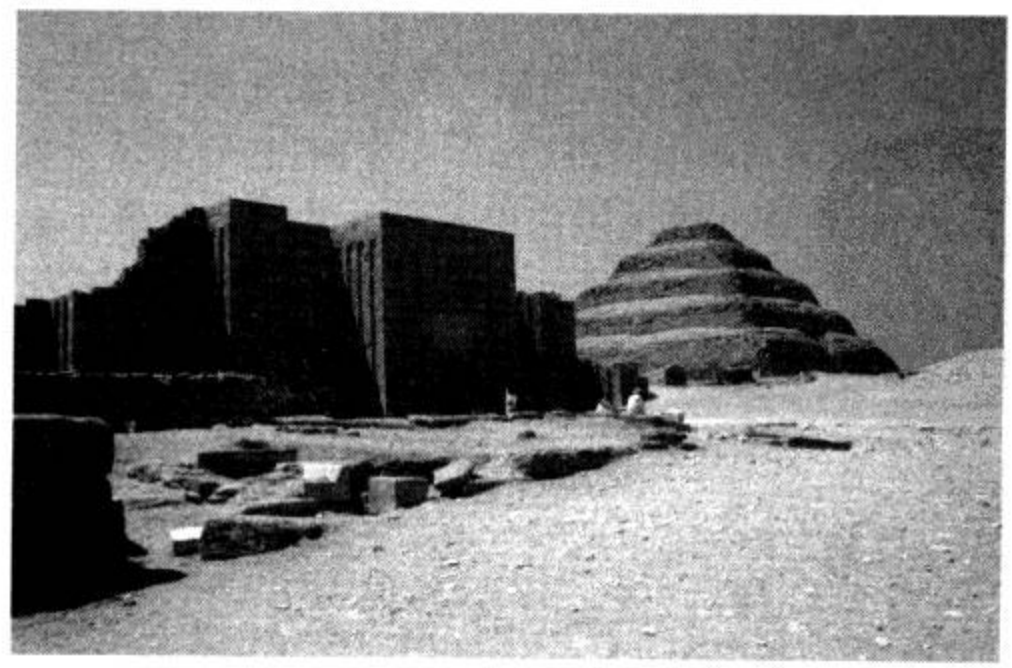


图1　左塞梯形金字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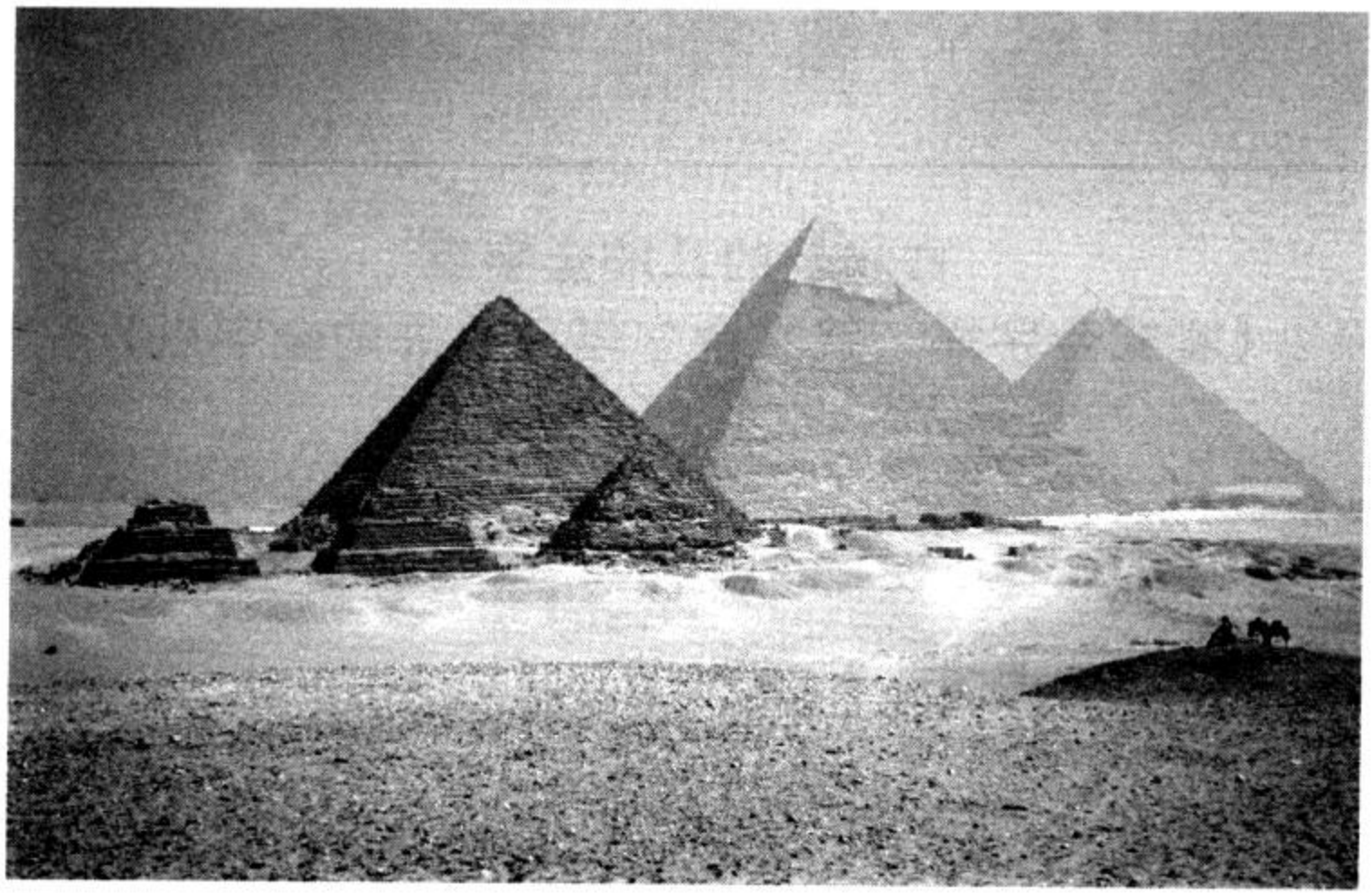


图2 吉萨高原的金字塔

尤其吉萨(Gîza)高原的著名金字塔(图2):胡夫(Khéops)、卡夫拉(Khéphren)和米凯里诺斯(Mykérinos)的陵墓,其修建年代可以追溯到第四王朝(公元前2625—前2500年)。人们会注意到,胡夫金字塔是古代七大奇迹中目前还可以看到的惟一的一个,它的底边长230米,高约147米。

首先要注意这些陵墓自相矛盾的特征:一方面,它们几乎全部是无铭文的,没有外界提供的情况,很难准确地辨认出这些陵墓是属于哪位法老的;另一方面,这些陵墓因为它们的独特规模,向后代传递了对一代特殊权势的见证。

尽管哑式金字塔是不言不语的,它们还是给了我们很多关于丧葬观念、建筑技术甚至还有关于在产生这些金字塔的社会中如何组织劳动的启示。因此,人们冒着夸大其辞的危险,甚至还创造出一种"金字塔探隐说",试图揭开奥秘,辨认出这些比其表象更复杂的陵墓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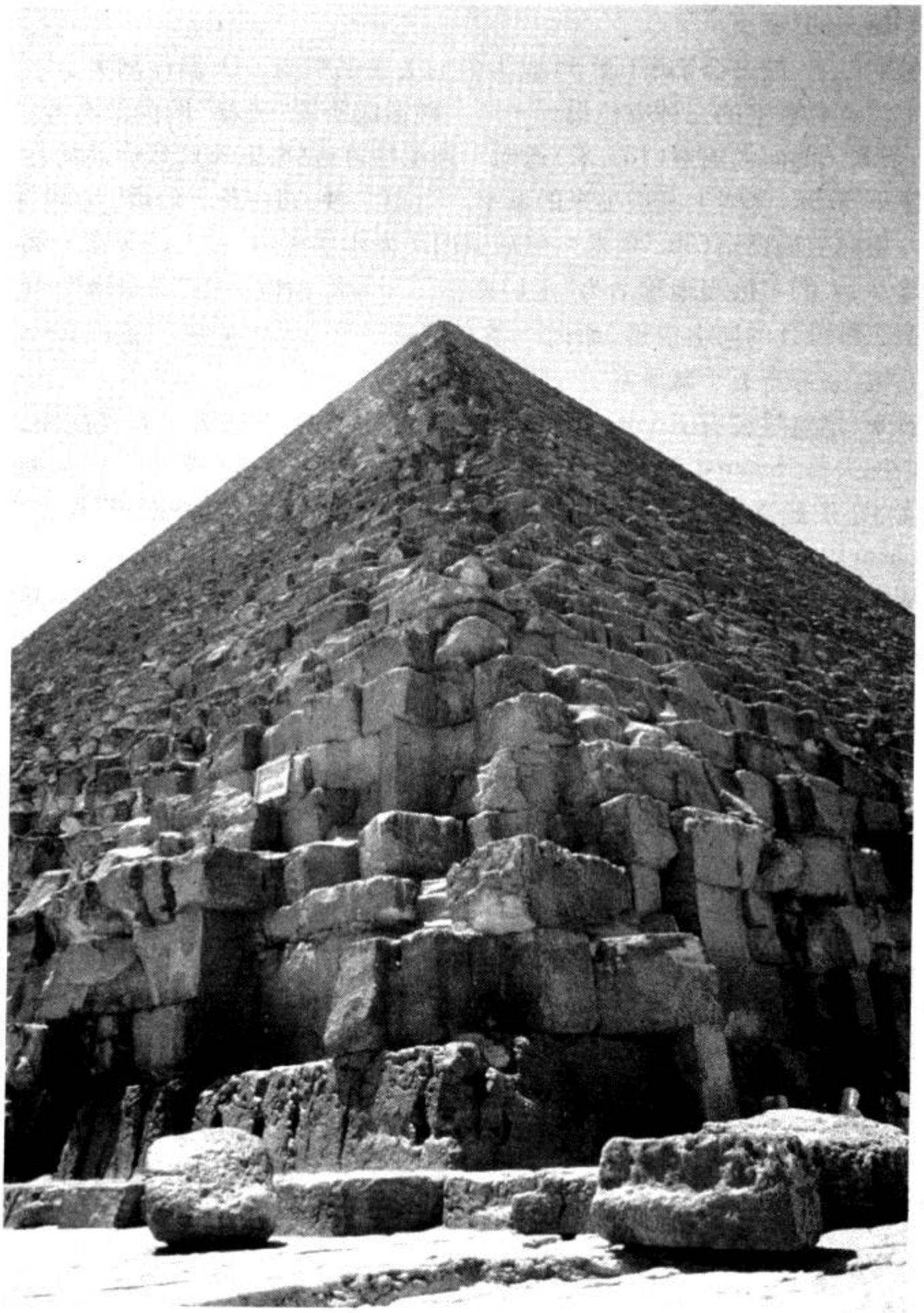


图3　胡夫金字塔

2. 胡夫的“密室”

长期以来，胡夫金字塔（图 3）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在胡夫金字塔的结构中注意到墓室的三种方位设计——一种形成所谓“奥秘”的内部布置：1）首先，一条北—南向大信道（133 米）通向一条水平甬道（8.9 米），然后通向在金字塔基座下 30 米、基岩上开凿出来的墓室。2）第二种：同一条大信道，在 30 米处，通向一条向上的甬道（38.70 米），然后通向一条水平甬道，进入设置在上部结构内的墓室，人们不恰当地称之为“王后墓室”。3）第三种：一条“大走廊”（46 米）延长第二种设计的向上甬道，通向一条水平甬道和“国王墓室”，室内有一口花岗岩石棺，顶部有五个减压室。

看来，建筑过程有三个连续阶段。如果承认胡夫金字塔几乎是其前任、他的父亲斯涅夫鲁（Snéfrou）两座金字塔的综合的话，便不能完全排除上述三个墓室从原始图开始就确已设计。斯涅夫鲁金字塔位于吉萨南部的达苏尔（Dahchour）。

胡夫金字塔保存特别完好，可能正由于这一原因，很难解释其建筑中某些不规则结构；可能由于胡夫金字塔是所有金字塔中最雄伟、最引人入胜的，还可能由于它吸引了所有的目光，（虽然在埃及有上百座金字塔！）而且还可能由于尚未发现国王墓室石棺中的法老木乃伊，（然而一般情况都是如此！）近几十年来，所有这些因素会合起来使窃宝贼和强烈爱好者中间出现了称之为“探寻密室”的现象。

就在最近，第九届国际埃及学大会于 2004 年 9 月在法国举行期间，一位建筑师吉尔·多尔米翁（Gilles Dormion）提出，“真正的”国王墓室在所谓的“王后”墓室之下。这一新理论在几个月内成为专栏文章的话题，在此列举出这一理论的几点不足会是有益的[1]。

国王墓室由花岗岩石梁构成的顶部可能已经龟裂；当时石梁被支撑住，灌浆堵住裂缝，然而，垮塌的危险性非常大，于是决定将墓室改到另一处，在王后墓室之下。问题：1）为什么不选择更加牢固的地下墓室；2）王后墓室的地面承受负荷要大于赋予国王墓室的负荷；3）国王墓室的石闩已降下来，可以设想，墓室实际上已发挥作用……而顶部从那时以来始终没跨塌下来！

新的“密室”和信道可能是西—东向的，这违反了已知的古王国（公元前 2700—2200 年）所有信道的走向：北—南（位于南达苏尔的斯涅夫鲁金字塔第二条信道例外），观察金字塔无进口的东侧也没证实这一点。

1883 年彼特里(Flinders Petrie)在金字塔东侧发现的"沙盘",是为工地工头用的,它表明有已知的三个系统,却没有假设的第四个系统。如果有意保守秘密而短缺第四个系统,那么为什么还标出一开始就选作墓室的国王墓室系统呢?

地球物理测量[2] 似乎指出约 1 米宽、东一西向的结构,其顶部在约 3.5 米深处;但是这个标号可能非常符合普通的洞穴(多尔米翁本人于 1986 年在王后墓室的水平甬道西端已经发现这一点),符合石块坍塌地段、瓦砾地段、属于天然地核的多岩石地段,等等。

至于国王墓室的石棺里没有木乃伊,人们不能以此为论据,因为古王国(公元前 2700—2200 年)的国王木乃伊没有一个是在金字塔里发现的。

二　铭文金字塔(les pyramides à textes)

当人们有意过多地谈论哑式金字塔时,重要的是要慎重。可是,另一些不太著名的金字塔,对了解法老时代的埃及却具有极大的意义。这些金字塔的宝藏是很实在的,是可观察到的"铭文金字塔",如此称谓是因为在这些金字塔隐藏的墓室里布满埃及象形文字的石刻。这儿有几段发现这些石刻的纪事。

1. 第一批铭文金字塔的发现

埃及学历史上的一个传奇式的场面是,1881 年冬季的一天,法国东方考古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加斯东·马斯佩罗(Gaston Maspero)气喘吁吁地从撒卡拉高原跑回来,向他那位正在奄奄一息的兄长奥古斯特·马里埃特(Auguste Mariette)述说,他的"哑式金字塔理论"从此以后破产了。事实上,在几个月内,1881 年 1 月到 5 月,在荒漠的南撒卡拉高原,发现有 5 座铭文金字塔:他们依次是:沛比一世(Pépy Ier)、梅仁雷(Mérenrê)、乌纳斯(Ounas,彩图 10)、尼乌卡瑞—沛比二世(Néferkarê-Pépy II,图 4)和泰堤(Téti)的金字塔,所有这些墓主人都是第五或第六王朝(公元前 2500—2200 年)的君王。古王国金字塔已经具有历史意义和象征性的使命,它们不断以时好时坏的方式激励评论家,因此,它们自我表现出隐藏着的真正的铭文宝藏。埃及学产生了两个新概念:铭文金字塔和金字塔铭文,它们从此以后成为人类最古老的宗教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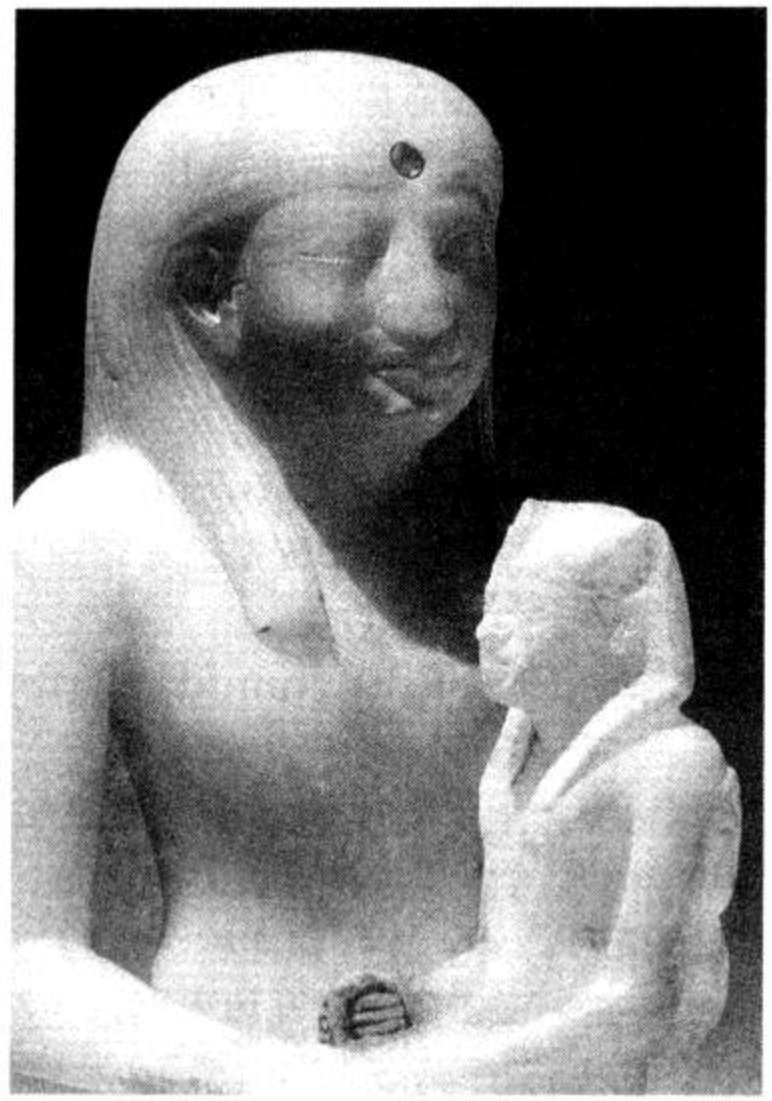


图4 方解石小雕像(高:39厘米),沛比二世坐在他母亲的双膝上(布鲁克林博物馆39.119)

2. 古·热基埃的发现

第二次系列发现是在1924—1936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瑞士埃及学者古斯塔夫·热基埃(Gustave Jéquier)在南撒卡拉地区勘察之时。四座新的铭文金字塔出现了。前三座是王后们、尼乌卡瑞—沛比二世法老的三位夫人的金字塔,她们分别名叫乌德吉博坦(Oudjebten)、内依特(Neit)和依布特(Ipout),她们的陵墓都与她们的丈夫的陵墓毗连。第四座铭文金字塔偏南,是阿巴(Aba)——一位当时还不知其名的国王金字塔。阿巴在人们称之为第一中间期(公元前2200—2000年)的第八王朝期间执政。这些新发现特别重要,不仅因为它们补充提供了铭文材料,而且还因为它们证实,镌刻在墓室墙壁上的金字塔铭文不是专属于法老的一种特权。

3. 法国撒卡拉考古队的发现

调研结果必然激发起对沛比二世统治时期以前的王后金字塔的研究:这是在让·勒克朗(Jean Leclant)教授领导下,从1967年开始在沛比二世墓群进行发掘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这次活动特别富有成果。

果然,2000年2月12日,当时在奥德朗·拉布卢斯(Audran Labrousse)领导下,撒卡拉考古队的努力得到了报偿,因为这一天,第一块刻有安赫森沛比二世(Ânkhesenpépy II)王后金字塔铭文的石灰质残片出土。安赫森沛比二世是古王国(公元前2700—2200年)末期的历史人物,她曾是沛比一世的王后,后成为他的继承人梅仁雷的王后,梅仁雷的继承人、尼乌卡瑞—沛比二世的母亲,并以此成为埃及王国的女摄政。她的陵墓从此成为第十座著名的铭文金字塔。

三　金字塔的铭文(les textes des pyramides)

1. 金字塔铭文的发表:正在进行的意外收获(图5)

加斯东·马斯佩罗在他的发现之后,几乎立即在海因里克·布鲁格斯(Heinrich Brugsh)的帮助抄录下,公布并翻译了1880—1881年已公诸于世的金字塔铭文,人们永远不能充分地肯定加斯东·马斯佩罗做出的这一特殊挑战。这项工作功劳再大,也表明那只是第一步。德国埃及学者库尔特·泽特(Kurt Sethe)于1908—1910年将铭文摘要版付梓时,才跨越出基本阶段:事实上,许多套语(formules)从一座座金字塔显现出来,一般地说它们可能有些差异。从系统的比较中,对铭文得到较好的理解。上述摘要版在今天仍是同类中的惟一,但它不包括保存在原位的大量铭文,以及从那时以来发现的残片。

让—菲力普·洛埃(Jean-Philippe Lauer)和让·圣·法尔·加尔诺(Jean Sainte Fare Garnot)从1951年开始清理泰堤(Téti)金字塔,随后中断,然后让—菲力普·洛埃又和让·勒克朗从1964年1月开始继续清理泰堤金字塔,收集到700多块大小不等的镌刻残片。从1967年开始,法国撒卡拉考古队开始清理沛比一世金字塔,收获竟近2 500块残片。从1971年开始在梅仁雷金字塔周围进行调查,迄今已清点出2 000块以上的残片。最后,对安赫森沛比二世王后金字塔地下墓室的发掘,仅在2000年和2001年两次行动中,就发现近1 200块残片。

这个考古队最大规模的拼图般的集体长期耐心作业——在沛比一世金字塔的作业——于2001年以期待已久的公开宣布而结束,这项宣布登载在法国东方

图5 金字塔铭文(沛比一世)

考古所的刊物上。

至今有5部关于金字塔铭文的译作。我已经提到加·马斯佩罗的著作,这些著作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定期连续部分发表后,于1894年编入其全集之中。从1935年到1939年,随后在1962年,以遗著的方式出版了库尔特·泽特4卷本《古埃及金字塔铭文的译文和注释》(*L'Übersetzung und Kommentar zu den altägyptischen Pyramidentexten*)。最后,在埃及学学者路易斯·斯皮洛斯(Louis Speelers)1935—1936年和萨米埃尔·A. B. 梅尔塞(Samuel A. B. Mercer)1952年之后,雷蒙德·O·福尔克讷(Raymond O. Faulkner)于1969年出版了新的英文译本,融入热基埃发掘的新成果,目前它仍是最晚近的,尽管已经过时。

这最后的译本出版30年来,已有三种重要的资料问世。第一种资料是撒卡拉考古队分组进行拼图发掘逐步形成的,它补充了大量新的版本和新的套语,同时增加了泽特和热基埃的研究内容。第二种资料是关于在词法、句法和埃及词典学方面认识的进步:例如,从此后,人们知道了如何分析并确切地翻译某个不久前可能有多种表达方式的动词形式。

第三种资料是方法性的。现在,在金字塔铭文研究的重要阶段,人们认识到铭文金字塔的位置在金字塔每种套语的选择和含义中所发挥的作用。这种新的空间的、三维的、可以真正称之为考古学的接近,便于今后避免向读者提供随意添加的杂乱无章的表述。

考虑到建筑的大环境,开始在本义上谈论起一个新的分析领域,这个领域为套语确定了"方向",真正赋予它"含义"。甚至可以确认,在重新把套语置于它们起始的空间框架条件下,便化解了其中大部分困难;并且消除了人们一直认为金字塔铭文是十分难解的印象。

2. 金字塔铭文的内容:多样性与一致性

让我们快捷地介绍一下这些铭文的内容吧。

金字塔铭文实际上归纳为不同的文学亚类和多种套语类型,甚至是各种类型。铭文以其方式要达到的惟一目的,就是使死者得到资格、标志和在上天飘游期间适应他的变化所必不可少的从属人员。简言之,套语主要可区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祭献套语或"礼仪"套语类,这类都出现在墓室的北墙上。由于有这类铭文,死者便备有远行所需要的各种物品和钱财:奠酒、供焚烧的香、粮食、面包、薄饼、蛋糕、乳制品、肉类、禽类、蔬菜、水果、葡萄酒、啤酒,还有香脂、化妆用品、织物、权杖和弓箭。

第二类是驱魔辟邪诅咒套语，或“庇护套语”类。由于有这类铭文，主持礼仪的人将保护死者免于敌对者的攻击，所谓敌对者——恶魔，其最通常的隐喻代表是蛇，但也可采用蝎子、狮子或公牛的形象。这些苛毒的咒语有时通过魔术书传送到年代较近的时期。

最后，“神学的”或“讲述宇宙的”套语是一个非常长的序列，它在已知的十座金字塔内，总在墓室南墙上的同一位置，垂直于石棺，它以这样的言辞对死者说：啊（国王），你不是死着离去，你是活着离去！这是所谓的“永别”形式。通过祭献获得再生，具有生命，而且由于活动不定，国王便可以真正地进行他的末世飘游了。

标明方位者指示阅读的顺序与含义。认真研究铭文表明，铭文在墓室中从石棺处开始，自西向东全面展开，经过前厅，直到三个墓室之一的塞尔达德厅（*serdab*）处。根据国王颁布诏书的概念，死者只有获得全部物质财产才能开始其游历，所以铭文在墓室的北墙，以祭献套语开始。这个新到的死者，能够飘泊、愉悦他的全部机体时，便向东方走去，以实现其心愿：“讲述宇宙的套语”通过各种方式，比较浅显地叙述了这段故事，“讲述宇宙的套语”可以简便地区分为复活、晋升和升天等套语。

我们还要强调指出这一点，考虑套语的位置是理解铭文本义的关键。

3. 礼仪和政治语言：历史和国家的基础

在金字塔铭文研究方面还有许多任务要完成：继续出版铭文真迹，重新审查而且大概最终出版新版本的古斯塔夫·热基埃发表过的铭文，汇编的新摘要版，加注释的译文集，古文字学研究，建立索引汇编，编撰主题字典——这部字典可能定位在多语种的地名、神名（*théonymes*）、有关神话的基本知识和真实性上。

同时，还要进一步思考两个深层次问题，力图回答两个基本问题：首先是金字塔铭文的起源（铭文的出现早于古王国吗？）；其次是铭文的深刻意义（它仅仅是一篇墓葬文吗？）。

实际上，铭文可区分为两个基本层次的宣读：“内部”宣读，只是礼仪和丧葬性的，从中可看到死者进行人身变化，然后他的下行（*catabase*）走向（古埃及主神之一的）俄赛里斯（Osiris），他的上行（*anabase*）走向夜空；而“外部”宣读，继任者以此完成对已故国王的崇拜，作为他的首次君王行动。举办皇家葬礼是王权的初始活动（加冕仪式只能在葬礼后，原则上在国王死后 70 天举行），经过宣读铭文从而具有合理性。而且在金字塔铭文中，不难觉察出制度和国家的基础

有赖于它。最引人注目的是,鉴于铭文本身的资历,我们依据其字义可以复原主宰法老国的政治、精神和社会结构。

总而言之,如果金字塔铭文非常肯定的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关于古埃及宗教和丧葬观念的信息源的话,那么,它也会是向我们提供关于这些铭文所铭刻的王朝的历史和制度的信息源,而且也是关于非常古老的年代的,在这个古老的年代里形成埃及国家的信息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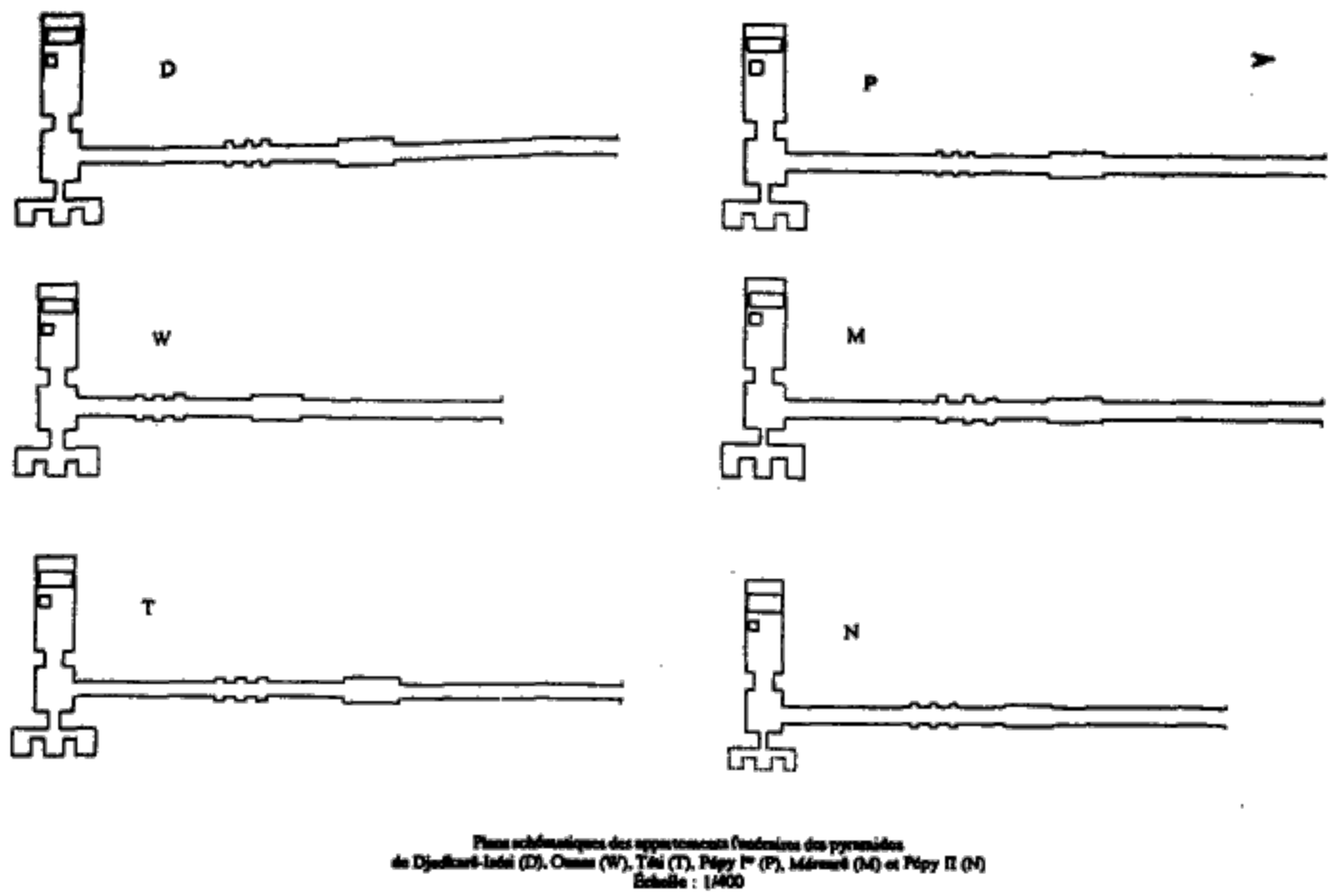


图6　铭文金字塔墓室示意图:D:吉德卡雷·伊塞西:W:乌纳斯;T:泰提;P:沛比一世:M:梅仁雷;N:沛比二世

四　第六王朝(公元前2350—2200年)消失的金字塔

我们讲到哑式金字塔和"健谈"金字塔,即古王国(公元前2700—2200年)的铭文金字塔。还要说一个词:未消亡却消失的金字塔,这些金字塔仍置身原地,安然自得。实际上,相当数量的皇家陵墓不名所在,尤其对第六王朝(约公元前2350—2200年)而言。

1. 曼涅托(Manéthon)的见证

根据曼涅托(这位生活在约公元前300年托勒密时代[Ptolémée I - II]的埃及祭司、《埃及史》[*Aegyptiaca*]的作者)的记述,第六王朝有六位帝王:奥托埃斯(Othoès / 泰堤 Téti)、培奥斯(Phiôs / 沛比一世 Pépy Ier)、孟托苏菲斯(Methousouphis / 梅仁雷一世,一译麦伦列一世 Mérenrê Ier)、培奥庇斯(Phiôps / 沛比二世 Pépy II)、孟西苏菲斯(Menthesouphis / 梅仁雷二世 Mérenrê II)、尼托刻利斯(Nitokris = Nitocris)(图6)。然而,人们对梅仁雷二世和尼托刻利斯的陵墓一无所知。

另一方面,今天已经知道,曼涅托的王名表是不完整的,因为泰堤之后,有某个乌塞尔卡勒(Ouserkarê)执政。这个遗漏必定不是由于曼涅托的疏忽或错误,但是,毫无疑问,这是延续到他那时的一种正式的传统的反映,这种传统就是不提这位国王。

因此,在地面上,缺少第六王朝(公元前2350—2200年)乌塞尔卡勒、梅仁雷二世和尼托刻利斯三位国王的墓群。

2. 乌塞尔卡勒之谜

埃及的一种传统保存了对这位乌塞尔卡勒国王的记忆,这位国王执政最少一、二年,至多四年。在当代一份逐一列举第六王朝君王的资料《南撒卡拉王表》(*Pierre de Saqqâra-Sud*)中,提到了这位国王,在塞蒂一世(Séthy Ier)皇家名录中也提到他,该名录镌刻在圣地阿比多斯(Abydos)的俄塞里斯神庙里,目前都灵埃及博物馆保存的拉美西斯(Ramesside)时期(新王国,公元前1550—1100年)的一部纸莎草纸编年史书《都灵纸草》(*Canon de Turin*)也提到。

我们能有幸发现乌塞尔卡勒墓群吗?

3. 塔拜特阿尔古伊士(Tabbet al-Guech)的最新发掘

建在南撒卡拉的法国研究所在塔拜特阿尔古伊士遗址(图7)最新的发掘,有可能使我们对这个课题了解得更多。

实际上,在这块遗址上出土的古王国(公元前2700—2200年)的陶器碎片使我们观察到当时存在的古老结构。然而,我们在山上清理很可能是在晚近年代(公元前650—332年)打的一眼小井时,得以发现一座崖墓的墓室,这座崖墓可能属于古王国末期或第一中间期(公元前2200—2000年)之初的。墓室内,白色石灰石板贴着山体墙,上面有雕刻和彩绘。墓主人是某个名叫哈乌内菲(Haounéfer)的,与其夫人科乌蒂(Khouti)同葬,他有沛比一世金字塔祭司的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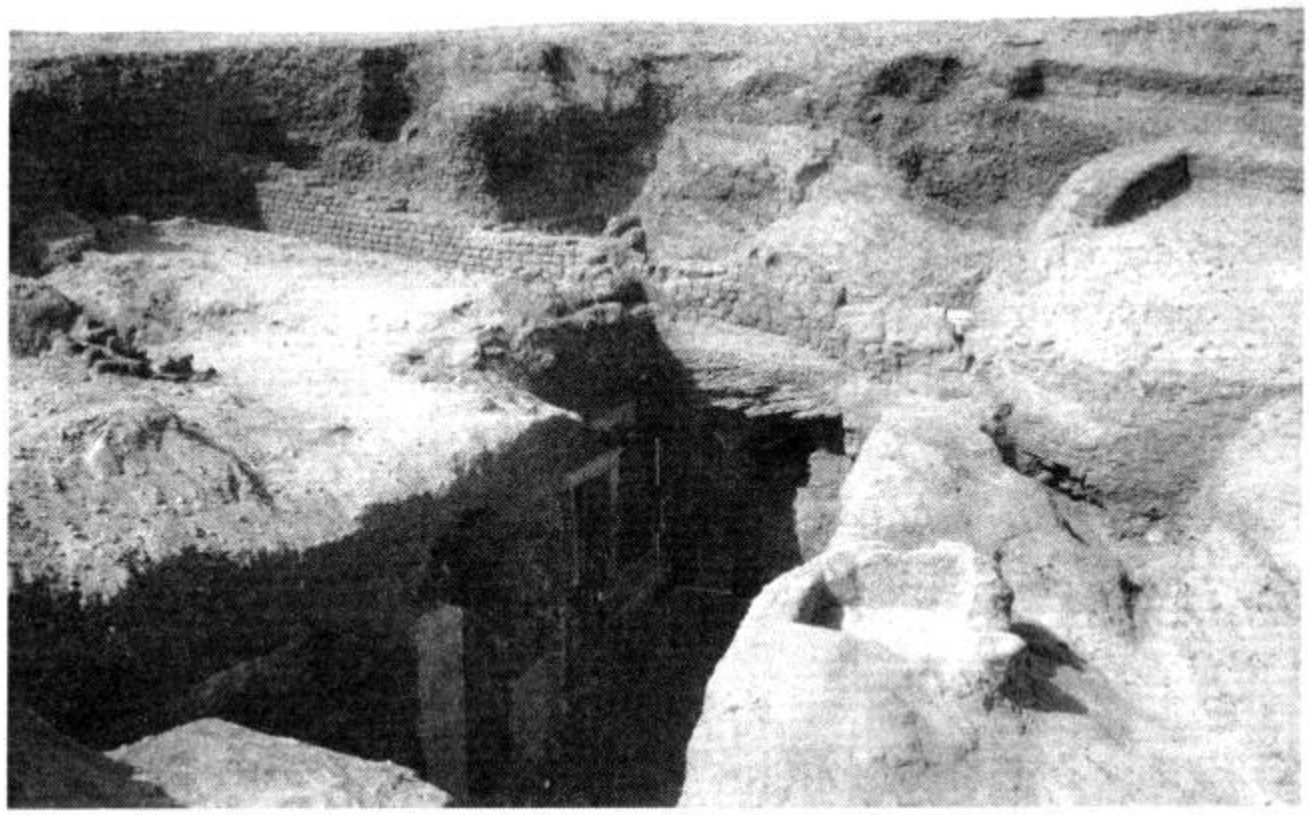


图7　塔拜特阿尔古伊士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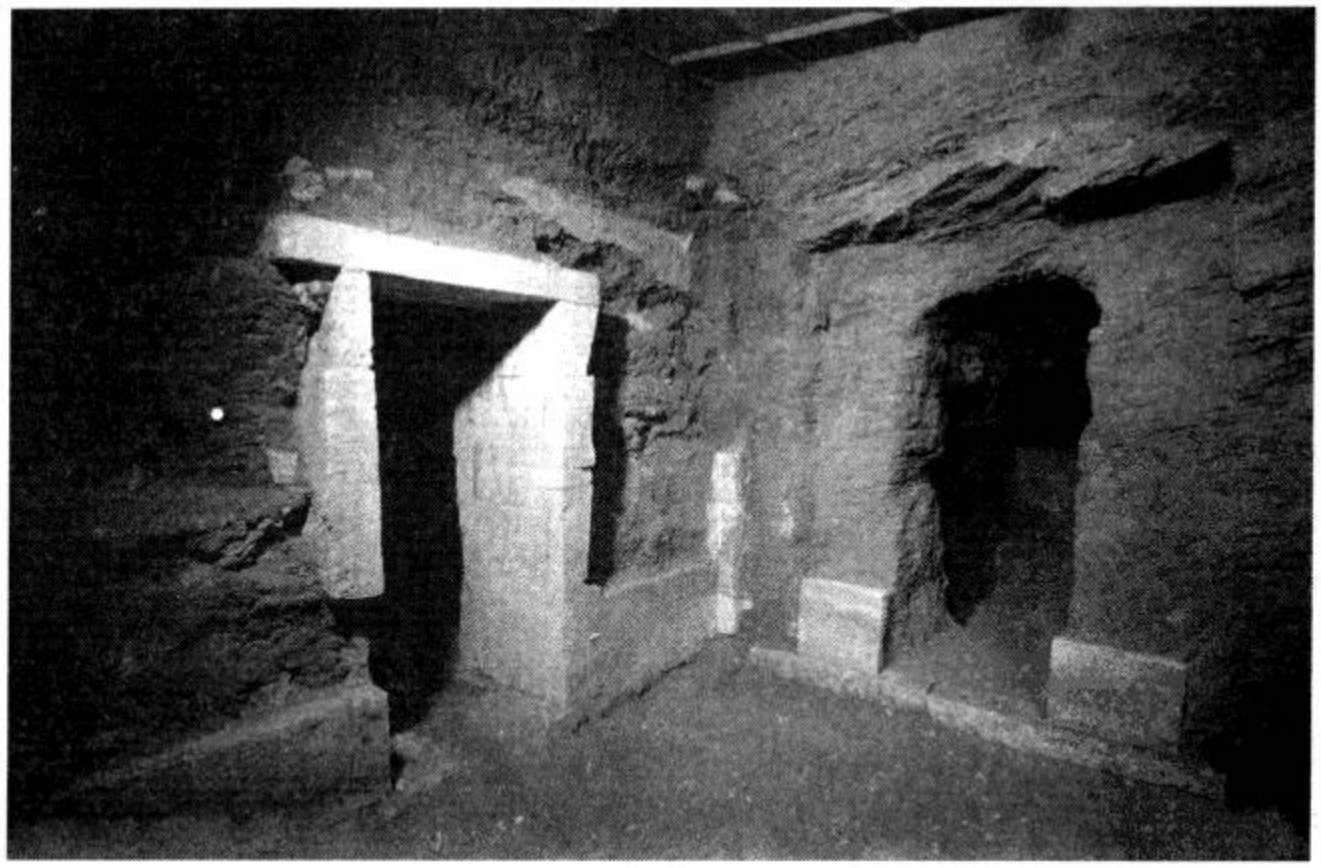


图8　哈乌内菲墓

衔(图8,彩图9)。

从那时以来,还发现了其他的私人墓。这与从属于皇家墓群的大公墓有关吗?一般地说,大人物的陵墓都在撒卡拉,在诸如王陵这样重要的陵墓四周。如果情况如此,非常可能的是,此地可能与第六王朝(公元前2350—2200年)三个缺失的法老之一有关。还要指出,在撒卡拉,从北到南,已知的皇家墓群在地理位置上有规律的延续:泰堤、[乌塞尔卡勒]、沛比一世、梅仁雷一世、沛比二世。因此塔拜特阿尔古伊士遗址上曾有一座铭文金字塔,而这一遗址是乌塞尔卡勒墓群的理想地点,并且这一遗址也正好位于他的前任泰堤墓群北侧和他的后任沛比一世墓群南侧之间。

结　论

哑式金字塔,其内部结构有许多不规则形式尚未解释明白;铭文金字塔,自然有不少文字,但铭文正在抄录和复原之中,需要新的解释;最后,消失的金字塔,考古学正在试探着发现:总之,我这篇讲话是对多重任务的概述,表明对今天和明天的埃及学的期待。

本文是"欧亚非考古与文明——历史、考古与社会"中法学术系列讲座第64讲的讲稿。

〔注　释〕

1 见 *Science et Vie*(科学与生活),2004年11月,页43—49。

2 萨弗若<Safege>公司。

参 考 文 献

BAUD, Michel, *Djéser et la IIIe dynastie* (左塞与第三王朝), Paris, Pygmalion, Collection《Les grands pharaons》, 2002.

BERGER-EL NAGGAR, C., LECLANT, J., MATHIEU B., PIERRE-CROISIAU, I., *Les textes de la pyramide de Pépy Ier. Edition, description et analyse* (沛比一世

金字塔:编辑、描述与分析), MIFAO, 118 /1 -2, Le Caire, IFAO, 2001.

DOBREV, V., LABROUSSE, A., JANNOT, F., MATHIEU, B., MINAULT-GOUT, A.,《La dixième pyramide à textes de Saqqâra : Ânkhesenpépy II》(撒卡拉的第十座铭文金字塔:安赫森沛比二世), *Bulleti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法国东方考古学研究所专刊), 100, 2000, p. 275 - 296.

EDWARDS, I. E. S. , *Les pyramides d'Egypte* (埃及的金字塔), Paris, Le Livre de Poche, 1997, 2e éd. 1992.

LAUER, J. -P., *Le mystère des pyramides* (金字塔的秘密), Paris, Presses de la Cité, 2e éd., 1988.

LEHNER, M., *The Complete Pyramids* (完整的金字塔), Londres, Thames and Hudson, 1997.

MATHIEU, B.,《Que sont les Textes des pyramides ?》(金字塔的铭文是什么?), *Egypte, Afrique et Orient* 12, Avignon, Centre vauclusien d'égyptologie, février 1999, p. 13 - 22.

MATHIEU, B.,《Les travaux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en 2003 - 2004》(2003—2004 年法国东方考古学研究所的工作成果), *Bulleti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法国东方考古学研究所专刊), 104, 2004, p. 585 - 762.

STADELMANN, R. , *Die ägyptischen Pyramiden* (埃及的金字塔), Mainz am Rhein, Phillip von Zabern Verlag, 1997.

VERCOUTTER, J., *L'Egypte et la vallée du Nil. I-Des origines à la fin de l'Ancien Empire* (埃及与尼罗河谷:溯源直至旧王国时代), Paris, PUF, Collection《Nouvelle Clio》, 1992.

VERNER, M., *The Pyramids: Their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金字塔:它们的考古及历史), London, Atlantis Books, 2003.

西班牙土地上的腓尼基人与希腊人
——铁器时代“远西”地区的文化接触与交流模式

莫雷(Pierre MORET) 著
周莽 译

对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这些从地中海中部或东部出发的冒险航海家来说，伊比里亚半岛代表着一片“远西”之地，与“远东”之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旅行者同样的神秘和富有吸引力。

在已知世界的尽头，伊比里亚对于他们首先是一个传奇的对象。人们对于这一地区的看法建立在一些非常古老的神话的基础上和财富不计其数的声名之上。对于腓尼基人和其他近东民族来说，这是神奇的“他施”(Tarshish)[1]，富产金属，在《圣经》中曾多次被引述。对于希腊人而言，这是日落的神秘国度，一片世界尽头的土地，这里住着曾被赫拉克勒斯(Héraclès) 战胜的怪物，比如有三个身体的巨人革律翁(Géryon)，是被英雄所夺走的牛群的守卫者，还有在赫斯珀罗的女儿(Hesperides)的花园寻找金苹果时必须要杀死的百头巨龙。仍旧是赫拉克勒斯，在取得这些功绩之后，他被人认为在海峡边上竖立了两根赫拉克勒斯柱，把“我们的”海即地中海与人所畏惧的“大洋”分开，以此标记了文明世界的界限。

当然，伊比里亚的现实不同于这种淹没在传奇泡沫中的形象。这一现实渐渐由考古发掘揭示出来，特别是委拉士开支研究所进行的发掘活动，本文将就此展开论述。

目前，在西班牙、北非由“委拉士开支研究所”支持或直接组织的考古计划覆盖了很长的时间段，从铁器时代早期到中世纪末。所以除了我将要同你们谈到的文明，本所的计划还涉及到罗马帝国和西方阿拉伯—穆斯林文明。所涉及的主题同样是多样的，比如与殖民者接触中的本地文化的演变、城市与建筑形态、水资源控制、耕地组织和矿产开发，恕我不一一列举。在此次会议的框架中，

不可能汇报甚至列举所有的计划。我不得不有所选择，所以我将谈一下我自己参与最多的计划。

这个计划在皮埃尔·卢亚尔(Pierre Rouillard)领导下发起于80年代，将法国和西班牙的研究者紧密联合起来，在两个地区进行，即东南部的阿利坎特省(Alicante)和埃布罗河谷地的下阿拉贡(Aragon)地区（图1）。断代上涉及铁器时代，即西班牙的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的时期。从主题上看，计划是为了更好理解发生在定居伊比里亚半岛沿岸的希腊和腓尼基商人同他们在当地的主人或顾客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且重新勾勒出影响被这些交换网络所触及到的当地社会的转变过程。尤其是通过居住形式和土地组织的演变，我们试图发现这些互动和转变的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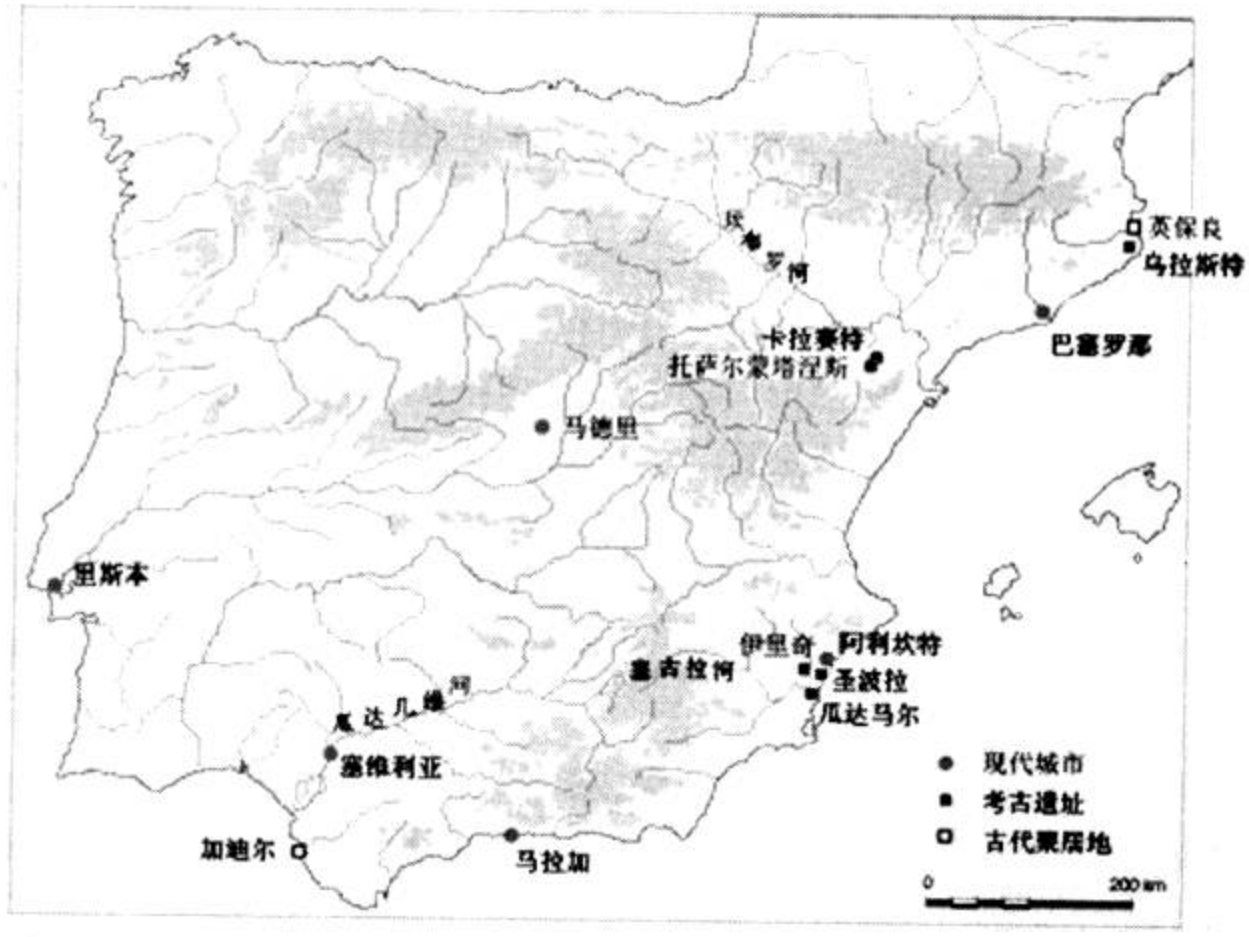


图1 文中提及的主要遗址及其在西班牙的分布

我们所谈及的这两个民族——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当他们踏上西班牙土地的时候，他们并非是征服者，也不是作为侵略者。他们在那里的代表只是一小撮冒险行商，他们寻求贵重金属，梦想着在来回各三个多月的航行之后获得巨大利润。

他们的船只出发时装载着多种多样的商品:消费品如植物油和葡萄酒、廉价货(彩色玻璃项链、埃及金甲虫像、陶制护身符、彩绘鸵鸟蛋等),但也有一些奢侈品(东方的香水、首饰、金线织物、牙雕盘子、埃及大理石花瓶、青铜或雅典陶瓷的餐具)。这些贵重物品是针对当地首领的,赢得他们的好感是必不可少的。作为交换,东方商人们希望得到他们看重的财富,即古代近东地区紧缺的银矿和锡矿石。西班牙的确在山地地区蕴藏着几处欧洲含量最高的银矿。

一 腓尼基人与当地人(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

1. 瓜达马尔(Guardamar)港

腓尼基人最早来西班牙定居——确切地说是在直布罗陀(Gibraltar)海峡之外的加迪尔(Gadir,现今的加的斯 Cadix)——的时间有争议,但我们可以大致确定在公元前9世纪。随后在公元前8和前7世纪,沿着半岛南部海岸建立起另一些更小一些的贸易站。在这些贸易站中,塞古拉河口的瓜达马尔贸易站最近由委拉士开支研究所发掘(从1996年至2000年)。

瓜达马尔是我们所知的西班牙地中海沿岸最北端的腓尼基人贸易站,与马拉加(Malaga)和阿尔梅里亚(Almeria)的贸易站距离数百公里。就这一项来说,这是研究西班牙东南部铁器时代的一个主要参照点。

距离腓尼基人在西欧主要基地如此之远的地方选址是容易解释的。塞古拉河(Segura)下游谷地从青铜时代末期(即从公元前20世纪末以来)就是本地区所有交易网络的一个枢纽,对于各方来的船都是一个首选中途站。这里也是通往半岛腹地的最方便的陆路的起点。

塞古拉河口如今已经被沉积土淤塞,在当时却是一片宽阔的海湾。在这片三角洲南岸,新来到的人们在大约公元前730年定居在地势略高的地方,在一片隐蔽的小海湾上面,那里为船只提供了一片不错的锚地。两个世纪之后,对这个站点的弃置可能是由这片小海湾的淤积造成的,淤积渐渐使定居点远离了码头。

我们已掌握的资料并不能让我们认为腓尼基人在瓜达马尔定居的原因是出售过剩的农业品或者渔业产品,比如在后来成为这一地区财富的咸鱼。这里首先是一个商业中转站,而不是生产地。从东方或西班牙南部(加的斯、马拉加)其他腓尼基殖民点来的贸易商在瓜达马尔可以与内陆的当地人群建立关系,并与他们交易。依靠长久以来(远在殖民地建立之前)由塞古拉河谷构成的渗透

和交易的道路，他们还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些来自远方的中央高原和上安达卢西亚（Andalousie）的产品。

发掘只触及遗址的一个局部，遗址几乎完全被沙丘覆盖，与古代相比距离大海要远得多。在遗址中心，一座中世纪穆斯林寺院覆盖了腓尼基地层，使得我们不可能对遗址进行完全发掘。所以我们不得不集中研究一片边缘地带，即沿着城墙的位置（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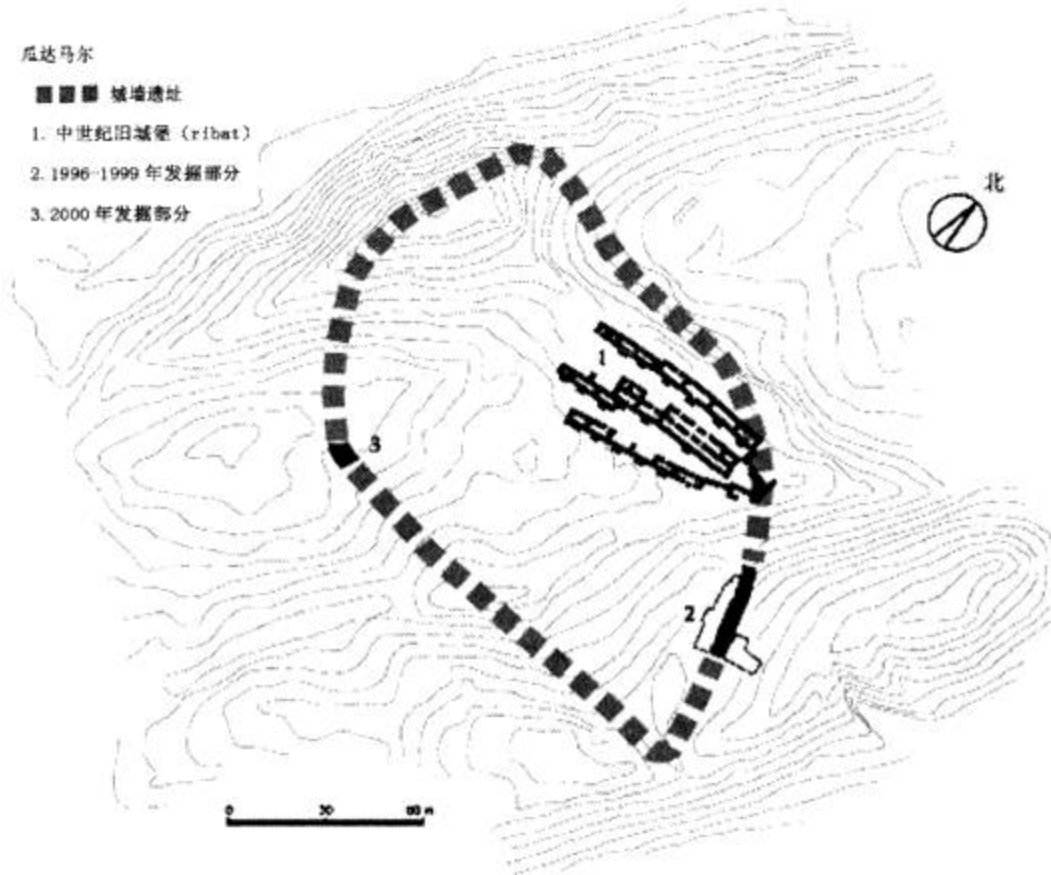


图 2　瓜达马尔：遗址图

发掘的最初结果显示这并非一处纯粹的腓尼基人定居点。证据显示这是一处混合居住地，其中较大的当地人组成成分可由日常使用的陶器证实。当地传承的非陶轮制餐具的比例在前 8 世纪末叶定居点建立时高于 60%，在整个前 7 世纪仍然占 35%。相反，建筑技术和城市框架无疑是属于腓尼基人的（图 3）。前 7 世纪确立的建筑形式是按照叙利亚—巴勒斯坦沿岸的类型，我们在安达卢西亚（托斯卡诺斯 Toscanos、梅斯基提拉山 Morro de Mezquitilla）和伊维萨岛 Ibiza（萨·卡莱塔 Sa Caleta）的其他腓尼基人遗址找到更加相近的例证。由许多长方形小型房间组成的紧凑的房屋、地基和三层墙皮墙壁的处理（一层绿色泥灰、

石灰薄层和赭石色涂层)，是西欧的腓尼基民居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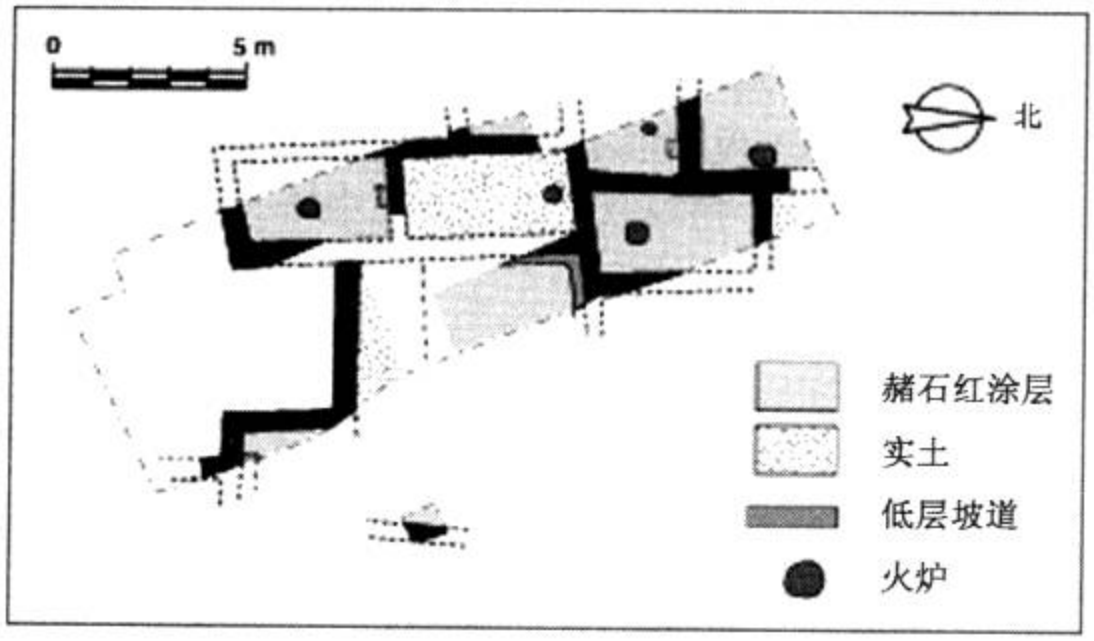


图 3 瓜达马尔:公元前 7 世纪的腓尼基房屋

大约在公元前 600 年，城市规划深层次的重新调整和城墙的建筑(图 4)——此前似乎是不存在的——是遗址上定居者群体重新组合的明显标记，与此同时纯粹东方的特征逐渐模糊。一些可能是就地加工的属于一个新类型(原始伊比里亚)的陶器出现，部分地代替了进口的腓尼基器皿。在建筑领域，我们看到一系列尝试和革新，从中看到改造腓尼基模式以适应当地使用需要的考虑。在建筑技术方面，我们看到全方位的多样化，石头地基上的生土脱坯的泥水工程从此与干打垒墙壁和柴泥墙壁并存。城墙本身的设计独特，中心是土坯砖，内外均有砌石支撑，并未表现特别的东方特色。至于房屋平面图，则正在简化并接近我们在此之后在当地看到的样子，一些一居室或两居室的长方形房屋彼此贴合。

但是腓尼基人并没有消失，在此后建筑中发现的一些零散的聚落证实他们这一时期的存在，至少有一座东方类型的大型建筑(庙宇或者丧葬建筑)，可以从某些突饰形式辨认出来(图 5)。但是，一切都表明东方人的小团体渐渐融入人数众多的当地人口之中，瓜达马尔定居点应当对内地居民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瓜达马尔遗址最终于前 6 世纪末被废弃，此时海上贸易转入希腊人和迦太基人手中。但是居住此地的混合群体在这个地区留下的种子对于一种原生文明的构成有很大贡献，这一文明的东方特征的印记到一个多世纪以后仍能从建筑、雕塑、绘画和金银饰品中找到。

图4 瓜达马尔:从南部看到的发掘现象;左边,公元前7世纪的房屋(土建的,在钻探末端有经过整平的土)之上建有公元前6世纪的房屋(石砌的);右边,墙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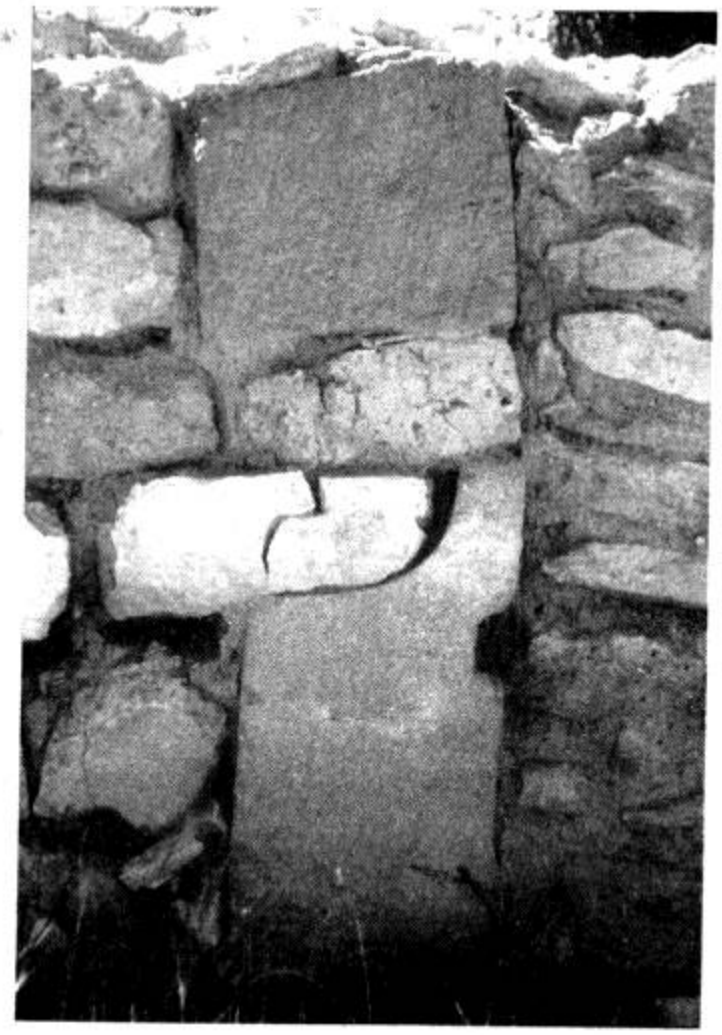


图5 瓜达马尔:东方色彩的大型建筑的埃及式带有沟槽的正檐,之后又被用在一座中世纪建筑的墙体中

在建筑方面,西班牙东南部有众多直接影响的例证。在前6世纪,我们看到各处建起一些直接受瓜达马尔的腓尼基模式启发的房屋,包含多个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居室,其中工作区域与居住和休息区分开,通常围绕着天井来建筑(例如埃林 Hellin、佩尼亚·内格拉山 Peña Negra)。

在艺术方面,影响是模糊的,但也是更加持久的。在沿河而上,距瓜达马尔10公里的卡贝祖·卢塞罗(Cabezo Lucero)墓区的公元前4世纪一个金匠墓中发现的青铜工具模具就是证明。这些模具带有典型的东方化纹样(比如英雄与狮身鹰搏斗),放在300年前的公元前7世纪的背景中也毫不逊色。我们由此涉及到伊比里亚文明的一个特色,即其在图形表现方面惊人的保守性,如果我们不称为守旧性的话。

2. 下阿拉贡地区的古伊比里亚社会变迁

在更北部一些的埃布罗河谷地中,距地中海岸 50 公里左右(更确切地说是在下阿拉贡地区),委拉士开支研究所的其他发掘工作显示出腓尼基人与内地的当地人群体之间的贸易交换网络的建立是如何在后者当中引发深刻的转变,尤其是与社会组织有关的转变,比如建立在武力价值之上的贵族制度如何出现或者得到巩固。

因为原始时期考古所拥有的有限手段,面对一些没有文字的社会,这些转变只能通过丧葬行为、日常生活习惯和居住形式来证明,这正是我们在马塔拉尼亚(Matarraña)河谷地区一个小区域所试图做的事情,将表层勘探与对保存最好的现场的发掘结合起来。

在埃布罗河谷的这个部分,东方影响从公元前 7 世纪起表现出来——比塞古拉河谷要模糊许多。没有外来人口的输入。腓尼基奢侈品的引进非常稀少,相反,盛葡萄酒或植物油的腓尼基双耳尖底瓮却散布很广。所以,在这里我们处于关系与交换链条的终端,而瓜达马尔代表着链条的起点。我们在下阿拉贡观察到的转变并不像在瓜达马尔邻近地区一样以文化濡化或者模仿的模式进行。影响是非直接的,我们在此地看到的是一次当地社会变迁,通过不平等的加剧和一个特权阶级夸耀性的确立以非常明显的方式表现出来。

要正确评价所观察到的这些事物的价值,首先必须简要谈谈在此前的阶段,即在前 8 世纪,埃布罗河谷这一部分的当地村庄与公墓是怎样的。当时的居民分散生活在丘陵顶部被防御墙围住的一些非常小的村庄里。这些微型的村民群体几乎都不超过 50 人,在住所之间没有等级表现。这些小村庄全部呈现大致相同的布局:两排狭窄的分界共有墙壁的长方形房屋,邻着小巷或中间广场。他们的坟墓是一些石圈,中心是由三块竖立条石组成的无盖石棺遮蔽着一个骨灰瓮。葬具非常简朴,通常仅有这个骨灰瓮。

大约前 6 世纪中期,在西班牙考古学家称为"古伊比里亚"的时期,事情突然变化。为了说明这种变化,我援引委拉士开支研究所在托萨·尔蒙塔涅斯 Tossal Montañés(巴尔代尔托莫镇 Valdeltormo)现场的最近一次发掘。这是俯瞰埃布罗河支流马塔拉尼亚河河谷的一座小丘陵。丘陵顶部存在于公元前 7 世纪的小村庄此时被夷平,由一座圆塔型的独立建筑代替(图 6)。这座塔占据山丘的整个时期(最多半个世纪),没有其他建筑存在。这是一座直径 8.4 米的近似圆型的工程,墙壁坚实(厚 1.45 米),由南面一个 0.80 米宽的门进入。以瓦砾体积为依据的计算可以复原一座至少 8 米高的三层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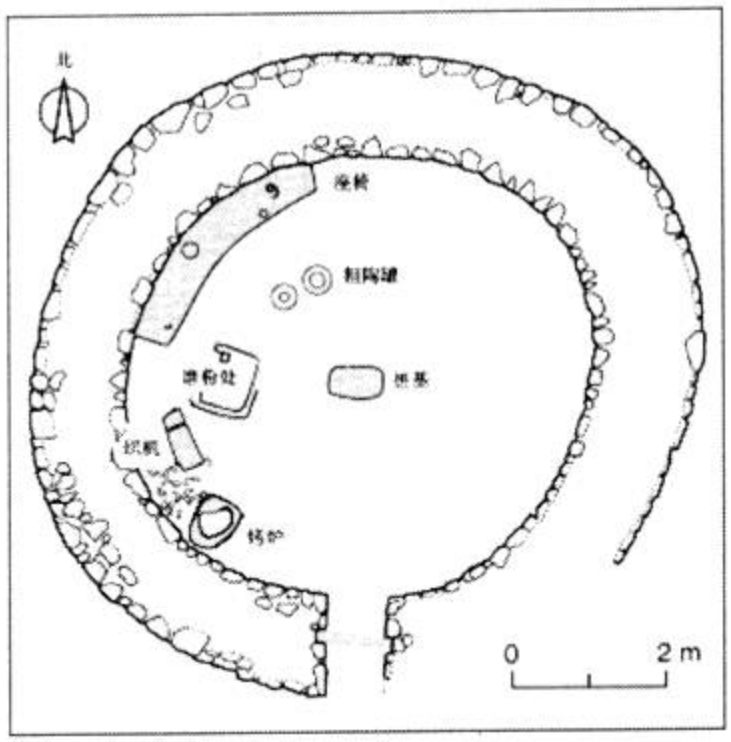


图6 托萨尔·蒙塔涅斯(巴尔代尔托莫):碉楼住宅图

由于一场大火造成多数土质或柴泥结构表面焙烧,内部布局保存完好,可以复原这座塔的多数内部设施,我们将会看到,这座塔是一座碉楼型房屋,而不是一座军事工程(图7)。底层形成一个28平方米的单间,中央是中心立柱的基础,门口右侧可能是一座通向楼上的木制楼梯。

内部设施全部集中在左半边。一条低矮的长凳用来陈列一些储物罐,长凳前的两个瓮在大火时倒扣着。一座低矮的胶泥建构可能用来进行谷物的研磨。在门的附近有一座形状特别的炊用炉灶(图8)。在石质和胶泥底座之上,一个水平放置的瓮充当炉膛。一个配了把手的胶泥盖子可以封住开口来进行闷烧。

为了更好了解塔内居民的食谱,我们根据几种技术(显微镜观察、色谱分析和光谱测定)对炉灶内和陶制容器内的提取样本进行了一些分析。识别出由圣栎树坚果和大麦粒获得的一些淀粉残余物。这表明炉灶曾用来烤制一些由一种大麦粉和栎果粉混合面构成的面包或硬饼。如同一个大罐底部的残留物(酵母和由酶化作用改变的淀粉残留)所证实的,当地居民当时还饮用大麦啤酒。最后,一个捏制陶罐提供了一些似乎在蜂蜜中腌制的带有果肉的水果的残留(硬化细胞),蜂蜜由于蜂蜡的痕迹而得到识别。

在炉灶旁边有一部石质立柱的织机,这是据我所知整个欧洲铁器时代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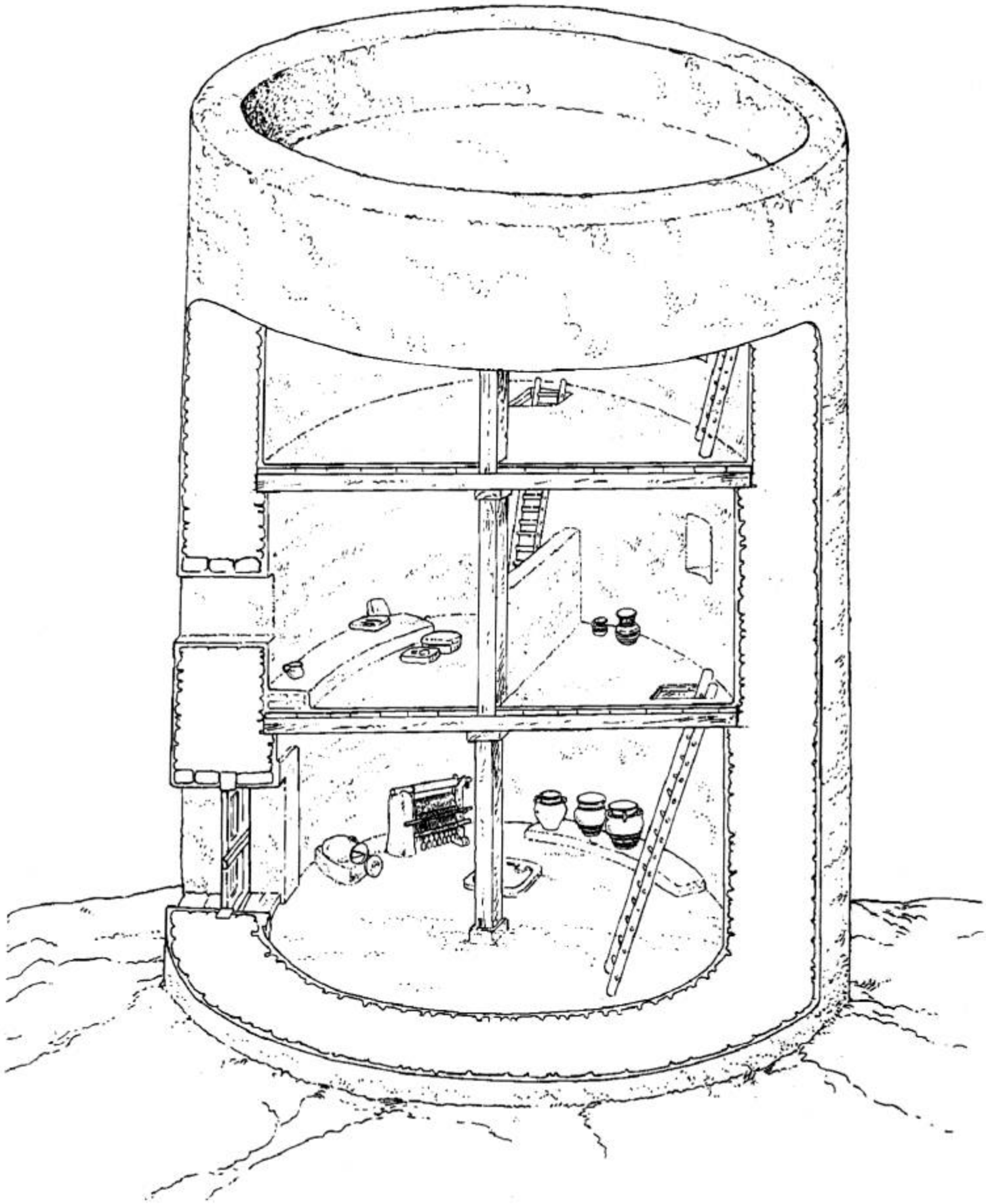


图7 托萨尔·蒙塔涅斯(巴尔代尔托莫):碉楼住宅的假想复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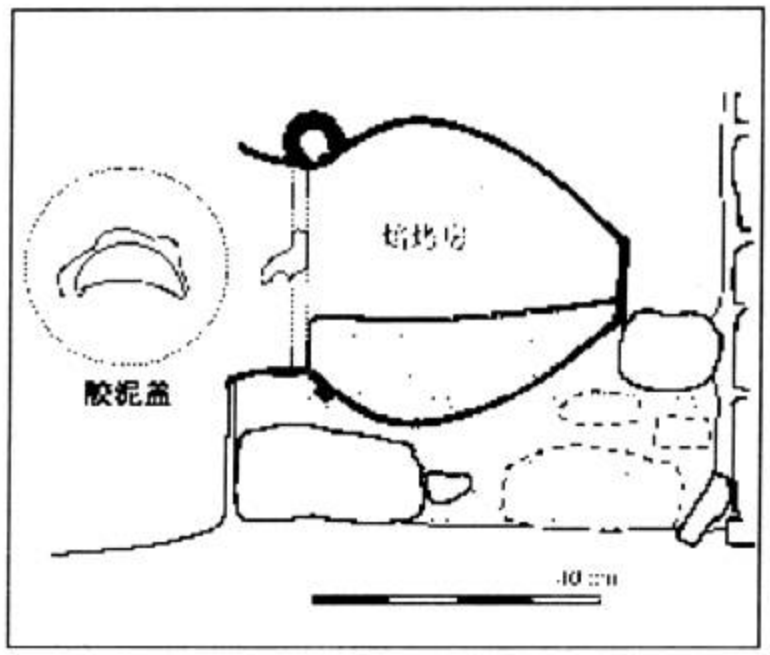


图8 托萨尔·蒙塔涅斯(巴尔代尔托莫):
炊用炉灶的剖面图

下来的惟一一部(图9)。80厘米高的石柱上挖的一些孔洞可以让我们较精确地模拟它的运作,甚至将它复原。这部织机属于应当在古代欧洲最平常的类型,我们在同时代的希腊陶器上的绘画中看到它的样子,这个类型直到现代初期还保留在北欧的一些传统织机上。但是织机表现的一个特色让所有的专家感到意外,这就是它的高度很低。我们找到堆列着的37枚配重物,在石质立柱倒下时被压碎。对从这些配重物的孔中发现的纤维痕迹进行了分析,结果是亚麻。

细致的地层发掘使我们得以将在火灾造成碉楼毁坏时处于底层的和从上层落下的东西区别开来。处于楼上的两个罐子是作为饮具的细餐具,属于受腓尼基原型启发的一种类型,肯定不是当地生产的。它们可能来自沿海,来自位于河口地区的一个作坊。楼上还放置着一部石磨和几块熔铸青铜物件用的两片一组的模具。

所以碉楼的居民拥有粮食贮存、食物加工、食物烤制、纺织和青铜手工艺所必须的布局和器具。纯粹的家务活动(炊事、纺织)在底层进行,而最珍贵的物品和更加专门的(冶炼)工具放置在上层。

这座碉楼住宅从所有层面都标志着与当地传统的彻底决裂。从建筑的角度看,房屋雄伟的外观,它的坚固防御设施,它不同于这一地区习惯的圆型平面图,它孤立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将它与从前建筑的和这一地区延续建筑的房屋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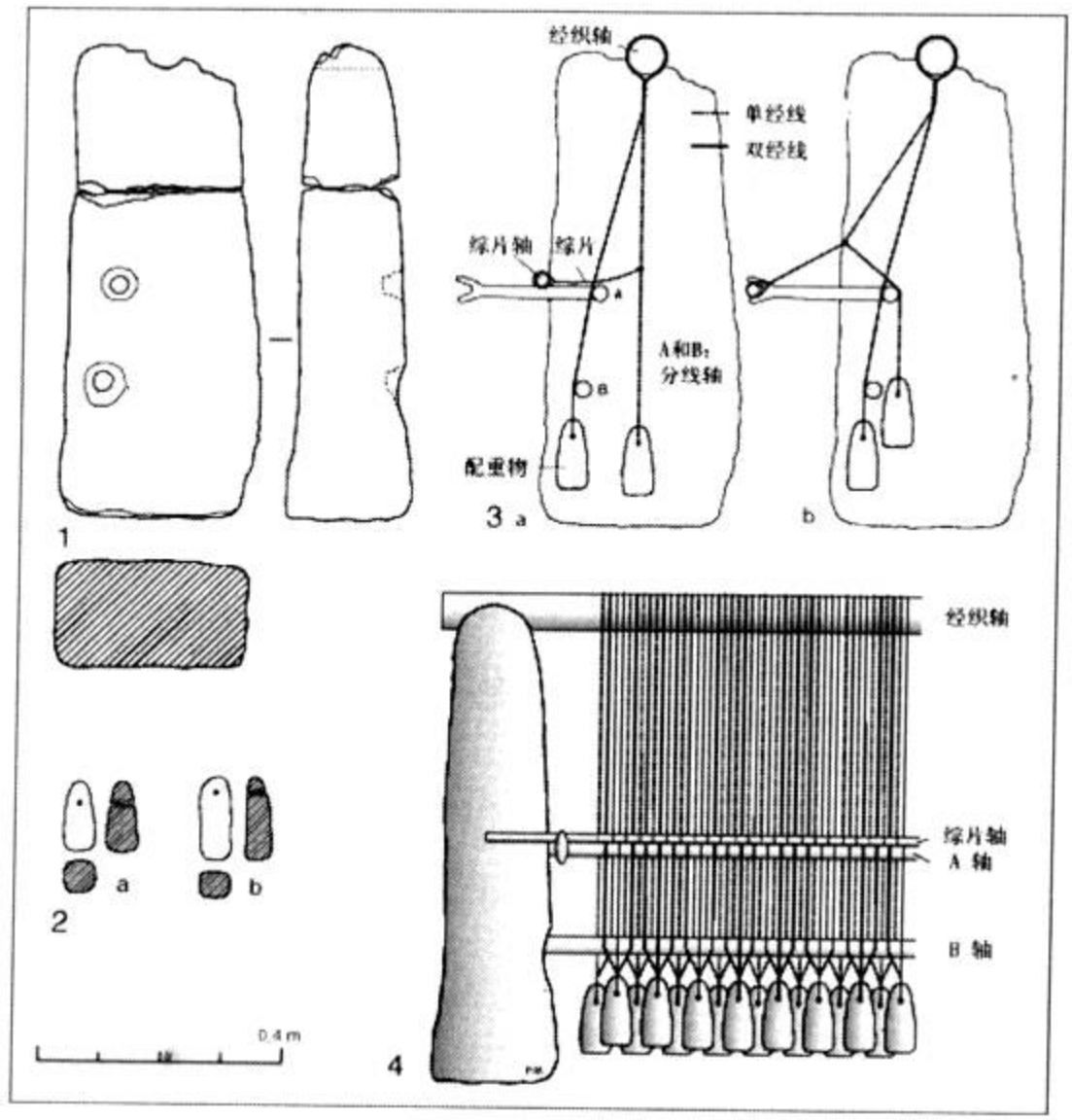


图9 托萨尔·蒙塔涅斯(巴尔代尔托莫):织机;1. 石制立柱;2. 土制配重物;3、4. 均为织机的假想复原图:3. 为剖面图,4. 为正面图;其中3-a是机综平放时的情况,而3-b则是机综抬起时的状况(图比例1:20)

别开来。而且,这座房屋有两个显著特征:所呈现的贵重的家具在这个地区是不同寻常的(家具存留下的算是较少的,因为很明显这座碉楼在毁坏时遭到洗劫),而且存贮和生产工具集中在一个惟一的居住单元——一个家族。我们应特别注意在传统的伊比里亚村庄里,食粮的储存、冶炼活动和纺织分散在几个房屋或者几座没有分工的建筑,而在此处却集中在一座孤立而且设防的建筑。

所有这一切表明当地群体的社会组织中的一些深层变化。一些村庄里农业人口继续生活在彼此粘连的小房子里,与这些村庄不同,托萨·尔蒙塔涅斯的孤

立碉楼高据在从远处明显可见的山丘上，表明了一个统治家族的权势夸耀和特权地位。所以，这座碉楼属于原史考古学者习惯上称作铁器时代“贵族住宅”的类别。

然而，埃布罗河谷在同一时代，在另一领域，经历了一个同样特别的现象，即拥有非常豪华的金属家具的墓葬。20 世纪初发现的莱斯·费雷莱斯 Les Ferreres（卡拉赛特 Calaceite）的一座坟墓因其出土的青铜胸甲、铁剑和兽型装饰的青铜锅架，是这一现象的最好范例（图 10）。靠近我们的碉楼住宅仅 300 米距离，我们在另一个现场上进行的发掘发现几处遗迹，无疑是在古代就被毁掉的另

图 10　莱斯·费雷莱斯（卡拉赛特）：兽形装饰的青铜锅架（马德里，国立考古博物馆）

一座富有的坟墓。那就是属于这一时期埃布罗下游河谷地区富有墓葬常见类型的一件公羊形状的青铜锅架，以及属于一件希腊爱奥尼亚（Ionie）制作的大号双

耳杯的一片残片，只有很少件数的这种双耳杯到达西班牙沿岸，我们从未在距离沿岸这样远的地方发现过。

无疑这并非偶然巧合。一座孤立的碉楼不正是同一位首领墓葬奢华陈设一样表达了一种夸耀的考虑？在丧葬领域如同在建筑领域一样，这些充满军事象征的工程表明了一个控制着与腓尼基人交易并从中获取利益的贵族阶级的崛起。

但是，我们明显看到在这一时代那些带来威势的财富（武器、饰件、进口餐具等）集中在下阿拉贡的一个有限区域内，而在埃布罗河谷更加西部的区域却未见任何痕迹。我们所研究的区域处于来自埃布罗河口的两条主要陆路的汇合点上，它的特殊位置并未造成推动向更加内陆地区的再分配。进口的奢侈品以某种方式被就地占有和收藏，这是由当地贵族发起的，并且可能纯粹是为他们自己享用。

这种占有策略明显在社会层面和经济层面是一个不稳定因素。这个策略无疑不能长期维持，而公元前500年左右城堡建筑和富有墓葬的突然消失表明半个世纪前建立起的制度不久就崩溃了。

二　希腊人和伊比里亚人

希腊人首先接触安达卢西亚沿岸，但是希腊人在西班牙的第一个而且在两个世纪中惟一的殖民地却是在加泰卢尼亚沿岸的埃姆波里昂 Emporion（如今的安普里亚斯 Ampurias，靠近拉埃斯卡拉 l'Escala），是在大约公元前580年建立的。这些希腊人是来自小亚细亚或马赛的弗凯亚人，是在腓尼基大城市陷入持续危机而伊比里亚“市场”对他们成为可能时来到的。埃姆波里昂长时间内只是一个很小的城镇，这并非一个移民殖民地，而只是一个转运港口，是“远西”商路上的一个中转站。

实际上，埃姆波里昂对内地的辐射影响很小，就像定居海岸的一个小的希腊人群体和它的伊比里亚人邻居背靠背生活着，除了一片接触影响区域以外没有明显的相互作用，这个影响区超不过殖民地周围大约15公里。

相反，如果我们向南走400公里，我们会在阿利坎特地区发现一个在前5世纪和前4世纪完全进入以希腊化为标志的文化濡化进程的当地人社会。我们只举两个例子，是在这个地区而不是埃姆波里昂周围确立了一种建立在希腊字母

上的书写系统(所谓的希腊—伊比里亚文字),同是在这个地区发展起一种源自对希腊雕刻手段切身认识并使其投合当地订货者口味的艺术风格(最著名的例子是名为《埃尔切妇女》的一尊女性胸像)。简单地说,一方面他们有一个殖民地却没有周围当地人的希腊化,另一方面他们没有殖民地却有深刻的影响,至少是在伊比里亚社会的某些局部。怎样解释这一矛盾?或者,以另一种方式提问:以哪种不同于殖民地的形式,希腊人能够出现在那里并且这样大地影响着西班牙的东南部?

一大部分的答案存在于拉皮科拉 La Picola(圣保罗 Santa Pola)的遗址中,委拉士开支研究所在 90 年代初在那里进行了发掘。拉皮科拉位于刚才我们谈起过的瓜达马尔北面 10 公里。所以,选址可以由同样的理由来解释。

同瓜达马尔一样,那也是一个港口,随着 2000 年来海岸线的移动,目前已经远离岸边。港口的修建在公元前 450 年至前 425 年之间,一个世纪之后,大约前 330 年到前 320 年之间因为未知的原因被放弃。尽管由于考古现场位于一个扩展中的海水浴场外围,遗址保存情况不好,发掘仍然揭示出较多值得注意的特点。

首先是与其平面图和建筑有关的内容。这是一个小规模的定居点,因为它的墙内面积只有 3000 平方米,包括壕沟在内,总面积 6750 平方米。居住点由一道连续的围墙界定,形成一个接近正方形的四边形(图 11a)。大门处于东北边中央,对着大海的方向。防御建筑梯级分布在 12—13 米宽的条形地带上,由 5 个连续部分组成:一道墙、斜堤、围栏覆盖的内壕墙、壕沟和一道壕沟外护墙。在城北角有一座碉塔,无疑在东角还有一座(被毁)。

内部结构只有围墙内北部四分之一我们较为了解。其余地方的古代建筑曾被完全毁坏。三排彼此平行的房屋被发掘出来。已知两条街道,一条通向东北城门。每排房屋由一些 20 平方米的长方形单间组成。这些单间可以解释为一些小居室,经常被一道内隔墙分成两部分。

围墙、街道、房屋、主要城门,简而言之,这座军事风格的小定居点的所有已知建筑都服从一张预先设计的非常规整的草图。西班牙其他地区已知的建筑没有与此相同的。如果我们将它与同样规模的本地村庄相比,我们看到这些村庄总是呈现不规则的形状,在他们的城市布局中没有对称也没有使用模数制。而且他们的防御几乎总是简单得多,限于一道城墙。

对规划平面图的分析显示出系统使用了一种可能来源于希腊的模数制。街道和房屋模块相对于一条对称轴来组织,轴心由中央街道来实现(街道 2)。一

个6尺(6×29.7厘米)的模数用于绘出房屋宽度(2个模数)、街道宽度(2个模数)、房屋长度(4个模数),还有城门的规模。这种大约29.7厘米的尺几乎与弗凯亚人在他们殖民地所经常使用的伊奥尼亚—阿提卡尺完全吻合。

而且,在拉皮科拉平面图和埃姆波里昂平面图之间存在着多种值得注意的可类比性,正如最近对埃姆波里昂前6世纪修建的一组房屋的发掘所揭示的,这组房屋一直维持到下一个世纪中期,也就是到拉皮科拉建立的时候(图11b—c)。房屋相对街道的分布都与上文相同,彼此的接续也同样规则,但是最引人注意的是它们规划图的吻合。在这两个案例中,街道宽度与房屋宽度(由分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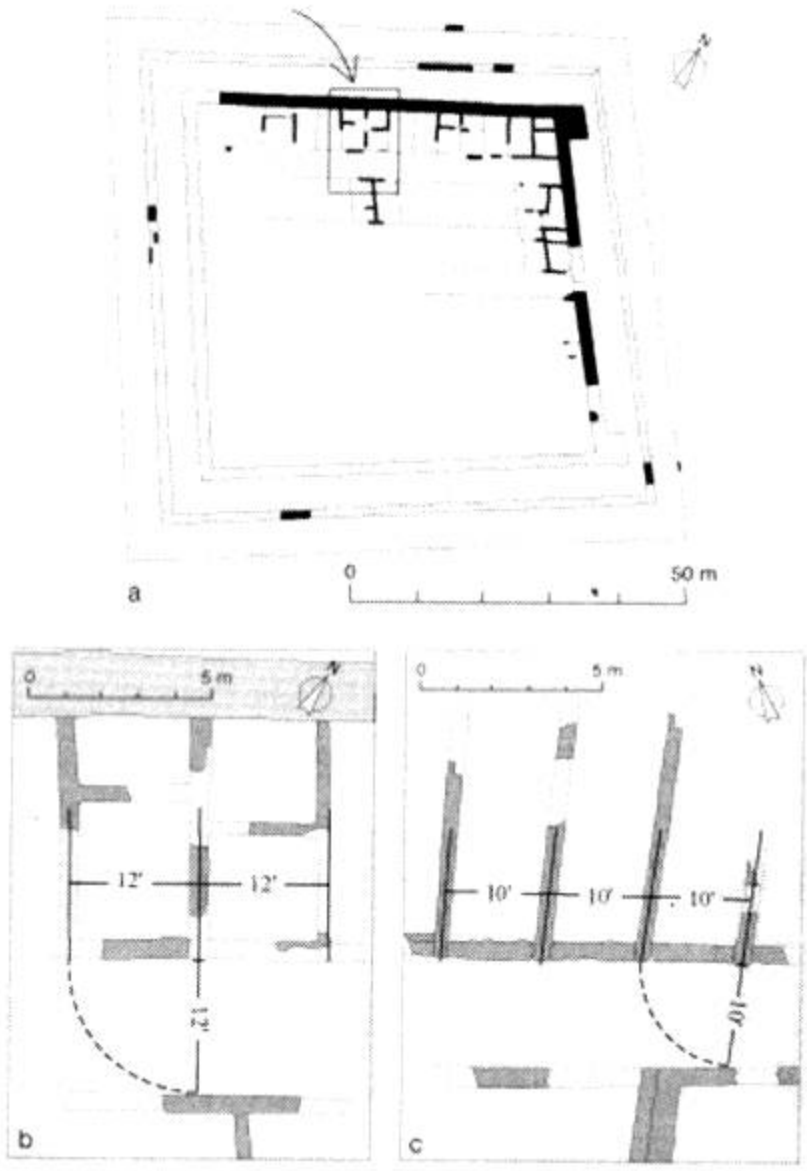


图11 拉皮科拉(圣波拉,阿利坎特):a遗址图;b一座房屋和两排房屋中的一条街道的细节?;c埃姆波里昂:公元前6世纪中期的房屋。图中模数均以"步"为单位

墙的中心轴距测得)是完全相同的。惟一区别在于所使用的模数,在拉皮科拉是12尺,在埃姆波里昂可能是10尺,使用的测量单位相同,在29.5厘米到30厘米之间。

但是,尽管有这一切吻合的特征,拉皮科拉不能被看作一个希腊居住点。我们对其居民的了解实际显示出他们并非希腊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中大多数并不过"希腊式"的生活。希腊陶器只占已发现餐具中的10%。这要多于这个地区已知的所有当地人居民点,但却少于殖民地(如马赛或者埃姆波里昂),这些殖民地几乎所有的餐具都是希腊的。同样缺少的还有另一些表明希腊居民存在的惯有的物质特征(金属家具、铭文、饰件等等)。

在这些情况下,怎样解释拉皮科拉定居点按照希腊类型修建,而居民却并非希腊人?考虑它的规模小,城市布局规整,它所能符合的功能归结为三个:港口活动(主要是贸易的)、借助防御来保护一个小的居民群体、监视海岸。但是,似乎可以排除在这座围墙内存在一个权力中心或者重要的宗教中心。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是在距此仅12公里的内地存在着一个大的伊比里亚人城邦,被称作"伊里奇"(Ilici,现今的埃尔切 Elche)。伊里奇在当时绝对是这个地区最重要的城市。这一地位可由集中在埃尔切的前5世纪伊比里亚雕塑最出色的成就来证实,其中《埃尔切妇女》只不过是保存最好的范例(彩图11)。

距离一个强邻这样近,难于设想拉皮科拉定居点相对于它能够有自主的存在。而且,两个定居点的地理位置必然将它们通过一种近乎机理性的依靠关系结合起来:拉皮科拉定居点是埃尔切的自然出海口。彼此之间,这是生命的联系。考虑到两个定居点规模的巨大差别——拉皮科拉0.65公顷,拉阿尔库迪亚(La Alcudia)10公顷——所表现出的力量对比,结论显而易见:拉皮科拉港只有在埃尔切的直接控制和统治区里才能够形成和发展自己的活动,拉皮科拉依附于伊里奇。

所以,这个小贸易港应当被视为由伊里奇的伊比里亚人建立的,是靠着希腊人的技术支援修建的,是为了便利与希腊人的交易,是由当地人政权控制的。这一威权的存在必然吸引着地中海的贸易商,因为一座有力城邦的庇护对于他们是安全和商业交易延续性的一种保障。

在拉皮科拉沿地中海岸应当存在另一些类似的港口。像埃姆波里昂一样的殖民点本质上倾向于防范内地,因为他们首要的考虑是葆有自己文化的同一性和政治的独立性,这经常导致他们出于一些领土控制的原因与本地人邻居冲突,

但是相反，那些在本地人统治下的混合群体却为希腊思想、技术和形象的进入构建了一些真正的门户。

我们可以因此理解为何是在阿利坎特地区，可能在拉皮科拉和伊里奇之间，产生了用一种使用希腊字母的文字来记录伊比里亚语言的想法，却不是在埃姆波里昂周围。我们可以理解为何是在伊里奇而不是伊比里亚其他地区，由希腊师傅培养的雕塑师的作坊得以发展起来，而我们在埃姆波里昂殖民点周边200公里的辐射面上却没有看到任何高质量的伊比里亚雕塑。

通过这些例子，我们看到"东方化"（腓尼基人时代）和"希腊化"（希腊人时代）这些词汇实际涵盖着非常多样性的而且彼此反差强烈的一些现实。面对因地区而异的殖民或贸易策略，伊比里亚人也以不同的方式做出反应。但是在前7世纪如同在前5世纪一样，正是在地中海沿岸民族孤注一掷地杂交和融入当地人中间的那些地方，转变是最深刻的。当地社会快速转变，变得更为复杂也更为不平等。其艺术尤其彻底地更新了，向一些新的载体开放，比如在石头上雕刻，产生了一些至今仍让我们着迷的杰作。

本文是"欧亚非考古与文明——历史、考古与社会"中法学术系列讲座第61讲的讲稿。

〔注　释〕

1 《创世纪》10:4;《耶利米书》10:9 ;《约拿书》1:3;4:2;《列王记上》10:22;22:48;《诗篇》48:7;72:10;《以赛亚书》23:1;60:9。根据中国基督教协会引发"神版"《新旧约全书》。——译者注

参 考 文 献

BADIE, A., GAILLEDRAT, E., MORET, P., ROUILLARD, P., SANCHEZ, M. J. et SILLIERES, P., *Le site antique de La Picola à Santa Pola (Alicante)*[圣波拉的拉皮科拉（阿利坎特）之古遗址], Paris, Editions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Casa de Velázquez, 2000.

MORET, P., 《El Tossal Montañés (Valdeltormo, Teruel) : une maison-tour

ibérique du VIe siècle av. J.-C.》(托萨尔·蒙塔涅斯:一座公元前6世纪的伊比里亚碉楼住宅), *Madrider Mitteilungen*, 42, 2001, p. 85-101.

MORET, P.,《Maisons phéniciennes, grecques et indigènes : dynamiques croisées en Méditerranée occidentale (de l'Hérault au Segura)》(腓尼基、希腊和本地房屋:两地中海地区交汇的动力), dans J.-M. LUCE éd., *Habitat et urbanisme dans le monde grec de la fin des palais mycéniens à la prise de Milet (Colloque international, Toulouse, 9—10 mars 2001)*("从米切利宫殿末期米列斯的被占时期希腊世界的人居和城市化"(国际研讨会,图卢兹,2001年3月9—10日), *Pallas*, 58, 2002, p. 329-356.

ROUILLARD, P., GAILLEDRAT, E. et SALA, F., *Fouilles de La Ràbita de Guardamar II (Guardamar del Segura, Alicante). L'établissement protohistorique de La Fonteta (fin VIIIe - fin VIe s. av. J.-C.)*(瓜达马尔II[*Guardamar del Segura, Alicante*)的居所发掘:拉封特答(公元前8—6世纪)的史初建构], Madrid, Casa de Velázquez, 出版中(2006).

晨雾缭绕的塔索斯岛
——古典和希腊化时期(公元前5—前1世纪)一处帕罗斯人的殖民地

缪理业(Dominique MULLIEZ) 著
何竞 译

在古代,今天意义上的希腊并不存在,在当今希腊的领土上当时存在着一些既是城市又是国家的实体,它们各自有自己的法律、历法、货币和崇拜偶像。希腊语称其为 *polis*,我们将其称为城邦。每个城邦均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它的核心部分,是一座具有行政、政治、经济、宗教等职能的城市,另一个是被城市用来耕种、放牧,为城市提供自然资源的郊野(希腊语称其为 *chora*)。各城邦都想以某种方式做到自给自足,但这一目标始终未能实现。

今天法国远东学院要我来介绍法国雅典学院所做的考古工作,我想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自1911年起一直在不停发掘的一个中等城邦——塔索斯(Thasos)的情况。

一 城市与郊野:塔索斯领土安排

1.1 塔索斯岛的地理位置

塔索斯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图1)。

它是"北方诸岛中距大陆最近的一个",法国学者让·布约(Jean Pouilloux)将其比喻为"一条停在色雷斯(Thrace)岸边的大船"。面对着近在咫尺的色雷斯沿海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其好战而不好客的居民,塔索斯则张开双臂欢迎所有的投奔者,还为过往船舶提供多个避风之所。正因为如此,帕罗斯(Paros)人才于公元前7世纪选择在这里定居。

塔索斯的战略地位也很重要。"塔索斯与伊姆勃罗斯(Imbros)及萨莫特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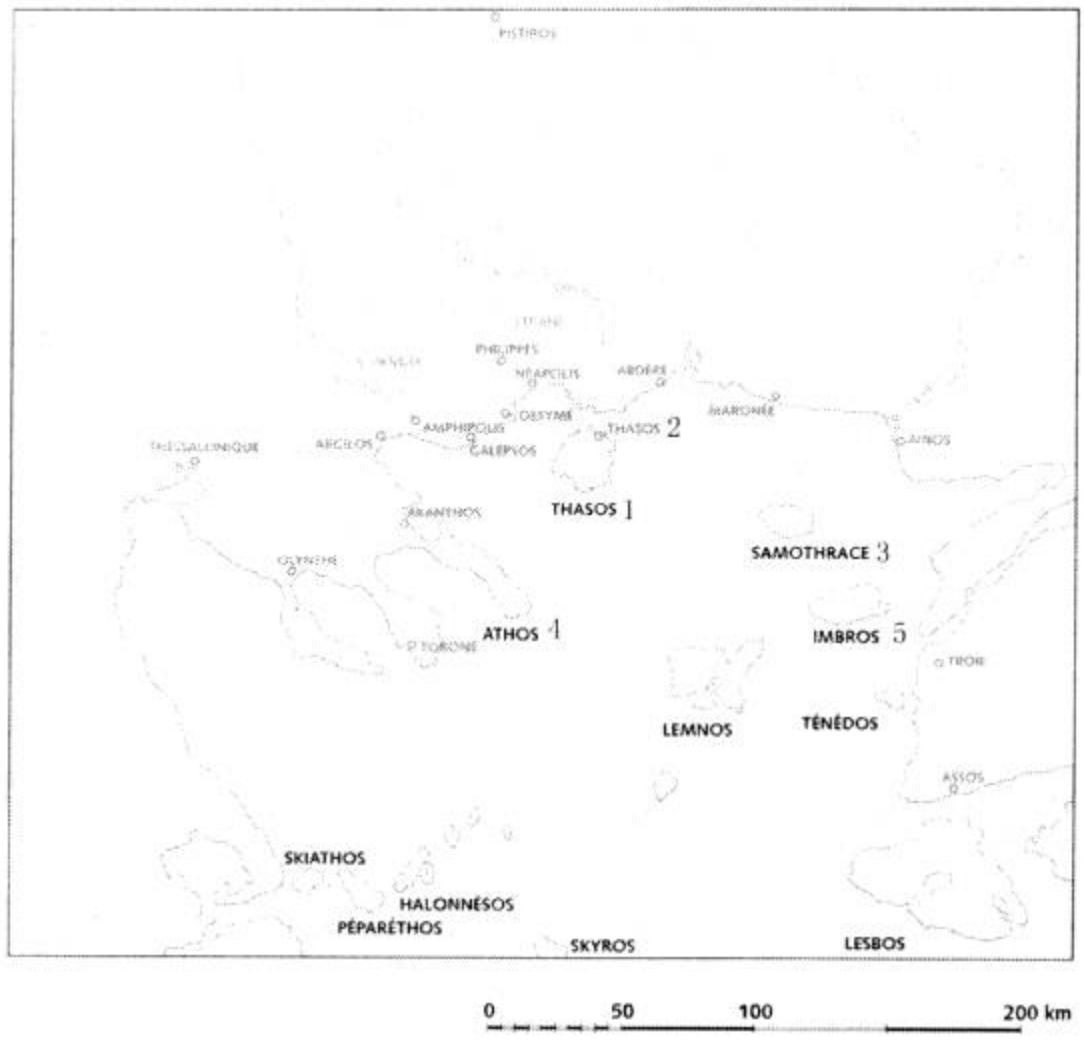


图 1 塔索斯岛在北爱琴海中的地理位置(© — EfA 版权所有):1. 塔索斯岛;2. 塔索斯城;3. 萨莫特拉凯;4. 阿索斯峰;5. 伊姆勃罗斯

凯(Samothrace)一起组成了亚洲与色雷斯之间一系列岛屿的末端,当时习惯在近海航行的船只,从达达尼尔(Dardanelles)海峡前往基克拉泽斯(Cyclades)或者埃维亚岛(Eubée)等大规模商业中心,前往雅典(Athènes)或科林斯(Corinthe)运河都沿着这些岛屿航行。这样走虽然因需向西绕行而多走些路,却是最为可靠的航道。在德莫斯梯尼(Démosthène,公元前 384—前 322 年)时期往雅典运送小麦的船队走的也是这条航道。"

1.2 岛的具体情况(图 2)

地理概貌

塔索斯的面积为 390 平方公里,地形稍微隆起,对此有两种不同的形容方法,第一种说"岛中心是山,四周均为平原"(*EG* 51);第二种则强调以西北—东南走向的山脉(其最高峰为伊普萨里翁[Hypsarion],高 1203 米)为界的两部分

之间的差别(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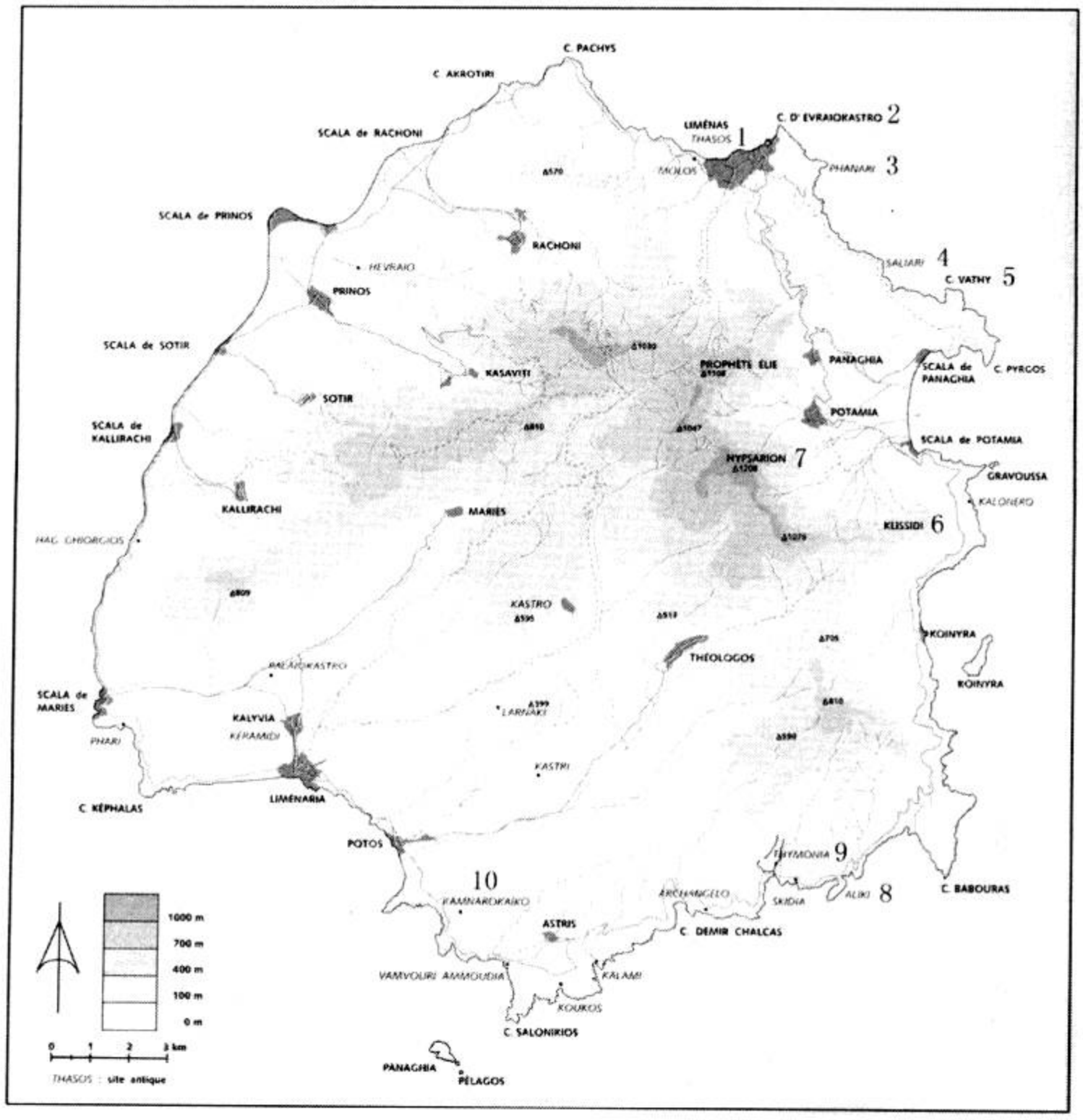


图 2 塔索斯岛地图(© — EfA 版权所有):1. 塔索斯城;2. 埃夫拉约卡斯托山峰;3. 法那利角;4. 萨利阿利;5. 瓦西;6. 克里斯蒂;7. 伊普萨里翁山;8. 阿利基半岛;9. 锡莫尼亚;10. 康诺拉海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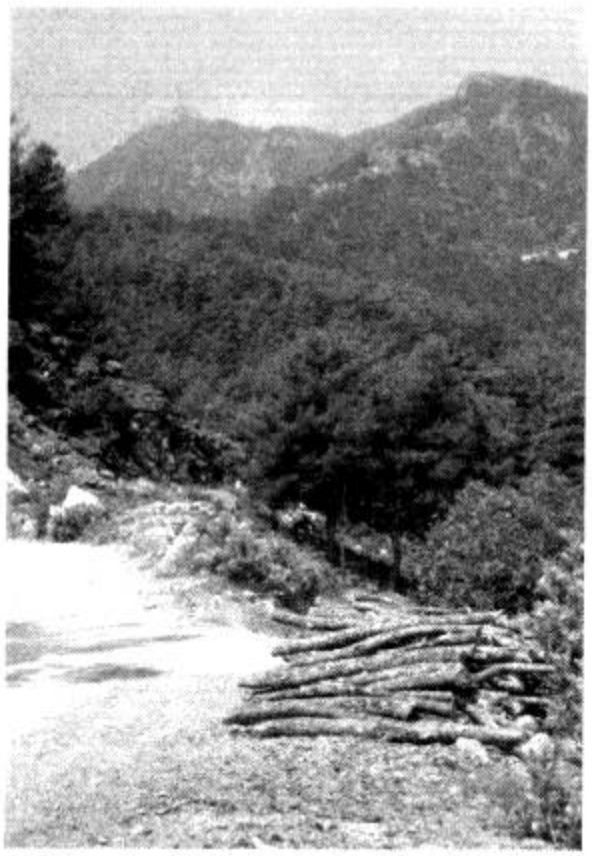


图3 伊普萨翁里山，岛屿的制高点（Mulliez 摄）

“东北部地势陡峭，沟壑纵横，崖壁悬峭，怪石嶙峋，山坡一直延伸到海湾，与大海一起构成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天气晴朗时可以一直看到萨莫特拉凯岛（图4）。

“西南部山坡较为平缓，从伊普萨利翁峰1203米的高度逐渐降低到海平面，海面的延伸被哈尔基季基（Chalcidique）山所阻隔，山的终端是呈金字塔形的圣山（阿索斯峰Athos）。”

岛上的资源

帕罗斯的诗人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que，公元前712—前672年）曾参加对塔索斯的殖民征服，他说岛就像驴的脊背，上面遍生天然林木。“岛确实被林木所覆盖，木材自古就是它的主要资源之一，因希腊的其他岛鲜有这种情况，这里的木材就更加珍贵。因为树木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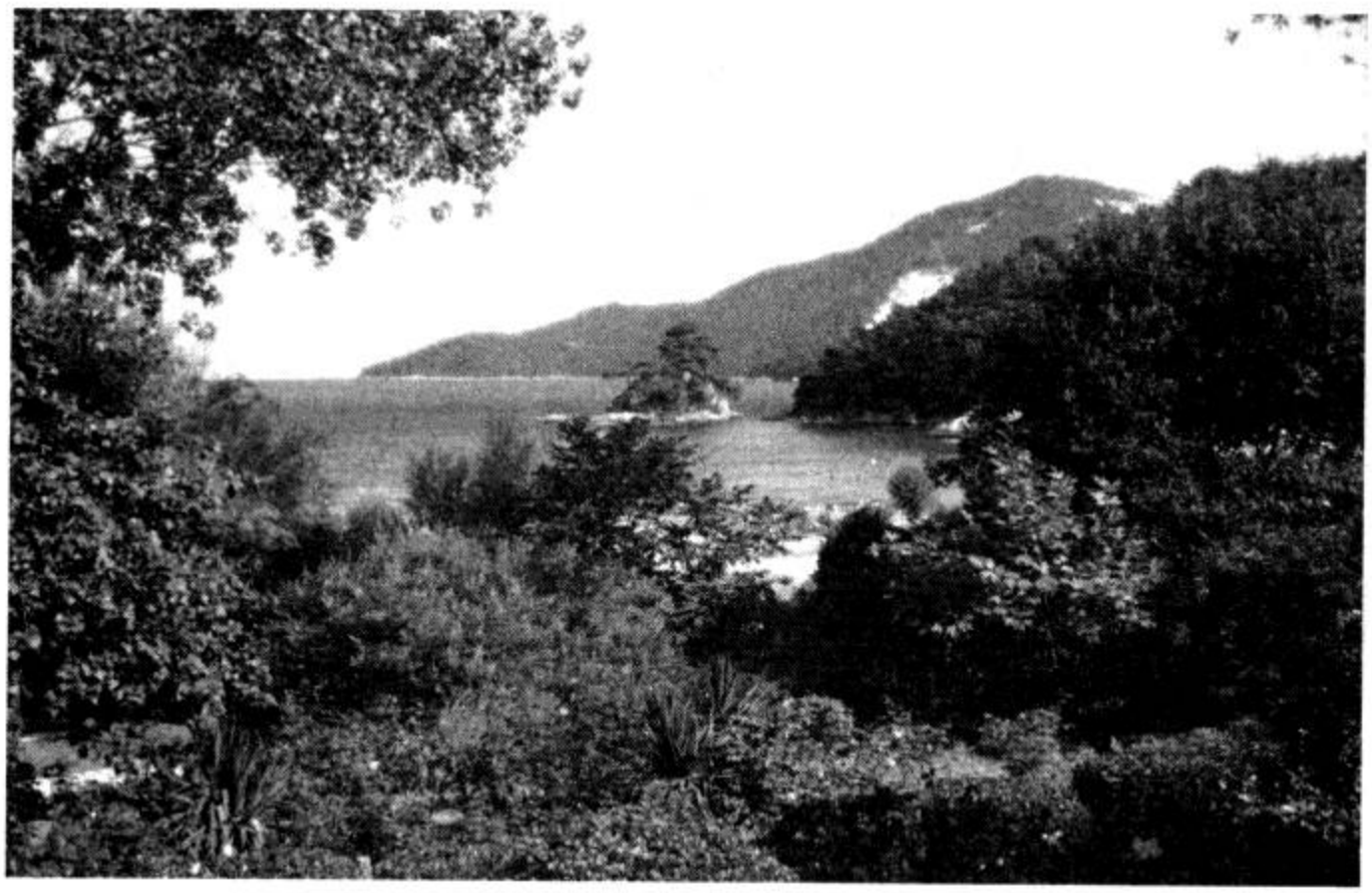


图4 塔索斯东南海岸（Mulliez 摄）

茂，岛上盛产树脂油，高大的橡树为建筑和造船提供了高质量的木材”（*G Th* 3）。总体上说，大自然非常慷慨，这里气候温和，水分充足，特别有利于作物生长。岛的矿藏也很丰富：有金矿、铁矿，大理石和片麻岩的开采至今长盛不衰。它周围的海域则是希腊的主要渔场之一。

陆缘地带（古希腊的岛屿城邦在大陆占据的区域称 Pérée）

谈到塔索斯的富庶不能不提及一点，就是如同其他岛屿一样，塔索斯也开发着一片大陆的边缘地带。这片陆缘因为矿产丰富，农业发达，并且出产优质木材而受到众多城邦的觊觎。在公元前 5 世纪，雅典人把这一地区围困了两年（公元前 465—前 463 年），按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公元前 460—前 395 年）所说，雅典人最终以一纸条约强迫塔索斯人“放弃了他们所控制的陆缘地带和一些小岛”（1.101），成了雅典的附属邦。直到公元前 4 世纪初，塔索斯人才收复了失地，夺回了经济利益。

1.3 **领土安排**

我们还是回来谈一谈岛的情况，了解一下公元前 5 世纪到前 1 世纪期间塔索斯人土地的使用安排。最近 15 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考古专家、地理学家和环境学家一起对总共 300 余个遗址进行了考察，依据考察结果“重现并解释了领土使用的总体情况，并且分析出了各不同领土单位之间的合作、互动、牵制和对立”（*EG* 54）。

依据现有的资料我们虽不能说明公元前 7 世纪到前 5 世纪时期的情况，但对其后各个时期的情况却可得出结论，领土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图 5）。

塔索斯城

它位于岛的东北隅，显然不处于中心地区，但它“在战略和贸易上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该城位于岛上离大陆最近的地点，是该城邦陆地与岛屿两部分领土的联结点，并且位于古代将雅典和哈尔基季基与海峡甚或与黑海（Mer Noire）相联接的极为重要的航道之上”（*EG* 54）。

村镇

“在城邦全部领土上，大小村镇数量众多且分布均匀，每处海滨平原上及每条山谷中都有一个村镇。村镇选址都距海较远，西部山谷中的坡地上为数最多”（*EG* 54）。

孤立的农场

第三部分是这片大地上星罗棋布又独立存在的农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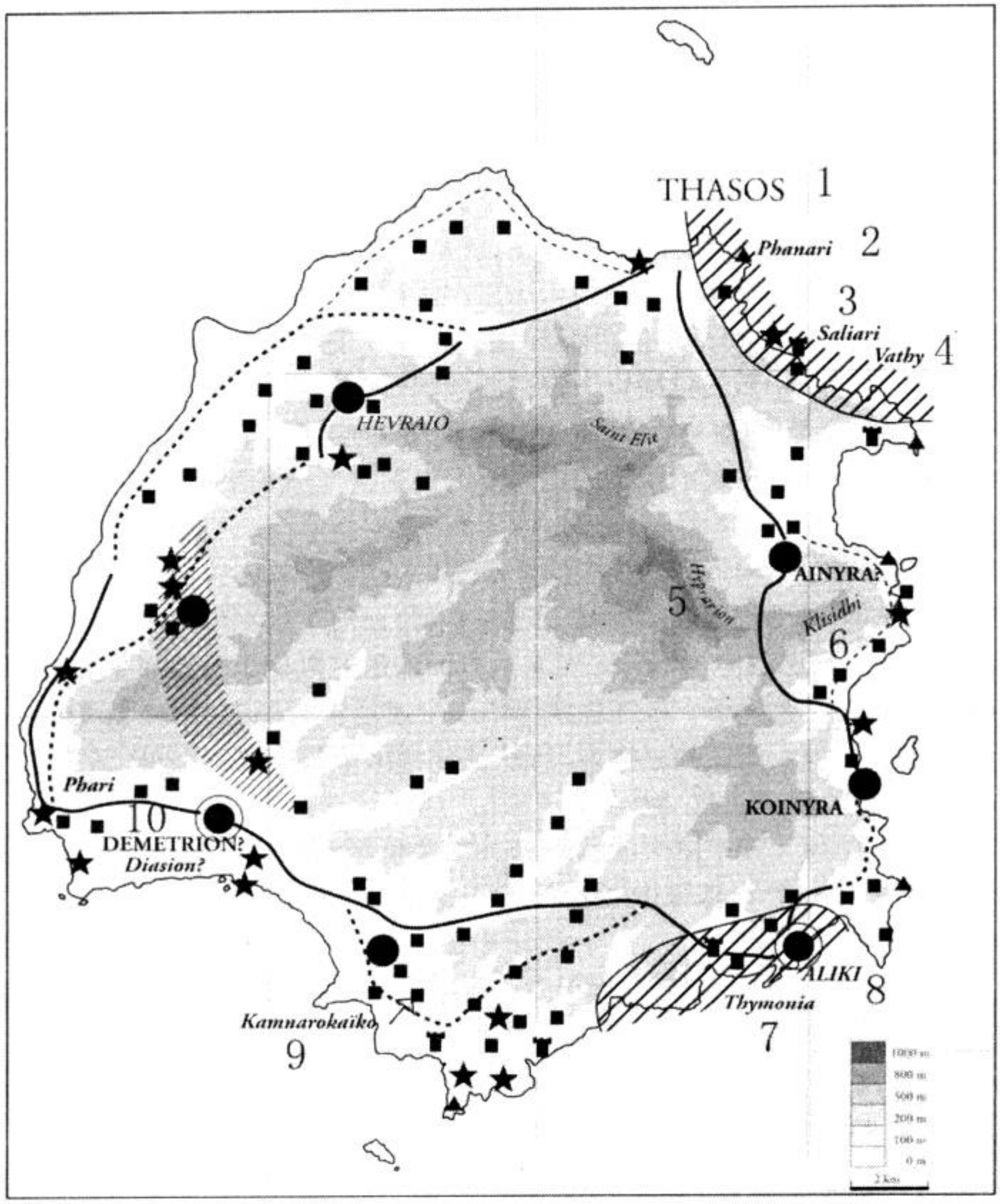


图5 领土安排:图中圆圈表示人居集中地;方块表示农场;星星表示工场(©— EfA版权所有):1. 塔索斯城;2. 法那利角;3. 萨利阿利;4. 瓦西;5. 伊普萨里翁山;6. 克里斯蒂;7. 锡莫尼亚;8. 阿利基;9. 康诺拉海科;10. 德墨忒尔神庙(得梅特立翁)

这样的领土需要一个有效的监察系统和道路网络。

楼和塔

监察的工作是通过岛上建有的一系列不同的塔和楼来完成的。随着发掘工作的进展和对领土功能划分认识的深入，我们对各种遗迹也有了更多的理解。目前我们认为有三种不同的楼和塔。

• 具有战略功能的碉楼，其作用是对领土进行监察和保护，锡莫尼亚（Thymonia）就是其中之一。

• 农场了望塔，其功能是对种植园的情况进行观察，康诺拉海科（Kamnorakaiko）是其代表。

• 沿海岸线修建的灯塔，其作用是为船只导航，法那利（Phanari）角就建有这样的塔。

道路网

考察中发现了一个与这一领土安排形式完全对应的道路网。在阿利基（Aliki）我们找到了一块里程碑，碑上记载着城邦三个主要地点之间的距离（图6）。从阿利基经西部海岸到塔索斯；从阿利基到西南海岸的德墨忒尔（Demeter）神庙（希腊语称其为得梅特立翁，Démétrion），从德墨忒尔神庙到塔索斯。“里程碑的发现说明岛上曾经存在一条环形干道。它也说明城邦对于领土政治的统一有所担心。塔索斯岛被山势分割，而居统治地位的城市又与岛的中心地区距离较远，这有可能对城邦的政治统一构成威胁。因此碑文列举了塔索斯岛最重要的三个地点——城市和位于岛最南端的两座神庙，以提醒居民维护岛的统一”（*EG* 54）。

按照这一设想，岛中部的山区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舍弃区”。但是需要指出，情况并非一直如此，自19世纪末起，反而是沿海地区变成了“舍弃区”。导致濒海平原被舍弃的原因有二：一是岛上居民人数减少，故而沿海地区越来越不适于人类居住，以至最终被遗弃；二是海盗的入侵。于是村庄逐渐向岛的内部，向山上迁移，与外部的交流也逐渐减少。可是到了19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变化，西部沿海成了最为活跃的地区；到20世纪末，由于旅游业的影响，中部山区又再次沦为舍弃区，回到了古代的状态。

图6 在阿利基半岛发现的刻有铭文的界碑
(© —EfA 版权所有)

二 城市的组织

帕罗斯人之所以在已经有色雷斯人居住的岛的东北角定居，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些特别的优点。直到今天，如果我们从大陆乘船上岛依然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图7）。首先这里的山势自卫城（*acropole*，阿克罗波里斯）脚下缓缓延伸到海面，非常适宜修建剧场。其次在高约150米的山下有一个良好的避风港，岸边又有一片降水丰沛的小平原，是爱琴（Egée）海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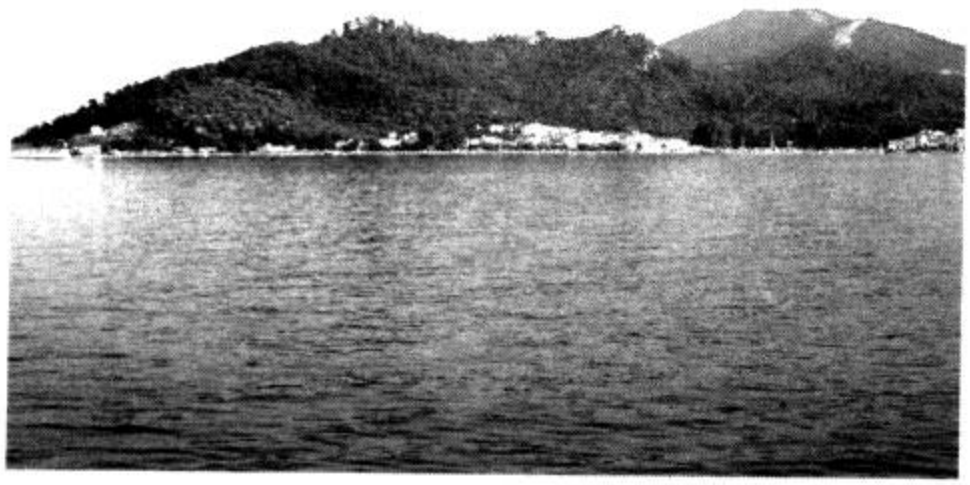


图7 塔索斯卫城（Mulliez 摄）

在这里我们不对城市进行详细的描述，只想介绍它的几个特别之处：包括了三座山峰顶上的卫城；建在山脚下的城市、阿尔忒弥斯（Artémis）神庙和赫拉克列斯（Heracles/Hercules）神庙（希腊语称其为阿尔忒弥斯翁，Artémision，和赫拉克勒翁，Hérakleion）、政治活动中心和行政管理中心；以及将所有这些都围在其中的城墙（图8）。

2.1 卫城

卫城里的三座山顶上各建有一座神庙，三座神庙的规模各不相同。

阿波罗神庙（图9、图10）

阿波罗神庙（希腊语称其为皮西昂，Pythion）建在一处南北走向的平台上，建筑已不复存在，只有部分石块因为14世纪被用于建筑热那亚（Genova）的城堡而幸运地存在至今。

雅典娜神庙（图11）

雅典娜（Athéna）神庙建在由石墙围起的高台上。神庙本身建于公元前5世纪初，好像并没有完工，现在只剩下它的基础。此前，这个地方另有一座建于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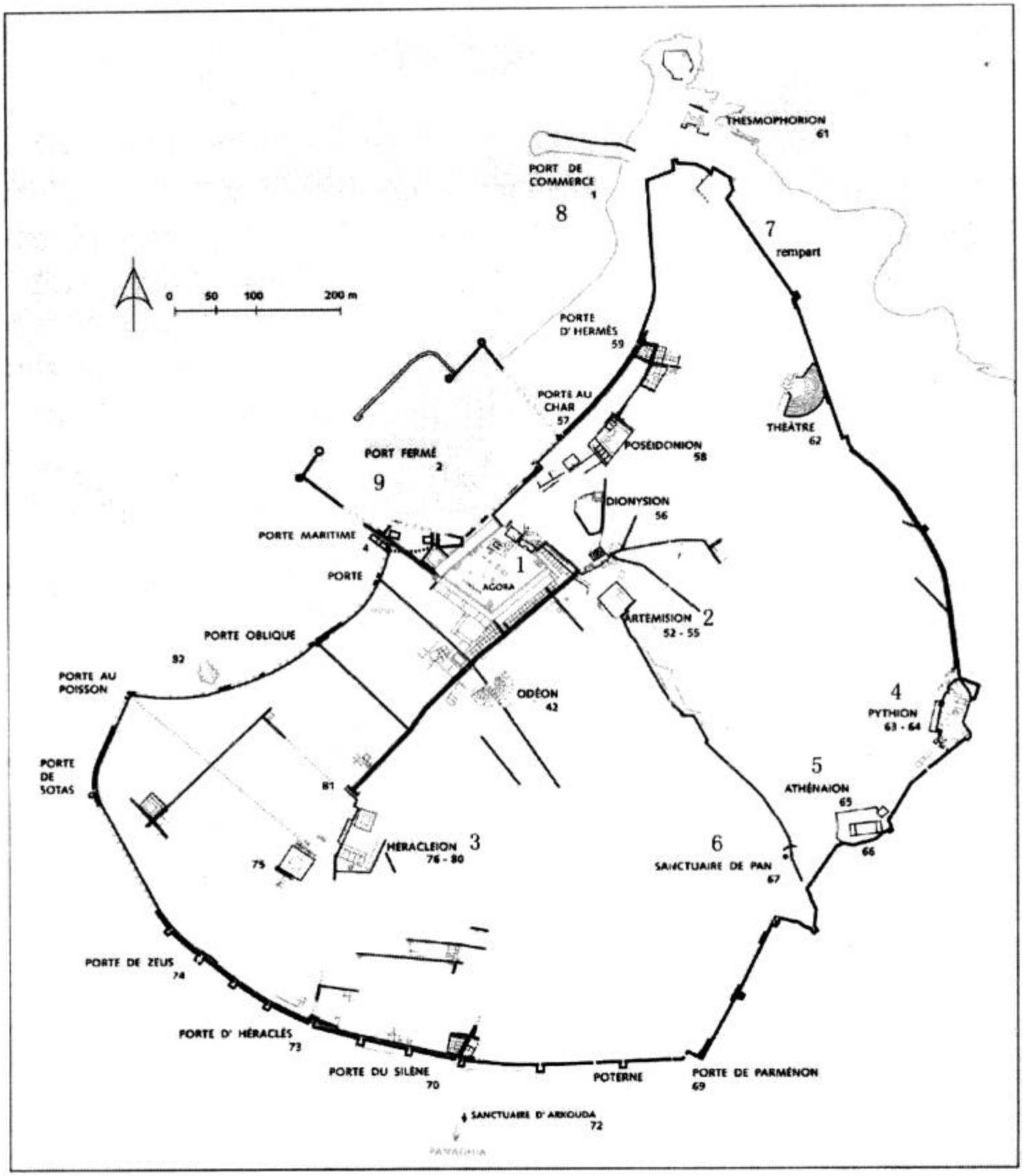


图 8 塔索斯城邦图(© — EfA / T. Kozelj 版权所有):1. 市政广场;2. 阿尔忒弥斯神庙;3. 赫拉克列斯神庙;4. 阿波罗神庙;5. 雅典娜神庙;6. 潘神庙;7. 城墙;8. 敞开的港湾;9. 围起的港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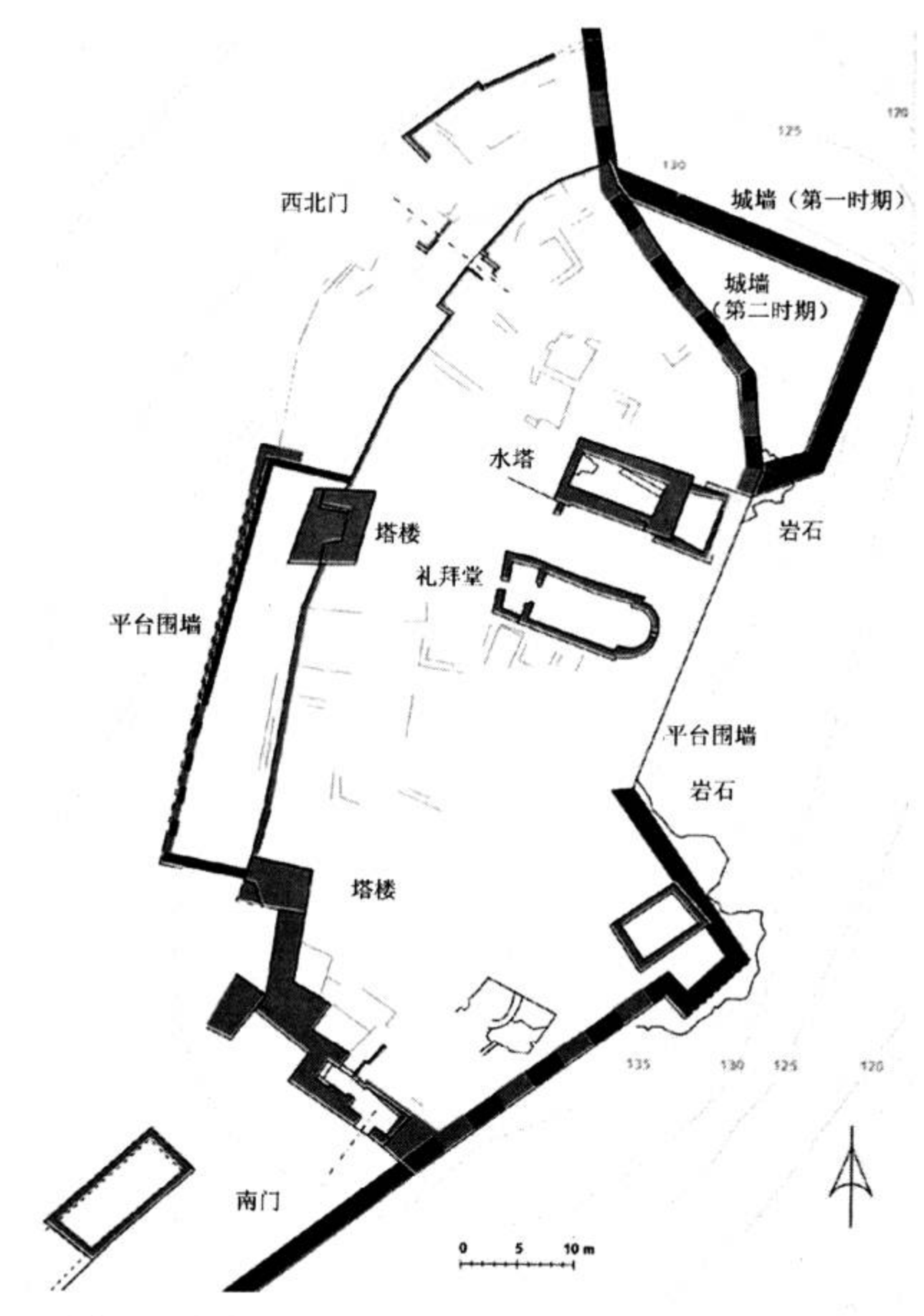


图9 阿波罗神庙的中世纪城堡之复原图(© — EfA / M. Wurch-Kozelj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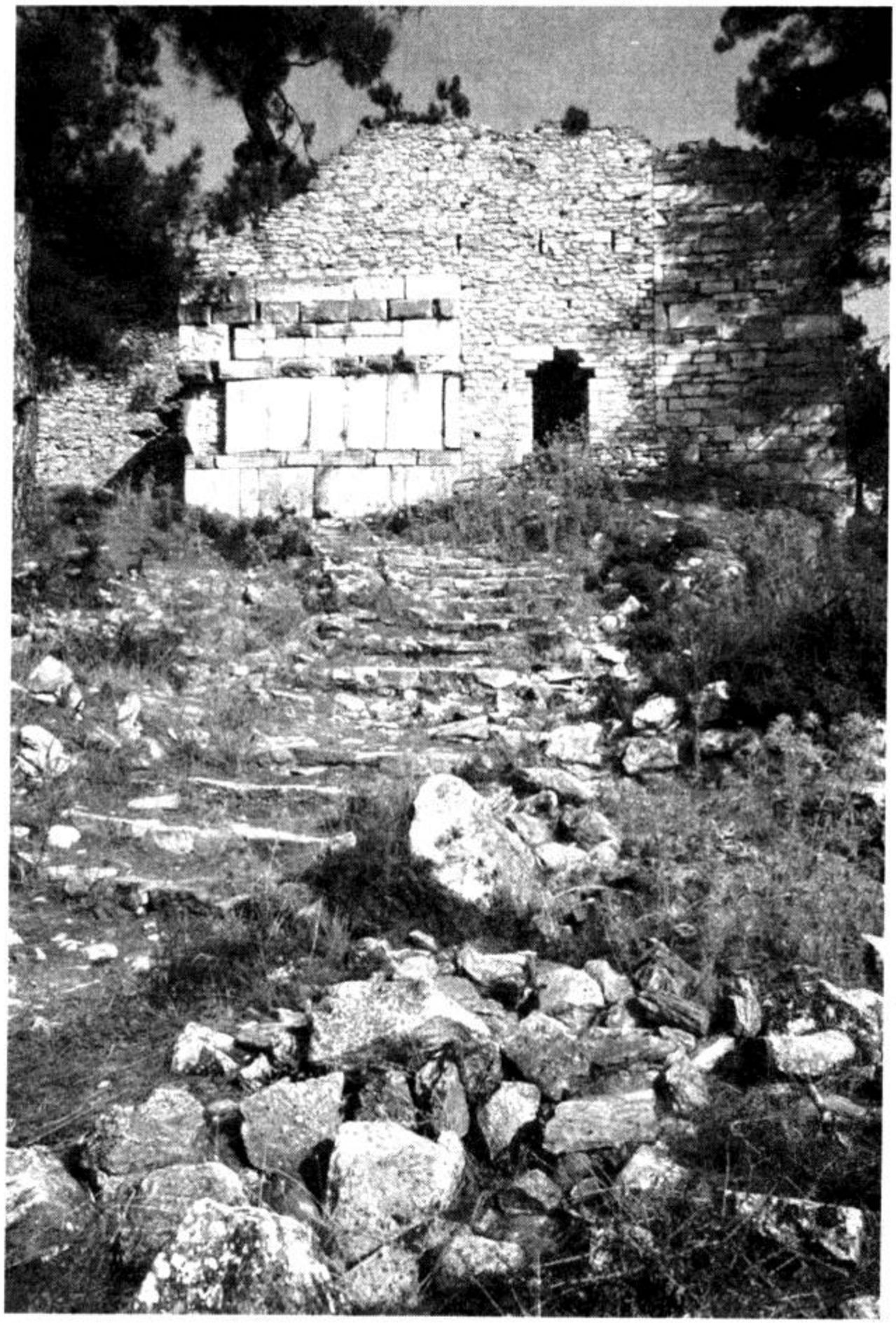


图 10 从西南面所见的中世纪城堡，对阿波罗神庙原有石块的再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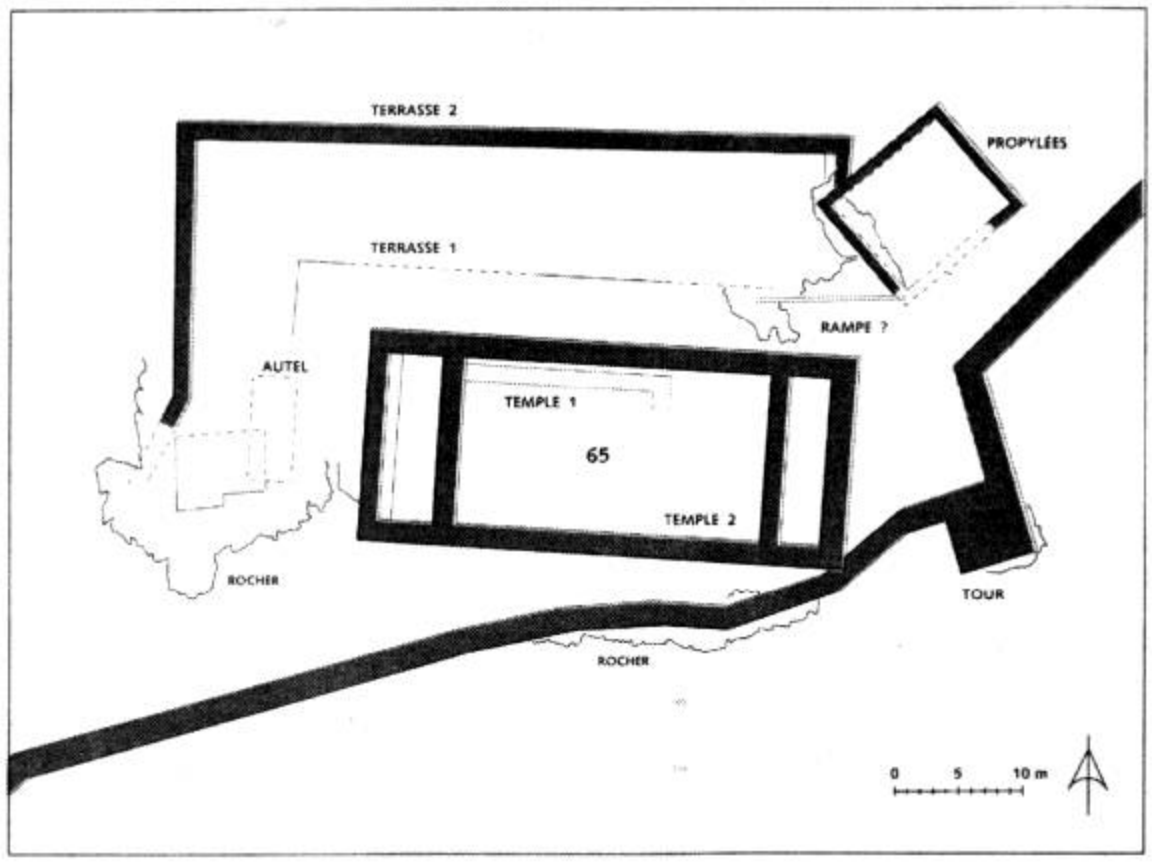


图 11 雅典娜神庙复原图(© — EfA / M. Wurch - Kozelj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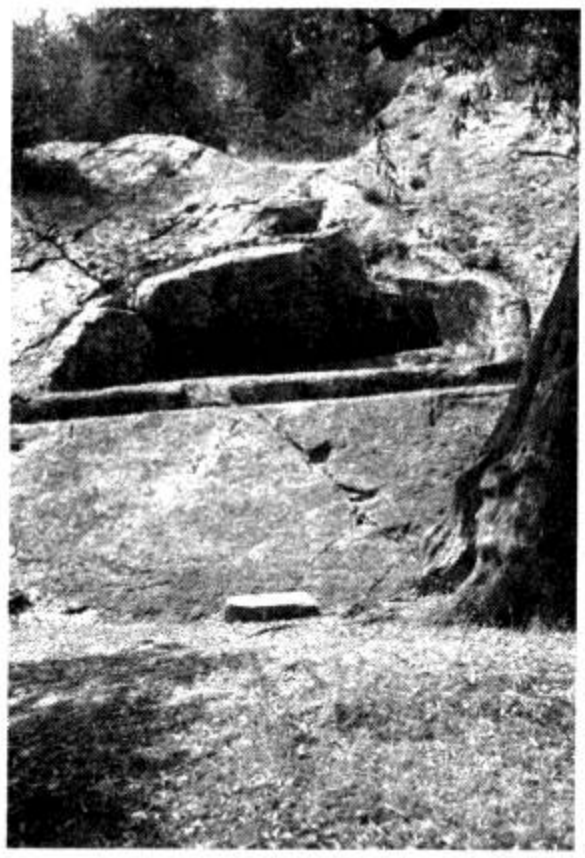


图 12 潘神庙

元前 7—前 5 世纪的古代殿宇,后者的立柱全为木质。

潘神庙(图 12)

在卫城的最高处,在上述两座最主要神庙的旁边,建有较不起眼的潘(Pan)神庙。当年,牧人和军人都到这里来祭祀以寻求牧神潘的庇护。神庙像一个在山石上直接开凿出来的石窟,墙上装饰着可能是公元前 4 世纪(?)的浮雕。

2.2 城墙和港口

塔索斯围有一道城墙,这是当时商业城邦的特点之一,城墙将全城都环绕在内(图 8),目的是保护它的居民和港口。城墙长 4 公里,它以卫城为起点,向北沿山脊延续,向南则跃

下一道陡坡延伸到平原之后再沿海岸继续伸展一直到达港口。城墙可能建筑于公元前6—前5世纪，当时波斯对爱奥尼亚（Ionio）和色雷斯等地的希腊城邦的攻击引起当地人对安全的担忧。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几处以浮雕装饰的城门都建于此时（彩图12、13）。今天我们看到的城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是不同的施工队在不同时期所进行的建筑的拼接，城墙的走向也有多次变化（图13）。事实上，公元前491年波斯人打到这里时，城墙可能尚未完工就被拆毁，波斯人败退后，城墙又被复建。但是在公元前463年城市落入克蒙（Cimon）所率领的雅典人之手后，城墙又一次被毁，到"公元前4世纪初叶，城墙再次被恢复，而后在公元前4世纪末或公元前3世纪初时又做了改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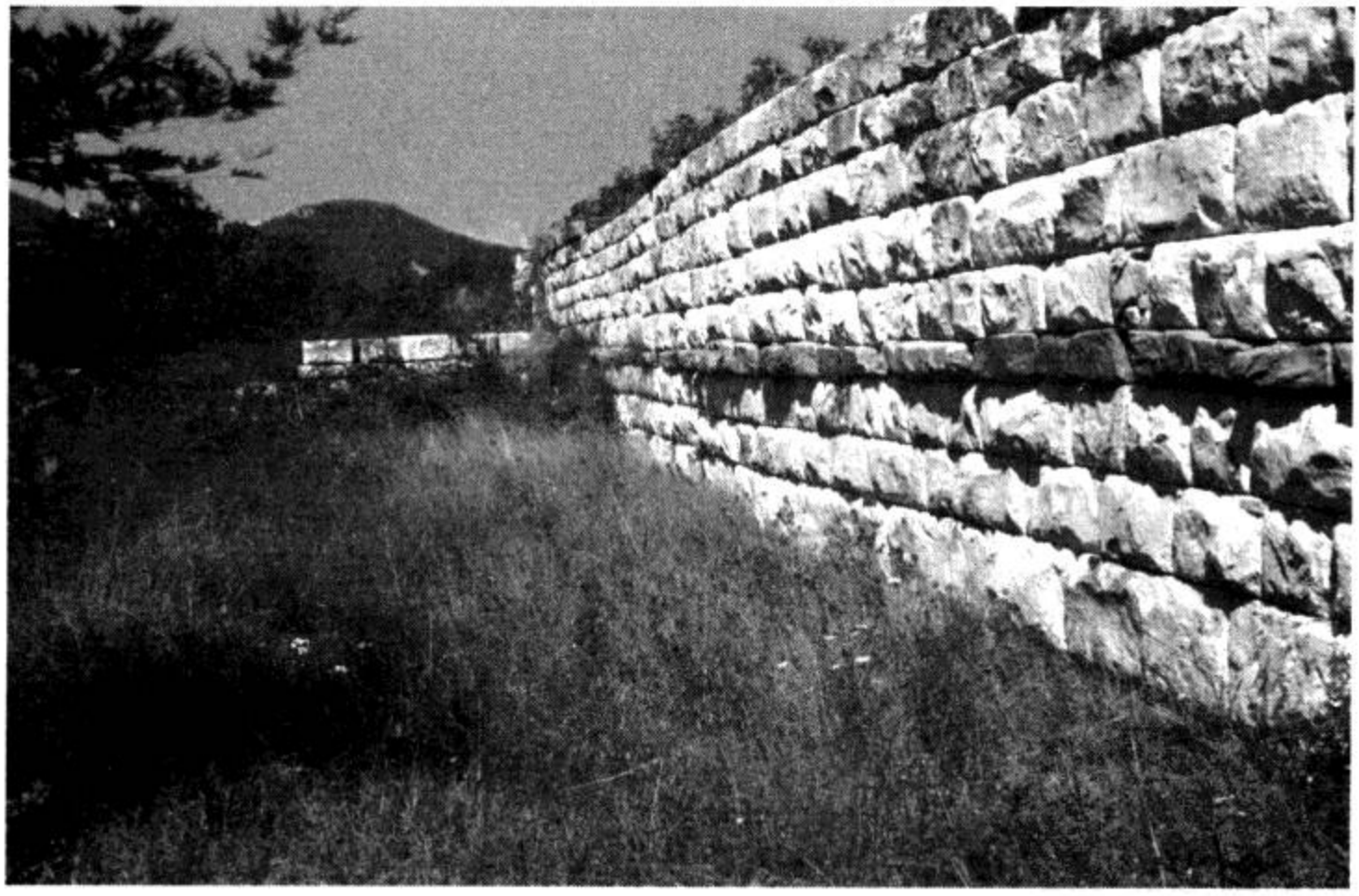


图13 城墙：雕凿规则的大理石与片麻岩（Mulliez摄）

港口作为城墙不可分离的部分，是城墙向海边的延伸，也是塔索斯城经济生活的依靠，它紧邻市政"广场"（或者市场，*agora* 阿哥拉），有两处港湾：北边是一处敞开的港湾，它受到埃夫拉约卡斯托（Evraiocastro）山峰和一道防波堤的庇护，不受任何风浪的威胁。现在水下还可以看见防波堤的基础。南边是一处围起的

港湾,数座圆形高塔守护着它的入口,锚地基础上现在建有另外的建筑(彩图14)。

当年港口吞吐量相当大,我们发现了一件公元前3世纪刻在大理石上的铭文,说的是当时港口为不同吨位的船只划定了各自的专用港区和出入港口的信道。

2.3 城市的布局和中心城区

城墙包围范围之内的地域并不都是城市,有相当大的面积一直没有任何建筑。城市的聚居区以阿尔忒弥斯和赫拉克列斯两个神庙为中心向外扩展。"神庙建在卫城下面的两处高台上,为当地最早居民所建"(*EG* 78)连接两处的道路是当时城市的主要干道。最近的一个发现给我们对城市布局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证,这是一块"港口碑",上面的文字是公元前480—前460年间镌刻的港口交通规则和对当地地形的介绍。

在卫城脚下封闭港口之东,是塔索斯城的市政广场,广场呈长方形,其面积为100米×80米,周围有大量建筑(彩图15,图14)。当地居民可能是于公元前4世纪初,在公元前7—前5世纪的遗址上对城市进行了重新设计,其建筑工程则持续了几个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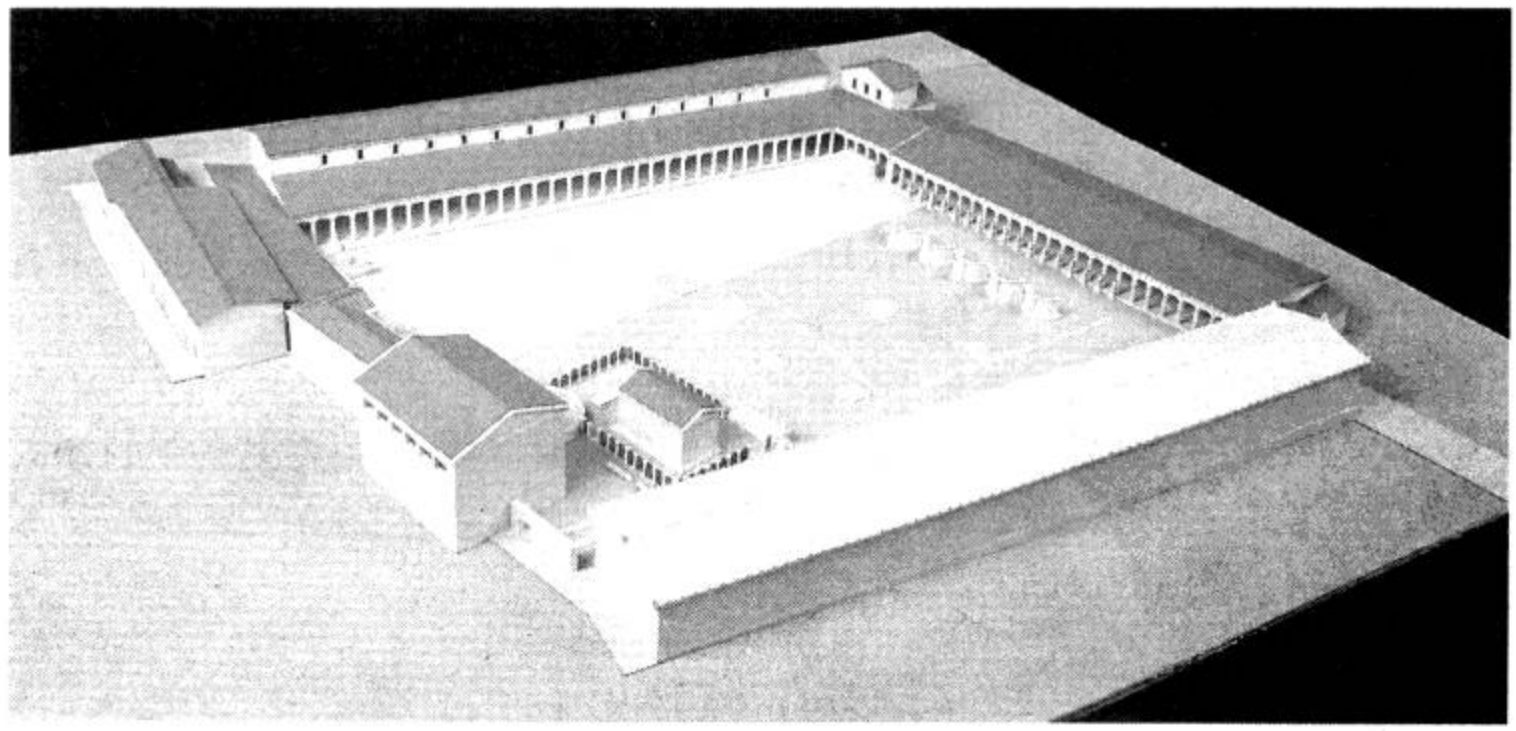


图14 塔索斯市政广场:模型(© — EfA / Ph. Collet 版权所有)

广场的中心部位建有一系列祭坛、会堂等宗教性和纪念性建筑。其中有高勒克斯(Glaukos)的衣冠冢,他是勒比蒂纳(Léptine)殖民者的儿子;以写讽刺和幽默诗著名的阿尔基洛克斯曾经善意地嘲笑说高勒克斯对自己的一头卷发颇为自豪。广场里还有广场保护神宙斯(Zeus)的神庙;有特奥格内斯(Théogonès)的神庙,该人是"当地公元前5世纪最负盛名的运动员,他的塑像一直到公元4世纪还被认为具有治病的法力"(*EG* 111);还有罗马帝国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的两个孙子的祭坛,这两个人也以凯撒(César)为名。

在广场的边缘逐渐建起各色建筑和廊柱拱门,到公元前2世纪或公元前1世纪时这里变成了"一个被各种饰有高大石柱的建筑物围成的宽阔的广场"(*EG* 106),城里的道路走向也因此而被改变。如塔索斯的市政广场将当时流行于亚洲的新的城市建筑方式应用于一处古老的空间,使这些主要承担政治功用的建筑物与广场构成了一个协调的整体。

广场的东北角有一处被考古学家称为塞奥雷斯(Théores)信道的地方,塞奥雷斯希腊语意为行政长官。它由两道11米长的墙组成,墙用方形大理石块建成,自公元前4世纪末叶起行政长官的名字被刻在这两道墙上,墙因此而得名。两道墙上本来也各饰有一幅浮雕,这两幅浮雕现陈列在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西面墙上原镶有表现阿波罗神和圣女向阿波罗神敬献饰带和水果等内容的浮雕(图15),并刻有铭文:

> 尽人皆可向圣女和阿波罗(Apollon)神献祭,牺牲不论雌雄,但猪和绵羊不可献,*pean* 颂歌不可唱[2]。

东面墙上的浮雕是赫尔墨斯(Hermes)和美惠三女神(Charites[3]),他们围着一个古老的祭龛(图16),所刻铭文为

> 向美惠三女神不可献猪和山羊。

这样的建筑在古希腊历史中仅此一例。很长时间内,人们对这种建筑形式出现的原因莫衷一是。现在我们终于弄清楚了,塞奥雷斯信道是建在城市扩展之前的一座老城门的遗址上。

三 对领土的开发利用

"对郊野的开发"(*EG* 54)主要是开发矿业和种植作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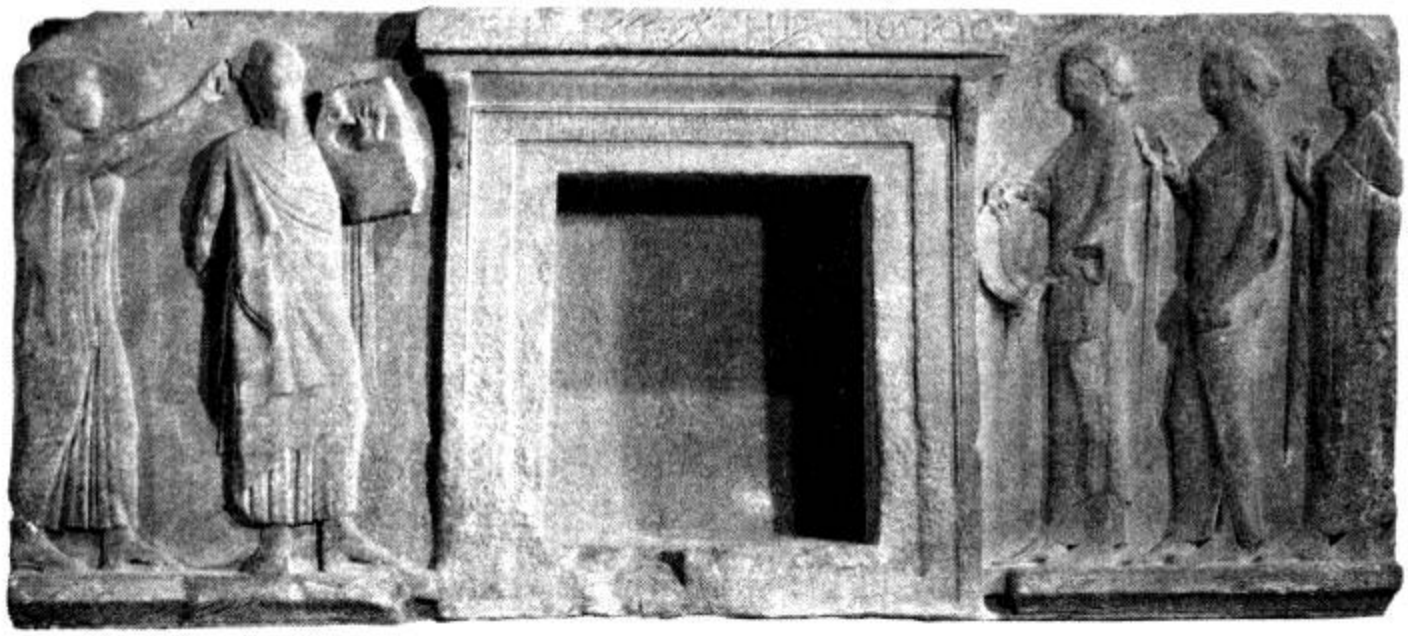


图 15　塞奥雷斯信道:西面的浮雕(阿波罗与圣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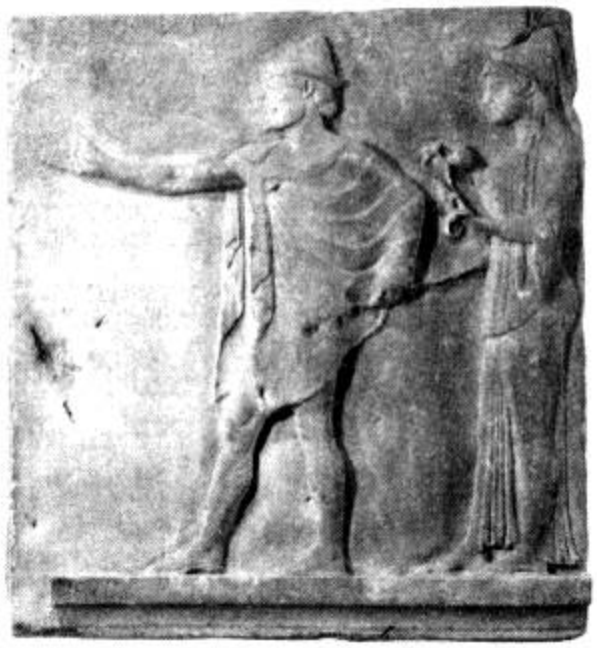


图 16　塞奥雷斯信道:东面的浮雕(赫尔墨斯和美惠三女神)

3.1 作物种植

"当时的农业主要是种葡萄"(*EG* 56)。在文学作品、碑刻、纸莎草纸文献及陶瓷器皿里都能找到证据。

据文献记载,"在公元前 5 世纪后期塔索斯的酒就已因品质优良而闻名于世"[4]。在公元前 5—前 1 世纪期间,塔索斯的酒是一种奢侈品,"所有作家,从色诺芬(Xénophon,公元前 430—前 355 年)到卢奇安(Lucian,公元 125—192 年)对

此都有描述”[5]。希腊富翁卡里亚斯(Callias)在宴请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399年)和澳特利科斯(Autolykos)时曾使用此酒,希腊以外很多国家的君主和最高级的艺妓的餐桌上都少不了它。这是一种暗红色、酒精度很高并且易于保存的甜味葡萄烧酒,喝的时候要兑水,泰奥弗拉斯托斯(Théophraste,公元前372—287年)曾对它大加赞誉;城邦的行政长官们为之倾倒;而且它还被以不同方法用于治病。它能够安眠、强身、抗毒,也能用于堕胎。老普林尼(Pline [Plinus] l'ancien,公元23—79年)还说用这种酒制成的醋可以当作洗眼剂,治疗白内障和沙眼。到公元前2世纪时这种酒更加声名远扬。

图17 公元前4世纪的塔索斯双耳尖底瓮(©— EfA 版权所有)

有文字记载说塔索斯当年极力保护这种酒,并努力将其商品化。“从与酒有关的经济活动中产生了一系列规则和控制手段,国家性的保护主义干预和税收也由此而来”[6]。我们发现的文字有:

第一件是制定于公元前480年的关于酒和醋的规定;

第二件是一份公元前5世纪末的文件,它包括两部分,一是规定售酒方式:预售或按帕托斯(*pithos*)出售。帕托斯是一种储酒大罐。预售是依据葡萄的长势预计酒的产量并出售,但6月以前不可预售;二是一项保护主义措施,“规定任何塔索斯的船只均不得将外地酒运进相距140千米的圣山(阿索斯 Athos)和帕凯尔(Pachéié)之间的水域”,如果违反,船主和船长都将受到与在酒中掺水者同样的惩罚。

人们还找到了塔索斯的酒的资料,一份纸莎草纸文件“记载了对两艘运酒船征税的情况”,而考古发现的双耳尖底瓮和残片能更好地说明当时这种酒的巨大销量(图17)。在塔索斯发现了十多个工场,它们每年能造出数千个专门用于储藏和运输这种酒的双耳尖底瓮。很多尖底瓮在入窑烧制之前被打上包含制造者标记和行政长官名字的印记,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制造者是谁,并且可以确定瓮的制造日期,因为当时人们以行政长官的名字纪年(图18)。这种带有印记的尖底瓮残片在很多地方都有发现,黑海、色雷斯沿海、马其顿

(Macédonie)沿海、雅典、亚历山大城(Alexandrie)等地自不待言,整个东地中海沿岸,甚至中亚也有发现。这足以让我们确定当时这种酒的销售范围。

3.2 金矿

关于塔索斯人建设城防的资金来源,希罗多德(Herodotus, 公元前5世纪)是这样说的:"塔索斯人是从陆地上和矿产中得到资金的,他们从著名的斯卡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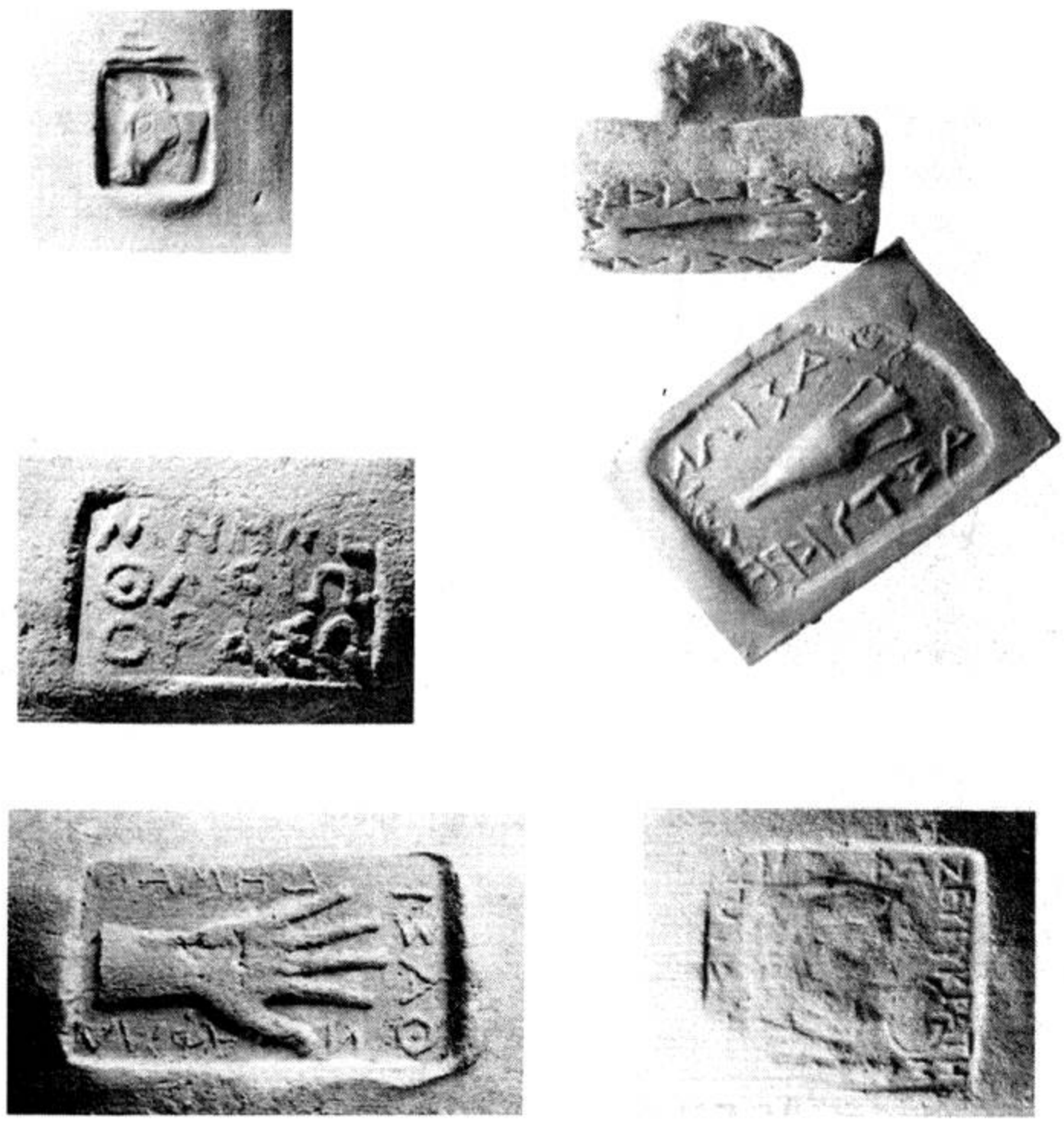


图18 双耳尖底翁上的印记

特—伊勒(Skaptè-Hylè)金矿每年可获得约80塔连特黄金(1塔连特相当于当时6000个工作日的工资),塔索斯本地也有一些金矿,如此他们每年可获得200塔连特甚至300塔连特的黄金,而且他们不用交纳农业税。我本人曾亲自看过这些金矿,其中产量最大的一些都距腓尼基人(Phéniciens)更早开发的金矿有一定距离。腓尼基人来到岛上后就开始开矿,还用它们当中一个人的名字命名了现在的塔索斯岛。他们所开的矿都位于埃尼拉(Ainyra)和克伊尼亚拉(Koinyra)之间一座被开矿者挖得乱七八糟的山上,与萨莫特拉凯相对。"(Hdt 6.46—47)[7]

希罗多德所说的金矿位于岛的西海岸,在克里斯蒂(Klisidhi)高地上,两面被克伊尼亚拉湾和埃尼拉湾所包夹。另一座金矿就在塔索斯卫城脚下,20世纪时被重新发现。矿里所发现的遗迹证明该矿于公元前5世纪起一直开采到公元前4世纪。矿内巷道狭窄,高、宽都只有1米(图19),照明用的是小油灯,有时放在巷道壁上凿出的小洞里,有时只用一把泥土勉强粘在石壁上。当时矿工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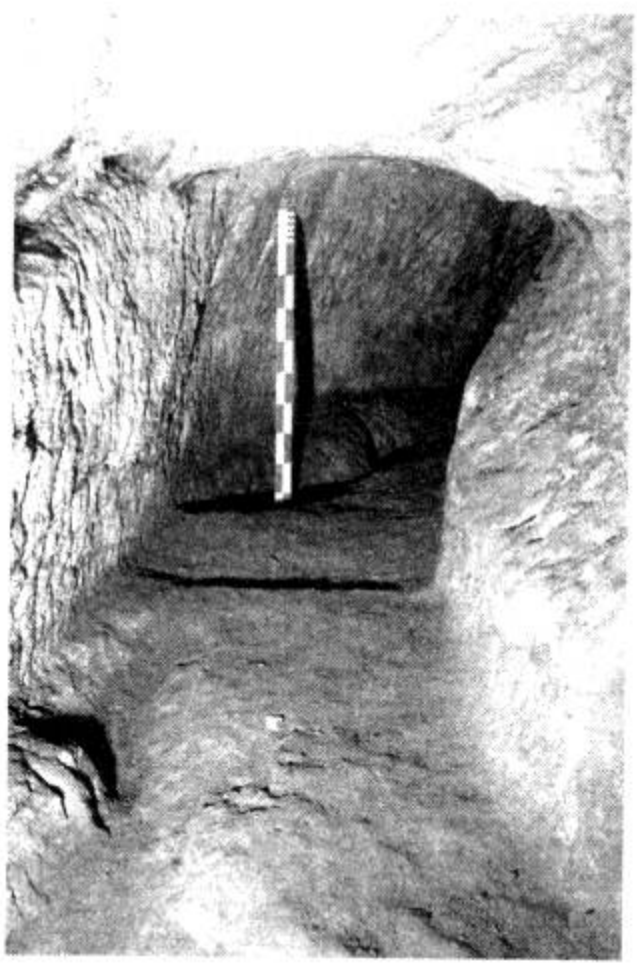


图19 塔索斯卫城脚下的金矿:古代矿道

图20 一座高大的手抱牡羊的年轻战士(*couros*)塑像(高3.5米)(©—EfA版权所有)

作条件之艰苦由此可以想像。

但是金矿并非塔索斯人所开采的惟一矿藏，由于“岛上的主要金属矿都在西部沿海”，因而塔索斯人同时开采的矿产还有银、铁和铜。

3.3 大理石开采

当时在岛上的东北沿海有大理石开采（法那利，萨利阿利［Saliari］，瓦西［Vathy］），但最好的大理石产自南部的阿利基。那里的大理石颜色洁白，结晶度高，既是很好的建筑材料也是雕塑的上品材料（图 20）。这些大理石起初只在当地使用，后来开始输出。按照两位拉丁作家西奈克（Sénèque，公元前 8/1—公元 65 年）和老普林尼的说法，在罗马帝国时期，意大利人对其尤其钟爱。今天这些当年的采石场向我们展示着一种遭到掠夺之后的特殊的美，例如在阿利基，由于自公元前 6 世纪至罗马帝国灭亡一直在开采大理石，半岛的顶端已经被凿得快要低于海平面（图 21）。

“整个半岛的顶端逐渐都被凿得与海平面持平，有的地方甚至已经浸在海水里。在它的表面可以看到凿取大块方形石料留下的痕迹。但是石头资源远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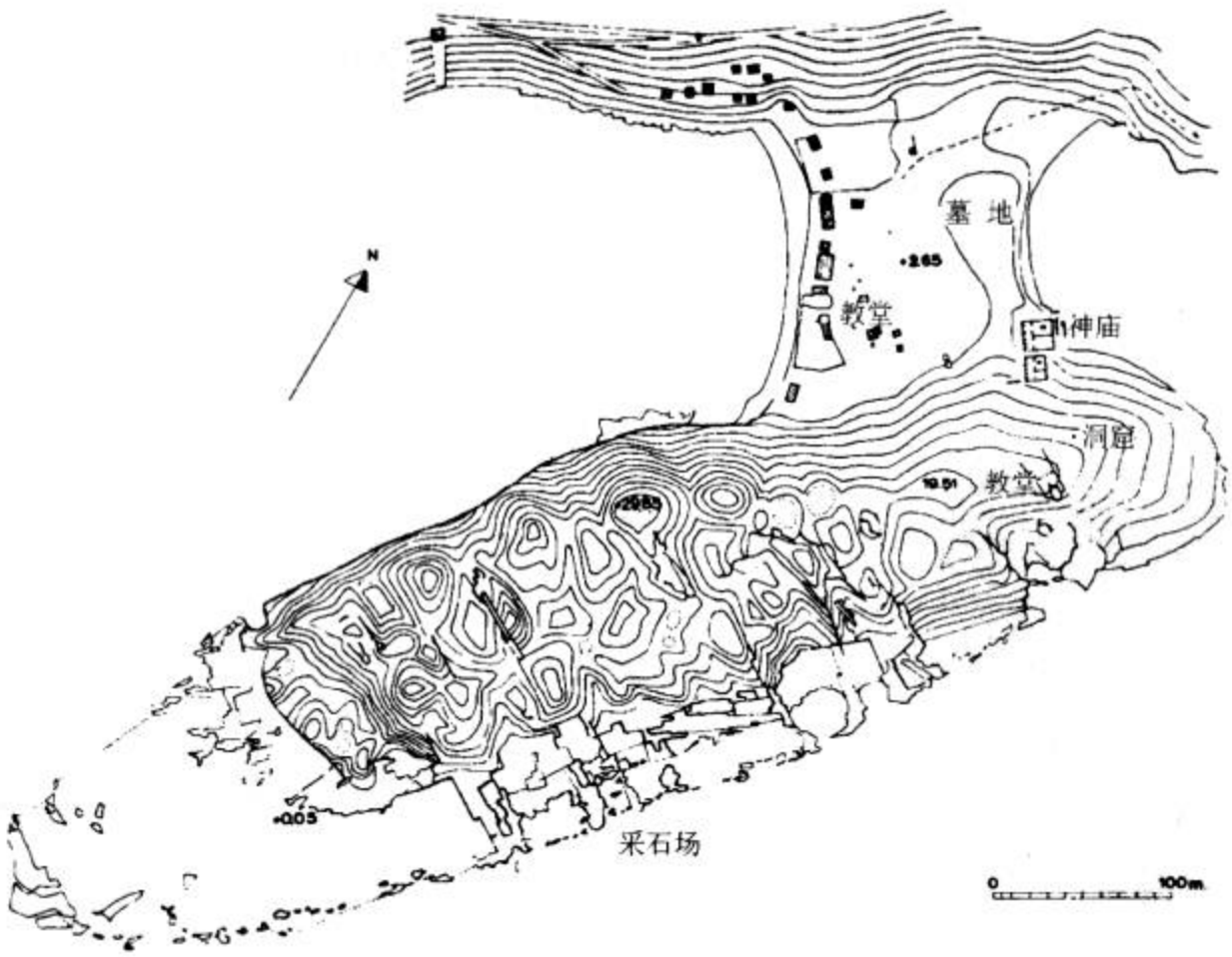


图 21　阿利基半岛：地图取自《塔索斯指南》（— EfA 版权所有）

被采尽,大理石至今还高高地屹立着,工程终止的地方留下多处高大的白色断面,使石峰从海上望去,好像是一座座极地海水里的冰山(图22)。石头表面有多种工具如镐头、钻头、凿子等留下的痕迹;还有一些已经凿好只待运走的石材,其中有一块长达9米的单件石柱(图23),还有一块硕大无朋的石柱础静静地躺在古代工地上。"(彩图16)

图22 阿利基:凿取大型方块石料留下的痕迹(Mulliez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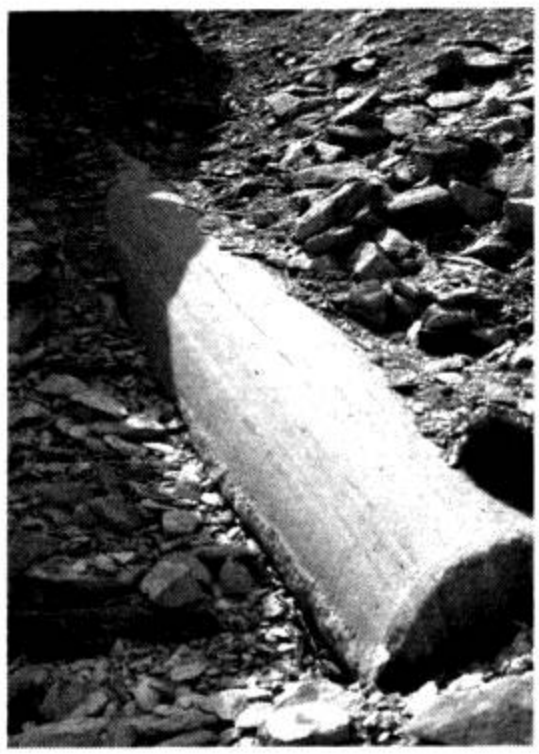


图23 阿利基:凿好的单件石柱被遗弃在当地(Mulliez摄)

四 结论

塔索斯不仅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都很繁荣,它的兴旺一直持续到公元4世纪。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这块与使徒保罗(Paul)在欧洲开始传教地腓立比(Philippes)紧邻的领土上,建起了一座座教堂。在拜占廷时期(4世纪起),塔索斯还曾是一个主教区(*G Th*15)。在公元7世纪初,塔索斯丰富的资源和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它遭到了一系列变故:7世纪初,斯拉夫人向这里发动了攻击,829年克里特(Crète)岛的阿拉伯人在塔索斯海域消灭了拜占廷的舰队,他们是用塔索斯岛上的木材制造了攻城器,于904年夺下了萨洛尼卡(Salonique)。再次听命于拜占廷之后,塔索斯又先后受到热那亚(Genova)和威尼斯(Venice)的觊觎,在15世纪上半叶在来自于热那亚的加蒂卢齐(Gattilusi)家族控制时期(1414—

1455 年)经历了短暂的二度辉煌之后,落入了土耳其苏丹之手。在 1479 年至 1770 年土耳其人的统治之后,俄国占领了这个岛屿,1774 年苏丹又恢复了对这里的统治,并将其作为礼物送给了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Méhémet Ali, 1769—1849 年)[8]。1903 年在经过流血的争夺之后,塔索斯岛又重归苏丹之手,1912 年塔索斯岛最终被归还给希腊。

总而言之,塔索斯岛的历史上既有兴旺发达的辉煌时期,也经历过外族的蹂躏和宰割。

本文是"欧亚非考古与文明——历史、考古与社会"中法学术系列讲座第 63 讲的讲稿。

〔注 释〕

1 R. Martin,《Thasos. Quelques problèmes de structure urbaine》,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nnée 1978* [*CRAI*], 1978, p. 195.

2 Pean 颂歌是一种专门赞颂阿波罗神的颂歌。——译者注

3 美惠三女神:宙斯和欧律诺墨的女儿;众神的歌舞演员,为人间带来诸美;分别是阿格莱亚(光辉女神),欧佛洛绪涅(欢乐女神),塔利亚(激励女神)。——译者注

4 F. Salviat,《Le vin de Thasos. Amphores, vin et sources écrites》, dans J.-Y. Empereur et Y. Garlan éd., *Bulletin de Correspondance Hellénique*, *Suppl. XIII. Recherches sur les amphores grecques*, 1986, p. 187.

5 F. Salviat, *op. cit.*, 1986, p. 180.

6 F. Salviat, *op. cit.*, 1986, p. 181.

7 Hérodote 6.46—47 (traduction B. Holtzmann, dans《Des mines d'or à Thasos ?》, *Bulletin de Correspondance Hellénique*, *Suppl. V. Thasiaca*, 1979, p. 347.

8 阿里(Méhémet / Mohammed / Muhammad Ali)后来建立了埃及帝国,并一直统治到 1952 年。埃及也是在他统治时期实现了初步的现代化。——译者注

参 考 文 献

工具书:

GRANDJEAN, Yves, SALVIAT, François, *Guide de Thasos*(塔索斯指南[第二

版]), Collection *Sites et monuments* 3(遗址与文物3), Athènes - Paris, EfA, 2000(2e édition).

专业著作:

法国雅典学院出版的《塔索斯研究》(*Études Thasiennes*)丛书共收录19种著作,其中:

POUILLOUX, Jean, *Recherches sur l'histoire et les cultes de Thasos.* —I. *De la fondation de la cité à 196 avant J. - C.* (塔索斯历史及崇拜研究(一):从城邦的建立至公元前196年), 3, 1954.

DUNANT, Christiane, POUILLOUX, Jean, *Recherches sur l'histoire et les cultes de Thasos.* —II. *De 196 avant J.-C. jusqu'à la fin de l'Antiquité*(塔索斯历史及崇拜研究(二):公元前196年至古代末年), 5, 1957.

MARTIN, *Roland*, *L'agora*(市政广场), 6, 1959.

PICARD, Ch., *Les murailles* —I. *Les portes sculptées à images divines*(城墙(一):雕刻有神像的城门), 8, 1962.

SERVAIS, Jean, *Les deux sanctuaires*(两座神殿), SODINI, J. - P., LAMBRAKI, A., et KOZELJ, T., *Les carrières de marbre à l'époque paléochrétienne Aliki*(原始基督教时代大理石采石场,阿里基), 9, 1980.

GRANDJEAN, Y., *Recherches sur l'habitat thasien à l'époque grecque*(希腊时代塔索斯人居研究), 12, 1988.

论文集:

Thasiaca(塔索斯), *Bulletin de Correspondance Hellénique*(希腊通信学报), *Supplément*(补编)5, 1979.

KOUKOULI-CHRYSSANTHAKI, Haïdo, et MULLER, Arthur, PAPADOPOULOS, Stratis, (éd.), *Thasos. Matières premières et technologie de la Préhistoire à nos jours*(塔索斯:自史前时代至今的原始材料和技术),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Liménaria, Thasos, 26—29 septembre 1995*(理梅纳瑞亚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塔索斯,1995年9月26—29日), 1999.

经由埃及东部沙漠和红海而建立起来的罗马帝国与东方诸国的商贸联系

博伦(Jean-Pierre BRUN) 著
韦遨宇 吴旻 译

西方,尤其是罗马帝国,与阿拉伯世界、印度、锡兰以至于中国都有过非常密切的商贸联系,但是这种关系通常都是逆差。为换取帝国社会与文化发展所必需的奢侈品,如香料、香水、宝石、丝绸,罗马帝国主要出口葡萄酒、制造业产品和珊瑚。为弥补对外贸易赤字,罗马帝国还需动用以黄金和白银铸造的货币。

斯特拉本(Strabon,公元前58? —公元21/25年)的著作表明,奥古斯都·恺撒(Augustus César, 公元前27—公元14年间在位)曾对阿拉伯诸国由于未投入流通而积累起来的黄金(XVI, 4, 22)垂涎不已。在韦斯巴芗皇帝治下(Vespasien, 公元69—79年间在位),身为政治家和博学者的老普林尼(Pline,公元23—79年)曾以下述语言表达其愤怒之情:"阿拉伯诸国幸而赖以海洋,使其尚有珍珠产业为继。即使是按最低的估计,仅此珍珠一项,每年印度、'塞尔国人'(Sères [中国?])和阿拉伯半岛就花费掉我们帝国一亿罗马小银币,可见奢侈品和贵妇们的生活代价是多么不菲!"(XII, 84)

此文名闻遐迩,而同一时期的其他史料也证实了这一点,尤其是被视为红海地区、印度和非洲东海岸商务活动指南的《厄里特里亚海航海志》(*Périple de Mer Érythrée*),更是如此。此书为一手资料,写于公元1世纪中叶,作者为希腊人,姓名已不可考。书中描述了罗马帝国商业活动所及的各个港口城市,并为每座城市开列了一份可供商人买卖的产品清单。

例如(§41—49),在纳巴达(Narbada)河入海口的巴里加扎(Barygaza)港,西方的商贾们可以采购到小麦、大米、麻油、纯奶油、棉花和印度织物面料;他们同样可以在那里销售产自意大利、劳迪塞亚(Laodicée,位于叙利亚 Syrie)和阿拉伯诸国的葡萄酒、铜、锡、铅、香精、服装,尤其是金银铸币。

该航海志还记载说商贾们也可以在马拉巴(Malabar)海岸港口城市穆吉里斯(Muziris)的外港巴卡雷(Bakarê)购买到丝绸产品。这种丝绸可能是通过陆路,经由恒河(Gange)和阿萨姆邦(Assam)到达该地的。因此,中国产品,尤其是丝绸,还有印度产品(桂皮、胡椒、宝石和珍珠),通常是经过由陆路转经海上运输而抵达罗马帝国的。

在向诸位介绍对经由红海、埃及东部沙漠抵达印度的商贸路线进行的研究的最新成果之前,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罗马帝国与东方通商的各条路线的概况。

1. **商贸之路**(图 1)

1.1 古希腊时代

法老时代的埃及人早已经过蓬特国(pays du Pount, 厄立特里亚省的北部,人们通常认为它位于埃塞俄比亚东海岸——译者注),为西方带来了乳香、香料、黄金和宝石。商船队往往从顾维西斯港(Mersa Guweisis)出发,沿红海乘风而下。走这条航线通常需要沿着荒芜人烟的海岸航行,克服航海过程中的诸多艰难险阻,而船队每一次补给都是一次长途跋涉。自公元前 525 年起,埃及为波斯国王康比兹(Cambyse II,公元前 530—前 522 年间在位)征服后,红海即成为波斯帝国内海。大流士一世(Darius,公元前 522—前 486 年间在位)在红海内开掘了一条连接尼罗(Nil)河与苏伊士(Suez)的运河。尽管如此,如产自哈达拉毛(Hadramaout)省和也门(Yémen)的乳香和没药,产自印度和马来西亚的桂皮等,这些贸易均掌握在诸如纳巴提人(Nabatéens)、米内恩人(Minéens, 也门)及哥黑恩人(Gerrhéens)那样的阿拉伯人手中,因为他们既是惯于在阿拉伯半岛沙漠中长途跋涉的商旅高手,又是波斯帝国伟大君主的臣民。来自巴林(Bahreïn)的哥黑恩人横穿阿拉伯半岛,与米内恩人汇合,然后将商队一直带到佩特拉(Pétra,约旦)。而桂皮则是由习惯乘季风航行的印度水手带来,这种定时产生的季风使海上航行变得非常方便与快捷。

红海上的商贸运输活动由于战略原因直至公元前 3 世纪上半叶托勒密二世(Ptolémée II, 公元前 285—前 247 年间在位)在位时才变得异常繁忙起来。自从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re le Grand, 公元前 356—前 323 年)征服了部分印度国土之后,用于作战的象群已成为战场上极为重要的武器。由于作战的将士驱赶象群冲锋陷阵,碾压敌方步兵,因而象群起着今日坦克集群的作用。面对统治着地中海东岸和美索不达米亚(Mésopotamie)平原的息琉卡斯一世(Séleucos,公元前 305—前 280 年间在位),亟欲保持自己地位的托勒密二世必须不惜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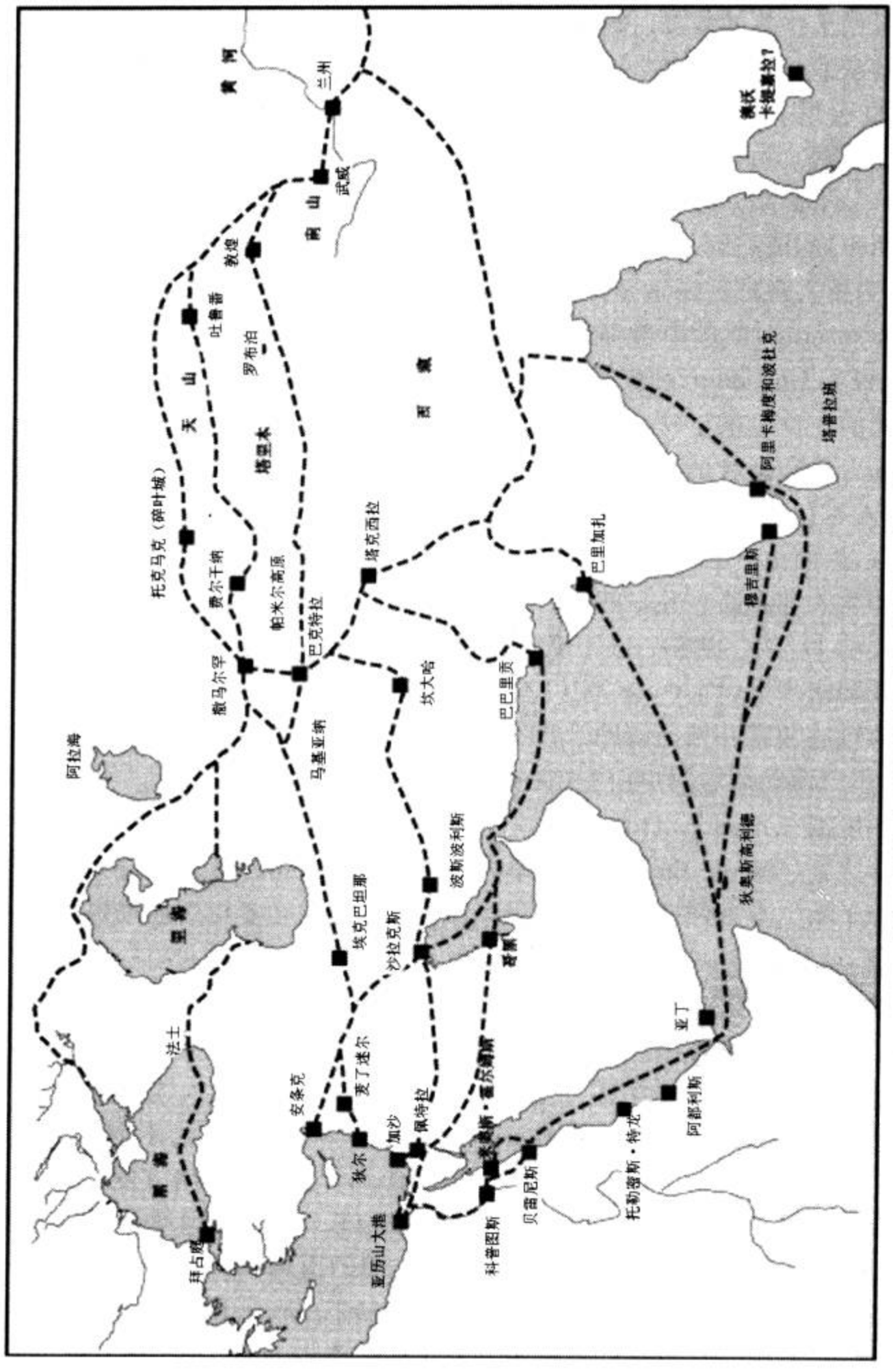


图1 罗马帝国与远东之间的贸易通道（博伦绘制）

代价获得用于作战的象群。他在埃塞俄比亚找到了大片象群，并组织了一系列围猎活动来捕获它们。围猎地点在位于非洲东海岸的一个中继港口，距苏伊士以南1900公里。该港口因而被命名为托勒密斯·特龙(Ptolemaïs Therôn)，意为狩猎的托勒密。为将象群运回国内，国王不仅特意修建了一座命名为贝雷尼斯(Bérénice)的海港以便迎接象群的到来，而且开辟了一个穿越东部沙漠直抵伊德富(Edfou)的道路网。这些军事上的努力不仅建起基础设施，促进商贸活动发展，并且为更大规模地探索开发红海创造了条件。公元200年，海军上将沙里茂托斯(Charimortos)就曾率舰队勘测了曼德海峡(Bâb el Mandeb)、瓜达富伊角(今葛儿得风 Guardafui，在索马里东北角)和印度洋周边地区。

公元前3世纪末年，由于人们学会了在战斗中驱使象群反戈一击，象群不复成为战场上出奇制胜的武器。红海的运输贸易遂集中于香料贸易。在那个时代，希腊人尽管已经在狄奥斯高利德(Dioscoride，也称 Socotra 索科特拉)岛上站住了脚跟，然而他们的活动一般不会越过亚丁(Aden)港，因为在亚丁港阿拉伯人迫使印度人和希腊人登岸卸货，缴纳关税。

公元前117年，随着一位印度水手成功地开辟了道路，上述时代结束了，马其顿王托勒密八世(Ptolémée VIII，公元前145—116年)由此得知如何借助于初夏的季风抵达印度并如何借助于初冬的季风返回的方法。两个世纪之后写成的《厄里特里亚海航海志》则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航海家们于7月左右乘夏季季风离开印度河三角洲"。在掌握了这一情报之后，托勒密八世便决定授权西吉克的厄多克斯(Eudoxe de Cyzique)率领一支远洋船队前往印度。两年后，厄多克斯组织了第二支远洋船队再度前往。然而这一次，厄多克斯被季风送到了瓜达富伊角，这使他得以勘测了东非海岸。

自此以后，与印度的直接贸易得以发展起来。然而，与那个时代通过由波斯人创建的令人叹为观止的道路网络辗转进行的陆上贸易相比，这种海路直接贸易还无法望其项背。当时的波斯帝国已经先后落入亚历山大大帝及息琉塞思(Séleucides)的继任者之手，其版图包括粟特地区(Sogdiane)，与中国的新疆仅隔着帕米尔(Pamir)和大雪山(Hindou-Kouch)地区。这种近距离方便了自公元前4世纪末即已为希腊人所熟知的中国丝绸的进口。尽管各国政治风云变幻多端，然而美索不达米亚与坎大哈(Kandahar)之间的道路系统和驿站系统继续为商贾们所沿用。在公元前20年左右，伊西多雷·德·沙拉克斯(Isidore de Charax)就曾经证实说，当时就有希腊人定居在陆路边上的一些城市里。自公元

前1世纪下半叶起，丝绸贸易即已在地中海一带更为广泛地开展起来。当时的帕忒斯人(Parthes)起着丝绸运输的中转作用，在与罗马帝国敌对的间隙，他们让商贾们通行。

1.2. 罗马帝国：公元前31—公元235年时期

在奥古斯都大帝治下，经由红海而进行的罗马帝国与印度的直接贸易迅猛发展，与此同时，陆路的贸易却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在公元1世纪，匈奴人回归塔里木盆地定居导致了与中国直接贸易联系的中断。直至公元75年，班超重新夺回塔里木盆地，中国人与帕忒斯人的贸易联系才得以恢复。这种局面到1世纪末，随着贵霜(Kouchan)人建立起自咸海直至阿富汗和塔里木一带的西陀—伊朗王国而开始稳定起来。由于该王国所起的中间作用，中国与西方的联系变得更加经常，更加稳固。在2世纪时，一位名叫马厄斯·狄提亚诺斯(Maês Titianos)的马其顿人就曾向居住在兰州一带的中国人派遣其商务代理。他们自幼发拉底(Euphrate)河畔的希拉波利斯(Hiérapolis，叙利亚古城)出发，经过马基亚纳(Margiane)的安条克城(Antioche)，到巴克特拉(Bactres)和"石塔"(Tour de Pierre)，穿过帕米尔，历时12月的旅行，终于抵达黄河岸边"塞尔国"[中国?]人的都市兰州(据由托勒密所引述马林·德·狄尔[Marin de Tyr]所说)。

事实上并不只有一条丝绸之路，而是存在着一个丝绸之路的道路网络。公元606年的一份题为 *Relation sur les pays d'occident*(《大隋西国志》?)的文献，就曾提到了三条连接中国与罗马帝国的途径。丝绸之路的始端则是共同的，即沿黄河经武威到达祁连山脉以北，然后再西出敦煌。此后即有三条路可供选择：

北路，目的是为了避开帕忒斯人，取道天山，途经锡尔河(Syr-Daria)谷和阿姆河(Amou Daria)谷、巴克特里亚(Bactriane)、里海(mer Caspienne)、居鲁士(Cyrus)河谷，直抵法士(Phase)，在那里舍岸登舟渡过黑海，抵达拜占廷(Byzantium)。

中路，沿天山南麓而行，途径吐鲁番、塔里木盆地、帕米尔高原、费尔干纳(Ferghana)、撒马尔罕(Samarkand)及阿姆河，最终抵达波斯。

南路，自敦煌出发，绕罗布泊(Lob Nor)，穿越塔吉克斯坦(Tadjikistan)、帕米尔高原，经由巴克特拉和塔克西拉(Taxila)，抵达印度河河谷及其港口城市，在那儿将丝绸装船启运并驶向红海。《厄里特里亚海航海志》提及这些港口：位于印度河三角洲的港口为巴巴里贡(Barbaricum)，而位于纳巴达河入海口的港口城市则为巴里加扎。

鉴于北路漫长且多艰难险阻，中路又先后为帕忒斯人和波斯人所把守，故而在罗马帝国初年，陆路和海路相结合的南路使用得最为频繁。此外南路还凸现了经由红海而打通的与印度的直接联系所带来的利益：在米奥斯·霍尔摩斯(Myos Hormos)港口和贝雷尼斯港口登岸的，不仅有来自阿拉伯的乳香和没药，来自非洲的象牙和龟甲，来自印度的胡椒、棉织品、宝石和珍珠，还有来自中国的丝绸。

据斯特拉本的统计，在公元前1世纪初年，罗马帝国共有二十余艘商船往返于帝国与印度之间，而到了奥古斯都时代，这个数字则翻了六番。必须指出的是，这条道路是凯乌斯·恺撒(Caius César)于公元前1年运用军事手段在摧毁了亚丁港阿拉伯人的封锁之后打通的，并在此设立了交给罗马帝国的海关关税。

自此，有关此项贸易的文献记载便日益增多。在西方的史料中已知有两处。其一，在克劳狄治下(Claudius Ier，公元41—54年间在位)，阿尼乌斯·普劳卡穆斯(P. Annius Plocamus)家中一名被解放的奴隶所驾驶的商船在锡兰(Ceylan)搁浅，他却因此而受到了锡兰国王的款待。国王此后并向罗马派遣了四位使节(见普林尼，*N. H.* VI，84—85)。在尼禄皇帝时代(Néron，公元54—68年间在位)，有个名字为赫尔梅罗斯(Herméros)的商人，亚丁的阿拉伯人阿德尼翁(Athénion)之子，在科普图斯(Koptos)—贝雷尼斯海路上经营葡萄酒贸易。当时在印度半岛南部，就有大量的用于购买当地产品，尤其是胡椒和桂皮的罗马小银币在流通。

正是在这一时期，《厄里特里亚海航海志》展示了它对非洲之角及印度海角各港口的深入了解，记载了它们各自的形式特征，尤其记载了在各个港口可以买卖的货物。来自罗马帝国的商团也先后在印度的一些港口城市定居下来。在孟加拉湾的本地治里(Pondichéry)附近，或许是波杜克(Podouke)设在国外的商行的所在地阿里卡梅度(Arikamedu)，考古现场发现了砖砌的仓库，并有大量进口的产自意大利阿莱佐(Arezzo)的陶瓷，以及产自意大利和高卢的双耳尖底酒瓮出土。在塔普拉班(Trapobane，在今锡兰)，双边贸易的一方是香料，另一方则是珊瑚与彩色玻璃珠制品，尤其是蓝色玻璃珠。《波廷格古地图》(*Table de Peutinger*)，这份大部分可断代为4世纪，然而其中所收集的信息甚至回溯到1世纪末年的罗马帝国的道路交通图，指出在马拉巴海岸的穆吉里斯，曾有过奥古斯都大帝神庙(Templum Augusti)这一纪念性建筑，而它只可能为西方商贾所修建(图2)。与阿里卡梅度不同的是，穆吉里斯的考古遗址尚未得以精确定位，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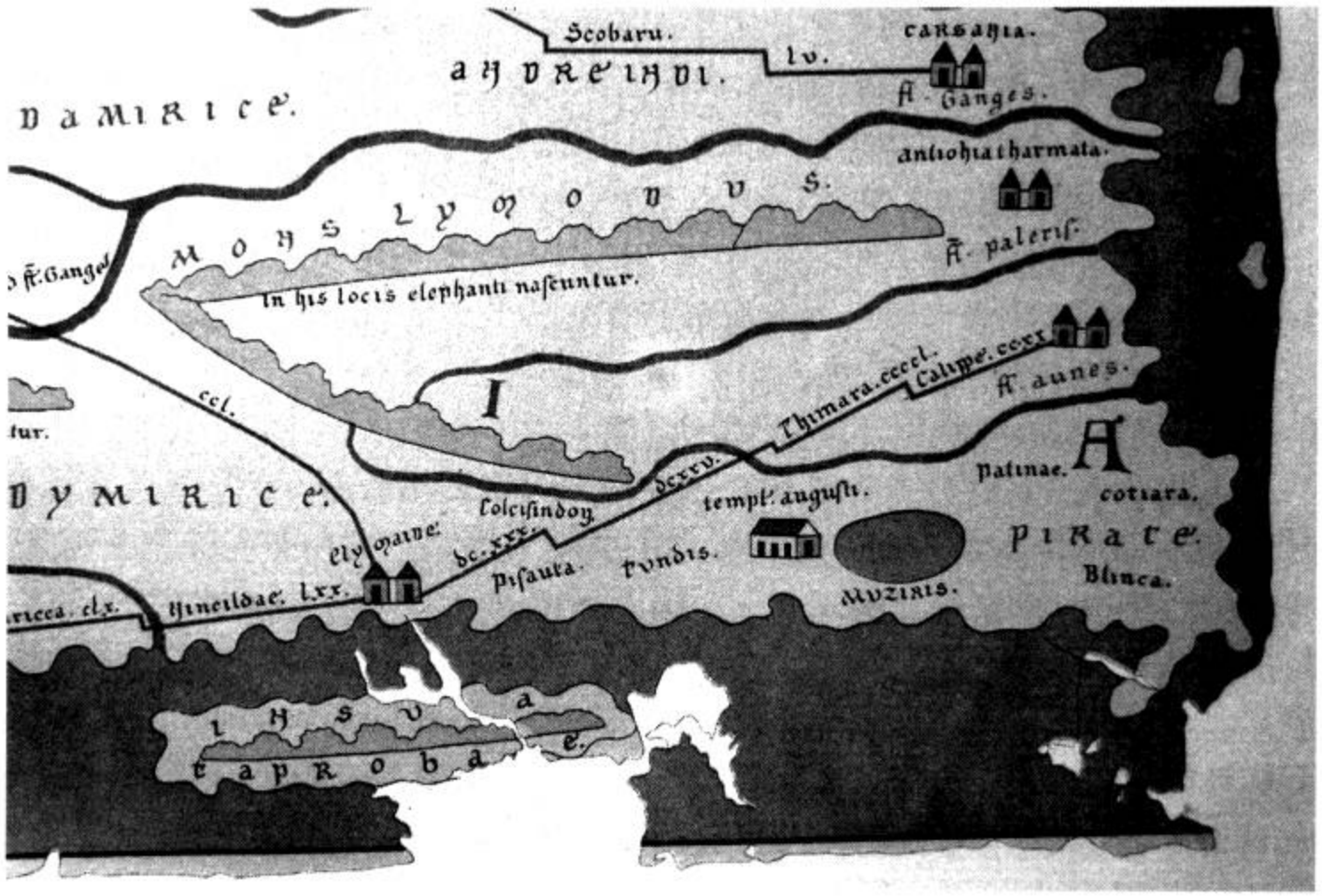


图 2 《波廷格尔古地图》的部分，标注有印度、穆吉里斯和特拉波纳

是它应该位于当时极为重要的，在孔杜伽卢尔（Kondugallur，又称科连加诺尔 Crangannore）附近的贝里亚尔（Peiryar）河流域[1]。这座港口，应该以木材建成，然而在 1—6 世纪的 500 余年间，它曾经是当地所产的胡椒和罗马人用船运来的黄金的交换地，而 2 世纪的用塔米尔文写成的诗歌则将西方人称为雅华纳（Yavana）。在锡兰，巴利文文学作品，尤其是 7—13 世纪的 *Vamsatthappakasini*（《大史注》）中，均有自“Romanukharattha”（罗马帝国）进口珊瑚贸易的记载。据普林尼（XXXII，21—23）的记叙，由于印度大量需求珊瑚，反使珊瑚在地中海一带成为稀罕之物。

时而有些西方商贾一直冒险深入到阿萨姆邦和马来半岛（Chersonèse d'Or，即所谓黄金岛）。《厄里特里亚海航海志》中曾提到秦国（Thin）和秦奈（Thinae）城（“塞尔国”［中国?］）。地理学家托勒密引述的马林·德·狄尔所说，确认一个名为亚历山大（Alexandre）的航海家曾抵达比卡提嘉拉（Cattigara）更远的辛纳（Sinae）人的国度。事实上，在暹罗湾的沃澳（Oc-èo）遗址，也许就是古时的卡提

嘉拉，人们发现了安托奈那斯·比乌（Antoninus Pius，138—161 年间在位）与马克·奥略留（Marcus Aurelius，162—180 年间在位）两位皇帝时代的钱币以及罗马生活用具的仿制品；而且于公元 166 年，在马克·奥略留治下，一个可能为商人的罗马人就曾携带犀牛角、象牙和龟甲到达中国。

因此，自 1 世纪始至 3 世纪中叶，罗马帝国与印度及锡兰的直接海上贸易十分频繁；因而需要对位于埃及红海海岸的货物始发港进行特殊的改建。最近在埃及东部沙漠的考古发掘恰恰证实了这一点。

2. 在埃及东部沙漠的最新考古发现（图 3）

自从结束了与以色列的战争状态以来，埃及逐渐为旅游开放了其红海西部海滨，同时对考古研究开放了其沙漠。20 多年以来，有三支分别由美国—荷兰、英国和法国考古学家组成的考古队一直在这一带工作。由塞德波森（S. Sidebotham）与温德里克（W. Wendrike）领导的美荷考古队特别注重野外调查，发现了大量遗址，尤其是罗马军队的要塞。他们同样对贝雷尼斯港进行了重点发掘。由丕考客（David Peacock）领导的英国考古队则专注于对红斑岩山（Mons Porphyritès）的红斑岩石矿的考古发掘，而最近则集中于对库塞尔·阿勒·卡笛姆（Qusayr-al-Qadim）港的考古发掘，以试图找到古代的米奥斯·霍尔摩斯港。我参与的法国考古队则发掘了克劳狄亚努斯山（Mons Claudianus）以及乌姆·巴拉德（Umm Balad）的矿场，尤其是发掘了分布在将科普图斯、尼罗河与米奥斯·霍尔摩斯港及贝雷尼斯港连接起来的沙漠商路之上的罗马军事要塞。如今这些尚在进行之中的考古发掘，部分成果已经公开，使考古学家们得以勾画出罗马帝国对东方贸易的组织及其对之进行的军事保护的历史图景。

在考古发掘工作开展之前，我们从文献史料中又了解到什么呢？

2.1. 文献史料

斯特拉本

奥古斯都时代的地理学家斯特拉本乃是在史料中提到将科普图斯与米奥斯·霍尔摩斯港连接起来的道路的第一人。公元前 27 年或 26 年间，他在沿尼罗河上行时，曾为红海上商贸活动的盛况叹为观止："从那儿（即从科普图斯）可见一片一直延伸到红海海滨城市贝雷尼斯的地峡，虽然该城市尚无港口设施，但由于地峡本身具有的良好地势地貌结构，它为该城提供了一些天然泊位。据说费拉德夫（Philadelphe 即托勒密二世，公元前 285—247 年间在位）第一个动用军队开凿了这条旱路，并修建了一些中继站（类似于沙漠商道中的驿站）。经验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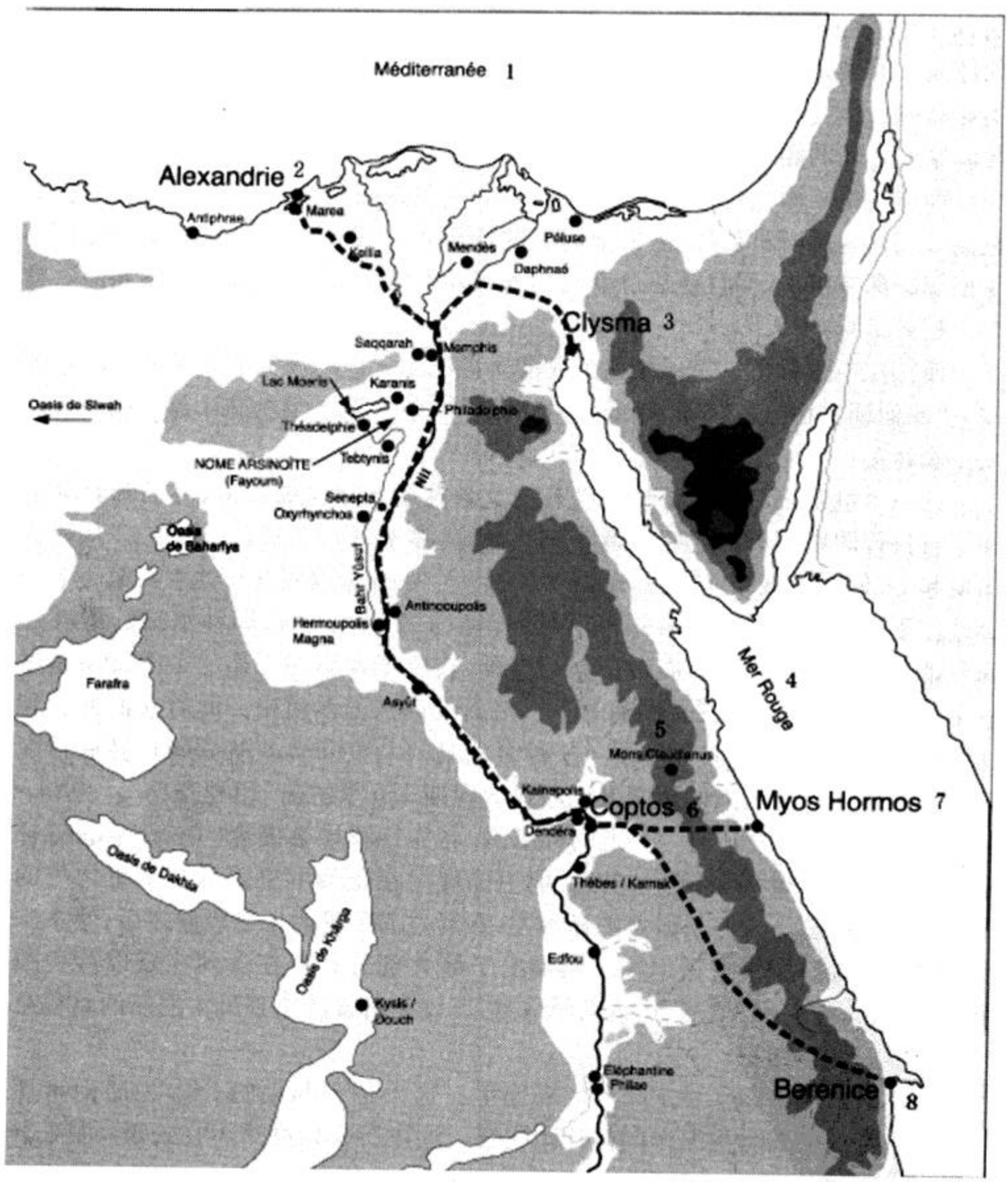


图3 罗马时代的埃及地图:经由科普图斯将亚历山大城与米奥斯·霍尔姆斯及贝雷尼斯连接的道路(博伦绘制):1. 地中海;2. 亚历山大港;3. 克利斯马港;4. 红海;5. 克劳狄亚努斯山;6. 科普图斯;7. 米奥斯·霍尔姆斯;8. 贝雷尼斯

明，他的这项工程用途巨大，故今日来自印度、阿拉伯的所有商品，以及取道阿拉伯湾而来的埃塞俄比亚商品都能由此而抵达科普图斯，而科普图斯城恰恰是这类商品的一个交易市场。距贝雷尼斯不远即有米奥斯·霍尔摩斯港，那里有供航海家们登陆的船籍港……。今天，科普图斯与米奥斯·霍尔摩斯港颇负盛名而且商贾云集。而往昔之日，沙漠中的商队往往夜行，并根据星宿判断方向，而且商人们还得像海员那样，需带上充足的饮用水。如今人们在各个中继站借助于挖掘的深井供水，而且还通过修建储水罐来收集雨水，尽管雨水并不充沛。整个行程需走6—7天”。

斯特拉本强调了贝雷尼斯在公元前3世纪和2世纪作为战略性港口的重要性，然而他证实在公元前27年或26年间，米奥斯·霍尔摩斯港才是首屈一指。

普林尼

约一个世纪之后的老普林尼没有提及米奥斯·霍尔摩斯港，然而却具体描述了自科普图斯至贝雷尼斯的道路交通状况（参见 *HN* 6. 102—103）。“从科普图斯起，人们需先乘骆驼前行，这需要经过几个中继站以便补充饮水。第一个中继站位于22里开外处，其名称为‘伊德合乌马’（*Hydreuma*，即补水站的意思）。而要抵达第二个中继站则需走一天的行程，它位于沙漠中。第三个中继站是另一个‘伊德合乌马’，距科普图斯85里，然后又深入至沙漠中。此后人们才会到达距科普图斯184里的‘阿波罗·伊德合乌马’（*hydreuma* d'Apollôn），然后再度深入沙漠腹地。随后人们便会来到距科普图斯236里的新‘伊德合乌马’（Nouvel *hydreuma*）。另外还有一个老的补水站，名为特罗果第提克（Trogodytique）补水站，距新‘伊德合乌马’有7里远，那里的驻军在距特罗果第提克2里之外的地方曾设立岗哨。人们从科普图斯出发，在经过257里的长途跋涉之后，便来到红海之滨的港口城市贝雷尼斯。然而由于绝大部分路程在夜间完成以避免酷热，而且白天往往用于安营扎寨以便休息，所以从科普图斯到贝雷尼斯的路程总共需要12天的时间”。

沙漠商队通常每天大约走30来公里。这一估计与斯特拉本为通向米奥斯·霍尔摩斯港的行程所作的估计相吻合。这段行程长度为170公里，每隔24公里或28公里即有一个中继站，故共有6—7个这样的中继站。由于总共只有四口深井为商队补充饮水，所以沙漠商队必须在两口深井之间的山里宿营。

《安东尼路线》（*Itinéraire Antonin*）、《波廷格古地图》和《拉维纳的宇宙学家》（*Cosmographe de Ravenne*）也都曾证明当时确实只有一条通向贝雷尼斯的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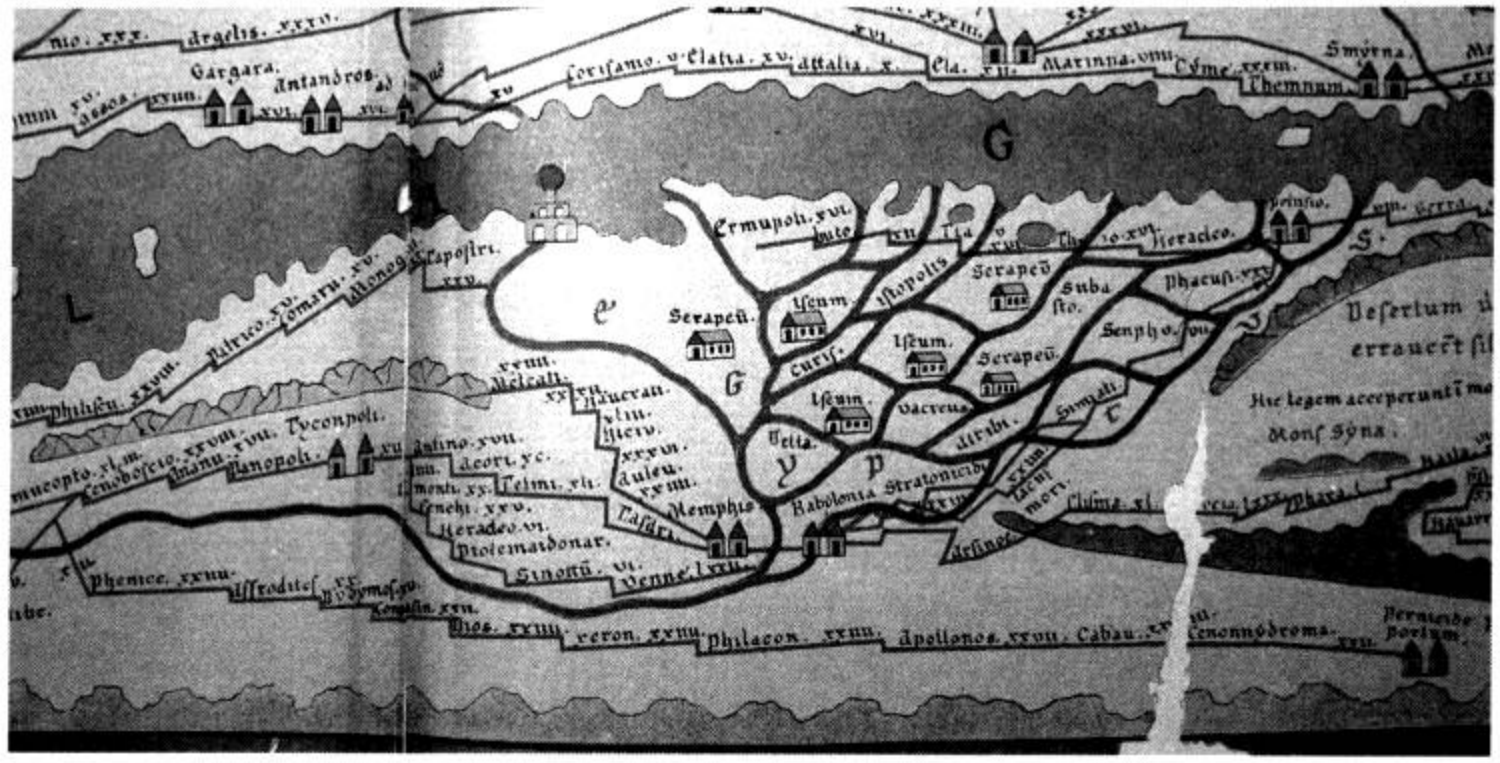


图 4 《波廷格尔古地图》的一部分，标注有从科普图斯到贝雷尼斯道路上的驿站名称

路（图 4）。这些史料年代较晚，对应的时代自 3 世纪末开始，而那时通向米奥斯·霍尔摩斯港的道路已不再被把守也不再有人使用，也许是由于港口被泥沙淤塞的缘故。

上述有关商路的史料如今都已经由对罗马军队的要塞所作的考古发掘得到了证实。当年连接米奥斯·霍尔摩斯港和贝雷尼斯港与科普图斯城这个将商品转船装运至尼罗河的集散点的两条道路上遍布着这些要塞。

2.2. 考古研究总结出的信息

在 1994—2000 年间，法国考古队对坐落在这些商路上用于守卫水井及中继供水站的八个军事要塞进行了发掘，它们分别位于库苏尔·阿尔·巴纳特（Qusûr al Banât）、阿尔—姆维—克罗阔第罗（al-Muwayh-Krokodilô）、比尔·阿尔—哈马马特（Bi'r al-Hammâmât）、阿尔—札尔坳—马克西米亚农（al-Zarqâ'-Maximianon）、阿尔—哈姆拉（al-Hamrâ）、比尔·萨亚拉—西米欧（Bi'r Sayyâla-Simiou）、达威（Dawwî）和哈斯姆·阿尔—美尼—笛笛摩（Khasm al-Menih-Didymoi）。

拜上述考古发掘研究之赐，我们今日得以按年代顺序重新描述出这些商路的使用情况及其发展变化，并大致了解到当时商贸活动的频繁程度。

古希腊时期（图 5）

将科普图斯城和红海经由瓦笛·阿尔·哈马马（wâdî al-Hammâmât）连接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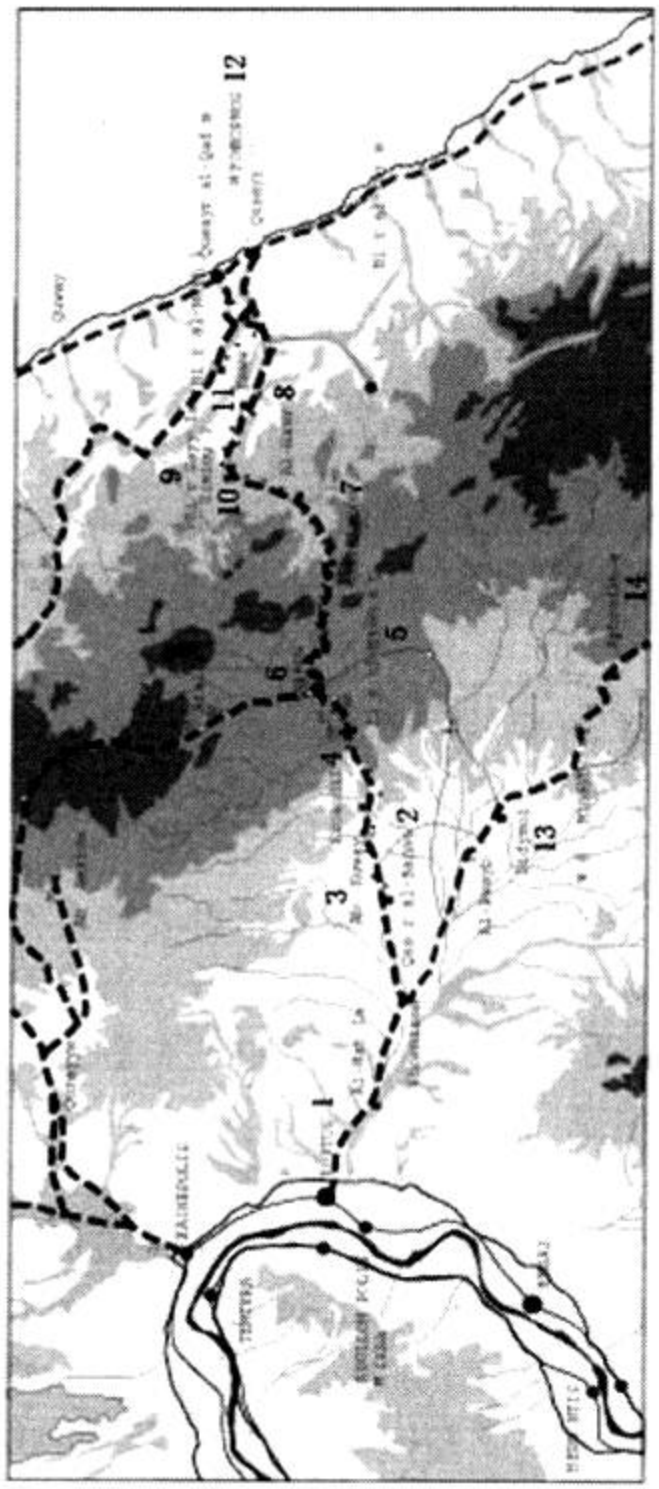


图 5 从科普图斯到米奥斯·霍尔摩斯之间的埃及东部沙漠地图（博伦根据 Cuvigny 等的书绘制）：1. 科普图斯；2. 库苏尔·阿尔·巴纳特；3. 阿布·库威；4. 克罗阔第罗；5. 比尔·阿尔—哈马马特；6. 波苏；7. 马克西米亚农；8. 阿尔—哈姆拉；9. 比尔·萨亚拉；10. 斯米欧；11. 达威；12. 米奥斯·霍尔姆斯；13. 笛笛摩；14. 阿芙罗狄托要塞

来的商道上的活动早在上古时期已十分繁忙，这是由于它是连接尼罗河和红海的最直接的通道，而且没有任何险阻。通道的尽头应有一座港口，它在古希腊时代被称为米奥斯·霍尔摩斯。公元前3世纪末，阿伽塔希德（Agatharchide，参见 *apud* Phot. 250.81）首度确证了这一地名。米奥斯·霍尔摩斯港的发展则与至少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由于地中海地区日益高涨的对奢侈品的需求而兴起的对东方的贸易的增长息息相关。位于库塞尔（Qusayr）北部几公里处的库塞尔·阿勒·卡笛姆（Qusayr-al-Qadim）遗址也许正是当时的一座新城或是围绕一座新港修建的街区（图6）。

图6　今天已被沙淹没的库赛尔·阿尔·卡笛姆——米奥斯·霍尔姆斯港（博伦摄）

在科普图斯与米奥斯·霍尔摩斯之间的商道上，那些沙漠商队在福伊尼康（Phoinikôn）绿洲歇脚，然后在至今还存有许多托勒密王朝时代留下的粗糙雕刻的阿布·库威（Abû Kuway‘）岩石洞中休息。而走到了路途的一半，他们又会停留在被称为“波苏”（Persou）的比尔·乌姆·法瓦吉尔（Bi'r Umm Fawâkhîr）的地方，在那里可找到水、食物、宿营地以及庙宇。法瓦吉尔以东的比尔·萨亚拉也

可能曾经有过一个名为斯米欧的中继站：该名源于托勒密三世（Ptolomée III，公元前247—222年间在位）手下的将军斯米亚斯（Simmias）的名字。据斯特拉本的文字记载（17.1.45），当时的商人们在其大半行程中必须携带自备的水，旅程中有4个到5个中继站。

奥古斯都、提庇留（Tiberius，公元14—37年间在位）与尼禄皇朝时期

我们从斯特拉本的记载中得知，在奥古斯都治下，罗马对印度的商贸活动大幅增长，使当时米奥斯·霍尔摩斯港口的吞吐量有了大幅增长，并在库塞尔·阿勒·卡笛姆泻湖新建了一个港口。而在提庇留治下，沙漠中找到的铭文证实了罗马帝国行政当局曾经控制着东方沙漠里的宝藏（即黄金、绿宝石以及用来雕刻塑像的黑石矿）的开采。

在米奥斯·霍尔摩斯的路上，除了前述的中继站以外，罗马军队似乎还在波苏与海岸之间的阿尔—札尔坳建立了一座哨所，因为考古学家在马克西米亚农要塞的原址上发掘出了更为早期的建筑。那个时代的房子大多围绕着一个庭院建造，内有骑兵部队所需的马厩，但四周并无防御工事。

从有关佩蒂齐（Peticii）家族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得到一幅当时这条商道上贸易往来的真实景象。这个发源于意大利亚平宁（Appennini）山脉，来自马耳斯族（Marses）的家族以其热衷于东西方的小麦与葡萄酒贸易而闻名于公元前1世纪。在西方，属于家族的一艘商船曾在热那亚（Genova）不远的笛阿诺·玛丽娜（Diano Marina）沉没；而在东方，此家族的一名成员曾在法萨罗（Pharsale，公元前48年）战役后用自己的船帮助庞贝（Pompeus）逃跑，使其得以脱险。几十年后，某个名为该乌斯·佩蒂求斯（Caius Peticius）的人，大概正是那名家族成员的儿子，掌管着与印度的贸易，并曾在通往米奥斯·霍尔摩斯的商路上的瓦笛·阿尔·哈马马神庙里举行过祭谢潘神（Pan）的仪式（图7）。当时他将葡萄酒出口到印度，并带回了利润丰厚的胡椒与珍珠。大约与此同时，佩蒂齐家族在亚平宁山脉的阿圭拉（Aquila）一带建起了一座陵墓，墓内画有背着双耳尖底酒瓮的骆驼（图8）。

一个位于科普图斯的骆驼运输企业印在陶瓷片上的收据则再次证明了当时的商贸活动的繁荣（图9）。该企业属于一个名叫尼卡诺尔（Nicanor）的人，主要活跃在提比略与尼禄治下。其中就有成瓮的古意大利葡萄酒，它们被从科普图斯输往米奥斯·霍尔摩斯及贝雷尼斯这两个红海港口。它的代理商与合作商中既有希腊人、埃及人、犹太人、阿拉伯人，也有罗马公民，例如那个将自己的名字

图7 岩洞神殿中该乌斯·佩蒂求斯刻写的铭文(博伦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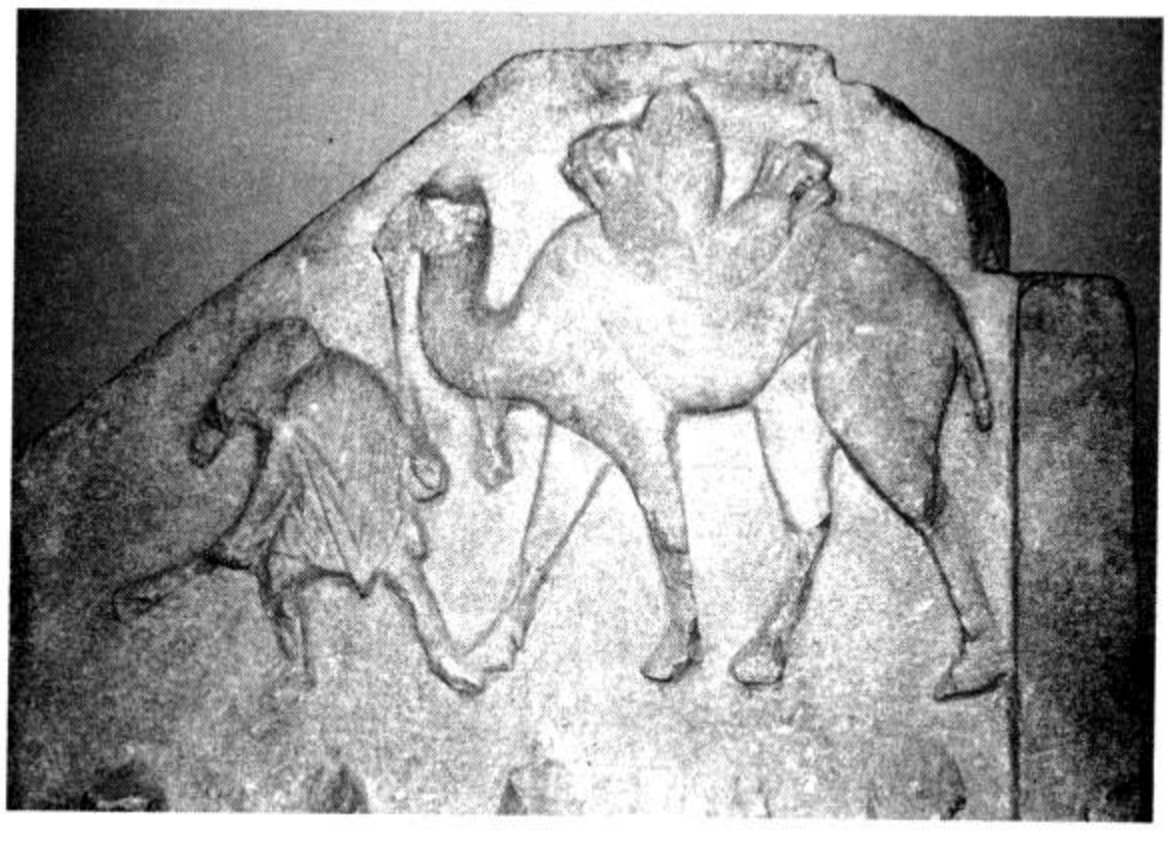


图8 意大利阿奎拉的佩蒂齐陵墓中的浮雕:一匹骆驼驮着装酒的双耳尖底瓮(博伦摄)

图 9 尼卡诺尔骆驼运输企业所在陶瓷片上的收据(博伦摄)

诺巴努斯(C. Norbanus)印在酒瓮上的出口商。

能够证明科普图斯与贝雷尼斯之间存在着一条直达商路的最古老的物证也始于这个时期。在阿芙罗狄托(Aphroditô)与笛笛摩两个要塞建立以前,沙漠商队曾在白天歇息于瓦笛·梅尼(Wadi Menih)的山凹,因为那里有能遮阳的岩石(彩图 17)。闲来无事时,来往贝雷尼斯的商人们在石头上刻了不下 80 条的粗糙雕刻文字。确认年代的最古老的粗糙雕刻的署名是卡普纽斯·摩沙斯(Calpurnius Moschas)的奴隶洛达内斯(Laudanès)。其后有名为努密笛欧斯·埃洛斯(C. Numidius Eros):一个可能是做香料买卖的意大利卡普阿(Capua)人则在他的雕刻中记下他于公元前 2 年自印度返回。就在此雕刻旁,阿纽斯·普洛卡姆斯(P. Annius Plocamus)的奴隶利萨斯(Lysas)于公元 6 年 7 月 2 日以拉丁、希腊双语刻下了他的名字(图 10)。他主人的家族醉心于罗马与印度的贸易,因为 30 年后正是某位阿纽斯·普洛卡姆斯成了红海一带的包税人。年代最晚的雕刻是由阿求斯·费利克斯(L. Attius Felix)的奴隶厄菲摩斯(Euphémos)于公元 46 年 4 月 29 日经过时留下的。对我们来说,这些粗糙雕刻的日期十分重要: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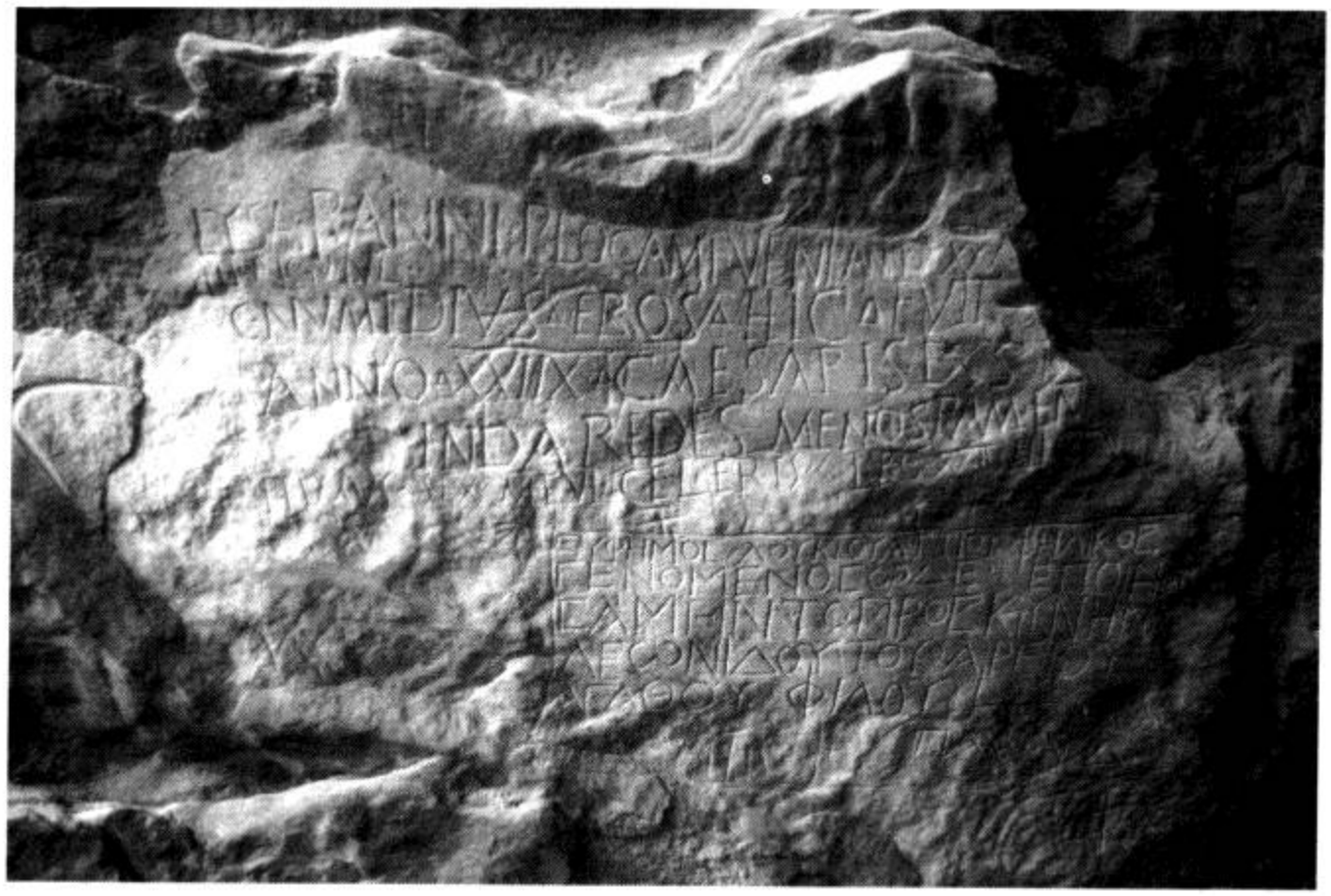


图 10 努密笛欧斯·埃洛斯公元前 2 年从印度归来以及利萨斯公元 6 年在瓦笛·梅尼的背阴处刻下的铭文(博伦摄)

早的一条是军队刻录的铭文,是商道开通的主要材料,正是由于在"阿波罗·伊德合乌马",坎巴斯(Compasi)和贝雷尼斯打出的水井使得商路得以开通;而最晚的铭文与修建新的军事要塞的时间相近,正因为后者的修建使得上述天然避暑地不再有用。

由此可见,自奥古斯都统治末年起,在 1 世纪上半叶期间,贝雷尼斯港越来越重要,其重要性在 1 世纪 70 年代超过了米奥斯·霍尔摩斯港。似乎这一发展变化乃是由于驶向印度南部的商船吨位的增加所致。连接科普图斯与贝雷尼斯之间的直达公路的开通导致了米奥斯·霍尔摩斯港的相对衰落,后者专门停泊较小吨位的船舶。

佛拉维斯(Flavii)皇朝(公元 69—96 年间)(图 5)

在韦斯巴芗皇帝统治下,确切地说是在公元 76—77 年间,从科普图斯通往贝雷尼斯的道路上,即分别在迪迪摩、阿芙罗狄托和西凯(Sikkayt),或许还在若维斯(Jovis),新开挖了由军队把守的水井。最近找到的一系列铭文,使我们得以确定其年代。也许就在同一时期,由于修建了克罗阔笛罗要塞和马克西米亚

图 11 通往米奥斯·霍尔姆斯道路上的马克西米亚农要塞，建于佛拉维时代（博伦摄）

农要塞，使得科普图斯与米奥斯·霍尔摩斯港之间的较短商路的设施得以完备（图 11）。与 1 世纪上半叶的情况有所不同，1 世纪下半叶的军事哨所都建成了要塞式哨所，用以防御日益增长的来自沙漠里游牧民族的威胁。哨所的结构为边长约为 50 米的四边形，每只角都配备有圆柱形碉楼。要塞的大门置于两个半圆形碉楼之间，可以让马匹出入，然而马车却无法进出。要塞中央有一口深井，人们可以借助于台阶下至水井内。由围墙圈起来的四周为士兵宿舍，被称为 *praetorium* 的指挥所，一座粮仓，一个或数个储水罐，自 2 世纪起还常有些温泉浴室，至少有一个神庙，坐落于要塞中后部的位置上，与大门构成一条中轴线。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增建了一些生活设施，如厨房；自 2 世纪起安装的温泉浴室，有些显得简陋，有些则相当讲究。位于通往贝雷尼斯的商路上的迪迪摩要塞，使用率异常高，且拥有一些必不可少的附属设施，如位于要塞门外的供沙漠商队的骆驼饮水的水槽，再如位于门旁垃圾堆上用于养猪的猪圈等（图 12）。况且，恰恰是在这些垃圾堆里出土了最为丰富的古代器具。除餐具以外，还有双耳尖底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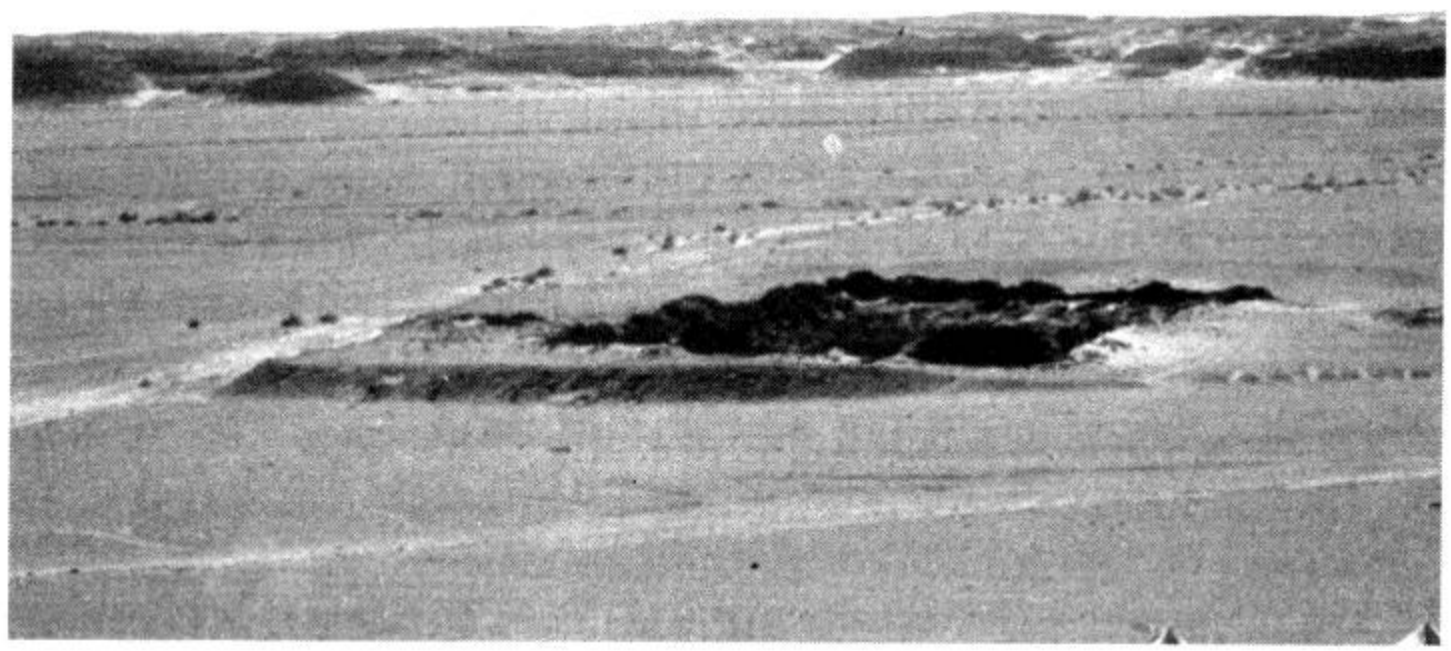


图 12 通往贝雷尼斯道路上的迪迪摩要塞，建于公元 77 年（博伦摄）

瓮、玻璃制品、织物、皮革制品，特别是还出土了数千枚陶片，它们曾被用来写信。这些书信向我们提供了有关驻扎在沙漠里的士兵们日常生活的无数细节，从获得补给的困难到娼妓活动的组织形式都有。

自哈德良时代起

在哈德良皇帝的统治时期（Hadrien，公元 117—138 年间在位），克罗阔笛罗要塞遭废弃，并被位于比尔·阿尔—哈马马特的要塞（我们尚不知其古代的名称）所取代。也许在同一时期在马克西米亚农和比尔·萨亚拉这两个相距 23 公里的地方之间修建了阿尔—哈姆拉要塞，可能是由于商路必须穿越一段山路，而这里恰恰是游牧民族部落对罗马军队进行伏击的理想场所。这些要塞与前述要塞的建筑模式相同，惟一的区别在于守卫大门的碉楼呈正方形。这条商路上的最后一个要塞是达威要塞，位于比尔·萨亚拉和米奥斯·霍尔摩斯港口之间。它的建筑年代或许较晚，其建筑更加讲究，在每一条边线中部都增设了一座碉楼。当这座要塞建成后，通往米奥斯·霍尔摩斯港的商路上便配备齐了水井和相距很近互成犄角之势的警察哨所，两所要塞之间的距离都不超过 20 公里。为此而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非同寻常的努力说明当时有必要保护这条抵达红海

的最为快速的通道，因为使用它的不仅有军队、行政管理部门（传递官方邮件），也有旅行者，而且是整个厄里特里亚海周边交易的一部分。

在塞维鲁皇朝治下（公元193—235年）

2世纪末3世纪初在塞维鲁皇朝治下，在库苏尔·阿尔·巴纳特修建了一座新的要塞。其形制与此前的要塞大不相同，规模明显比它们更小，内部也没有水井。其边角呈圆形，已不复有碉楼拱卫，里面仅有兵营、厨房和一座神庙而已。

在库苏尔·阿尔·巴纳特要塞修建完成20多年后，罗马军队决定放弃通往米奥斯·霍尔摩斯港的商路上的所有大小要塞并不再对这条道路上往来的沙漠商队进行保护与控制，而对通往贝雷尼斯的商道则继续进行监护，直至3世纪中叶前后为止。这一决定也许是由于图拉真（Trajan）运河和红海北部克利斯马（Clysma）港以及埃拉（Aila）港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的缘故。至克利斯马港的直接水运可以避免东部沙漠的不安全性。4世纪末几年成书的《职官志》（参见 *Notitia Dignitatum Or.* 28）指出，罗马军队守卫着图拉真运河，然而却不复守卫沙漠商道。造船与航海技术的大幅度改进使得船只能够更为便捷地抵达克利斯马港。这样船只便可以无需中途装卸货物并不间断航行直抵亚历山大（Alexandria）港，此举更可使得商人避免由于使用骆驼运输而带来的昂贵运费。

自3世纪下半叶至6世纪：东部沙漠的商道被逐渐废弃

在3世纪中，东部沙漠军事驻防情况发生变化的同时，对远东进行贸易的整体条件也在发生变化。一般而言，2世纪下半叶，中国汉朝的衰弱使得匈奴人掌握了部分陆路的控制权。自230年起，萨珊王朝（Sassanides）的波斯人封锁了丝绸之路的中路，他们分别与罗马人和贵霜人交战。在沙普尔一世（Sapor I，公元241—272年间在位）及其继任者的不断打击下，贵霜王国最终分崩离析。而自3世纪起，由于哥特人（Goths）的出现和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e）希腊城邦的衰败，往昔可以绕过波斯的丝绸之路北路也无法使用了。

剩下的只有南路可行，经由印度河谷或阿萨姆邦及恒河河谷，陆路和海路运输并举，将中国丝绸与印度商品一起运往西方。

可是自3世纪下半叶起这条路线上的安全状况也每况愈下：因为埃及东部沙漠落入了名为布列明斯（Blemmyes）的游牧民族的控制之下，而埃及本身也为芨了迷尔（Palmyre）的齐诺比亚（Zénobie，公元266—272年间在位）所统治。到了279、280年间，不雷米人甚至占据了科普图斯港。

直至296年，戴克里先皇帝（Diocletian，公元284—305年间在位）才从布列

明斯人手中重新夺回了科普图斯港并平定了沙漠。这个历史事件的一个标志就是在309年和311年间修建的阿布·沙尔(Abû Sha'r)要塞,罗马军队在那里一直驻扎到4世纪末年。罗马军队虽夺回了对沿海一带的控制权,但其控制却未及内陆,未能保护商道。我们在通往米奥斯·霍尔摩斯港和通往贝雷尼斯的商道上的要塞中均未发现任何东罗马帝国时期有军队重新占领的痕迹,尽管自4世纪起,贝雷尼斯港的商贸运输活动曾再度繁荣起来。有可能这个港口用于货物中转,即将来自印度的大型船只上的东方货物装载至能够自红海北上经由图拉真运河进入尼罗河的小型船只上。

公元4、5世纪,罗马帝国与印度和锡兰的贸易再度兴盛,在那里曾大量出土君士坦丁时期(Costantine,公元307—337年间在位)的钱币。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阿克苏姆(Axoum)王国对天主教的皈依曾有助于帝国恢复其在红海一带的统治。阿克苏姆与印度之间的直接联系为许多史料所证明,尤其是一位底比斯(Thèbes)的律师的历险记,这位罗马公民所乘船只在孟加拉湾触礁,曾被判处在当地的一个面包作坊服劳役。

由于与阿克苏姆王国的联盟关系,罗马帝国与东方的商贸联系变得更为便利;在360年前后,《世界概览》(*Expositio totius mundi*)一书提及亚历山大港大量吞吐香料和来自印度的货物的事实。

与4—6世纪商贾云集的贝雷尼斯不同,米奥斯·霍尔摩斯港似乎是一落千丈。根据《诸圣传记》(*Martyrium Arethae*,参见 *Acta Sanctorum*, Oct. X, p. 743)记载,在524年进驻埃塞俄比亚阿都利斯(Adoulis)港的60艘商船中,有20艘来自克利斯马港,15艘来自埃拉,7艘来自伊奥达贝(Iôtabè),只有两艘来自贝雷尼斯,而竟没有一艘来自米奥斯·霍尔摩斯港。

事实上,来自马拉巴海岸的胡椒在4、5世纪时主要运往贝雷尼斯,在6世纪和7世纪时则主要去往克利斯马港。彼爱尔·迪亚可(Pierre Diacre, Y, 6)所引述的公元383—384年间的爱捷丽(Egéria)圣地朝圣的记载就提到:"克利斯马港将商船发往印度并接待来自印度的商船,而来自印度的商船除此港口外,再也没有其他进入罗马帝国领土的通道。那里云集着巨型商船,而港口则因为有来自印度的商人而闻名。罗马帝国称为罗郭代特(*logothète*)的代理官员就将其官署设立于此并将其船舶停泊于此,他每年奉皇帝之命前往印度。"

除了纯粹商贸联系之外,罗马帝国还与东方建立了其他方面的联系,带有宗教目的之行。众所周知,佛教正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犍陀罗(Gandhara)地区

(如白沙瓦 Peshawar)和贵霜王国的,随后则进一步传播至中国,在公元1世纪,中国开始建造其首批佛教寺院。佛教僧侣们利用各条丝绸之路取经并将其带回中国。同样,正是基督教的僧侣们将养蚕的技术传到了拜占廷。其时查士丁尼(Justinian,公元527—565年间在位)皇帝采取了一些阻止自波斯进口丝绸的措施,同时在皈依基督教的阿克苏姆王国的支持下,他大力发展红海上的贸易活动,试图打破波斯的经济封锁。可是这项计划并未圆满实现,到了6世纪,商人们已几乎不再问津通向红海的这些道路。而继续来往于这片荒芜高原的人士则大部分为采石工人、石矿主以及僧侣。实际上,拜占廷时代沙漠腹地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金矿、宝石和红斑岩的开采,而红斑岩山一带的石矿在当时都很兴旺。而寻求隐居与灵修的僧侣们则在沙漠深处修建起他们的隐修所和修道院,甚至连罗马军队遗弃不用的古代要塞也派上了用场。

本文是"欧亚非考古与文明——历史、考古与社会"中法学术系列讲座"第62讲的讲稿。

〔注 释〕

1 参见 Gurukkal 与 Whittaker,2001年。

参考文献

BALLET, P.,《De la Méditerranée à l'Océan Indien. Égypte et le commerce à longue distance : les données céramiques》(从地中海到印度洋:埃及远距离贸易—陶瓷器资料), *Topoi*, 6, 1996, p. 809 - 840.

BEGLEY, V., *The ancient port of Arikamedu, New excavations and researches 1989—1992*(阿里卡梅度的旧港:1989—1992年间的新发掘和研究), I. Pondichéry,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1996.

BERNAND, A., *De Koptos à Kosseir*(从科普图斯到科塞尔), Leyden, Brill, 1972.

BRUN, J.-P., BÜLOW-JACOBSEN, A., CARDON, D., CUVIGNY, H., LEGUILLOUX, M., MATELLY, M.-A., REDDE, M., *De Coptos à Myos Hormos*, *Re-*

cherches sur l'organisation et la protection de la piste caravanière de la Mer Rouge à l'époque romaine(从科普图斯到米奥斯·霍尔姆斯:罗马时代红海地区商道的组织与保护之研究), Le Caire, IFAO, 2003, 2 volumes.

BRUN, J.-P.,《Le verre dans le Désert Oriental d'Égypte. Contextes datés》(埃及东部沙漠的玻璃:确定年代的背景), in FOY, D., NENNA, M.-D., éds., *Échanges et commerce du verre dans le monde antique. Actes du colloque de l'AFAV. Aix-en-Provence / Marseille 7—9 juin 2001*(古代玻璃的交换与贸易——AFVA 研讨会论文集), Montagnac, M. Mergoil, 2003, p. 377 - 387.

CASSON, L. ed. *The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厄立特里亚海航海志), Princeton, 1988.

[Colloque 讨论会],《Autour de Coptos》("有关科普图斯"研讨会), *Topoi*, supp. 3, 2002, p. 438.

CUVIGNY, H., BULOW-JACOBSEN, A.,《Inscriptions rupestres vues et revues dans le désert de Bérénice》(贝雷尼斯沙漠岩壁铭文研究与再研究), *Bulletin de l'Institut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99, 1999, p. 133 - 193.

DE ROMANIS, F., *Cassia, cinnamone, ossidiana. Uomini e merci tra Oceano Indiano e Mediterraneo*(肉桂、樟料、黑曜石。从印度洋到地中海的人与货物), Roma, L'Erma di Bretschneider, 1996.

DE ROMANIS, F.,《Romanukharattha e Trapobane : sui rapporti Roma-Ceylon nel I sec. d. C.》("罗马努克哈拉塔"与塔普拉班:关于公元1世纪罗马与锡兰之关系), *Helikon*, 28, 1988, p. 5 - 58.

DE ROMANIS, F., TCHERNIA, A., éds., *Crossings. Early mediterranean contacts with India*(跨越——地中海地区与印度的早期接触), New Delhi, Manohar, 1997.

DESANGES, J., *Recherches sur l'activité des Méditerranéens aux confins de l'Afrique*(地中海人在非洲边界的活动研究), Rome, Ecole Française de Rome, 1978.

MOLLAT DU JOURDAIN, M., DESANGES, J., *Les routes millénaires*(千年之路), Paris, Nathan, 1988.

GURUKKAL, R., WHITTAKER, D., "In search of Muziris"(寻找穆吉里斯),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14, 2001, p. 335 - 350.

PEACOCK, D. P. S., "The site of Myos Hormos : a view from space"(米奥斯·霍尔姆斯遗址——从空间角度来看),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1993, p. 226 - 232.

REDDE, M., GOLVIN, J. Cl.,《Du Nil à la Mer Rouge : documents anciens et nouveaux sur les routes du désert oriental d'Égypte》(从尼罗河到红海:有关埃及东部沙漠道路的新旧资料), *Karthago*, 21, 1986—1987, p. 5 - 64.

SIDEBOTHAM, S. E., ZITTERKOPF, R. E., "Stations and Towers on the Quseir-Nile Road"(在库塞尔到尼罗河道路之上的驿站和碉楼),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75, 1989, p. 155 - 189.

SIDEBOTHAM, S. E., *Roma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Erythra Thalassa. 30 B. C. - A. D. 217*(公元前30年至公元217年罗马帝国在红海的经济政策), Leiden, Brill, 1986.

TCHERNIA, A.,《Le dromadaire des Peticii et le commerce oriental》(佩蒂齐的骆驼及与东方的贸易), *MEFRA*, 1992, p. 293 - 301.

WEERAKKODY, D. P. M., *Trapobanê. Ancient Sri Lanka as known to Greeks and Romans*(塔普拉班:古希腊罗马人所知道的古斯里兰卡), Turnhout, Brepols, 1997.

WHEELER, R. E. M., "Arikamedu, an Indo-Roman Trading Station on the East Coast of India"(阿里卡梅度:印度洋东岸印度—罗马交易中心), *Ancient India*, II, 1946, p. 17 - 124.

WHEELER, R.E.M., *Rome beyond the Imperial frontiers*(帝国边境之后的罗马), London, 1954.

WHITCOMB, D., JOHNSON, J. H., *Quseir al Qadim 1980*(库赛尔·阿尔·卡笛姆1980年), *Preliminary Report*, Malibu, Undena, 1982.

关于扶南国的考古学新研究
——位于湄公河三角洲的沃澳（Oc Eo，越南）遗址

莽甘（Pierre-Yves MANGUIN） 著
吴旻 译

“发现”扶南

1903 年，当时还非常年轻的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在《法国远东学院院刊》（*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上发表了他最早的文章之一，题目就叫作《扶南》。在文中，他以一种汉学分析的严谨——日后他将因这种严谨而闻名于世，介绍了整个中国历史文献中，哪怕只有只字片语，但都以某种形式提到过的扶南国。从中人们可以推断出，这个国家位于东南亚大陆某处，曾在公元 1—6 世纪存在过。伯希和在这篇材料丰富、长达 50 页的开山之作当中，在介绍了直至当时还在流行的各种看法之后，经过深思熟虑，将扶南国定位于印度支那半岛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并对当时所有的历史资料作了一个概括。在这里顺便提一下，这个国家至今被历史学家称为“扶南”，这惟一的国名是各种中文文献对它的称呼：极少的一些在那里发现的公元 5、6 世纪的梵文碑文只提到该国最后几代君主的姓名，却从未提起他们所统治的国家的名称。（此外由于缺乏使用当地语言文字的碑刻，我们还不能确切地认识这种语言文字，因而我们也无法确定扶南国民的人种归属：最有可能的假设是他们为高棉人的祖先，说的是南亚语，然而也有人认为，他们更接近于相邻的占城人［Chams］，说的是南岛语。）

从中国文献中我们得知，这一点亦已被今天的考古学家所证实，这个叫作“扶南”的国家诞生于公元1世纪，3、4世纪时受到了印度文化在许多方面的影响，如政府制度，最初的碑文使用梵文，尤其是宗教，即佛教和婆罗门教；在建筑与雕塑中也表现出相应的艺术形式。这也就是20世纪初研究东方的历史学家所说的东南亚的“印度教化”，这个过程同样体现在该地区的其他区域，无论在大陆上还是在岛屿中。我们在下文中还将谈到这些深刻的文化转变。我们通过阅读有关扶南的中文文献，也可看出自公元3世纪起，这个始建于湄公河三角洲的国家经济有相当发展，已能控制马来半岛峡地的一些小国，这些小国都位于经过孟加拉湾通往印度的各条道路的出口处。在东南亚，那些海峡（新加坡、马六甲和巽他海峡）和半岛峡地（有着横穿半岛的道路），是由中国通往印度和中东的海上通道的必经之路，对它们的控制从那时起已经成为关键之举（图1）。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国远东学院的碑铭学家、建筑学家和艺术史家继续探讨着扶南国的问题，而现有材料的罕有与模糊使得这个问题变得十分困难：公元5、6世纪之前碑文的匮乏；而在这个时期，也是扶南国存在的最后两个世纪中出现的雕塑，其艺术风格却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时中国的文献，即写于中国刚刚“发现”东南亚时期的材料，由于只有通过后世的文字引用才能见到，也有相当的不确定性。而对于这些建筑学家、艺术史家或是碑铭学家来说，考古学只不过是作为一种辅助性的技术：他们掘地三尺只是为了清理出“优美”的古迹，让“美丽”的雕塑或是文字，以及所有可被看作他们想研究的“伟大文明”的一切印记重见天日。他们对于考古发掘所能揭示的与一个像扶南国这样的新生国家有关的日常生活、经济生活及远距离的文化交流等等还毫无兴趣。直到1930—1940年间，在法国远东学院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考古这门学科才进入西方的东方学家钟爱的领域，真正显示出它的进展。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该地区的政治历史原因，直到上世纪80年代，甚至是90年代，考古学家才最终可以运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科学手段，重新对湄公河三角洲进行考古研究。

然而早在1944年，法国远东学院成员马勒海（Louis Malleret，1901—1970）已经在当地称为“沃澳”的地区组织过一次长时间的考古发掘。沃澳位于当时所称的交趾支那（Cochinchine），在湄公河三角洲西端与泰国湾之间，在此前几年，它与周围地区已经遭遇多次盗掘，从那里出土的古制金首饰已大量流入西贡的古董市场（图2）。马勒海经过调查，并且对这一当时还很难进入的地区进行勘察之后，终于确定了这些淘金者所获物品的来源方位：这就是名叫沃澳的冲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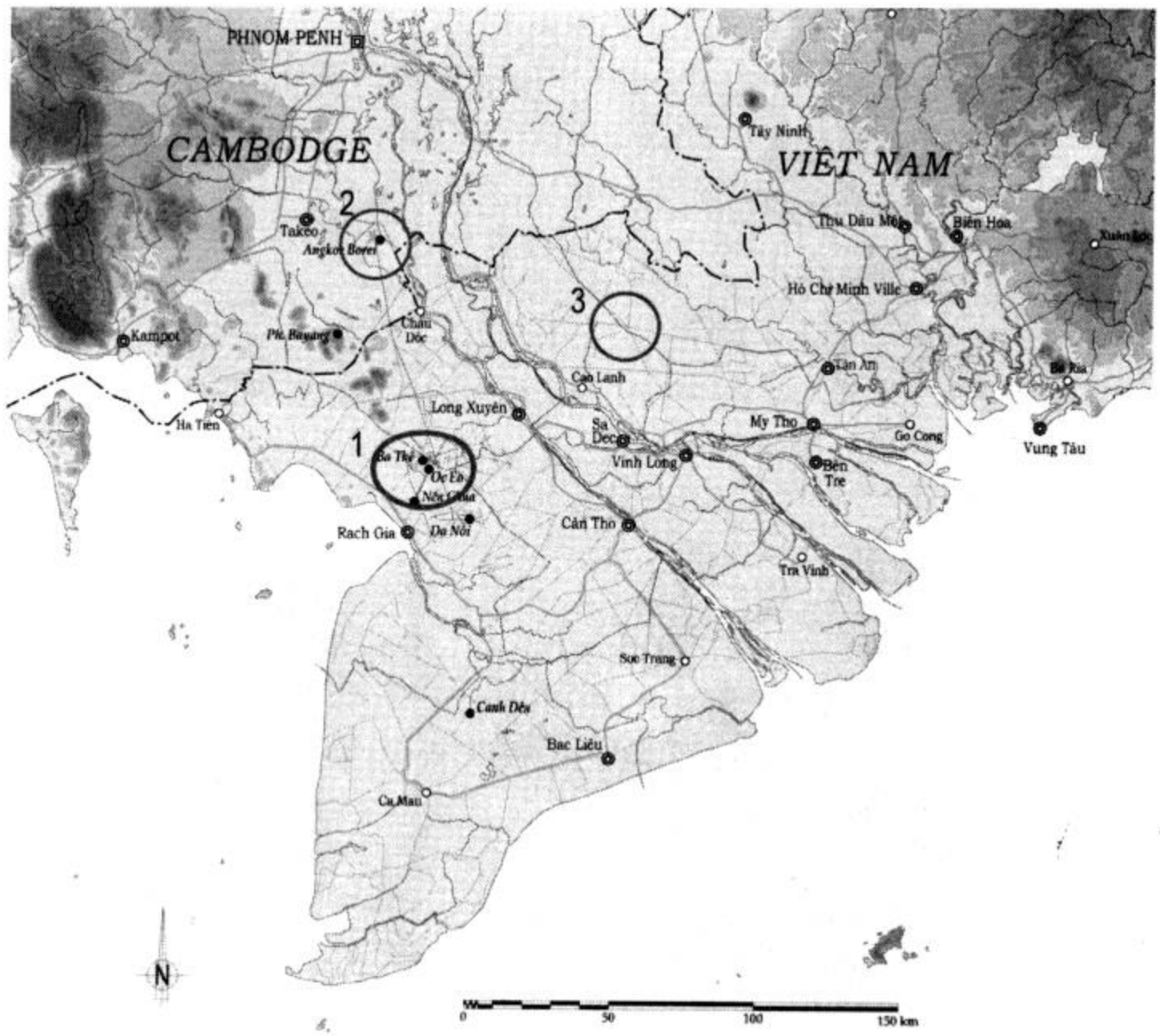


图 1　湄公河三角洲地图及沃澳遗址的位置(H. David 制图—EFEO):1. 沃澳;2. 吴哥博莱;3. 塔穆

平原,在雨季完全被淹没,在旱季仅有几个星期的时间可以进入。它位于巴泰(Ba Thê)小山脚下,在龙川市(Long Xuyên) 西南方三十余公里处。这个在 1944 年还是一片沼泽的地区,如今已是越南的重要稻米产区之一。

1944 年的这次发掘出土了一系列砖砌和石砌的建筑古迹,与人们在这个地区所常见的形制完全不同,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器物,金质的、锡制的、半宝石和陶瓷做的成套和零散的首饰(图 3)。当时更令人惊异的是找到了数枚公元最初几个世纪间的罗马与波斯钱币,这一发现不仅引起了科学界的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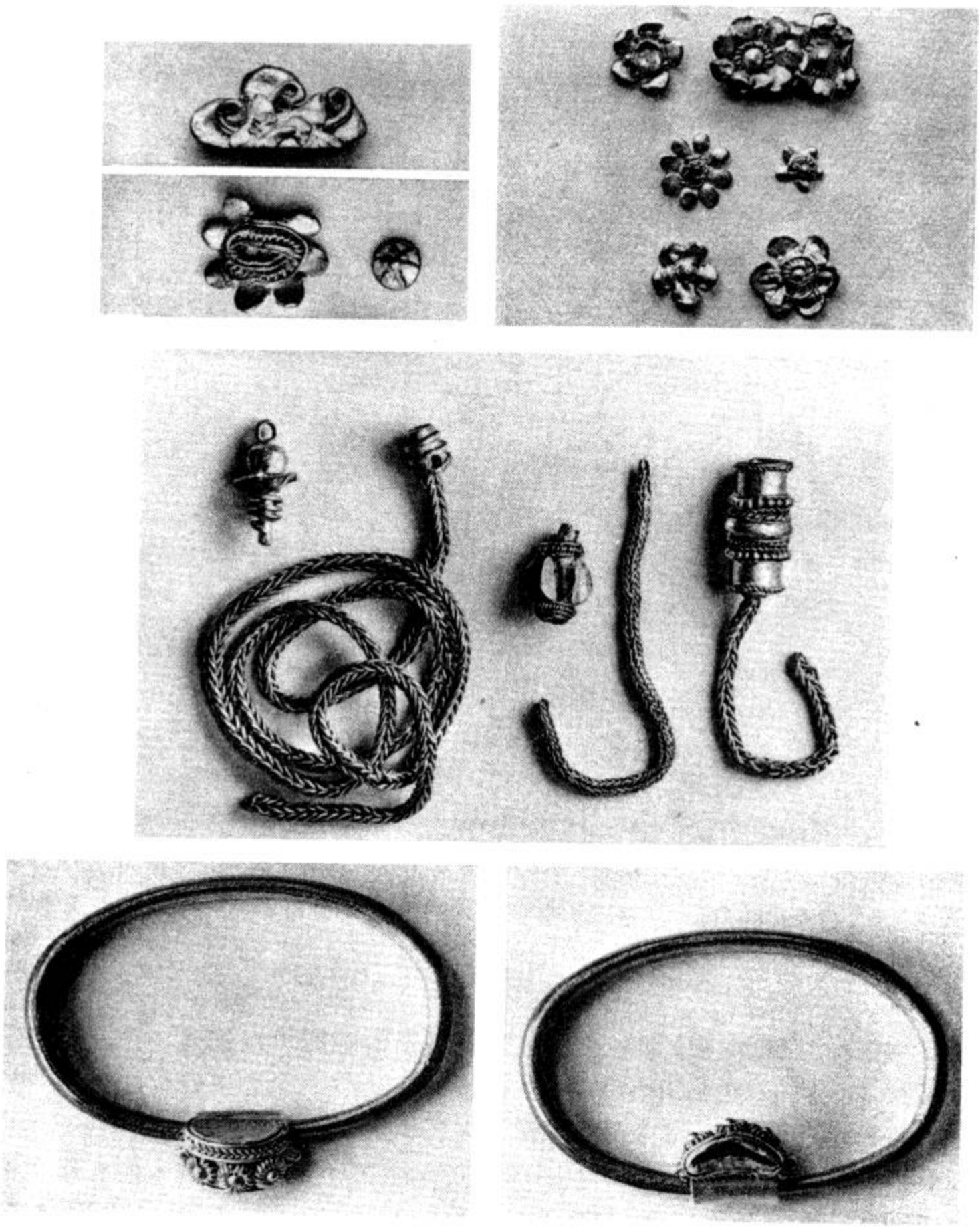


图 2　沃澳的金银制品(EFEO 照片)

图 3　沃澳的锡质项坠(EFEO 照片)

意,还吸引了媒体的关注(图 4)。这一系列品种纷繁的物品使得它被列为东南亚公元 1—10 世纪的发现最多的遗址之一。从这个遗址的航拍照片上还可以看出,它有一个在地面看不见的长方形的形状,长边 2.5 公里。一些古老的运河穿越城市的范围,一方面将之与海洋连接,另一方面,则将它与柬埔寨境内的其他一些重要遗址连接起来,其中就有吴哥博莱(Angkor Borei,是柬埔寨的一个城市,离金边 65 公里,柬越边境 12 公里)。由于 1945 年 3 月日本军队禁止法国人进入该地区,当时准备于次年进行的第二次发掘一直未能进行。此后与法国进行的独立战争,然后与美国进行的长时间的越战,最后在柬埔寨进行的内战,使扶南国的遗址长期不得随意进入。

但是,马勒海继续收集研究来自沃澳地区的器物,并将之与整个湄公河三角洲 300 多处的文物作比较,这些物品自 20 世纪初陆续被发掘出土,当时还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散布在西贡的各个博物馆和个人收藏家手里。经过了独立战争之后的巨变,1957 年法国远东学院的行政系统亦从河内转到巴黎,1959 年至 1963 年间一部题为《湄公河三角洲考古学》4 部 7 卷的巨著终于在法国远东学院问世了,这就是上述细致的历史重建研究的结果,书中还伴有一份 1944 年考古发掘的最终报告。

马勒海是第一位将这次考古发掘的大部分成果定为扶南国遗迹的人,人们是在 20 世纪初从中国文献中得知这个国家的名字的。尽管将之作为扶南国的

图4　亚历山大大帝银制德拉马克(上图,柬埔寨);罗马皇帝安敦尼·庇乌与马可—奥勒留的金质像章(中图,沃澳),公元2世纪;玻璃饰钉:带有波斯意味的人像(下图,沃澳),3—4世纪;(EFEO照片)

遗址此后从未被真正置疑，但是当地发掘工作的中断，以及在东南亚其他地区出土的与马勒海所发现的相近的器物，一些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于他结论中有关沃澳遗址的年代及其相对重要性所提出的置疑，使得许多争论至今仍在进行。

从1979年开始，越南考古学家重新开始这一研究，他们以1944年发现的遗址命名，将之称为“沃澳文化”。他们进行系统的勘察、探测、以C_{14}方法断代，发现的文物丰富了越南各博物馆的馆藏，他们还发表许多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完善并有力支持了当年法国远东学院考古学家的结论。

上世纪90年代，胡志明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考古学家感到有必要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进行一系列密集的发掘工作，并且在发掘中运用一切目前已经掌握的科技手段。因此他们向法国外交部求助，并且也向当时我领导的法国远东学院研究小组求助，我们小组专门研究东南亚城市遗址及其最早的各国之间的交流。

1997年开展了这次新的“湄公河三角洲考古行动”的第一次活动，进行了勘察与探测。在1998—2002年间，又对沃澳遗址及周围地区相继进行了四次密集的发掘。此后，小组致力于研究出土的几万件文物，其中大部分是陶瓷制品。此外，与越南和法国的地质学家及植物学家合作，我们正在对沃澳遗址的古环境进行研究。

湄公河三角洲考古发掘行动的研究议题及目标

“湄公河三角洲考古发掘行动”的开展，主要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元1—6世纪，在扶南国以及东南亚的其他地区，所发生的深刻文化转变的复杂过程。因此必须在绝对准确的断代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可靠的年表；确定以往与印度和与中国之间的交流各占多少份额；还要确定当地文化与印度文化在城市化与建立国家的进程中各起了什么作用。我们的研究还尝试分析在扶南国时代城市空间构造的过程，海上贸易交流与农业活动在它的经济中相应的份额。我们还试图理解，由于通过开挖运河控制这样一个每年遭遇洪水的地区的水文状况，从而使得景观发生彻底变化，究竟在古运河的运作中，排水、浇灌和航运各占多少比重？从2002年以来，我们的研究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一些与扶南国同时代的遗址上进行，以便更好地从总体上理解这些根本的变化，也能更好地理解现代的东南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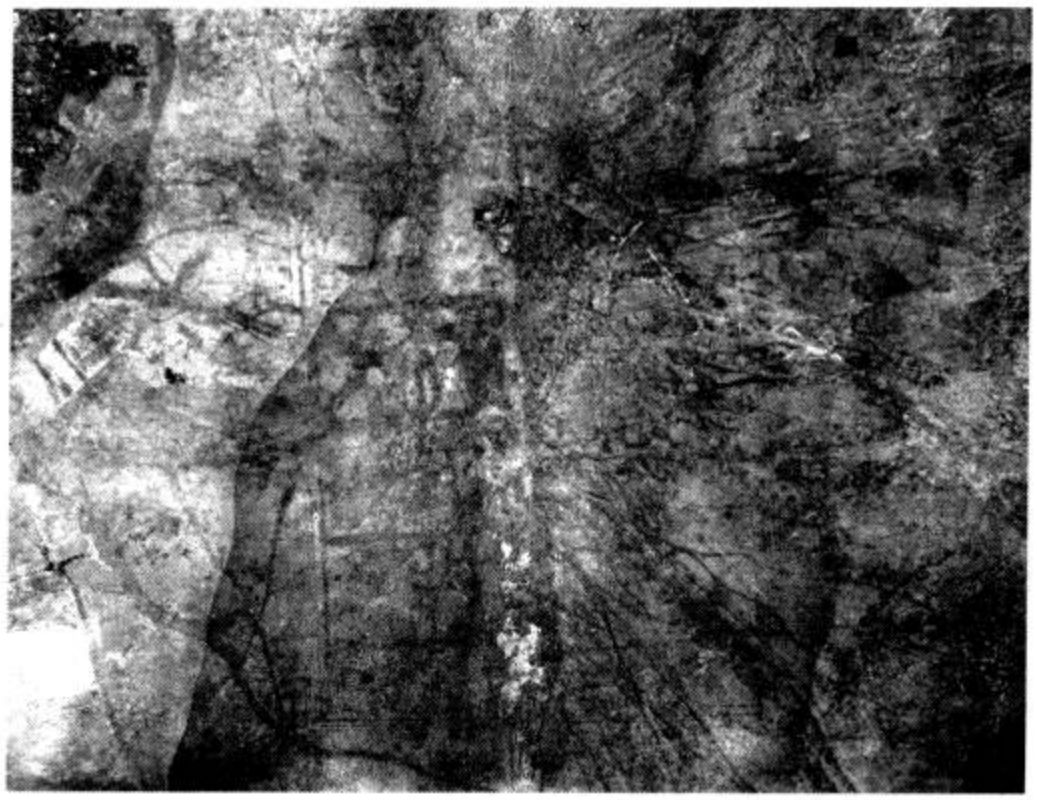
1997 年，在勘察了整个湄公河三角洲的众多遗址之后，与越南同事一道，我们决定重新开展对沃澳遗址的考古研究。这样我们可以直接得益于马勒海的先期工作，并且也试图将他收集的非常可观的材料置于历史背景之中。

一系列发掘遗址在巴泰山的斜坡和沃澳平原上展开，发掘目的是获取一些目前缺乏以至于无法解读现有众多材料的信息，亦可与东南亚同时代的其他遗址作比较。建立在可靠的地层学研究上，并且以 60 多个 C_{14} 方法断代的结果作为比照，我们掌握了一组年代表。以该年代表为基准，遗址与遗址之间、在当地遗址中找到的各类建筑遗迹以及物品（特别是陶瓷制品）之间清晰的相似的类型学研究正在建构之中。这将可以使得自 1944 年陆续收集到的整个的材料、物品次序井然，这些材料、物品非常丰富，但几乎一直无法找到它们的来源背景。经过对 20 世纪 50 年代航拍的照片进行判读之后，我们终于确定了方位并且对人工设施（城市的周边和运河）进行了发掘，在此之前只是通过遥感探测认识它们（图 5）。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一地区的古代环境，以便更好地认识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在地质学家和植物学家的帮助下，我们目前正在对发掘现场及其周围环境进行地貌学和孢粉学的研究。在 2002 年进行的活动中，有很大一部分实地研究在两个既非居住区又非寺庙的现场进行：1. 古运河，这是湄公河三角洲各遗址，特别是沃澳遗址的特别之处，它们穿越或是通往古城的周围，将之与柬埔寨的吴哥博莱遗址和海洋相连接（图 6）。2. 城市遗址上标出了沃澳古城范围的护城河。以往这只是一种假定，因为只有在 1930—1950 年间的航拍照片上才看得到，这次通过发掘我们证实了它的存在。

关于沃澳和扶南国的初步结论

在目前所有的分析结果出来之前，要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研究作出最后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但至少我可以在这里介绍一些今天已经有了的结果。

在进行了五次发掘之后，本次考古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早已经达到。一份详细的公元千年之内的年代表的建立在东南亚考古学上尚属首次（如果与我们的美国和高棉同事正在制作的那份年代表作比较，我们的这份格外出色（图 7）。他们正在发掘的是扶南国的另一个城市，位于柬埔寨的吴哥博莱遗址）。这份年代表对于扶南国的研究当然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在这段时期几乎找不到任何碑文。但同时它涉及到的也是整个东南亚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因为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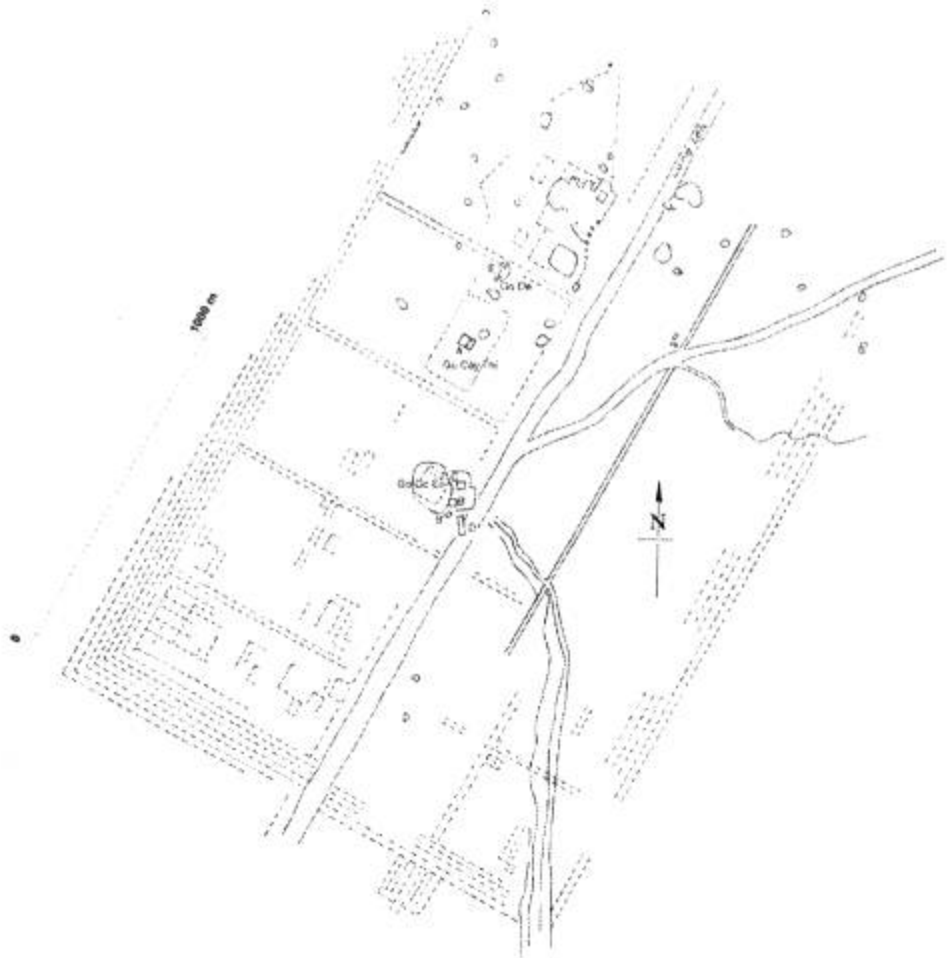


图 5　沃澳的城市遗址:考古遗址,城墙,中轴运河(1951 年航拍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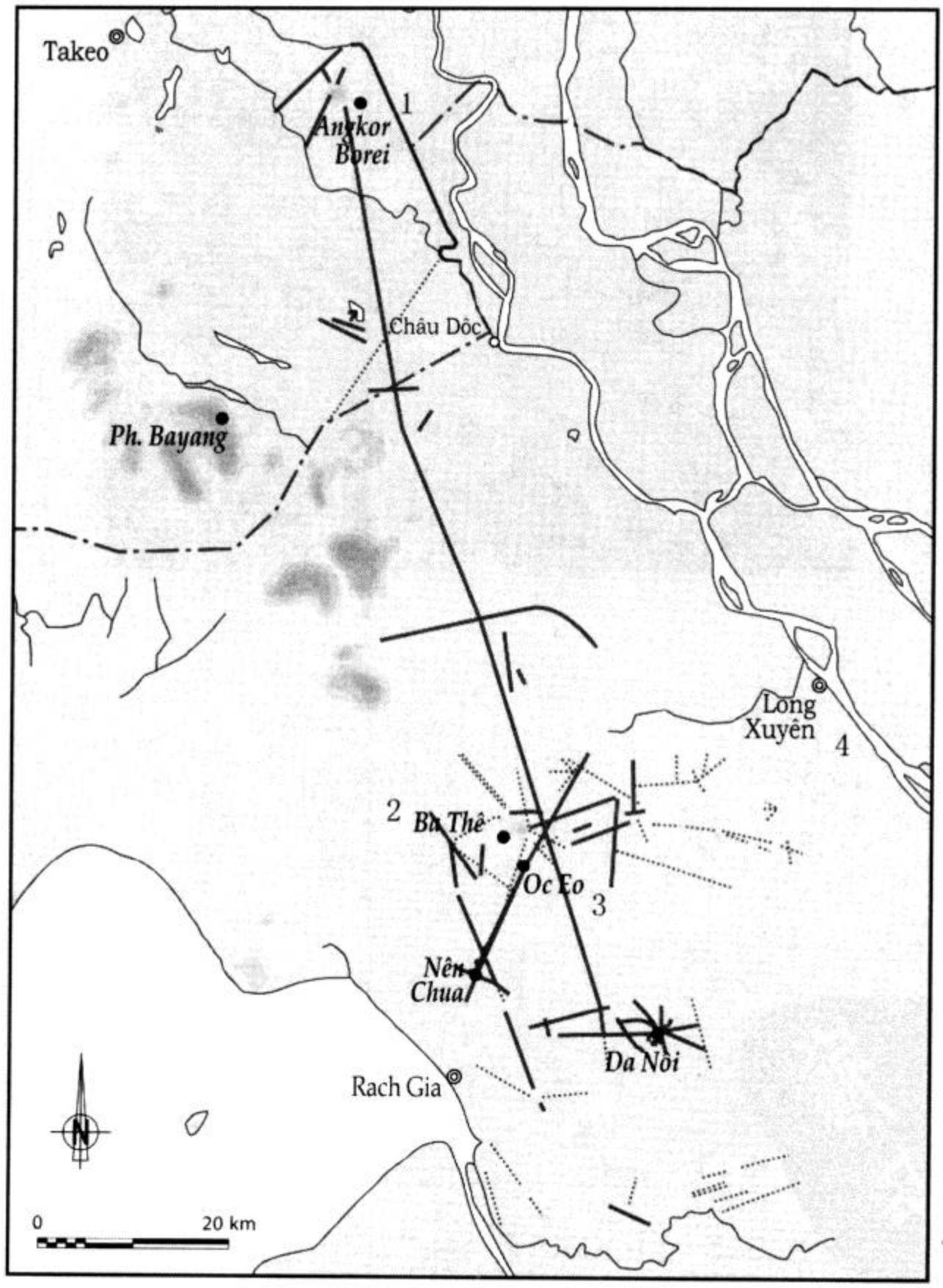


图6 古运河:连接吴哥博莱和沃澳(H. David 制图 - EFEO):1. 吴哥博莱;2. 巴泰;3. 沃澳;4. 龙川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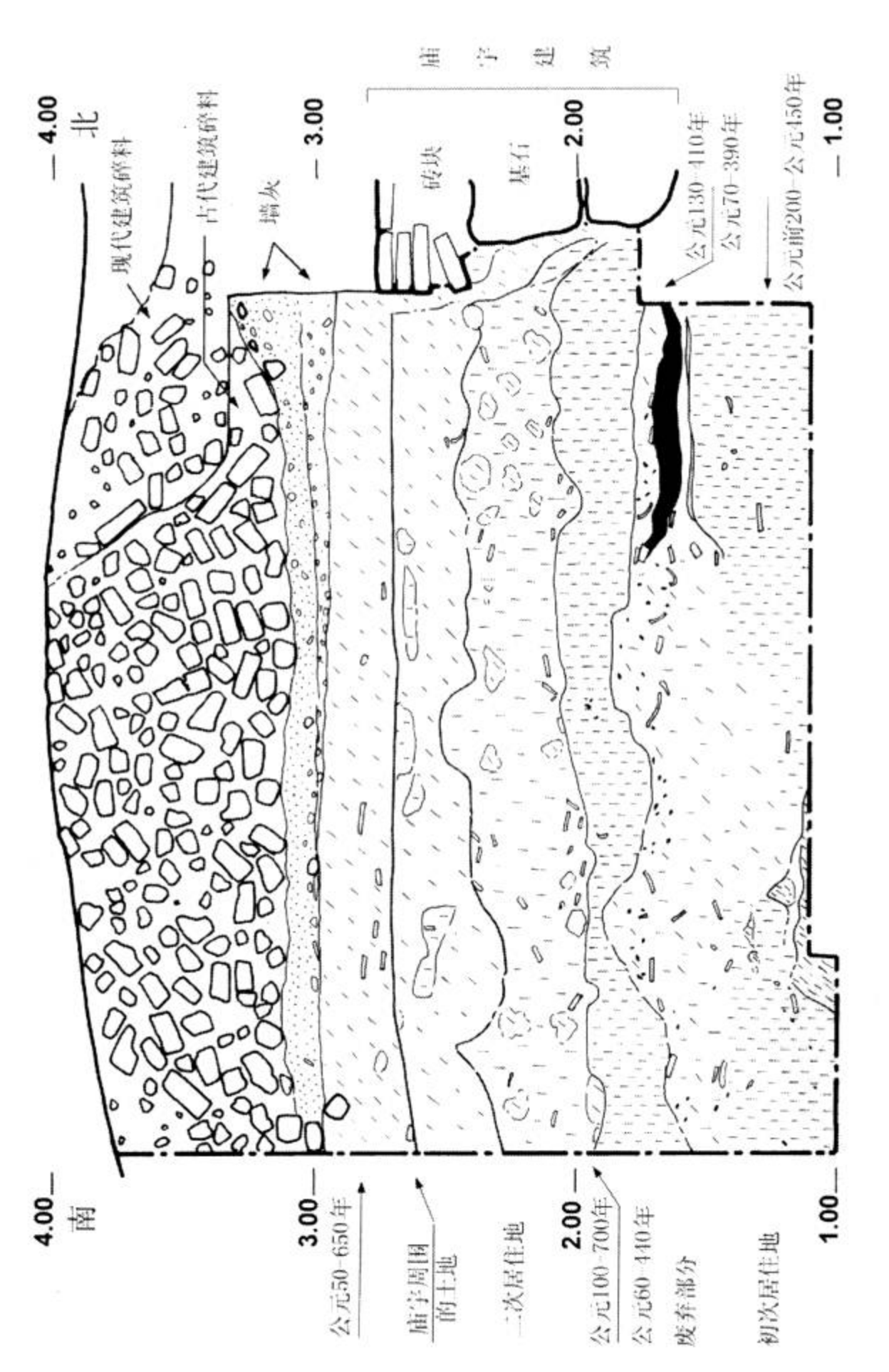


图7 地层学研究（沃澳，Go Cây Thi遗址，1999），从公元初有人居住到寺庙的修建和废弃（5—7世纪间）；V. Bernard绘制—EFEO

在此时这个地区的第一批大的国家开始形成，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发生了至今还未被很好认识的所谓“印度教化”的过程，最近也有人称之为“婆罗门教化”。

被发掘的遗址现在考古学上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在扶南国历史的第一个阶段（公元1世纪至3、4世纪），也是沃澳地区最初有人类居住。形成三角洲平原的地质运动已经基本完成，尽管在沃澳西南二十多公里处的海岸线位置还有待沉积学与动物分布学、植被学的进一步分析才可确定。我们看到人类最初的居住点分布在沃澳平原的小丘和巴泰山的低坡上，住宅是木结构的干栏建筑，底部架空，有一些建筑顶部覆盖有陶土烧制的平瓦，形制与在印度南部找到的瓦相似（发现于与此时代相近的阿瑞卡墨都[Arikamedu]遗址）（图8）。东南亚地区史前时代晚期及原史时期传统的用陶罐做棺具的二次葬，在这里仍然流行。与印度及东南亚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已是经常性的。在这一时代的晚期人们开始在城市的周围开挖护城河。同时开挖的还有水利系统，特别是一条很大的运河，它将城市一分为二，并使得城市与海洋、湄公河和吴哥博莱遗址相连。运河的开挖为的是解决平原地区的排水问题，使得人们可以在以护城河为界线的城市范围之内居住（图9）。然而并未发现大的宗教建筑和婆罗门教及佛教的雕塑，说明这一时期的扶南国尚未被“印度教化”。

在扶南国历史的第二阶段（公元5—7世纪），木结构吊脚的住宅从小丘移向可能被洪水淹没的平原上，移向巴泰山的低坡上（图10）。在沃澳平原的小丘和巴泰山的侧坡上，则修建起毗湿奴教和佛教的宗教建筑，其中的雕塑则证明了这个国家的印度化。水稻在这个地区也有种植，因为从陶器和砖瓦的制作中可以找到为了减少粘土粘性以防开裂，用炭化的稻子茎叶和稻壳作为羼和物的痕迹。这一时期不仅与印度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交流大大发展，而且也开始同中国进行交流。

从我们的发掘中看到的第三个阶段涉及“前吴哥时代”和“吴哥时代”（公元7—12世纪）（图11）。这个时期扶南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即将形成的强大的高棉国的政治制度的最初活动，这个国家在公元9世纪时将定都于著名的吴哥城。在这一时期，沃澳平原上的居住区及宗教建筑被废弃，水利系统也被淤塞填没。唯有在巴泰山坡上的宗教建筑的修建仍见证了这里与吴哥王朝的关系。然而三角洲已只是外围，地区的重心已经远离海岸，逐渐向远在内地的未来的吴哥城靠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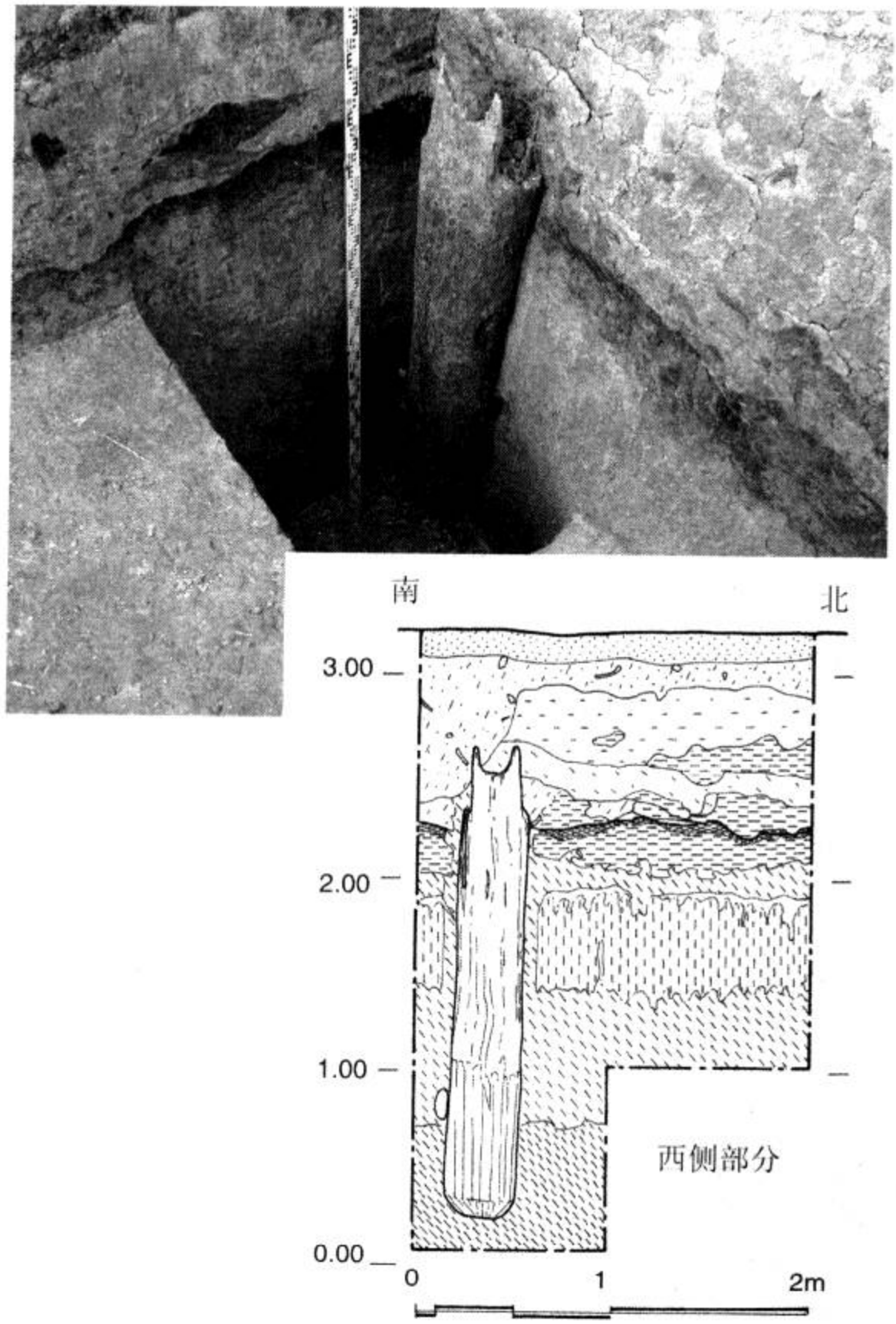


图8 有木桩的悬空式居所，约2—3世纪（Go Oc Eo 遗址，2001）；V. Bernard 绘制 - EFEO 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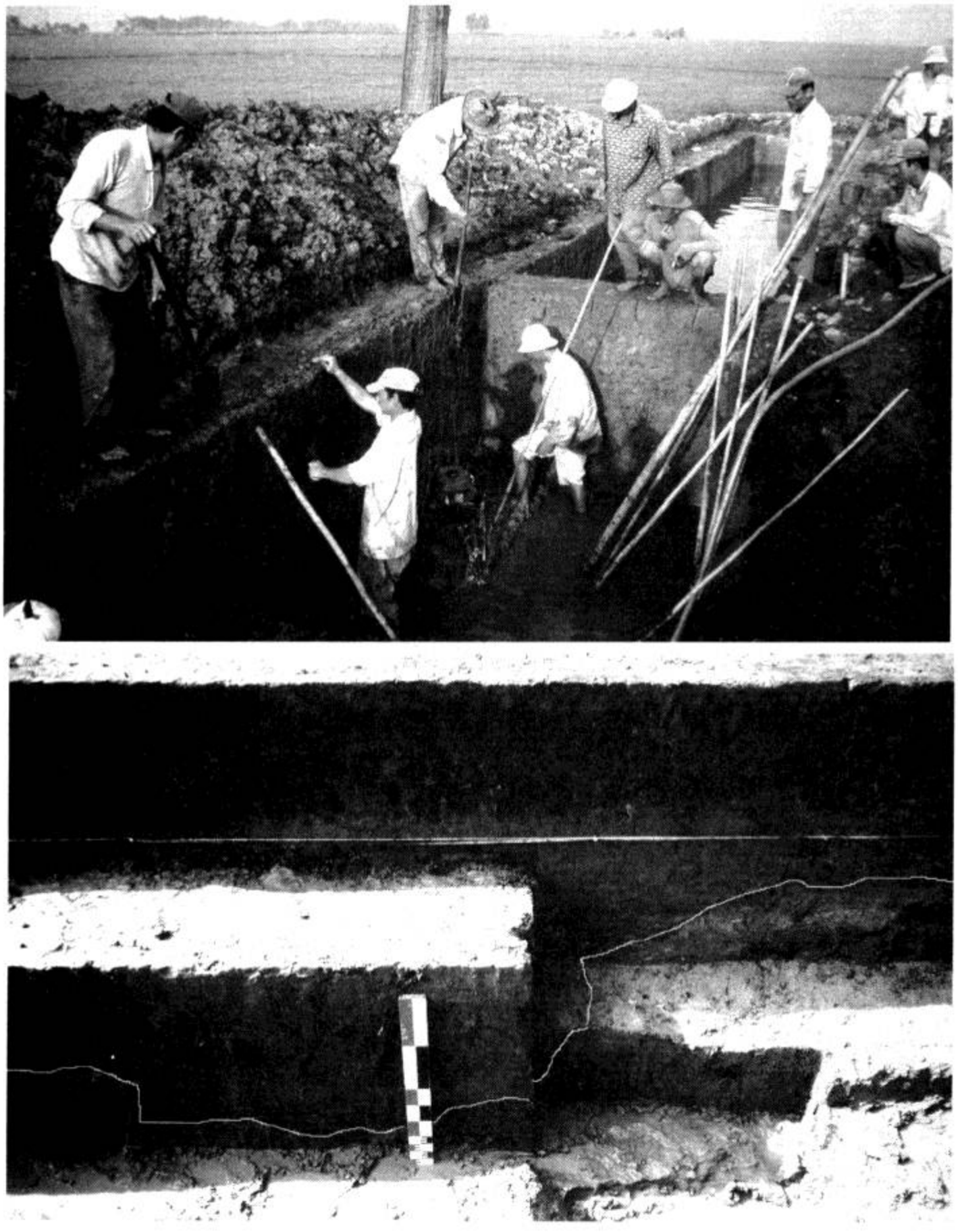


图 9　对沃澳城护城河的发掘(2002);EFEO 照片

图 10　对 Go Cây Thi 建筑的发掘(1999):5—7 世纪;EFEO 照片

另外,对于发掘出的两吨陶瓷制品我们正在进行仔细地研究。在对其中的一部分样品进行物理化学分析的结果出来之前,我们已经将前辈考古学家的对于这个遗址的类型学研究结果加以精炼,尤其是将之嵌入我们前文提到的年代表中。

目前研究的重点之一就是辨认为数不少的印度陶器,它们均出土于扶南国第一历史时期(公元 1—4 世纪),即"印度教化"时期之前的居住区中。这些都是普通的用于日常生活的陶器,数量较多,并不像人们以往认定的那样,仅仅是些值钱的物品。从这里可以看出远在扶南国第二历史时期(公元 5—7 世纪)之前,即这个国家被"印度教化",接受印度的宗教、艺术风格和政治文化等等之前,它与印度及斯里兰卡的商业交流就已很频繁。这也证实了这种印度教化的过程,并不像人们直到最近还确信的那样,突然发生在 4 世纪或 5 世纪,一种从印度来的"先进"文化从外部强加过来,而是一种数个世纪之久与印度经济交流的结果。在东南亚进行的其他考古研究今天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我们还应该看到,扶南国在形成的阶段未受中国文化的任何影响,这一点上与它北部的邻国林邑(Linyi)不同,在林邑的考古发掘出土了许多汉代的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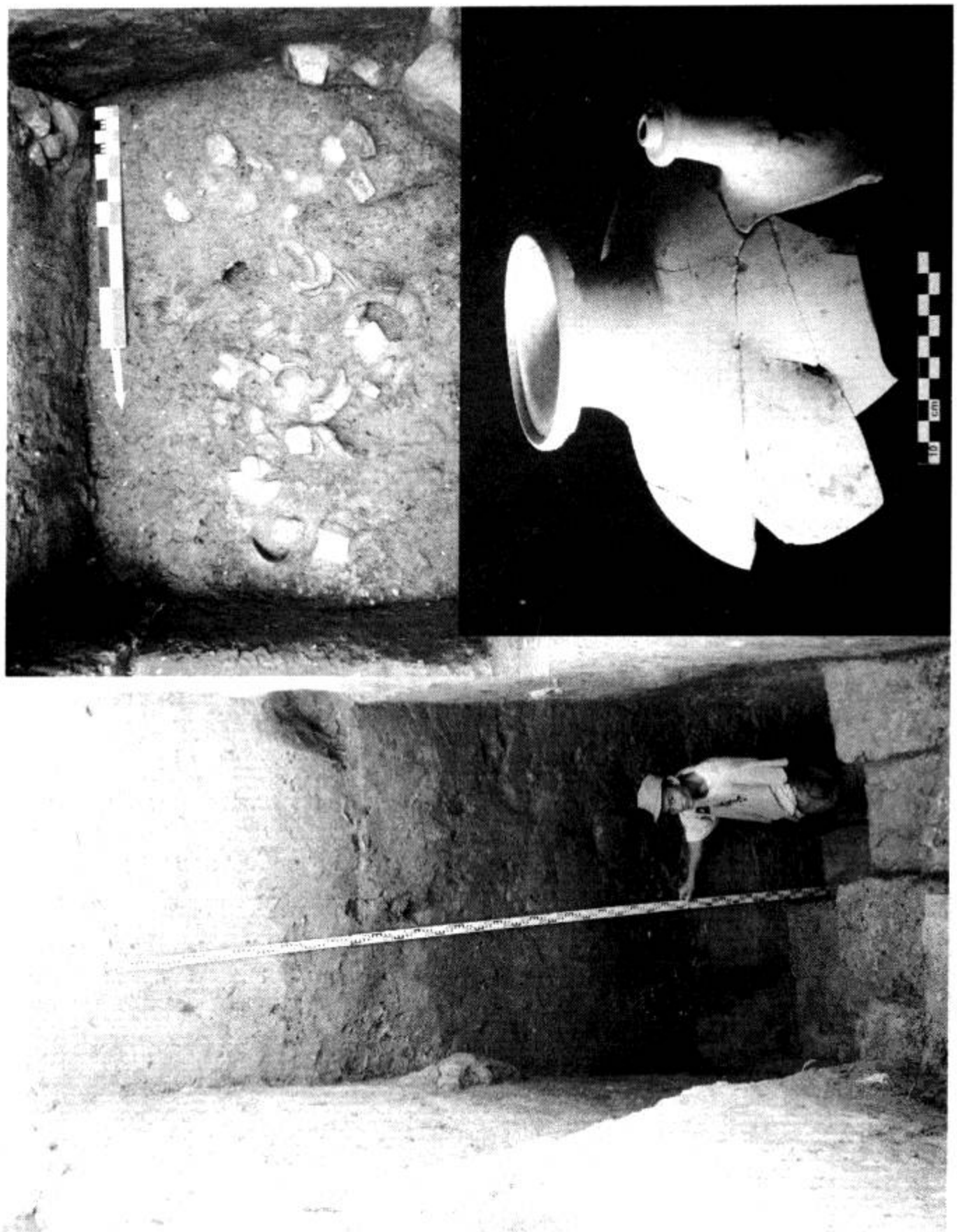


图11 对一座居所遗址的发掘（巴泰山，沃澳），1—9世纪；深度以及细陶罐（Kendi），前吴哥时代（EFEO照片）

其区域一直延伸到今天的越南中部的海岸。在扶南遗址中，已发现的4、5世纪之前的中国器物非常之少，而我们知道自4、5世纪开始中国经常去往它的港口。正如从中国文献本身中就可以推断出的那样，当时的扶南是来自印度洋的商人和产品的集散点，主要就是在扶南的港口之中，中国与这些商人及其贸易网络发生联系（图12）。

图12　中国铜制佛像，沃澳（5—6世纪）；中国铜镜，沃澳（汉代）；EFEO照片

最后，我们的工作证实公元4世纪或5世纪之后佛教和婆罗门教这两种宗教在扶南国同时并行。我们在湄公河三角洲的发掘清理出了一些这两种源于印度的宗教的庙宇和雕塑，越南考古学家在沃澳以外的其他遗址也同样有所发现。看起来在扶南与坐落在马来半岛及印尼群岛的其他的新的印度化国家一样，这是婆罗门信徒习惯采取的一种毗湿奴教崇拜的方式（奉爱 bhakti），而扶南国王本人即是毗湿奴教信徒。湿婆教主导该地区的信仰一直要等到公元7世纪扶南国衰落之后。

回顾公元后十个世纪的东南亚历史

在结束本次演讲之时，我们把视野扩大到整个东南亚，更确切地说是它的西部沿海。这个地区，位于贯穿亚洲的海道之上，在日益加强的国际交流推动之下，自公元1世纪起发展起一批港口城市国家。扶南国很可能就是数个这样的城市的联邦，如今我们只能从它留下的考古遗迹和一些晚期的碑文中认识它。我刚刚向你们介绍的沃澳遗址，得益于1944年以来不断进行的考古研究，算是如今人们所认识的最清楚的东南亚诸城之一。（彩图18）其他的遗址还有由美国和高棉专家共同研究的柬埔寨的吴哥博莱和越南考古学家研究的越南的塔穆（Thap Muoi）。

在印尼，从2002年开始，我们与当地考古学家合作，对一处与扶南国同时代的遗址进行了研究，它于公元1—9世纪间经历了与扶南国相当的发展过程（参见本期《法国汉学》同一作者所作另文介绍）。我们在印尼西爪哇省，位于首都加尔各答东部50多公里的巴图爪哇（Batujaya）和西布阿亚（Cibuaya）两个海滨遗址进行了考察，研究它们与一个古国塔如玛纳嘎拉（Tarumanagara）的关系，这个国名来自于一些公元5世纪的碑铭。与扶南一样，我们相继找到一些证据，看出它们在大约5世纪时本地文化被印度化之前，就与印度有着长期的经济交流，并有重要的社会发展。其他的一些印尼遗址，在苏门答腊岛的南部、巴厘岛的北部海滨，以及在婆罗洲（Borneo）的东部，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最近的考古发掘，都支持我们得出的结论，并完善我们在整体考古研究上逐步建立起来的新的年代表。

本文是“欧亚非考古与文明——历史、考古与社会”中法学术系列讲座第65讲的讲稿。

参 考 文 献

BOURDONNEAU, Eric, “The ancient canal system of the Mekong Delta. A Preliminary Report”（湄公河三角洲古运河系统：初步报告），in A. KARLSTROM &

A. KALLEN (ed.), *Fishbones and Glittering Emblems.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2002* (鱼骨与华丽的装饰:2002 年东南亚考古), Stockholm,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004, p. 257 – 270.

DALSHEIMER, Nadine & MANGUIN, Pierre-Yves, 《Visnu mitrés et réseaux marchands en Asie du Sud-Est: nouvelle données archéologiques sur le Ier millénaire apr. J. –C.》(戴冠的毗湿奴与东南亚的商道:公元 1—10 世纪的考古学新材料),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85, 1998, p. 87 – 123.

DAO Linh Côn, "The Oc Eo burial group recently excavated at Go Thap (Dong Thap Province, Viêt Nam)" (最近在 Go Thap 发掘的沃澳墓葬群), *in* P.-Y. MANGUIN (ed.),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1994: Proceedings of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ists, Paris, October 1994* (1994 年东南亚考古:第五届欧洲东南亚考古学家协会国际大会论文集), Hull, University of Hull, Centr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1, p. 111 – 117.

LE Xuan Diêm, DAO Linh Côn & VO Si Khai, *Van hoa Oc Eo: nhung kham pha moi* (沃澳文化:一些新发现 *La culture de Oc Eo : Quelques découvertes récentes*), Ha Nôi, Viên Khoa Hoc Xa Hoi tai Thanh Phô Hô Chi Minh, 1995.

MALLERET, Louis, *L'archéologie du Delta du Mékong* (湄公河三角洲考古学),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59 – 1963, 4 tomes en 7 vols.

MANGUIN, Pierre-Yves & VO Si Khai, "Excavations at the Ba Thê / Oc Eo complex (Viêt Nam):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1998 campaign" (Ba Thê / 沃澳区域考古发掘:1998 年初步报告), *in* W. LOBO (ed.),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1998* (1998 年东南亚考古), Hull/Berlin, University of Hull, Centr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Ethonologisches Museum, Staatlich Museen zu Berlin, 2000, p. 107 – 122.

MANGUIN, Pierre-Yves, 《Les cités-États de l'Asie du Sud-Est côtière: de l'ancienneté et de la permanence des formes urbaines》(东南亚沿海的城市国家:城市形式的古老与特性),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87, 2000, p. 153 – 185.

PELLIOT, Paul, 《Le Fou-nan》(扶南),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3, 1903, p. 248 - 303.

VO Si Khai, "Plans architecturaux des ancients monuments du Delta du Mékong du 1er au 10e siècles AD"（公元1—10世纪间能国哈三角洲古迹的建筑图）, *in* Pierre-Yves MANGUIN (ed.),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1994 : Proceedings of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ists, Paris, October 1994*（1994年东南亚考古:第五届欧洲东南亚考古学家协会国际大会论文集）, Hull, University of Hull, Centr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1, p. 207 - 214.

WHEATLEY, Paul, *Nagara and Commandery: Origin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Urban Traditions*（Nagara与其郡县:东南亚城市建筑传统的来源）,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1983.

城市与考古的整体观
——柬埔寨旧都吴哥城(10—16 世纪)

郭榭(Jacques GAUCHER) 著
邹欢 吴旻 译

本文介绍的是由我领导的法国远东学院在柬埔寨旧都吴哥城(Angkor Thom)所作考古研究的主要情况。

一方面,本文将介绍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项研究工作具有一些特殊性,本文亦将展示这些考古实践及在此之上所作的思考。首先就其范围来讲,此次考古是所谓的城市考古,即考古的对象是那些仍被居住着的或者是已经被废弃的古城。

具体到我们的考古对象——吴哥城,正是后一种情况,它是吴哥王朝时期的首都,16 世纪后被遗弃,城市遗址在 1860 年被法国博物学家亨利·穆奥(Henri Mouhot)发现。对这座城市的了解与法国远东学院密切相关。事实上,1900 年远东学院创立的时候也正是对吴哥城进行全面清理记录工作的开始;当时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对古代文物以及用梵文与高棉文撰写的碑文的研究。

吴哥遗址面积巨大,所谓的"考古公园"面积就有 400 平方公里(彩图 19)。1907 年,法国远东学院任命了吴哥城的第一任保护负责人。面对被热带植物淹没的石头建筑,当时的任务异常艰巨:清理大量历史建筑表面附着的植物,为妥善保护创造条件,同时允许参观者进入参观,为科学研究奠定基础。直到 1975 年,法国远东学院一直担负着这一工作。

吴 哥 遗 址

第一眼看去,吴哥遗址上布满了由砂岩、红土和砖建造的巨大庙宇(图 1)。根据它们与地面的相对位置,可将其分为几类:1. 在大地上平缓展开,成为"平

图1 吴哥,顶上有一座塔状殿堂的阶梯状庙宇,藏翅寺(Baksei Chamkrong,10世纪)

坦的庙宇";2.像金字塔一样逐级升高,成为"山形的庙宇"。在几个世纪内,高棉的国王和建筑师们将一种形体简单、规模相对较小的建筑类型转变为建筑群体,然后转变成为在空间和形式上都十分宏伟的构成,其中尤以11世纪中叶的吴哥窟为杰作。同一时期,高棉人筑造的蓄水设施可能比庙宇具有更重要的象征意义。最初只是一些小规模的工程建设:在地上挖水塘或是筑土堤储水。但是从公元9世纪开始,这些蓄水工程的建设规模也变得非常巨大。

庙宇和水系并非互不关联,而是相互结合在一起。通常,水系与庙宇相结合,在空间布局上形成宏伟的整体构成,这些构成可能是横向或纵向的轴状(彩图20),或是同心状,如护城河的情况即属于后者。这些建筑类型在建筑上和结构上经过了高棉王的变异,可以说是对印度传出的建筑形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高棉国引入的印度建筑形式的重新阐释;这一情形发生在公元初年开始的东南亚文明的印度化之中。同样,印度的神灵、文字、庙宇也被高棉人拿来重新运用;在此过程中,高棉人展示了在广阔地域上将地域空间和大尺度建筑布局紧密结合的高超技能。从这一点来看,公元9世纪到13世纪的高棉时期在很多方

面都堪称鼎盛时期:创造宏伟建筑、筑造水利工程以及国土面积不断扩张,公元12世纪末,高棉王国的疆域东起南中国海岸,西到印度洋安达曼海岸。

从考古的角度来讲,在大约70年的时间里,法国远东学院在吴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对这些奉献给神灵,反映高棉文明的建筑、文字、水利、肖像等创作的研究。在历代高棉王朝的编年史以及对重要的宏伟建筑的编年史研究中,碑铭学、艺术史和建筑史都成为古柬埔寨历史的主要内容。

吴 哥 城

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广义的文明转向具体的社会,就会意识到,这些由高棉国王们奉献给神灵的宏伟建设显然是历经几个世纪,由无数民众完成的;这需要有相对集中不同形式的组织方法,需要有大量的财富,需要有灵巧的施工设备。如此的宏伟不仅体现了对神灵的敬畏,也体现了针对民众的强权统治,不管是对国内的民众还是国外的民众。

五千年来,构成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基础要素之一,即是人们所称的城市现象。最伟大的文明通常都是由城市、都城和政治、文化、宗教中心生发开来的;从这一点来讲,如果说吴哥的庙宇是神灵世界宇宙观在人间的再现,那么城市又该如何呢?对于这个问题,从文献中找不到答案,碑文铭刻也帮不上忙,只有在一些游记中,比如13世纪末周达观陪同一位中国大使游览的记载中,对城市进行了具体的描述。

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对法国远东学院的研究人员来说,城市的问题成为关注的中心。然而该问题并未以城市本身的形式表现出来。历史上最古老的碑文记载了耶输跋摩之城(Yasodharapura)的存在,它是由耶输跋摩王(Yasovarman)在公元10世纪建立的;后来的碑文又记载了"Maha Nagara"城(玛哈那加拉),即高棉语中的吴哥城。从此,吴哥城(Angkor Thom)的名字被人们所熟悉,它的位置也得以确定,而耶输跋摩之城却不是这样。在20世纪,人们一直在研究耶输跋摩之城的位置问题,推测出两种并非相互排斥的空间布局,并且引出了两种研究观点。

第一种方法基于碑铭学的支持,设想该城基本上采用了象征性的方式,一种在印度社会常见的建筑布局模式,即:四方形,呈正南正北方向布局,中心围绕一个建筑物:庙宇,周围被围墙所包围。基于这个假设,可以得出两种不同的城市

布局形式:(1)城市呈正方形,每边长3公里,中心是巴戎寺(Bayon),四周有明显的城墙体系,即吴哥城。(2)城市以一座人工山丘为中心,山顶建有巴肯寺(Bakheng),考古发现,城市的部分地区被双层堤坝环绕,目前只留有一处遗迹,由此可以推测,该城建有边长为4公里的防御体系,这条双层堤坝即为其中的组成部分。第二种布局形式通常被认为是耶输跋摩之城的布局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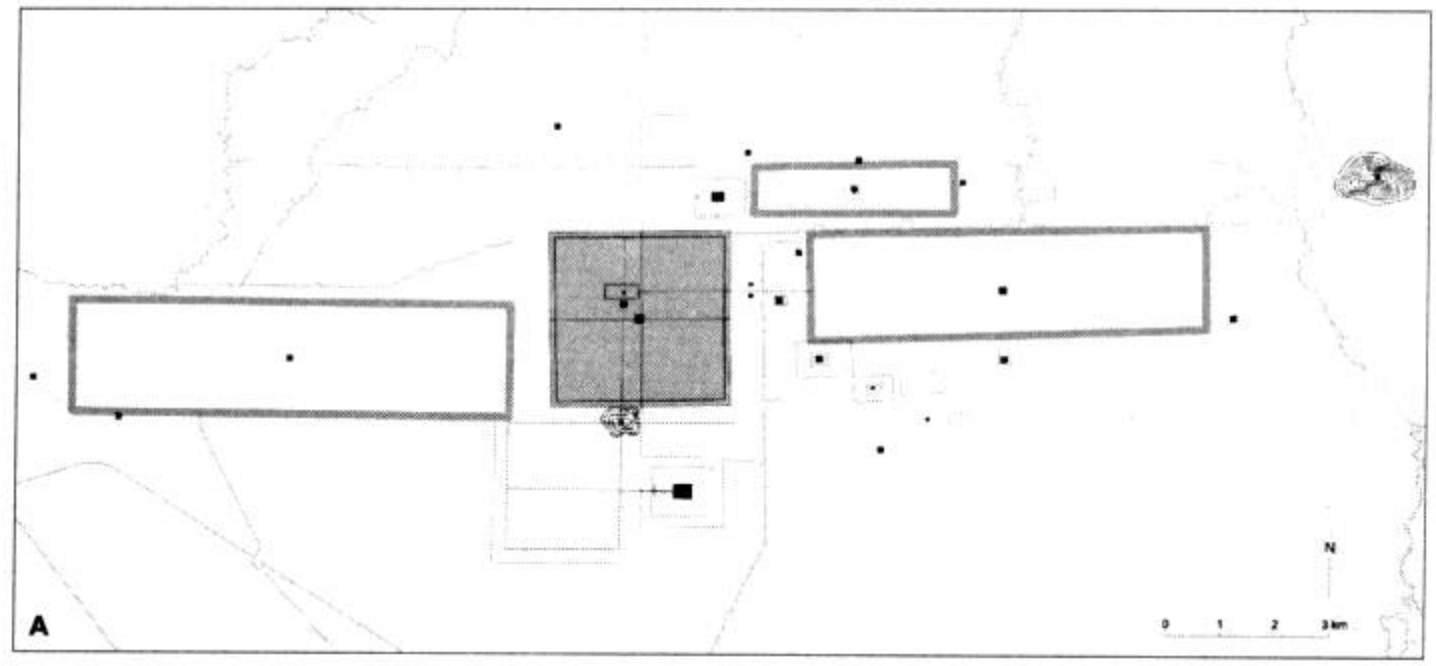
第二种方法与此不同,它认为城市的布局与功能和经济密切相关,目的在于土地开发;城市布局是对地形进行整体考虑的结果,护城河和水库不再只具有象征意义,而是成为水利灌溉系统的功能组成部分。1971年,格罗利耶(Bernard-Philippe Groslier)在论文中提出,水田、水库、山形庙宇都是这座"水利城市"的组成因素。他认为,耶输跋摩之城并非如上所述,是一座一成不变的方形大城市;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这座水利城市经历了四种形式的变化:I."巴肯城,10世纪"(Phnom Bakheng),II."巴芳,11世纪中叶"(Baphuon),III."吴哥窟,12世纪中叶"(Angkor Vat),IV."吴哥城,据格罗利耶推测为12世纪末"(Angkor Thom)。格罗利耶认为,耶输跋摩之城是由这些先后出现的不同中心所组成的,最终形成了被灌溉系统覆盖的吴哥城,他称其为"一座杰出的城市"(图2)。

城市考古计划

可以看出,这两种考古研究方法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认为城市是基于某个大型纪念建筑发展起来的,这一建筑,例如山形庙宇,构成了城市的中心。但是,该建筑实际上位于什么的中心?我们如何在其周围建立起和谐的空间形式以及基础设施和居住场所如何在其周围不断延伸?各种不同的城市现象是否从未在吴哥城出现过?

我们需要了解,一种田野考古是否以及如何能够为回答这些有关城市及其与其相关的社会、城市社会、城市历史问题提供一些依据;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将这些纪念建筑重新置于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之中,尤其是创造这些纪念建筑的人居结构和当时所处的物质环境?为了得到一些初步答案,我们在2000年制定了一项考古研究计划,其策略是:1.建立一个概念的框架;2.选择一个地段;3.制定一些具体的目标;4.确定研究方法。

1. 概念的框架是指城市考古,即我们尝试定义的"城市形态考古"(*archéologie des formes de l'urbain*)。我们希望了解,是否一种特定的形态能够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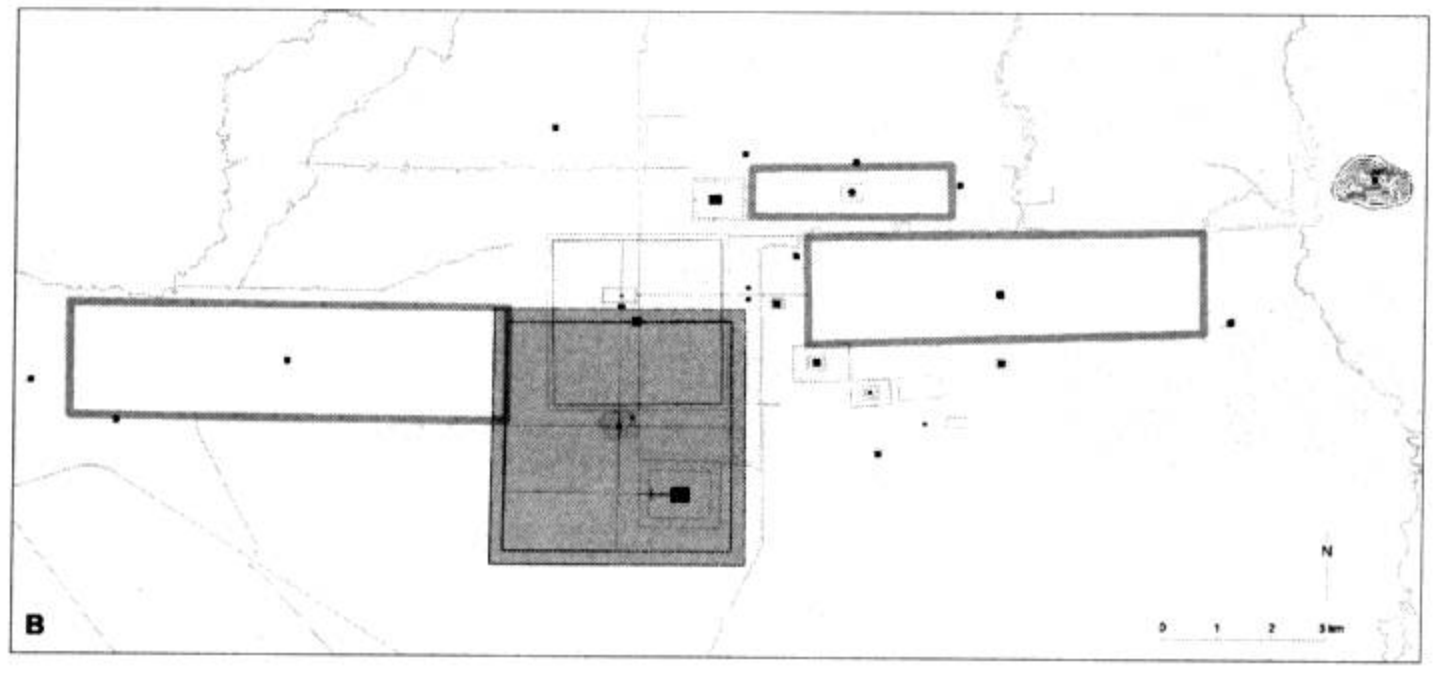


图 2 A. 吴哥遗址当中的吴哥城，B. 根据郭鲁柏（Victor Goloubew，1937）所认定的耶输跋摩之城（Yasodharapura）古城

多或少地与一个复杂的城市定义相符。

2. 地段选择理所当然是吴哥城，对此有四个理由：①吴哥这个名称在高棉文中即为“大城市”的意思；②吴哥城地域广阔，周围有城墙清楚界定，但人们却知之甚少；③吴哥城的一部分覆盖在最早的城市耶输跋摩之上（图 2）；④吴哥城内现在仍存有不同时期的建筑和不同城市构成形式（庙宇、宫殿、皇家广场）。

简而言之，吴哥城的场地形态具有如下特点：整座城市是一个边长 3 公里的

正方形，周围被宽110米的护城河环绕（图3、图4）；护城河以内是一道连续的防御性城墙，总长度超过12公里，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上开有五个一模一样的城

图3 吴哥城，从东南角航拍的遗址景观

门（其中东城墙上开有两个城门）；城墙有7米多高，内侧周围筑有土坝，高度与城墙大体相当，基座部分平均宽度约80米；五条大街由城门（图5）通向城市中心。在城市构成的布局上，其中心是各种城市要素聚集的场所，其中：

巴戎寺，即大乘教（Mahayana）寺庙构成了整座城市的地理中心和宗教中心，东南西北四条大街由此向外辐射，将城市分割成四个几乎相等的空间。

王宫构成城市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空间结构的特点不再是一个点，而是由王宫与王宫广场所组成的一条对称的轴线；通过这条轴线，始于王宫东门的门楼的第五条大街，通往向东3公里处，位于城墙以外的一个巨大水库西侧堤岸。

第三个城市中心是联系上述两个城市中心的巨大广场（图6），在这个800

图4 吴哥城,从西南角航拍的南护城河

图5 吴哥城,西城门

图6 吴哥城,中央广场,王家用地

米×175 米的广场周边，呈长方形环绕着一系列重要建筑，并且在空间上连接着上述两个大型建筑群。

最后，在城市的四角各有一座寺庙——豆蔻寺（即普拉萨特克拉温寺，Prasat Crung），位于巡查道，确定了东南、西南、东北、西北的四个斜向方位，也使得具有象征意义的对称结构更加完整。

3 接下来的问题是针对一个地段的考古，准确来讲是城市。如果说我们对城市的中心已经有所了解，那么与此相反的是，我们对四个街区的空间利用情况所知甚少。30 年代进行的遗址考古工作发现了某些遗迹，并且确定了某些遗迹的准确位置，但是很多结果并没有被详细记录。对于第一阶段的研究工作，我们确立了以下目标：首先恢复吴哥城的结构要素，然后根据结果，将之进行鉴定、归档，了解其功用，初步建立编年史。

4 当我们面对场地和时限等现实条件时，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几乎难以实现：①遗址面积达 900 公顷，即九百万平方米；②场地被茂密的热带植物覆盖；③大部分古老住宅是木结构的（图 7）；④第一阶段的研究时限为 4 年；⑤场地上布有地雷。

最终，我们制定了一项试验计划，涉及地形学、地质沉积学、形态学、地层学、建筑测绘、地图信息学等多个学科。这项以有限勘探发掘为重点的计划主要通过以下八个步骤得以实现：

1. 在森林里清除杂草灌木、进行地理定位，建立起由宽 4 米、长 1500 米的“森林通道”组成的正交网络（图 8）。这个正交网络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完善。为此，开始时首先在每个方形区域内修建间距 200 米的东西向和南北向通道，形成正交网格 A；一年后，在与原有的正交网格相距 100 米的位置上，以同样的方式修建正交网格 B，形成边长为 100 米的小方格。最终，所有通道的总长度达到 150 公里。

2. 沿所有的森林通道进行地形测绘，目的是：（1）绘制纵向剖面，显现地面的高低起伏和总体的地形特征；（2）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对通道进行定位。

3. 在每条通道上进行土样钻探，钻孔间距为 25 米，深度为 2—2.5 米。在一些重要地区，钻孔间距减小到 10 米、5 米甚至 2.5 米，钻探深度加大到 5 米。从这些土样钻探可以获得当地土壤及其变异的初步特征。

4. 针对每条通道中心线两侧各 50 米的森林地域，绘制详细的微观地形剖面图，同时开始以 1：2000 的比例绘制城市最终状态的地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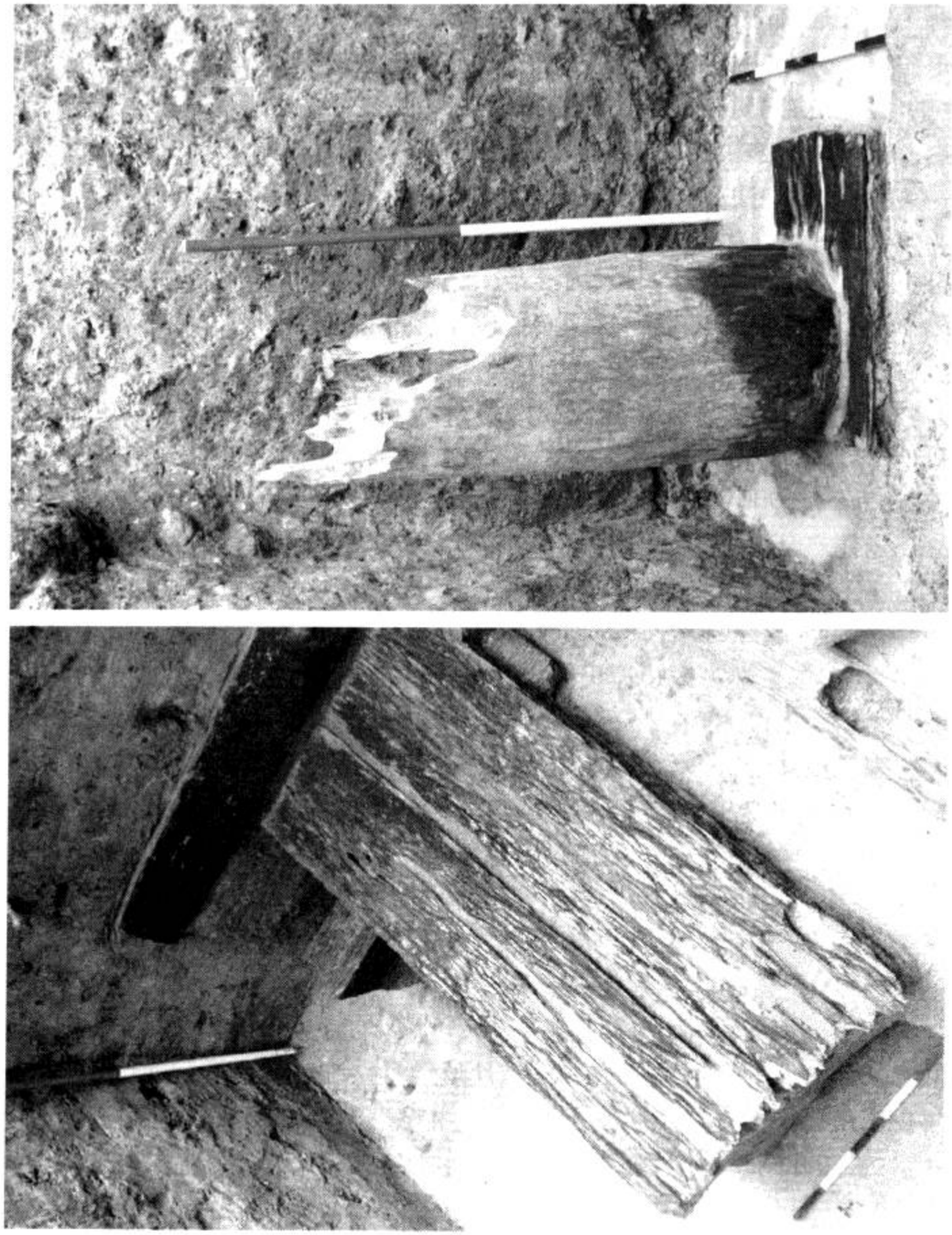


图7 吴哥城，王宫，木楼板和木柱（10—11世纪），吴哥城法国考古队发掘

图 8　吴哥城，在森林中清理出通道

5. 针对考古发现、由砂岩、砖、红土砌筑的建筑物遗迹，编造建筑和考古清册（图 9）。

6. 同时针对遗址中发现的地面物品（建筑片断、雕刻残片、陶器完整形状等）编造清册。

7. 选择某些地点进行地层钻探（图 10）。

8. 将所有有关形态和土壤的数据存入专为吴哥城制作的地图信息系统内。

结　　果

我们的工作结果如何呢？事实证明，在吴哥城进行的四年考古工作非常重要。勿庸置疑，今天，人们要了解吴哥城的真实面貌，不仅要了解位于中心的纪念建筑，还要了解被我们称为技术网络的水利工程和道路网络所规则构筑的巨大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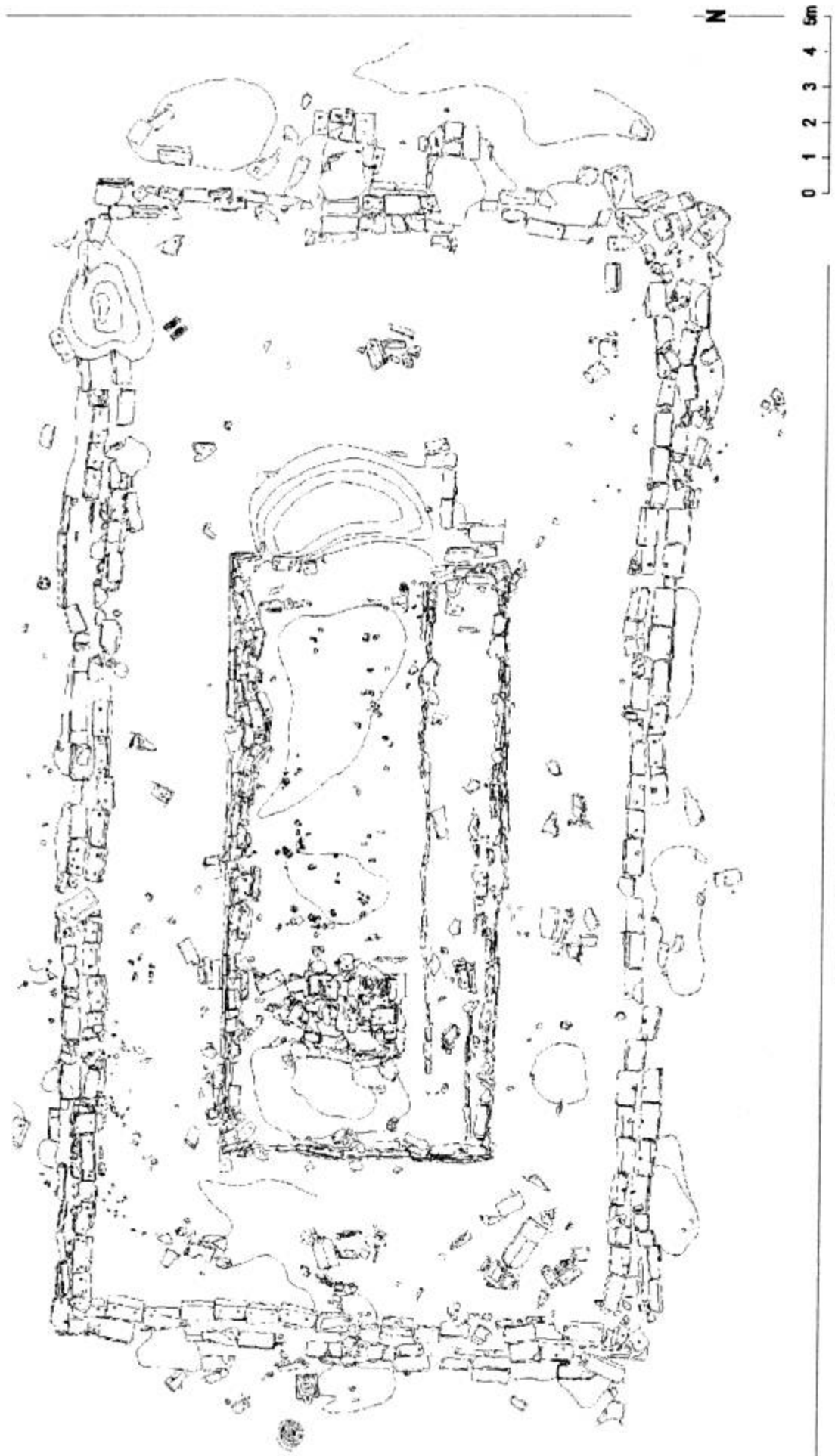


图9 吴哥城，街区内建筑清单，佛教用地 AT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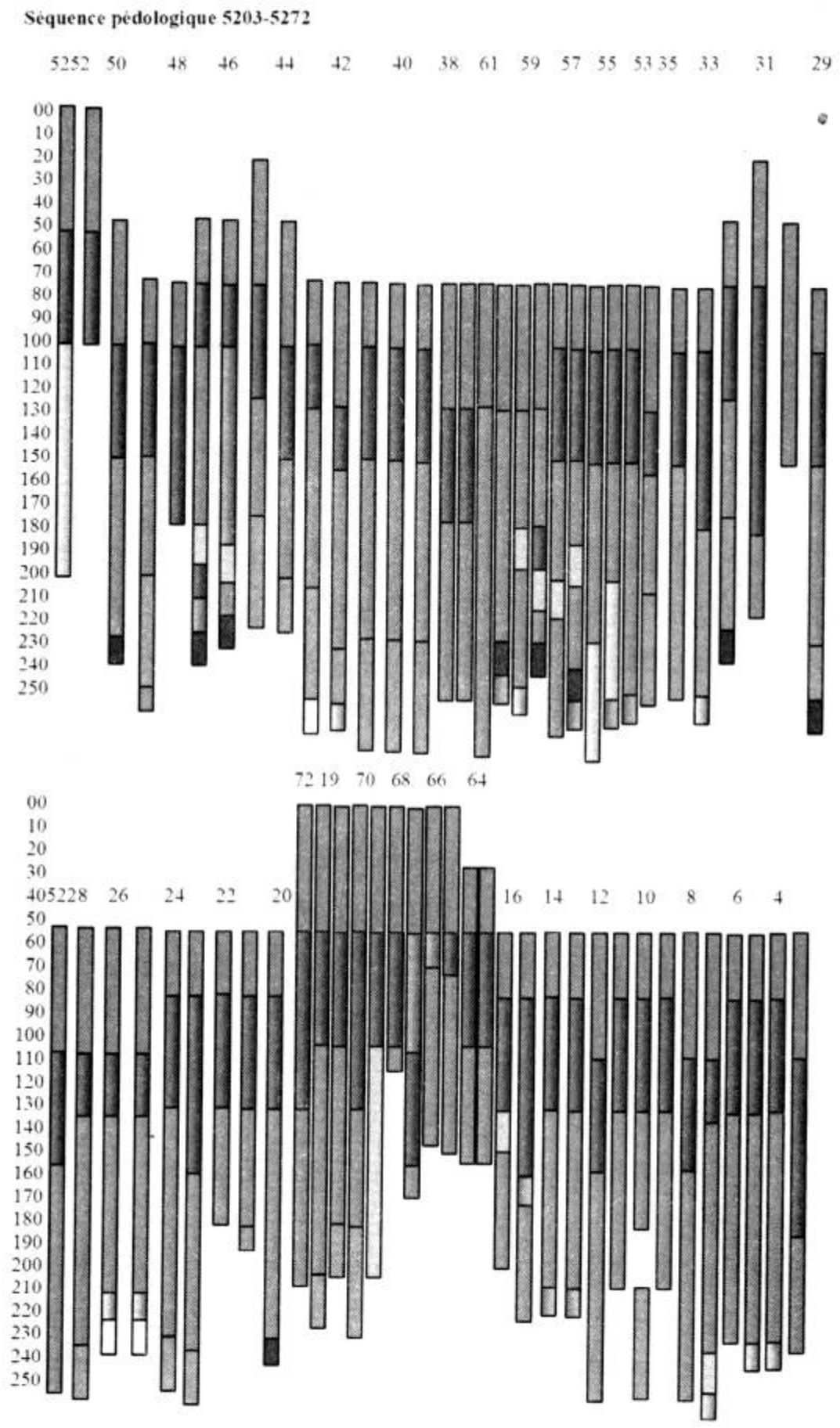


图 10 吴哥城，勘测，对内城河的地层钻探

一个决定性的形态因素:线性结构

这些技术网格是在土样钻探的基础上发现的,但同时更是基于我们对地表面轻微塌陷和高度变化现象的观察;在发现地面土层有轻微塌陷现象的时候,我们对它进行了标识,并将其命名为"线性结构"。根据在地图上的位置,可将其分为4类:1.边缘型;2.放射型;3.(城市街区)内向型;4.(皇宫)内部型。

这些线性结构与水利工程的类型相关

土壤钻探和考古发掘揭示了土层的表面现象与埋在地下的现象之间的相关性。这些线性结构是在某些构造被土壤掩埋的最后形式,但是,埋在地下的这些水利工程的类型并不一定和地面上可以看见的线性结构的形式相符。就其宽度而言(8米到18米),有时这些可见的线性结构只是整个构造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条水沟,旁边还有一条道路;就其长度而言,尽管今天在地面上只能看到部分片断,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地下水利工程通常穿越城市的四个分区。我们通过研究确定了若干类型的水利工程,并对其中的部分工程进行了定位,包括:①运河;②水道;③水沟;④砌筑的护城河;⑤砌筑的水沟-水池;⑥未砌筑的水沟—水池。其他一些非常特殊的水利工程,是大型纪念性构造的构成要素,相关研究至今仍无法对其做出阐释(图11、图12)。

这些水利工程类型具有重要的考古意义

对其中一个水利工程的分析表明,这些线路简洁的水利工程构成了非常复杂的考古单元:从形式角度看,它们的平面布局大都方正笔直,但剖面轮廓却多有变化;从时间角度看,这些水利工程因逐渐被掩埋而出现形式上的改变;从功能角度看,可以对沉积物进行对比分析,同时还存在一些因为相互依存而出现的不规则结构,如崩积层、纵向传送;从社会学角度看,存在着相邻的土地和空间的影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同样非常有意义。

但是从城市布局来看,这些水利工程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在那里构成了一个规则的空间结构。

这些道路和水利工程网络构成了吴哥城空间组织的"结构性"要素。通过布局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些要素都遵从按一定间距布局的原则,由此形成了至少两种规律性。总体上,城市呈几何对称布局,通过对场地条件进行计量分析,可以得出城市的基本结构模数大概是90米和360米。

另外,这些水利工程类型形成了连续性。

考古发掘还发现了水利工程功能单元之间的各种连接系统,包括:①护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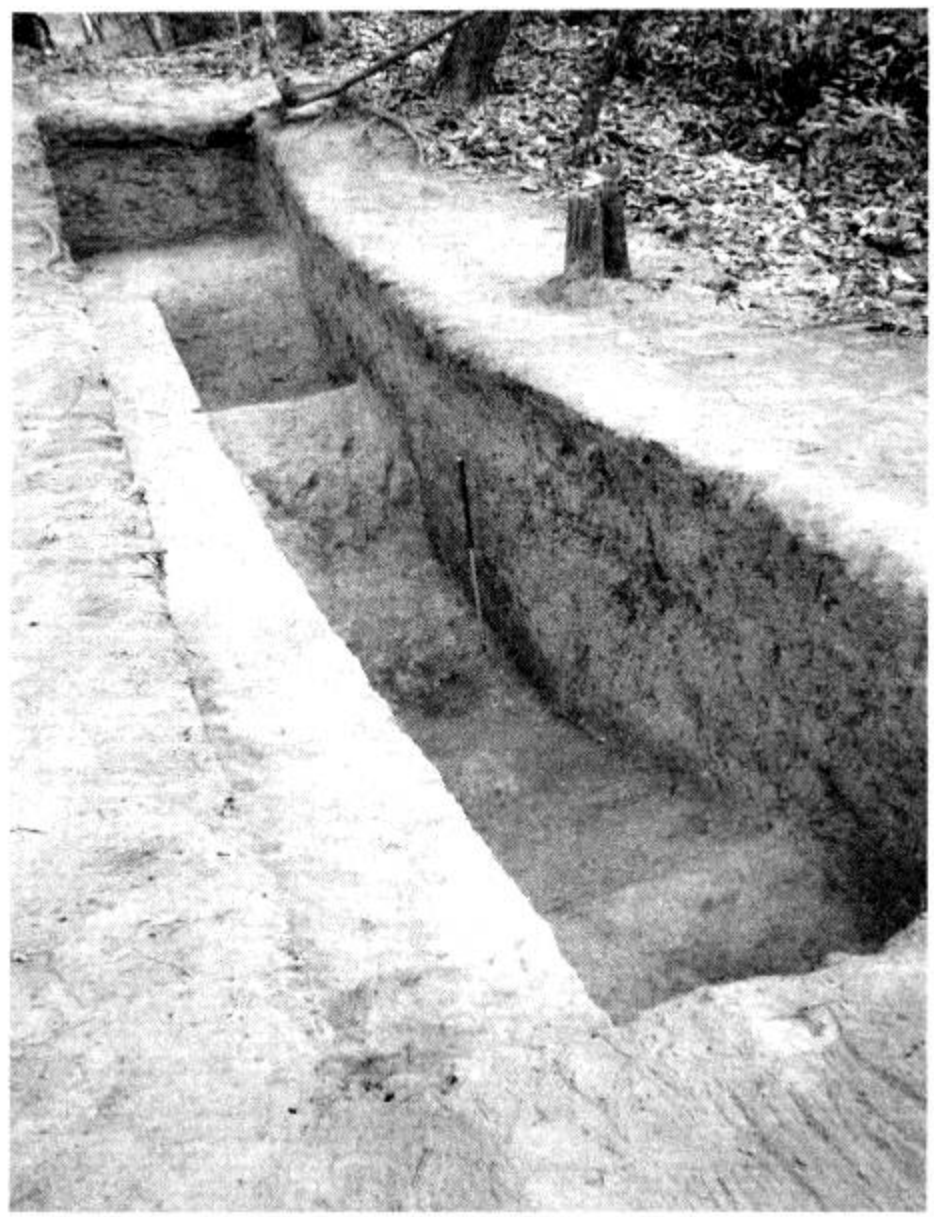


图 11　吴哥城，线形结构，东南街区中的东西向水道

河/线性结构；②线性结构/水池；③护城河/护城河；④水道/水道。在森林中还发现了许多单独的砌筑结构，或许也可看作历史上城市水利系统的组成部分。这些不同类型的水利工程及其连接要素构成完整的水力循环体系，为封闭的居住地域提供供水、分流、排水、排污等服务。这些认识推动了我们对吴哥时期一项城市水利工程建设原则的研究，并且有助于理解其在历史过程中的演变（图13、图14）。

在城市构成形态的历史中，如果技术有了进步，原则往往还在延续：技术网络和道路网络总体来讲是协调的。

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关于水利工程结构和道路网之间的历史及其演变过程。以这个观点来看，在有些情况下，道路和水沟可以是同时存在的，也可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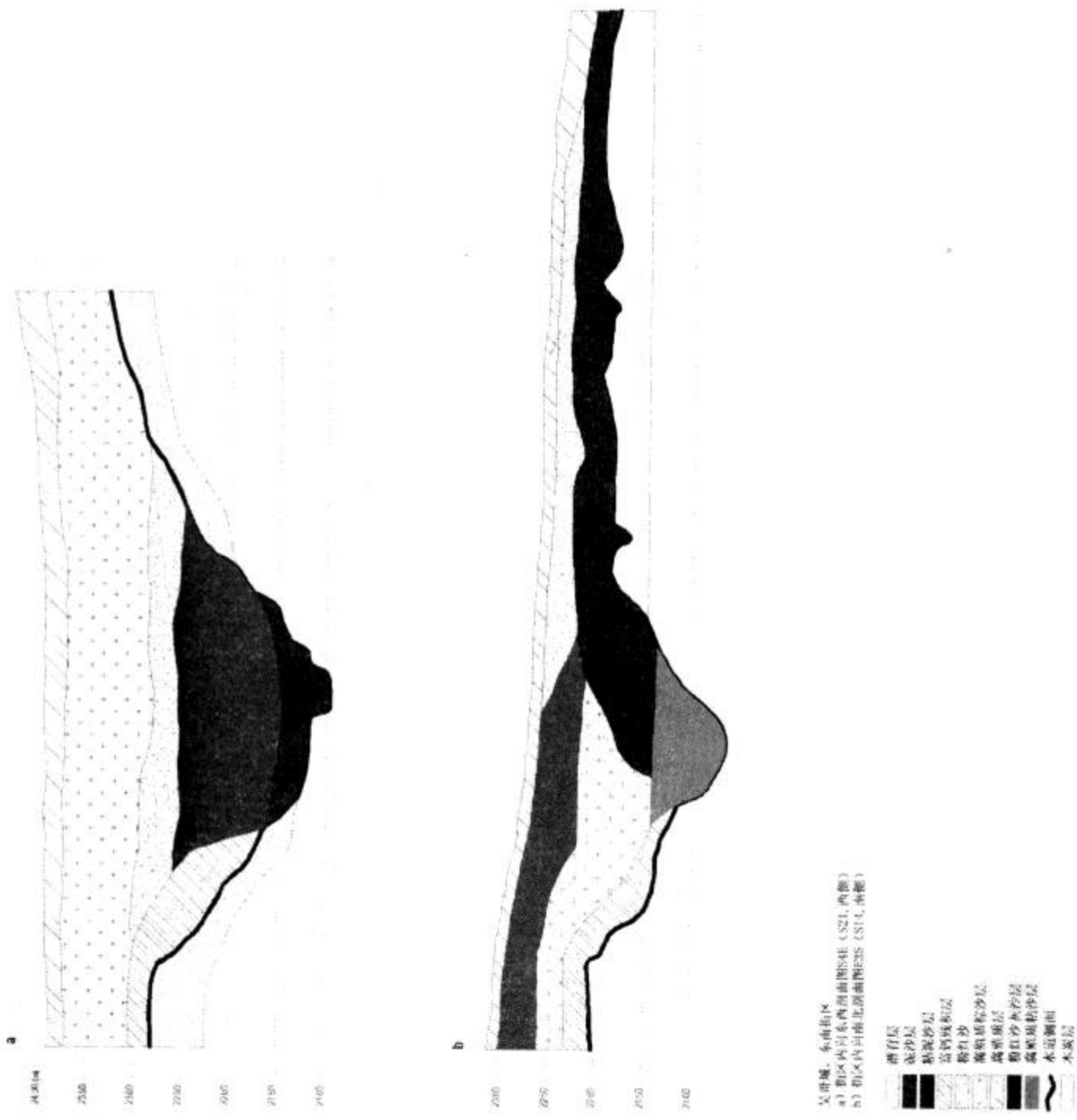


图12 吴哥城，A.水道； B.东南街区的街道及侧面的水沟

图 13　吴哥城，东大街的南水池沟的东端

图 14　吴哥城，内环城河，东大街的双水渠

前有后。我们调查研究的结果开始展现城中街区内的一些道路的痕迹，以及它们和构成城市的大街之间的联系方式（图 15、图 16）。

现在我们可以提出吴哥城城市经络分析的基础。

通过城市经络分析，可以得出吴哥城在其最后时期分为两个大的地区：第一种经络内部区别很大的，经络 A；另一种是重复的，经络 B。经络 A 代表一个独特的街坊。这个街坊的特别之处在于其规模，其水利设施的特征，其空间控制，其建造类型，其形式以及在一些地方其历史的积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王家用地，中间有许多建筑，其中包括当时的王宫。

城市，也是一个个的小块

这些同样的基本结构模数将土地分为小块，在空间形态上形成许多街坊（图 17）。发现的街坊超过 300 个。现在可以对这些街坊进行编年法之外的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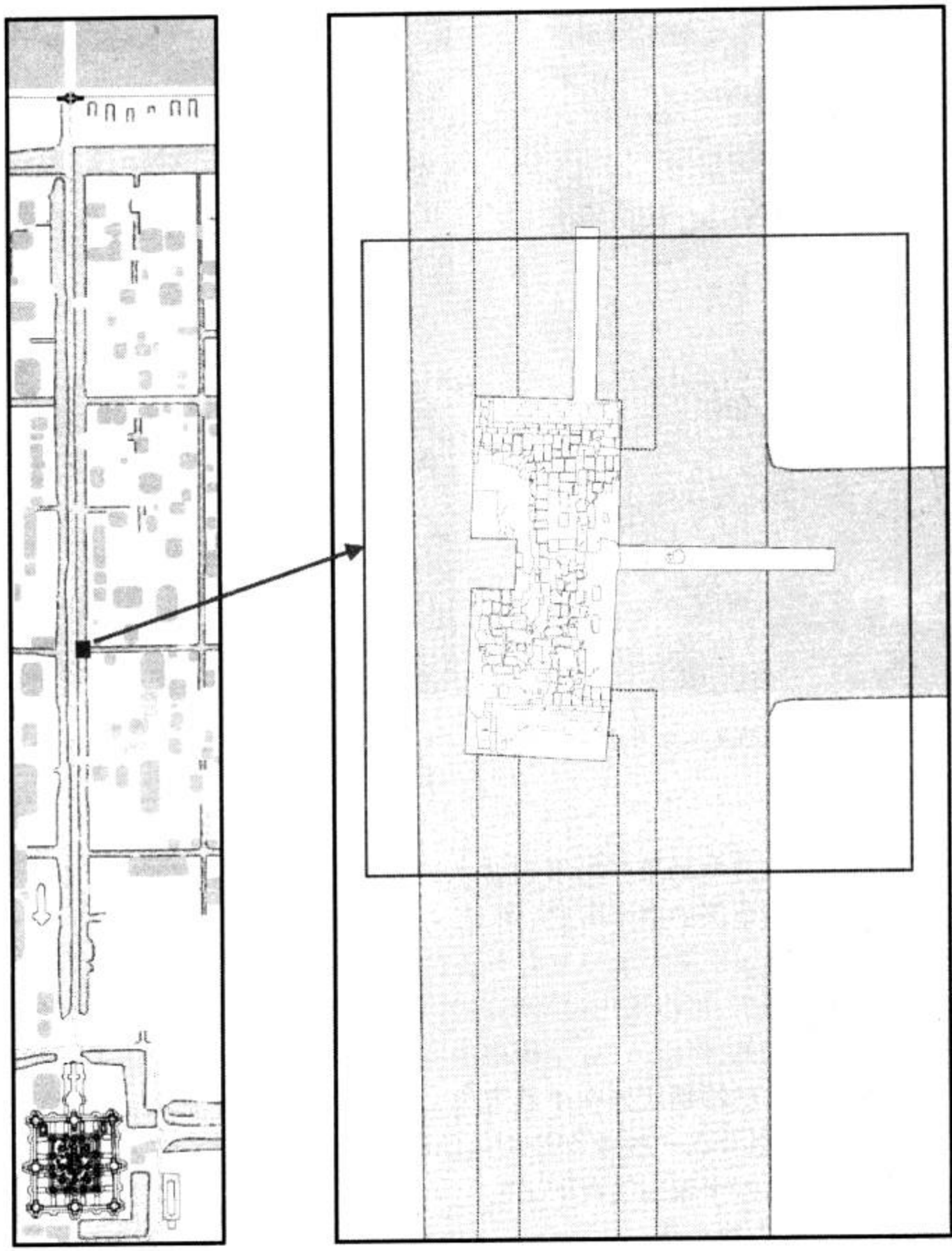


图15 吴哥城，东南街区的一条南北向街道与东大街的交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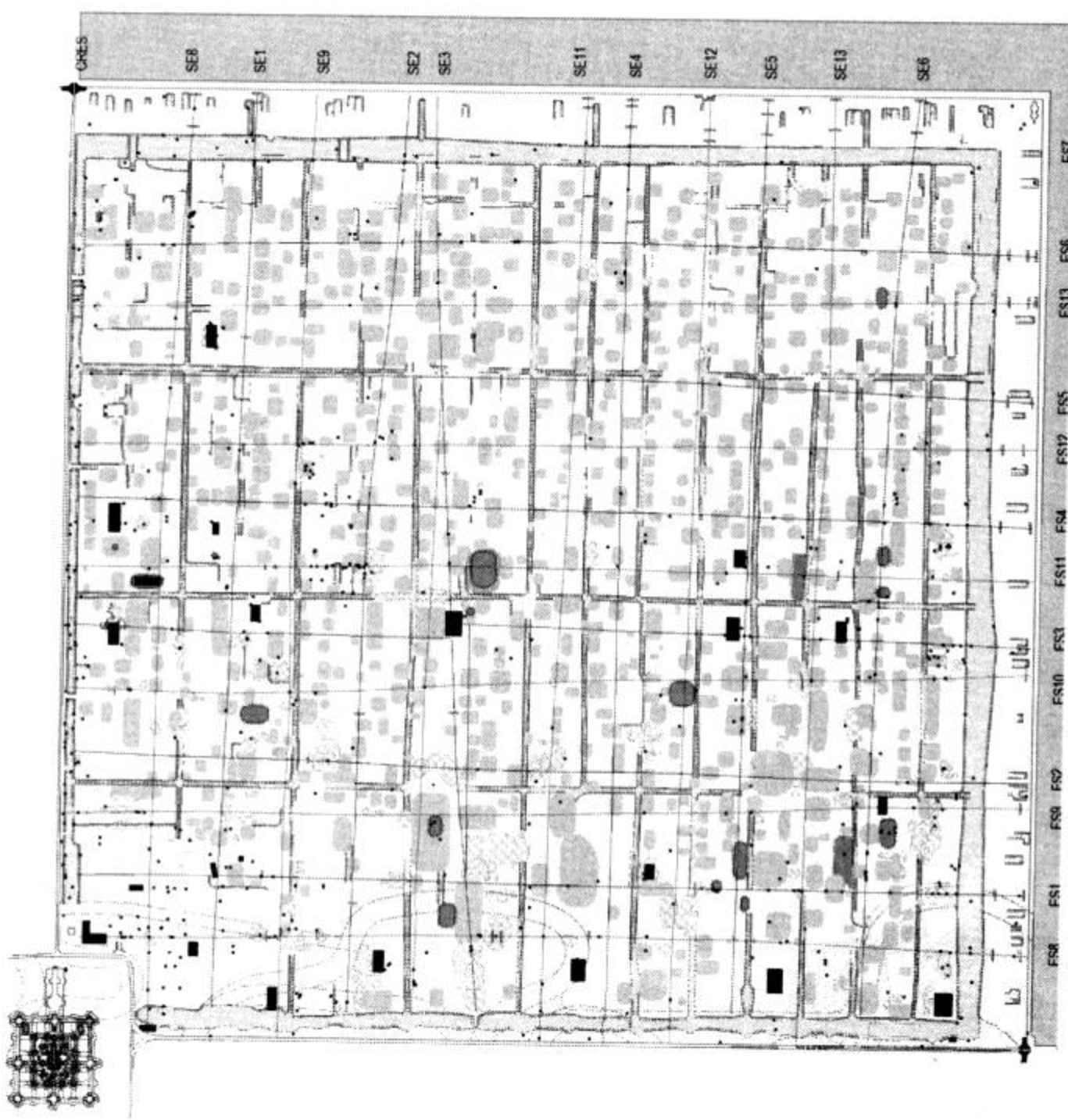


图16 吴哥城，勘测，对东南街区微观起伏的形态学测量，2004年12月

类:1. 以其形式一范围或大或小,但都是几何形状的;2. 在城市地图上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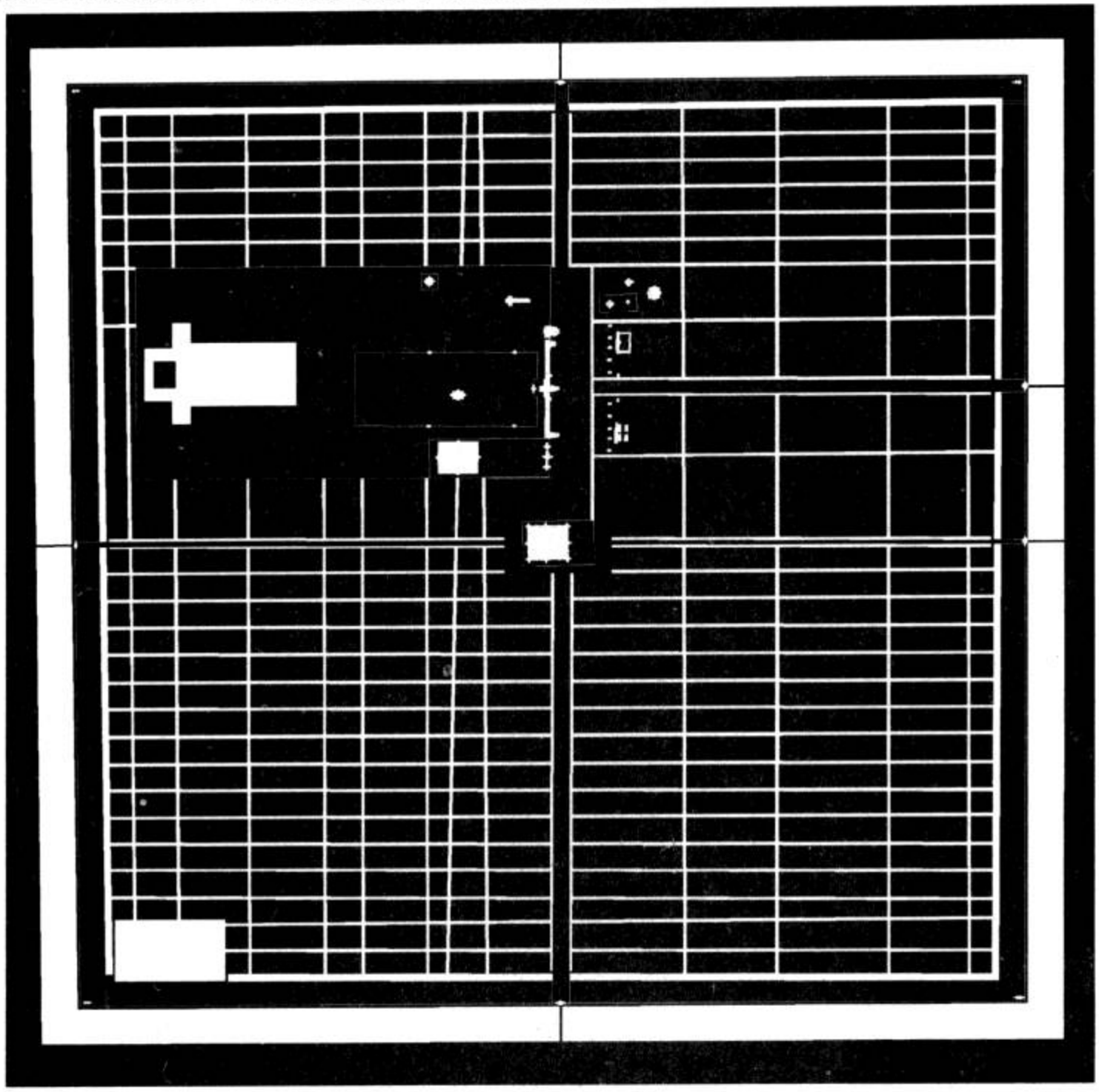


图 17 吴哥城,线形结构图,对于道路和水系网络的再现,2004 年 12 月

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大的内部构成

它们是:A. 两百多个砌筑物(建筑、堡垒、运河等等;图 18);B. 大约 3000 个水池;C. 二十多个夯土建筑;D. 单独的高差;E. 地下的自然状态;F. 考古挖掘层的厚度;G. 不同的物品类型。

此外,除了城市布局以外,对于城市形成之前的自然环境也开始被认知

图 18　吴哥城，Prasat（寺庙）AT87，吴哥城新的建筑统计清单

地质沉积学的研究发现了形成吴哥地区水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吴哥城建成之前有一条河流穿过整个地区。一项更加深入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思考这条河的动态变化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些新的考古资料证实了这个遗址的城市化特征。其中的一些已经可以深入研究。今天它们构成了吴哥城的总体布局，在此布局中各个实体不再孤立。

这个总体地图是一项结果，同时也是一个开始。作为结果，它首先通过吴哥城的广阔和连续，丰富了城市化的历史，亚洲城市化的历史，更进一步说，是一个城市形态规则显现的历史。人类一直在进行着理想城市的规划，但是很少能得以实现。吴哥城作为一个巨大城市的证明（比同时代的巴黎大，但是比当时的长安城要小），象征性强烈，技术独特，我们初步分析认为，高棉的天才们用印度的理论城市模式，在吴哥实现了一个乌托邦。而这种理论城市模式在印度从未被实现过。

但是这一城市布局同时也是一个开始，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从操作的角度来说，在一个旅游压力非常大的地区，建立了一个古都的考古总体规划。通过执行这个规划所确定的考古基本方针，通过在科学的基

础上确定其保护的条件，这个文件为当地的决策部门提供了一个基本工具，用以认识、保护和利用遗址。应高棉政府的要求，这个文件综合了遗址的考古因素、其所面临的威胁、产生这些威胁的原因和如何解决等各方面的内容。

其次，从研究的角度是一个新的出发点：从资料信息的角度，它为以后建立了最为重要的考古资料，因为如果要描述城市的最后状态，这一布局可以表达其历史的大部分，就像我们开始在表面结构与埋在地底的古迹之间所寻找的相符关系所证实的那样。

这个新的潜力渴望得到更多的探索数据资料。其内容包含新的研究课题：吴哥城的城市社会状况，城市水利工程，日常生活状况，城市形态发展变化的历史。由于不存在孤立的建筑实体，因而也不存在孤立的功用，只有在同一块土地上，同一种文明的内部，不同社会在不同的时间不断发展不同的空间组织。

在第一阶段的计划中，如果我们称其为地段考古的话，在形式和地点的发现和记录工作中，在土地特征归类工作中和在根据沉积物确定地段的编年史工作中，对城市研究的动态性的考虑是从整体到局部。在第二阶段的计划中，这种思考正好反过来，从局部到整体，以期能够从形式和地点的定位转向功能性和时间性的特征定位。

总　结

目前，这项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第一阶段的成果，我认为有必要讲几点思考，这些思考有助于更好地指引这项研究的方法，我们觉得也许对其他相似的亚洲地段有用。简单来说，这些思考是从考古的眼光出发，针对考古对象，研究范围和方法。

1. 从对象的角度，是对城市的认识，对于我们所提及的吴哥城，要进行的是城市考古而不是在城市中考古。这个表述有助于我们理解是城市本身作为考古的对象。

这个对象是考古的客体，因为它也是社会物质文化和文明的产物。但是这一产物，它和其他的物质文化产物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但是它也非常特别而且研究起来尤其复杂。它是多种现象相互关联的特殊交织，这些现象可以来自于平常生活，也可以来自于特殊事件；可以是一个地点，也可以是广阔的区域；可以是有意的，也可以是无意的；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表现性的；可以是结构性的，

也可以是历史性的。作为城市，它有四个基本构成：它是物质形式的空间产物，是社会的产物，是在历史中的社会产物，亦是历史的产物。

城市作为物质的产物，它具有一种形态，也就是说通过一系列的城市构造形式来满足其功能，所以应该从形态分析归类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在它的范围之内，反映的是人居建筑和人的居住。在法国，我们说“进城”，也说“进入一个地区”，“进入战争”或是“前往旅行”。由此可见，人们将自己置于“内部”；城市，与其城墙有着历史性的关联，具有一个“主体”，正如在城市之中有一个存在的主体。这一整体的建筑及城市化的范围，从表现性和管控的角度，给与城市其决定性的结构价值。

这个形式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活动客观化的表现，而社会活动也是一种类型范畴，社会，即建立在差别，主导和风俗系统之上，与工作的分别有关，但同时也与社会整体联系规则有关。面对如此之多的特征，空间亦需要在不同层面与之相配合。在城市中，这个社会活动通过各种不同的城市形式体现，作用于不同的功能，实现多种多样的象征表现系统，涵盖不同的范围。

作为时间的产物，城市是形式组成和消解的历史过程。它作为社会的个体和群体相继占有的成果，从旧的模式中不断地创新。如果设想始终具有意向性，城市的形式和功能就没有终结。在历史上，城市有时会非常不同，它会结合多种多样最新的象征性和功能性形式，总是在变化，它服从于表现，服从于一种更深层的结构，集体的和普遍的完美，创新永远与其相伴。

2. 从研究范围的角度，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更增加其范围的复杂性。作为一个考古学家，如果他对一个外在的形成和层次感兴趣的话，也必须对其独有的运作和表现形式本身感兴趣，而这些表现形式作为文化的对象，也同样反映出层次的问题。我们不仅要从在城市之中的考古实践中汲取经验，也要从城市的史学传统和历史中汲取经验。对于考古学来说，城市曾是大型发掘清理的对象，其目的都是将之为博物馆学所用：收集尽可能多的物品提供给博物馆。他们清理出整个城市，却忽略了其本身历史。另一个方面，之后进行的地层学研究，主要从编年的角度来研究，但却是一个点状的编年，没有从整个空间的角度来理解。

在城市历史这门学科中，有两种研究传统并存，一种是城市化史，另一种是历史地形学，前者对大的世界城市形态感兴趣，一直依赖于总体概论；而后者则正好相反，经常通过对孤立事件的研究获得零散的认识。

在吴哥城的实践与思考，汲取了我们在欧洲和印度南部所做的城市形态研究工作的经验，激励我们进一步，将景观考古和城市考古、城市形态、城市历史和空间人类学融合在一起，形成我所称的“城市形态考古学”。它针对的是如何理解历史上的和今天的城市空间，以及通过社会—空间变化建立起这一空间的城市构成形式。

3. 从研究方法看，其角度是整体的，包括：

（1） 将城市视为其本身，意即城市考古学不应该依赖于某些学科，每一种文献资料都应视为是同等的，有局限性的。

（2） 首先将城市置于参考系中，a. 空间上的；b. 时间上的，最重要的是将整个遗址的整体性作为研究领域。

（3） 根据实地情况，调动各种技术手段，建立起一个实验机制。

（4） 区分工作的不同尺度，并且探索各个尺度之间的关系。

（5） 重新思索发掘和勘探之间的关系。

我们看到，吴哥窟的研究取向对于我们来说并不仅仅是古城的发现。凭借在印度的工作经验，我们知道多年来一些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一直在呼吁，希望加深对他们的古城的城市方面的了解，但是其中的大部分地图，其中有成熟的例子，很遗憾的是它们是极个别的，一直不为人所知。另外，即使在今天，城市的历史还主要停留在以欧美为中心，这是因为现有的大量研究都是针对西方城市（巴黎集中的考古和历史的研究数目简直难以置信，可能是针对一个城市的研究最多的）。我强烈地希望，对亚洲城市遗产，对于远东城市的考古计划能够不断增多，它们将以其特殊性和原发性，大大地丰富城市考古的内涵。

本文是“欧亚非考古与文明——历史、考古与社会”中法学术系列讲座第66讲的讲稿。

参 考 文 献

ACHARYA, Prasanna Kumar (trad.), *Architecture of Manasara*（玛纳萨拉建筑）, vol. IV,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 1994.

ACHARYA, Prasanna Kumar, *Architecture of Manasara*, *Illustrations of Architectural*

and Sculptural Objects(玛纳萨拉建筑:建筑及雕塑图), vol. V,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 1980.

Arthasastra(政事论), voir R. P. Kangle, 2000.

BOISSELIER, Jean,《La signification d'Angkor Thom》(吴哥城的含义), in *Angkor et dix siècles d'art khmer*(吴哥与 1000 年的高棉艺术), catalogue sous la direction de H. I. Jessup et de T. Zéphyr, Paris,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conférence donnée à la Siam Society, Bangkok, 1987], 1997.

CHAKRABARTI, Dilip K.,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Indian Cities*(古代印度城市建筑),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CŒDÈS, George,《Une nouvelle inscription du Phnom Bakhen》(巴肯山新铭文), *BEFEO*, vol. 11, 1911, p. 396 - 398.

CŒDÈS, George,《La date du Bâyon》(巴戎寺年代), *BEFEO*, vol. 28, 1928, p. 82 - 103.

CŒDÈS, George,《Stèles des Pràsàt Crun d'Angkor Thom (K. 287, 288, 547, 597)》(吴哥城克戎寺的石碑[编号为 K. 287, 288, 547, 597]), in G. Cœdès (éd.), *Inscriptions du Cambodge*, vol. IV, Paris, EFEO, 1952, p. 207 - 253.

CŒDÈS, George, *Les Etats hindouisés d'Indochine et d'Indonésie*(印度支那与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化国家), Paris, De Boccard, 1989.

DUMARÇAY, Jacques, *Le Bayon. Histoire architecturale du temple, Atlas et notice des planches*(巴戎寺:寺庙建筑史、地图及图释), Paris, EFEO, (Mémoires archéologiques, 3), 1967.

DUMARÇAY, Jacques, GROSLIER, Bernard-Philippe, *Le Bayon : Histoire architecturale du temple*(巴戎寺:寺庙建筑史) [J. Dumarçay] - *Inscriptions du Bayon*(巴戎寺铭文) [B. Ph. Groslier], Paris, EFEO (Mémoires archéologiques, 3 - 2), 1973.

DUPOIZAT, Marie-France,《La céramique importée à Angkor : étude préliminaire》(吴哥进口陶瓷之初步研究), *Arts Asiatiques*, 54, 1999, p. 103 - 116.

DUTT, Benode Behari, *Town Planning in Ancient India*(古代印度城市规划), Calcutta & Simla, Thacker, Spink & Co, 1925.

FILLIOZAT, Jean,《Le symbolisme du *Phnom* Bàkhèn》(巴肯山的象征意义), *BEFEO*, *vol.* 44, 1954, p. 527 -554.

FINOT, Louis,《Notes d'épigraphie, 16, L'inscription de Sdok Kak Thom》(铭文研究16:所多卡城铭文), *BEFEO*, vol. 15 (2), 1915, p. 53 -106.

FINOT, Louis,《Le Yasodharagiri et le Phimeanakas》(东城与吴哥古皇宫), *Journal Asiatique*, 1932, janv/mars, p. 47 -59.

GAUCHER, Jacques,《Premiers aperçus sur des éléments de planification urbaine à Angkor Thom》(吴哥城市规划因素初窥), *Udaya*, n° 4, 2003 (a), p. 41 - 52.

GAUCHER, Jacques,《New Archaeological Data on the Urban Space of the Capital City of Angkor Thom》(吴哥王城城市空间的新建筑数据), in Anna Karlström and Anna Källén (eds.), *Fishbones and Glittering Emblems.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2002*, Stockholm,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003 (b).

GAUCHER, Jacques,《Angkor Thom, une utopie réalisée ? Structuration de l'espace et modéle d'urbanisme indien dans le Cambodge ancien》(吴哥城:一个实现的乌托邦? ——古代柬埔寨空间组织及其印度城市化模型), *Arts Asiatiques*, 59, 2004, p. 58 -86.

GOLOUBEW, Victor,《Le Phnom Bàkhen et la ville de Yaśovarman》(巴肯山与耶输跋摩之城), *BEFEO*, vol. 33, 1933, p. 319 -343.

GOLOUBEW, Victor,《Nouvelles recherches autour du Phnom Bàkhen》(巴肯山新研究), *BEFEO*, vol. 34, 1934, p. 566 -600.

GOLOUBEW, Victor,《Recherches dans Angkor Thom (Mission Goloubew)》(吴哥城的研究[郭柏鲁考古活动]), *BEFEO*, vol. 36, 1936, p. 619 -623.

GOLOUBEW, Victor,《Recherches de M. Goloubew dans Angkor Thom》(郭柏鲁在吴哥城的研究), *BEFEO* vol. 37/2, 1937, Chronique de l'année 1937, p. 651 -655.

GOLOUBEW, Victor,《La double enceinte et les avenues d'Angkor Thom, leur étude et leur dégagement systématique》(吴哥城的双重城墙与道路:对它们的研究和系统清理), *CEFEO*, n° 14, 1938, p. 33 -39.

GROSLIER, Bernard-Philippe, *Angkor et le Cambodge au XVIe siècle d'après les*

sources portugaises et espagnoles(从葡文和西文材料看 16 世纪的吴哥与柬埔寨), Paris, P. U. F, 1958.

GROSLIER, Bernard-Philippe, 《La cité hydraulique angkorienne : exploitation ou surexploitation du sol?》(吴哥水利之城:对土地的开发还是过度开发?), *BEFEO*, vol. 6, 1979, p. 161 -202.

HIGHAM, Charles, *Early Cultures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东南亚大陆早期文化), Bangkok, Riverbooks, 2002.

JACQUES, Claude, 《Etudes d'épigraphie cambodgienne, X -Autour de quelques toponymes de l'inscription du Pràsàt Trapän Run K 598 : la capitale angkorienne de Yasovarman Ier à Suryavarman Ier》(柬埔寨铭文研究 10:从塔般戎庙 K598 号铭文中几个地名看耶输跋摩一世至苏耶跋摩二世时期的吴哥都城), *BEFEO*, vol. 75, 1978, p. 281 -321.

KANGLE, R. P (ed.), *The Kautiliya's* Arthasastra(考底利耶的政事论), 3 vol.,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2000.

Manasara(玛纳萨拉), voir ACHARYA, P. K. (trad.), 1994.

MARCHAL, Henri, 《Monuments secondaires et terrasses bouddhiques d'Angkor Thom》(吴哥城的次要古建筑与佛教用地), *BEFEO*, vol. 18 (8), 1918, p. 1 -40.

MUS, Paul, 《Le symbolisme à Angkor Thom : le"grand miracle"du Bayon》(吴哥城的象征意义:巴戎寺的"伟大奇观"), *Comptes rendu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 Belles-Lettres*, Paris, Picard, 1936, p. 57 -68.

PELLIOT, Paul, *Mémoires sur les coutumes du Cambodge de Tcheou-Ta-Kouan*(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 œuvres posthumes de Paul Pelliot, Paris, Adrien Maisonneuve, 1997.

SAHAI, Sachchidanand, *Les instructions politiques et l'organisation administrative du Cambodge ancien (VIe - XIIIe siècles)*(古代柬埔寨政令与行政组织:6—13 世纪), Paris, EFEO, 1970.

STERN, Philippe, *Le Bayon d'Angkor et l'évolution de l'art khmer. Etude et discussion de la chronologie des monuments khmers*(吴哥巴戎寺与高棉艺术发展:有关高棉古建筑年代学的研究与讨论), Paris, Geuthner, 1927.

STERN, Philippe, 《L'évolution de l'architecture khmère et les transformations de la

ville d'Angkor》(高棉建筑的发展以及吴哥城的变化), *Journal Asiatique*, n° 222, 1933, mai - juin, p. 352 - 354.

STERN, Philippe, 《Diversité et rythme des fondations royales khmères》(高棉王家建筑的时代与差异), *BEFEO*, vol. 44 (2), 1954, p. 649 - 687.

“历史、考古与社会”

中法学术系列讲座

吴哥及其地域

博悌叶(Christophe POTTIER) 著
吴旻 译

要我在一个小时内介绍吴哥的情况是很困难的,因为只对自19世纪末至今对吴哥的研究作一个总结就已经非常不易。在这一百余年间的研究中,当属1908年至1952年柬埔寨独立期间法国远东学院全权负责的工作最为重要,后者又继续承担研究中的科技任务直至1975年。但是今天我不从这一角度来谈,而是想强调吴哥——这个被广泛认为是谈论东南亚伟大宗教遗址的"古老神话"的理想地点,已经成为"新的研究方法"所考察的对象,新的研究方法就是试图将庙宇建筑整体放置在更广大的时空背景之下。吴哥事实上非常出色地体现了东南亚农田之城的概念[1],它的中心就是位于一片水稻种植区中的庙宇建筑综合体。无论是从政治、社会与经济组织来看,还是从空间形式组织来看,它都可被视为一个巨型曼荼罗(*mandala*)的完美表现形式[2]。如果我们要谈将吴哥作为对象来理解的"新方法",就必须简略地提一下"旧"方法,而后者也正是认识吴哥的基础。首先我们必须强调的是从一开始就与吴哥密不可分的建筑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本身也是产生吴哥神话的源头。

19世纪下半叶吴哥的"发现"过程是众所周知的。那时,西方正在全球进行勘查,在许多情况下,也同时进行着殖民活动[3]。当法国在柬埔寨建立起保护国制度之后,吴哥就成为了一种丰富的古代文化的象征。它已经被热带丛林吞噬而消逝,而殖民国"文明"的任务就是要研究并修复它,将它的"伟大",至少是它的"历史"还给这个国家。经过第一阶段的勘查,发现这个亚洲的"亚特兰蒂斯神话"的种种遗迹之后,法国政府在19—20世纪之交斥资建立起一个科学机构,专门研究和保护法属印度支那的文化,这就是法国远东学院。法国远东学院的成立以及它在吴哥设立的一个常驻机构"吴哥保护委员会"(Conservation

d'Angkor)，从此提供了一个长期研究的框架[4]，并由此产生了第一批系统的文物统计清单以及第一批对古代柬埔寨文明的史料研究。需要重申的是，上述研究只是局限在古建筑、碑铭（它们的数量本身就很少）和为数更少的中文记载之上。在实地进行的最初工作就是将主要的古建筑从疯长的植物桎梏中解放出来，由于当时能够使用的方法有限，因此根本无暇展开其他工作以及进行研究。清理植物的工作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而建立起一个"吴哥公园"的计划则见证了自20年代起政府管理的加强，这促使了新的研究方法的产生与迅速发展；而考古复原（*anastylose*）[5]的引进也见证了在遗址修复方面，已经从简单的点状的加固转变为一种有意识使其价值再现的政策，这种转变是通过重修已成废墟的建筑物和对重建建筑的价值的肯定之上的，这一切的基础则是对古建筑的深层的、"科学"的认识。另外，斯泰恩（Philippe Stern）的建筑风格学研究完全推翻了古建筑的原有历史，并且提出了众多历史和空间的新问题。这些研究引发的是对整个碑铭文汇编和实地考察的重新审视，并与勘测、航空辨识及考古钻探相结合，该方法被首次运用到解决特定问题之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的动乱年代使得上述工作暂时停顿，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引进了当时的新技术，工作才又重新开展起来。在重建的工作中，在这一新的方向指导下，复杂和大规模的考古修复计划建立起来，真正体现遗址价值的措施也得以实施。与此同时，进一步运用了遥感测量技术及使用地层图像的考古研究也重新展开，对宗教背景之外的物质文化与空间及经济组织形式开始了新的思考。而由于1970年吴哥遗址被关闭，1975年整个柬埔寨不再对外开放，上述工作又被忽然打断了。当然，在柬埔寨之外的地方，研究还在继续进行，但只是集中在文字和碑铭史料，以及在此之前的实地勘察所积累起来的材料的综合之上。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特别是1992年柬埔寨再次开放以及吴哥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后，这一遗址成为国际性保护计划的对象。由于保护古建筑是其中的重点，因此这些计划针对的是主要的、参观人数最多的庙宇。保护工作由此也在当地重新展开，但几乎完全集中在建筑遗产之上，而研究工作，包括考古研究，被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因此在近十年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的大量旅游类书籍和普及读物中，我们看到吴哥只是被描述为密集型城镇，甚至就是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和遗址中出现的巨大庙宇，这是不足为奇的。这种单个的典型叠加起来之后便出现了一系列孤立的庙宇，在极度规整的城墙之中的都城，以及大型的单独的水利设施。用相对稀少的现有资料去理解吴哥文明及其历史空间

的复杂性，当然就会产生这种情况，尤其是这些资料涉及到的方面非常有限。例如碑铭文汇编，只有区区1200多种，大都来自于庙宇，直接并且也是仅仅提供有关神灵的供奉以及善款的运作情况；尽管我们也能从这些资料里得到许多其他信息，但那也是间接的材料，并且经常都没有给出清楚的解释，因为其中一些言外之意是我们所无法了解的。在对图像的研究中我们获得了更多的资料，特别是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但是这里主要多为宗教影像，“世俗”场景是非常罕见的，有时仅有一些片断而已。资料的第三种来源是建筑遗迹，根据碑铭学研究和它们自身装饰图案的发展过程，这些遗迹都已经被仔细地按照时间分类、断代和整理。但是它们仍然大都与庙宇相关，因为只有庙宇才使用持久坚固的材料建造。尽管在上述领域的研究已经进行了达一个世纪之久，可是目前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对其中很多方面的了解还是漆黑一片，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弄清。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建立在这些研究之上的吴哥形象，仍然集中并且局限在它的神明、庙宇和国王之上，却孤立于其他社会现象之外，而对这些社会现象人们几乎一无所知。

现在看来应该从这个狭窄的框架中将研究扩展开来，以便建立起对吴哥的更广泛和均衡的认识。格罗里耶(Bernard-Philippe Groslier)早在1959年就指出过这一必要性，他当时是“吴哥保护委员会”的科技负责人。他当时建议从两个不同但却互补的方面来发展吴哥学研究：一是平面的，试图从空间和古环境的组织形式来理解；二是垂直的，进行时间上的重叠性研究，即历时性研究(*diachronies*)[6]。这种表述方式当然是很简略的，并且也不是吴哥所独有的，但是它丝毫不会减少从时空两个方面来解读吴哥的重要性，我们在格罗里耶为数极少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他的研究因故过早地停顿了，而当我自1992年调到吴哥之后，就觉得应该继承他的研究路数，这是因为看到人们还远不能提出可以诠释吴哥的整体模型，现在需要做的则是重新审视现有材料的价值，并且在当地收集缺少的资料，尤其是考古学方面的资料[7]。在下文中我将以最近的研究为例来说明这种平面与垂直并重的研究方法。

先从平面研究方法说起，目前我们对于某些基本信息也有重新审视的必要，首先就是吴哥地图本身。尽管在此遗址之上进行考古研究已有一个世纪之久，但对它的地图重新深入考量并非无用之举，特别是因为这一地图仍然是不完整的，并且受到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吴哥的第一批地图是在19世纪末西方大规模勘查时期所作(Mouhot, Garnier, Aymonier...)，地图上的范围

南起洞里萨(Tonle Sap)湖,北至荔枝山(Phnom Kulen),覆盖整个吴哥地区。除了绘制遗址边界带有先验性之外,这些地图都从整体上介绍一些主要遗址,尽管都是孤立的介绍,但每个遗址仍能够不脱离周围地形的大致情形。它们都是当时经典地理学方法的典型作品,而1911年德拉容基耶尔(Lunet de Lajonquière)出版的《古代柬埔寨考古地图》更是其中的登峰造极之作:这幅地图介绍的是在古吴哥王国的广袤范围内的900余个遗址。然而有意思的是,也正是在同一时期同一位作者绘制的一幅新的吴哥地图,却使得之后70年间的几代地图都局限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德拉容基耶尔出版的这幅《吴哥遗址群图》,专门针对吴哥所有的古建筑遗址,由于它们密度非常之大,我们一般将之总称为"吴哥遗址群"。这幅图实际上也只反映了吴哥遗址的一个有限的部分,范围是在两个大型人工湖之间[8],北起圣剑寺(Prah Khan),南至暹粒(Siem Reap)。这一区域的选择并不是随意的,因为自1915年起人们开始建立起一个参观的"线路",将一组便于出入的主要古建筑作为中心,方便"吴哥保护委员会"集中开展工作,而地图所选区域正是要彰显这一组古建筑的价值。上述工作一直持续到1970年,发现了一些新的遗址,也绘制出了几张新地图,但是这些地图或多或少仍然在同一框架之下,即仍然局限在德拉容基耶尔《吴哥遗址群图》的中央部分[9]。而今天在各种指南手册上所用的地图也是在这一框架之下绘制的,在图上我们看到各种寺庙建筑散布在背景当中,好一点的图对背景采取淡化处理,而有些背景则处理得让人联想起一片神秘的森林,实际上那里的森林现在已基本无存。

在对寺庙环境长期研究的过程中,人们对于吴哥的理解有矛盾之处。特别是随着航空辨识技术的引入,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人们开始进行不同的工作试图将庙宇重新置于其原有的城市背景之下,这些背景以宽阔的城墙、道路、堤坝、运河……作为标志。吴哥城市发展的过程是以它的最后一个都城吴哥城作为标志的,而人们首次将庙宇也作为城市发展过程的一个因素加以理解的举措,使得20世纪30年代的考古发掘能够第一次在古建筑以外的地点进行。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格罗里耶继续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他将研究领域从城市本身扩展到整个吴哥地区,并将水利系统的遗迹也纳入研究范围。格罗里耶试图将这些都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之下,他甚至组织了数次钻探,希望完成吴哥地区的一张真正的"考古全图"。由于他担负着"吴哥保护委员会"的繁重工作,因此上述工作都未能完成,其成果也只有一小部分出版[10],但是这些工作还是为他在1979年出版的《吴哥水利之城》中提出的模式提供了材料。尽管他采

用的功能主义的研究方式今天值得商榷，但他的这篇综述仍是迄今惟一一篇对吴哥地域发展持整体的和历时性看法的文章，而吴哥地区的古建筑则是与这种地域发展紧密联系并且融入其中的。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现在还有一种对于那些人工湖的歪曲理解，以及对于吴哥水利系统作用的错误看法，由此所产生出的吴哥的新画面就是：在原有的孤立的庙宇建筑之上，又加上一些同样孤立的水利设施，而整个这一切则被认为是体现出了一种象征性的、宇宙论的绝佳模型……

正如我上文所说，我认为目前现有的认识还不足以立刻提出一种理解吴哥的整体模式，在下文中，我将列举几个用平面方法研究的例证来说明我的看法，即这一方法可以收集必要的信息来发展我们对于吴哥的认识，特别是在吴哥与其环境及地域关系这一层面上的认识。这些工作开展之时，我正好担任“地域环境整治规划（ZEMP—Zoning Environmental Managment Plan）”的跨学科研究顾问，这一规划是在吴哥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之后，为了完成遗址的保护计划而在联合国的赞助支持下设立的。当时我的任务仅仅是负责绘制一幅吴哥地区已知古建筑的地图。对于其中心区域来说，绘制工作毫无问题，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那样，1911 年的那幅地图是目前惟一一幅涵盖整个地区的地图，但是在今天看来它的地图背景是太不精确了。以 Finmap 的新的航拍图为基础，我开始着手依据遥感测量技术辨识收集所有可能为庙宇的遗址——这些遗址通常都有一条方形的城壕作为标志，目的是在一个新的地图背景之下，把法国远东学院档案和统计清单里收录的 300 余座寺庙予以定位。这一方法不仅快捷而且行之有效，然而最后它辨认出来的遗址不是预计的 300 个，而是多达 800 个！遗址和线形结构的密集程度看起来已经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想[11]。并且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以前未曾发现的遗址显示在整个吴哥地区密度均匀地分布着一些小型的次要遗址，与传统地图中流行的那种大型古建筑集中的吴哥形象完全不同[12]。因此新的系统地图有助于我们重新考虑吴哥的土地整治体系，并且新地图也反映出了人居活动留下的痕迹。

撇开遗产保护这一方面不谈，我一直在继续和进一步绘制这份详细的地图，第一步就是将研究的领域局限在从吴哥地区到南部湖泊的范围内：这个 600 平方公里的区域正好就是吴哥土地整治的发源地，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地域与湖泊的关系提供方便；并且当时这也是惟一一个安全有保障的区域，我们可以在那里进行实地考察而不必担心生命受到威胁。在此我将不再详述有关方法论了：传统方法就是将出版物及档案信息，与遥感测量结果的系统分析、钻探结果及通过

卫星定位进行的系统实地验证等一起进行对照。这样取得的整体资料都收入到一个数据库中，再与数据库中已有的其他资料建立起联系，如铭文、雕像、书目等等；同时这些资料信息也被增加到 1∶10000 的地图之上，该图所采用的背景是 20 世纪 60 年代格罗里耶完成的，这也是目前惟一可用的背景。这一新的地图为对该地区自“前吴哥时代”直到 11 世纪初国都的分布及其更替形式的重新评价奠定了基础[13]。得益于与悉尼大学的合作，该地图也完成了数字化，并且成功嵌入了 GIS（地理信息数字化系统）之中，紧跟时代的脚步跨入数字化的 21 世纪。该图收录了 527 座古建筑，其中的三分之二从未被绘入地图或是被编入统计资料。除了标注统计清单上的各地点及其号码之外，该地图主要展示了人居建筑群及其相关设施（道路、运河等等），还有，在许多情况下，也标注了古代的土地划分，包括稻田的田格划分的痕迹。这些资料反映了如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吴哥的土地整治，这一角度即便不能说是超越了，至少也是补充了我们目前对于吴哥特色的理解。下文将对该地图作进一步的论述（图 1：南部地区）。

新地图为我们提供的第一种信息毫无疑问是有关庙宇的，它们是最明显的地标，无论在地图上还是在实地都是最清晰可见的。尽管我们在此不谈它们可能是宇宙论的表现形式——这几乎是人所周知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它们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在所有的庙宇之中，从最简陋的到最宏伟的，我们都能找到同样的几何形状：成方形的土丘（实际上通常都是长方形的），四周环绕着城壕（图 2）。这些庙宇在大小和方向上存在着多样性，但是最大的特点则在于小型庙宇的遗址数目相当可观，它们散布在整个吴哥平原之上。尽管它们布局的一致性使得它们似乎成为清一色的整体，但是它们所使用的材料的多样性，尤其是使用材料的多寡，都在提醒人们实际上这个集合体是等级森严并且对比鲜明的，一边是数量有限、皇家敕命修建的庙宇，另一边是数量众多、但却简朴的私人庙宇，差别相当悬殊。这已充分表现出这些宗教性建筑所占有的重要经济地位，以及一个中央集权在组织人力上的能力。

通常位于寺庙附近的人居建筑却呈现出相当不同的面貌，至少从土丘、人工平地和池塘堤岸等地的情况中可见一斑。根据这些地点的地形、地表密集分布的陶瓷碎片等，我们考虑可以将它们认定为曾经有过人居建筑的遗址、遗迹。在对这些土丘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在大型山形庙宇（一般被认为是都城的中心，（图 3）周围，有几处特别集中的人居建筑，但是如果只看到这些却可能掩盖真实状况：即绝大多数的人居建筑集中在数量有限的几处人工平地之上，与那种带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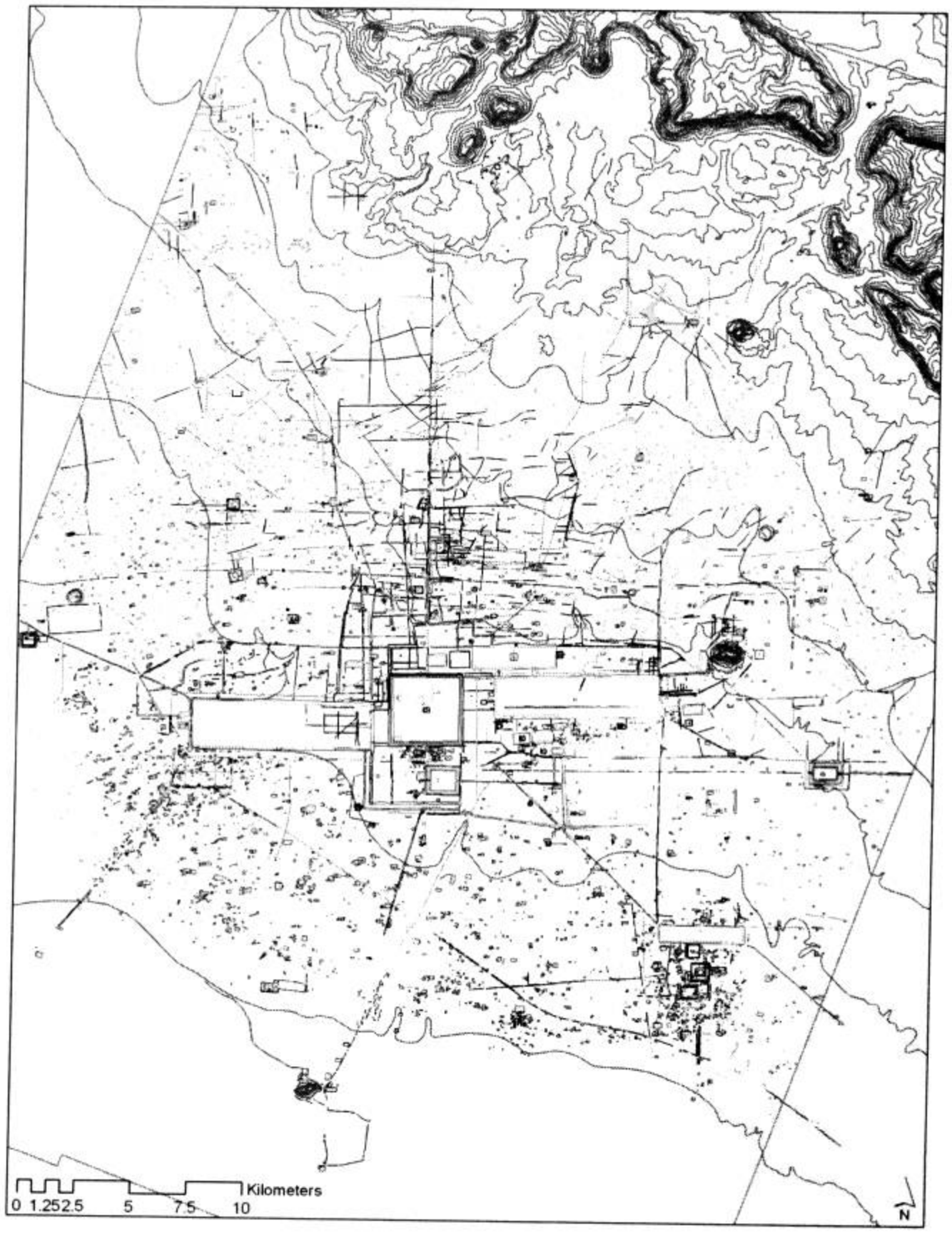


图1 吴哥地区考古图。南部及中央地区:pottier,1999(EFEO);北部地区:遥感测量:Evans 2002(USYD);地面确认:pottier,2003(EFEO)。背景地图:JICA(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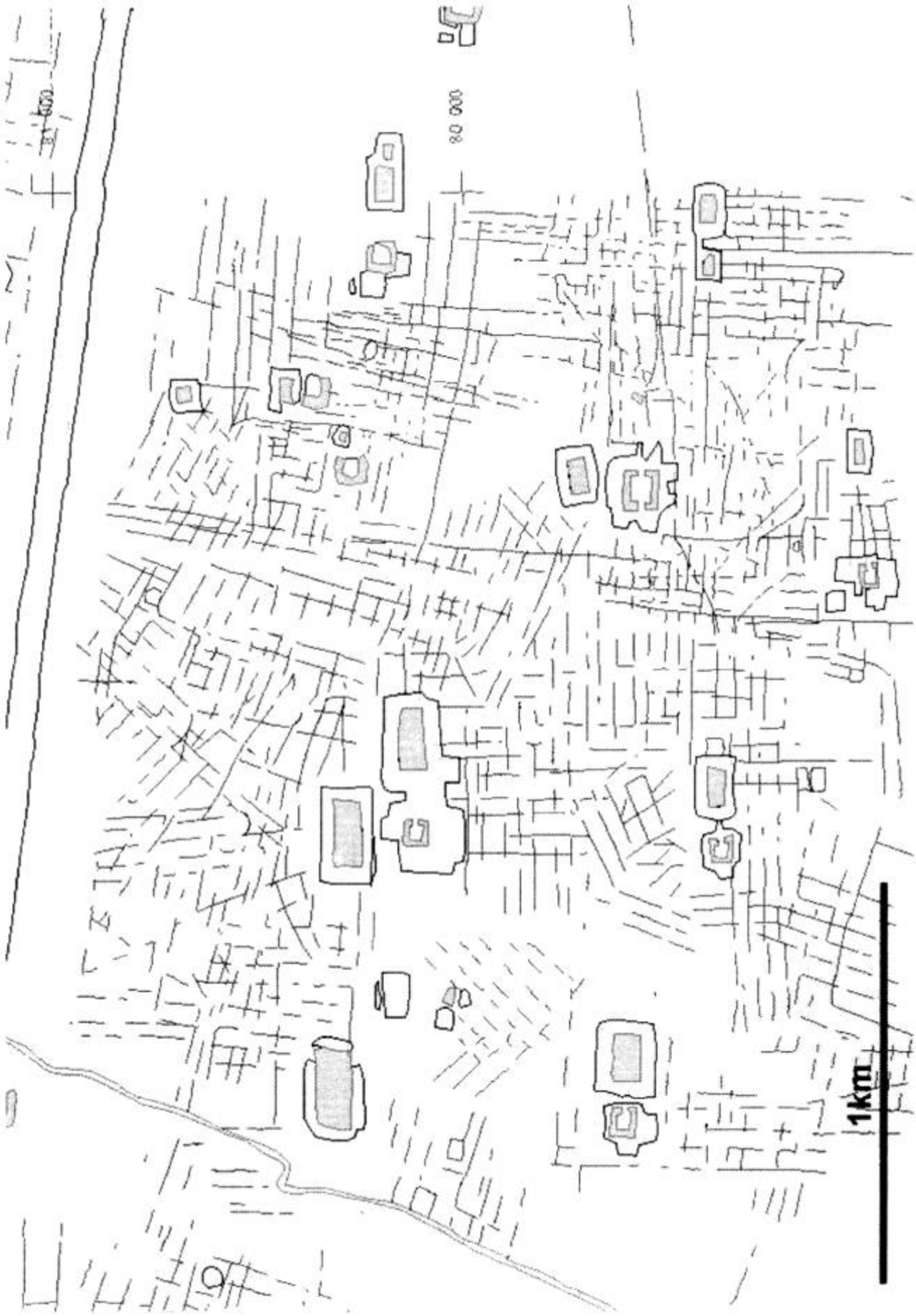


图2 吴哥南部地区考古图局部（Pottier,1999）：遥粒东北部地区；图中可见一些小型庙宇的土丘与水池、人工平地和田格划分遗迹相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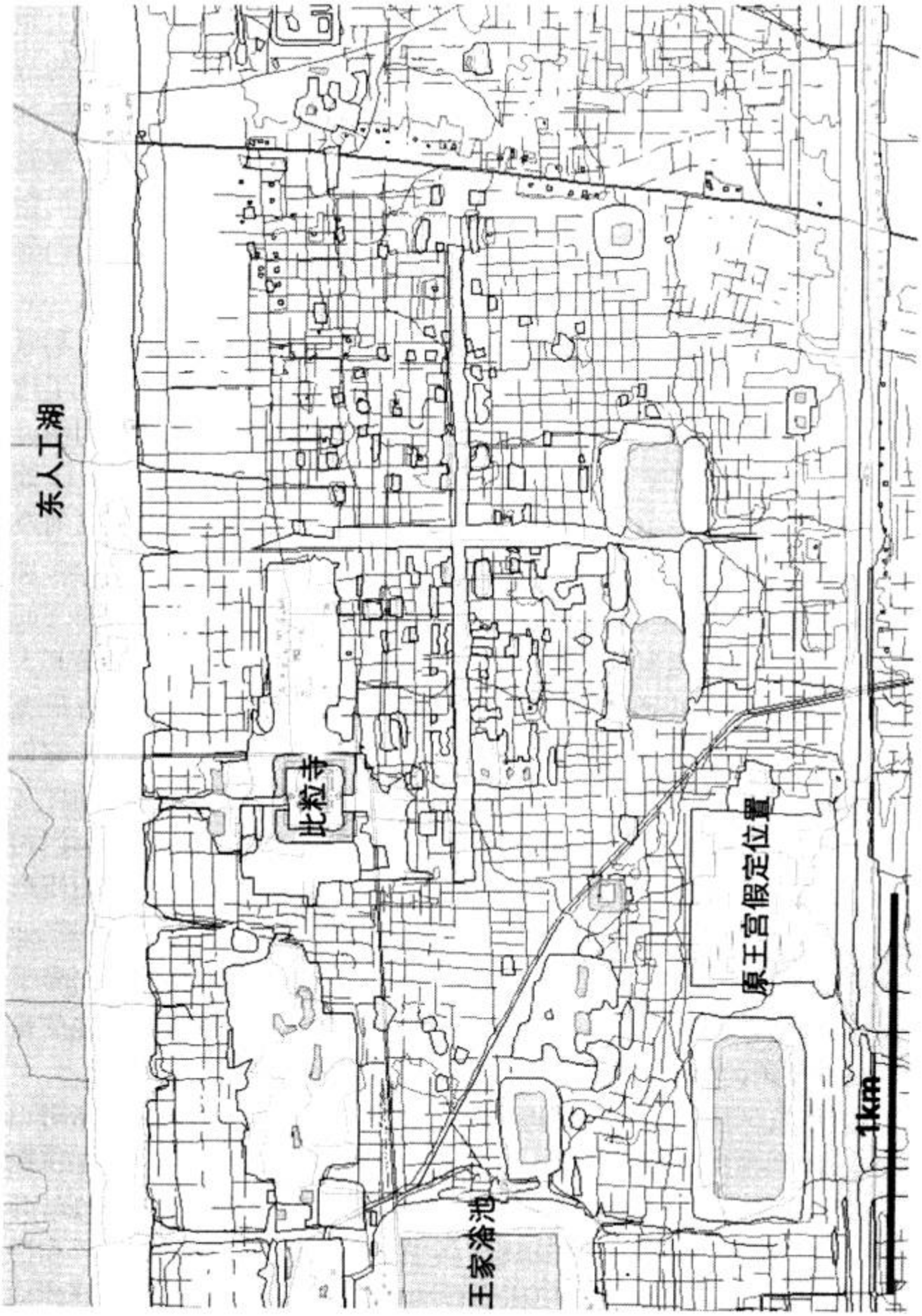


图3 吴哥南部地区考古图局部（Pottier,1999）：山形庙宇比粒寺（Pre Rup）的周围；值得注意的是图中人工平地和田格划分遗迹的密集程度，未见城墙存在的痕迹

城壕、东边或北边有水池(trapéang)的传统布局的小型庙宇紧密相连(图2)。这种相似的庙宇布局甚至在比较复杂的遗址中都可以看到,例如某些都城的组织形式,或是在一些特殊的建筑如普农博寺(Phnom Bok)里。它们在该地区的分布与那些寺庙分布完全一致,因此显得非常协调。然而完全独立于寺庙之外的土丘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如果说上文我们所看到的在山形庙宇附近的人居建筑的密集可被视作某种城市化的特征,那么那些分布在湖泊淤洪区边缘的人居密集点则可被视为人居最早的建筑形式,很可能属于"前吴哥时代",正如我们最近在对彭池(Trapéang Phong)的研究中所揭示的那样(参见下文及图5)。

这一系统的地图也辨识出许多水利设施,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水利管理及相关信息,这些设施当然包括人工湖,但也包括运河、水池和城壕。有了这些信息,我们就可以重新思考格罗里耶书中一些论述得不够详尽,或者没有明确阐述的问题[14],例如人工湖、大型线形结构与人居建筑之间的关系。如果只是笼统地看过去,这里似乎与吴哥的传统描述相去不远,四座人工湖都与大型运河及一些道路相连;然而究其细节,百余座水池的存在实际上展示了另一种真实,那就是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功用上,数座大型人工湖和星罗棋布的小型水池之间都存在很大的区别(图4)。这些水池多为长140米宽70米的长方形,但是其大小也随相关的宗教建筑的大小而有所不同,那些最大的建筑通常附近也有最宽阔的水池。无论这些水池是与寺庙或与居住区相关联,还是完全独立在外,它们都可以被认为是古代人居遗址的痕迹:有多少这样的常用水源,就一定有同样多的居住区。有些水池还与几条长长的划过这个区域的线形结构如道路和运河相连,可以由此假定沿着某些这样的线形结构,也有人居的存在。但是大多数线形结构,却是独立于"点状"的人类建筑之外的,这些建筑以寺庙、寺庙的方形平地及水池为代表。这一情况在吴哥的北部尤其突出,在那里,线形结构呈现出异乎寻常的密集性,但却与点状的人居建筑及其分布毫不相干[15]。显然这里遵循的是完全不同的组织和功用的原则,体现了土地整治中的不同层面。

最后,遥感测量技术使我们得以更进一步了解到土地占用的细节,包括辨识出古代农田划分,特别是稻田的田格划分。我们观察到在庙宇及其相关建筑周围产生了一个几何形状化的土地系统,例如在寺庙附近通常都分布有一些与寺庙同向平行的土地田格,但有时也延伸得较远(图2)。对它们的地貌分析和层叠状况的研究都清楚地显示那确实是田格划分的陈迹。最近在暹粒机场修建地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也从地层方面证实这些田格划分确实有悠久的历史[16]。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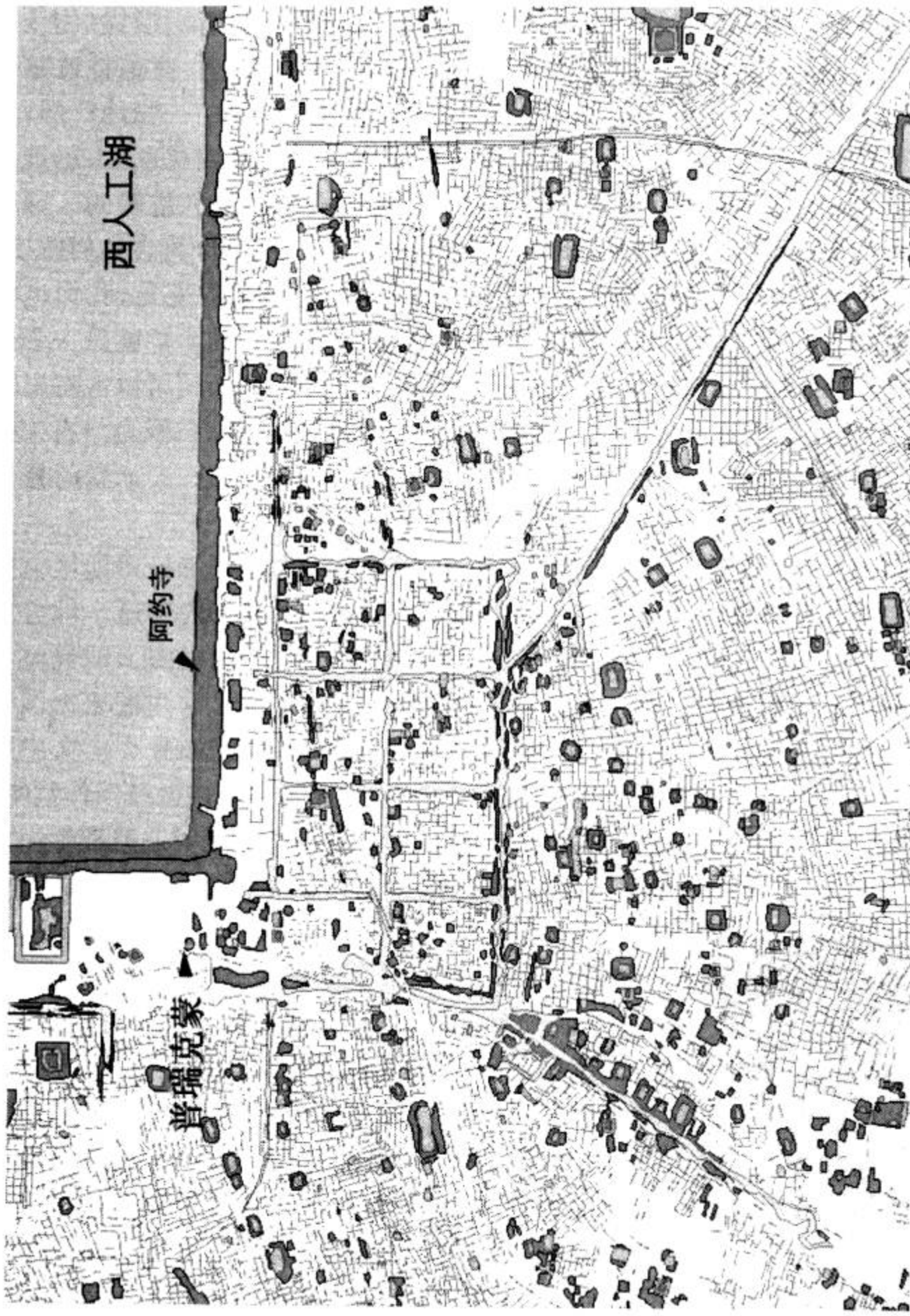


图4 吴哥南部地区考古图局部（Pottier,1999）：西人工湖西南地区；图中可见运河网络，以及在一片错综复杂的田格划分当中十分密集的庙宇土丘、水池和人工平地，形制大小各异

些田地划分一方面说明属于寺庙的田产面积有时相当大(甚至可达70公顷),另一方面其逐渐密集的程度也说明在城镇中心周围有特殊的组织形式(图3)。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改造的力度已经超出了简单的庙宇建造,而是将地域真正地网格化了。北库(Kleang)的K. 542号铭文下部保存有惟一一张地产图,从中我们即可见一斑。它证实了无论在经过人类深刻改造的地域观念上,还是人类寻求与环境的一致性的过程中,这种几何网格的形式都是极为重要的。这些田地划分同时也说明了它们与原有地貌的复杂关系,为了使划分符合几何图形,其原有的地貌都多多少少经过了改造。通过分析其前后形态的变化,我们也可以找到人居建筑在地域分布中相对密集的时间段。西人工湖的南部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在这一片错综复杂的地域网格之中,根据其方向的不同可以区别出不同的建筑群,有些是在修建人工湖之前的人居建筑,而有些则是在修建与人工湖相连的运河系统之时修筑的(图4)[17]。从这一例证中也可看出,人工湖的修建使得下游本来只能部分耕种的土地得以修整成为大片稻田。

通过研究整个新地图提供的信息,我们可以弄清和重新评价吴哥地区空间整治和管理的一些特征。在此我只论述与地域整治相关的部分,而这一部分又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吴哥的城市化,如何理解那些处于规模宏大的规整城墙之内的城市的理想表现形式。吴哥城就是这样的典范,它是12世纪末由国王阇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VII)修建的吴哥最后一座都城。正如我在上文中所说,吴哥城作为实例,是最初的吴哥城市研究的基础,并且吴哥城也被当作范本,用来界定在它之前的吴哥都城的城市化特征。对于它最初的研究一般都集中在城市基础设施之上(庙宇、道路、城墙、运河网络……),而郭榭(Jacques Gaucher)最近的研究则将之大大地发展了[18],他发现了一个规整的线形结构网,组成一个由许多长方形街区构成的系统,街区里则有许多人居的痕迹(水池、人工平地等),这种形式使人联想到北库的K. 542号铭文上提到的长方形的网络,至少从地貌上来看是这样的。尽管吴哥城的城市形态看起来简直近乎完美,但是它却不能被理解为是一个理想模型的最终实现,而过去历代吴哥都城又都是从这个模型中产生出来的。事实上,吴哥城是在一个悲剧性事件,即吴哥被占城人(Chams)占领之后才修建起来的,这也可以充分说明为何它具有被封闭在防卫体系里面的形态。这座阇耶跋摩七世的都城成为吴哥城市化史上一个精彩的成果,而这部城市化史在此之前的阶段还有待确认。目前已经提出了在城墙之内的方形城市的存在,作为对这部历史的补充。最著名的可能是郭鲁柏(Victor

Goloubew)在上个世纪30年代提出有关耶输跋摩之城的假设。这位学者认为巴肯寺(Phnom Bakheng)为耶输跋摩一世(Yasovarman Ier)在9世纪末所修建,是都城的中心寺庙,他还复原了边长为4公里的城墙。该假设的第一部分如今已被认为是成立的。但是对于这个面积有16平方公里,被戏称为"郭鲁柏之城"的巨大城池的界定,今天已经被摒弃了[19]。曾被郭鲁柏认为是城墙西南角的设施,也是目前惟一清晰可见的遗迹,很可能是一座水利设施,而且其修建年代是在12世纪以后。钻探、地形学、地貌学,以及铭文与古代田格划分的对照等研究也都证实,耶输跋摩之城事实上是个开放的城市,位于东人工湖(Yasodharatataka)的下游。格罗里耶也提出了相似的假设,这次是有关"木堡"(Bantay Chhœu),前吴哥时代最早的城市之一,他认为该城有一条边长3公里的城壕,城壕范围内有几座这一时代的庙宇——这些坐落在西人工湖地区的庙宇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已为人所知[20]。与郭鲁柏的假设一样,这些古老庙宇与所谓的"城墙"之间的联系并不能确定,并且它们的分布也远远超出了"城墙"的范围[21]。事实上,"城墙"也是一座水利设施,是与西人工湖垂直相连的运河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一系统始建于11世纪,那已是3个世纪之后的事了(图4)。并且,"木堡"之名所指实际上是邻近的一个地点,经过遥感测量,我们发现了一个在地面上已经无法辨识的650米×560米的长方形区域,可以清楚地看到它重叠在吴哥的田格划分之上。至少,"木堡"这一地名还保存了下来,算是对一个后吴哥时代的有围墙的小型建筑群的纪念[22]。这些有关吴哥之前封闭城市的存在的假设目前都应该被摒弃了,我们应该更多地去寻找开放的城市形式,它们的形状事实上是无法界定的。吴哥国王拉坚德拉跋摩(Rajendravarman)10世纪中叶修建于东人工湖南部的城市是极好的例证(图3)。这座后来有时也被称为"东城"或是"耶输跋摩之城第二"的都城,其建筑群都修建在山形庙宇比粒寺(Pre Rup)的周围,其中有一座宫殿、几座水池以及不同的人工平地,它们的组织形式在地图上清晰可见。但是却没有任何信息足以让我们辨别出一个"城市"的城墙,或者划出一个地貌上的确定界限。我们在对土地划分遗迹的研究中发现,越接近山形庙宇它们就越密集,特别是在其东南部,集中了一批长方形人工平地,是这里可被视为是城市形式的惟一证据[23]。我们看到在这些密集人居遗迹的附近,修建有一些传统形态的神庙,带有水池和平地,则应该是典型的农村建筑;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就像巴春(Bat Chum),却是由王国的高官修建的。我们看到这样一种非常明显的城乡延续的存在形式,如果在这里谈城乡的对立还有

实际意义的话。城市并不以实际存在的特殊地貌和界限区别于乡村，而是以一些象征性的因素为标志。因此，土地整治、城市化和建筑似乎都紧密联系在一个空间整治的整体之中，而这一整体受到皇权和教权的影响。

在论述这种平面研究方法的最后，我将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的进展情况，这也是悉尼大学、吴哥地区保护与整理局（APSARA）与法国远东学院合作进行的“大吴哥计划”的一部分。在此我仅谈一下这个非常巨大的计划的一个方面，即与扩展考古地图相关的方面（图1）。以南部地区的地图[24]和地域环境整治规划（ZEMP）的资料[25]为基础，依据一张 AIRSAR 2000 年 9 月完成的新的雷达图，伊文斯（Damian Evans）于 2002 年在北部地区进行了初步的遥感测量工作。现在他们正在进行检查和修正的工作，依据的一方面是实地勘察——目前这项工作尽管不是在系统地进行，但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则是航空辨识——他们采用了轻型飞机（ULM）来拍摄，这些飞机是专门适应距离很长的线形结构而设计的，而这些线形结构都经常位于人很难进入并且安全缺乏保障的地区。这一系列的工作，尽管还没有完成，但是我们已经可以从中看出北部地区的人居建筑的密集程度和不同形式，并且可与已经研究过的南部地区情况相对照。其中二者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北部地区存在着异常密集的线形结构，这一线形结构将该地区划分成网格状，但其历史和功用还有待进一步确定。

在接下来的部分里我将以一些实例介绍垂直研究方法，这些工作都是自 2000 年以来我们在“吴哥区域整治中的法柬联合考古工作（MAFKATA）”的框架下进行的。这一考古活动的主要目标是研究吴哥发展的最初阶段，围绕着从“前吴哥时代”建筑物的少量修建到第一批以大型山形建筑群为中心、组织得很好、有规整形状的吴哥都城的出现这一发展变化过程进行研究。从已有的研究出发，我们决定选择两个地区来研究吴哥地区的这种变化：一是西人工湖地区，二是罗洛士地区（Roluos）。我们的首批发掘工作集中在第一个地区。我们选择了 5 个遗址进行发掘，因为它们应该可以作为吴哥历史重要时期的各个不同阶段的代表（图4）。主要的钻探集中在对庙宇附近的环境、土地整治的方式以及附近可能的人居遗迹等研究之上。在研究中我们不仅发现庙宇空间与人居空间是分开的，而且还证实这里从史初时代（*protohistoire*）一直到“前吴哥时代”都有人居活动这一史实，尤以普瑞克蒙（Prei Khmeng）为最清晰的例证。同时这些研究也确定印度化庙宇的出现年代是在公元 6 世纪至 7 世纪初叶，逐渐伴随而来的则是空间组织形式的彻底改变，以及由于放弃了土葬而带来的葬仪的根本

变化。然而该地区在11世纪经历的这种深刻变化却大大阻碍了我们的研究，尤其是我们在山形庙宇阿约寺(Ak Yum)周围进行的研究，我们认为那里正是吴哥自7世纪末开始的第一座都城的建筑所在。

2004年以后，我们的工作就转到罗洛士地区，这里有“前吴哥时代”的庙宇遗址，如彭池(图5)；也有因陀罗跋摩一世都城的建筑遗址，这座都城是围绕山形庙宇巴空寺(Bakong)建立的公认最早的“吴哥城市”。罗洛士不同的遗址也见证了一种同步的发展，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两个遗址之上，它们完全不同，但却互为补充，是两种建筑的代表，它们是巴空和彭池。

彭池位于罗洛士地区的南部，处在遭受洞里萨(Tonle Sap)湖季节性泛滥的土地的边缘，似乎是“前吴哥时代”最早建筑的典型，集中了许多小片呈长方形的人工平地(图5)。此外，在这座由不同时代“风格”的神殿组成的庙宇的东部和北部，有两座大水池，格罗里耶认为它们是一种“阶梯状水池”的土地整治形式的标志，而这种形式曾经作为位于北部的、围绕巴空寺建立的吴哥城市所采用的模型[26]。他甚至认为这一遗址就是阇耶跋摩二世和阇耶跋摩三世的第一座都城诃里诃罗洛耶(Hariharalaya)。我们最近这两年的工作都集中在这个面积约有240公顷的遗址上，研究它的形态、年代和人居。根据我们完成的一份详细的地形图，我们在遗址的所有人工平地上打了六十余个钻孔，目的是从整体上确定可能存在的考古地层的厚度和大致地形。与此同时，我们也对寺庙及两个水池周边的环境进行了第一次钻探，今年我们又在附近的众多人工平地之上继续这项工作。尽管工作还没有做完，但是已经可以看出这两座水池是吴哥时代才加修的，因此年代较晚，最初的地域形式只有那些人工平地。由于从小型孤立的庙宇建筑到大型规整的吴哥式建筑之间缺少衔接的环节，因此“阶梯状水池”这一假设被推翻了。这些水池实际上是11—12世纪间，这一遗址重新有人居住并经历了深刻的整治改造的见证，与邻近的多同特奈池(Trapéang Totung Thngay)遗址所经历的建筑形式的改变类似。在彭池进行的24次钻探之中，有19次是在附近的人工平地上开展的，由此可以(部分地)再现一个丰富的人居状况：其核心是主要位于寺庙西边的最早修建的人工平地，它们一直继续存在至吴哥时代，在此期间，人们又对它们进行了加高并且修建了新的人工平地。人们也对庙宇相继进行了多次扩建和重修，其中对中央神殿的重修约在10世纪[27]，这足以证明这座庙宇的重要性，但是这里却不应再被视为吴哥城市的一个范本模型。恰恰相反，正如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它的组织方式是一个集中的人居平地，尽管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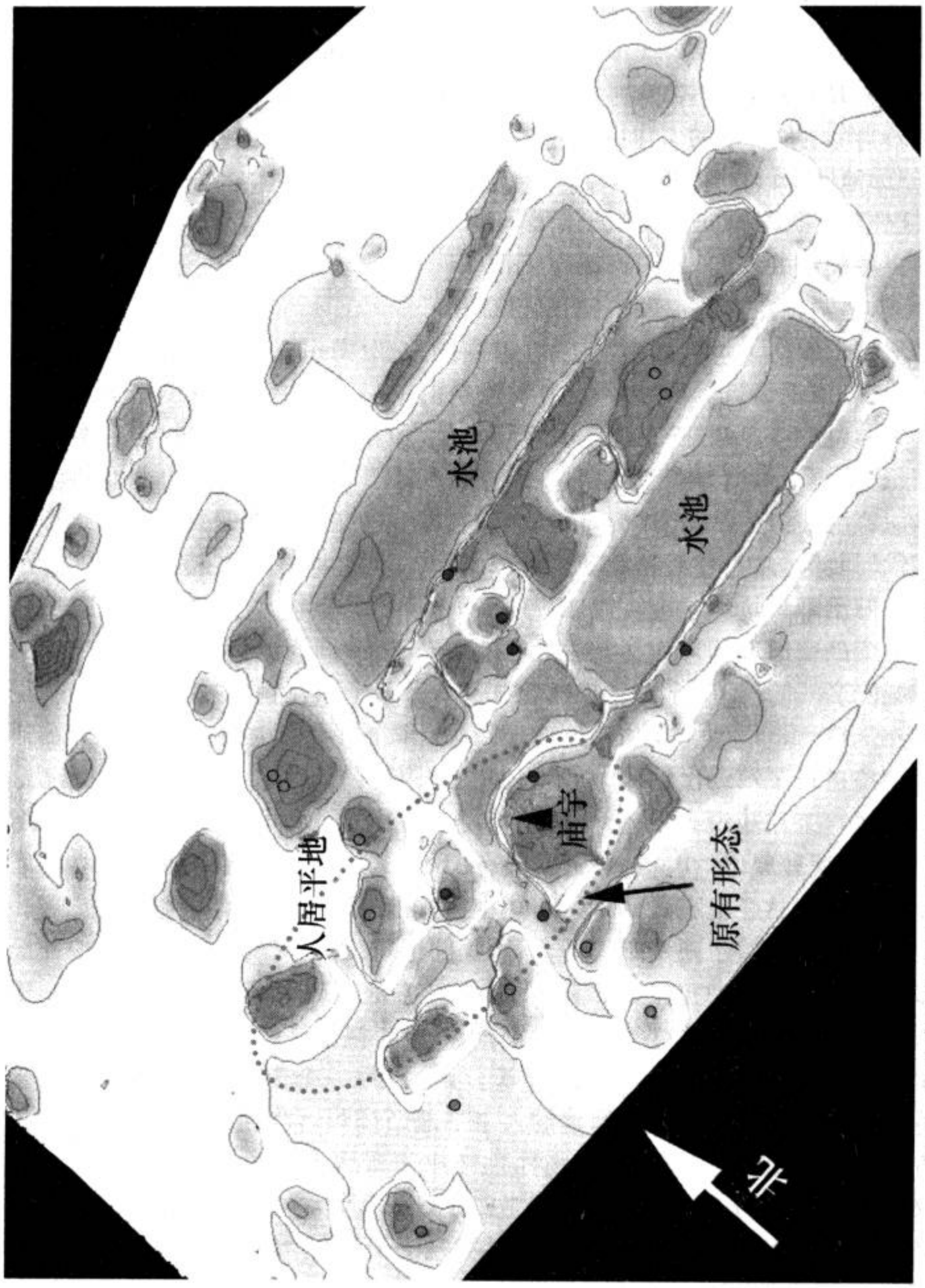


图 5 彭池遗址数码平面图（Pottier, Mafkata 2005）：图上标注 2004—2005 年间考古发掘的位置

体上呈长方形，但是人居建筑分布零散，相当忠实地反映了该地区最早的人居形式。我认为将彭池视为第一座都城是极不可能的，它应该只是一座以庙宇为中心的“传统”的小型建筑群，位于一个自史初时代就有人居住的地区，相对于附近被认为是同一时代的遗址而言，这个地区在“前吴哥时代”人居还相当密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所作的钻探也清楚地表明，要弄清楚“前吴哥时代”的人居密度，就必须从历时学的角度来平衡现在这个地区仍存在的人工平地数量。

巴空是我们考察的第二个遗址，它是第一座吴哥城市的中心。这座吴哥城市50年以来一直作为一个范本供我们理解和阐释之后出现的其他都城[28]，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成为吴哥城的对照，而后者则是吴哥城市史的“终结者”（图6）。然而在巴空，构成这第一座吴哥城市的主要建筑因素（人工湖、普里哥寺和巴空寺）的时间，却与根据碑铭建立起来的年代学不符。后者都将这些建筑的修建归于因陀罗跋摩一世（Indravarman 1er）名下，这位国王于公元877—886年前后是诃里诃罗洛耶的统治者[29]。但是我们对于建筑上的增建物的细致研究则表明了其年代的复杂性，它已经超出了因陀罗跋摩一世的时代，而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末人们已经辨认出这个时代之后的一些变化形式[30]。因此我们所做的工作是针对整个巴空遗址的土地整治，特别是研究其组织方式、年代顺序以及位于寺庙和外城壕之间的这一片广大区域（面积约840米×800米）的人居状况。我们在1998—2000年间完成的详细地形图不仅使得我们可以确定在这一地区内规则分布的各建筑要素（环绕在四周20余座砖石结构或是砂岩修砌的庙宇以及8座方形水池），并且也提供了一些较早人居的信息。这张呈规整几何形状的全图，是确立该遗址地位的关键，并且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构成带有围墙的大型庙宇的各个建筑因素已经出现，但在这张图上首先需要澄清的是，融入到该图的各个建筑究竟有哪些是属于同一时代的；然后我们必须试图定位这一空间：我们究竟是应该将之视为大型宗教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这一地域的外围呢？还是围绕宗教建筑修建的最早的，但却是一个真正的城市空间呢？事实上，如果不将它的组织形式和它的人居状况的实际分布及其特色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不能先下定论称其为城市空间。因此如何确定和评估这个按照形态和等级划分的空间中各种建筑的分布是最为重要的：哪些是通道，哪些是拜祭场所，哪些是人居……

最近三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工作都集中在这一“外围”地区，首先发掘的地点是在其西南角，因为这里有些与众不同，似乎留有一个在整体几何状规划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庙宇建筑（图7）。已经进行的第一次钻探在证实了上述假设的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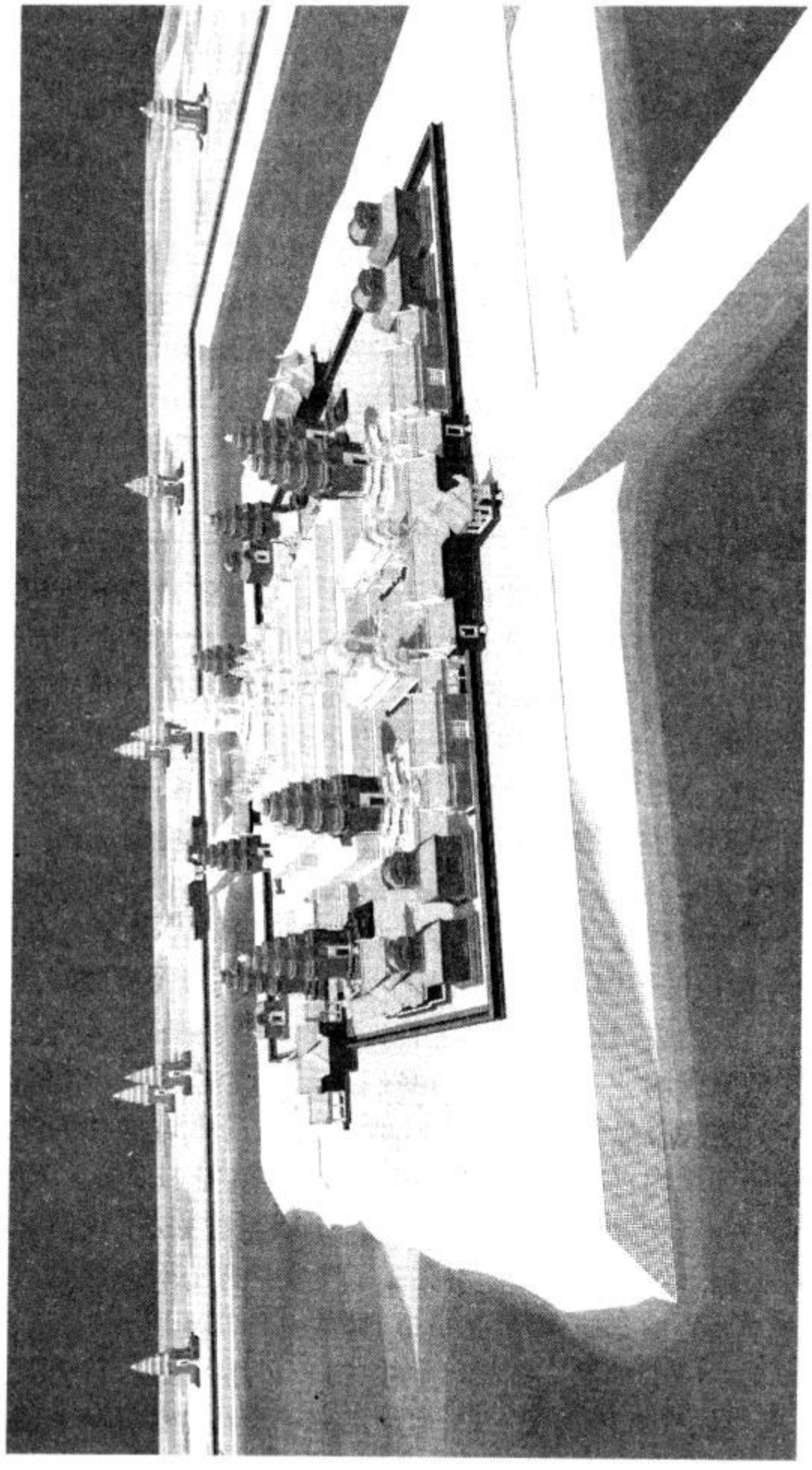


图6 巴空寺复原示意图（Pottier/Cazin/Beaufeist, Mafkata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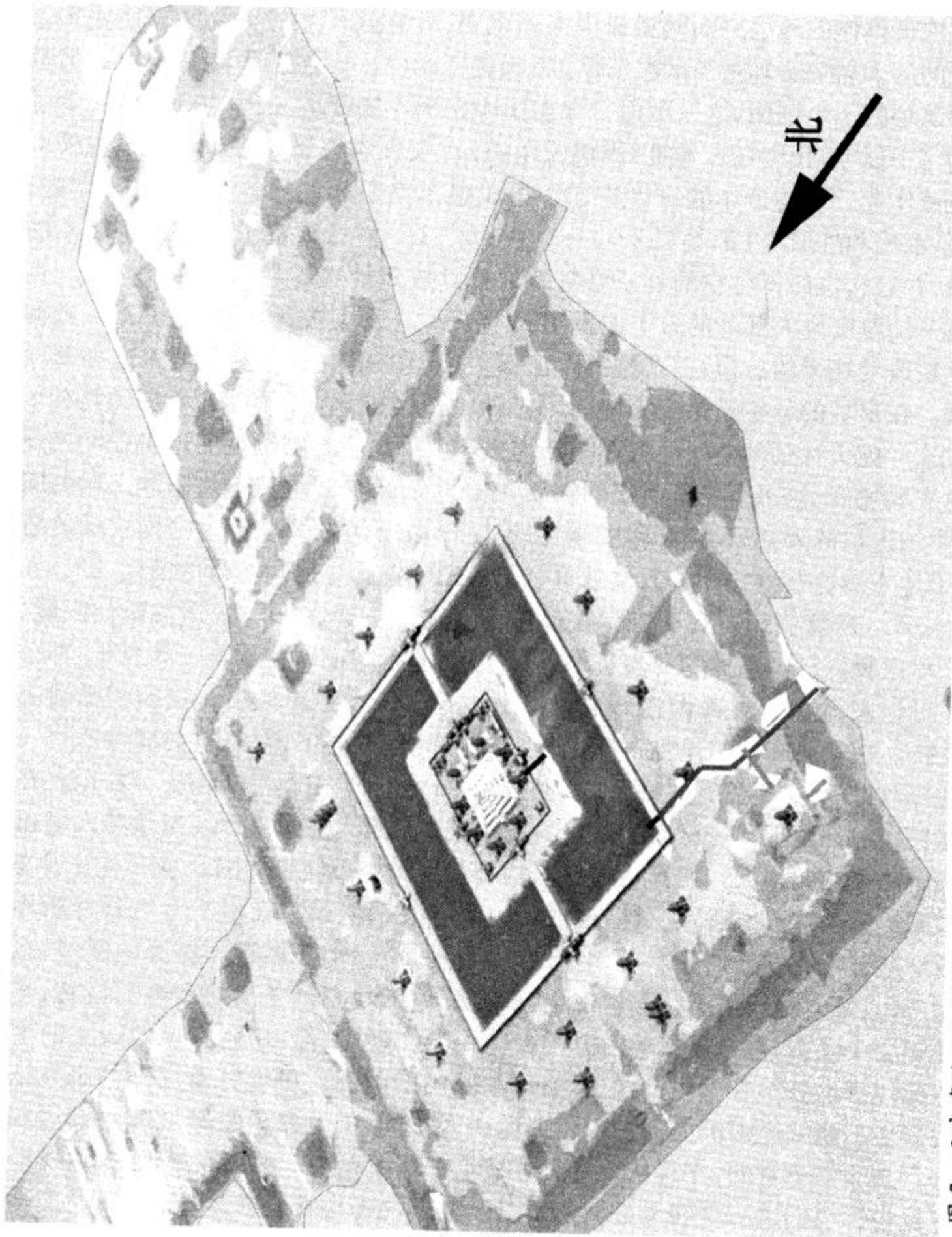


图 7　巴空遗址以及 2004—2006 年间考古发掘区域数码示意图（Pottier/Cazin/Beaufeist,Mafkata 2006）

时，却发现了有厚厚的人工淤积物，但极少人居遗迹这样看似矛盾的现象。故而迅速取得整体的地层剖面图就显得格外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区分这些人工形成的但人居痕迹却很少的淤积层，因此最近的两次发掘工作就开挖出了横贯整个遗址的一个剖面，这一剖面自寺庙围墙起至外城壕止，长达300余米。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在古建筑（围墙及角塔）以及人居地层周边以外的地方采取了机械作业。上述工作的结果肯定了组成整个巴空遗址的各个建筑物（围墙、角塔、水池和外城壕）都是属于同一时代的。这一信息肯定了我们一直以来的假设，并且它也使得巴空的复原修建计划可以按照恰当的规模着手进行了。当时留下的厚度令人咂舌的人工淤积层揭示了人们顺从强制性的宗教指示，有彻底重新改变环境的意愿，而在这一点上那些小型的建筑如彭池等是无法仰其项背的。在最后的分析结果出来之前（最后一次发掘上个月刚刚结束），我们对于完成这一庞大计划的断代任务还是持谨慎态度。出土的器物说明这里曾经出现过重大的发展，这也是吴哥时代的物质文化的特征：经过抛光的陶瓷和上釉的陶瓷；中国进口的陶瓷；放弃了印度制瓦的技术，取而代之的是带有中国式样的屋顶；而原本对这些器物中的大多数进行断代的依据正是巴空本身的断代，即公元9世纪末。尽管我们还远不能完全解决巴空遗址创建和人居时期的断代问题，但是根据我们已经掌握的初步资料，可以认为它创建的时代要早一个世纪，即公元8世纪末，但它的持续时间却非常短暂。这一假设也得到了一项孢粉学研究的支持。这项研究的结果是在“大吴哥计划”的框架之下，在巴空内城壕通过一次钻探取得的[31]。尽管其时间跨度在吴哥的历史上只不过算是昙花一现，但是在整体钻探中都发现了与巴空的建筑物同时代的人居遗迹的存在，当然其人居遗迹的密度也相差很大。尤其是在寺庙围墙和周围小型庙宇周围几乎没有发现陶瓷和碳类物品，更加支持了这些地区无人居住这一假设。在似乎专为祭拜所用的东部地区也有同样的情况。相反，在周边地带，特别是靠近外城壕的堤坝、水池的旁边，坑穴和居址层则非常密集，但在那里却找不到任何防御性的设施，甚至连围墙也没有，包括在朝外的方向上。同样，在外城壕以外，在中轴线上的道路两旁似乎也分布着居住点，位于菜地和农田的前面。尽管针对局部的研究结论我们还不能就这样扩大到整个相关的研究空间，但这些信息却证实了人居现象并不是非常短暂的，并且从中可见居住点都集中在遗址的边缘地带；同时这些信息也告诉我们这一空间无论从建筑意义上来说还是象征意义上来说都是建构井然、等级分明的，其中的建筑和人居遗迹都有特定的分布方式，因而极有可能

是事先规划好的，但是在形式上这一空间并未与外界完全分开。这些信息同时还为我们开启了深入研究的道路，如关注各个建筑的分布、各种空间的分离以及人居点的不同密度等等；它们还揭示了从宗教空间到世俗世界各种建筑的区别和分布，提醒我们要从整体性和复杂性两个方面来把握与巨大山形庙宇相关的整个空间。

概括而言，上面所给出的事例完全不是给大家一个理解吴哥的“新研究方法”的概要，而是想展开一些可供发展的新思路，以便丰富我们对于东南亚那些古老宗教遗址的理解。传统的研究方法长期以来在辨识宗教建筑自身特色等方面表现出其优势，我们对于环境和空间组织的研究则是对传统研究方法的补充，庙宇就处于这种环境和空间组织之中并促进后者的发展，新研究方法强调了它们的影响，并尝试重新界定它们在社会中的作用。同时，考古和古环境学的研究则使得我们得以了解现有的文字史料缄默不言的不为人知的过去。在吴哥地域的这一个案中，我们试图说明的是，一种从总体空间的角度来研究的方法是如何辨识和研究那些地面建筑和居住点的世俗特征的，它们通常位于巨型的古建筑之外；并且如何将提出的有关问题与看得见的、可以计量的地层学痕迹相对照，从而从城市建筑形态和农村建筑形式的对立这一死胡同中走出来[32]。

本文是2006年4月13日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在清华大学建筑馆的“历史、考古与社会”中法学术系列讲座第29讲的讲稿。

〔注　释〕

1 Lombard, 1970.

2 Higham, 1989.

3 Dagens, 1989.

4 Pottier, 2001b.

5 “anastylose”一词产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是一种目前西方古建修复界广泛应用的技术。它的重点在于通过对一座已经倾颓为废墟的遗址各个残存部分的结构研究，看出其内在关系，从而达到将之修复的目的。——译者注

6 Groslier, 1960.

7 Pottier, 2003.

8 这种人工湖在柬埔寨文中被称为“baray”，它挖掘不深，但由很高的堤坝围起，呈长方形，宽2公里，长4—8公里不等。还有另外一种形式的水池，柬文称为“Trapéang”，

它亦呈长方形,但挖掘较深,面积相对较小,一般边长不超过600米。——译者注

9 Fletcher & Pottier, 2002 ; Pottier, 出版中。

10 Pottier & Dumarçay, 1993 ; Groslier, 1997; Pottier, 1999.

11 Pottier, 1993.

12 Pottier, 1993 & 1995.

13 Pottier, 1999.

14 Groslier, 1979.

15 Evans, 2002.

16 Bâty, 2005.

17 Pottier, 2001a

18 Gaucher, 2004.

19 Groslier, 1979 ; Pottier, 2000.

20 Groslier, 1979.

21 Pottier, 2001a.

22 Pottier, 1999.

23 Pottier, 1999.

24 Pottier, 1999.

25 Pottier, 1993.

26 Groslier, 1997.

27 Pottier & Lujàn-Lunsford, 2006.

28 Stern, 1954 ; Groslier, 1979.

29 Pottier, 1996.

30 Pottier, 2006.

31 Penny & al. , 出版中。

32 鸣谢:在此我谨向以下机构和个人表示衷心感谢:首先感谢法国外交部考古委员会以及法国远东学院对吴哥区域整治中的法柬联合考古工作的资助;也感谢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对于大吴哥计划的支持,还要感谢吴哥地区保护与整理局的古建筑与考古部以及柬埔寨当局管理吴哥的有关部门。在此我向自2004年就参加法国—高棉联合考古活动的下列所有成员表示最诚挚的感谢:Annie BOLLE, Eric LLOPIS, Dominique SOUTIF, Jean - Baptiste CHEVANCE, Cyril TAN, PENG Dara, CHEA Socheat, SO Sophearin, KONG Vireak, SANG Sun, Maartje ZWANEVELD, HENG Than, KHIEU Chan, Seila YAM, Tessa Simone MAH-BOER, PIN VICHEAR Sachara, CHHAY Rachana, Rethy K. CHHEM, Fabrice DEMETER, Caroline SOUDAY, Mélanie FRELAT, Nicolas BUCHET, AnneéMarie BACON, Christophe GABILLAULT, Alexandrine GUERIN,

VAN Sary, SIN Sokchenda, UONG Savana,还有普瑞克蒙，巴空和彭池等村参加工作的60位工人;我也向大吴哥计划的下列成员表示感谢: Roland FLETCHER, Dan PENNY, Mike BARBETTI, Damian EVANS, Ian JONHSON, HENG Than, KHIEU Chan, TOUS Somaneath, Terry LUSTIG, Andrew WILSON, Matti KUMMU。

参 考 文 献

BATY, Pierre, BOLLE, Annie, CHEA, Socheat, *et al.*, *Extension de l'aéroport de Siem Reap 2004. Rapport de fouille archéologique*(暹粒机场的扩建:考古发掘报告), APSARA-INRAP, 2005.

DAGENS, Bruno, *Angkor, la forêt de pierre*(吴哥:石林), Paris, Gallimard, 1989.

EVANS, Damian, *Pixels, Ponds and People : Urban Form at Angkor from Radar Imaging*(从雷达图像看吴哥的城市形式), thesis of Bachelor of Arts degre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Sydney (悉尼大学考古系), 2002.

FLETCHER Roland, POTTIER, Christophe, "The Gossamer City: a new inquiry" (蛛网一般的城市:新的调查), *Museum International*, 213 -214, May 2002, UNESCO, Paris, 2002, p. 23 -27.

GAUCHER, Jacques,《Angkor Thom, une utopie réalisée》(吴哥城,一个实现了的乌托邦?), *Arts Asiatiques*, 59, 2004, p. 58 -86.

GROSLIER, Bernard-Philippe,《Nouvelles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à Angkor》(在吴哥进行的新的考古研究), *Comptes Rendu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Séance de l'année 1959*(1959 年度金石与美文学院的报告), Paris, C. Klincksieck, 1960, p. 337 -389.

GROSLIER, Bernard-Philippe, "Our knowledge of Khmer civilization a re-appraisal"(我们对于高棉文明的再评估),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48 (1), 1960, p. 1 -28.

GROSLIER, Bernard-Philippe,《Agriculture et religion dans l'Empire angkorien》(吴哥王国之中的农业与宗教), *Etudes rurales*, 53 -54 -55 -56, 1974, p. 95 -117.

GROSLIER, Bernard-Philippe,《La cité hydraulique angkorienne : Exploitation ou surexploitation du sol》(吴哥水利之城:对土地的开发还是过度开发?)

BEFEO, 66, 1979, p. 161 - 202.

GROSLIER, Bernard-Philippe, "Introduction to the Ceramics Wares of Angkor"(吴哥陶瓷制品介绍), in *Khmer ceramic, 9th - 14th Century*(9—14 世纪高棉陶瓷), Singapore, Ed. Southeast Asian Ceramic Society, Diana Stock Ed., 1981, p. 9 - 39.

GROSLIER, Bernard-Philippe, "For a Geographic History of Cambodia"(柬埔寨地理历史概述), *Seksa Khmer*, 8 - 9, 1985 - 1986, p. 31 - 76.

GROSLIER, Bernard-Philippe, *Mélanges sur l'Archéologie du Cambodge* textes réunis par Jacques Dumarçay(柬埔寨考古学论丛,由 Jacques Dumarçay 收集整理), Paris, Réimpressions de l'EFEO 10, 1997.

LUNET de LAJONQUIERE, Etienne, *Inventaire descriptif des monuments du Cambodge*(柬埔寨古建筑描述性统计清单), Cartes(地图)1—*Carte archéologique de l'ancien Cambodge*(古代柬埔寨考古地图) 2—*Carte du groupe d'Angkor*(吴哥遗址群图), par Buat et Ducret, Publ. de l'EFEO, Paris, Ernest Leroux, 1911.

HIGHAM, Charles, *The archaeology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from 10,000 B. C. to the Fall of Angkor*(从公元前一万年至吴哥倾覆之间的东南亚大陆考古),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LOMBARD, Denys,《Pour une histoire des villes du Sud-Est asiatique》(东南亚城市历史简述), *Annales. Économie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Paris, Armand Colin, 1970, p. 842 - 856.

PENNY, Dan, POTTIER, Christophe, FLETCHER, Roland, BARBETTI, Mike, FINK, David, HUA, Quan,《A palynological record of vegetation and land - use change from Angkor-Hariharalaya》(从孢粉学记录看吴哥—诃里诃罗洛耶的植被和土地使用的变化,出版中), *Antiquity*, Hawaï, sous presse.

POTTIER, Christophe (préparés par), DUMARÇAY, Jacques (introduction de), *Documents topographiques de la Conservation des monuments d'Angkor*(吴哥古建筑保护的地形学资料), *MEFEO* 21, 1993.

POTTIER, Christophe, *Préparation d'une carte archéologique de la région d'Angkor*(绘制吴哥地区考古地图的准备工作), Mémoire de DEA, Sorbonne Nouvelle, Paris III, dactylographié, 1993.

POTTIER, Christophe, 《Notes sur le Bakong et son implantation》(巴空寺及其附近区域小记), *BEFEO* 83, 1996, p. 318 – 326.

POTTIER, Christophe, 《Élaboration d'une carte archéologique de la région d'Angkor》(绘制一张吴哥地区考古地图), P. – Y. Manguin ed.,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 vol. I, 1994 (1998), Leiden, p. 179 – 194.

POTTIER, Christophe, *Carte archéologique de la région d'Angkor-Zone Sud*(吴哥地区考古地图:南部), Thèse de Doctorat, Sorbonne Nouvelle, Paris III, 1999, 3 vol.

POTTIER, Christophe, 《À la recherche de Goloupura》(寻找郭鲁柏之城), *Mélanges du Centenaire de l'EFEO*, *BEFEO* 87, vol. 1, 2000, p. 79 – 107.

POTTIER, Christophe(a), "Some evidence of an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hydraulic features and rice field patterns at Angkor during ancient times"(古代吴哥水利特征与稻田形状之间的内在关系之明证), *The Journal of Sophia Asian Studies*, 2001, 18, p. 99 – 119.

POTTIER, Christophe, (b).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EFEO with respect to the cultural heritage at Angkor during the past 100 years"(在过去的一百年间法国远东学院对于吴哥文化遗产的尊重及贡献), *The Journal of Sophia Asian Studies*, 2001, 18, p. 253 – 262.

POTTIER, Christophe, 《Travaux de recherche récents dans la région d'Angkor》(吴哥地区最新研究著述), *Comptes Rendu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1er fasc., séance du 14 mars 2003, Paris, p. 17 – 39.

POTTIER, Christophe, LUJAN-LUNSFORD, Rodolfo, 《De brique et de grès. Précisions sur les tours en brique de Preah Kô》(用砖石和砂岩:神牛寺砖塔详论), *BEFEO* 92, 2006.

POTTIER, Christophe, 《Angkor et ses cartes》(吴哥及其地图), B. Dagens & H. Chambert-Loir éds, *Volume d'hommage à Jacques Dumarçay*, Paris, à paraître.

STERN, Philippe, 《Diversité et rythme des fondations royales khmères》(高棉王家建筑的时代与差异), BEFEO 47, 1954, p. 649 – 687.

文字记载与考古发现
——阿莱西亚遗址给我们的启示

列德(Michel REDDÉ) 著
孙建民 译

公元前52年发生的阿莱西亚之战一般被认为是法国历史的奠基事件;作战一方是恺撒(César)以及罗马军团,另一方是韦辛格托里克斯(Vercingétorix,下文简称韦辛格)及其高卢(Gaulois)诸部联军。后者的战败使高卢地区(今法国)被纳入罗马帝国,同时也被施之以拉丁文化,而今天的法国人仍是这一文化的继承者。这种观点出自19世纪的编年史研究,其旨在重建现代法国的国家根基;这就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会围绕这次战役地点的确定问题展开了争论,因为这不仅仅牵扯到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虽然遗址地点早就为人所知,但是考古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却与惟一的传世文献,即恺撒本人写的那部文献(译者:指《高卢战记》)不相吻合。在向罗马元老院进行了战况汇报以后,在尖锐的权力争夺的背景之下,恺撒写了这本书;其实,在军队的支持下攻占高卢之际,恺撒作为罗马的大贵族之一,正在谋图篡夺共和国的政权,《战记》明显就是其政治宣传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他也是最伟大的拉丁语作家之一,其文辞之精纯,可与其政治、军事才华相媲美;其作品之神圣也就不言而喻了。从这一点来看,阿莱西亚(Alésia)对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课题;既有文献资料,又有考古实据,由此,我们可以对这部事后才编写成的文献与考古的实地发现之间的差异,进行一番研究。

首先简要回顾一下史实。恺撒率领着十来个罗马军团来征服一个国家,这是为了罗马的利益,也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他是从公元前58年起踏上高卢的,而在此前半个多世纪已经开始受到来自意大利方面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影响。

高卢很富庶,但处于分裂状态;各部族独立自治且常常争斗。其共同之处是拥有灿烂的文化却没有任何统一的政治实体。恺撒依赖着他的诸多高卢同盟,连续进攻并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并未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公元前53—前52年冬,在阿维纳(Arverne,即今欧维涅地区 Auvergne)贵族(译者:即指韦辛格)的领导下,高卢各部落的总联盟形成了,高卢起兵造反了。恺撒在吉尔高(Gergovie,即今克莱蒙费朗 Clermont-Ferrand)把韦辛格的高卢军队围困在一座城里,但却无法攻下它。

恺撒解除包围圈北上(图1),与其部将拉比努斯(Labienus)在塞农人(Sénons)那里(今日的桑斯[Sens]地区)会师。面对高卢的全面抵抗,恺撒遭到战略性失败,只能别无选择地向罗马占领区,即今天的普罗旺斯(Provence)撤退。恺撒在书中写道,"为了轻而易举地援救它(译者:它即指普罗旺斯)";这话骗不了谁,谁都知道他当时处于什么境况之中。在这场名副其实的退败中,占领着沙奥纳(Saône)谷地的艾端人(Héduens,在今欧屯[Autun]地区)新叛恺撒,而且不让罗马军队由此经过。这位罗马的首席执政官别无他法,只好试图取道东行,穿过塞卡纳人(Séquanes)的领地(今贝桑松 Besançon)。到了蓝宫(Lingon,今朗葛 Langres)地区的南部某地,罗马军队又被韦辛格截住,只好仓促应战。可是,战场风云变幻莫测,恺撒的日耳曼骑兵击败了高卢骑兵,迫使韦辛格撤退到附近的堡垒——阿莱西亚,进行坚守。

恺撒的记载

恺撒对该地点以及为了攻占该地他所进行的战地工事构筑工程,是用了如下这样的词语来描述的。

69 - 阿莱西亚这个地点本身,处于一座陡峭的山丘的顶部;这使它易守难攻,除了对其加以围困外,别无他法将它攻下。山丘脚下,两边都有河水流过。其前面是一片开阔地,延伸出去长约三千步。其他各边,距离该地不远处,有与该山丘等高的其他山丘环绕四周。朝东的一边,高地之下完全被高卢兵占据着;他们还在面前挖了一道战壕,并用石块垒起一道高达六尺的防护墙。罗马人的战地工事的营建在一个周长为一万步的包围圈上展开。其军营安扎在地形有利之处,23座小型的堡垒,也都建在地形有利之处。这些堡垒白日驻有守军,以防被围者突然冲出;夜间派有哨兵及加强卫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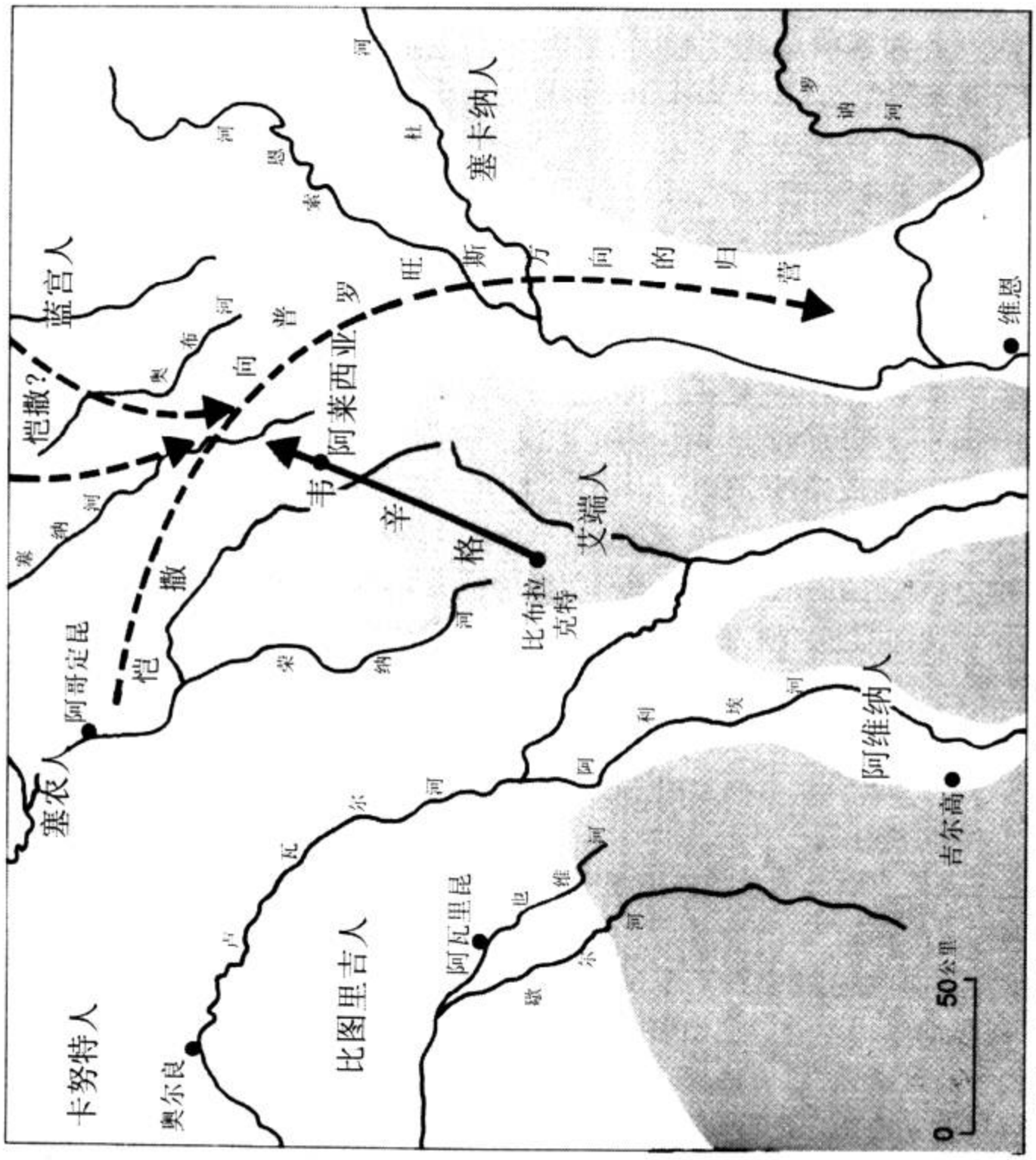


图1 公元前52年罗马军队在高卢行动路线总图（录自 C. Goudineau, *César et la Gaule*[恺撒与高卢], Paris, 1990）

70－战地工事的构筑开始以后，双方骑兵在开阔地上交锋过一次。上文已经提到了这片开阔地，这是一片山间的平地，有三千步长。双方作战都异常激烈。恺撒派出日耳曼（Germains）兵援救我方处于困境中的人马；而把诸军团在阵营前面摆开，以防敌人步兵的突然袭击。军团的援助鼓起了我军战士的士气：被打败的敌人由于人数众多而自相妨碍；也因为他们自己只留了很窄的出口，所以被挤成了一团。日耳曼兵猛追不舍，一直到城墙下，一通大杀。有的战士还从马上下来，并试图越过战壕和防护墙。恺撒把阵前的大军再向前推进了一点。城中的高卢军已经大乱，他们认为我军已经兵临城下，大叫着“拿起武器”；有的惊恐不堪，在城中乱窜。韦辛格下令关闭城门，以免城中人马跑空。在杀死了很多敌兵，缴获了很多马匹之后，日耳曼兵才撤了下来。

71－韦辛格决定让所有的骑兵在罗马军完成合围工事以前乘黑夜冲出去。他交给这些人的任务是，回到各自的本部，把所有能够拿起武器年龄的男人都集合起来。他讲了为了大家自己所做的一切，并和他们一起宣誓，让大家要为他的安全着想，不要在敌人的酷刑之下出卖他，因为为了大家的自由他已经做出了很多。他又说，如果他们不忠的话，那么八万精英就会和他殉难于此。经他计算，只剩下够吃三十天的小麦；但如能合理分配的话，还能坚持更长一些时间。对骑兵们作了如此的讲话后，他就让他们悄悄出发了；次日凌晨，从我军阵地还未合拢的间隙中逃了出去。韦辛格命令把所有的小麦都交归他管；并宣布不从命者杀无赦。他把曼都他人（Mandubiens）聚集的大量牲畜分配给每个人，并把小麦一点一点地、精打细算地分到每个人手里。他又把本来在第一线作战的部队调进了城中。通过这些措施，他等待着高卢救兵，把战争进行下去。

72－从逃兵及战俘那里获得信息后，恺撒便着手进行各种不同的防御工事的营建工作。他规划出一种战壕，宽度为20步，坑壁竖直，从而使坑道的底部与坑口等宽。然后，在这道战壕后面400步处再营建其他各种工事。他的意图是这样的，因为需要防守的空间是如此广阔，把士兵排布在整个战线上去防御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他采用了挖战壕之法来阻挡敌人；无论敌人夜里对我们的工事进行大规模地冲击，还是在白日里用弓箭投枪攻击我们的工程兵，这样一来都能达到防御的目的。留出这个空档以后，他又规划出两道宽度和深度均为15步的战壕；在内侧的一道战壕中，他又引来河水，把壕沟在平原及地势低平的地段都灌满了水。在这些战壕的后面筑起了一道土木结构的高达12步的城墙；其上附加栏杆、垛墙；在垛墙和城墙主体的接合部，还插上带叉的树枝，以减慢敌

人爬墙的速度。在城墙边上，环绕城墙每隔 80 步建一座碉楼。

73 – 我们同时要寻找物资材料，因为既要保障小麦的储备，还要营建规模如此庞大的工事。但是由于一部分部队远离军营从事生产劳动，因而我们的员额减少了；高卢军还从他们的据点中，经由不同的城门疯狂地冲杀出来，不时地试图攻击我军的防御工事。所以恺撒认为还应该加强工事的营建，最终达到以较少的兵力来防守阵地的目的。因此我们伐木砍树，把树干和粗壮的树枝去皮并将一端削尖；然后挖一条深 5 步的沟，再把削尖的树干树枝插进去，而且把它们从基部捆扎成一体，这是为了它们不至于很容易被连根拔出来。只把它们的尖端露出地表以外。这样如法炮制共安插了五排，而且把它们交叉连接在一起。进入这种区域的人是会被尖利的木桩戳死的。我们把这种设置称作“桩”(*cippes*)。再往前，我们在地面上斜向挖洞，并使它们每五个成为一组，排列成一洞居中，四洞环绕的构图。洞深 3 步，且随深度的增加逐渐变细。在洞中插入像大腿那么粗的木桩。露出地面的一端已被削尖，并用火烧，使之炭化坚硬。它们露出地面的长度只有四指高。为了加固它们，还把洞底填土打实，厚达 1 步。然后，又在其上覆以树枝、荆棘，加以伪装。这种设置我们一共安插了八排，排间距为 3 步。由于这种尖桩安插得像百合花，因此我们称之为“百合花”(lis)。再往前，我们把带着铁钩子的一尺长的桩子埋入土中，密集排列，间距甚小。我们把这种装置叫做“小针刺”(*aiguillons*)。

74 – 工程结束后，恺撒又根据地势，尽可能合理地来规划与第一道防线相似的另一道防御工事，其周长达一万四千步；这道防线转向反面，是为了应付外来之敌的。这是为了在他远离的情况下，使敌人即便是在为数众多的时候，也无法包抄我军镇守在工事的军兵。为了不至于狼狈地逃离阵地，他命令所有的人积攒够三十天吃用的粮草……

83 – 高卢军两次被挡了回去，损失惨重。他们便开始考虑他们应该做什么了。他们于是求助于了解这个地方的人；这些人给他们讲了我军在各个山丘上的位置及部署情况。北边有一座山丘，是我军防线中没有完全控制的一个地方；这是因为这个山丘范围太大的原因。我军只好在不是十分有利的缓坡上安营扎寨。这里驻守的是安提斯提乌斯(C. Antistius Reginus)和卡尼乌斯(C. Caninius Rebilus)二位特使率领的两个军团。

考 古 发 掘

能够确认阿莱西亚的地点多亏了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该地点位于蒙巴尔(Montbard)东南的阿丽丝·圣王后(Alise-Sainte-Reine)山丘上。其发现来自一个传统的说法,并为一段高卢语的长篇铭文所证实;其中清楚地写道,在罗马帝国时期,这个高卢—罗马村镇名叫阿里西亚(Alisiia,图 2)。1861 年,拿

图 2 高卢语铭文,最后一行提及阿里西亚(Alisiia)

破仑三世命令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当时的发掘方法是运用窄长的探沟来观察剖面。一旦发现一条阵线的痕迹,就马上移动到近旁几米处如法炮制。用这种方法总共花了五年时间,对整个遗址进行了密集发掘。如果发现了遗物,就顺着探沟的方向清理一段。凭借这种技术,也就是当时的发掘方法,只能搞清楚那些规模较大的坑状遗迹现象。除非是在极其侥幸的情况下,才会发现有关的小型建筑遗迹,诸如碉楼等等,不然的话,很难发现。最近,我们才得到当时留下来的发掘平、剖面图,以及当时发掘中的有关信件。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发现,拿破仑三

世当时在《恺撒历史》(*Histoire de Jules César*)中所发表的图版和当时的原始考古资料是有出入的;而前者在很长时期里一直是惟一可资参考的文献。当时的发掘者以恺撒的记载为依据,找出了两道近圆形的、包围着阿莱西亚的阵线;第一道阵圈周长15公里,朝向被围的城垒,目的是堵住被围困者逃出的各条去路。这道阵圈被称作"包围圈",第二道阵圈周长20.7公里,朝向外部,是用来对付援军的,称作"打援圈"。

自1861年至1991年,这里再也没有进行过任何大规模的发掘工作。1991年,文化部决定重开对该遗址的大规模发掘,这也是对该遗址进行整治的总体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考古工作由法德工作队联合承担(德方是法兰克福的日耳曼—罗马文化研究所 *Römisch-Germanische Kommission*)。这次发掘的宗旨是彻底校正人们已有的关于恺撒围城工事问题的看法。这便可使我们对照一下恺撒的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实据,重新审视我们在军事考古及物质文化考古方面的某些认识。

地　　形(图3)

恺撒的描述是简短而平庸的,这也表现在他的用词上。他仅仅满足于罗列出主要地形单元:中央,是一座陡峭的山丘,两道水流环绕其旁。在这座山丘周围,有一圈与其等高的山丘,而且与之相去不远。一边有一片冲积平原,这很明显应该是上文提到的那两条河流的交汇之处。而阿丽丝(Alise)山这个地方的情况正好与这一记载相吻合。与记载不同的是,蒙欧克苏瓦山丘(Mont-Auxois)有悬崖峭壁,特别是它的东南面。如果按照通常的译法,把 *flumen* 一词译成法文中的"河"一词;这会让人觉得,用 *flumen* 来描述那两条很小的河流,即欧丝河(Oze)和欧丝罕河(Ozerain),显得言过其实了。出现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在拉丁语中,所有的河流不分大小,一概用 *flumen* 一词来表达。

蒙欧克苏瓦山与其周围的丘陵的平均距离为1.2公里,即蒙欧克苏瓦山脚至周围丘陵基部的距离。在实地明显可以看出,它们面面相对,相去不远。它们都与阿丽丝山顶基本等高;阿丽丝山最高点为407米,营地A点高408米,C点401米,B点425米,等等,这里就举这几个例子。有人对蒙欧克苏瓦山的高度持有异议:从山谷到山顶的海拔150米,但其平均距离则有800米,这不论对搞地理的还是对搞军事的来说,都是个严重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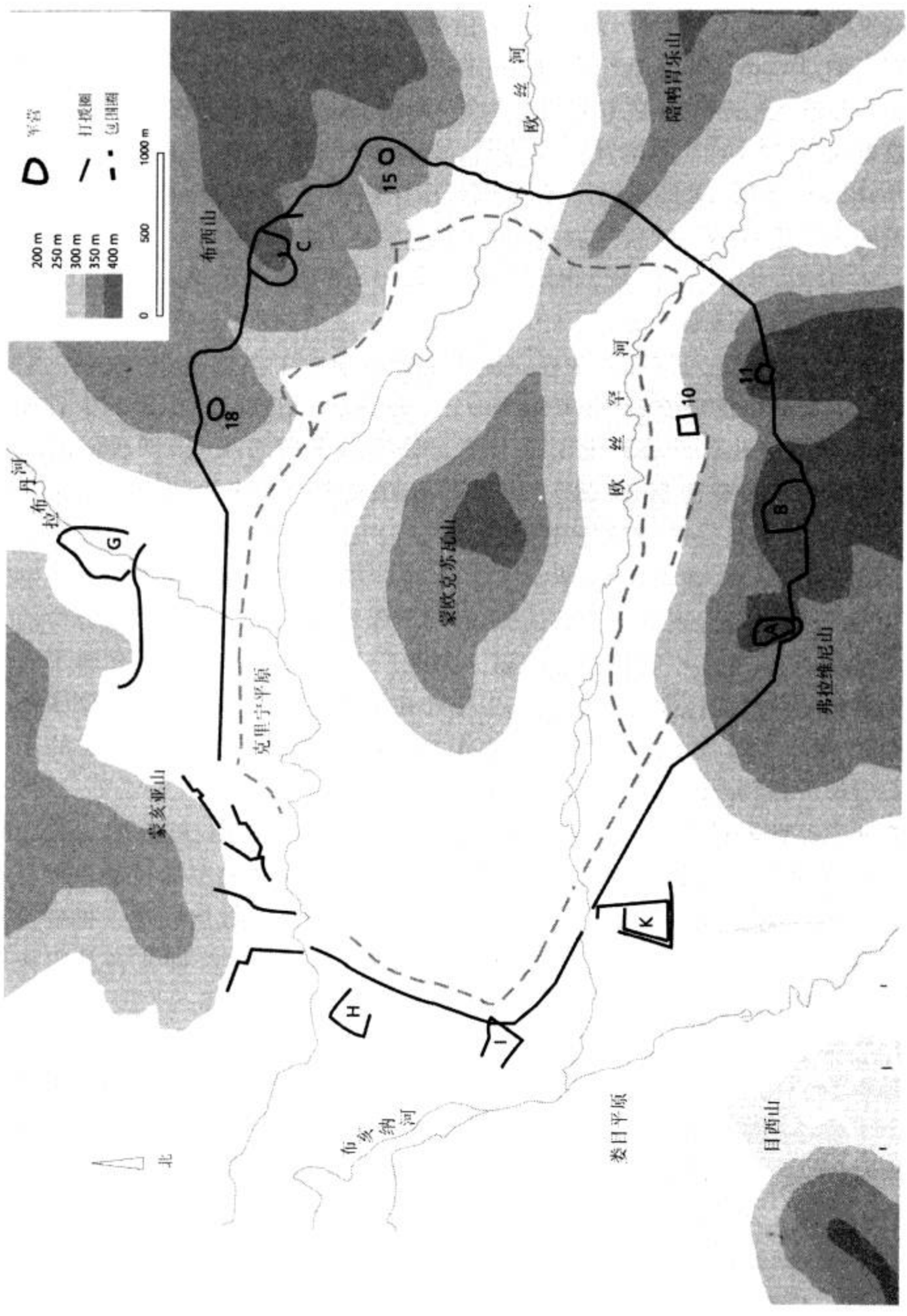


图 3 围绕阿莱西亚的罗马军事设施示意图（Reddé 绘制）

这里的确存在一片平原，位于西边，由欧丝河与欧丝罕河的汇流以及另一条叫做布亥纳（Brenne）的河流冲积而成。布亥纳河从两排丘陵中间流过，然后朝向西北的蒙巴尔（Montbard）方向流去。根据我们在平原上所处位置的不同，对它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测量方法。在娄目（Laumes）一带，它逐渐展宽；而到克里农（Grignon）一带时又明显变窄。若从阿丽丝山或者曼塞山（Mincey）脚下（即布亥纳河的开口处）来看，这块平原的长度可达4.5公里，宽度可达2.5—3公里。这一空间范围的大小正好与恺撒所记载的4000步的说法相符合，罗马时期的4000步约合现在的4.4公里。

剩下的问题是北边的那座山丘。关于这座山引发了很多争论；拿破仑三世把它断定为记载中的蒙亥亚山（Mont Réa）。如果我们从阿丽丝山顶的中心来观察，会发现蒙亥亚山位于其西北方向。但是如果挪到营地A点，即我们所确认出来的恺撒当时的观察点（这里是一个能够俯瞰整个娄目平原的地点），来观察的话，可发现蒙亥亚山的方位是340°，也就是说几乎是正北方向。如果从娄目平原上的罗马军的阵地里来看，蒙亥亚山的确是在正北方向。另外需要提出的是，拉丁语只是笼统地表达正方位的概念，而不重视正方位之间的其他方位的表达，这是拉丁语表达上不够精当的缺陷。在拉丁语中，北方一词同时包含了西北和东北的含义在内。恺撒通过这么一个短小的叙述，把这里的地形的总体情况讲清楚了；对不了解这个地方，而眼前又无地图可查的读者来说，其简洁的用辞绝对是足够了，足以让人们去想像当时当地的阵势。

文献中提到了罗马军未能完全控制蒙亥亚山的具体原因，就是因为此山范围太大，而且这里的山坡地形不利；这一条记载对弄清楚罗马军的行动是很有意义的。事实上，此山是这里惟一的一座北坡平缓的山丘，谁被包围在这里处境都是不利的。阿丽丝山周围的其他山丘，都不难据守；唯独此处，即便占领山头的制高点也没有大用，因为这里的防御面太宽了。

总之，恺撒的记载中没有一点是与蒙欧克苏瓦山及其周围的地形相抵触的。这并不是说该文献的记载就其本身而言，此处或他处，对地理位置的记载是非常详尽的。而是因为这一记载完美地体现了一位作者的意图：即使读者明白，却不进入琐碎的细节的艺术，否则的话，其风格就不够优雅。对没有地图的读者来说（更何况那个时代也没有地图），能够抓住文章的要旨即可；需要让读者知道的是，阿莱西亚这样一个地方，由于地形原因，不可能直接冲上去占领它；但它是围困敌人的理想地点。这种战术是为人熟知的。布景一旦搭好，好戏就可以开场了。

阵　线

恺撒在其书中肯定地写道，他所营建的战地防御工事由一道城墙、两道壕沟以及三种陷阱组成；内外两道防线皆是如此。经过考古发掘，今天看来这种说法完全值得推敲。在实地发掘中，不同地段的发现完全不同；在同一地段内，一道防线和另一道防线的差异也很大。这种不同有时体现在所使用材料的不同上，材料皆就地取材，或用石块，或用草皮，或用墙垒、木栅栏；有时则因地形的不同而不同：平地的防御要比高地的防御艰难得多，高地的危险性要小得多；有时则是因为想变换一下防御工事的式样，以便迷惑敌人。在许多情况下，实地考古观察都是很困难的，这是因为古今人们的开垦、耕作把细微的遗迹现象都破坏掉了；也因为出土的小遗迹现象，在被揭露出来的瞬间里，是很难与其周围的填土堆积相区分的。对恺撒的大军根据围城策略所进行过的各种工事的营建活动，我们只能通过一个发掘概况登记表加以展现了。

地点	包围圈				打援圈			
	防护墙材质	碉楼间距	壕沟数量	防御类型	防护墙材质	碉楼间距	壕沟数量	防御类型
娄目平原	草	15 米	3	桩和小针刺	草	17 米	2	小针刺或百合花
克里宁平原	草	15 米	1 或 2	百合花或桩	草	17 米	1	桩
欧丝河谷	石	?	1	桩	XXX	XXX	XXX	XXX
欧丝罕河谷	?	?	?	?	XXX	XXX	XXX	XXX
布西山	XXX	XXX	XXX	XXX	石	+60 米	1	桩
弗拉维尼山	XXX	XXX	XXX	XXX	?	?	1—2	?

有趣的是，在娄目一带的平原上，通过航拍照片和实地发掘，都发现有三道壕沟（图 4）；而拿破仑三世的考古学家们当时也发现了第三道壕沟的存在，可是他们却视而不见，因为他们觉得这与文献记载不符，以至于最后根本没有加以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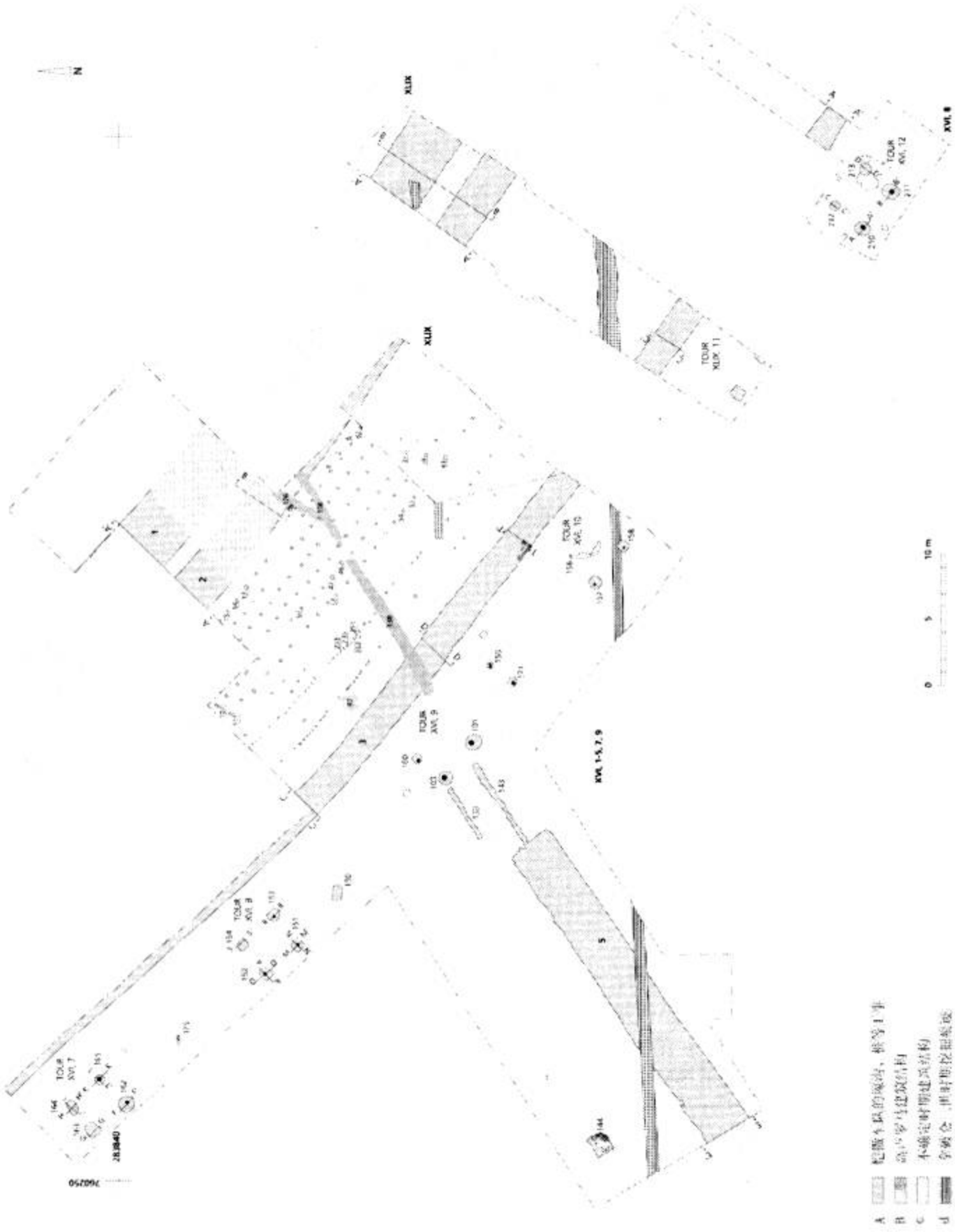


图 4 德国考古队在姜目平原的发掘：找到前后三条壕沟，以及在第三条壕沟之前的陷阱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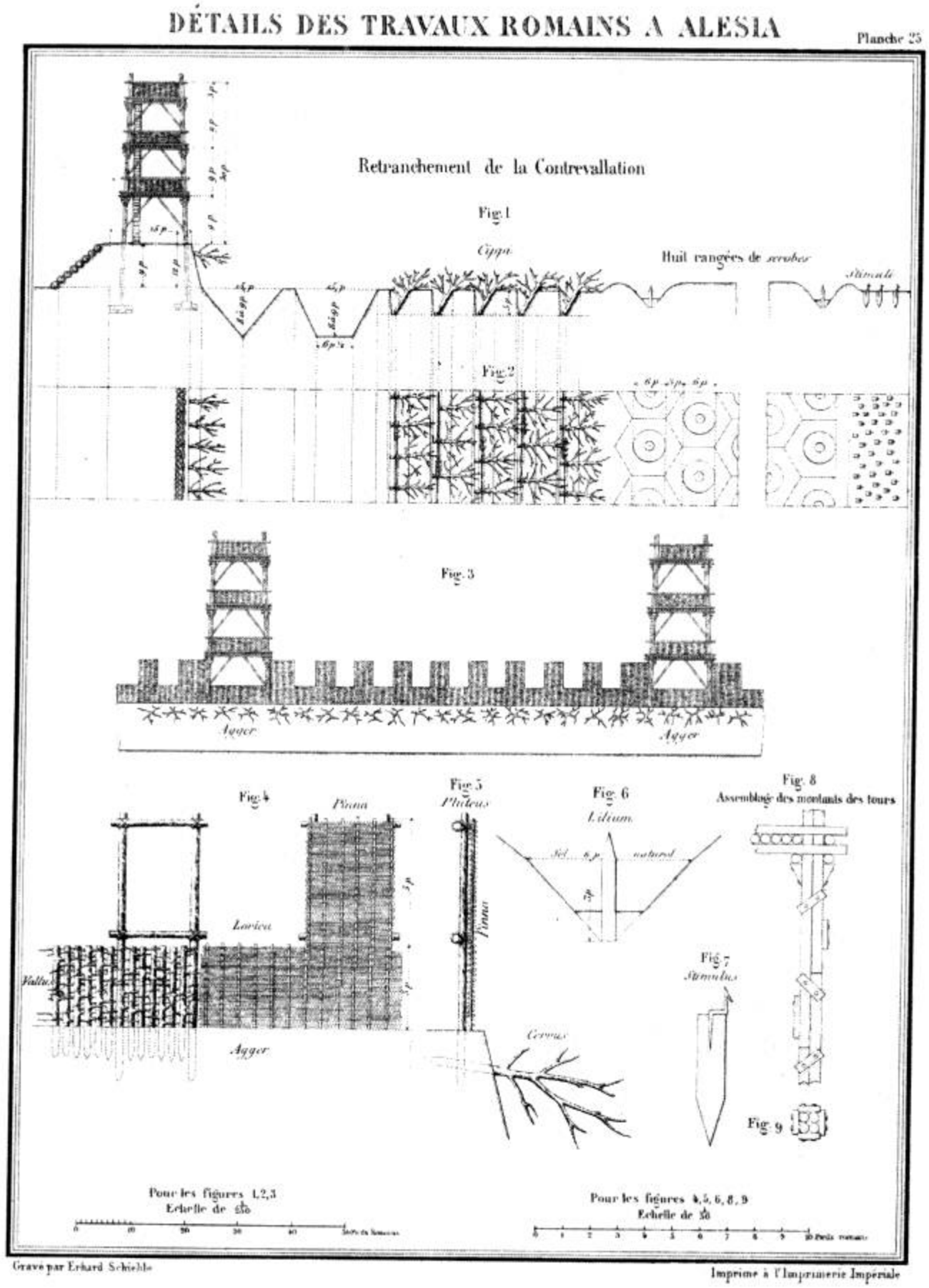


图5　根据恺撒著作对罗马军队前线的绘图再现(拿破仑三世在19世纪出版的地图,第二十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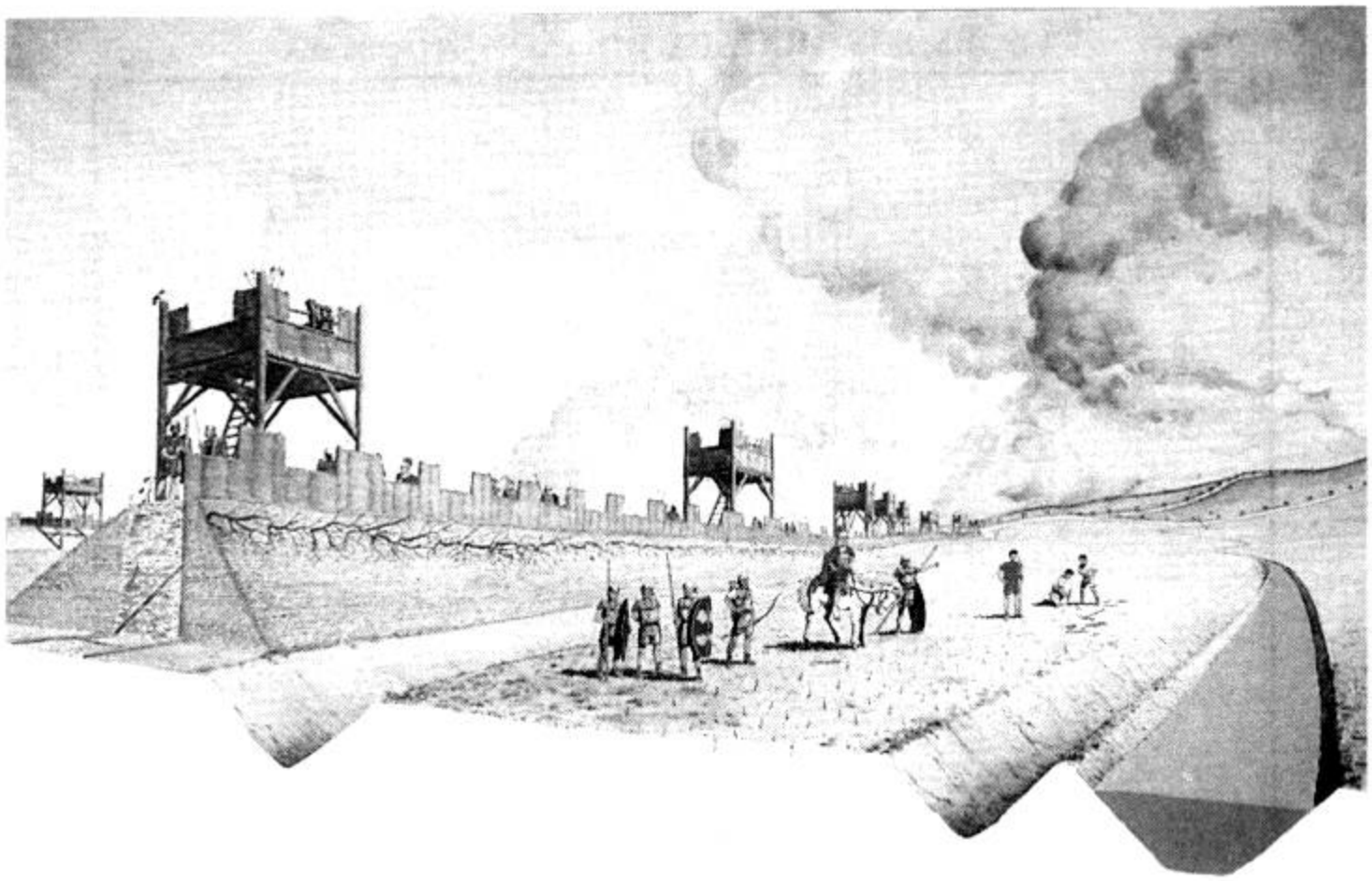


图6 根据最近的发掘绘制的水彩画，重现了罗马军队的包围圈(J.-P. Adam, CNRS)。我们可见其与图5的区别

19世纪提出的对遗址布局的认识，在历史、考古著作中一直抄袭沿用，而这种认识完全是以恺撒的记载为依据的(图5)，它与今天我们获知的考古发现差距很大(图6)。这样我们便对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之间的差异有了把握，并对恺撒记史的手法以及他那众所推崇的名著予以反思。从二者的差异中，我们可以产生如下几种分析思考。

1. 阿莱西亚并不在我们所确认的这个地点。这种想法只是少数非专家人士的意见；其主要根据是：该遗址的情况与恺撒的记载有差异，所以该地点不可信；文献是神圣无误的，因为是恺撒本人所著，他不可能说谎，文中讲述皆属事实。对这些人来说，文献就是科学研究之母。

我们应该看到，阿丽丝这个地方古时曾叫阿莱西亚，而且是一个惟一发现有实实在在的罗马时期的战地工事的遗址。遗址的年代也无庸置疑，为公元前1世纪中叶；遗物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大量的武器被发现，有高卢人的，也有罗马人的。还发现了带有恺撒的大将拉比努斯名字刻记的投掷弹。况且，没有任何其他遗址能给我们提供如此全面的考古材料。

2. 恺撒并非捏造故事，但却作了些手脚。首席执政官本人明显不是在写一份考古报告。我们不应该忘记历史客观性与准确性的古今价值观有所不同。与恺撒同时代的著名作家西塞罗(Cicéron)不是曾经讲过吗，历史就是"口才"的一种最好的表现，他无论如何要能让读者为之感动，要用尽所有的修辞手法，让他们为之倾倒、流泪。尽管这与恺撒对历史的概念不尽相同，而恺撒的描写至少不是为了像某个领导班子的工作报告(或者一个考古报告)那样，来作详尽的记述，而是为了人们了解事件的大体经过。从这个层次上讲，恺撒的记载要比我们冗长的、枯燥的分析讨论要有价值得多；它完美地阐明了战役指挥官千方百计想让人们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为了夺取敌人据点他所作的精心部署，以及围城计策的高明，从而获得了胜利；而恺撒正是取得这一胜利的总设计师。这完全是一部自我宣扬的作品。

3. 恺撒是用一种文学、军事学"经典"的模式来记述这次包围战的。我们不妨把恺撒在阿莱西亚的作战意图与西皮翁(Scipion)在奴芒斯(Numance)之战中的战略思想对比一下。奴芒斯之战比阿莱西亚之战早发生一个多世纪(图7)，是罗马人和西班牙人长期而艰苦卓绝的战争中的一次战役。罗马派出最优秀的将军西皮翁前往，把敌人包围在了奴芒斯，即当地人的都城，在今天的索里亚(Soria)省境内。这个地方与阿莱西亚的情况极为相似：中央是被围困的城垒，周围有与之等高的山丘环绕。这些山丘上都已驻扎了罗马军队。下边是冲积平原，必须布下连绵的阵线把守才行。根据前人早已运用过的，也是很多书中都记载过的战术，西皮翁构筑了一圈防御工事，把敌人团团围住，切断了敌人的所有去路和军需给养。敌人最终因饥饿被困死城中。这两次战役的主要经过是完全相同的。从这一点来看，恺撒只是抄袭了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来吹捧名将西皮翁这位公认的政治、军事家的楷模。通过这一含蓄的对比，恺撒也抬高了自己，表明了自己对权力的欲望。恺撒，能像西皮翁一样，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能够运用兵法的妙旨围城歼敌，且毫无差错。这正与其政敌对他的指责恰恰相反。这其中也体现出罗马当时流行的一种文风，这就是，能做到经引据典才是文采高雅的体现，同时还能表现出一种对传统的尊重。

所以说，文献记载与考古实地发现在细节上出现差距，这并不奇怪。恺撒的记载中没有任何一条能够否定对遗址地点的确认；在很多方面，文献学与考古学研究是和谐一致的，尽管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细节上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是可以用文献的功能的不同加以解释的；这一文献不是"发掘报告"，而是一个具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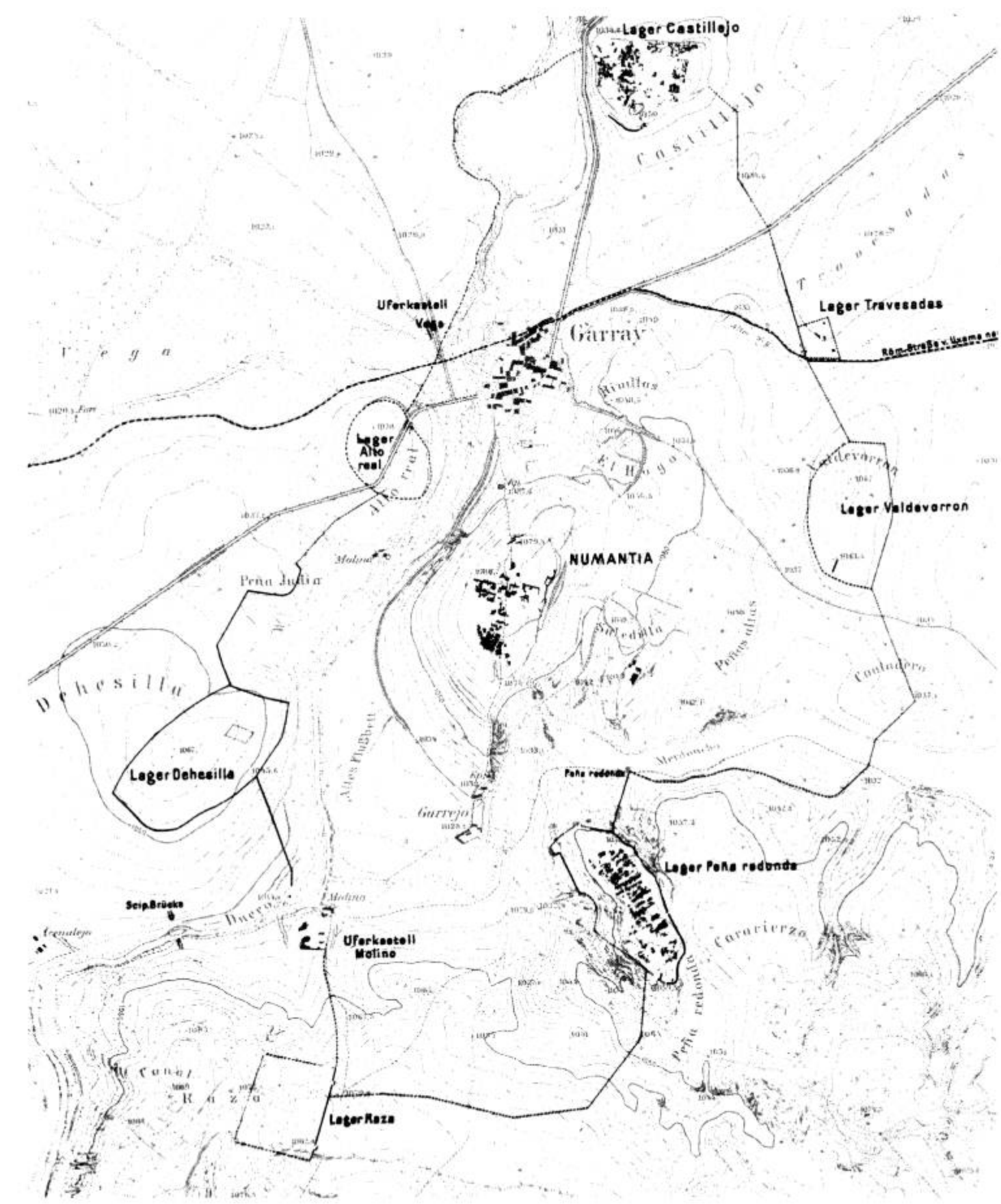


图7 西班牙奴芒斯被围图,根据 A. Schulten 图(20 世纪初德国考古发掘)

文学性的作品，是出于政治宣传目的而写作的。其主要意图不是描写，而是展示，向远离实地，不了解当地情况的读者进行说明。所以，这一写作自然是简明扼要的。

本文的研究主要想说明的是，在专业研究中，我们要持有等同的批判精神，对所有各种不同资料要加以分析和思考，资料有时难免会出现差异。

本文是2001年4月6日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行的“历史、考古与社会”中法学术系列讲座第29讲的讲稿。

法国远东学院

在东南亚的部分考古工作简介

柬埔寨考古遗址统计及其居住地域的分析[1]

布吉耶(Bruno BRUGUIER) 著
吴旻 译

早在十年前重新进驻柬埔寨之时,法国远东学院就开始着手进行一项庞大的计划,统计当地的考古遗址。这项计划是建立在对这个国家开放前景的信任之上。它将为柬埔寨政府管理其世所罕见的考古遗产提供有力的工具。因为尽管已有很多关于高棉地区的重要考古研究,但是人们对其整体的考古遗产还是知之甚少。同时该计划也将给科学界提供一个目前最全面的以电脑技术处理的有关古代人居区域分布的资料。

该计划分为相继进行而又互为补充的三个阶段,即文本研究、实地考察和分析。目前该计划已经进行到第二个阶段之末,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一个移交给柬埔寨政府的过渡阶段,继而展开的是对四年的勘查中取得的讯息进行分析的阶段。

一 文本研究

文本研究是从 1991 年开始的。首先开展的是对法国远东学院保存的有关柬埔寨的档案的利用和整理,继而是将柬埔寨有关的考古文献编写索引,之后再将之录入到一个与地理信息系统相连的数据库中。建立数据库的主要目的是将一些偏远和不为人知的遗址的资料汇集起来,这些资料又来自不同的历史时代;同时该系统还在对这些遗址进行实地绘图或研究,定出它们的确切位置并给予简单描述。

上述信息已编辑成一部 *Bibliographie du Cambodge ancien*(古代柬埔寨文献书目)[2] 付梓出版,这部两卷本的著作不仅收录了有关古代高棉世界的所有书

目，而且也成为整个考古遗址统计的基础。

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之上，我们向文化部提出着手建立一个柬埔寨考古遗址的图像统计。该统计将汇集几代研究者收集到的各种信息（如图像资料、不同遗址的铭文和雕像统计）。

二 实地考察

在对档案预先进行了充分研究之后，法国远东学院在柬埔寨文化艺术部建立起一个海外中心。该中心开展的工作就是根据对地面的勘测，创建出考古单元，在随时受到盗掘威胁的考古遗址上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并将留在原位随时有被盗危险的物品立即拍摄下来。

根据计划的第一个阶段收集到的资料，我们开展了一些勘测活动。这些活动的目的首先是对一些遗址进行定位，因为我们对这些遗址都还只有相对模糊的信息；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这些活动也帮助我们验证并补充有关建筑物的描述，并且画出草图。这些勘测活动的基础则是一个遗址的地理坐标的记录（该记录是根据卫星图片建立起来的），以及一个所有已经勘察遗址的图片库。

我们本来预计只有2000个遗址，然而根据实地考察收集到的资料、地名学研究、航拍照片的查验以及对地方行政机构档案的查阅，都使得遗址数目大幅增加，目前已统计到近4000个。虽然那2000个以前未发现的遗址一般都只是土丘，已经没有什么看得到的遗迹，但是它们却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人居在地域中的分布状况。然而在柬埔寨北部，这些“新”遗址里却包括有神殿、庙宇、古老的桥梁以及其他建筑，它们都散布在偏远的森林里，从未被研究者和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发现。

结合档案材料中的信息，我们对那些最为重要的遗址进行了系统地不断地巡查，从而使得对它们的重新描述成为可能，并且也使得以一种近乎系统的方式描绘出柬埔寨主要的建筑遗址成为可能。在这一方面，航拍照片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我们由此可以绘出整体图，更好地勾勒出庙宇及与其相关的周边设施（护城河、小路、水池）之间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辨认出连接起老挝的“山寺”（Vat Phu）与吴哥遗址的北部小路的痕迹。

在进行这项遗址确认工作的同时，另一项针对柬埔寨铭文的研究计划也在进行中，后者将遗址重新置于其历史及宗教背景之下，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它们的

认识[3]。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确认遗址的工作应该在数月之后即告完成，接下来的工作应该是将获得的资料归类和更新。这一工作应该可以将柬埔寨整个遗址状况的最新资料提供给不同的政府机构，而这些机构都参与了各种不同的遗产考古计划。柬埔寨文化部因此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部门，该部门不仅负责录入有关新发现遗址的资料，而且负责提供在保护遗产方面一切必要的信息，防止因违章建筑和艺术品的走私活动而带来的损失。除了纯粹意义上的考古工作之外，这个统计部门也关注其他时代的文化遗产（如修道院、殖民时代或是近代的建筑等）。

三　对高棉历史发展各时期之分析

目前有一些著作已经成为我们分析高棉历史发展各个时期的基础，它们从各省角度出发，使我们能更好地全面认识古代柬埔寨的考古遗产，例如正在出版中的一套《地区考古指南》[4]。这套著作以专论的形式集中了不同古建筑的资料，涉及题铭学、艺术史或建筑等各个方面，试图将每一处遗址都尽可能地还原到其原有的历史及宗教背景之下；此外，借助地图学和航拍照片，它们也将被研究的遗址还原到其古环境当中（道路、桥梁、城墙等……）。书中有一些特殊的说明，为我们讨论其中主要的建筑类型，或是选择一些独特的研究课题提供方便（如双语铭文的研究、古代城市、“宫殿”等……）。最后，书中对于每一处遗址的介绍，还可以让人了解进入它们的可能性（例如在柬埔寨北部要进入遗址通常是很困难的），了解已经融入到佛塔之中的古建筑，以及对它们保护的情况。

除了这套面向一般读者的普及读物之外，我们同时也预备编辑一部有关次要遗址的数字化汇编，让人们可以按照地区查找所有已经统计的遗址。它同时提供了一张考古地图及每处遗址的相关技术数据（地点、平面图、描述等），给研究柬埔寨历史的人士以及制定国土整治计划的负责人带来方便。除了这些可在网上查询的讯息之外，我们还将增加图片，以便能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和发展计划的框架中衡量其重要性。

在出版这两套著作的同时，我们记录下来的资料也成为古代柬埔寨建筑类型学和年代学分析的基础。按照专题的分类，以及遗址的密集程度在地区分布上及一些特殊的背景（如靠近河流、驿道）上的体现等信息，也成为我们对于古

代高棉历史发展研究的基础。而将标明考古遗址密集程度的地图与今天的人居分布图相对照,则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掌握从史初时代至今高棉地区人居活动在地域分布上的规律及其移民的动向。

〔注 释〕

1 计划协调者:Phann Nady 先生,文化部——法国远东学院;学术负责人:布吉耶(Bruno Bruguier)先生。

2 Bruno Bruguier, *Bibliographie du Cambodge ancien* (2 vol.)(古代柬埔寨书目[2册]), Paris, EFEO, 1998 - 1999, p. 340, 370.

3 *Corpus des Inscriptions Khmères*(高棉铭文汇编 - CIK),这一研究计划由巴黎高等试验学院的 Gerdi Gerschheimer 主持,gerdig@ efeo. fr

4 这套书籍包括以下著作:Phnom Penh et les provinces méridionales(金边及南部省份);Le bassin du Tonle Sap et Sambor Prei Kuk(洞里萨盆地及三波坡雷古);Banteay Chhmar et les provinces occidentales(班泰克马及西部省份);Kompong Cham et le bassin du Mékong(磅湛及湄公河盆地);Koh Ker et Preah Vihear-Les provinces septentrionales(扣可与博威夏:东部省份);Autour d'Angkor(吴哥附近)。

吴哥区域整治中的法柬联合考古工作

博悌叶(Christophe POTTIER) 著
吴旻 译

吴哥文明可说是标准的“农田之城”,无论在它的城市化上,还是在它的庙宇建筑上,或是在它的土地整治上,这一点都有所体现;而这一点也体现在吴哥地区考古计划的指导思想上。自1993年开始的这一计划也是对格罗里耶(Bernard-Philippe Groslier)工作的承继——他的工作过早地被打断了,罪魁祸首则是那些使柬埔寨直到前些年还被孤立在国际社会之外的各种事件。该计划的目的在于通过地貌学、环境学和历史学对吴哥地区人居的研究,从勘查中获取新的资料,用以完善人们对于吴哥文明的认识。

我们现有的文献极为丰富,但却极不一致,这项研究的第一步是在核查文献的基础之上,对整个地区进行了密集的遥感测量以及系统检验,其成果就是在1999年完成了方圆600平方公里吴哥地区直至洞里萨(Tonle Sap)湖的系统而详尽的考古地图。在这张地图上集中了500余个考古遗址,其中约三分之二都是以前从未公开的,几乎遍布整个研究地区。它为更好地理解吴哥城建立以前的城市现象,以及确立其领土扩张的年代表提供了基础,而吴哥的领土扩张是与其先后建立的都城紧密联系的。

这项研究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种“平面”(*horizontale*)的方法,即以更完备的方法论和更新的技术手段继续1992—1999年间已经进行的研究,对吴哥这一超级大城进行研究。目前在吴哥地区这一方面的研究由吴哥地区保护与整理局(APSARA)、法国远东学院和悉尼大学合作进行。该研究采用以新的雷达图像为标准的系统遥感测量、对土地的系统检测和航测、钻孔探测以及古环境学研究等方法,旨在推动整个吴哥地区考古地图学的发展和该地区的空间及环境分析。这种“平面”研究方法的基础仍是深入的勘测,因为至少要将

空间分析和地层发掘所得到的信息相比照，才能确定其假设之有效性。其二，一种“垂直”(*verticale*)研究方法，作为对“平面”研究方法的补充。吴哥区域整治中的法柬联合考古工作(MAFKATA)采取的主要是这种方法。

这次联合考古除了旨在帮助培训柬埔寨考古学者之外，其主要目标则在对作为地域问题关键的几个遗址作“垂直”研究。仅仅着手发掘这几个遗址，而研究的整体地域却有3000平方公里之大，这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似乎调查范围的宽广性和发掘范围相对有限性之间比例失当，然而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

一方面，我们通过在吴哥南部地区数目有限的几个遗址进行的发掘和钻孔探测，目的就是寻找一些因素，能够用来衡量，或是肯定和确立在“平面”研究中建立起来的地域假设。我们通过总体的空间分析选定了一些遗址作为发掘点，它们可能是土地整治的代表性阶段，可能是人居时期，也可能是在土地整治发展历史中的中断时期。由于整个吴哥遗址非常宽阔广大，因此我们涉及到的只能是一系列的点，但是我们认为选取的点都特别具有代表性，因为其选择的合理性都依据不同标准经过了反复分析论证。

另一方面，我们从1970年以前完成的工作中可以看出吴哥南部地区的遗址具有独一无二的年代复杂性，因为人类在此居住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而在9—15世纪间，高棉吴哥王朝又相继建都于此，人居过程几乎没有间断。国际考古学界目前也正在对吴哥时期的一些重要建筑时期进行研究，但是对此前的时期却知之甚少，尽管它是理解自9世纪末开始发展起来的土地整治体系之创建与来源的关键。而我们的考古发掘针对的就是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为“前吴哥时期”，人们认为这一时期出现的代表着最初人居城市理念及其土地整治都在其后的吴哥王国得到延续。“前吴哥时期”历时很长，在这一时期里最早有建立在史初时代遗址上的前吴哥时期的建筑，最晚则有9世纪出现的吴哥城及其发展起来的系统土地整治工程。实际上，我们选择的发掘点也间接地涉及到这一时期之后的土地问题，例如11世纪的水利整治，或是一直延续到12世纪的城市形式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吴哥地区的遗址都是时代混杂的产物，而对于早期遗址的研究也为如何理解区分其他各个时期提供了帮助。

自2000年起，我们对5处遗址(其中有两处此前从未发掘过)进行了三次发掘。这5处遗址分别为瓦克那(Vat Khnat)，克塔仙(Kôk Ta Sien)，普瑞克蒙(Prei Khmeng)，克普诺(Kôk Phnœu)和阿约(Ak Yum)，均位于西人工湖地区[1]，被认为是前吴哥时期人居以及之后的土地整治的代表。在已经进行钻探勘

测的这些遗址之上，考古队对明确属于前吴哥时期庙宇的各种遗迹进行了研究，同时仍继续对其周边及环境进行系统钻探，目的在于找寻出其组织形式。一方面我们在瓦克那、阿约和克塔仙等地采集到许多有关建筑结构的信息，而在克塔仙则发现一座前吴哥时期的神殿和引人注目的建筑物的沉积；另一方面在普瑞克蒙和克普诺附近我们则发现了不同地层里家庭人居的很多状况。上述发现也就间接地证实在那些最接近神殿的地方没有人居这一现象。在提交给法国外交部考古委员会的报告中，我们介绍了已完成的考古工作的种种细节，并提交了有关人居状况和土地情况的结论，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已经钻探的遗址。在此我们仅介绍新的结论中的主要方面。

例如，在普瑞克蒙发现的第一座史初时代的墓地，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最早的居址层层叠加的壮观景象，这也是早期建筑设施一直延续使用至关键的“印度教化”时期的一个绝好实例。这里的人居从铁器时代末年直到婆罗门教的庙宇建立，中间没有任何中断。但是伴随着婆罗门教庙宇的建立，无论是葬仪还是周围人居的空间组织形式，好像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普瑞克蒙似乎是一处很有前景的遗址，未来的研究者肯定可以进一步确定这些变化的形式。在这一遗址上，还集中了大量从未发现过的物品，它们见证了从公元初年直到吴哥时期，这一最初居址之中的人居状况、物质文化以及丧葬与宗教仪式。由于目前我们对于高棉陶瓷的有限认识都集中在吴哥的釉瓷之上，而这里发现的瓷器从这个角度来看也非常有意义，因为它们建立起了一个主要由前吴哥时期的陶器组成的整体。考古队已经对这些物品进行了科学研究，目的是建立起它们的类型年代学，以便日后为其他正在研究的遗址提供参照体系。

在其他遗址上所进行的钻探结果可能没有如此壮观，但它们都有助于确定某些问题，并且为预先提出的区域方面的假设带来某些肯定的因素，特别是我们通过空间分析认为可以将前吴哥时期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一假设。同样，通过瓦克那，克塔仙和克普诺等地所做的钻探，我们应该可以确定前吴哥时期的城市设施带有一种开放的形式，这一点与公认的成见，即城市都是在带有防御性质的护城河下紧闭的概念相去甚远。最后，这些钻探对于掌握吴哥时期在西人工湖地区建立起来的庞大的水利网络对这一地区的环境产生的巨大改变也很有帮助。

在写作本文之时，我们正在罗洛士地区（Roluos）的彭池（Prasat Trapéang Phong）和巴空（Bakong）附近完成新一轮的钻探，希望能够从中追寻直到在巴空

附近出现第一座吴哥城市之时，各个设施的组织方式之同步发展情况。这一新的区域与西人工湖地区相距30多公里，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有关吴哥地区最初人居情况和来源的研究，因此我们在那里所作的钻探目的是获取更多的材料，做出比较，并将这些信息重新置于一个更大的时空背景之下。

吴哥区域整治中的法柬联合考古工作(2000年始)

领导人：博悌叶，法国远东学院；

主要成员：盖兰(Alexandrine Guérin)，东方与地中海之家(Maison de l'Orient et de la Méditerranée)；罗丕(Eric Llopis)，巴惕(Pierre Bâty)及博乐(Annie Bolle)，法国国立预防考古研究所(INRAP)；德梅特(Fabrice Demeter)，法兰西学院古人类学和史前史实验室(Laboratoire de Paléoanthropologie et Préhistoire du Collège de France)；Heng Than, Khieu Chan 及 Im Sokrithy，吴哥地区保护与整理局(APSARA)；

参与单位：吴哥地区保护与整理局(APSARA)；法国远东学院(EFEO)；大吴哥计划(GAP- Greater Angkor Project)，悉尼大学；麦金道士第四纪断代中心(NWG Macintosh Centre for Quaternary Dating)，悉尼大学；骨骼考古学研究组(ORG-Osteoarchaeology Research Group)，国立新加坡大学医院。

〔注 释〕

1 这种人工湖在柬埔寨文中被称为"baray"，它挖掘不深，但由很高的堤坝围起，呈长方形，宽2公里，长4—8公里不等。还有另外一种形式的水池，柬文称为"trapéang"，它亦呈长方形，挖掘较深，但面积相对较小，一般边长不超过600米。——译者注

参考文献

FLETCHER, Roland et POTTIER, Christophe, "The Gossamer City: a new inquiry"(蛛网一般的城市：新的调查), *Museum International*, 213 - 214, May 2002, UNESCO, Paris, p. 23 - 27.

FLETCHER, Roland, BARBETTI, Mike, SOKRITHV, Im, PENNY, Dan, POTTIER, Christophe, "Redefining Angkor: structure and ecology in the largest, low density urban complex of the pre-industrial world"(重新界定吴哥：前工业时

代的大型低密度城市组成中的结构和生态），*UDAYA* n°4，APSARA，2003，Phnom Penh.

POTTIER，Christophe，“Mapping Angkor：for a new appraisal of the Angkor region”（绘制吴哥地图：对吴哥地区的新评估），*Space applications for heritage conservation*，European Space University，2002，Noordwijk，Publ. Electronique.

POTTIER，Christophe，《Résultats préliminaires des fouilles dans trois sites pré－angkoriens de la région d'Angkor》（吴哥地区三个前吴哥时期遗址发掘的初步成果），*UDAYA* n°2，APSARA，2002，Phnom Penh，p. 117－132.

POTTIER，Christophe，《Travaux de recherche récents dans la région d'Angkor》（吴哥地区最新研究著述），*Comptes Rendu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1er fasc.，séance du 14 mars 2003，Paris，p. 17－39.

重修吴哥巴方寺计划

若耶尔(Pascal ROYÈRE) 著
吴旻 译

在数个世纪的时间里,巴方寺一直都是古代柬埔寨最大的宗教建筑之一,它位于古王城吴哥的中心地带,王宫的南边。它有着金字塔型结构,三层高大建筑的每一层都环绕着回廊,根据索达城(Sdok Kak Thom)的铭文记载,这座供奉林迦(Linga)的山形庙宇始建于11世纪(Coedès, 1943)。在吴哥城的城墙和5座巨大的城门修建起来的那个世纪之前,它可能是这座吴哥城市修建时的主要中心建筑之一(图1)。

这座庙宇在随后的数个世纪里继续施展着它的魅力,到了16世纪左右,在巴方寺雕塑出了柬埔寨最大的佛像之一[1]。这尊佛像与其说是圆雕像,还不如说是大型浮雕,它的雕琢无疑是对吴哥庙宇进行的最伟大的再利用工程之一。

自1995年开始,在法国外交部的资助之下,与吴哥地区保护与清理局(APSARA)合作[2],一个重修巴方寺的重要计划交给了法国远东学院实施。这一计划是在国际吴哥保护活动的框架中进行的,由保护吴哥国际协调委员会[3]统一调配。

巴方寺的发现和价值体现

这一计划的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初。1908年,人们开始组织进行一些工作,其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四处生长的植物不断覆盖外围院墙和三层金字塔,因为这些植物已经使人们无法辨认寺庙的主要形状。临时修建的排水系统又补充了以上工作,为的就是减少填筑土芯被渗透的危险。但是如此之多的努力却未能持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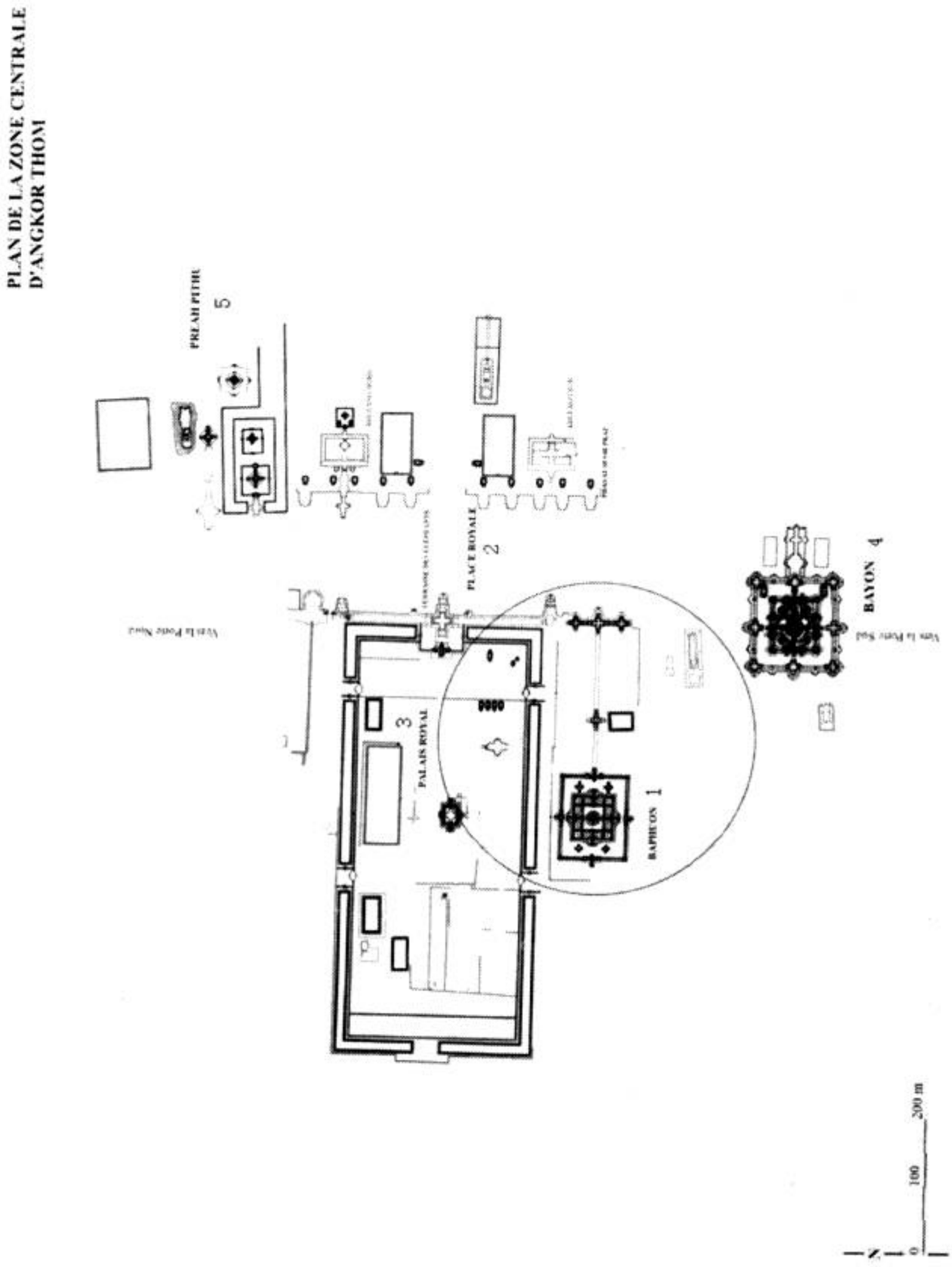


图 1 遗址全图（取自 Dumarçay,1988，图 LIV 及图 LV）

图2　20世纪20年代巴方寺状况(法国远东学院档案图第01662号)

自 1918 年开始，相继发生了一系列塌陷，尤其是第二层东南角的角楼倒塌了一半（图 2）。如果说在此之前，这座建筑物时常发生的破坏还是局部的或是规模不大的，那么到了 1943 年，则是第二层、第三层北墙的东半部分全部坍塌到第一层的平台之上。随着滑坡，上述两层地基上的整个砖石结构全部荡然无存。三年之后，人们还在发生塌方的地方进行加固，但新的同类事故又发生了，这一次是包括东面楼梯的南部填土的第三层上部墙体的坍塌。作为预防措施，一部分已经松散的砖砌结构被拆除，以便在原有的位置将外墙考古复原（*anastylose*）。但是 1952 年 10 月的报告中揭示了加固工作的悲惨命运：这项长期的工作由于填土被不断推动，加之吴哥地区遭遇了一个暴雨成灾的雨季而毁于一旦。

一项矛盾的大型计划

正是由于最后的这次事件使得人们产生了新思路，为解决巴方寺的诸多特殊问题开辟了新道路。从 1958 年开始，吴哥文物保护委员会制定了在文物建筑周围整治的计划，以便实现整个建筑的考古复原。从 1960 年开始，这一工地成为吴哥文物保护委员会最重要的工程。

工程持续了 10 年，直到 1970 年发生的政治事件使得文物保护的负责人被迫停止了正在进行中的活动，而只是采取了一些临时性的保护措施[4]。在过去的十年间，倒塌的部分已经被清理，拆建的工作在逐步进行，建筑的东面部分的一半已经被拆下。经过漫长战争之后的国家重建，也使得这些工作一直停滞到 1995 年。

1995 年工程重新开始，却是困难重重，非常棘手，一方面是由于工程停顿的 23 年间[5] 一部分原有构件的失散，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拆除砖石结构的原始记录的失踪。

从严格的文物保护的角度来看，只有第一层的结构以及第二、第三层整个西部的外立面还保持着它们的原始形态。在北面和南面的外立面上，都只剩一堆杂乱的坍塌的石头，我们看到在少数填土垒成的斜面上，残留着原来用作保护的红色泥质砂岩砌面（图 3）。

重修的问题仍然延续了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的工作，但是一个保护西墙佛像（图 4）的计划的确立，却为这项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革新。

在这里提醒一下，巴方寺的主要建筑缺陷有如下几点：

1. 支撑物的不恰当尺寸；

图3 巴方寺东面全览

图4 佛像西面数码模型图

2. 第三层过高；

3. 缺少排水设施；

4. 某些砖石构建过程的缺陷。

固定金字塔的三层

考古复原的方法，就是用其原有部分将一座废墟重新搭建起来，这也是我们采用的各种方法的基础。既考虑到要重新复原其古代的建筑结构，又担心如果不采取使之稳定的改善措施会对建筑本身不利，最后人们采取了在原有建筑结构内部加入钢筋混凝土构件，以改善人们所发现的其本身结构上的缺陷，而外面覆盖以砂岩砌面以保持其原有形态。

在完成这些改建所必需的时间里，每一块存放在场地的石块都被编号登记，以便可以按照原有配置一部分一部分地将全部墙基重建起来。当那些用于支持被认为是不完善的地基的支撑物被安放好之后，依据上述登记资料，我们将原有的砖石结构重修起来，并且将用于加固的支撑物隐蔽起来。这样，在内部连接各个部分的配重梁完成之后，地面建筑就可以按照其原样及原有规模重建起来，只是仍留有一些残孔，尤其是那些为了修建卧佛而取出石块留下的痕迹。

西部立面上佛像的重修（图 4）

如果仔细观察西部的砌面以及北部和南部的凸出角，我们可以肯定用来修建佛像的所有石块都是从原来的巴方寺上拆下来，并被重新利用起来的。很可能由于巴方寺本身当时已经部分倾颓，它原有的砖石就这样被重新利用了，但采用这种再利用方式之时，文化背景已经转换了。

这种情况还见诸其它位置：

1. 第二层回廊的北翼

目前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有高起的建筑朝向内院的回廊部分，以及一部分屋顶的拱脊。我们注意到为了避免这堵墙体的下陷，修建者采取了以极不规律的方式将重新利用的砂岩填回门窗洞之中。

但是这种方法并未运用到整个回廊上。这样，与西北角的角楼相接的几米之外，面向第二层内院的墙体就在一块巨大的砂岩之下消失了，这一块岩石实际上就是佛像头的后半部分。如此一来，这座角楼就被完全遮蔽了，无论从哪个角度，在外面都看不见它。

2. 第二层回廊的南翼

这里的问题则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我们看到整个回廊都是可以出入的，只是

北面的部分，与西山门（瞿布罗，Gopura，图5）的侧厅相连的部分，由于有佛像的砖石构造而受到部分限制。事实上，朝向外方的最后五排门窗洞都用碎的岩块堵住，而外墙的砌面也以佛像的腿为支撑用砖石遮盖起来。

图5 东面底部两层的山门

再往南去，佛像浮雕就与回廊以及西南角的角楼的遗迹分离开来。

对巴方寺的两种历史状况的考量

只要看到在巴方寺有着相隔如此久远的两种建筑活动同时存在，我们就不能不对这座建筑整体给与特殊的关注。我们的重修计划将既考虑到这种历史的巧合，又通过所采用的合适的复原技术将它们的价值同时体现出来作为目标。

在重修计划之中，我们应用了如下的几条原则：

1. 复原上的选择性

这座建筑一方面是11世纪的山形庙宇，而另一方面则是巨大的佛像，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建筑表现形式，如何体现出它们的价值则要依靠复原者的合理措置。因此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实施一个保护古建筑的计划，既要考虑到三层庙

宇本身的稳定性问题，又要保存其晚期改造，因为这种晚期改造将寺庙的西面整个改变为一座巨大佛像，这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种特殊遗产（彩图21）。

2. 建筑上的必须性

由于承受着整个第三层的庞大体积，第二层的墙基已是岌岌可危，加之佛教建筑师开凿了浮雕像，使得墙基垂直面上的重量超出，也使得西面墙的问题更为严重。

经我们调整过的复原技术就要兼顾到上述两点，即设计出一种方案，既能够加固和稳定11世纪的墙基，又能建立起合适的基础以便支撑起凿出佛像的大型石块带来的超重。

为了减轻佛像给墙基带来的压力，同时也使得人们既可以进入竖立在二层平台上的建筑物（楼阁、回廊及角楼），又保存了佛像，整理的工作将在佛像的背后进行。

因此，我们只准备修缮雕像的外部琢面，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回收佛像内部的石料，而且目的有二：首先是不容忽视地减轻了，其次也是重新分配了这座后修的建筑对于第二层产生的垂直方向的过大压力。

第二步，根据摆放在地上和未拆下的石块的统计，我们将使得因为佛像修建而被拆卸一空的第一层获得新生。

佛像体内原有的砂岩将被一种红色泥质砂岩替代，它将填满佛像表面与目前被隐藏的11世纪的层面之间的空隙。

在佛像的上半部分（特别是其表面的北半部分），我们将注意将这种填充的形状做成斜面，以便清空回廊，方便未来的参观者进入巴方寺。

前　　景

本计划刚刚庆祝过工地重开（1995）十周年。与法国远东学院古代柬埔寨研究小组的研究项目相结合[6]，这一计划也建立有一个非常先进的研究古代建筑技术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验室。

今天对于砖石结构的重修集中在金字塔的第三层，并且可以大致重现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中记载的13世纪末他途经此地所看到“铜塔”的景象（见Pelliot，1902）。目前这一计划结束之后，这座建筑文物最初的原貌还是无法恢复，原因是16世纪的大型佛教改造活动已经使它的一部分完全消失。但是目前

正在进行的整治工作却可以再现 11 世纪时湿婆神庙的大致建筑轮廓，并欣赏到后吴哥时代修建的佛像的伟大不朽。

〔注 释〕

1 值得指出的是巴肯山(Phnom Bakheng)在同一时代，可能也以同样的方式重新修整，一尊坐佛被放置在山顶的 9 世纪的庙宇中。

2 这一活动是在优先援助基金(Fonds de Solidarité Prioritaire)的计划框架下进行的，计划延续到 2008 年 12 月。吴哥地区保护与清理局是负责暹粒地区整个吴哥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的柬埔寨政府机构。

3 1993 年东京会议上成立的国际委员会。这一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由柬埔寨、日本和法国联合主持，目的是检查和跟踪有关吴哥文化遗产的整体计划。

4 1970 年 6 月，在吴哥地区进行的战斗使得最初的计划被迫放弃，特别是在第二层和第三层继续进行的墙基支撑物的修建。

5 我们主要想到的是由于战争的原因使得工作第一次被迫中断之后不久，发生在 1970 年雨季的那一次滑坡，它使得北部外立面的一半都坍塌了(RCA, 08/1970)。

6 这些研究是在法国远东学院一个称为“从寺庙时空到地域整治”的计划之下进行的。这些研究的成果发表在一系列介绍这一修复现场的文章之中，参见附录书目。

参 考 文 献

CŒDÈS, George, DUPONT, Pierre, 《Les stèles de Sdok Kak Thom, Phnom Sandak et Prah Vihar》(Sdok Kak Thom, Phnom Sandak 和 Prah Vihar 的碑), *BEFEO 43*, 1943, Hanoi, p. 56 – 154 (rééd. 1992, *Articles sur le Pays Khmer* [关于高棉国的文章], vol. 2, réimpressions de l'EFEO, textes réunis par Claude Jacques, Paris, p. 167 – 265).

DUMARÇAY, Jacques, *Documents graphiques de la Conservation d'Angkor, 1963—1973*(吴哥保护的图像文件——1963 年至 1973 年), Paris, MEFEO, 18, 1988.

EFEO, *Rapports de la Conservation d'Angkor*(吴哥保护报告), Siemreap, de 1908 à 1972, documents manuscrits et dactylographiés.

PELLIOT, Paul, 《Mémoire sur les coutumes du Cambodge de Tchéou Ta Kouan》(周达观《真腊风土记》), *BEFEO*, 2 (2), 1902, Hanoi, p. 123 – 177.

ROYÈRE, Pascal,《Programme de restauration du Bapùon : Mise au jour d'une canalisation monumentale aux abords du monument》(巴方重修计划:围绕建筑物的庞大排水系统之发现), *BEFEO*, 85, 1988, p. 406 – 413.

ROYÈRE, Pascal,《Programme de restauration du Bapùon : À propos d'une occupation tardive du monument》(巴方重修计划:关于建筑物的晚期人居), *Arts Asiatiques*, tome 54, 1999, p. 153 – 158.

ROYÈRE, Pascal, (en collaboration avec J. DUMARÇAY), *Cambodian Architecture Eight to thirteenth Centuries*(8 至 13 世纪的柬埔寨建筑),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 Smithies, Handbook of Oriental Studies, Section 3, Brill, Leiden, Boston, Cologne, 2001.

ROYÈRE, Pascal, *Histoire architecturale du Baphuon*(巴方的建筑史), Université de Paris III, Thèse de Doctorat dactylographiée, Bruno Dagens dir., Paris, 2002, 2 vol.

ROYÈRE, Pascal,《Programme de restauration du Baphuon: À propos de l'insertion de blocs de grès》(巴方重修计划:关于大块砂岩的使用), *Udaya*, *Journal of Khmer studies*, 2002, vol. 3.

ROYÈRE, Pascal,《Histoire architecturale du Baphuon: éléments d'une nouvelle chronologie》(巴方的建筑史——建立起一个新的编年史的部件), *BEFEO*, 91, 2005,(即将出版).

越南古皇城考古——遗址发掘与清理

帕潘(Philippe PAPIN) 著
吴旻 译

2003 年 9 月越南新的议会大厦动工之时,发现了位于河内市中心的昇龙(Thang-Long)古皇城遗迹。施工立刻停止,越南社会科学院所属的考古研究所立即就此展开一项大型的历史考古研究,该机构的活动与越南文化部遗产保护署有着密切的合作。发掘现场由考古所副所长 Tong Trung Tin 领导。

由于越南方面表达了与法国远东学院合作的意向,双方也早有学术及人员方面的密切关系,因此法国远东学院傅飞岚院长制定了一项包括学术研究草案和合作人员构成的完整合作计划,该计划交由高等实验学院(索邦)教授帕潘(Philippe Papin)主持。自 2006 年起,法国远东学院河内中心研究员哈迪(Andrew Hardy)将继续主持该计划(参见附录作者、译者联系方式表)。

学 术 意 义

这一发掘现场有两项独特之处。其一为遗迹的高度集中,因为 13 个世纪的历史都"压缩"在一个厚度不到 5 米的地层中。我们将井沿作为基准高度,可以清楚辨认出公元 7 世纪开始修建的以中国要塞的名字命名的"大罗(Dai-La)"时期的地层;之后相继有李朝、陈朝、黎朝和阮朝的堆积,最后还有 19 世纪末法国军队完成的水利设施。如此的密度是极为罕见的,它对我们的发掘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正是由于遗迹的集中,亦可见该遗址人居时间很长,这也是它的第二项独特之处。亚洲的古老遗址并不罕见,但是这一遗址的意义在于它反映出了时间如此之长的历史:就在这里,在几个公顷的土地上,从 9 世纪至今,这里一直是政治权力中心。

由于该遗址遗物的高度集中和人居时间的漫长，相对于其他遗址而言，考古和历史在研究中的联系就更加紧密。考古发掘和历史解读由这两门学科的研究者同步进行，更不用说还有建筑学家、陶瓷学家和文物保护专家的加盟支持（图1）。

图1　修复遗物现场

计划的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考古发掘，总占地约5公顷。该工作完全由越南考古研究所的人员完成。遗址的外围A和B已经发掘完毕，占地约2公顷，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是对外围D的发掘。在最重要的遗迹之上修建了临时的防护棚之后，由于人们恐怕遗址有可能被恶劣天气损害，其负责人正在将该遗址的大部分置于防护棚之下——这一部分日后可能会被改造成某种“遗址博物馆”（图2）。

第二个方面：历史研究。该研究的实施又可分为4点：1. 对出土文物，尤其是李朝和陈朝的陶瓷器（11—14世纪）编订系统目录。2. 创立起一个考古学文

图2 发掘现场总览

献中心，不仅针对亚洲，也针对世界其他地区，主要包括对原始文献的复制（古代舆图、航拍照片和专著等）。3. 对古城墙和机巧的引水和排水系统进行的研究。4. 对于代表中央政权的宫殿官署，以及越南王朝在9世纪至17世纪之间所设立的纪念性地点和其他标志所作的地形学研究。

第三个方面：对于遗址的保护和将之“博物馆化”。这一方面取决于越南政府最终的决定。而目前的理念是这样的：在地形学背景之下介绍考古遗址，并利用这一机会非常具体地展示考古工作的性质、各地层的堆积、物品被发掘的形式，以及如何以一种整体的形式来开展遗址的清理，这种清理并不局限于展出遗物，而是将发掘现场本身转变为博物馆的陈列对象。日后，以这一小片遗址为基础将会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河内市历史与考古博物馆”，并且将这片遗址特意融入到周边城市脉络当中。

历史简述

公元9世纪，越南从中国控制之下独立出来，李朝的第一个统治者将都城建立在原有的中国总督府城之上，亦即现在的河内，并将这个城市命名为“昇龙”

(Thang-Long)。之后年复一年,建起了宫殿,又建起了第一道城墙(*Long thành*)——再以后它又成为分割宫城和皇城的内城墙。

越南建设者利用了当地的自然条件与地形特征,这一遗址被水面所包围,有湖泊、池塘和水道。最初的河内就位于湖泊当中。因此,水便作为土地整治的一个因素,成为不同建筑成分的组织原则,这也是为什么在这座越南古城中找不到严格的建筑对称性的原因,而在许多其他亚洲城市中这种对称性是作为建设主导思想的。在这里,宫殿沿河修筑,而庄园则建在湖边的陡岸上(图3)。考古工作正是要重现古代的轮廓,并且深究它随时代变迁的发展轨迹。

这一遗址是直至1802年的越南首都。然而,从1700年开始黎朝政权被郑氏(seigneurs Trinh)所掌控,便使得它被逐渐废弃:领主们带着他们的行政系统,住到皇城去了——即现在的还剑湖和陈兴道之间,把皇帝这个被剥夺了权力的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留在原来的宫城,而这一区域,随着时间的流逝,仅剩下零星"营寨"和大片荒地。到了19世纪,首都迁到"顺化"(Hué),旧皇城也就不再使用了(鄂卡尔[Charles Edouard Hocquard,1853—1911]医生曾对此留下一篇令人吃惊的描写)。黎朝的不幸却成为考古学家的大幸:废弃良久无人居住,躲过了彻底改变了商业旧城的农村移民潮,我们正在发掘的皇城遗址不仅免于改朝换代时的象征性的破坏,并且也未经历新的建设,而后者毫无疑问将使旧有的建筑消失。最后,由于这块土地相继被法国殖民军和越南军队占据,因此它得以安然渡过20世纪而未遭遇大的劫难——战争和城市化的整治,到我们手中,从头至尾,毫发无损。这不仅在越南,就是在全亚洲都可说是独一无二的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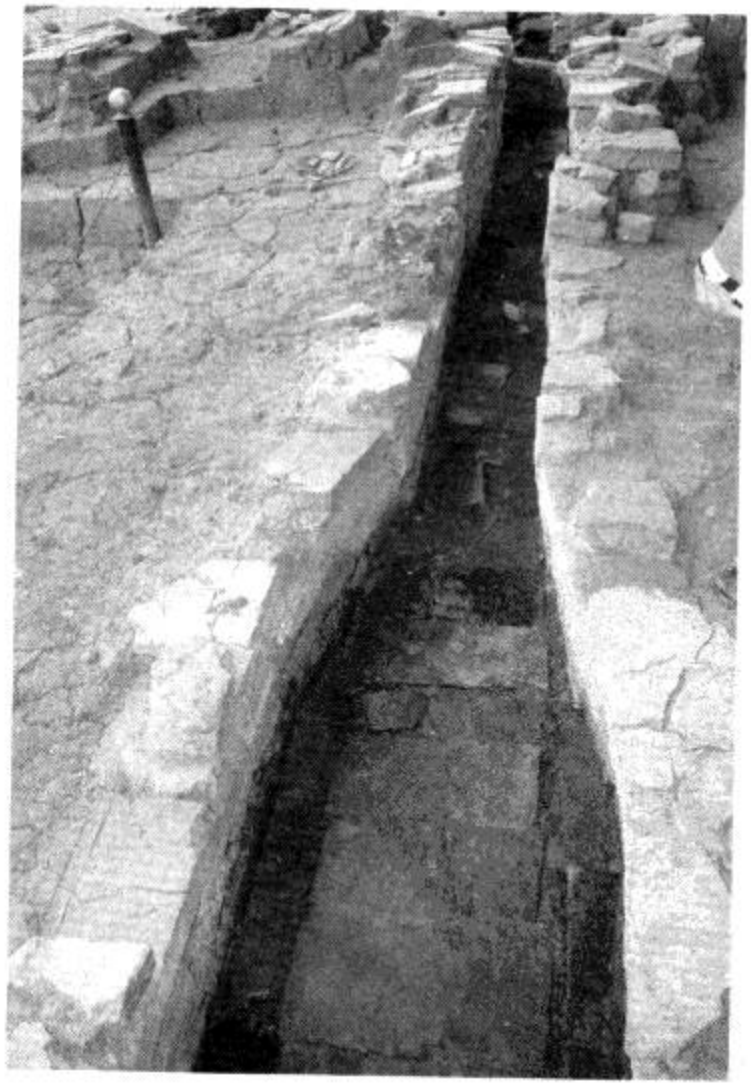


图3 古代水沟

发掘的初步成果略述

全部地层排列起来总共不到5米。一般来说，大罗时期（7—9世纪）位于3米以下，从3米至1.9米先后是李朝和陈朝（11—14世纪）的堆积，黎朝（15至18世纪）的遗迹在1.9米至0.9米之间，最上面就是阮朝（19世纪），还有法国工兵进行水利建设的遗迹（1880）（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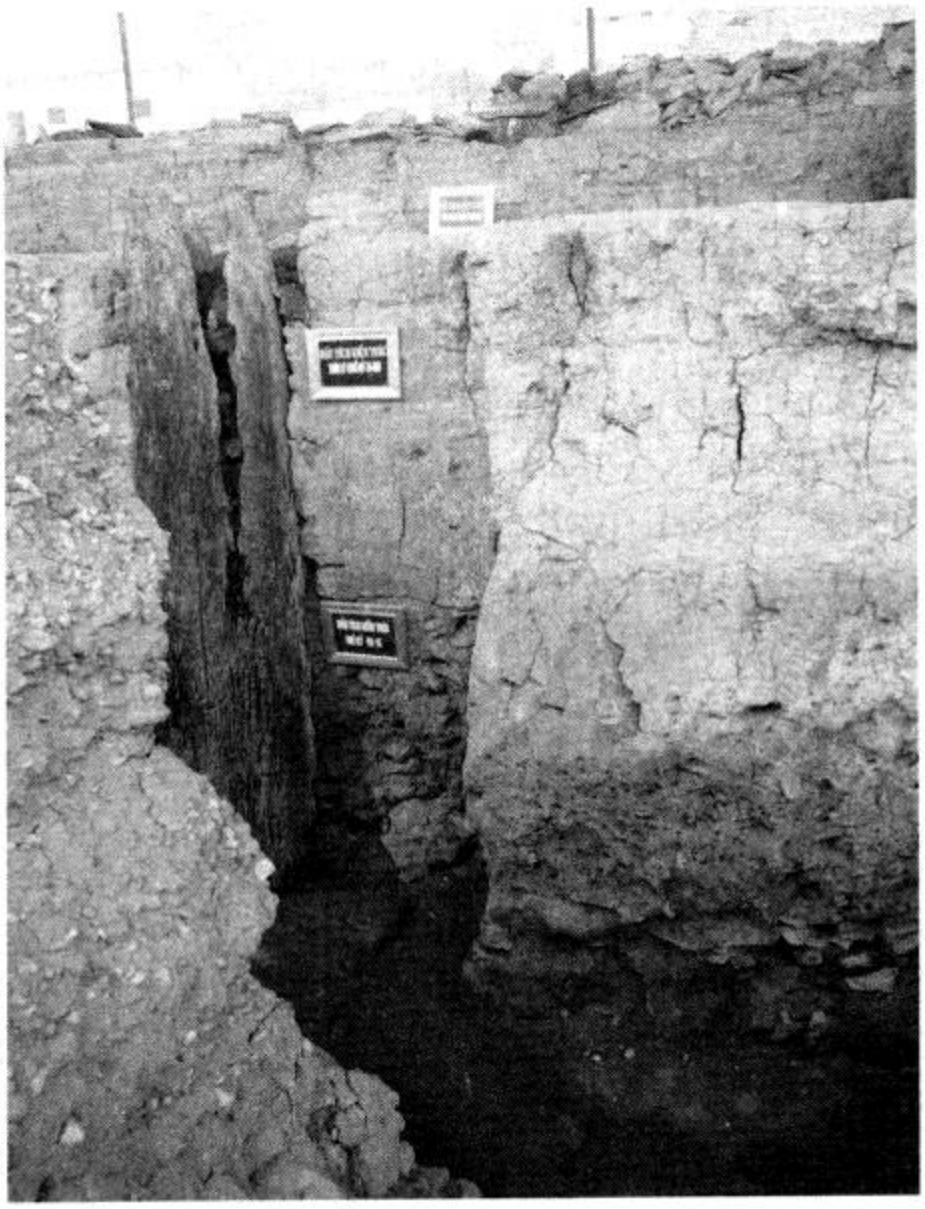


图4 遗址地层叠压状况

中国统治时期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砖，有些上面有铭文；还有四根相距3.8米的木柱及其基座，应该是用来支撑一座很大的建筑的；还有相当数量的陶瓷和小雕像（小狮子）。时代越近，留下的物品越多。到了李朝，红砖取代了中国统

治时代的旧青砖;A20 坑显示曾有地基(60 米 ×18 米),上有 40 个柱础(图 5)。在此2 万平方米的面积上,有 11 口井(图6;其中2 口是中式的)、6 座墓(年代最早是陈朝的)和一些散乱的骨殖,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坐落在遗址后方的文物仓库里,还储藏着上百万件待研究的残片。

图5 莲花纹柱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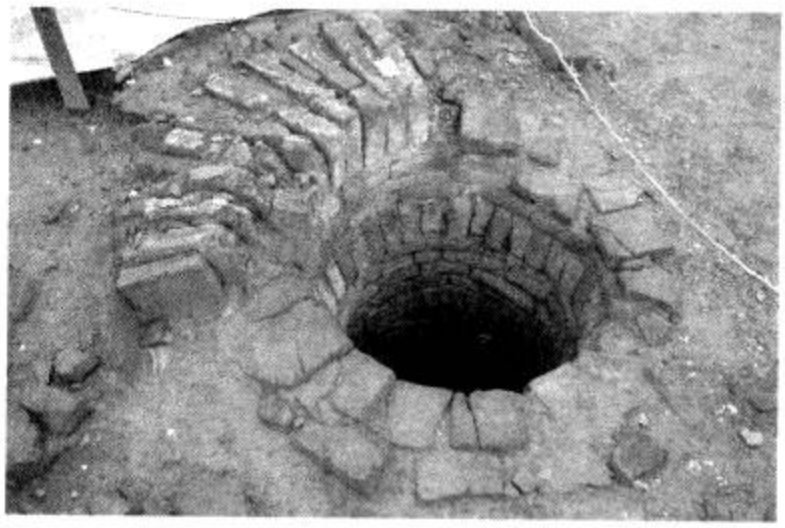


图6 井

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的巴如斯进行的法国—印尼联合考古研究

贝雷(Daniel PERRET)　苏拉尺曼(Heddy SURACHMAN)　著
吴旻　译

一　介绍

位于今天印尼北苏门达腊省的西海岸，巴如斯(Barus)地处一块与亚齐省接壤的狭长平原上(宽仅5—15公里)，这块平原在印度洋和高高耸立的巴里杉山脉的山嘴之间延伸。巴如斯市今天是塔帕努里中央省(Tapanuli Central)巴如斯地区的首府。

至少从公元5—6世纪开始，巴如斯地区就以林产品而闻名于欧亚大陆的广大地区，特别是产自其内地的樟脑。然而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由印尼国家考古研究中心对该地区进行了第一次钻探勘测。[1] 也正是在同一时期，人们开始关注源自巴如斯的马来文文献，并开始关注有关16世纪之前巴如斯历史的资料[2]。

这些先驱性的卓有成效的调查工作，将推动法国—印尼联合考古工作计划。该计划于1995年开始进行，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CNRS/EHESS)基约(Claude Guillot)的领导下，对罗布图阿(Lobu Tua)的海滨城市遗址展开了第一次发掘活动。这一计划得到了法国外交部考古研究顾问委员会(Commission consultative des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à l'étranger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的支持，在进行了5次发掘和一次出土文物研究之后[3]，于2000年结束。对这些发掘工作简要总结如下：罗布图阿始建于9世纪中期，是由来自印度或斯里兰卡的商人修建的(曾发现一块1088年的泰米尔文石碑，它与一个印度商人行会有关，也发现了陶瓷、青铜、雕塑及各种不同技术的器物)。

之后来自中东地区的商人也加入它们的行列(曾发现陶瓷、玻璃制品及一块刻字的印章)。该遗址位于一条从中东到爪哇的商道之上(曾在石头和一只金戒指上发现刻有古爪哇文),这条商道范围包括伊朗的席拉夫(Siraf),南印度及斯里兰卡。罗布图阿不仅仅是林产品的集散地,也是通往内地金矿的一扇大门。对这一片海岸内地的开发似乎是印度人和爪哇人合作的结果,很可能是为了摆脱室利佛逝(Srivijaya)皇朝的控制。罗布图阿在12世纪初时迅速衰落,则很可能是因为遭到了来自岛屿最北端的居民的攻击。

正是由于这几次发掘取得的丰硕成果,使得印尼国家考古研究中心和法国远东学院决心继续在巴如斯继续进行考古研究工作。出于这个目的,在法国外交部考古研究顾问委员会的支持下,一个新的考古计划于2001年开始实施。这一计划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2001—2005年)主要针对巴如斯地区其他海滨城市遗址;第二个阶段(从2006年起)主要研究的对象则是从巴如斯内陆直到北苏门答腊的古代城市遗址。

二 塔帕努里考古活动(2001—2005)

这次考古活动是法国远东学院和印尼国家考古研究中心(其加尔各达中心和北苏门答腊首府棉兰(Medan)分部的有关人员参与)的合作。这次活动是以罗布图阿发掘活动所取得的成果为基础的。发掘区域主要包括距罗布图阿以东约5公里处目前的武吉哈桑(Bukit Hasang),巴南该汉(Pananggahan),巴图盘干(Patupangan)和埃克达卡(Aek Dakka)等村庄,以及武吉哈桑以南约2公里处的卡代葛当(Kadai Gedang)海滨遗址。

该计划的第一部分主要想澄清四个方面的问题,即:各遗址的确切年代、居民的来源及生活方式、各遗址的结构及其组织方式等。发掘工作除了可以获得有关各遗址本身历史的丰富资料之外,还可以与罗布图阿遗址进行比较研究。我们也想找到这些古代城市遗址与当时岛上其他商贸机构或政治经济中心之间关系的种种迹象,它们或是位于内陆,位于岛的最北端,或是位于马六甲海峡(Pasai, Kota Cina, Jambi等),甚至远及爪哇、印度洋、中国和近东。在宗教与文化层面上,我们将试图从武吉哈桑[4]发现的穆斯林墓碑上的铭文资料与发掘中得出的考古资料相结合,取得这一地区伊斯兰教历史和马来文化的关键信息。我们知道的第一位最著名的马来穆斯林诗人哈姆扎(Hamzah)的诗歌中曾经提

到过“Fansur”和“Barus”的名字，al-Fansuri 的名字使之与这里紧密相关，我们现在几乎可以确定他曾于 15 世纪在巴如斯生活过[5]。与哈姆扎的关系使人联想到巴如斯可能是一个伊斯兰教的重要中心，也是马来文化的一个重要熔炉。此外，一些外文的资料提到在 13 世纪之前，在 Fansur（很可能就是巴如斯的古名）曾有聂斯托里派教徒，也提到 13 世纪时一位犹太商人在 Fansur 去世。

1985 年和 1997 年，曾对集中在武吉哈桑村的遗址进行过两次钻探勘测，分别开挖了 125 个 2.5 米见方的探坑进行全部的或是部分的发掘。一座贝壳砌成的南北向的墙被清理出了十多米，它似乎是将遗址划分为两个界限分明的区域。同时也发现了一口深约 5 米的古井，里面有大量完好无损的陶器，几乎都是在印尼从未发现过的形制。另外，打出的 75 个探方也找到了位于遗址中部东面的一条护城河。这条河沟有些地方深逾 4 米。根据出土物的密集程度不同，可以区分出三个大的居住区域，每个占地约有 8 公顷。该遗址出土了约 43000 块进口陶瓷残片，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中国元朝的瓷器；其余的 120000 块陶瓷残片总重量超过一吨，种类繁多，既有来自南亚的，也有来自中东的，还有一些可能为当地产品；还有来自中东的约 1000 块玻璃残片，超过 400 块的骨殖、牙齿和软体动物的壳、青铜和铁制物品，近 100 公斤的冶铁炉渣，一些石质和玻璃珠子，还有二十多枚中国钱币或钱币残片。

在卡代葛当遗址所作的 39 次钻探中，发现了超过 13000 块陶器残片，600 余块进口陶瓷残片和 100 余块玻璃残片。对进口陶瓷残片所作的初步研究看来证实了该遗址应该与武吉哈桑遗址为同一时代。

最后一次对于出土文物的大规模研究刚刚结束，对于第一阶段塔帕努里考古活动作出最后定论尚为时过早。但我们至少可以确定自 2001 年开始发掘的遗址都晚于该遗址，在罗布图阿遗址人居时代之末至武吉哈桑遗址和卡代葛当遗址最初有人居住之间大约相隔一个世纪之久。考古发掘也证实了在地方志中提到的在罗布图阿之后古代城市的存在。根据对进口陶瓷的断代，武吉哈桑的主要人居时代持续的时间非常短暂，只有约一个多世纪。如果这个假设可以成立的话，上述精确断代对于其他印尼遗址，甚至其他亚洲遗址的遗物断代都有很大帮助，因为其他遗址都没有如此短暂的人居时代。对于将近 100 块陶瓷残片的岩相学和化学分析正在进行当中，正在试图确定它们的陶土属性。本计划第一阶段的主要成果预计将于 2008 年出版。

〔注 释〕

1 Lukman Nurhakim,《La ville de Barus : Étude archéologique préliminaire》(巴如斯城:初步考古研究), *Archipel*, 37, 1989, p. 43 - 52.

2 Jane Drakard 发表了四篇有关巴如斯文字编年史的文章,以及有关巴如斯历史的整个现有史料:"Ideological Adaptation on a Malay Frontier"(马来边境之政治及文化互动),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7 (1), 1986, p. 39 - 57 ; "An Indian Ocean Port : Sources for the Earlier History of Barus"(一个印度洋上的港口:早期巴如斯历史资料), *Archipel*, 37, 1989, p. 53 - 82 ; *Sejarah Raja-Raja Barus*: *Dua Naskah dari Barus*(巴如斯国王之历史:两份巴如斯手稿), Jakarta / Bandung, EFEO / Penerbit Angkasa (Textes et documents nousantariens, 7), 1988 ; *A Malay frontier*: *Unity and duality in a Sumatran kingdom*(一段马来边境:一个苏门答腊王国的统一与对立),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1990.

3 这一计划的主要成果发表在两部著作中:Claude Guillot (éd.), *Histoire de Barus : Le site de Lobu Tua, I. Études et documents* (巴如斯历史:罗布图阿遗址,I,资料与研究), Paris, Association Archipel, Cahiers d'Archipel 30, 1998 (其印尼文翻译版由法国远东学院加尔各答中心完成:C. Guillot (éd.), *Lobu Tua. Sejarah Awal Barus*, Jakarta, EFEO / Association Archipel / Pusat Penelitian Arkeologi / Yayasan Obor, 2002) ; C. Guillot, D. Perret, H. Surachman *et al*, *Histoire de Barus. Le site de Lobu Tua. II*: *Etude archéologique et Documents*(巴如斯历史:罗布图阿遗址,II,资料与考古研究), Paris, Archipel, Cahier d'Archipel 30, 2003.

4 最早的石碑可以上溯至 1370 年。这块石碑位于武吉哈桑遗址的中心。参见 Ludvik Kalus 的文章,在专门针对罗布图阿遗址的第二册中。

5 Claude Guillot & Ludvik Kalus,《La stèle funéraire de Hamzah Fansuri》(哈姆扎的墓碑), *Archipel*, 60, 2000, p. 3 - 24 ; Vladimir I. Braginsky, "Towards the Biography of Hamzah Fansuri. When Did Hamzah Live ? Data From His Poems and Early European Accounts"(有关哈姆扎的生平:他曾在哪里生活——从他的诗歌和早期欧洲文献资料谈起), *Archipel*, 57, 1999, p. 135 - 175.

塔如玛纳嘎拉古国考古(西爪哇,印度尼西亚)

莽甘(Pierre-Yves MANGUIN) 著
吴旻 译

简 介

印尼考古研究中心是25年以来法国远东学院在印度尼西亚的合作伙伴,应该中心之请,我们自2002年起开始组织一次对塔如玛纳嘎拉(Tarumanagara)古国的考古工作(西爪哇)。2002年的试掘和2003年第一次密集发掘均在巴图爪哇(Batujaya)的佛教遗址上进行,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爪哇岛上的第一个历史古国最重要的一处遗址。合作工作是在自上个世纪80年代遗址发现之后印尼考古学家多次进行的规模较小的发掘基础上进行的。对邻近的西布阿亚(Cibuaya)毗湿奴教遗址也进行了现场勘测。

直到最近几年,只是通过一组五篇被古文字学家断代为公元5世纪中期的梵文毗湿奴教铭文,塔如玛纳嘎拉古国才为人所知,这批铭文中的四篇在位于加尔各答的内陆的波哥(Bogor)地区发现,另一篇则是在更靠近印尼首都的海滨发现的。它们是西雅如屯(Ciaruteun)和图古(Tugu)铭文,均属东南亚最古老的铭文。继20世纪60年代印尼首都市郊发现的一批找到丰富陶瓷文物的海滨遗址布尼(Buni)之后——它们都被有计划地盗掘过,到了20年代70—90年代之间,在此以东20多公里处,又发现了两处砖制庙宇建筑群(巴图爪哇和西布阿亚)。这些发现使我们可以对此提出假设,认为所有这些遗址都属于铭文中提到的塔如玛纳嘎拉古国。印尼的文化遗产局在2000年对首都加尔各答附近的巴图爪哇建筑群中的某些庙宇进行了修缮,以供发展旅游之用。

目　标

我们对这次塔如玛纳嘎拉古国考古工作制订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在我们研究的时代范围之内(公元前1世纪至9世纪)编写出一份尽可能详尽的年代表。重现巴图爪哇和西布阿亚遗址的古环境则是我们第二个当务之急。其他有关陶瓷学和建筑学的结论自然也要在我们的实地考察中展开。根据这次考古工作获得的数据,我们将试图弄清那些提到"塔如玛纳嘎拉"的铭文和我们正在发掘的遗址之间究竟有何关系,以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爪哇岛上的第一个国家的建立过程。

初步成果

在本文中我们将从最早的年代出发,介绍这次考古工作已经取得的几个初步结论。

在庙宇修建之前的布尼文化遗址群

在2002年和2005年之间在巴图爪哇的不同小丘上进行的数次发掘,在这一地区找到了对应于佛教寺庙和其他砖制建筑地层之下的史初人居遗迹。在Segaran V遗址的底层获取的样品显示它们的时代是从公元1世纪至6世纪初。它们来自于两个密集度不等的地层,其中都有普通的陶瓷,即称为"布尼陶瓷"的器物以及一些印度陶瓷:较高的那一层显示出相当密集的人居遗迹,而较低的那一层则显示出人居遗迹明显较为分散。在Segaran V遗址,在较低地层的发现物中,有相当数量大小不等的软体动物的壳,这是反映饮食习惯的产品。仅从巴图爪哇一地收集到的讯息,我们就可以设想这一沿海地区的最早居民大量食用附近的海产品,由于他们留下的人居痕迹较为疏离,我们可以设想他们极有可能是不定居的,以打猎或捕鱼及采集为生。

我们现在能够对布尼文化遗址群进行断代,并且较之以往的测想,将它的年代提前了。断代的有力证据是2005年发掘的地层I和II的印度陶器,尽管这一断代还是不太精确,但已由地层分析以及以往发掘所提供的年代所确认。我们今天可以肯定这个与爪哇岛西北海岸相关的文化,在公元初年(或可能更早)至4世纪间存在了约500年。我们也开始区分这种被称为"布尼陶瓷"的同一种风

格的陶瓷器的内部发展:制作与烧制质量的提高、锥形(*carinated*)和较大形制器物的出现等。对于这两个地层中的骨殖和炭分别所作的放射性碳素断代应该会将上述年代进一步精确。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收集到的这一史初时代的整体数据证实巴图爪哇遗址在这一地区被"印度教化"之前数个世纪已经有人居住("印度教化"的过程定义为接受了梵文,并接受了源于南亚的文字、建筑与艺术形式、宗教和国家理念)。无论如何,如果我们仅仅考虑地层 I 和 II 的年代,我们只能将这第一批砖砌建筑的修建时间定为约公元 400 年以前(我们在下文中将要看到,它们的年代似乎还要更晚),由于缺少塑像和铭文,它们是"印度教化"的最确定的证明。然而,在对出土了属于布尼文化遗址群的陶瓷的地层发掘中,也找到了数量可观的南亚进口的陶瓷器皿。至少在巴图爪哇出土的陶瓷中有一部分也在巴厘岛、南苏门答腊岛、马来半岛以及印度支那半岛(特别是在沃澳 Oc Eo)同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事实上就目前来看,巴图爪哇是东南亚发现印度陶瓷残片最多的遗址。它们的大量存在证实了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这里与南亚次大陆之间的关系。这些残片与在印度南部的阿瑞卡墨都(Arikamedu)遗址的整个出土物品惊人地相似。在较低地层发现的带有旋纹(*décor roulette*)的陶瓷残片表明这一遗址至少在公元初年即开始形成,并且立刻与南亚建立了关系。与阿瑞卡墨都的数据所作的比较,也使得对此后 3、4 个世纪间继续进行的交流进行断代成为可能,尽管还没有确定找到"印度教化"的任何具体痕迹。

庙宇的修建和使用

寺庙及其使用的历史应该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分别称为阶段 A 和阶段 B)。这一结论得自于对于建筑结构的清理,尤其是垂直于墙体进行的地表发掘,在那里人们找到了见证其修建和使用的两个主要阶段的遗迹,继而是被废弃的阶段。

由于对砖制建筑断代本来就存在困难(因为我们无法将建筑结构拆解),加之在巴图爪哇几乎找不到雕像,铭文也十分罕见(并且铭文也多为佛经内容),使得我们尚不能对巴图爪哇的最初建筑确切地断代(其历史中的阶段 A)。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不可能早于公元 400 年,但我们最多也只能断定它们是在这个年代之后,公元 9 世纪之前。对铭文的古文字学研究,以及对我们认为可以归为阶段 A 的毛粉饰(*décor en stuc*)的详细风格分析,都正在进行当中,看起来其综合的结果可以将此年代定位到约公元 7 世纪。这个结果似乎也支持了研究西爪哇的历史学家所提出的假设,这个尚未得到很好支持的假设认为这一佛教寺庙

整体是室利佛逝(Śrīvijaya)军队占领该地区的产物,可能依据的是686年科答卡普(Kota Kapur)的铭文。根据这一假设该佛教建筑整体应该晚于塔如玛纳嘎拉古国的灭亡(该国最后遣使中国的年代为666年和669年)。上述论断都是基于对论据的推理,但是我们仍无法解释这些庙宇为何被废弃,并且在阶段A的末期开始成为废墟。

人居活动的最后时期

在经过废弃和废墟的时期之后,在阶段A的末期仍有一些中间时段,巴图爪哇的许多寺庙被重新修建起来,为了遮掩前一时期的断壁残垣,它们的地基都被加高,或是用一种掺杂了河中小鹅卵石的白色灰浆将之恢复原貌。对建筑进行粗糙重修的这一阶段B的痕迹在遗址的建筑物上清晰可见。在Segaran V(Blandongan)进行的发掘对于阶段B来说是一个分界点:在用来填平阶段A的废墟的泥土中实际上带有一些中国陶瓷残片,这些残片是广东的窑烧制的,其时间不早于公元800年,亦不晚于10世纪。这些残片都属于同一时代,有几片略晚(最晚为11世纪初),它们使得我们可以对2005年清理出的人居建筑进行断代。看来可以公认的结论是,这些建筑与巴图爪哇寺庙的阶段B是同时代的。在巴图爪哇数个遗址有人居住的时段是其古代历史的末期(到18世纪末这一地区被重新耕作之前,我们没有再找到任何有人居住的证明)。但是相对于其他两个大的经济文化中心,即中爪哇(Mataram)和南苏门达腊(Śrīvijaya),我们对于西爪哇这一当时的边缘地带的历史知之甚少。而我们知道直到10世纪,一份古马来铭文(Bogor的Rakryan Juru Pangambat [932])才提及有位巽他王在这里"重掌政权"。(也许是在室利佛逝的控制之下?)这一史料是否可以解释巴图爪哇短暂的复兴,或是标志着一切的结束?现在还不能妄下定论。

东南亚艺术
——法国远东学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合作项目

嘉博德(Louis GABAUDE) 著
吴旻 译

台北故宫博物院计划于2009年在台南地区的嘉义建立一个新的博物馆。这个新的博物馆有着“地区”的性质,它将展出的是中国大陆以外的艺术品收藏,尤其是台湾本土和东南亚的艺术品。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负责人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对日后主持新博物馆的员工展开培训,让他们进一步提高认识。有关东南亚的部分,台北故宫博物院决定与法国远东学院合作,创立一个提高兴趣和培训的计划。该计划的大致条款已经双方协商同意,并于2004年10月正式签订协议。协议的一方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另一方法国远东学院的代表则是其台北中心(设立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内)的谷岚(Fabienne Jagou——参见附录作者、译者联系方式表)研究员和泰国清迈中心的嘉博德研究员。计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步是在台北建立起一个研讨班,第二步则是建立一个在东南亚各地流动的研讨班,最后是在台北召开一个国际研讨会。

计划的第一个部分是名为:“东南亚艺术:研究评估”(*Southeast Asian Arts: An Assessment of Research*)的研讨班,已于2005年4月11日至13日之间在台北举办。研讨班首先就对东南亚各个不同艺术领域所作的研究进行了总结。研讨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既使得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员工和台湾学者与研究东南亚艺术的专家能够相互认识,也为他们未来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共有16位学者在研讨班上先后发言,涉及的题目从建筑到陶瓷,从佛教艺术到纺织

品，范围非常广泛。这些学者中包括：

5 位台湾学者：谢明良（台湾大学）；黄兰翔、严智宏（中央研究院）；冯明珠、张湘雯（台北故宫博物院）

4 位法国远东学院研究员：布吉耶、嘉博德、罗瑞拉（Michel Lorrillard）和博悌叶。

还有 7 位相关学者：一位来自法国：杜普扎（Marie - France Dupoizat），一位来自日本：滢链濆璹（Morimoto Asako），还有几位来自英语国家：Charles Higham，Donald Stadtner，Patricia Cheesman，Leedom Lefferts 与 Gillian Green.

该计划的第二部分将借举办一个名为“东南亚艺术：本土环境与中国思考”的讨论班之际于 2006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1 日在东南亚地区展开。第二部分的主要目标是让参与计划的学者与东南亚艺术零距离接触，日后这些艺术品会在台湾的研究室里被细致研究，人们也会在台湾博物馆的展柜里看到它们。参加计划的学者同时得以借此机会在当地欣赏柬埔寨、泰国和老挝的艺术。如在柬埔寨他们可以看到由法国和日本考古队对高棉古建筑进行的保护工作；在泰国，则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佛教或是农村艺术；在老挝，大家会看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琅勃拉邦（Luang Prabang），观察这个今天仍充满活力的古老城镇是怎样被管理的。在该计划的每一阶段，都会举办一些小型讨论课，参加的台湾学者将论述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历史联系，参加的本地学者则介绍当地艺术的特殊方面，或是谈论对艺术品的保护和公开展示。

该计划的第三个部分将于 2007 年进行，计划举行一个国际研讨会，主题将围绕中国与东南亚诸国之间的文化互动。

在目前这样一个时代里，全球化所建立的经济关系都局限在金钱之上，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负责人是希望这一计划能够引起研究者和公众的关注，关注文化的价值以及特殊性，而艺术又是文化最精致的表现方式。从纯粹学术的角度来看，该计划亦使得台湾可以开设有关东南亚艺术的培训课程并举办活动，这些课程和活动都可以特别邀请法国远东学院的研究人员来主持。

结　语

陈星灿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考古学的归属问题时有纷争。有人把它纳入历史学，有人则把它归入人类学，有人说它是科学的一部分，还有人则说考古学就是考古学[1]。但是无论如何，如果说考古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描述、解释和复原历史，争论的各派大概不会有多少异议。

考古学主要是利用实物重建过去的一门科学。它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考古学与古器物学的根本不同，在于考古学不是研究单个的器物，它主要关心物质遗存的情景（*context*）；没有情景，就没有考古学[2]。所谓情景其实就是事物之间的联系，联系越多，资料越丰富，解释的可信度就越大，对历史的描述、解释和复原就越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反之则否。

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多种多样的，在物质遗存（比如器物跟器物、器物跟所从出土的单位、器物跟整个遗址、器物跟出土同类器物的整个地区、器物跟不同时代同类器物及其出土情景的关系等等）之间的联系之外（建立这样的联系需要考古学和自然科学的许多手段），还有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联系，也就是作为历史描述、解释和复原者的考古学家和物质遗存之间的联系，所以面对同样的历史真实，考古学家的知识背景和个人能力也影响甚至决定着历史的描述、解释和复原。

古代文化的特殊性和考古学家自身所在社会、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的特殊性，决定了历史的描述、解释和复原是永不停歇的一个过程，换言之，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描述、解释和复原，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描述、解释和复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描述、解释和复原。虽然如此，描述、解释和复原却有好坏之分，不能等量齐观。发掘什么、描述什么、解释什么、复原什么、用什么手段发掘甚至谁来发掘和解释，看似简单，其实却不单纯是考古学家自己的事情，而同考古学家所

处的时代及其社会思潮，他的文化背景、知识背景和个人能力息息相关。

历史是可以描述、解释和复原的（这是考古学存在的前提），但是历史的描述、解释和复原又是受限制的。根据考古资料描述、解释和复原历史，首先面对的是资料的破碎。不是所有历史都能留下痕迹，留下痕迹的物质遗存经过漫长岁月的冲刷，又变得七零八碎、模糊不清；更要命的是，考古学家的工作（包括调查和发掘）从根本上说又几乎都是抽样性的，这就决定了历史的描述、解释和复原是不完整的，是有残缺的，任何把个人的描述、解释和复原绝对化的倾向都没有充分意识到考古资料的局限性，当然更没有意识到解释者个人所处时代和能力的局限性。

本辑《法国汉学》收录的二十多篇考古学文章，虽然题目众多，涉及时空广大，却也可以看作是对古代历史的一种描述、解释和复原（当然各人的解释是各人的）。文集大致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中法学者（也有个别的美国学者）对中国考古的研究，第二部分是法国学者对欧亚非多个地区不同时代考古的探索。前一部分涉及近年来开展的多个中法合作考古项目，从人类起源到先秦时代中原和新疆塔克拉马干沙漠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史，内容非常丰富。

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了解，通过中外考古学家近百年来的不懈努力，应该说有了长足进步。比较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最近编著的多卷本《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考古学·两周卷》[3] 和即将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史前卷》，就知道我们今天对古代的认识比司马迁《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和《周本纪》不晓得丰富和扩充了多少倍，也不知道比中国考古学诞生初期的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丰富和扩充了多少倍。但是正如杜德兰（Alain Thote）先生所批评的那样，对于古代中国（他批评的当然主要是历史时期）的了解，到目前为止还主要是死人的世界，而对古代活人的生活情况所知甚少。我们所了解的仅仅是上层社会的物质文化，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包括其中最重要的方面都还不为我们所知。城市和乡村居民的生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4]。这个倾向最近已经开始得到纠正（这也证明考古挖什么不挖什么并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收入本辑的青铜时代河南南阳龚营聚落遗址和汉代河南内黄三杨庄聚落遗址的发掘成果，为我们了解两个地区不同时代村落生活的内容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证据，尤其是汉代房舍、院落以及附属的石臼、石磨、井、水池、厕所、用碎瓦铺设的便道，以及院外的树木、农田等等，非常直观地展示了中原地区汉代农村生活的面貌。虽然这些实物不能开口说话，对历史的描述、解

释和复原，还需要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艰苦努力，还需要在出土实物之间建立起更多、更广泛的联系，但是考古学家毕竟打通了通向遥远过去的时空隧道，我们可以直接站在两千年前先人生活过的土地上，看他们的房子和瓦顶，看他们的厕所和水井，抚摸他们曾经倾注力量的石臼和石磨，走过他们曾经洒下汗水的农田。这是考古学和考古学家的幸运，可惜这样的幸运却来自黄河对三杨庄汉代村落的颠覆。保存如此完好的聚落遗址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并不多见，值得我们加倍珍惜。杜德兰和杨宝成先生对青铜时代晚期龚营普通聚落生活的观察和解释，比如根据动物遗存分析得出聚落居民吃食马肉和狗肉，根据陶豆（带柄和座的陶容器）的身高推测其为古人席地而坐时使用的器皿，根据对陶器的分析证明青铜时代晚期中原地区农村的制陶仍以手制为主等等结论，均是理解古代社会生活的锁钥，但过去却很少为人注意。中法联合考古队对新疆克里雅河谷的联合考古项目，综合各种科学手段，对发现的大量古代有机物（包括动植物和人骨）进行多学科分析，不仅认识到某些人们的牙齿磨损可能跟软化皮革有关，甚至再现了其中三人被处死刑的过程。其他各文或者从青铜器、或者从盐业、城市、瓷器和文字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某些侧面进行描述、解释和讨论，新意叠出，均甚有可观。

法国学者对中国之外地区的考古，涉及地中海周围和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诸多地区，研究者的视野和所在地区特殊的历史情景决定了他们研究课题的独特性。举例来说，法国海外学院委拉士开支研究所在西班牙东南部的工作，目的是研究铁器时代发生在定居伊比里亚半岛沿岸的希腊和腓尼基商人同他们在当地的主人或顾客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且重新勾勒出影响被这些交往网络所触及到的当地社会的转变过程，特别是通过居住形式、生活器皿和土地形式的演变，试图发现互动和变化的线索[5]。在有限的发掘面积内，通过建筑形式和生活陶器的消长，比较远道而来的腓尼基人和当地土著居民的互动，也是在众多物质遗存之间建立广泛联系的结果。比如首先要确定哪些建筑形式和陶器是腓尼基人的，哪些建筑形式和陶器是当地土著的，腓尼基人的建筑和陶器的是否在其他地区具有类似的特点等等，如果没有这些联系，就不能谈及腓尼基人和当地土著居民的消长和互动。法国雅典学院对希腊塔索斯岛的考察，综合考古学家、地理学家和环境学家的力量，对全岛 300 余处遗址进行深入考察，对公元前 5 世纪以来塔索斯岛的土地利用情况有了深入了解，并且分析出各领土单位之间的合作、互动、牵制和对立，结合文献，几乎重建了该岛的历史[6]。法国学者对埃及

金字塔、对经由埃及东部沙漠和红海而建立起来的罗马帝国和东方诸国的商贸联系的考察、对发生在公元前52年的被认为是法国历史奠基事件的阿莱西亚之战的文献记载的澄清和解释、关于越南南部所谓扶南国的考古研究、关于柬埔寨旧都吴哥城的考古研究，特别是重修吴哥巴方寺的计划等等，均是根据最近发掘成果对古代历史所做的描述、解释和复原（包括对古迹本身的复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感谢法国同行把他们在欧亚非各地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给我们。上面说到，考古学的现在和过去、主观和客观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对话的过程当中。面积只有新疆三分之一的法国，却可以在欧亚非许多地区古代历史的描述、解释和复原上拥有发言权，而占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却几乎完全局限在中国的疆土范围内。从建立事物之间的广泛联系而言，这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解释和复原并非好事，对世界古代历史的解释和复原更谈不上多少贡献。因此，编完这书之后的感觉之一是沉重。法国考古学家的工作其实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愿从今以后的中国考古学家能够走出中国，愿后来者能够到埃及、日本、东南亚、伊朗、伊拉克、墨西哥、秘鲁等地去考古。如果十年、二十年后能够有幸和法国学者再编一本《法国汉学》的考古编，我希望在《欧亚非考古和文明》的栏目里，有中国人的名字出现。

〔注　释〕

1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1—16页。

2　伊恩·霍德著、徐坚译，《阅读过去》，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146—163页。

3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4　杜德兰、杨宝成，《南阳附近的龚营遗址的发掘：方法和结果》，见本书第36—48页。

5　莫雷，《西班牙土地上的腓尼基人与希腊人—铁器时代“远西”地区的文化接触和交流模式》，见本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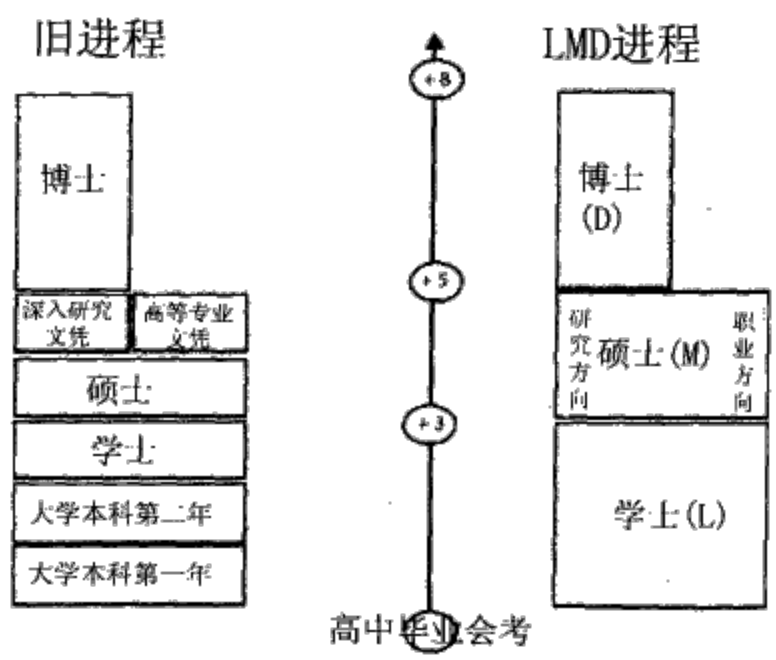
6　缪理业，《晨雾缭绕中的塔索斯岛—古典与希腊时期一处帕罗斯人的殖民地》，见本辑。

附录一

大学三年之后的考古学课程
——从法国课程改革到建立起完整的职业道路

杜尔若(Sandrine DURGEAU) 著
吴旻 译

本文将对法国考古领域所提供的学士之后的课程有关情况作一简介,并顺带介绍目前法国新的学制组织形式。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在此并未列出完整的名单,只是提供一些法国现有课程的线索而已。为了方便大家能够进一步搜索到更多信息,我们在文后附上了文中提到的课程和学校的网址。由于笔者自身的经历所限,在这里列举出来的课程大多数都与巴黎有关。最后提一句,下文中的信息都是与考古学直接有关的,但实际上,还有许多其他的课程供学习考古的学生选择,这些课程则多与文化管理有关,而文化管理课程本身已足够再写另一篇文章了。在下文中我们将从介绍学士(Licence)课程开始,然后再介绍硕士(Master)课程。



了解更多:LMD 改革:http://www.education.gouv.fr/sup/lmd/default.htm

学业进程示意图:http://univ-parisl.fr/lmd/cartelmd.html

A. 学士课程之后

两年前开始，法国教育部开始着手进行一项改革，名为 LMD（L 即 Licence［学士］，M 即 Master［硕士］，D 即 Doctorat［博士］），目的是使整个欧洲的学位制度能够接轨。这项改革，1998 年由 4 个国家（德国、英国、意大利和法国）发起，今天已经延伸到 40 多个欧洲国家。这项改革将大学课程分成三个部分：学士（Licence）、硕士（Master）和博士（Dissertation，即论文写作）。每一种文凭都带有领域名称（如人文科学）和科目名称（如考古学），如果有专业的话，也带有专业的名称（如西方中世纪考古学）。

中学毕业之后，学生先要通过考古学学士课程（Licence，三年），这一课程相当于未改革之前的 DEUG（大学本科前两年）加上原来的学士（Licence，大学本科第三年）课程。拿到学士学位之后，学生可以选择日后从事研究工作还是直接开始职业工作（研究硕士［Master recherche］或职业硕士［Master professionnel］）。在完成学士课程的同时，学生亦可决定是否转向高等学院继续求学或是参加国家的公务员考试。

1. 大学系统

如果学生决定留在大学系统，他们可以选择继续选择攻读研究硕士或是职业硕士。取得硕士文凭都需要两年的学习，每年完成一篇论文。第一年的学习相当于过去的硕士（Maîtrise，大学本科第四年）课程，而第二年的学习则对应于过去的 DESS（高等专业文凭，相当于现在的职业硕士）和 DEA（深入研究文凭，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硕士）课程。在大多数的大学里，第一年主要开设的是预备性的课程，概论性的课程，学生还是能够在从事研究还是直接踏入职业道路之间做出选择。当然学生最好还是能在第一年就做出选择，到底希望继续哪一种硕士课程的学习。

新学制与旧学制相比，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学生最好是在硕士的第一年（M1）、第二年（M2）选择相近的主题进行研究。第一篇论文的模式是通过选择一个个案并列举所需的参考书目，陈述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对课题进行总体介绍。而硕士第二年的论文则需对范围较大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以便在总体介绍的同时，进行分析和评述；并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完成对文献资料在社会历史框架下的诠释。这种硕士第一年和第二年选题的直接联系使得学生可以更好地意识到他们在走自己的职业道路之时所需进行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在许多大学里都有一种“引路”（*tutorat*）的制度：亦即有一位

至少已经通过硕士第一年学业的学生，在固定的时间里接待学弟学妹们，回答他们有关大学院系组织、学习方法、研究方法的各种问题，或者是关于未来的深造、学位问题，以及在学业当中和之后可以报考的各种公务员考试的问题。这些“引路人”同样也对那些外国学生施以援手，帮助他们融入新的课程学习当中。（具体情况请联系各系[UFR]的秘书处）

a. 职业硕士

职业硕士随着大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课程。在下文中我们列了一份常见课程的名单（请参见附录中那份更为详尽的名单）。南特大学的“考古职业”课程教给学生的是考古学家这一职业的方方面面以及现有的不同专科；而巴黎第一大学则教导未来的职业考古学家研究中遇到的各种课题；波尔多第三大学培养的则是考古科学方面的专家（考古科学亦即考古上应用的自然科学）；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大学则培养学生未来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和整体文化政策方面的工作（如艾克斯一马赛大学、巴黎四大、普瓦提埃大学等）。

准备研读这一类硕士课程都需要提交书面申请以供学校甄选，有时还需要通过面试。课程的最后需要提交论文。取得文凭的学生，可以直接去找工作，也可以转而继续研读研究硕士或是参加国家公务员的考试。

b. 研究硕士

研究硕士的专业通常与某一历史文化的大范围相关（如历史考古学研究硕士；西方中世纪考古专业）。在法国，很少有针对某一专题的研究硕士存在。仅以巴黎为例，惟一的一个专题研究硕士专业是“考古与环境”。如果要选择攻读这一研究硕士，必须从硕士第一年就选修“考古与环境”课程。取得研究硕士文凭不仅需要通过其选修的课程，而且必须通过 DEA 论文答辩。这一论文答辩不仅要求其论文有一定水平，还要求学生较好地完成口头表述。

2. *高等学院系统*

学生获得学士学位之后，除了可以继续在大学系统学习，也可以通过学位认证或是参加相当于学士学位水平的入学考试进入高等学院系统学习。

a. *卢浮学校*

对于学习艺术和考古的学生来说，最为著名的高等学院当属卢浮学校（École du Louvre）。中学毕业之后，要通过特殊的入学考试（考试内容是文化常识）才能在这所学校的一年级注册学习。这所学校主要提供的是艺术史的教育，也有一些考古学的课程。该校的学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学习时间为

三年，与大学系统的学士课程水平相当。

要想进入第二个阶段的学习，必须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年拿到 14 分以上的平均分（满分为 20 分），或者是在一所法国或外国大学里拿到学士学位（相对于考古学专业，他们更欢迎艺术史专业毕业的学生）。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将由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审查该学生的申请资料，决定是否准许他进入第二阶段的学习。第二阶段的学习时间为两年，第一年教授博物馆学，第二年则专门用于论文写作。

该学校开设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准备通过甄选博物馆负责人的国家公务员考试。

b. 培养修复专家的高等学院

除了卢浮学校之外，培养修复专家的高等学院（MST，IFROA）也接受考古专业的学生。学生进入这些学院的方式也是递交书面申请获得通过或是参加入学考试。它们所开设的课程也基本相近，只是后一所学院（IFROA）培养的多为修复在博物馆里陈设的艺术品的人才，而前者（MST）更多地教导学生修复考古中发现的物品。

MST 严格说来并不是一所学校，它是“科学和技术硕士”（Maîtrise des Sciences et Techniques）的缩写，挂靠在巴黎一大。学制改革之后，这门课程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巴黎一大的“文化资产的保存和修复”职业硕士，以取代原来的 MST，每年根据考试成绩不分国籍招收 20 余名学生。这些学生必须已经获得自然科学或艺术史的学士学位。他们首先需要通过的考试科目是美术和色彩学，然后是考察他们的双手的灵巧程度，最后还有一个由保存修复方面的专家组成的考试委员会对他们进行口试。与此同时，学生还要递交一份包括自己个人作品在内的申请材料。硕士课程分为四年：前两年的学习是为了取得一个预备证书（Certificat préparatoire-C. P.），接下来的两年则是准备正式取得“科学和技术硕士”。在前两年里，学生接受的是一般性的整体教育；而到了第三年，他们就开始接触这门职业实际操作的方面了，在这一年里，他们还将设计出个人计划，留待第四年里 6—9 个月的职业实习中完成。实习结束之后，他们还要完成硕士论文的写作。

国立文化遗产研究所（IFROA）则是一所与卢浮学校地位相当的公立学校，也培养了一部分修复专家。拿到学士学位的学生都可以申请注册该校，不受国籍的限制。考试的内容包括一门语言（德语、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一门

美术(纯美术或是工艺美术),对于选择"烧制技术"专业的学生,还需仿制一件指定作品(制模或是完成整件作品)。学生取得硕士需要上满四年全日制课程,他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专业:烧制技术(金属、玻璃、陶瓷、珐琅彩);书画刻印技术;纺织品技术;家具;绘画上色技术;照相技术以及雕塑。在前三年里,学生不仅要上讨论班的课,并且必须在第二年和第三年的年末在法国或是到海外进行实习。第四年则必须完成一件细致修复的工作。

c. 其他高等学院

其他一些高等学院也教授考古学课程,最为著名的是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ENS)和高等实验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EPHE)。

进入巴黎的高等师范学院第一年学习的途径有以下三种:两种形式的入学考试以及国际学生甄选。第一种形式的入学考试针对的是人文学科和理工学科的学生,而第二种形式的入学考试只针对医学和药学专业的学生。所有通过入学考试的考生都成为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如果他们是欧盟成员国的公民,那么他们同时也取得了实习公务员的资格,这意味着他们在四年的学习中都是带薪的(每月税后工资约1250欧元)。如果成功通过前两种形式入学考试的考生不是欧盟成员国的公民,他们同样可以成为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但却不能取得实习公务员的身份,也不能享有带薪学习的待遇,他们通常都享有一份交流合作奖学金。除了上述入学考试之外,高等师范学院每年还举行一次国际学生甄选。甄选的范围既包括理工科,也包括文科,总共约有20个奖学金名额,其目的就是选拔优秀的外国学生。学生申请之时,应该注册就读于本国大学本科的最后一年,并且有志到法国继续深造。每个学生只有一次报名参加这种甄选的机会。如果外国学生获得甄选通过的话,他们在三年的学习期间将获得每月约1000欧元的奖学金。在法国有专为报考文理科高等学院而设的为期两年的预科班,高等师范学院一般录取的学生都是出自那里;但是符合年龄和学位条件的学生未经预科也可以自由报考参加入学考试。

获得学士学位并且获得未来的研究导师的首肯之后,学生即可进入高等实验学院学习。这个学校的研究生院有"历史与语文学"(Sciences Historiques, et Philologiques)的硕士课程,其中有一个专业就是考古学,并且下分许多专科。

奖助学金制度

在大学里,硕士第一年助学金的颁发是以父母收入多寡、学校离家远近等社

会因素为标准的。外国学生也可申请这些助学金，但有一定的条件（详情请见 http://www.crous.fr）。

硕士第二年奖学金的颁发则以成绩好坏为标准。那些取得最好成绩并且从未留级的学生才有机会获得奖学金，但是奖学金的颁发标准每一年都不同，这是因为每一年的资金量多寡不一。外国学生也有机会获得这种奖学金。

B. 硕士课程以后

在完成了职业硕士课程之后，大多数的学生都会去找工作或是准备国家公务员考试。而选择研究硕士的学生则正好相反，尽管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已经在从事与考古相关的工作，但与此同时他们还是继续去写博士论文。

1. 博士论文

博士论文是在硕士阶段的研究基础之上，以三年的时间针对一个明确的主题完成的学术论文。博士论文的题目是由导师建议，研究生院院长同意，以及再由学校的领导负责确定下来。三年研究之后，博士候选人在事先送呈答辩委员会委员审查之后，将论文提交。在获得导师和答辩委员会成员的同意之后，博士候选人将举行公开的答辩。

奖助学金制度

能否获得博士论文奖学金则取决于每个大学分配到的奖学金多少以及学生自己的名次先后。而这个名次是以学生的硕士第二年论文答辩与陈述自己博士论文研究计划的论文答辩综合起来排名的。外国学生也可以申请这个奖学金，但有一定的条件。

2. 国家公务员考试

与考古学学习相关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一般都属于文化遗产和图书馆一类。提供的职位分属 A 级、B 级和 C 级。但是报考公务员大都需要有法国国籍或是欧盟成员国的公民。

国家公务员考试分为三个等级：A、B 和 C，是根据考试的程度划分的。如果要想报考 A 级（博物馆负责人、专员）考试，提交申请参加考试的候选人必须具有大学学历（通常要求高中毕业以后接受过 3 年以上的高等教育）；而对于 B 级（助理、助理资格）考试来说，招收的职员通常都是完成中等教育的人（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而在 C 级（文员）考试里，只要求候选者完成中等教育的第一部分即可（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历；有时甚至不要求任何文凭）。考试通过与否由职位的数目和考试中的名次先后决定。

3. 职业选择

目前法国文化事业也处于完全的改革之中，因此在这里列举的机构可能几个月之后就不再有同样的功能，甚至会被撤销。

学生找工作的途径一般是通过他们在大学学习、实习或各自的职业锻炼过程中结识的关系网络。目前还有一些网站发布工作信息（如 Cortex，Talents，Profilculture）。在结束学业之后，学生也可以到省级考古学中心或是其他一些考古学单位工作，如国立预防考古研究所（INRAP – Institut National de recherche en Archéologie Préventive）。加入这些不同的组织机构，可以使学生与发掘工作以及研究领域有直接的联系。学生也可以到不同的政府部门工作，如地区文化事务署（DRAC-Direction Régionale des Affaires Culturelles）、省级建筑与文化遗产部（SDAP-Service Départemental de l'architecture et du patrimoine）、地区考古部（SRA-Service Régional de l'Archéologie）等。到与博物馆有关的部门工作亦不失为学生就业的一条可能的途径。最后，学生亦可以到大学或是国家科研中心（CNRS）申请研究的职位。

本文介绍了法国考古领域课程设置的概况，可以看出它们的数量相当众多。由于考古领域实际能够提供的工作机会十分有限，因而相形之下它们的数目就显得更加众多。尽管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之小几乎让人有些沮丧，但值得提出的是，一个学考古的学生找到工作的机会也许渺茫，然而如果他在某一特定领域学有专长，或是他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发展到文化管理、文化项目的管理等方面，那么他就业的机会将大大增多。最后，不管是法国学生也好，外国学生也好，都必须记住：法国实地考古发掘和考古研究的方法，并不是坐在学校的教室里就可以学会的，要积极参与实地发掘以及发掘之后的工作，无论是有报酬的还是无偿的工作。

附录二

法国考古课程网址一览

杜尔若 编

A. Licence：人文社会科学—艺术史及考古学专业

机构名称	网址
Aix-Marseille I, Université de Provence(普罗旺斯大学—艾克斯—马赛—大)	http://www.up.univ-mrs.fr/
Besançon, Université de Franche-Comté(弗朗士孔岱大学，贝藏松)	http://com-extra.univ-fcomte.fr8088/CONSULFORMATION/DOMAINE/PHP/shs.php
Brest, Université (布雷斯特大学)	http://www.univ-brest.fr/index.php?page=affiche_formation&class=formation&object=formation40502fb799ece
Clermont-Ferrand, Université Blaise Pascal (帕斯卡大学，克莱蒙费朗)	http://www.univ-bpclermont.fr/lmd/ubp.php?action=licenceSHS
Dijon, Université de Bourgogne (勃艮第大学，第戎)	http://www.u-bourgogne.fr/index.php?rid=1420&cidori=300&cid=3012&uid=79
Université Lille 3 (里尔第三大学)	http://www.univ-lille3.fr/portail/index.php?page=FormationsLicenceDomaineShs
Lyon, Louis Lumiére (里昂第二大学)	http://www.univ-lyon2.fr/article.php3?id_article=63
Lyon, GHHAT (里昂第二大学地理、历史、艺术史及旅游系)	http://ghhat.univ-lyon2.fr/rubrique.php3?id_rubrique=17
Nantes (南特大学)	http://www.univ-nantes.fr/90704/0/fiche_907_structure/
Nancy 2 (南锡第二大学)	http://www.univ-nancy2.fr/formations/lmd/licence.html?Page_Num=2#2
Paris I (巴黎第一大学)	http://www.univ-paris1.fr/formation/arts_sciences_humaines/ufr03 /formations/licences/article4106.html
Paris IV (巴黎第四大学)	http://www.paris4.sorbonne.fr/fr/article.php3?id_article=2678
Paris 10 Nanterre (巴黎第十大学)	http://www.u-paris10.fr/LG05001/0/fiche_formation/

机构名称	网址
Pau（波城大学）	http://www.univ-pau.fr/lettres/page_html/licences_histoire_de_l_art_et_archeologie/index.html
Perpignan（佩皮尼昂大学）	http://www.univ-perp.fr/lsh/default-lsh.htm
Poitiers（普瓦提埃大学）	http://www.univ-poitiers.fr/rubrique/catalogue-formation/fiche_formation.asp?codesise = 20043763
Strasbourg II（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学）	http://www-umb.u-strasbg.fr/indexpage.php?Id = 002004001006005&cadre = c1
Toulouse II Le Mirail（图卢兹第二大学）	http://www.univ-tlse2.fr/fi/diplomes/licences/index.html
Tours, François-Rabelais（拉伯雷大学，图尔）	http://formatours.univ-tours.fr/HLLHIAR_43/0/fiche__formation/

B. Licence 之后

1. 大学系统(La filière universitaire)

a) 职业硕士(Master professionnel)

机构名称	课程名称	网址
Aix-Marseille(艾克斯—马赛大学)	Métiers du patrimoine（文化遗产相关职业）	http://www.up.univ-mrs.fr
Besançon, Université de Franche-comté（弗朗士孔岱大学，贝藏松）	Histoire des sociétés et des économies industrielles en Europe（欧洲社会和工业经济史）	http://com-extra.univ-fcomte.fr:8088/CONSULFORMATION/DOMAINE/PHP/shs.php
Bordeaux III（波尔多第三大学）	M2 de sciences appliquées à l'archéologie（考古应用学）	http://www.montaigne.u-bordeaux.fr/Ufr/ufr12/71Livret%202002 – 2003.pdf
Nantes（南特大学）	M2 métiers de l'archéologie（考古职业）	http://www.univ-nantes.fr/SI00074/0/fiche__formation/
Lyon, GHHAT（里昂第二大学地理、历史、艺术史及旅游系）	M2 Pro "Archéologie et histoire des mondes anciens"（Archéologie de l'objet, du bâti et du site: représentation, archivage, diffusion）（古代世界考古与历史[物品、建筑与遗址考古：介绍、存档与普及]）	http://ghhat.univ-lyon2.fr/article.php3?id_article = 176

机构名称	课程名称	网址
Paris I (巴黎第一大学)	M2 Conservation préventive des biens culturels (文化资产的预防性保护)	http://www.univ-parisl.fr/formation/arts_sciences_humaines/ufro3/formations/dess/article982.html
Paris I (巴黎第一大学)	Master Pro d'archéologie (考古学)	http://www.univ-paris1.fr/formation/arts_sciences_humaines/ufro3/formations/article4285.html
Paris IV (巴黎第四大学)	Master pro mention Archéologie et Histoire de l'Art, spécialité l'art contemporain et son exposition (考古与历史之现代艺术与表现专业)	
Poitiers (普瓦提埃大学)	Master Pro. "Patrimoine, nouvelles technologies et tourisme international" (文化遗产,新技术及全球旅游)	http://www.univ-poitiers.fr/rubrique/catalogue-formation/fiche_formation.asp?codesise=20043774

b) 研究硕士 (Master recherche)

机构名称	课程名称	网址
Aix-Marseille (艾克斯—马赛大学)	Protohistoire (史初史)	http://www.up.univ-mrs.fr
Aix-Marseille(艾克斯—马赛大学)	Archéologie grecque et romaine (古希腊罗马考古)	http://www.up.univ-mrs.fr
Aix-Marseille(艾克斯—马赛大学)	Préhistoire (史前史)	http://www.up.univ-mrs.fr
Aix-Marseille(艾克斯—马赛大学)	Archéologie médiévale (中世纪考古)	http://www.up.univ-mrs.fr
Besançon, Université de Franche-comté (弗朗士孔岱大学,贝藏松)	M1/2 Archéologie, territoires, environnement (考古、领土及环境)	http://com-extra.univ-fcomte.fr:8088/CONSULFORMATION/DOMAINE/PHP/shs.php
Besançon, Universit de Franche-comté (弗朗士孔岱大学,贝藏松)	M1/2 Constructions identitaires de l'antiquité à nos jours (远古至今的代表性建筑)	http://com-extra.univ-fcomte.fr:8088/CONSULFORMATION/DOMAINE/PHP/shs.php
Besançon, université de Franche-comté (弗朗士孔岱大学,贝藏松)	M1/2 Histoire des sociétés et des économies industrielles en Europe (欧洲社会和工业经济史)	http://com-extra.univ-fcomte.fr:8088/CONSULFORMATION/DOMAINE/PHP/shs.php

机构名称	课程名称	网址
Besançon, université de Franche-comté (弗朗士孔岱大学,贝藏松)	Grandes mutations culturelles et artistiques (大型文化及艺术变迁)	http://com-extra.univ-fcomte.fr:8088/CONSULFORMATION/DOMAINE/PHP/shs.php
Bordeaux III (波尔多三大)	M1/2 Histoire des mondes modernes et contemporains (R) (近现代世界史)	http://www.montaigne.u-bordeaux.fr/GUIDENS/diplomesLMD.htm
Bordeaux III (波尔多三大)	M1/2 Archéologie, sciences de l'Antiquité et du Moyen Age (R) (远古及中世纪考古和科学)	http://www.montaigne.u-bordeaux.fr/GUIDENS/diplomesLMD.htm
Bordeaux III (波尔多三大)	M1/2b Histoire de l'art et du patrimoine (艺术及文化遗产史)	http://www.montaigne.u-bordeaux.fr/GUIDENS/diplomesLMD.htm
Bordeaux III (波尔多三大)	M1/2 Matériaux du patrimoine culturel (文化遗产材料)	http://www.montaigne.u-bordeaux.fr/GUIDENS/diplomesLMD.htm
Clermont-ferrand (克莱蒙费朗)	Histoire des espaces et des cultures du Moyen Age à nos jours (中世纪至今空间及文化史)	http://www.univ-bpclermont.fr/lmd/ubp.php?action=masterSHS&PHPSESSID=b7a050b6f965beab414363013c89adfc
Clermont-ferrand (克莱蒙费朗)	Histoire, archéologie et sciences des mondes anciens et médiévaux (古代及中世纪历史、考古与科学)	http://www.univ-bpclermont.fr/lmd/ubp.php?action=masterSHS&PHPSESSID=b7a050b6f965beab414363013c89adfc
Dijon (第戎)	M1/2 Etudes médiévales: (Histoire, histoire de l'art, archéologie, musicologie) (中世纪研究:[历史、艺术史、考古学、音乐学])	http://www.u-bourgogne.fr/index.php?rid=1420&cidori=3001&cid=3004&uid=79
Dijon (第戎)	M1/2 Histoire et archéologie des mondes antiques (histoire, archéologie) (古代历史与考古[历史、考古])	http://www.u-bourgogne.fr/index.php?rid=1420&cidori=3001&cid=3004&uid=79
Dijon (第戎)	M1/2 Préhistoire et protohistoire/archéologie spatiale et paléoenvironnement (史前史与史初史/空间考古学与古环境)	http://www.u-bourgogne.fr/index.php?rid=1420&cidori=3001&cid=3004&uid=79
Lyon, GHHAT (里昂第二大学地理、历史、艺术史及旅游系)	Master 1/2 Archéologie et histoire des mondes anciens (古代世界考古与历史)	http://ghhat.univ-lyon2.fr/rubrique.php3?id_rubrique=23

机构名称	课程名称	网址
Paris X Nanterre (巴黎第十大学)	M2 Culture de l'Antiquité classique (古典时代的文化)	http://web.mae.u-paris10.fr/recherche/deacult.htm
Paris X Nanterre (巴黎第十大学)	M2 ethnologie et sociologie comparative, ethnomusicologie et préhistoire (人种学与比较社会学,原始音乐学与史前史)	http://www.mae.u-paris10.fr/ethnologie/ethnomaster3.php?ID=32903
Paris I (巴黎第一大学)	M2 Archéologie préhistorique et protohistorique (史前与史初考古学)	http://www.univ-paris1.fr/lmd/fiche_diplome.php?numero=81&diplome=master1
Paris I (巴黎第一大学)	M2 Archéologie des périodes historiques (历史阶段考古学)	http://www.univ-paris1.fr/lmd/fiche_diplome.php?numero=81&diplome=master1
Paris IV (巴黎第四大学)	M2 Archéologie: textes, terrain, vestiges «R» (考古学:文本、实地、遗迹)	http://www.paris4.sorbonne.fr/fr/article.php3?id_article=2619
Paris IV (巴黎第四大学)	M2 Archéologie: Équipement de la personne et arts appliqués: le vêtement (考古学:个人用品与实用工艺:服饰)	http://www.paris4.sorbonne.fr/fr/article.php3?id_article=2619
Paris IV (巴黎第四大学)	M2 Antiquité classique: archéologie et civilisation (古典时代:考古与文明)	http://www.paris4.sorbonne.fr/fr/article.php3?id_article=2619
Poitiers (普瓦提埃)	M2 civilisation antique et médiévale (远古及中世纪文明)	http://www.univ-poitiers.fr/rubrique/catalogue-formation/fiche_formation.asp?codesise=20043766
Strasbourg Ⅱ (斯特拉斯堡二大)	Sciences de l'Antiquité et archéologie du territoire (古代科学与地域考古)	http://www-umb.u-strasbg.fr/c1.php3?Id=018&cadre=c1
Toulouse, Le Mirail (图卢兹大学)	M1/2 Arts et cultures de la préhistoire (史前工艺与文化)	http://www.univ-tlse2.fr/fi/diplomes/masters-rech/index.html
Toulouse, Le Mirail (图卢兹大学)	M1/2 Sciences de l'antiquité (古代科学)	http://www.univ-tlse2.fr/fi/diplomes/masters-rech/index.html
Toulouse, Le Mirail (图卢兹大学)	M1/2 Études médiévales (中世纪研究)	http://www.univ-tlse2.fr/fi/diplomes/masters-rech/index.html

2. 高等学校系统(Les écoles)

— 卢浮学校(L'école du Louvre): http://www.ecoledulouvre.fr

—"文化资产的保存和修复"职业硕士(MST), Master «conservation-restauration des biens culturels», Paris I:

http://www.univ-parisl.fr/formation/arts_sciences_humaines/ufr03/formations/masters/article2628.html

http://www.univ-parisl.fr/lmd/fiche-diplome.php?numero=52&diplome=masterl

http://www.ffcr-fr.org.format/mst.htm.

—国立文化遗产研究所: 文化遗产复原者部(IFROA) Institut National du patrimoine: Département des restaurateurs du patrimoine (IFROA):

http://www.culture.gouv.fr/culture/ifroa.htm

—高等师范学院(ENS): http://www.ens.fr/entrer/

—高等实验学院(EPHE): http=//www.ephe.sorbonne.fr/accueilshp.htm 及 http://www.ephe.sorbonne.fr/masterSHS/accueil.htm

C. Master 之后

3. 职业选择(Le milieu professionnel)

—工作机会: http://www.profilculture.com, http://www.talents.site-recrutement.com, http://www.cortext-culturemploi.com

—考古的各种行政决策: http://www.culture.gouv.fr

—国立预防考古研究所(INRAP): http://www.inrap.fr

附录三

作者、译者的联系方式

B

Erika BODIN（鲍爱丽）
中法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UFR S. S. A. , Département d'Ethnologie UMR 7041 ArScAn, équipe: Anthropologie des techniques, des espaces et des territoires aux Plio/Pleistocène
200, *avenue de la République*
92001 Nanterre
France 法国
erikabodin@ hotmail. com

Eric BOËDA（博爱客）
巴黎第十大学(Université Paris X-Nanterre)教授
UMR 7041 ArScAn- AnTET.
Maison de l'Archéologie et de l'Ethnologie
Université de Paris X
92023 Nanterre cedex France
France 法国
eric. boeda@ wanadoo. fr

Bruno BRUGUIER（布吉耶）
法国远东学院研究员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 Phnom Penh
P. O. Box 878
Phnom Penh,
Cambodge 柬埔寨
efeo_ph_pnh@ camnet. com. kh

Jean-Pierre BRUN(博伦)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意大利贝哈尔中心(CNRS-Centre Jean Bérard)教授
Centre Jean Berard

Via Crispi n. 86
80121 Napoli
Italy 意大利
berard@ unina. it

Michela BUSSOTTI（米盖拉）
法国远东学院（EFEO）研究员
100010 北京市朝内大街 137 号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
efeo2002@ yahoo. com. cn；michela. bussotti@ yahoo. com. cn

C

陈伯桢
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
台湾 106 台北市罗斯福路四段一号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
pochan@ ntu. edu. tw

陈星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100710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 27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chenxingcan@ hotmail. com

D

Axel DAUSSY（杜爱溪）
国立预防考古研究所（Institut National de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Préventives）
技术工程师
Base INRAP
13 rue Négoce
31650 Saint Orens de Gameville
France 法国
axel. daussy@ inrap. fr

Corinne DEBAINE-FRANCORT（戴蔻琳）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UMR 7041“考古学与古代科学”—中亚考古研究所教授
CNRS - UMR 7041 ArScAn
21 allée de l'Université,
92023 Nanterre cedex
France 法国
corinne. debaine@ wanadoo. fr

Sandrine DURGEAU（杜尔若）
巴黎一大(Université Paris I)陶瓷学专业博士生
Université Paris I-UMR 8546, Centre archéologique de Seine Saint Denis
1 à 3 route de Saint Leu
93600 Epinay-sur-Seine
France 法国
sadurgeau@ hotmail. com

F

Lothar von FALKENHAUSEN（罗泰）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史系教授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UCLA
Los Angeles, CA 90095—1417
USA 美国
lothar@ humnet. ucla. edu

Rowan FLAD（付罗文）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助教授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Peabody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 11 Divinity Avenue
Cambridge, MA 02138
USA 美国
rflad@ fas. harvard. edu

G

Louis GABAUDE（嘉博德）
法国远东学院(EFEO)研究员
124/123 Soi 1 - Suraphon Niwet
San Kamphaeng Road
Chiang Mai 50000
Thailande 泰国
gabaudel@ loxinfo. co. th

Jacques GAUCHER(郭榭)
法国远东学院(EFEO)研究员
C/O EFEO Phnom Penh
P. O. Box 878
Phnom Penh

Cambodge 柬埔寨
jacques. gaucher@ efeo. net;jacques_gaucher@ yahoo. com

Christophe GRIGGO（葛励施）
格勒诺布尔第一大学教授
Université Joseph Fourier-Grenoble I
Equipe de Recherche sur les Peuplements et Paléoenvironnements Paléoalpins（ERPPA）
FSEP - UMR 6636 du CNRS
Institut Dolomieu
38031 Grenoble
France 法国
cgriggo@ ujf-grenoble. fr

H

Andrew HARDY（员哈迪）
法国远东学院（EFEO）研究员
EFEO
5A Xom Ha Hôi
Hànôi
Vietnam 越南
hardyvn@ yahoo. co. uk

何竞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师
jacqueshe@ vip. sina. com;jacqueshe8@ hotmail. com

侯亚梅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100044　北京 643 信箱，西直门外大街 142 号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houyamei@ ivpp. ac. cn

黄万波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100044　北京市西直门外大街 142 号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huangwanbo@ sina. com

I

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83001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北京路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J

Fabienne JAGOU（谷岚）
法国远东学院（EFEO）研究员
台湾台北市南港区
11529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法国远东学院台北中心
fabiennejagou@ yahoo. fr

L

李水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10087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
lisc@ pku. edu. cn

李学勤
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100084　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
xqli@ mail. tsinghua. edu. cn

李英华
中法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100044　北京市西直门外大街 142 号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archlyh@ tom. com

刘海旺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450000　郑州市陇海北三街 9 号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haiwangliu@ yahoo. com. cn

刘庆柱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100710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27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liuqz@ cass. org. cn

刘驯刚
100026 北京市朝阳区白家庄东里40楼803号
（原）轻工业部外事司
bjlfgml@ 126. com

鲁娜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硕士
100044 北京市西直门外大街142号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lunar0411@ yahoo. com. cn

M

Pierre-Yves MANGUIN（莽甘）
法国远东学院(EFEO)教授
E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
22 avenue du President Wilson
75116 Paris
France 法国
pierre-yves. manguin@ efeo. net; manguin@ efeo. fr

Bernard MATHIEU（马迪厄）
法国东方考古学研究所(IFAO)前所长
蒙彼利埃大学教授
Maître de conférences en égyptologie (HDR)
Université Paul Valéry (Montpellier III)
Route de Mende
34199 Montpellier Cedex 5
France 法国
bernard. mathieu@ univ-montp3. fr; bmathieu@ ifao. egnet. net

梅建军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所长
100083 海淀区学院路30号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
jianjun_mei@ hotmail. com; meijianjun12@ yahoo. com. cn

Pierre MORET (莫雷)
委拉士开支研究所(Casa de Velázquez)教授
Casa de Velázquez
Calle de Paul Guinard, 3
Ciudad Universitaria
E -28040 Madrid
España 西班牙
moret@ cvz. es

Dominique MULLIEZ (缪理业)
法国雅典学院(Ecole française d'Athènes)院长
Ecole française d'Athènes
6, rue Didotou
10680 Athènes
Grèce 希腊
dominique. mulliez@ efa. gr

P

Philippe PAPIN (帕潘)
法国高等实验学院(EPHE)教授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4e Section (Sciences historiques et philologiques)
à la Sorbonne
45 -47, rue des Ecoles
75005 Paris
France 法国
papin. philippe@ club-internet. fr

Daniel PERRET (贝雷)
法国远东学院(EFEO)研究员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Jalan Ampera III/26
Kemang
12550 Jakarta Selatan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dagperret@ yahoo. com

Christophe POTTIER（博悌叶）
法国远东学院(EFEO)研究员
Ecole française d' Extrême-Orient-Siem Reap
Siem Reap
P. O. Box 93300
Siem Reap
Cambodge 柬埔寨
efeo. pottier@ online. com. kh；christophe. pottier@ efeo. net

R

Michel RASSE（何觅乐）
鲁昂大学(Université de Rouen)副教授
Département de Géographie
Université de Rouen
76821 Mont Saint Aignan
France 法国
michel. rasse@ univ-rouen. fr

Michel REDDE（列德）
法国高等实验学院(EPHE)教授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4e Section（Sciences historiques et philologiques）
à la Sorbonne
45－47，rue des Ecoles
75005 Paris
France 法国
redde. michel@ club-internet. fr

Pascal ROYERE（若耶尔）
法国远东学院(EFEO)研究员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 Siem Reap
C/O EFEO Phnom Penh
P. O. Box 878
Phnom Penh
Cambodge 柬埔寨
pascal. royere@ efeo. net

S

Josette SAREL（沙悠诗）
国立预防考古研究所（Institut National de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Préventives）助教
Institut National de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Préventives
31, rue Delizy
93698 Pantin Cedex
France 法国
sarel. josette@ wanadoo. fr

Heddy SURACHMAN（苏拉尺曼）
国家考古研究与发展中心（Puslitbang Arkeologi Nasional）研究员
Jl. Raya Condet Pejaten no 4
Pejaten
Pasar Minggu
Jakarta 12510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孙建民
23, avenue de Verdun
94410 Saint Maurice
France 法国
sunjmavril@ hotmail. com

孙智彬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610041 四川省成都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zbsuns@ yahoo. com. cn

T

Alain THOTE（杜德兰）
法国高等实验学院（EPHE）教授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4e Section（Sciences historiques et philologiques）
à la Sorbonne
45 – 47, rue des Ecoles
75005 Paris
France 法国
alain. thote@ wanadoo. fr

V

Olivier VENTURE（风仪诚）
法国高等实验学院(EPHE)副教授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et philologiques
Sorbonne
45 – 47, rue des Ecoles
75005 Paris
FRANCE 法国
olivier. venture@ ephe. sorbonne. fr

Franciscus VERELLEN（傅飞岚）
法国远东学院院长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2 avenue du President Wilson
75116 Paris
France 法国
direction@ efeo. net, verellen@ efeo. fr

W

王昌燧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
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主任
100049　北京市玉泉路 19 号甲
cswang@ gucas. ac. cn

韦遨宇
17, allée de Saint Paul
92390 Villeneuve la Garenne
France 法国
weiaoyu@ free. fr

吴旻
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编译主管
100010　北京市朝内大街 137 号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
edition_efeo@ 126. com

X

徐自强
龙骨坡巫山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国家图书馆分馆
邮编:100034
lgpcnfr@ sina. com

Y

杨宝成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考古系教授
中法联合考古队队长
430072　湖北武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袁俊杰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100044　北京市西直门外大街142号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junjie_yuan@ yahoo. com. cn

袁振东
安阳师范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院史研究所博士生
100010　北京市朝内大街137号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yuanzhendong@ ihns. ac. cn, yuanzhendong@ gmail. com

Z

ZHAO Bing (赵冰)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 UMR 7133 (Centre de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chinoise, japonaise et tibétaine)研究员
Collège de France
52, rue du Cardinal Lemoine
75005 Paris
France 法国
zhao. bing@ free. fr

赵凌霞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
100044　北京市西直门外大街142号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zhaolx@ mx. cei. gov. cn

周莽
北京大学法语系副教授
100871 北京市北京大学法语系
mang. zhou@ gmail. com

朱继平
合肥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
230009 安徽省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合肥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jpzh@ ustc. edu. cn

邹欢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100084 北京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zouhuan@ hotmail. com